



書名：邱會作回憶錄

Memoir of Qui Huizuo

作者：邱會作

頁數：上、下兩冊，共 1028 頁（照片：98 幅）

简介：

邱會作（1914-2002）

江西省興國縣人。1955 年被授予解放軍中將軍銜；曾任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兼總後勤部部長，中共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文化大革命」中任中央軍委辦事組成員。1981 年 1 月 23 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確認」邱會作是「林彪反革命集團主犯」判有期徒刑 16 年。1987 年刑滿。2002 年 7 月 18 日病逝於北京協和醫院，享年 89 歲。

《邱會作回憶錄》

上册目錄

寫在前面的話

第一篇 戰鬥的歷程

第一章 少年時代

我的家鄉

紅軍來了

蘇維埃

三代同堂幹革命

第二章 戰鬥在家鄉

第一次戰鬥

巧當紅軍

肅清「AB團」

參加粉碎第一次「圍剿」

參加粉碎第二次「圍剿」

參加粉碎第三次「圍剿」

第三章 紅色瑞金

在瑞金

長征前的準備

周恩來、葉季壯救了我的命

出發前夕

人民為革命付出的代價

第四章 兩萬五千里長征

出發「上前線」

「全權代表」

為紅五軍團送餉

在遵義

「娃娃科長」

相識毛澤東

第五章 艱苦的歲月

過大渡河

翻越大雪山

紅軍一、四方面軍會合

過草地

紅軍的重大分裂

最後的難關

第六章 永遠的延安

初到陝北 任糧食局長

在抗大學習

任軍委供給部長

解決經費問題

開展生產運動

邊區的財經和供給工作

抗戰初期的國共兩黨合作

第七章 華中三年

中央財經工作團

淮北往事

從四師回延安

到綏德

胡敏的革命精神和戰鬥作風

第八章 參加七大

在中央黨校學習

整風與七大

會場集錦

選舉與閉幕

打回老家去

第九章 「我們的八縱」

戰鬥在熱河

八縱成立

戰鬥力提高了

第十章 遼瀋戰役

吉林會議

政治整軍與軍事訓練

錦州攻堅戰

遼西會戰

遼瀋戰役的歷史地位

第十一章 平津戰役

奉命進關

重要的決策

三分鐘突破民權門

城市政策紀律

勇猛果敢的黃永勝

第十二章 向中南進軍

四野高幹會

將革命進行到底

向江南進軍

山地運動戰的典範

衡寶戰役的重大意義

進軍廣西

執行粵西和桂東南剿匪任務

統一對剿匪性質的認識

第二篇 軍隊建設的征程

第十三章 從廣州到北京

到廣州工作

華南軍區的三反運動

部隊文化教育

重返後勤戰線

關於肅反問題

參加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

第十四章 新軍委成立

軍委統帥部的改組

軍委辦公會議

穩定軍隊的高級幹部

總後的新班子

林彪批評了朱德

一點教訓

第十五章 林彪對我軍建設的貢獻

廣州軍委擴大會議

北頂南放

北京軍委擴大會議

全軍編制裝備會議

研究確定我軍編制

我軍後勤的編制

部隊後勤裝備

林彪關於當前部隊工作的講話

第十六章 準備打仗與後勤建設

後勤戰略方針與後方基地建設

全國的戰略勘察

後方基地的勘察和建設

軍馬生產

戰備物資儲備

劃區供應

機關工作的整頓和建設

妥善安排老幹部

第十七章 後勤業務改革

調整幹部隊伍

學校整編和學制調整

加強與建設科研機構

知識分子政策問題

改革軍服質量和顏色

改革物資供應

改革醫療衛生

改革財務管理

第十八章 軍隊農副業生產

三年災害對軍隊的影響

生產渡荒

軍隊生產以「副」業起家

軍隊生產以「自」業傳家

全軍歷次農副業生產會議

軍隊的生產效益

毛主席的《五七指示》

附：《五七指示》

第十九章 後勤工作的天職

正確認識後勤工作的地位

充分發揚革命幹勁

黨委當家，全軍辦後勤

局部與整體的關係

認真管理業務

反對空頭政治

勤懇辦事，勤儉辦事，勤巧辦事

第二十章 軍隊的風雨歷程

林總推選羅瑞卿為總參謀長

羅瑞卿的變化

軍隊內部兩個陣營的形成
全軍大比武
劉亞樓、楊成武、蕭華的作用
葉帥打招呼
毛主席的底牌
林彪給毛主席的信

第三篇 人民軍隊忠於黨

小引
附： 林彪同志給賀龍等同志的信
第二十一章 軍隊文革的序幕
上海緊急會議
我過了關
中央工作小組會議
關於「四條」的問題
羅瑞卿的錯誤和林總的態度
羅瑞卿檢討與「自殺」
羅瑞卿炫耀自己
葉帥的總結
楊成武是反羅的幹將
附：關於羅瑞卿同志錯誤問題的報告

第二十二章 炮打司令部
端掉彭、羅、陸、楊
要進行反擊戰了
劉少奇談彭、羅、陸、楊
嚴慰冰事件
首都工作小組
毛澤東點火
十一中全會的特點
歷史的教訓
附：毛澤東《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
第二十三章 軍隊文化革命的方針和三個階段
附：「一〇五」緊急指示

中央軍委命令（軍委八條）

中央軍委命令（軍委十條）

第二十四章 全軍文革支持造反

總政李曼村與總後結「冤家」

二醫大「紅縱」發難

軍隊院校進京

天安門上被告了一狀

「一〇五」緊急指示

江青接見「紅縱」頭目

第一次昏倒在批鬥場上

「紅縱」把總後變成鬼蜮世界

五大部長

兇惡的武鬥昏天黑地

上册照片索引

邱會作，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將軍銜

一九六九年當選為第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

二〇〇二年春節，人生最後一張照片

一九七〇年，軍委辦事組在西山軍委前方指揮所

一九七〇年，在文化大革命中

一九七〇年在長城

一九七〇年在京西賓館

一九七〇年在長城

一九七〇年，在廬山九屆二中全會期間

一九七〇年，軍委辦事組在西山

一九九二年，老戰友在北京相聚

邱會作對胡敏說：我們參加革命是對的！

「勤懇辦事、勤儉辦事、勤巧辦事是我軍後勤工作的天職」

二〇〇八年十月二十三日，邱會作將軍去世六年後魂歸故里

江西興國高興圩上密村楓木凹現貌

江西興國高興圩上密村老家

軍委供給部長兼政委葉季壯

一九四〇年，新四軍六支隊部分領導

一九三七年，胡敏在八路軍前線野戰醫院
一九四五年，胡敏在延安重逢
一九四八年冬，胡敏與承光在齊齊哈爾
一九五二年，胡敏在廣州任軍區總醫院小兒科主任
一九六三年，胡敏在總後大院家門口
一九六〇年，胡敏任解放軍通信兵部衛生處長
胡敏晚年
一九四六年在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
一九四六年在熱河
一九四六年在承德
任赤峰地委書記
八縱第一任司令員黃永勝
任東野八縱政治委員時留影
和八縱戰友在一起
一九四八年九月，在遼河三江口檢查浮橋
一九四八年遼西會戰勝利後，八縱老戰友在一起
遼瀋戰役後，八縱召開慶功大會，邱會作時任八縱政委
林彪突擊隊獎旗
整理遼瀋戰役總結報告
和二十四師戰友
平津戰役勝利後留影
和一三五師戰鬥英雄、毛澤東獎章獲得者在一起
和四十五軍戰友在一起
一九四九年十月與到該軍採訪的蘇聯著名作家西蒙諾夫合影
與父親分別二十年在廣州相見
一九五二年中央慰問團在廣州慰問中國人民解放軍
一九五二年在廣州向中央慰問團匯報工作
一九五六年在後勤學院開學典禮上講話
一九五七年，在北京高級黨校學習期間於頤和園留影
在高等軍事學院學習期間參加將軍合唱團練歌
一九六〇年，廣州軍委擴大會議八元帥合影
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澤東主席在廣州接見出席軍委擴大會議的全體與會人員
一九六三年在南京靈谷塔

一九六四年在越南

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林彪接見革命群眾

A portrait of a man in a military uniform, likely a high-ranking officer, wearing a peaked cap and several medals. The image is the background for the book cover.

邱會作回憶錄

【作為歷史的親歷者，有責任做一個記錄者】

方块字读书社区 <http://book.sinozi.cn>



滿江紅

怒髮冲冠憑系屬
滿江紅
雨歇拾生眠
仰天长嘯壯懷激
烈三十功名塵與
土八千里路雲和月
莫等閑白了少年頭
空悲切

靖康恥猶未雪臣
子恨何時滅駕長
車踏破賀蘭山缺
北風飢餐胡虜肉
笑談渴飲匈奴血
待從今日靜胡河
朝天闕

己巳年夏仲月

鄭文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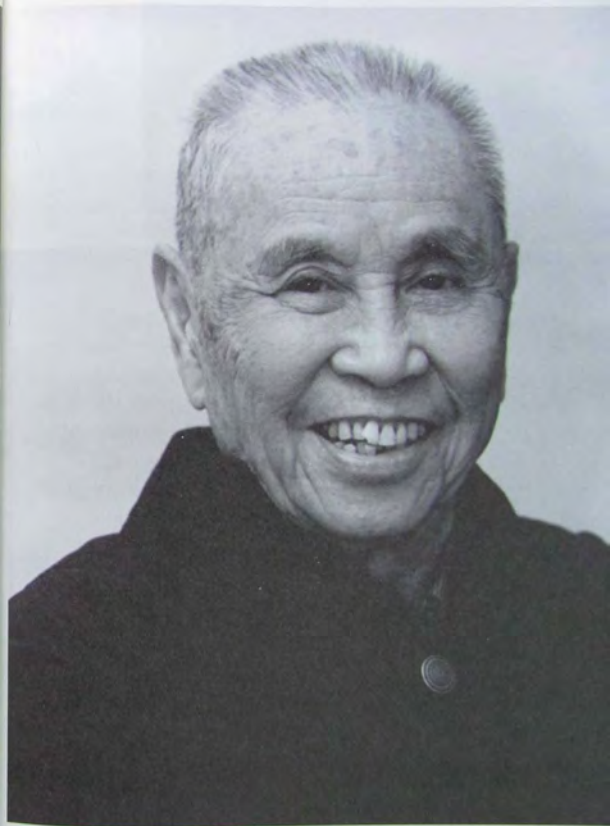




邱會作 (1914-2002)，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中將軍銜。



一九六九年當選為第九屆中央政治局委員。



二〇〇二年春節，人生最後一張照片。

一九七〇年，李俊在西山军委后方医院。
前排左起：李俊、王成、刘智、王作、吴法宪、黄永胜、李作鹏、李德生。





一九七〇年在長城。左起：李作鵬、邱會作、胡敏、葉群、陳綏圻、吳法憲、黃永勝。



一九七〇年在京西賓館。前排左起：董其采、胡敏、葉群、吳法憲、項輝方、陳綏圻。
後排左起：李作鵬、黃永勝、邱會作。



一九七〇年在長城。左起：黃永勝、邱會作、吳法憲、李作鵬、陳媛圻、葉群、胡敏。



一九七〇年，在廬山九屆二中全會期間。



一九七〇年，軍委辦事組在西山。

左起：溫玉成、劉賢權、邱會作、吳法憲、黃永勝、李作鵬、李德生。



一九九二年，老戰友在北京相聚。



風雨同舟六十載。邱會作對胡敏說：我是江西的窮苦人，你是陝西的窮苦人，不參加革命我們怎麼能走到一起，我們參加革命是對的！



二〇〇八年十月二十三日，邱會作將軍去世六年後魂歸故里。



目錄

上冊

| | |
|-----------|-------|
| 照片索引..... | xxiii |
|-----------|-------|

| | |
|-------------|---|
| 寫在前面的話..... | 1 |
|-------------|---|

第一篇 戰鬥的歷程

| | |
|-------------------|----|
| 第一章 少年時代..... | 5 |
| 我的家鄉..... | 5 |
| 紅軍來了..... | 9 |
| 蘇維埃..... | 10 |
| 三代同堂幹革命..... | 12 |
| 第二章 戰鬥在家鄉..... | 15 |
| 第一次戰鬥..... | 15 |
| 巧當紅軍..... | 16 |
| 肅清「AB團」..... | 20 |
| 參加粉碎第一次「圍剿」..... | 22 |
| 參加粉碎第二次「圍剿」..... | 25 |
| 參加粉碎第三次「圍剿」..... | 26 |
| 第三章 紅色瑞金..... | 32 |
| 在瑞金..... | 32 |
| 長征前的準備..... | 35 |
| 周恩來·葉季壯救了我的命..... | 40 |
| 出發前夕..... | 42 |
| 人民為革命付出的代價..... | 43 |
| 第四章 兩萬五千里長征..... | 46 |
| 出發「上前線」..... | 46 |
| 「全權代表」..... | 48 |
| 為紅五軍團送餉..... | 53 |
| 在遵義..... | 57 |
| 「娃娃科長」..... | 59 |
| 相識毛澤東..... | 63 |
| 第五章 艱苦的歲月..... | 67 |

| | |
|---|-----------|
| 一九四九年十月與到該軍採訪的蘇聯著名作家西蒙諾夫合影 | 206 |
| 與父親分別二十年在廣州相見 | 220 |
| 一九五二年中央慰問團在廣州慰問中國人民解放軍 | 224 |
| 一九五二年在廣州向中央慰問團匯報工作 | 224 |
| 一九五六年在後勤學院開學典禮上講話 | 228 |
| 一九五七年，在北京高級黨校學習期間於頤和園留影 | 229 |
| 在高等軍事學院學習期間參加將軍合唱團練歌 | 235 |
| 一九六〇年，廣州軍委擴大會議八元帥合影 | 251 |
| 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澤東主席在廣州接見出席軍委擴大會議的全體與會人員 | 253 |
| 一九六三年在南京靈谷塔 | 281 |
| 一九六四年在越南 | 286 |
| 一九六六年毛澤東、林彪接見革命群眾 | 448 |
| 一九六七年一月，毛澤東主席接見軍隊高級幹部 | 499 |
| 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在天安門城樓上 | 569 |
| 一九六八年，在文化大革命中時任中央軍委辦事組成員 | 571 |
| 一九七〇年周總理參觀我軍新研製的 69 式 40 火箭筒打坦克表演 | 574 |
| 毛澤東、林彪周恩來在九大開幕式上 | 617 |
| 總理說：「中央政治就是處理好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關係。」 | 681 |
| 九屆中央委員會副主席林彪在九屆二中全會開幕式上講話 | 692 |
| 「歸來罷去，把帽子給我們扣上了，可憲法草案上 ...」 | 725 |
| 林彪對黃吳李邱說：「你們照常吃飯，照常睡覺。頂多做個彭德懷第二。」 | 729 |
| 一九七〇年，陪同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接見朝鮮軍事代表團 | 731 |
| 一九七〇年十一月，陪同周總理、李先念副總理會見羅馬尼亞政府代表團 | 732 |
| 一九七一年「五一」節 | 768 |
| 有口難辯，在一九八一年「公審」中 | 921 |
| 黃永勝總參謀長 | 945 |
| 胡敏拜見黃永勝陵墓 | 951 |
| 胡敏看望老首長李作鵬 | 952 |
| 邱會作的母親 | 957 |
| 一九八〇年，經過近十年的磨難，兄、弟、妹五人第一次在北京見面 | 963 |
| 和京京、新平一家合影 | 964 |
| 路光一家合影 | 965 |
| 和承光一家合影 | 966 |
| 和光光一家合影 | 967 |
| 和小光一家合影 | 968 |
| 光光、小光同在一個部隊、一個城市 | 969 |
| 一九九五年，胡敏和老戰友項輝方在西安家中 | 971 |
| 胡敏和林立衡（豆豆）在一起 | 972 |
| 一九九九年，和老戰友李作鵬在一起 | 980 |
| 二〇〇七年，胡敏看望老首長李作鵬 | 982 |
| 真情實意 | 988 |
| 邱會作將軍銅像揭幕 | 990 - 994 |
| 人民總理周恩來的評價 | 995 |

寫在前面的話

一九二九年初，毛主席領導的隊伍從井岡山下來，到興國、雩都一帶開闢新的根據地，革命的紅旗把我們一家窮苦人都捲入革命的隊伍，我們家是三代同堂鬧革命，那時我剛剛十五歲。經過了槍林彈雨，經過了艱苦歲月，經過了南征北戰，在黨和毛主席的教育培養下，我逐漸成長起來了。在幾十年的革命征程中，我都是積極工作、努力奮鬥的，為之流過鮮血、負過傷並付出全部力量，這一切我都認為是革命者的本色。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是偉大的，是英雄輩出，群星燦爛的，我祇是燦爛群星中的一顆小星。因此，我過去從沒有想到去寫個人的回憶錄。

在公審之後，我想寫回憶錄的願望越來越強烈。

我原以為公審祇是走個過場，是讓我們為毛主席，為周總理，為黨中央在文革時期工作中的錯誤擔當一些責任。沒想到公審竟是以「創造性」的法律形式解決黨內路線問題，用不實事求是的態度和方法衡量文革時期的工作，還給我們帶上一頂莫須有的反革命帽子，甚至還無端地把我們和江青一夥捆在一起。這一切表面上是打擊我們，實際上直指毛主席、周總理及黨中央。

在文革期間，林彪主持軍委的日常工作，並被毛主席欽定為接班人；周恩來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當時我正工作在一線，是在周恩來總理的直接領導下，和當時在臺上的老同志們一起為黨工作。在極其複雜困難的情況下，大家怎樣支撐著黨的工作，怎樣支撐著共和國的肌體，怎樣用夜以繼日的工作來使損失減到最小程度，被公審搞得黑白顛倒、面目全非，看來我有必要向黨和人民做一匯報，再了此殘生。當然在文革中，我在工作上的錯誤和失誤也要認真地總結教訓。這就是我寫回憶錄的初衷。

我要特別指出的是，現在的當權者常自詡和江青一夥做了鬥爭。他們怎麼做了鬥爭？他們的鬥爭是在毛主席已經去世、「四人幫」為階下囚

之時，是在文革已被徹底否定的時候；我們怎麼做了鬥爭？我們的鬥爭是在毛主席健在，江青一夥還是黨的領導人，文革還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時候。有些人自己被打成反革命委曲得不得了，但是他們把別人打成反革命又毫不客氣。

八一年，我「保外就醫」到西安時，才知道老伴胡敏還在「監督勞動」之中，五個兒女也受到無端的株連，我的震驚難於言表！在七一年九月二十四日，我們在人大會堂被抓起來時，周恩來總理當著黃、吳、李、邱的面說：「毛主席決定你們離開工作崗位，反省自己的問題，時間不會太長。你們的老婆、孩子都是革命的，你們回來以後，如果他們遭到什麼不是，找我姓周的是問！」說完周總理用手在胸脯上一拍。也許這就叫信誓旦旦吧。

我和老伴已分別十年，真是生死兩茫茫。當老伴從勞改農場坐上馬車，轉坐手扶拖拉機，再轉乘長途汽車風塵僕僕趕到西安與我會合時，我眼前出現的已不是飽含熱情、充滿朝氣的胡敏，而是一個飽經苦難、白髮蒼蒼的老太婆。我們祇有含淚相望。我對老伴說：「我是江西的窮苦人，你是陝西的窮苦人，不參加革命我們怎麼能走到一起，我們參加革命是對的！雖然我們經歷了這麼大的磨難，但跟著黨、跟著毛主席幹革命信念從來沒有動搖過。我們都是以革命為職業的人，失去了革命工作就等於失去了一切。不過我們還是要堅強地活下去，我們要把一生的經歷寫出來，看看是不是對得起自己，對得起兒女，對得起黨和人民。」

我的回憶錄是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從八二年的冬夜開始動筆的，當時不但沒有任何資料，生活困難的連紙張都買不起，幸有老伴四處請鄰居幫忙，第一部分草稿是用百家紙寫就的。我的回憶錄，談不上什麼教益，僅作為這段歷史的親歷者，有責任做一個記錄。但其中肯定會有不少缺點、不準確之處甚至錯誤，請讀者批評指正吧。

謹以此書獻給與我幾十年革命在一起、磨難在一起的老伴胡敏和因我受到株連的老戰友和同志們。

第一篇

戰鬥的歷程

第一章 少年時代

在我的記憶裏，我少年時代的生活情景，是從紅軍來了之後才是最清晰的。我十四歲參加革命，十五歲參加紅軍，一直在人民軍隊中生活。因此，我把參加紅軍作為對少年生活回憶的開始，也是很自然的。

我的家鄉

一九一四年四月十六日，我出生在江西省興國縣高興圩上密村的楓木凹。這是一個小山村，每個山坳坳裏三五戶人家。我的家鄉自然條件還不錯，農民世代以耕作為生，主要農作物是水稻和紅薯。

我們屬客家人。江西南部是本地人和客家人雜居的地方。我們的祖上在河南、山東一帶，邱氏祠堂供奉的是姜太公，這就是我們的祖先了。姜太公封邑在山東淄博，繁衍其後的有撰《左氏春秋》的左丘明……。古時候戰亂不斷，我們的祖上為躲兵亂而南遷到廣東省梅縣地區，後因災荒，又逃荒到興國縣高興圩。



江西興國高興圩上密村楓木凹現貌。

從我記事以來，我的家庭就是過著勤勞的生活。祖父邱順接是一個治家非常勤儉的人，全家祇有一套共用的外出穿的衣服，我祖父、我父親出門時，輪流穿。我們這些小孩子穿的很破爛，我從不記得我穿過新衣服。

我的祖父是個能幹又能吃苦的人。祖父種田不算裏手，他就在路旁的石巖下賣茶水為生，無論天晴、下雨，一年到頭天天如此，因為茶攤在路邊，過往的生意人、官差，甚至挑東西的腳夫，都在這裏喝茶休息，他們能帶來一些外面的消息。老倌們幾乎都是幾代人沒有出過遠門，十幾里以外是個什麼樣子都不太知道，到過縣城的就是能人了。

祖父為人非常本分、正義，在全村他都是人家的上客，大家對他十分尊敬。祖母從小是一個孤兒，不知道自己叫什麼名字。祖母從小靠要飯為生，以後她就給地主家餵豬賺飯吃。我的祖母是最善良最勤勞的人，她耕田、做農活，做家務活、撫養孩子。我小時同我的祖母是寸步不離的，晚上和祖母睡在一起，祖母是我最親的人。一九三一年，我祖母去世，埋在家後面的山坡上，一九三四年紅軍長征走了，國民黨反動派的軍隊和還鄉團對紅軍的家屬進行迫害，我祖母的墳也被毀了。

父親邱時昕。他是一個非常忠厚的老實人。父親在全村德高望重，人們都稱他為「時昕老大」，村子裏各家有事，都請父親到場，都願意聽他的意見。

我的父親也是勤勞一生。他青年時期以挑山貨為主，挑運山貨要付出很強的勞動力，賺錢不多，但無須本錢，活計靠得住。歇息在家時，他每天總是天不亮就出門去拾糞，幾十年都是這樣的。因此，同樣的土地及水利等條件，我們家的田地要比別人多收一些糧食。我祖父去世之後，父親就接著擺攤賣茶水了。我很尊敬父親，也很想念父親。自一九二九年我離開家之後，就一直沒有見過他。紅軍長征後，全家吃盡還鄉團的苦。一九四九年，解放軍打過長江，在毛主席「將革命進行到底」的偉大號召下，我正率領部隊南下。當時部隊到了萍鄉，離家鄉祇有不到一天的路程，從十四歲離家，已經二十年了，真想家啊！毛主席、共產黨把我從一個窮苦小孩，培養成我軍的高級指揮員，我戴著望遠鏡，坐在吉普車上，望望身後的千軍萬馬，又望望家鄉的方向，思念家鄉的



江西興國高興圩上密村老家。

淚水就在眼裏打轉。爲了革命的最後勝利，我們還要追擊敵人，揮師直奔湘西南，又與家鄉擦肩而過了。

一九五三年，我把父親接到廣州住了一個時期。分別二十五年了，他一直好奇地望著我，不說話，他覺得一切都不可思議。後來，因爲臺灣國民黨的飛機要轟炸廣州，軍情越來越緊，我又把父親送回老家去了。在廣州的時候，我給父親做了一床絲棉被子，他非常滿意。可是父親臨走時，忘記了把被子拿走。我一想起了這件事，心裏難過極了！我尊敬的父親對我從來沒有提過任何要求，唯獨喜歡一床被子都未曾如他所願。父親於一九五六年病故了，當時我已調北京工作，因工作太忙，我沒有回家爲父親辦理喪事。這件事祇有藏在我的心底，一輩子遺憾！

我的母親蕭寅秀是一個勤勞吃苦，能幹的勞動婦女。母親會耕田（使牛下田），能挑擔子。我能記事的時候，母親經常早出晚歸從六十里以外的地方挑一擔百十斤重的石灰（肥田粉）回來。有一次，母親在離家還有幾里的地方，看到路旁有一堆牛糞，她就把自己的頭巾把牛糞包回來了。待我長大後，我認爲這件事是母親勤勞的標誌。

我有一個哥哥邱會佳，早我參加紅軍，一九三四年在粉碎敵人五次「圍剿」時，陣亡於廣昌戰場。另外，還有一個弟弟，兩個妹妹，他們沒有跟我享過什麼福，可是「九一三」後受我的株連是很厲害的。

我九歲那年，祖父決定送我去讀書。由於家裏太窮，我祇讀了不到兩年就停學了。小時候讀書的時間雖然很短，卻對我在革命隊伍裏的成長起了積極作用，這是祖父的恩德。

現在，我的文化程度比我參加革命之初，當然是提高多了。我的文化知識是在革命隊伍中一點一點學來的。依我看，一個人生活在社會上無非是兩件大事：工作和學習，這兩件事是分割不開的，工作就是學習，同樣學習也是為了更好地工作。有人把工作和學習結合得好，進步很快，反之，進步就慢。在長征的路上，毛主席教導我的三勤：勤讀、勤寫、勤查字典，我是很有體會的。我比較愛讀書，也有學習的習慣，也愛翻字典，把字典看作是隨身不說話的「教師」。我可以認真地說：「我的一生是沒有枉度光陰的！」

在我們那樣的山村裏，孩子們的生活非常簡單，沒有讀書的孩子早就跟隨大人參加了勞動，讀書的孩子，也要輔助大人參加勞動。

家鄉的老倭對「外面的世界」知道很少，孩子們就更無所知了，但聽老人講故事卻成了重要的啓蒙教育。晚飯後村裏的男女老少喜歡湊在一起說東道西。老人講故事的內容大都離不開鬼、神兩件事。愛聽故事是孩子們的天性，聽鬼、神的故事是越聽越害怕，越怕還越想聽。聽故事長不了多少知識，但一件事有前因後果的關係，在腦子裏就逐漸形成了。

我少年時代懂得一些道理，來自於我的「同年哥」楊秀全，也是他把我帶進了革命的隊伍。我的父親和楊秀全的父親是同年同月生，他們結成了「同年親」。這樣，我和楊秀全的關係自然就很親密了，他比我大五歲，對我關心備至。楊秀全有個叔父叫楊宜佳，他是讀過洋學堂的，在學生時代接受了馬列主義革命思想，是我黨早期的黨員。一九二七六大革命失敗後，他回到家鄉從事地下革命工作。陳奇涵、楊宜佳和我的本家堂兄邱會培等人都是當時興國縣共產黨的領導人物，影響很大。一九二八年初冬，興國縣高興區成立蘇維埃政府時，楊宜佳是第一任區蘇維埃主席。因為邱、楊兩家關係很親密，我常從楊宜佳那裏聽到許多新思想，受到了革命的影響。

我的童年時代，是在封建落後的山村度過的。共產黨、毛主席領導鬧革命，不僅使家鄉變了樣，也改變了我一生的命運。

紅軍來了

我十五歲就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這不是我有多高覺悟，而是革命的紅旗把我捲進革命隊伍的，我趕上了這個形勢。

一九二八年的春天，我聽到大人對紅軍的許多傳說，我家裏是大家聚談的中心地點，每天晚上都有滿屋子的人在閒談，參加談話的人都是一些「鄉巴佬」，不懂又愛談，這恐怕是鄉裏人的特點，大家談的最多的還是對紅軍的傳說。紅軍是什麼樣？也說不清楚。等到外面的消息逐漸多起來了，大家對紅軍也就有了模模糊糊的瞭解：在我們家鄉西邊的大山裏有紅軍，紅軍的頭人叫「朱毛」，紅軍是窮人的隊伍，要打土豪，鬥地主，把他們的地和東西分給窮人；男女平等，女人要剪掉長頭髮……這就是最初對紅軍的傳說。

一九二八年舊歷二月間，我的家鄉的農民運動開始了。我跟著父親去參加了家鄉的第一次農民大會，這是我們村農民革命的第一次會議，大會是離我家不到五百米遠的羅家祠堂開的，全村的男人幾乎都來了。我能參加了這樣「改朝換代」的第一次會議，我感到很光榮。

主持會議的楊宜佳是一個二十多歲的人，他身穿前面有口袋的衣服，還留著分頭，當地人稱之為小洋頭，他這身打扮在農民心目中就是了不起的人物了。他主要說紅軍是窮人的隊伍，不打人，不抓壯丁。

村子裏這次開了農民大會以後，就經常開會了，人們稱之為「農民會」。開了農民會之後，種田的人心裏高興極了，過去那種愁容好像都沒有了。我們村子唯一的一家地主，同農民的精神狀態恰好相反，地主發愁，整天不敢出門，窮人向地主借糧食非常方便。村子裏的氣氛變了，看來窮人真要翻過身來坐天下了。

一九二八年六、七月間，我父親在耕地，我也在地邊玩，快到中午的時候，大路上有一個身上挎著槍的人，在一個本地人陪同下走過來。那個本地人邊走邊大聲說：「鄉親們，紅軍來了，大家不要害怕，紅軍是窮人的隊伍，今天晚上就住在我們村子，紅軍蠻好，不打不搶……。」父親停下農活時那本地人認出我父親了，他說：「紅軍是從萬安來的。告訴老鄉們，紅軍來了，大家不要驚慌，不要害怕。」

此時，父親很高興地說：「我們這裏，兩三天以前就知道紅軍要來的。我們這裏的人喜歡紅軍來，不會害怕的！」不多一會，部隊開來了。

走在前面的人打著一面紅旗，部隊到了一個山凹子裏，突然一個什麼東西響了，紅旗插在地上，大家都不走了。當我聽到這一聲響的時候，真把我嚇了一跳，那個會響的東西後來知道是軍號。我抄小路三步並兩步地跑回家去，到家不久就有隊伍來了。晚上，在我們家裏住的紅軍除了借鍋做飯之外，什麼也不動我們的。他們祇住在廳堂裏，根本不進臥室。這天見到的事是有生以來沒有見過的，心裏新鮮的滋味也是難以形容的。

第二天一早，住在我家的紅軍就向高興圩方向走了。走前把地打掃乾淨，借用過的東西都放回原處，此外，還給我們留下大半盆的大米飯。村子裏好多人都集中在大路旁的石巖下閒談起來，他們談的非常熱鬧，紅軍僅僅在村裏住了一夜，大家對紅軍就有了進一步的瞭解。

不久，紅軍在高興圩附近打了一個勝仗，消滅敵人靖衛團一百多人，並且立即開展了接濟窮人的活動，深得人心。紅軍打了勝仗的消息很快就會傳遍全村，大家又興奮又震驚，震驚的是一點動靜也沒有（那時無炮，也無從有炮聲）怎麼就消滅了靖衛團呢？興奮的是，看來紅軍的確是窮人的隊伍。

蘇維埃

一九二八年冬天，紅軍攻佔了興國縣城，革命的紅色政權興國蘇維埃政府就建立了。紅軍一到，從北邊的老營盤，到南邊的高興圩，其間距離約六十里都是紅軍佔領了，一片都紅了，我的家鄉也在其內。紅軍佔領了高興圩之後，很快就有一個小分隊回到我們村子裏來，他們在村裏干了三件大事：成立村蘇維埃政府，農民當家做主；組織赤衛隊，拿起武器保衛家鄉；成立土地委員會，把地主的土地分給窮人。

大家對成立蘇維埃是擁護的，祇是讓紅軍放（委派之意）一個村長是最好的辦法，給窮人當也是當不了的。紅軍小分隊卻一直說要在老倌中找一個。我們家鄉的村蘇維埃政府成立大會的盛況，是我永遠難忘的，到會男女老少有數百人，這麼多人聚在一起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見到。村政府的主席竟然是我們上密村的雇工廖明光，他當主席是大家沒有預料到的。大家都感慨說：「沒有想到大字不識一個的老廖當了主席，窮人真是要做主了呀！」

在成立大會上，一個紅軍幹部講了話，他說：什麼叫蘇維埃？蘇維埃就是農民組織起來的政府，我們窮人一定要有自己的政府，祇有這樣才能保衛自己的利益。革命是什麼意思？就是要把靖衛團，地主都打倒，窮人自己管自己的事，這是完全能做到的。

這個紅軍幹部還說：鄉親們提出一個問題，就是國民黨的軍隊會不會到我們這裏來？我看大家要準備敵人來，我們自己要拿起刀槍，組織赤衛隊。敵人來了就同敵人打，不要怕敵人。打得過敵人就消滅他，打不過就先躲開他，有好時候再打，對敵人祇能鬥，不能怕。我們要保衛革命的成果，保衛家鄉。

這些話深深地留在我的心靈裏。

村蘇維埃政府成立的第三天，在紅軍小分隊的號召下，向地主開戰了，首先沒收地主的財產分給窮人，其次是沒收地主的土地，並開始丈量土地分給村民。我家的村子裏祇有一家小地主，他早已逃跑了。離我家比較遠的地方有一家大地主，家產多得很，對這家地主由紅軍派人直接分配財產。附近的窮人都去分東西了，這家地主的糧食分了三天才分完。

我同我的父母都去分地主的東西了，人人是滿臉喜氣。農民最關心的問題就是土地問題，人們把能分土地看成是自己擁護紅軍最重要的問題。毛澤東深入農村，調查研究，體察民情，寫就了《興國土地法》，也就是後來的《中華蘇維埃土地法》。在貧窮落後以農業為主的中國，誰解決了農民的土地，誰就能得到民心，毛澤東做到了，這是歷史事實。

分完地主財產之後，村蘇維埃政府就著手建立群眾武裝了。在農民心中赤衛隊和革命是同樣意義的名字。楊秀全是最早的赤衛隊隊長，我的哥哥是最早的赤衛隊員，赤衛隊沒有什麼武器，祇有大刀、梭鏢和棍子。因此搞到武器、壯大自己是最重要的事情。

我的家鄉不遠的地方有個稅卡，是國民黨政府設在隘路口上向過往行商的人收稅的。他們有一短、一長兩支來火槍，這種槍射程並不遠，這在當時來說就是最好的武器了。赤衛隊很想搞到這兩支槍，楊秀全和我的哥哥等幾個人，在我的家經常商量搞稅卡的槍的事。他們商量時，他們提出過幾個方案又都感到不合適，我在一邊聽了幾次之後，向他們獻了一計，採取「偷」的辦法。他們非常同意，於是就佈置實施。

稅卡收稅的人最喜歡打牌賭錢，如果賭興上來時，可以打通宵，這是偷槍的好機會。要能進到稅卡去偷槍，關鍵問題就是打開稅卡的後門，這個任務就落到我們三個小孩子的身上。

行動的那一天，楊秀全派三、四個人去找稅卡的人打牌，從上午打到黃昏的時候，他們完全失去警惕，我們三個小孩佯裝在稅卡的院子裏玩，然後就悄悄溜到院子的後門把門打開了，楊秀全帶兩個人進來把槍拿走了，不到十分鐘就完成了任務。

楊秀全等十餘人剛回到村裏就開會了，他向大家宣佈赤衛隊正式成立。新生的事物祇要一出現，又在適當的條件下就會迅速發展。我的家鄉是紅軍解放的，家鄉的人民積極參軍又壯大了紅軍隊伍。我們村的赤衛隊是最早編入紅軍正規部隊的，是隊長楊秀全帶走的，我的哥哥邱會佳也一起參加紅軍了。

三代同堂幹革命

一九二八年春節前後的時候，各村蘇維埃政權先後都建立起來了，我們一家三代人都參加了革命工作。我的祖父是檢查站站長，父親是村土地委員會委員，母親是婦女挑擔連（為紅軍挑物資的運輸隊）的排長，哥哥是赤衛隊員，他不久就編入紅軍正規部隊離開了家鄉，我是兒童團副團長。我們都積極努力地幹自己的工作，那時，村蘇維埃開會，我們經常是全家三代人一起去，像這樣全家參加紅色革命的家庭並不多。

我的祖父是檢查站長，祇有被信任的人才能擔任這個職務，那時，防特防奸是很重要的工作。我們村前是一條北通吉安，南通贛州的大道，蘇維埃政權沿路每十里一站設下了若干檢查站，防止白區的敵人混入蘇區。過往行人要有路條才放行，本地人外出也要到蘇維埃政府去開路條，以便通過其他地方的檢查站。

我父親是土地委員，是執行分配地主土地的管事人，從丈量土地到分配都要負責，因為事關大家根本利益，祇有德高望重的人才能承擔。當時分配土地的原則是實行平均分配，我家分了土地，全家高興，因為土地是農民的根本。

這裏我要特別地說一說我的母親，她是個出色的蘇維埃紅色婦女。蘇維埃政權剛建立時分地主的財產，農民們還不敢向地主鬥爭，也不敢

把從分得的東西拿回家，怕以後地主報復。我母親第一個勇敢地把分的東西挑回家，這是非常大膽的行動。我的家鄉是白區和紅區交界的地方，局勢複雜，一九二九年初敵人靖衛團突襲了我們村子，殺害了三個人。由於敵我力量懸殊，赤衛隊藏到山裏去了，村蘇維埃主席廖明光叫我母親爲赤衛隊送糧，每兩三天就要冒隨時可能被敵人抓住殺頭的危險上山一次，堅持了幾個月之久。

我母親是深明大義的人，按規定，我哥哥參加紅軍後，我就不用了，但後來她還是支持我去當紅軍。三〇年紅軍粉碎國民黨軍隊的第一次「圍剿」，母親不怕犧牲，領著婦女擔子排上戰場爲作戰的紅軍送糧。三一年六月，國民黨軍隊第三次「圍剿」中央蘇區，正是莊稼青黃不接的時候，紅軍的糧食極其缺乏，農民田里的稻穀抽出穗，祇有頂上的一些略爲發黃接近成熟。蘇維埃政府號召農民把上面的半熟稻米剪下來，送去當軍糧。農民對此極不願意，因爲不但麻煩，浪費勞動力，而且會減產，我的母親則積極執行命令，日夜下田，超額完成了任務。事後，區蘇維埃政府給我母親發了獎狀，並獎勵給了她一套衣服的布料。那時的江西南部農村相當封建落後，婦女很少出門，而我母親卻是婦女裏參加革命的積極分子，爲革命做了許多工作。

解放後，母親一直生活在農村，七十多歲還在忙農活，沒享什麼清福。六六年，文化革命一開始，我遭到殘酷的批鬥，母親聽到這個消息，立刻就氣瘋了。七〇年我把她接到北京來，住在三〇一醫院。沒想到七一年發生了「九一三」事件，我被打倒了。母親因我的問題沒有得到很好的治療，很快就去世了，據說母親死的時候，瘦得祇剩下幾十斤。想到此我萬分的難過。

村蘇維埃成立三天後，在一個比較大的祠堂裏召開了兒童團成立大會，到會有幾十個少年。經楊秀全提議，我當了兒童團副團長，團長是鄰村一個孩子。那天的會先唱剛學會的《國際歌》，然後團長做報告，他講組建兒童團的意義、任務和當前的工作。團長僅比我大二歲，他能在幾十人面前作報告，講得又很好，我很佩服他。會議接著是我講蘇維埃政府要求各村「破除迷信」的問題。因爲我會前有些怯怕，楊秀全一句一句地教我該怎麼說。但是，到開會講話的時候，我心裏還是有些慌。講話有點「卡殼」，兒童團長在一旁幫忙，我才能把背好的那一套話說出

來，主要意思是「泥菩薩不好，要把它打了」。那天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在大會上登臺講革命的道理，雖然有點出洋相，但心裏很高興。以後不斷地鍛煉，就好多了。

會後，兒童團就向菩薩開戰了。我們村有一座坊神廟，一座和尚廟，一座關公廟。關公沒有專門的廟，關公的神像立在大路旁一個茶亭之內。據說若干年前大旱，全村人向其求雨，事很湊巧，果然下了雨。後來，全村就按人頭攤派錢，修好茶亭把關公的像供奉起來了。村裏人得知兒童團要打菩薩，反映很強烈，老年人更為不安。有個老頭把關公的像藏起來了，兒童團連著幾天也沒有偵察出藏匿的地點，原來那老頭把關公像藏在自己被子裏了，晚上睡覺也守著它。

和尚廟坐落在村外山溝裏的石巖上面，有一個和尚和一個做飯的伙夫。廟產富足，廟宇也堂皇。村民對這座廟沒有好感，因為三年前發大水，大家去求神保佑，並不靈驗，還是淹了田地和房子。

那一天，我帶著幾十個兒童團員打著紅旗到廟裏去，和尚嚇得躲起來了，我還沒開口，孩子們早按捺不住了，動手就打，很快就把廟裏的菩薩打得亂七八糟，那些昔日受人跪拜、不會說話的「大人物」們被打得缺胳膊短腿地躺在地下。離開廟之前，有人發現泥菩薩後腰上有個洞，洞裏裝有桂圓、稻穀、豆子，大家就分了，算是小小的戰利品。

兒童團經過打菩薩等活動後，主要是站崗放哨和軍事化訓練。後來我們兒童團一夥的人，多數一起去當了紅軍。「三代人同堂鬧革命」至今已經相隔七十多年，我從一個孩子變了老頭，往事雖然朦朧，但仍依稀記得。我從少年時就走上了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道路，是共產黨、毛澤東領導的武裝革命鬥爭正好在我的家鄉發起了，使我成為紅軍較早的參加者。我十四歲參加了蘇維埃革命，一年後我又參加了紅軍。在我的記憶裏，我的少年生活，與其說是在自己的小家庭中度過的，倒不如說是在紅軍的革命大家庭中長大的。

第二章 戰鬥在家鄉

第一次戰鬥

一九二九年初，紅軍主力離開興國一帶到東邊去開拓新區，一些地方部隊也跟著出發了。這時興國以北泰和縣那邊的國民黨軍和靖衛團活動猖狂，經常向興國蘇區擾亂、搶掠，形勢比較緊。蘇區邊緣地區的防衛由當地的赤衛隊和兒童團擔任，我們兒童團擔起了站崗放哨的任務，監視泰和那邊敵人的動向，除了查路條之外，還要傳遞情報。

那時，我家鄉的青壯年幾乎全部都參加了赤衛隊、少先隊（十五歲以上少年參加），適齡兒童都參加了兒童團。爲了保衛分得的田地和勝利果實，人民群眾非常積極。這是人民戰爭最初的萌芽。

村蘇維埃指定我們的崗哨設在村外大路的隘口處，哨位就在原來放關公像的茶亭裏。第一次夜裏放哨我確實有些害怕，幸虧村子裏有幾個好夥伴和我一起出哨，我膽子就大多了。晚上在哨位上，小夥伴們高興地說了好長時間的話，大家都是頑童，很是天真，時而用鬼神嚇人，時而談起革命成功後的家鄉，充滿美好的憧憬，直到瞌睡得睜不開眼了，大家就先後睡下，我第一次放哨就這樣完成了。兒童團放哨多流於形式，但有了這種形式，敵人也多少有些害怕，這些小夥伴後來也大都參加了紅軍，大都死在戰鬥中和長征路上，我算是一個倖存者。

兒童團還有一項任務，就是參加生產勞動。兒童團主要擔負了三種農活：一是放牛；二是積肥；三是割飼草。農忙中孩子們要做的事更不計其數。那些男人上了前線的家庭，孩子的勞動更是辛苦，甚至成了主要勞動力。儘管如此，兒童團還要堅持訓練、站崗、放哨、宣傳等常規工作。有一次，我們分隊還捉住了敵人一個偵探，受到了區政府的獎勵。

一九二九年秋天，我參加了消滅興國縣龍口反動武裝的戰鬥，那是我參加紅軍前第一次參加戰鬥。

我家鄉以北二十五華里有個龍口村，那裏有家姓鄒的大惡霸地主。鄒家私自設卡收稅，為此還建立了私人地主武裝。

區委決定消滅鄒家地主武裝。但赤衛隊武器很差，沒有戰鬥力，主力紅軍又遠離這裏。因此區委認為對他們祇能智取，要深入虎穴打進敵人內部去。並叫我冒充羅招蓮的「表弟」，進出鄒家傳遞情況。羅招蓮是鄒家地主小老婆，是窮苦人出身。經過工作，羅招蓮和長工董長庚成了內線。

鄒家依山傍水，房高牆厚，路徑曲折，不熟悉的人進去後根本找不到門路。我冒充「表弟」，幾次進出了鄒家大院，裝得若無其事，其實每次進去都很緊張，全憑腦子記，沒有多久就摸清了裏面的情況。治安隊集中住在前面一個小院落內，他們的槍在晚上全集中到一個房子裏統一保管，領導治安隊的二少爺不和治安隊同住。

區蘇維埃根據我帶出來的情報，決定動用一百名赤衛隊員作戰。行動當天下午，先讓幾個膽大心細的人假裝成幫工隨董長庚潛伏進鄒家，赤衛隊則埋伏在鄒家大院附近。午夜一到，董長庚率潛伏進去的幾個人突然衝進二少爺那裏抓了他，另外幾個人把集中放槍的房子佔了，然後偷偷開了院子的大門，把已經準備好戰鬥的赤衛隊放進去。我因為熟悉情況，跑在最前面，一點也不怕，帶領著一百多個赤衛隊員，直逼治安隊的住處。治安隊員們從睡夢中被叫起來，一見赤衛隊的槍已經頂在腦門上，自己又沒了槍，祇好投降。這次戰鬥，裏應外合的方案周密，一舉成功，一槍沒放就消滅了這股強悍的地主武裝。

巧當紅軍

毛澤東領導秋收暴動後，在井岡山建立了紅軍。朱德率領的南昌暴動部隊幾經輾轉，在湘南暴動後，率隊伍上山與毛澤東會合，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第一支武裝力量，在佔據了井岡山為根據地後，又增加了彭德懷領導的平江暴動的部隊。井岡山是黨領導工農武裝開關的第一塊革命根據地。但是，井岡山地方很小，要向外發展和擴大才行。一九二九年一月，毛澤東、朱德領導的紅軍主力從井岡山下來，在

興國縣一帶擴大後，又向東打去，開闢了贛南和閩西一大片地區，影響很大。毛澤東、朱德到了興國縣一帶，我們家鄉很快又成為紅軍的根據地，這裏的不少青年人都當了紅軍。

一九二九年四月以後，我十五歲了，我也想當紅軍，這件事在我家中是很難的，因為我哥哥已經當紅軍走了。

同年冬天，我的「同年哥」楊秀全回到了興國高興圩老家來「擴紅」，他已經是紅三軍的一個連長。他對我如實說了當兵是很苦的事，平日裏白天要出操訓練，執勤幹活，晚上還要放哨，生活也很苦；打起仗來，犧牲和受傷的事經常發生。但我的決心已經下了，我一切都不怕，我一定要參加紅軍。

當紅軍是我們那裏青少年的嚮往，村政府宣佈「擴紅」徵兵之後，不到幾天就有四十多人報名。但所有報名的人都比我年紀大。那天我去報名，村蘇維埃主席不給我登記，還開玩笑說：「你當兵？你有槍高嗎？晚上害怕了怎麼辦？難道讓你奶奶跟著你一起去嗎？」

楊秀全知道我要報名當紅軍，他就哄我說：「你現在參了軍跟我們走了，就回不了家了。」我堅決地說：「當了兵還回家幹什麼？再遠也沒有什麼關係！」這次和楊秀全一起回來「擴紅」的人裏，有一個連隊的書記也是青年團負責人叫楊唐藝的，外號叫「黑子」，他很支持我當兵，和我商量好了，這批新兵什麼時候走，他一定事先告訴我。於是我做好了準備，藏好了一雙新鞋，一旦有消息就跟著他們走。

幾天後的清早，黑子趕來告訴我，早飯後他們就要帶著新兵走了，要我別錯過這個機會。我本想和祖母告個別，但是怕她攔住我不放，就死了那個念頭，把一雙新鞋插在腰帶裏就出了家門。我離開的時候心裏很難過，難過的是十分不想離開我的祖母。走出沒多遠就幾次回頭，但當紅軍的思想戰勝了一切，我橫下一條心離開了家，跟著隊伍走了。我跟著當紅軍的這夥人走時，好在那天楊秀全有事，是下午才趕上來帶隊的。

這次我們幾個村子裏去當紅軍的有二十多人，都是十八、九歲的青年，祇有一個二十多歲的人叫柳元福，大家叫他「福叔」。走了大約二十多里路，我的腳就打起了血泡，我脫了鞋打赤腳勉強還可以走，但腳上是通紅的鮮血。我的腳無論怎麼痛，也不叫苦，反而裝作無事的樣子。

隊伍走出五十里路休息了，當地政府爲我們準備了飲食，這時趕上隊伍的楊秀全發現我竟然在新兵隊伍裏，他急了，一定要派人把我送回去。我知道這時多說無濟於事，就死死地祇有一句話：「我一定要當紅軍！」同去當兵的人都爲我向楊秀全求情，福叔也說：「這孩子當紅軍的心，已經扎根了，讓他跟著我試試吧。」楊秀全雖然歎了口氣，但他見我當紅軍的決心這麼大，祇好妥協了。

飯後的繼續行軍，對我實在是苦不堪言，除了腳痛得難以忍受，胯檔裏的大腿內側也磨爛了，疼得連邁步都很困難，但那一天真是人小決心大，我一直堅持走到宿營地。

事也湊巧，我們到了宿營地之後，上級就來了通知，要我們這隊新兵就地休整，等前方的部隊回來之後，合併在一起進行訓練。這對我十分有利，我算是命好。當天晚上，福叔爲我燙好了腳，挑了腳上的血泡，包好了傷口，我們在一起有說有笑，白天的痛苦幾乎都忘光了，不久我倒頭就睡著了。

幾天後紅軍大部隊從前線回來了。那支部隊中絕大部分是我家鄉一帶的人，熟人一多，我也就不想家了。大部隊回來之後，楊秀全帶來的二十個新兵就補到連隊裏去了。福叔當了伙夫班長，不久當了司務長，因爲我年紀太小當了一個「超編的傳令兵」。連部編制上祇有兩個傳令兵，加上我就變成三個了。我很快就習慣了部隊生活。我終於成爲一名正式的紅軍戰士。

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發生後，我被關在北京衛戍區、秦城監獄以後，也常常做夢。戰鬥的歲月很難夢到，卻偏偏多次夢到參加紅軍第一天的情形，每每老淚縱橫。

在連隊經過一段時間的操練，我簡直成了另外樣子的人，並且特別能走路。有一天黎明出發練習急行軍，來回約有六十多里路，我沒有掉隊，腳上也沒有打泡，我高興極了。

我在部隊各方面都有了進步，一九三〇年一月間，黑子介紹我參加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青年團是幹什麼的？我當時並不完全瞭解，祇知道是要求進步的青年應當參加的。當時，共產黨和青年團組織在我們那支紅軍隊伍裏還是不公開的。不久，黑子調到江西省青年團委當巡視員

去了，他走了之後，我們再也沒見過面，他後來在紅軍第二次反「圍剿」的戰鬥中犧牲了，我至今還懷念他。

黑子調走之後，連部裏沒有書記，我這個讀過點書的人成為連部的文書。文書和書記不一樣，雖然做的是一樣的工作，但書記比文書職務高一級。我當紅軍沒多久就當了文書，是很大的進步，我能有這樣的提昇，是因為連隊裏一百多號人中沒有一個比我識字多一點的人，我才有機會提昇到文書的職位。

我當了文書，才知道我們部隊的正式番號是「興國泰和紅色警衛連」，共有一百五十來號人，其成員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興國縣高興圩的人。雖然我們是地方部隊，但裝備不錯，戰士差不多都有槍，子彈也不少，這在地方部隊中是很少見的。這支部隊在興國和泰和交界的地方打過不少勝仗，同群眾聯繫也密切，我們完全是家鄉人民自己的子弟兵。我的同年叔楊宜佳和同年哥楊秀全是這支部隊的創始人，他們在家鄉的群眾支持下創建了一支紅軍地方部隊，對革命有貢獻。

我們的部隊由於有一定戰鬥力，最後江西軍區決定把我們歸屬省軍區獨立團，以後又隨獨立團編入中國工農紅軍江西軍區第二十五縱隊。不久二十五縱隊就改為紅三軍九師二十五團。楊秀全昇任營長，我們的連長姓石。

我們部隊整編後不久，一九三〇年十月執行了一次護送一千多名新兵到紅軍主力部隊去的任務。我們向北出發離開興國到吉安，這是我第一次進到城鎮裏。原先我連興國縣城也沒有去過，吉安雖然是個小縣城但是在我眼裏已經是太大了。

有一天，我正在連部，忽然聽到外面響起了「嘟、嘟、嘟……」的聲音，我嚇了一跳。連長告訴我說，那是贛江上的小火輪（蒸汽機輪船），我們都到江邊去看新奇。正在這時，值星排長急忙跑來向連長報告說：「不好了，幾個新兵連的人大多數跑到山上去了，說是『小火龍』來了，一口能吃下一個人。現在有百十名新兵跑了，散在城外滿山都是。」石連長馬上帶部隊上山去找人，我也跟著去了。我們用家鄉土話向新兵們喊：「大家不要怕，不用跑。江上的小火輪是一種船，不是小火龍，它不會吃人，也上不了岸。」我們的話起了作用，一部份人不跑了，下山回到宿營的房子裏去。後來各單位清查人數，一千多名新兵少了一百

多人，跑了的人找回來的不多。幾天艱苦的部隊生活就難倒了他們。另外，也有些人是當地蘇維埃政府爲完成上面壓下來的任務，被強制性地送來的，那些人原本就不想參軍，正好借這個機會不辭而別跑回家裏去了。

執行護送新兵的任務完成後不久，我調到團部宣傳隊任宣傳員。

我們紅三軍九師可以說基本是興國縣的地方部隊，但是編入紅三軍之後，部隊活動的範圍就大多了，不久我們離開吉安，開到樟樹一帶活動，轉一大圈後又回到興國和泰和一帶。一九三〇年十一月開到了萬安縣境內的東固山，準備粉碎敵人剛發動的對蘇區紅軍的第一次「圍剿」，在這段時間裏，部隊都是在行軍中生活的。

上面說的是紅軍初創時期的一些真實情況的寫照。今天，紅軍已發展成了強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成爲現代化的軍隊。作爲這支軍隊初期的參加者，我基本上看到她發展的全過程。中國人民解放軍能從那麼一支以沒有文化的農民爲主的軍隊發展成現在這樣強大，是很了不起的。這是幾代人、特別是最早參加的一代革命者努力奮鬥的結果。

肅清「AB團」

我們部隊從贛西北返回吉安後，駐在東固鎮以東一個叫龍崗的地方，在這裏駐防時，紅軍裏殺「AB團」風潮傳到我們部隊裏。

「AB團」到底是個什麼組織？我當時根本不知道，祇聽說它是壞人組成的一個秘密反革命組織。幾年後，我到瑞金紅軍學校學習時才知道它是「反共團」英文字母的縮寫。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後，江西南部就有了「AB團」，但很快就被打了下去。一九二九年夏天開始，敵人又把這個名字拿出來使用，主要是給蘇維埃政權和紅軍內部的人栽贓的，用這種從內部攻破的方法來瓦解革命政權和紅軍。一九三〇年七月在蘇區內亂抓「AB團」就開始了，入冬之前在紅軍中也風行開了，誤抓誤殺了很多自己的人，敵人的陰謀得逞了。

我們部隊在龍崗駐紮下之後，開始就地整訓，積極做著反「圍剿」的準備。我們團宣傳隊員都分散到基層各連隊去做青年工作。我被分到原來所在的八連進行政治鼓動。整訓開始時，我的思想和工作都很好，經常受到團部的表揚，但做著做著就不對味了，上級要求官兵們發動起

來揭發混進革命隊伍裏的壞人，宣傳隊員要帶頭，本來正常的生活突然被打亂。肅反運動開始了。這是我第一次遇到革命隊伍內部的整肅。雖然我還小，祇是個小小的團宣傳隊員，組織上沒有審查我，但我被一些眼前發生的事情嚇得很厲害。

我們部隊的肅反運動就是抓「AB團」、殺「AB團」，運動在一九三〇年十二月發生的「富田事件」時達到高潮。在那次事件前後，紅軍和蘇維埃內部都錯殺了一大批無辜的人。運動開始沒幾天，八連政委就被抓走，聽說他是「AB團」。沒幾天，我們的二排長也不見了，不久又有幾個班長沒了，被抓走殺了。看到這些熟悉的人一夜之間就成了「反革命分子」喪了命，我有點緊張。殺「AB團」處決人的場地離我們的住地有十里路。那時每天都有人被綁到那裏去執行死刑，殺人的恐怖新聞我也聽到不少。掉腦袋雖然輪不到我頭上，但我總覺得心裏有什麼事，整日也是愁眉不展的。

肅反期間，有一次我隨福叔去部隊駐地附近趕集，我們買好菜之後，正要往回走，突然聽到軍號的聲音，這種號音以前我沒有聽過，聲音使人心裏很難受。我們趕快往住處走，當我們走到河邊時，已經戒嚴了，橋上不准過人。不一會兒，我看到河灘上綁著幾個「犯人」，接著執行人用大刀砍他們的腦袋，那幾個人躺在沙灘上，血染紅一片，這可把我嚇壞了。因為前幾天傳來的消息，說已經調到省裏當共青團巡視員的黑子也是「AB團」，而我正是他介紹入團的，這會不會牽連到我？

回到連部之後，我死死地把石連長拖住，反覆問他：「黑子（楊唐藝）是不是也是那個……」，石連長聽得懂我的意思，他一句話不說，讓我更著急了，晚上我就病倒了。很快楊秀全來了，楊秀全問明情況後說：「我知道了，他的病，三班長（士兵肅反委員會主席）就可以治好。」不一會兒，三班長來了，向我做了解釋，我這時才明白了我參加的不是「AB團」的團，而是共青團的團，「肅反」不會牽連到我，我的「病」也很快就好了。

我對自己不是「AB團」，心裏有了底，不太害怕了。但是紅軍部隊殺「AB團」的風並沒有停止。有一次我到上級機關去送信，回來的路上又看到別的部隊殺「AB團」。爲了不讓那些人行刑前喊叫，用小樹杈橫在嘴裏，用繩子綁住，行刑的方法比我們那天在河灘上見到的更殘酷。

爲了節約子彈，執行人把要殺的人綁起後推倒在地，用大石頭砸「犯人」的頭，砸得腦漿四濺……我一見這個場面，嚇得就跑。回憶起那一天的情景，現在仍然感到不寒而慄。打「AB團」活動不久就停止了，但紅軍中相當一批中下層指揮員被無辜地殺掉了，使初建不久還很弱小的紅軍大大地傷了元氣。這場政治大災難，有政治路線錯誤的原因，這是主要的，但是以落後地區農民組成的紅軍部隊的愚昧也加重了這場風潮的災難性。

參加粉碎第一次「圍剿」

一九三〇年十月下旬，江西蘇區的形勢明顯緊張了。蔣介石對紅軍進行第一次「圍剿」，企圖在三至四個月內一舉消滅江西蘇區的紅軍。

我們這支部隊在沿溪渡過贛江後就開始動員反「圍剿」。當時紅軍的政治工作人員水平不高，不能通俗地說明反「圍剿」的意義，祇講一些「捍衛紅色蘇維埃」之類的口號。戰士們對圍剿紅軍的國民黨中央軍心裏沒底，不少人有些害怕。恰好我們紅三軍和紅四軍一個師的部隊住相鄰的村子。一天，紅四軍軍長林彪來給紅四軍部隊講話，上級通知我們也去聽。

這是我第一見到林彪。他根本不像老兵們傳說的那樣是威風人物，而是一個才二十出頭的小伙子，個子不高，濃濃的眉毛。他如果不是騎馬來，後面還跟有護兵，誰也不相信他是紅軍第一主力的紅四軍軍長。

林彪在打穀場上的臺子上對著下面一大片部隊說：我們現在集合兵力回到自己的「家」門口來打這一仗，是因為我們熟悉這裏，老百姓又擁護我們。敵人對這裏倒是很陌生，我們把白軍引到山溝裏來，牽著敵人跟著我們轉，把它像蛇一樣，拉的很長，我們在適當的時候猛地一回頭，把敵人切成幾段，像獾子吃蛇一樣，一段一段地把敵人吃掉……。林彪用通俗的道理來說明我們能打敗敵人，士兵們聽了林彪的講話之後，明白了紅軍的戰法，提高了認識，主要是解決了「怕」的思想問題。我那時當兵已有一年，聽了林彪講話，我第一次明白了戰爭有「戰略戰術」問題。前段時間，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對反「圍剿」的戰略方針進行了討論，要在贛江以東蘇區腹地有利的地形下，發現敵人的弱點，再對其進行攻擊。這個戰略被林彪深入淺出地向士兵們講明白了。

十一月中旬以後，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和蘇維埃政府對粉碎敵人的「圍剿」進行了緊張的準備工作，在部隊和群眾中，採取多種形式進行深入的宣傳和政治動員，解除戰士和老百姓的種種顧慮，樹立必勝的信心。臨戰前，總前委在小布召開軍民誓師大會。會場上張貼出「敵進我退，敵駐我援，敵疲我打，敵退我追。遊擊戰裏操勝算」；「大步進退，誘敵深入，集中兵力，各個擊破，運動戰中殲敵人」的大標語，這些都是毛主席最早的軍事思想。紅一方面軍總部根據毛主席的戰略思想，頒發《三十條作戰注意》，簡明地規定了指導思想，原則和要求，戰場紀律後方工作和戰後注意事項等等。毛主席的指揮是我們能夠粉碎敵人「圍剿」的保證！

我參軍之後打過的仗都是打的地主武裝和國民黨地方武裝靖衛團，國民黨的「中央軍」是個什麼樣子卻沒見過。現在要和他們打大仗，我並不害怕，反倒有新奇感，希望仗最好早點打起來。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底，我們連進行戰前動員。石連長說：「敵人已經被兄弟部隊牽著鼻子走到龍崗的山谷裏了，我們要把他們堵在山溝裏消滅掉。在戰場上，誰活著誰就要打下去，絕不能怕死！」

第二天，紅三軍各部隊在龍崗的稻田地裏集結，第三天拂曉，我們部隊上戰場，這是紅三軍九師參加反「圍剿」作戰的第一天。我們連是九師參戰的前衛連，走了十多里路的時候，大家看到紅一方面軍毛澤東總政委、朱德總司令站在路邊土崗上檢閱上戰場的部隊。因為部隊走得很快並且已經聽到槍聲，我無法細看自己的最高領導，祇看到毛總政委身軀很高大。當時紅軍中對毛澤東有很多傳說，說祇要他在，就能打勝仗。那天是我第一次看到毛澤東，並且是在戰場的槍聲伴奏下看到的。

我們連繼續向前急進到亭子嶺的狹窄谷地。附近突然一陣陣槍聲，而且越來越激烈，這時國民黨中央軍衝過來了。那時打仗很簡單，兩軍相逢勇者勝，我們發起一個衝鋒，敵人轉身就退。我們追著敵人打，敵人邊退邊戰。白軍武器好，槍也打得準，我們不斷有人犧牲，前面的倒下，後面的接著追，農民出身的紅軍在山路上跑的快，很快就追上敵人進行肉搏。我們連傷亡很大，兩個排長也犧牲了，二、三排在一個山頭上沒有人指揮，石連長命令我這個青年委員為代理排長，我領著大家勇敢地追擊殘留的敵人，這下子敵人基本潰散了，多數人停下來投降。龍崗戰鬥的時間並不長，傍晚太陽西斜之前，戰場上槍聲最後「熱鬧」了。

陣子就平靜下來。我們連還剩下三十多人，接到命令打掃戰場，把犧牲紅軍的屍體集中在一起掩埋，把受傷的人向後面送。

這時有人說，山坳裏有一個會叫的東西，用手一搖「噹、噹、噹」地響，誰也說不出是什麼，嚇得心驚肉跳。我們把情況報告上去，一會兒，來了幾個紅軍和兩個穿白軍衣服的人把它抬走了。事後我才知道那是手搖發電機，是無線電電臺發電用的。來識別和抬走發電機的人是剛從白軍參加紅軍的電臺臺長，叫王諍。王諍是人民軍隊無線電事業的創始人。在長征途中，我同王諍就熟悉了，對那次戰鬥繳獲了手搖發電機，不止一次地作為笑料談得很高興。

這次戰鬥我們連傷亡很大，我們團把剩餘的部隊集中起來，立即帶隊向亭子嶺集合急行軍，翻一座大山時，我摔倒跌進山溝裏昏了過去，等我醒來時，發現自己傷得動也不能動了，我一摸槍還在身邊，我咬著牙努力往上爬，終於被戰友發現了，把我救上來送到救護站。軍醫查了我的傷情，很嚴重，在前面的戰鬥中，我左小腿已被手榴彈炸傷，骨頭都露出來了，我怕下火線，叫衛生員包紮了一下，就又上陣了，我囑咐他不要說出去。我這才搞明白，因為腿傷了沒有力氣，腿一軟才跌進了山溝，真是禍不單行，現在又骨折了。醫生給我作了簡單的包紮後，轉送到後方醫院去。紅軍後方醫院算不上是真正的醫院，沒有專門的醫生、護士，祇有少數中醫和招呼傷病員吃飯的人。但我很幸運，遇到了一個福建籍客家老中醫，他對我特別關心，仔細檢查傷情後說：「你的左腳小骨錯位了，很快就可以好。」他用客家話反覆安慰我。第二天，醫生來給我治腿，同來的還有幾個身強力大的戰士。老醫生表情嚴肅地說了一句：「你的腿很快就會好的。」他的話剛落音，幾個戰士用勁把我按在床板上一點不能動，醫生則把我的腳腕子用勁一扭，我聽到「嚓」的一聲，就疼得暈了過去。我甦醒過來之後，老醫生說：「你腳上錯位的小骨必須正位，炸傷的傷口也要清理。我們沒麻藥，祇有用蠻辦法。」給我治療彈片的傷口時，也沒有治傷的藥，祇能用鹽水洗傷口，每一次洗傷口都把人痛得死去活來。十天之後我的腿好多了，可以下床動動。我幾次到醫院院部要求回部隊，回答說：「現在部隊離這很遠，你暫時不能走，先臨時參加醫院的工作等待出院。」於是我參加院部組織的宣傳工作。我從上級發下來的材料中知道，紅軍反圍剿取得了很大的勝利，殲滅白軍一萬

人，繳獲七千多支槍，還活捉敵軍中將指揮官張輝瓚，召開群眾公審大會，當眾把張槍斃了。傳說蔣介石對張的死很痛心。

不久上級通知：九師傷癒人員出院到江西軍區軍事部集合。我們二十幾個人到位於興國縣的江西軍區軍事部報到，在這裏我看到了「同年哥」楊秀全。他奉命來組織興泰萬赤衛隊，他提議將九師傷癒的傷員都調到赤衛隊，得到批准。

幾天之後，以九師傷癒戰士二十多人成立了「興泰萬赤衛隊」，後來發展成「興泰萬獨立團」，在兩年多的時間裏發展到二千多人。由主力部隊派骨幹組建地方部隊，是當年擴大紅軍搞「豐收」的方法，興泰萬獨立團就是一個典型。

參加粉碎第二次「圍剿」

一九三一年五月，國民黨對贛南蘇區的第二次「圍剿」開始了。蔣介石坐鎮南昌，何應欽任前線指揮，帶著二十萬大軍分四路向蘇區殺來。

那時興泰萬赤衛隊剛成立，不過百十多人，但在反「圍剿」中發揮了不小的作用。

1、西渡贛江佯攻。敵人這次進入「圍剿」區後就固守不動，採取「穩紮穩打，步步為營」的戰術。為此，紅軍必須調動敵人才能在運動中取勝。那時敵主力在贛江以東，紅軍西渡贛江會牽動敵人。於是興泰萬赤衛隊和友鄰的赤衛隊三百多人，由紅三軍九師指揮，向泰和縣以北的沿溪渡出發，佯作紅三軍主力西渡贛江作戰。我們沿途寫了大量標語和路標，落款全是紅三軍的番號。我們在沿溪渡街上最熱鬧的地方派出糾察隊高舉紅旗在街上巡邏，敵人相信紅軍西渡贛江的意圖，我們的行動對敵人起了牽制作用，為紅軍主力的集結爭取了時間。

2、捉敵人的「活口」。敵二十八師在泰和、富田一線固守不動，紅軍要捉「活口」瞭解敵情。紅九師偵察參謀帶著我和十個戰士到富田、泰和之間去活動，天遂人意，在那裏捉住了敵人一個軍官和兩個護兵。軍官立即將一張紙塞進了嘴裏，我們趕緊掐住他的喉嚨把紙掏出來了，原來是敵師長傳達的命令，要富田的敵人給二十八師準備五天乾糧物品，三天後向蘇區東固一帶進攻。我們隱蔽到天黑返回，那個敵人軍官要死

夠不肯走，我們用繩子把他胳膊和雙腿綁了，向老鄉借了一個大筐抬著他走，送到了師部。根據這個重要的情報，紅軍做了反擊的準備。

3、爲紅軍主力鉗制敵人。敵人剛沿著富田河向東固方向前進，那裏正好在我們的預定的戰場裏。紅九師立即進入戰鬥準備：一是破壞山區道路，使敵人行軍困難，道路隘口破壞了，敵人短時間修不好，卻把兵力分散了；二是由我們興泰赤衛隊作嚮導，協助紅軍引誘敵人進到水官河一帶後鉗制住敵人，紅九師主力擇小路繞到敵人後面把道路切斷破壞，再把敵人切成一段一段地消滅。戰鬥打響之後，紅軍在二十多里長的一條山溝裏把敵人截成了四段包圍。敵人進退不得，祇得交槍投降。

我們幾乎沒有什麼損失就消滅了敵人，俘虜一百一十多人，繳獲步槍九十餘支，新卡嘰布軍裝一百餘套。紅九師接收了繳獲後，當場留給赤衛隊每人一套軍裝以示嘉獎。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穿上了洋布衣服。

第二次反「圍剿」的富田戰鬥，紅軍殲滅王金鈺的二十八師大部 and 四十七師一部，繳獲五千多枝槍，還有一部 100 瓦電臺。富田戰鬥後，紅軍後續又打了白沙戰鬥、中村戰鬥，總共消滅敵人近二萬，繳槍一萬多支，基本粉碎了敵人的「圍剿」。後來又進行了廣昌戰鬥、建寧戰鬥，第二次反「圍剿」戰役至此結束，總共消滅敵軍三萬多人。第二次反「圍剿」戰役前，紅軍一些主力部隊還要用土火槍和梭鏢，但戰役後，都換上洋槍，大多數部隊還有了正規的軍裝，紅軍壯大了。

參加粉碎第三次「圍剿」

一九三一年七月，離第二次「圍剿」結束還不到一個月，國民黨對江西蘇區的第三次「圍剿」又開始了。這次蔣介石親自掛帥指揮，調集三十萬兵力，企圖「長驅直入」一舉殲滅紅軍。

紅軍遇到的困難比前兩次反「圍剿」更大了。除了雙方力量懸殊之外，主要是出現了以下兩個問題：

第一，敵人來得突然。蘇區軍民還沉浸在第二次反「圍剿」勝利的氣氛中，紅軍當時也正處於分散狀態，必要的戰爭動員，戰場準備、徵集糧食都沒進行，而敵人的進攻已經開始。直至七月中旬，紅軍主力才由蘇區的東北部連日行軍回國，一籌未集，連戰十分倉促。

第二，敵人長驅直入，很快就扼制了蘇區的城鎮和要道，使紅軍運動十分困難。蘇區地盤不大，交通不發達。另外，還有許多沒打下來的地主「土圍子」武裝，敵人深入蘇區後，隨同而來的地主還鄉團很快同「土圍子」聯繫上了，扼住蘇區咽喉，給紅軍運動造成很大困難。爲防止被敵人包圍，紅軍就要在蘇區邊緣山區較大範圍內緩慢集結。過去紅軍的迅速運動、集中兵力殲滅敵人的老辦法，在第三次反「圍剿」中一時難以實施。

這個仗怎麼打？發動人民群眾直接參戰！人民戰爭的思想此前已初露萌芽，在第三次反「圍剿」中趨於完善，是粉碎敵人第三次「圍剿」的特點。這次戰爭的勝利，有諸多的原因，但集中到一點就是，毛澤東創造的人民戰爭戰略戰術的勝利。人民戰爭的基本概念是，紅軍爲骨幹，有廣大人民群眾參加的革命戰爭。

1、動員蘇區全民參加戰爭。把敵人的進攻和可能發生的問題和對人民群眾參戰的要求直接向群眾說清楚。我們把底（即敵情）交給群眾，使群眾心中有數是最能啓發群眾的積極性的。戰爭動員就是把要求群眾參戰的具體任務，如站崗放哨、籌糧送糧，招呼傷病員等都說清楚。蘇區人民的參戰熱情十分高漲，我自己一家人就是例子。我年老的祖父母，父母和幼年的弟弟，全家六口人都參戰了。

蘇區農民從地主手裏分到土地，反對敵人「圍剿」就是保衛勝利成果，因此參戰熱情很高。蘇區農民知道沒有紅軍就沒有土地，也沒有飯吃；紅軍也很清楚，沒有廣大群眾的支援，紅軍難以存在。歸根結底，黨和群眾的關係就是互相依靠的關係。在這樣的情況下，群眾哪有不關心紅軍的存亡呢？事實上，群眾關心紅軍也就是關心自己的利益。蘇區的農民，把自己的兒孫都獻給了紅軍，幾乎家家都是紅軍家屬。

2、蘇區各處實行堅壁清野。老倭們把糧食、生豬、耕牛、家禽等能吃的東西和牲畜送到深山裏藏起來。敵人對堅壁清野很痛恨，他們吃不上飯喝不上水，生存都有了問題，一氣之下常把老百姓的房子燒了，甚至把整個村都燒掉。

3、籌備糧食。蘇區小，糧少難養兵。第二次「圍剿」後紅軍主力向贛閩和贛粵交界方向開闢新區，也是爲糧食。第三次「圍剿」是六月底，稻穀離收割還差一個多月。於是蘇維埃政府提出要求：一是節食，群眾和

地方政府兩個月內每人每天祇吃二兩糧，以紅薯和野菜補食，以此算出可節出來的糧食要一次交清給政府，解決紅軍作戰部隊三萬人的糧食。二是「剪黃」，在稻子成熟之前先將谷穗頭上成熟的剪下成糧，「剪黃」很費事，要用剪刀一穗一穗地剪，收穫很少，但「剪黃」解決了紅軍的急需。為了保證戰爭的勝利，蘇維埃政府答應日後補償群眾損失，老百姓戰後向各級政府算賬。興國一帶蘇維埃政府創造了奇跡，居然解決了紅軍部隊的糧食。

4、赤衛隊配合作戰。蘇區的赤衛隊、少先隊全部參戰了。

5、破壞道路，破壞道路能夠為紅軍出擊爭取時間，並在敵人退卻的時候截滯他們，增大紅軍殲滅敵人的機會。反「圍剿」開始後，我們對蘇區道路實施破壞，有很多險峻地方的路破壞了不容易修復，甚至不能修復，群眾為戰爭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山區的老百姓對道路很珍惜，捨不得破壞，動員群眾破路比動員堅壁清野更困難。

6、救護和看護傷病員。群眾裏的中年人和壯年婦女為擔架隊，老年婦女則照顧傷病員。當時紅軍的衛生機構和戰地救護很簡單，藥品也很少，老鄉家裏就是「醫院」。傷員在戰場就近交群眾看護。這次我家招呼了五個傷員，一切「護理」工作，都落在我七十歲的祖母身上，她成了遠近聞名的「紅軍奶奶」。

紅軍有了群眾的支援，就敢在盤踞蘇區的國民黨部隊的眼皮底下和「肚子」裏鑽來鑽去。蘇區面積小，來了幾十萬敵人，不僅每個縣有敵人，甚至每個鄉都有。紅軍由蘇區西部的寧都、興國轉移到蘇區東北的寧都的幾次作戰，都是從敵人之間的縫隙中鑽過去的，有時空隙祇有幾里寬，鑽過去很不易。後來紅軍在寧都以北，君埠以東集結時，被敵人發現，結果還是從兩股敵人之間一個不到幾里寬的山溝縫隙中鑽出去，脫離了危險。敵人進入蘇區後開始分散，佔的地方越多越分散，越有利於紅軍殲滅敵人。毛澤東提出「誘敵深入」，「牽著牛鼻子走」，紅軍分出一部分和赤衛隊一起騷擾、阻滯敵人的進攻。大部隊則隱蔽運動，聲東擊西，往返穿插於敵人重兵集團之間，避強擊弱，速戰速決殲敵，從被動中爭取了主動。

敵人在蘇區已經奔波兩個多月，一直被紅軍牽著走，肥的拖瘦了，瘦的拖死了，士氣急劇下降。紅軍也不輕鬆，長距離運動作戰，常常走

幾天的路才能打幾個鐘頭的仗，又要遠距離轉移，得不到休息，糧食供應不上，沒有鞋子穿，非常疲勞，但人民的支持大大地鼓舞了紅軍的士氣。紅軍從八月初至中旬，在半個月的時間內繞道千里作戰，幾乎沒有睡過一次完整的覺，極度疲勞，行軍中休息，戰士們祇要坐到地下就呼呼地睡著了，再出發時要人拉幾次才能醒來。

粉碎敵人第三次「圍剿」進行了蓮塘戰鬥、良村戰鬥、黃陂戰鬥、老營盤戰鬥、高興圩戰鬥、方石嶺戰鬥。興泰萬赤衛營主要打的是老營盤戰鬥。

老營盤戰鬥前紅軍主力進至興國、萬安邊界的均村、茶園一帶隱蔽待機，紅軍此前已經取得了蓮塘、良村、黃陂戰鬥的勝利，累計殲敵、俘敵萬餘人，士氣正旺。九月六日赤衛營接到命令派一個連到楓木凹破壞橋樑，我是楓木凹人，即隨該連去執行任務。我到村子裏一人未見，村民們都到山上躲藏起來了，我用火炭在自己家的門板上寫道：「我一切都好」就走了。我們把各處隘口橋樑破壞後，敵人就好像劃地為牢似的不能動彈，最後被紅軍逐段地消滅了。老營盤戰鬥是一次很漂亮的戰鬥，紅軍傷亡很少，消滅了敵軍一個旅，俘虜了二千多人，繳獲各種槍支兩千多。紅軍總部對老營盤戰鬥的非常讚譽，曾發過一份教材專門論述這次戰鬥的經驗。後來的瑞金紅軍學校、延安的紅軍大學、抗日軍政大學的軍事教材中，都把這次戰鬥列為優秀戰例當教案。新中國成立後，高等軍事學院和軍事科學院進行戰役戰例學習研究，都要介紹這次戰鬥。老營盤戰鬥成了人民軍隊作戰史上的經典之作。

在粉碎敵人的三次「圍剿」中，紅軍受到了嚴峻的考驗。由於戰略方針的正確，人民全力支援，紅軍英勇作戰，打了一場有聲有色的人民戰爭，取得了很大的勝利。紅軍的戰鬥風格形成了，一直保留到後來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其中以中央紅軍為基礎的第四野戰軍等部隊繼承發揚這種作戰風格尤為顯著。

第三次反「圍剿」勝利之後，贛南和閩西的蘇區聯成一片，形成了擁有二十一個縣城、五萬平方公里土地、二百五十萬人口的中央蘇區。到一九三二年底第四次反「圍剿」開始前，在一年半的時間裏，中央蘇區相對平和，紅色政權得到鞏固和發展，我們興國這一帶的蘇區也得到了擴大。

粉碎敵人連續三次「圍剿」的多數戰役是在興國境內打的，興國人民對蘇維埃革命的重大貢獻眾所周知。我們興國縣在蘇維埃革命前人口不到三十萬，在一九三一年底有將近十萬人參加了紅軍。我們家鄉被譽為「蘇區模範縣」。

第三次「圍剿」後，敵人向中央蘇區的侵犯就改在東北方向，即在閩贛兩省交界一帶。興國等老蘇區的任務就是發展生產和擴大紅軍。一九三三年一月，黨中央由上海搬進中央蘇區。在王明路線在中央佔統治地位的情況下，紅軍的戰略有了改變，要和敵人打正面陣地戰，紅軍急需擴大。一九三三年四至五月間開始的擴大紅軍的辦法是很特別的。名義上是動員，實際是強迫。農村裏祇要是能當兵的人，是非去不可的，有沒有勞動力種田都不顧了。地方蘇維埃政府把可以送到紅軍的人幾乎全送去了。誰也不敢不辦，否則就以反對蘇維埃論處。紅軍數量雖然迅速膨脹，但質量下降了，蘇區也大傷元氣。

擴大紅軍在敵人第五次「圍剿」之前一直是蘇區的主要任務。地方領導幹部如果完不成「擴紅」，常常要受撤職處分。當時「擴紅」的非常措施大致如下：

- 1、中華蘇維埃政府發佈《動員令》，提出要「保衛蘇區的每一寸土地」，擴大紅軍，誓死保衛家鄉，保衛勝利果實。

- 2、各地以鄉為單位張榜公佈應徵名單。名單一公佈，該當兵的人誰也跑不掉，互相監督。上了榜而不報名的，鄉政府就在門上掛「恥辱牌」相威脅，對報名起了很大的促進作用。

- 3、發《應徵令》。由縣級蘇維埃政府對應徵的每個人發給《應徵令》。蘇維埃憲法規定所有蘇區人都有當兵的義務，如果不執行《應徵令》就是反對蘇維埃，這是很大的罪名，可以嚴厲處理。

- 4、公佈懲罰破壞「擴紅」行為的命令。凡是破壞「擴紅」，都必定嚴懲。我記得當時蘇維埃中央政府工農劇社編了一出宣傳「擴紅」的戲，戲中富農婆搗亂「擴紅」時唱的歌詞是「當了紅軍很艱苦，天天行軍兩腿痛，夜裏放哨沒覺睡，凍得身上好冷啲……」劇社本意是宣傳「擴紅」，但演出後起了負作用，結果對這個戲的作者和演員都當作破壞「擴紅」罪給予嚴厲處理。

「擴紅」中「反徵」的現象很嚴重。最常見的就是躲藏起來或自傷，入伍後開小差的人也不少。部隊如發現某個戰士有了開小差的苗頭，會立即派人做說服工作，一般允許你回家呆幾天，到時主動歸隊就算沒事。如果不回來，「擴紅」人員就會把不歸隊的人抓到鄉政府去，被強制送到部隊去，對開小差的處理，地方政府比軍隊還嚴厲。我參加革命後，遇到過第一次過左、過激的群眾運動就是這次「擴紅」，中國共產黨從那時起就有了「寧左勿右」的思想。

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中失敗了，被迫長征，過去祇強調是王明機會主義路線錯誤，我認為中央蘇區的政策也很有問題，如過度徵糧，「擴紅」，以及土地革命中殺地主富農及其家屬的過激行為，各地都打「AB團」肅反擴大化，使紅色政權有些失去了民心。我們興國縣在蘇維埃革命前人口二十三萬，在一九三一年底有八萬餘人參加了紅軍。這被說成是我們家鄉的光榮，被譽為「蘇區模範縣」，實際上已經是竭澤而漁了。

第三章 紅色瑞金

在瑞金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國民黨第二十六路軍一萬七千餘人在江西寧都舉行暴動，參加了紅軍，被編為第五軍團。這是紅軍另一種方式發展起來的力量，必須很好地改造建設才能真正成為共產黨的軍隊。這時，正逢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提出「政治建軍」的方針，即在各個部隊加強政治機關的建立和建設。中革軍委從其他紅軍老部隊調給五軍團一大批的政治工作幹部，從上到下建立了政治工作系統，我作為骨幹也在其中。此前我們在瑞金附近進行了短期訓練，紅軍總政治部組織部長李弼廷是我們的主要政治教官。不久就在部隊中開展了「三大運動」，即以反對軍閥主義為中心，提倡官兵政治平等；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軍事幹部和政治幹部要團結共事。

軍團的領導人董振堂、趙博生等革命態度堅定，加上他們在部隊裏有極大的影響力，使紅五軍團很快成了共產黨領導下一支有戰鬥力的部隊。一九三二年初，紅三軍團和五軍團在三軍團的軍團長彭德懷指揮下攻打贛州，攻城打開突破口之後，三軍團衝進城內。由於沒有經驗，突擊進城的部隊遭到敵人的反突擊，這時五軍團發揮了他們城市巷戰近戰的特點，進行肉搏戰，用大刀殺開了一條血路，救出三軍團。這是紅五軍團暴動後編為紅軍的首次大戰鬥，打得非常英勇，在紅軍中樹立了威信。從此，五軍團不僅和紅軍其他部隊團結了，內部也更加團結了。

一九三二年秋冬之際，我由紅五軍團選送到瑞金的中國工農紅軍學校第五期學習。瑞金是中央蘇區剛成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首都，是中央蘇區的政治文化中心。上工農紅軍學校滿足了我學習的願望，紅

軍學校的校長是劉伯承，他是我軍軍事教育的開拓者，後來人民解放軍的高級將領不少都出自這所學校。

我進紅軍學校之後先在政治團學習，後來上級要求由政治團調部分個人政治條件好的學員到特科營軍械班學習，我被調到軍械班。不久軍械班與供給隊合併了，我在供給隊學習，一直到畢業。我很珍惜這次機會，我在紅軍學校學習祇有八個月，學習非常努力。我學習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概念，學習了戰術戰鬥條例，和粗淺的天文、地理知識，還學算數和簡單財務原理。這些全新的文化，對我又是一次啓蒙教育。學習中，我不僅「文」的好，「武」的也行，我是從士兵一步一步上來的，在紅軍戰鬥部隊受過基礎軍事訓練，到了紅軍學校裏，我對隊列、射擊、投彈、田徑等樣樣在行。在校期間，我曾是瑞金紅軍學校評選的模範班的班長，一百米賽跑還得過一等獎。一九三三年春，我以優異的成績從紅軍學校畢業。

由於我學習成績突出，家庭成份好，是黨員（我已於三二年由團員轉為黨員），畢業時就和另一個叫劉吉仁的學員被留在瑞金紅軍總部機關，分配到總供給部。我們兩人都到財政處工作，他任出納，我任會計。不久，我兼任總供給部的機要統計員，管理全軍與總供給部有關的軍務實力統計，這是一項絕對機密的工作。

總供給部機要統計員的業務範圍為：進行紅軍人員、兵力、槍支、馬匹、軍械、彈藥、糧秣的全部實力統計工作，各部隊實力都分別定有秘密的代號，總供給部除楊至誠部長、葉季壯政委外，祇有我一個工作人員知道全軍的這些數字。我擔任這項工作之前，經過了國家政治保衛局專門審查並由周恩來副主席批准，因此周恩來早就知道了我。我有國家政治保衛局的特殊工作證，我要是去中革軍委辦理這方面的業務，紀律規定我不能個人行動，至少有兩個保衛人員（特工）與我同行。

我擔任總供給部的機要統計工作不久，在行政職務上又擔任了供給部政治指導員，主要是在總供給部部長楊至誠，政委葉季壯直接領導下工作，就好似總供給部的機要秘書一樣，成為部長和政委的直接工作助手，可以這樣說，楊至誠、葉季壯，尤其是葉季壯是我「革命的引路人」。楊至誠比我大十二歲，是出身於黃埔軍校和參加過南昌暴動的老資格，但他把我當作忘年交，我倆不僅是上下級，也是最好的朋友。那時

供給部沒有秘書，楊至誠就把我當秘書使用，叫我為他辦理不少文書工作。他出差辦事一般都帶我出去，我隨著楊至誠到過福建長汀、江西寧都、興國等地檢查工作，這讓我開闊了不少眼界。我到供給部後不久，已經來中央蘇區一年多的原上海黨中央的一些人推行「左」傾路線更厲害了，一九三四年一月，中共六屆五中全會在瑞金召開，把「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錯誤推向了頂點，在組織上大量肅清和他們意見不一致或無辜的人。楊至誠因為供給部工作人員有貪污銀圓行為被抓住不放，受到執行王明路線的人的迫害，被打了下去，之後葉季壯出任紅軍總供給部部長兼政委。

葉季壯上任後，我已擔任了總供給部政治指導員一段時間了。當時總供給部機構非常精幹，政治工作範圍內的具體事都是我一個人在管，因此我這個政治指導員就是總供給部政治委員的直接助手，其實我早已同政委葉季壯的關係甚為密切了。葉季壯參加過廣州暴動、百色暴動，參加革命前曾做過新聞記者，社會知識豐富。他對一般人不愛多說話，但和我則時常聊天，從不把我當外人，使我感到非常可敬可親。楊至誠、葉季壯是我的老領導，他們對我的教育和培養，我銘記在心。一九六七年六月葉季壯去世，在他的追悼會上，總理拉著我的手說：「以後軍隊的後勤工作就靠你了。」總理的話意味深長，雖然我已當了多年總後勤部長，但是我軍的後勤工作是葉季壯、楊至誠他們開創的。

我由紅軍學校分配到供給部後，當時的總政治部組織部指定我為總供給部機關黨支部書記，長征開始之前，又任命我為軍事工業局的黨總支書記。軍事工業局是中革軍委獨立的部門，但由總供給部指導工作。此外我還是一九三四年初在瑞金召開的第二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代表大會選出的人民檢察院工農檢察委員。總之，我從紅軍學校出來後，組織上就把我列為政治上特別可靠的人來加以重用了。

我到中革軍委總供給部工作，是我從事軍隊統帥機關後勤工作的開始。那時人民軍隊後勤工作正處在創建時期，我們那一批人是人民軍隊最早的後勤工作者了。這些人在長征途中大部分犧牲了，後來又經過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艱苦歲月，到新中國成立的時候活下來的人已經很少，而其中曾在紅軍總供給部工作並先後擔任過領導的祇有楊至誠、葉季壯和我。

長征前的準備

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召開。在共產國際代表的支持下，王明補選為中共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控制了黨中央領導工作，從此，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在黨中央開始了長達四年的統治。王明沒有什麼實際鬥爭經驗又愛瞎指揮，一九三三年一月，以博古為首的臨時中央從上海遷入中央蘇區，很快，他們就全面推行「進攻路線」，批判毛澤東「狹隘的經驗論」、「富農路線」、「極嚴重的一貫右傾機會主義」，清除毛澤東正確路線的影響。毛主席實際上失去了對紅軍的指揮權，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開始在中央蘇區佔了統治地位。

一九三三年九月，國民黨對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圍剿」開始了，不久就有紅軍失利的消息傳來。一九三四年四月廣昌戰役中，紅軍和白軍打陣地戰硬拚遭到重大失敗，人們就不那麼樂觀了。我哥哥邱會佳就是在廣昌戰役中犧牲的。

一九三四年六月開始，我參加了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周恩來領導下的紅軍退出蘇區的準備工作。紅軍可能要進行戰略轉移的決策在當時極為秘密，直到紅軍長征前夕，我才知道我做的大量工作是為什麼。

一九三四年六月初的一天早上，葉季壯通知我，他帶我到總司令部（當時都習慣地稱中革軍委為總司令部），去接受一項特殊任務。我因為工作關係每月都要去那裏幾次，報抄統計數字，我每次去都要如同「大官」出門一樣帶兩個佩帶短槍的保衛人員。保衛員並非保護我，而是保護紅軍實力統計資料這樣絕對保密的文件。國家政治保衛局規定：如果發現機要人員有離隊或投敵行為，有當場槍斃的權力。

那天葉季壯親自和我去，我就知道有很大事了，直到快進總司令部的門口，葉季壯才說了一句：「今天是周副主席親自向我們交待重要工作。」聽了葉季壯的話，我立即緊張起來。在王明路線的肅反後，紅軍機關裏存在著一定程度的恐怖氣氛，越是機要的人，如果發生了問題越是要死，我懷疑自己是否出了什麼事要倒黴了。這次周恩來這樣的「大官」為什麼親自找我？我心裏一連串疑問。

我們到了周恩來住處，門口有背長槍的衛兵站崗，院子裏還有背短槍的內衛。進了屋子就是周恩來的辦公室，中間是兩張方桌拼成的會議桌，四周牆上掛的全是軍用地圖。周恩來聽到來人就從內間出來了。他

身材中等，絡腮鬍子又密又長，雙眼睛炯炯有神。葉部長把我介紹後，周恩來客氣地邊說邊擺手勢，叫我坐下，我卻不知所措。周滿臉笑容地再次叫我坐下，我緊張的心情一下子鬆弛了下來，看來不會有「那種事」發生。

周恩來第一句話說：「啊，你就是邱會作，名字我早知道了。」他知道我全家都參加了蘇維埃革命，我雖然祇有十九歲，已參加革命快五年了，打過不少仗，當過基層幹部，一年多以前又畢業於紅軍學校。周恩來對我非常滿意，他說：「在我們家鄉，不滿二十歲的人還叫小孩。你現在就參加處理紅軍戰略上的大事，這叫『小人辦大事呀』！」周恩來的話我似懂非懂，「小人辦大事」是說我年紀輕，至於說處理「戰略上的大事」，我就不明白了。

周恩來問了我個人情況後向葉季壯點點頭說：「人就這麼定了，任務你和邱會作談過嗎？」葉答：「沒有。」這時周恩來向我介紹了他身邊的一個人，叫馬紀元，是國家政治保衛局的一個副隊長。周恩來向我交代任務說：「我們可能同國民黨軍隊在蘇區的中心打仗，事先得有必要的準備。」周恩來的話祇局限在準備打仗上，對準備撤出中央蘇區沒有明說。其實他也是說不明的，因為當時中央並沒有明確的打算，不僅沒有長征到陝北的計劃，連是否立即退出中央蘇區也還沒有最後定下來。

周恩來對我交待：你去完成一項特殊任務，把幾處兵工廠、藥品材料廠和幾個倉庫一律炸毀。另外，要把大量的浮財埋掉。幾個倉庫裏的東西，可以迅速分散，分散不了就毀了。東西要處理得乾乾淨淨。你們要絕對保密，無論如何不能讓當地人和廠裏的工人察覺我們的意圖。要是知道了，傳出去了，就會對根據地軍民的士氣引起動搖，於當前的鬥爭十分不利。你們對兵工廠的處理可能會比較困難，最好採取夜間行動。這是一項蘇維埃國家最高機密的工作，如有洩密，軍法不容。馬紀元同志參加這次任務，帶保衛局一個警衛班去協助邱會作。邱主要負責，馬保證邱執行任務和安全。

周恩來說完就帶著我們到了地圖跟前，問我：「會看地圖嗎？」我答：「在紅軍學校裏學過。」周指著地圖上畫的一個圓圈裏箭頭的標記問：「這是什麼？」

「它代表指北針。」「要是沒有指北針標記的地圖，你怎樣區別方向？」「上北下南、左西右東。」周聽了我的回答後放心地說：「你還有什麼不明白的立即提出來。今後還有什麼問題，葉部長還可以和邱會作談。」從這次談話中，我知道了周恩來的工作風格，他雖然是紅軍最高領導，但佈置工作卻喜歡事無鉅細，凡事都要一一關照到。

從那天開始，我就放下了總供給部的工作，專心執行周恩來交辦的任務。馬紀元帶了一個警衛班，班長是李青山。他們穿中央保衛局保衛團的制服，佩帶特別樣式的藍色領章，每人都帶著短槍和一把大刀。我從總供給部帶了一個傳令兵、一個飼養員，一共十六人組成了一支分隊。

我們按照計劃沿著兵站線每天行軍大約六十里，都是早出發、晚宿營。我同馬紀元都不願騎馬，跟大家一起步行，我當時年紀輕，一點也不覺得苦，祇要肚子吃飽就行了。我和馬紀元熟悉了，曾開玩笑問：「你除了周副主席交代的事情外，還有監視我的任務吧？」他祇是一笑，既不承認，也不否認。按平日的規矩，這次最高軍事機密行動中，馬紀元監視我，隨行的人裏肯定還有監視他、有權處置他的人。在我們執行任務回來後，我曾在周副主席的辦公室還看到過馬紀元一面，但不敢相互打聽什麼，以後就再也沒有見到他，不知馬紀元是犧牲了還是被「保密」了（處死了）。我軍有史以來，幹部們對保衛機關都很害怕，特別是抓「AB團」和紅軍肅反後更是這樣。

我們執行這次任務是分幾站完成的。

第一站，勝利縣水頭寨。我們來這裏處理倉庫物資，這個倉庫存有數千支雜色步槍及軍械用品，這在當時都是寶，但祇能忍痛割愛了。我決定先接管倉庫，把現有的人員全部調走後再處理物品。爲了保密，我們全部自己動手。我們要工作人員一律到瑞金附近集中，他們交接完就全走了。怎麼處理物品？我權衡利弊後，決定把東西沉沒在深水中。倉庫裏有一個水運碼頭，裝船就在白天公開進行，說是運到前方去，等到晚上再把物品沉沒在河裏深水中。

第二站，橋頭鎮。橋頭是勝利縣政府所在地，有個大型的彈藥庫，庫主任是個負傷殘廢的紅軍營長。這裏庫存的物品基本上都是一些廢物，如未炸的地雷、手榴彈、飛機炸彈等。倉庫在橋頭鎮東南的群山裏，那裏有很多天然石洞，其中幾座很大的洞是倉庫區，這個倉庫已經

封閉了，工作人員撤走了。祇有殘疾的倉庫主任住在橋頭，行動不便管不了事，那裏的山洞就成了土匪藏匿之地，那天我們恰好搜查出三個從家逃出來藏在那的地主，就把他們捆綁住，押回來交給縣保衛局。我們把物資集中起來放火燒了。我原以為對橋頭倉庫的處理很難，沒想到順利地完成了任務。

第三站，江面鎮。江面鎮在勝利縣和興國縣交界處，屬勝利縣管轄。這裏是紅軍兵工廠所在地，工廠有三個分廠：子彈廠（翻造）、翻砂廠（造手榴彈）和修械廠，共有一千多工人。工廠所在的二十多里長的山溝早已劃為軍事禁區，沒有居民，有一個警衛連專門保衛工廠。這裏是我們工作的重點，以工廠要轉移其他地方建廠來掩飾我們毀掉工廠的目的。

首先，進行深入的動員。我召開工人大會講話說，為了粉碎敵人第五次「圍剿」，需要加強軍工生產。要把現在的工廠分為三個，分別遷到不同地方擴大生產，在不同的作戰方向滿足戰爭的需要。我的講話很有「說服力」，他們完全相信了。

我們按照原定計劃把工廠的設備分為三個部分，名義上是分成所需要擴建的三個工廠。其實一部分設備要帶走，一部分要毀掉。

人員也是一樣，名義上按三個「新工廠」的形式調配人員，實際上按照將來要帶走的和遣散的分開，開到不同的地點去。兵工廠的行政組織積極配合，人員調動很快就完成了。我再用公函調來一千五百運輪員的隊伍，把要帶走的物品搬運離開工廠，不要的就地集中堆放。大約十天後，工廠那裏除了我們和警衛連外，什麼人也沒有了。

怎麼銷毀物品很難辦。機器等鐵製品不怕火燒，不少機器一時無法拆開。後來還是工廠警衛連的連長提出一個辦法：把工廠留下的炸藥和瞎火的手榴彈集中，和機器堆在一起，爆炸毀掉。

紅軍兵工廠是幾年辛苦逐漸建設起來的，機器和器材都是戰爭中繳獲來的。工廠的主要負責人如郝希英等都是上海地下黨介紹到中央蘇區來的，有的是從白軍解放過來的。工廠經過數年的經營才形成現在這樣的規模，能生產出木柄手榴彈、地雷，用舊彈殼翻造子彈和修理各種槍支。紅軍粉碎敵人五次「圍剿」是拼消耗的，根本繳獲不到敵人什麼東西，一切都要自己供應。紅軍兵工廠做出過很大的貢獻，現在馬上就

要毀掉了，當然非常心痛。但是爲了執行上級命令，除了毀掉，別無他計，我下炸毀令時心裏很不好受。

我們完成這裏的任務之後就回到瑞金。我向葉季壯部長匯報了工作，他表示滿意，並要我隨他一起去向周副主席匯報。第二天，我們到了總司令部，周恩來已等在那裏。我預先準備好了一個小提綱，按稿子讀了大約半小時，周恩來坐在我對面用心地聽著。我讀完之後，葉季壯補充了幾句，葉在給我補臺。出乎意料的是，周恩來對我滿口讚揚：「你說得很好，很簡明，要點也突出。我知道了你們出色的工作。這麼一項複雜的事，被你這麼順利地完成了，不容易呀！你還這樣年輕，思維能力很強，大有前途！」

說著說著，周恩來興致一下來了，說了一大段培養農民子弟當幹部的問題。他說，對學生出身的人著重要去做實際工作，到實際工作中去鍛煉。而對農民出身的則要千方百計提高他們的文化水平。如果學生出身的會做實際工作，農民出身的把文化水平提高了，我們黨就會有一支很好的幹部隊伍。當前我們農民出身的幹部多，提高他們文化水平是事關革命前途的一個戰略任務。

周恩來勉勵我說：「你很年輕，今後你要下功夫學，讓你的文化與你的思維能力能夠成正比例發展就好了。我今天算是給你下了一個學習文化的任務，下次再見面我就要考你了。」我聽了周恩來話，不知道哪兒來的勇氣，站起來把我自己釘的本子（也就是工作記事本）送到周恩來面前，請他給我寫上幾句話。周恩來隨手拿起墨筆在我的本子上寫上了：「誠實、勤奮周恩來一九三四年八月。」這個本子我一直珍惜地帶在身邊。可惜的是，「九一三」事件後，我的家被抄，這個本子不知所終。

從周恩來那兒回來後，我對學習抓得更緊了，遇到不懂的，我就到紅軍供給學校去請教宋奇峰校長。我在紅軍學校學習時，宋是我們的教導主任，畢業後我常去請教他。宋奇峰是北京大學的學生，學問很高，曾是國民革命軍二十六路軍的軍需處長，寧都暴動中參加了紅軍。一九三四年紅軍退出中央蘇區之前，再一次進行了肅反，他被國家政治保衛局處決了。宋奇峰死得冤枉，我至今懷念他！

周恩來、葉季壯救了我的命

完成這次特殊任務之後，心裏非常高興。但工作一忙，對這事很快就淡忘了，根本沒想到一場大禍要降臨到我的頭上。

大約過了一個多月，即一九三四年九月初的時候，第五次「圍剿」的形勢非常緊張了，紅軍內部的肅反更加嚴厲。

十月初，紅軍的長征就要開始了。這時我發現了一個反常的現象，國家保衛局派到總供給部的特派員表情很蹊蹺，一直死死地盯著我，甚至我上廁所他也一步不離。我掌握全部紅軍的實力，現在又知道紅軍準備退出中央蘇區的絕對機密，他們怕我「開小差」給革命造成重大損失。國家政治保衛局已經開過會，決定把我徹底「保密」了（秘密殺害），祇要保衛局的死刑命令一到，行刑隊來了就動手。當時中央蘇區裏正是王明路線發展到登峰造極的時候，別說是國家政治保衛局，就是各部隊的保衛局也可以殺人。隨便殺人是王明路線的罪惡之一，多少人都成了王明路線的冤鬼！

有天黃昏，突然衝進來幾個人把我綁了起來，國家政治保衛局執行部部長張炎和把鄧發簽署的要處決我的手令展示了，然後把我綁成處決死刑的樣式。我知道要被處決了，連喊冤枉，但沒有用。張炎和我要拉出去行刑的時候，要先向葉季壯打個招呼，可是葉季壯不在，我感到徹底絕望了。但真是湊巧，在押我執行的路上，正好周恩來、鄧發、葉季壯三個人騎馬迎頭而來，葉季壯見此症候大吃一驚，立即問周副主席，周恩來也有些驚愕，但沒有說話，祇是面向鄧發，鄧發向周恩來擠擠眼睛（意思是按老規矩辦），我則死死地盯著周恩來。周恩來略加思考對鄧發說：「他還是個孩子！交給葉季壯帶回去吧。」這樣又給我鬆了綁。我跟著葉季壯的馬後，一溜煙跑回供給部。



軍委供給部部長兼政委葉季壯。

回到供給部，葉季壯又給周恩來打電話，他心裏有點火，埋怨殺他的人連個招呼都不打。過了一會，周恩來又來了電話，要葉季壯和我立即到他那裏去把我的問題談一談。到了

周副主席那裏，看見張炎和也在，我沒有進去。祇過了一小會兒，葉季壯和張炎和就出來了，周恩來送他們到門口。他看見我反倒沒有說話，上前握了握我的手，我睜大眼睛直盯盯地望著周副主席，也不敢說一句話。周恩來決定除了免我一死之外，還要對我加以特別保護，並帶著一起走（長征），並交待對曾想處決我的事要絕對保密。

在延安的時候，周恩來提起這件事，跟我開玩笑說：「你當時直盯盯的眼睛望著我，給我的印象很深！」真是無獨有偶，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發生後，九月二十四日，毛主席決定把我們關起來，在大會堂和總理告別時，總理握著我的手，我雙眼也是直盯盯地望著總理，我對總理說：「我相信主席，相信中央，也相信我自己。」總理有些激動說：「好嘛！」此時此刻，不知總理是否想到，近四十年前我那雙直盯盯望著他的眼睛。

葉季壯一個爭辯，周恩來一道命令把我的腦袋保留下來了！讓我多活了七十年。周恩來、葉季壯在世的時候，我多次向他們表達謝意，感謝他們的救命之恩。他們總是說：那是王明路線的罪過，不應該死的人被處死的不知道有多少，你算是僥倖的了。

國家保衛局要把我「滅口」的事，最初我祇知道大概。一個偶然的機會，我知道了真情。一九三六年二月紅軍主力過黃河東征到山西去了，而紅軍總部留在陝北的瓦窯堡。周恩來時任中革軍委後方辦事處的主任，統一領導指揮陝甘寧邊區的黨政軍工作，重點是抓紅軍的供應。當時軍委總供給部駐在延長的永坪，我是供給部糧秣處長。葉季壯部長派我常駐在紅軍後方辦事處，爲了工作方便，我就同周恩來住在一個大院裏，當時住在一起的還有李克農、鄧發等人。我們幾個常常喜歡在周恩來辦公的大炕上閱讀當時可能得到的報紙，並且在那裏聊天。一次，我們無意中談到了瑞金的生活，李克農問鄧發：「長征臨出發之前，你爲什麼要把邱會作抓住要殺掉，難道就因爲他多知道了些機密嗎？要不是周副主席，閻王那裏就多了一個鬼。」鄧發面對著我略有羞愧地說：「那件事的起因你都知道，幸好沒有造成千古之恨！」周恩來聽我們說到這，就插進來爲鄧發開脫：「離開江西之前，殺了一些不應該殺的人，當時我們都有責任，沒有殺了他（邱），是葉季壯堅決不同意，否則要等到殺掉之後才匯報上來，那就晚了。現在大家對亂殺人的事很痛恨，這是我們黨一個最爲慘痛的教訓。」

出發前夕

長征出發前的準備工作十分緊張，那時並無「長征」一說，名義是「上前線」。長征前，葉季壯部長沒有別的助手經辦此事，供給部的一切準備工作都是他自己組織，特派員和我配合他進行工作，因此祇有我們三個人知道「上前線」的真實含意。

各項準備工作中最複雜的就是對人員的審查。凡「上前線」的人都要經過嚴格審查，報上級批准才能定下來。走的人確定之後，留下的人都到離瑞金不遠的七堡集合去了。當時王明路線非常左、非常殘忍，我至今還記得幾例被無辜殺害的人。

總供給部糧食處長羅鳳章是湘南暴動參加革命的。有人檢舉他貪污過三塊銀元，國家政治保衛局就把他抓走了。對此，作為總供給部部長的葉季壯居然事先不知道。羅鳳章的事情發生在離「上前線」較前的時間裏，形勢還沒有那麼緊張，葉季壯又幾次找周恩來，羅保住了腦袋，祇是被國家保衛局送到兵站去罰做苦工。對羅鳳章的打擊就是懲罰主義路線的具體案例，羅當了苦役，頭髮上被開了一條「馬路」（中間剃光一條頭髮作標記，防止逃跑），每天在兵站搬運重物。今天我們提到在革命隊伍裏搞「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是人人痛恨的，但在當年是很革命，很時髦，很風行的，是人人必須執行的。有一次羅鳳章挑運物品到總供給部來，我沒有像別人那樣歧視他，給他喝了水。羅比我大十幾歲，過去我對他很尊敬，可那天我也說了幾句責怪他的話，沒想到他毫不在乎地回答：「我現在比當處長好，晚上睡得穩當一些了。」他見我很不以為然，又說：「老弟，你年輕！對現在的事情，你能看到，但你不能看透。人若是倒了霉，可是身不由己呀！」對羅鳳章的話，我想了幾十年才想明白。當我想明白的時候，我已經比羅鳳章倒霉百倍了。

在臨出發前，供給部送出去了一批剛修好的步槍到前方去，兵站檢查出來有生鏽的，向上報告了。國家政治保衛局立即派人來總供給部檢查追究。負責槍支管理的軍實處軍械科科長胡子昂十分緊張，知道自己縱有十張嘴也說不明白，肯定是活不成了，於是偷偷在自己內衣裏藏了一個手榴彈。當我陪國家保衛局的人到軍械科找胡子昂查問時，他從容不迫地說：「我是軍械科長，槍生鏽由我個人負完全的責任，請不要連累其他人。」胡子昂說完，扭頭就向房子外面跑。祇見他跑出門外不遠，

榴彈就響了。他沒在房子裏拉響手榴彈，是爲了不傷害我和其他無辜的人。胡子昂在知道要被處決了的情況下，痛恨的祇是肅反制度，還不願意傷害別人，甚至包括不願傷害要執行他死刑的保衛局的人，真是可敬呀！事後，供給部把胡子昂當作「反革命分子」進行了批判。我一言不發，認爲胡子昂根本不是「反革命」，祇是工作中出了點差錯。但是，在王明路線之下，在長征前的那種特殊氣氛下，胡子昂除了死，沒有別的選擇，他死於共產黨的懲辦主義。

還有總供給部的管理科長李躍也死得冤。李是湖南人，是個二十幾歲的大學生，這在紅軍中是很少的。因爲他的家庭成份是地主，國家政治保衛局開始沒有批准他「上前線」。後來經過我們第二次報告，保衛局總算是同意了。李躍平常工作非常好，但是在長征出發的前一天晚上，管理科無意中發生了輕微的火災。保衛局認爲這是反革命發出的「燈火信號」，告訴敵人我們要行動了，於是把李躍抓走了。雖然對李的下場並未宣佈，但無須多考慮，就是用「保密」的方法處決了。

上面談的我死裏得救的經歷和另外三件事，說明了紅軍離開中央蘇區之前，恐怖的氣氛是相當厲害的。可以說，當時沒有一個人是不怕犯錯誤的。因此大家在工作中總是積極苦幹，謹小慎微，甚至不敢多說話。當時如果出了什麼問題，哪怕是一件小小的事就不得了呀。

那時的國家政治保衛局是革命隊伍中的「活閻王店」，想要誰死是輕而易舉的事，幾年來殺了很多的革命人士和人民群眾。一九三〇年開始的殺「AB團」，是敵人挑起的反間計在內部殺共產黨；一九三四年的肅反是我們共產黨自己挑起的殺共產黨。一些所謂的不可靠分子，例如寧都暴動起義過來的紅五軍團的一些幹部，殺了不在少數。長征前的肅反亂殺人是中國共產黨永遠要記住的教訓。

人民為革命付出的代價

紅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利是一步一步的。紅軍的長征還沒開始，國民黨軍隊就佔領了蘇區的邊境地區。那裏的人民開始遭到苦難，紅軍家屬被殘酷迫害的消息不斷傳到瑞金。那時我和家裏已經失去了聯繫，興國人民和我一家人遭的難是新中國成立以後我才知道的。

國民黨反動派剛佔領興國，就對這個中華蘇維埃模範縣的人民進行了屠殺。興國縣在一九二八年蘇維革命運動開始的時候有二十三萬人口，到一九三四年紅軍退出中央蘇區後，銳減到不足十五萬，參加紅軍走的約八萬人，絕大多數戰死了。有人統計，僅長征中，犧牲的有名有姓的興國籍戰士有二萬三千多人，沒名沒姓的犧牲者應當是多數，但無法一一收集名單了。興國參加紅軍的人到一九四九年解放時活著的並在革命隊伍中繼續工作的僅剩下一百多人了，其中五十四人成為新中國開國第一批將軍，其餘至少也是師以上的領導幹部了。

一九四九年興國縣經過一些不很完整的典型調查推算，全縣戶口平均減少四分之一以上。如我的老家，蘇維埃革命前有四十戶人家，解放後祇有十九戶，減少了二分之一。從這些數字就可以看出興國縣人民對革命付出了多大的貢獻！興國縣人民是這樣，我的家庭同樣也為革命付出了巨大的代價。

我家付出的第一個代價是，我兄弟兩人當了紅軍，哥哥還獻出了生命。哥哥和我參加紅軍後，家中沒有了壯丁，養活全家十多口人的重擔就落在我父母親二人身上了。我母親很顧家，對紅軍卻很慷慨，把兒子交給了革命。後來在第一次反「圍剿」的戰場上我們母子巧遇了。她對我說：「你要狠狠打白軍。不然地主回來了，分到的田也保不住。」革命利益同一個普通農村婦女的切身利益一旦聯繫在一起，就會改變她的思想。我哥哥在廣昌戰役中陣亡，紅軍長征後，我母親才知道她大兒子死了，哭得死去活來。失掉親人的痛苦壓抑了全家人很多年，二十年後解放了，他們才知道我還活著。這樣人間悲歡離合的事在興國不止我一家！

我家為革命付出的第二個代價是，家裏房子被毀、家人受迫害。我家有三間房子，是幾代人辛苦建起來的。房子在一九三一年粉碎敵人第三次「圍剿」時已經遭到過破壞。那次白軍被紅軍包圍時，佔據我家裏進行野戰防護，在牆上開了許多射擊孔，還搞塌了一間房。

白軍第五次「圍剿」時，戰略是步步為營的「堡壘政策」，即進到哪裏，堡壘就築到哪裏，公路隨後就修通，修公路是「就地取材」，以毀壞紅軍家屬的房子為主。國民黨部隊把我家所有的房子全扒光，成為一片廢墟，我父親急得連吐幾口血就病倒了。因為我家是紅軍家屬，鄉親們不敢援救。我家分得的土地被地主收回去了，祇好在荒山上種些紅薯，

加上砍柴挑賣，以吃紅薯和野菜爲生，我九歲的弟弟還要去要飯。最困難的時候，祖父和父親光著上身，穿補過「千層」的褲子，洗的時候，要用稻草編的草片子遮羞。爲避風雨我的一家人在墳洞裏一住就是兩年。

我家爲革命付出的第三個代價是，父親用勞役還地主的租子，摔成重傷。地主從一九三〇年共產黨正式分田到一九三四年國民黨政權恢復計算，地主要我父親補交五年的租子。我家沒有能力償還，就托人向地主家求情，希望和別人一樣緩交。地主惡狠狠他說：「別人欠租一百擔我也不要，你家有共匪，一粒糧也不能少！」地主逼著我父親上山到他的林場去砍伐樹木挑到公路上，以勞役代交租子。木材每擔至少有一百三十斤，挑四十里路的山路，有次連人帶著擔子掉到深山溝裏差點摔死，跌成重傷殘疾了。紅軍長征走了，地主回來氣勢洶洶地把奶奶的墳地扒開暴出骸骨，說是「他家墳地的風水破壞了」。地主扒墳時，我爺爺奮力阻擋，被打得口吐鮮血，很快病故了。

我的一家人和興國縣許多家庭一樣，爲共產黨的革命吃盡了苦頭。興國縣在人民革命鬥爭中犧牲了數以萬計的優秀兒女的生命，無數的家庭遭受到摧殘。他們犧牲流血，爲新中國的建立鑄成了一塊塊奠基石。

第四章 兩萬五千里長征

出發「上前線」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旬，中革軍委機關開始由瑞金長征。

出發之前進行了動員，說是「上前線」。當時「上前線」很有動員力，除了對國民黨反動派的痛恨，願意上前線殺敵立功的原因外，前後方的待遇不同也是一個因素。前方每人每天一斤十兩糧（十六兩制），後方祇有一斤二兩，而且沒有油，有時連鹹鹽也沒有，整天吃清水煮南瓜。

出發前，我被任命為軍委軍事工業局的黨總支書記，加上我原來的總供給部政治指導員兼機關黨支部書記的職務，身上的擔子不輕。中央機關長征組成了兩個縱隊，各轄若干梯隊。一縱隊為軍委機關的大部分，葉劍英任司令員，紅軍最高領導「三人團」的博古、李德等隨此縱隊行軍。二縱隊由中央機關、政府機關、總供給部等組成，是中央領導機關長征的主體。李維漢任司令員（沒到職），鄧發副司令員實為司令員，蔡樹藩任副政委，毛澤東等隨此縱隊行軍。以總供給部為主編成的二縱隊第二梯隊，還有通信教導隊、軍委軍事工業局和運輸大隊。出發前幾天，葉季壯帶著特派員和我去向周恩來匯報總供給部的準備工作。周表示滿意並指定葉季壯、我、特派員三人組成總供給部工作小組，由葉總負責，統籌處理總供給部長征事宜。匯報後，葉季壯帶著特派員提前到雩都去擔任中央縱隊的渡江（贛江）司令員，總供給部的行政工作實際由我負責。

這一下我的工作就更多了，那時也不知道什麼叫累，工作再多也不怕。長征出發的前一天下午我們就準備好了一切，我在開晚飯之後很久才到炊事班吃了一點東西。我已經兩天沒有睡覺了，手拿著飯碗靠著牆就睡著了。炊事班長很心疼我，在門口「放哨」不讓人來打攪我。晚上有

事找不到我，就有人懷疑我開小差跑了。通信班長很快找到了我，他看我累成那個樣子，就對大家說明了，仍然沒有叫我，直到凌晨才叫醒了。出發前的這一覺我睡得實在痛快。

總供給部機關本身並不大，軍事工業局合併過來，還有地方工作團和一些女同志也編過來一起走，變成二百多人，雖然人不算多，卻相當亂，管起來很麻煩。一是官多兵少難管，除了管理科的三個班（炊事、飼養、運輸）和通信警衛排之外，其他人都是官；二是大官多，每人都有牲口，飼養員、特務員（後改稱警衛員），少數還配有運輸員挑東西；三是機關的各個處、科都是獨立單位，現在湊合在一起，這些人毫無紀律，誰也指揮不了。

行軍開始集合時，這支隊伍根本聚不起來，有的祇到集合場去看一下不去站隊，行軍時站起來再走，工作一有不慎就會冒出一大堆意見。行軍走起來毫無秩序，距離拉得很長，有時把別的單位的隊伍都攪亂了。到了宿營地不服從分配，誰先到了，誰搶到了好房子誰就住。先到的人住得寬，後到的人沒有房子住，也不相讓。飯好了隨便就打，後來的人吃不上飯……。離開瑞金第一天行軍中曾進行過防空演習，防空號一吹，人四處亂跑，除通信警衛排和管理科的人有組織地到達宿營地之外，幹部無論有牲口的還是沒牲口的，都逍遙自在地走，有的天亮才到，有的因為累了就在途中找地方睡覺，第二天中午才到。他們自己不聽指揮，還大發牢騷指責別人。

對此，中央縱隊嚴厲地進行了批評，說這樣很快就會掉隊掉光了，這哪是行軍？是自己消滅自己！我召開幾次支委會討論，也做過不少規定，但效果不大。因為大家看到，各單位除司令部機關好一點之外，其他的彼此都差不多，中央縱隊在長征初期差不多都是這樣。

我們對總供給部行軍管理動過不少腦筋，教育的方法不靈就實行嚴格紀律，組織戰鬥化。葉季壯召過一次開幹部會議並宣佈了四條規定：1、成立隊部統一組織指揮，我任隊長，下設宿管組、收容組；2、所有人員一律按班排編組，總供給部機關及軍事工業局編為第一排，地方工作團和女同志編為第二排，騎馬的幹部編為第三排。其他官都是「兵」，有事找排長；3、規定了行軍秩序，警衛排在前，隊部、一、二、三排其次，牲口全部集中在最後，幹部想騎馬祇能到後面，不能騎馬在隊列內行進；

4、制定了集合、宿營、開飯等制度和紀律，每個幹部都要管好自己的警衛員、馬伕，他們如果犯紀律，追究幹部的責任。

規定實行起來阻力很大，我是「初生牛犢不怕虎」，硬性強迫執行。有一個高級幹部的特務員有恃無恐，屢犯錯誤，我下令把他的槍下了，到達宿營地關了禁閉，這下震動了全隊，多數人擁護，少數人不滿。有人向縱隊鄧發司令員寫了告狀信，責罵邱會作是個「小霸王」，沒想到這卻給我們幫了大忙。鄧發認為告狀信中的指責正是優點，應當表揚，必須有幾個「小霸王」才能管理好中央縱隊裏那些大大小小的「老爺」。鄧發把自己看法和告狀信呈報給周恩來，周對我大加讚揚並在路邊查看了總供給部的行軍。周恩來向鄧發說：「機關不戰鬥化，不提高組織紀律性，就不能完成緊張的長途行軍任務。」周恩來、鄧發認為我提出的「機關戰鬥化」的口號很好，要全縱隊向總供給部學習。

誰告了我的狀？事後我才知道是中華蘇維埃全國總工會軍事工業工會主席伍江洲。周恩來嚴厲批評他說：「你反對戰鬥化的生活很不對！邱會作很年輕，工作經驗不多，但他肯動腦子。你應當支持他工作。」周恩來親自出面批評，那些「老爺」都服帖了，主動服從指揮，行軍情況進步很大。

「全權代表」

中央機關的長征是從瑞金到粵都西進的，在河上架了幾座浮橋，夜裏就過去了。紅軍長征幾天之後，運輸部隊「走不動」，問題很多。葉季壯認為加強那裏的領導是當務之急，讓我把總供給部的工作暫時交給糧食處長劉明德，立即以軍事工業局總支書記的身份到運輸總隊去指揮。

中央機關從瑞金出發是「大搬家」。兩個中央縱隊各有自己的運輸隊，主要是二縱隊，由一千五百多運輸員編成了總供給部運輸總隊，兵工廠政委鄒林當總隊長。他們一出發就「走不動」，拖了中央縱隊的後腿。

我到運輸總隊時鄒林總隊長已經患重病不能工作了，我實際上成了負責人。我很快就發現了運輸總隊的三個困難：一是沒有預備運輸員，每人都挑一副擔子，天天長途跋涉不行；二是不少大機器要多人抬著走，根本沒法子走長路，更別說山區小路了；三是運輸分隊的行政組織沒有單

立，運輸員吃飯、走路、睡覺沒有人管。運輸總隊名義上是紅軍的一個部隊，但如同民工一樣是「一盤散沙」。

為此，我們就日夜不停地抓緊工作：第一是整編隊伍，把運輸總隊分成了三個大隊（一個抬運大隊，兩個挑運大隊），大隊下面再組成連隊式的十二個分隊。分隊裏有炊事班、收容組、宿營組。第二是加強行政領導，管好全隊的調度、行軍、吃飯、睡覺四件大事，讓運輸員沒有後顧之憂，有體力完成任務。第三是清理運輸物品。全隊約有一千副挑子，約三百副是手榴彈半成品。抬運的機器中多是「洋機器」，用電才能開動，在兵工廠從來也沒有用過（因為沒有電）。

我提出把它們處理掉，但遇到嚴重的阻力。工廠技術人員什麼都想留，好像明天就要開工生產一樣；而行政幹部則要多扔，否則會把部隊拖垮。幾經周折我才上報了必須處理的物品清單。葉季壯立即轉報鄧發司令員和周恩來副主席審定。

批回來的清單使我大失所望，祇可以處理手榴彈半成品約一百擔，其餘物品則務必運到「新根據地」。儘管如此，這次處理後總算有了百分之十幾的預備運輸員，再加上軍事化的整頓，情況有了好轉。

在將要通過第一道封鎖線的前兩天下午，周恩來、鄧發親自察看中央機關兩個縱隊的運輸部隊。運輸員挑著抬著東西一天要走近百里路，大多潰不成軍，一幅慘狀。中央縱隊帶著這個「大包狀」無法快速前進。憂心忡忡的周恩來到了路邊一個村子，看到幾百副挑子在村口放得整整齊齊的，就問：「哪個單位的？」聽到是軍事工業局的以後，又問：「你們有多少掉隊的？」

「一個掉隊的也沒有！我們吃了中飯馬上要出發。」運輸員們回答。

周恩來一聽大吃一驚，我聽到聲音從房子裏出來了，周恩來一見我就說：「隊伍好整齊呀！管得比其它運輸隊都好！你們應當好好總結。」我簡要報告了我到運輸隊後的做法。

中央縱隊在通過封鎖線之前，要等後衛的紅五軍團，就地休整了一天。周恩來召集了一次專門討論運輸部隊問題的會，要我在會上介紹整頓總供給部運輸隊的經驗。我說了我們在行政、生活、行軍上的「三管好」之後，又大膽地說：「運輸部隊的問題很嚴重，如果不從根本上解決，就有人財兩空的可能。物資要丟，運輸員也要丟了……」中央縱隊副政委

蔡樹藩馬上打斷我的話，問：「有這樣嚴重嗎？」他的話裏包含著政治態度，顯然在指責我不要問題看得過重，犯右傾錯誤。在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還在高峰的時候，對蔡樹藩的問話我當然很害怕，立即住了口。

周恩來看出我的顧慮，用既是鼓勵我，又兼有批評蔡樹藩的話說：「我們是討論運輸部隊的問題，要把實際情況說出來。至於決心，由我們來下。邱會作你繼續說下去！可以大膽提出建議。」

我這才敢接著說：「在人和物都不能保證的情況下，應當要人不要東西，或多要人少要東西。爲了保住人，東西就要丟。否則不要說過封鎖線，正常行軍也難以堅持。當前要解決的是：第一，運輸員與擔子比例應當是三比二，三個人兩副擔子，如有可能，最好是五比三。第二，擔子不能超過四十斤重。戰鬥人員負重不過十多斤，運輸員的負重是戰鬥員三四倍，而每天行軍一步不少，體力吃不消。第三，抬著走的大件一律丟掉，因爲今後要走山路，有的地方抬著走根本過不去，現在不丟，走山路時還是要丟。」聽了我的發言，主管此事的中央財政部長林伯渠、總供給部長葉季壯等都不敢表態。他們好像已經知道紅軍要到湘西與賀龍鄧麗台，新根據地離這裏並非天涯海角，東西以不扔掉爲好。而我不知道這些，就「放了一炮」。

周恩來看到大家不表態，會議結束前總結地說了一句：「物品的處理是一個嚴肅的問題，處理不好，後果不堪設想，大家考慮一下再定。」周恩來是唯一對我的意見認爲是值得考慮的大人物。

第二天，葉季壯向我傳達了中央領導研究後的指示，「對物品現在不能做大的處理」。我雖然有想法，但祇能執行命令。我想，祇要急行軍兩天，大部分東西都會「自然」處理掉的。

我們要通過的贛粵湘交界處的幾道封鎖線，縱深約有二百多華里，從封鎖線前的幾十里外就開始急行軍，要經過兩座高山走三百里以上的曲折險峻山路和一條較大的河流，封鎖線兩側敵情相當嚴重，戰鬥部隊兩天急行軍即可通過封鎖線，而運輸部隊即使每天急行軍走八十里以上，連續走四、五天也不一定能過得去，運輸部隊面臨著一道「鬼門關」。

果然，運輸部隊第一天過封鎖線就發生了嚴重的掉隊，但還勉強可以行軍。第二天就潰不成軍了，抬運的東西幾乎一件沒留，機器、擔子

丟棄在將近五十里的沿途上，甚至裝銀洋的箱子也破碎散落在路邊，蘇維埃票子到處可見……一片狼藉。運輸員有的開了小差，有的就躺在路旁死活不肯走了。國家保衛局的人催促威脅、以槍口逼迫也沒有用。

通過封鎖線的第二天晚上，除了總供給部的運輸部隊以外，其他的已接近潰散邊緣。周恩來聞訊後從縱隊的後衛趕了上來查看，在一個村子裏遇到我，問情況怎樣？我說，我們的隊伍基本還在，掉隊了百十人之多。運輸員徒手跟上都困難，更不要說挑著東西了。我們運的東西已丟了上百擔，抬運的都落在後面了，可能會全丟掉。

這時，周恩來認為不把東西扔掉是不行了，否則後果不堪設想。他知道離宿營地還有二十五里，中央縱隊兩邊的護衛部隊均在十里左右，還有機會下決心。於是周恩來在現場架上電臺，一面對全軍的行動指揮，一面通知林伯渠、葉季壯、鄧發、張經武（中央縱隊參謀長）等相關人員到這裏開會。

在等候開會的時候，周恩來對我說：「前天你提出的意見看來是對的，因多數人不同意實現不了，現在要下決心了。否則真要人財兩空。敵情祇會越來越嚴重，現在祇有少要物品，才能保住應留的物品，保住人。」

開會的人到了，周恩來示意我也列席，他說，從瑞金出發時近八千人的運輸部隊，現在不到三千人了，成建制的祇剩下總供給部這一千二百多人。我們過了這個封鎖線，前面又是封鎖線，這樣下去，家當要全丟了，我們不能人財兩空。

會議很快就討論決定了三條：1、擔運的東西要嚴格控制，祇能帶彈藥、醫藥、現金（主要是銀元和金條）、宣傳品，其餘一律處理掉。抬運的東西一件不帶（包括印蘇維埃幣的印刷機、石版等）；2、把幾個運輸部隊剩下的人全部集中編成一個運輸總隊，邱會作為負責人，代表縱隊全權指揮；3、對物品的處理和運輸隊的整編，授權邱會作、曹菊如（財政部局長）、姚××（名字忘了）三人在此就地進行。

這時前面傳來了消息：敵人在反撲由紅一軍團打開的封鎖線，後面從贛州方向追來的敵人不遠了，情況緊急。周恩來指示後衛的紅五軍團阻擊追敵至明天中午，給中央縱隊以突圍的時間。他同時下令我們三

個人（邱、曹、姚）處理物資，重組運輸部隊，明天上午十二時前要隨大部隊繼續前進。

我們在附近一個叫八丘田的村子裏對中央縱隊歸過來的零散運輸人員進行了整頓。按周恩來指示的原則反覆清理後，祇留下 1600 多名精幹人員。選 100 人組成炊事班、收容隊、救護隊和通訊勤務隊；擔子減少到五百副，每擔四十斤，三人一副擔子輪流挑。除子彈和銀元全帶走外，帶不走的東西全部毀掉。一時間，八丘田村爆炸聲不斷，火光沖天。我們提前三小時出發了。後面負責護衛的五軍團不斷來詢問情況，他們說，你們提早了三小時出發，我們不知道減少多少傷亡呀！

通過了第一道封鎖線後，在前邊開路的紅一軍團遭到敵人在粵漢鐵路線上新的封鎖，雙方正在作戰，中央縱隊就地休息了兩天。此時，我召開了一次新組建的運輸部隊的會，把全隊組成了三個大隊，下屬若干分隊、班排，如作戰部隊一樣設立了隊長、指導員、班排長。原來運輸員們不堪勞苦，人心惶惶。現在每人負重合理了，三人一副擔子，輪流休息，大家不僅體力恢復，也樹立了信心，軍心穩定了。

在十一月底中央縱隊突破粵漢鐵路和強渡湘江的封鎖線中，運輸部隊再也沒嚴重掉過隊，擔運的東西保住了。我們到了湖南後，把追敵甩在後面，敵情有些緩和，但氣候一直不好，大雨滂沱，山路之難行真是無法形容，有時是在沒有路的「路」上走。半個月裏，紅軍總數又比剛過湘江時減員大約四分之一，而我們運輸總隊雖也減員卻祇有十分之一，還剩下了 1500 多人。十二月中旬，中央在貴州東部的黎平開會，決定放棄北出湘西和紅二、六軍團會師的計劃，到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北部去。中央兩個縱隊合併前進。這時，我們挑運的子彈發到了各部隊，銀元等財物分散了保存，運輸部隊沒有存在的必要了。於是祇保留一個二百人的運輸分隊歸軍委四局三科指揮，其餘一千多人補充到紅五軍團。

在長征最初的一個多月裏，我親身經歷了中國工農紅軍這支運輸部隊悲壯的奮鬥和艱苦的生活，一定要為他們說上幾句。

首先，運輸部隊付出幾乎耗盡生命的消耗。人的體力有限，而運輸員的消耗幾乎沒有限量。他們每天都有一個幾十斤重的擔子壓在肩上，很多時候是連續急行軍。一個戰鬥員負重祇有十幾斤，而運輸員的負重是戰士的三至四倍，物品一點也不敢丟掉。這麼一比就知道運輸員體力

消耗之大了。通過封鎖線時，除前衛部隊在作戰之外，多數部隊不過就是走路，還常常受不了，而運輸部隊挑著重擔，比部隊一步也不少走，艱苦可想而知。我們進到湘南之後一直在行軍，天天下雨，運輸員的衣服是雨水和汗水浸透在一起，整天濕漉漉的，擔子濕了越來越重。由於道路泥濘，部隊走走停停，而運輸員幾十斤的擔子在肩上，欲走不能，欲歇也不能，壓著重物受「站刑」。

其次，運輸部隊吃不飽飯。他們沒離開蘇區時因為管理不當就常常吃不飽。進到白區後紅軍的行軍是密集縱隊，大量部隊在一個比較狹窄的空間裏通過，前面的把能搞到能吃的東西都吃了，後面的什麼也吃不上。打土豪沒有可打的，有錢也買不到糧食，後面的運輸部隊幾乎天天餓著肚子走路。在湘南的一個山區裏，一個三百多人的運輸大隊走錯了路，兩天沒有進一粒米，一個個餓得昏過去躺倒了。我們找到他們後，立即做飯，吃下飯他們才走得動。

第三，是沒有時間睡覺。運輸部隊因負重走得慢，常常很晚才到宿營地，如果路上遇到什麼故障，到了宿營地已是拂曉，第二天的出發時間到了，立即又要走。運輸員還可以找些「零星」時間打個盹，而幹部則忙得連一點睡覺的時間也沒有，運輸部隊的幹部搞垮了身體的人很多。

第四，是運輸員沒有鞋子穿。運輸員打赤足是普遍現象，公家沒有鞋可發，運輸部隊幾乎人人雙腳潰爛，有的爛到了腿上。

運輸總隊在黎平縮編後多數人要回部隊去，我們舉行了歡送會。周恩來高興地接受我的邀請來講了話。他說，我們運輸部隊所受的艱苦是一般人難以想像的，可是大家都忍過來並且戰勝了困難。你們是紅軍中最能艱苦奮鬥的一部分，你們是鋼鐵煉成的人，希望大家到部隊去繼續作紅軍的骨幹力量。我們的紅軍是光榮的，運輸部隊在吃苦耐勞、艱苦奮鬥方面勝過大家。因此我特別提出，你們是光榮之中最光榮的人，運輸部隊是最光榮的部隊。大家聽到這裏，許多人都哭了。

為紅五軍團送餉

一九三四年冬紅軍進入貴州，周恩來要物色一個人帶隊給紅五軍團送餉，葉季壯建議我擔任，周恩來批准了。

紅軍離開中央蘇區，紅五軍團擔任殿後，他們的物質供給很困難。因爲前面的部隊把糧吃完了，土豪地主打光了，走在後面的五軍團經常斷糧，不得不用現洋和硬通貨高價買糧。中革軍委籌集了大洋一萬五千餘元，大煙土六百多斤，還有部分蘇維埃鈔票，要盡快送到在中央縱隊後面二百多里跟進的五軍團去。經電文往返商量，定下了交接的時間地點。

我去總司令部接受任務，沒想到周恩來在那裏要向我當面交待。他在地圖上指出了五軍團現在的位置和交接款子的地點，然後說，送款不像帶運輸部隊那樣艱苦，但需要智慧，要隨機應變和獨立處理問題。這裏離交接地點有二百五十多里，如果不發生意外，五天就可以到達。要是情況變了，你就要自己決定如何行動。你帶一個運輸連、一個警衛連去，相信你可以完成任務。

任務交待清楚後周恩來又囑咐說，中央已經決定在貴州建立新的根據地。五軍團的前進方向是遵義以北的桐梓縣，和中央縱隊保持二百華里左右的距離，中間估計不會有大股的敵人。到了交接地點，如果沒人來接，就是情況有了變化，你們不能久等，向遵義方向追我們。如果聯絡不上，就「佔山爲王」，就地生存，等待革命的最後勝利。周恩來說完就在一張印製好的紅軍委任狀上寫了：「茲任命邱會作爲中國工農紅軍黔東北遊擊隊司令員」，簽上名字後交給我帶上備用。

我帶的運輸連大約一百五十人，六十多副擔子，警衛連約一百二十人，戰鬥力很強。我和同行的兵站部一位姓丁的科員、運輸隊長羅子明、警衛連長陳生四人組建了一個臨時「小司令部」，第二天就動身了。當時紅軍進入貴州打了許多勝仗，黔軍退後了，地主武裝都上山躲避了，我們每天行程約六十里，三天沒遇到敵人。我們去掉了軍服的紅軍標記，國民黨區、鄉政府分不清楚我們是什麼部隊，以爲是中央軍，有時還向我們供應糧食。

第四天早上我們路過一個鎮子，到了附近才發現敵情，向後退來不及了，祇好準備戰鬥。這時有個敵軍官走出鎮子來查問我們是哪部分的，從問話可以聽出來，敵人錯認爲我們是「黔軍」，我們吱吱唔唔地應付，敵軍官一聽不對頭，扭頭就跑。我從他的恐慌中判斷敵人力量不

大，下令衝過去。我們通過鎮子時，鎮公所裏空空無人，敵人已從後門溜到山上了。

第五天中午，我們離指定地點新安鎮祇有十餘里時，從那個方向來了一小股敵人，敵人發現了我們，立即退回新安鎮。我們找到老鄉打聽，得知紅軍向北走了，來敵是新安鎮區公所的武裝，並瞭解到紅五軍團的部隊確實沒有到達新安鎮。這時離約定的時間祇過了半天，還不能斷定五軍團就不來了，我決定等一天。我們等了一天還是沒有動靜，我判斷一定是發生了嚴重的敵情，否則絕不會不來接頭，因為這些錢款關係到紅五軍團的生存。於是我決定：連夜換到新的地方宿營以防不測；中央縱隊已向西北前進了，我們朝那個方向追。我當時年輕無經驗，又無法請示上級，祇是想無論如何要保住紅軍的財產。

出發之前我找村裏的小學校長談了談，他不清楚我們是什麼部隊。我和他東拉西扯，問到遵義有多遠？他說大約三百五十里，還拿出一張貴州省的地圖指給我看，圖上對道路、縣、區、鄉政府所在地都有標記。我要用錢買地圖，校長怕兵，表示奉送。天還沒亮我們就出發了。

此時已經過了約定時間三天，我判斷接收部隊不會再來了，決定向遵義方向前進。第五天發生了情況，原因是紅軍主力過去幾天了，被嚇壞了的地主武裝甦醒過來，向我們這支小隊伍挑釁了，我們通過一個小鎮的鎮公所，那裏有敵人武裝幾十人。我們從旁邊繞過了，離開鎮子二十里天就黑了，決定住下來天亮再走。我們考慮到鎮裏敵人看到了我們的擔子，做好了防範。果然，深夜裏敵人來發「洋財」了。我們打死了五、六個，活捉了一個小隊長。那個傢伙怕死，答應帶我們出縣境，這一招很有效，兩天之內很平安。但越往北走，情況越緊張，為了應付戰鬥，我們把十幾擔蘇維埃票子燒了，不但輕裝了，還增加了戰鬥員人數。一旦有敵情，運輸連可以自衛，警衛連可集中力量打仗。

第六天我們要通過一個叫水溪鎮的區公所，偵察到那有區中隊五十餘人，有一定的戰鬥力。我們吃掉敵人不難，但是為保住錢款，不能打仗。我們在離鎮子二十多里的小村子裏停下繼續摸了敵情，發現有兩個情況很有用：一是敵人抽大煙，每天早晚兩次集體定時抽煙；二是敵人有一個班出官差到縣裏去了。我們決定以智取勝，警衛連一個班化裝成敵人從縣裏回來的那個班，還僱請了當地老鄉應付敵人的問話。天亮前

到了鎮前，敵人哨兵果然中計開了門。我們直衝敵人營房，他們剛起床正徒手集中吸煙，當發覺了我們不是「自己」人，大勢已去，祇好投降。我們繳獲的槍不想拿走，那會增加我們的負重，祇把槍栓卸下來帶走，叫他們派人跟著到二十里以外再拿回來，敵人服貼了。我們把區長找來了，半拉半推地搞出門帶路。走了一天，估計再不會發生什麼問題了，才給路費讓區長回去。

再向前走，前面有一條河，不能徒涉，渡口有河防部隊駐守。我們祇有兩條路：一是設法渡河，二是繞道百餘里西行，但西邊能否順利過渡不得而知。這令我舉棋不定，就先在一個大自然村裏暫作休息。

我們住的房子是一家有三套院子的地主家前院。後院有個中年人很有禮貌，我們丁科員是紅五軍團的，熟悉國民黨軍隊，他很快問明了那個人是貴州軍閥王家烈部隊一個師經理處的軍需官，最近因公外出後在自己家裏住幾天。丁科員同他談得很投機，讓他錯把我們當成來貴州的外省雜牌軍，來採買大煙土的。軍需官無意中說了不少有用的情報：從湖南來的朱毛紅軍已包圍了遵義，貴州軍隊西撤了。這和我們出發前周恩來交待的紅軍戰略方向一致。

軍需官急於回遵義方向歸隊，正好遇見我們這支二百多人的部隊，想讓我們陪他走一段路。這正中我們下懷。說好沿途「通關費」由我們出，再送他二斤大煙土為酬金。第二天一早我們上路了，憑借大煙土為禮，河防部隊很快放了行。

我們渡河走了一段路後，才告訴了軍需官我們是紅軍，他並不驚奇，說：「曾想過你們是紅軍，可能是和大部隊分開了。在這亂世，相安無事為好。其實我幫了你們，我才安全。」我表示絕對保證他的安全，歡迎同我們一起到遵義，然後去留聽便。軍需官安心了。

我們走到離遵義不到一百里時，紅五軍團兩個連到了。帶隊的是軍團供給部一個科長，是我在瑞金紅軍學校的同學。我們見面後很激動，他說，五軍團按照約定的時間去新安鎮接收軍餉，但遇到了敵人阻擊，耽誤了三天，與我們失之交臂，現在總算是遇到了。我們交接完款項和那個一路來的敵軍需官話別，建議留他在五軍團躲一個時期兵亂，將來由他自己決定去向。敵軍需官很高興，表示今後絕不與紅軍為敵。

我們完成任務後的第三天回到了中央縱隊。中革軍委對我們沒有能在指定地點向五軍團交接很清楚，但對我們以後的行蹤一點也不知道，從上到下都以爲我們可能已經「光榮」了（即犧牲了）。

我回來的當天就去見周副主席，他見到我的第一句話是，「我以爲再也見不到你了！」他簡要問了我情況，對我們的行動和應變處理感到很滿意，說：「你離開大部隊十多天，帶隊在敵人中間穿插來去，除了燒了一些蘇維埃票子之外，祇耗費了幾斤煙土，沒有損失一人一槍。」

執行送款任務是我終生難忘的一段經歷。那時我不到二十歲，以前又沒有獨立指揮部隊作戰的經驗。向周恩來匯報後的第二天，葉季壯通知我到中革軍委報到。因爲周恩來點著我名字說，邱會作這個人他要了。

在遵義

一九三五年一月七日，紅軍攻克了黔北重鎮遵義市，進城後成立了「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籌備委員會」，籌備以貴州爲中心的新「中央蘇區」政府。林伯渠爲籌備委員會主任，葉季壯等人爲副主任。周恩來代表中央領導籌委會，決定把我調到那兒管物資分配處的工作。

物資處是籌委會裏最繁忙的部門之一。我們把各級「接收委員會」（也叫「沒收委員會」）沒收的物資都接收下來，然後進行分配。中央和紅軍的黨政軍機關所需要的物資都要經過我們的分配。大家對物資處是既「喜」又「恨」。喜的是，可以到我這裏領到東西，喜歡到我這裏來；恨的是，由於物資匱乏常常得不到滿足，物資處成了「挨罵處」。

遵義是貴州省的第二大城市。我們沒有在城市裏工作和生活的經驗，作爲將來的「蘇維埃中央政府」，籌委會面臨了許多新問題。

第一是城裏秩序混亂。

紅軍攻克遵義後出現了不少問題：一是紀律散漫，上街亂逛的多。過去紅軍在農村，偶然進一次縣城都不易。進了遵義城，上街亂走滋事鬧事就多了。二是上飯館、打架鬥毆的多。那時大家沒有什麼錢，大的「嘴福」不能享受，幾個人湊上一點錢上個館子就很滿意。遵義城裏飯館數目和供應有限，吃飯要等，晚了就吃不上，後來的人擠不進去就吵鬧打架。三是強佔好房子的多，大家聽說要成立蘇維埃中央政府，都想住

的寬敞好一些，強佔房子成了風。遵義城不大，好房子多是工商界人士和社會的頭面人物，對搶佔他們的房子反抗強烈。

對於以上這些問題，大家很著急，但解決不了，祇好請周副主席出面。周副主席晚上處理全軍的軍事，白天主要處理籌委會的事，他不知疲倦地工作，兩三天就把紅軍進城後出現的混亂局面理出一個頭緒，解決了問題。比如分配房子一事，周恩來叫組織了設營組，統一看房，統一分配，很快解決了糾紛。房東和用戶基本都滿意。

爲什麼周恩來能把事處理得很好呢？他對籌委會——未來的政府講了這樣一段話：我們是爲大家辦事的，應當認真、商量和公平。認真，就是勇於負責，凡事不要推來推去；商量，就是不要主觀武斷，要善於同別人商量，取得對方的諒解和幫助；公平，就是堅持原則，該怎麼辦就怎麼辦，不要怕得罪人。這段話我至今還記得。

周副主席講話時以我爲例做了表揚，他說：今天發生了一件事，是邱會作處理的。有支部隊從遵義路過，提出要在城裏休息一天，我同意了，批了條子要邱會作解決糧食問題。可是過路的部隊要三天的，邱會作照給了。但在遵義祇發一天的，其餘要他們行軍順路到城外六十里的糧站裏去領。部隊不願意，講道理也不聽，發火了，還在物資處打人。邱會作寧願自己挨打也不改變原來的計劃。他一點怨言都沒有，仍在認真地工作，令我十分高興。那個部隊的領導知道打了人的事後，立即到我那裏去認錯。

第二，是城市政策問題。

紅軍生活在農村，物資來源主要是打土豪、沒收地主的財產。打土豪一般不會搞錯，一則我們有經驗，在農村裏搞了多年，二則土豪地主的標誌明顯，在農村裏房子好的就是。在城市裏，我們打土豪政策沒變，但做起來就複雜多了。

進了遵義城，周恩來規定對三種人的財產可以沒收。一是奸商，二是軍閥官僚，三是地主。對上述三種財產，要寫詳細的報告（有專門報告表），經過周恩來批准後才能沒收。

我舉一個例子就可見當時政策的嚴格。遵義城裏有一家商行，好像叫「洪泰商店」，由兄弟三人出本錢共同經營。老大是地主，剝削雇工，投資經商。老二和地主家庭沒有經濟關係，另外生活。老三學校畢業後

在地方政府教育部門供職。對這個商家，祇沒收其財產的三分之一（即老大的那一份），其餘三分之二的財產一律不動，並告知其繼續營業。

對我們的政策，商家紛紛表示贊成，大多數的商店開門營業了，經銷的貨物也多。遵義的商會還發起了一個「勞軍運動」，捐銀元三萬多，各種鞋子數千雙。我們手上有了捐銀，商舖隨時可以把收到的「蘇維埃幣」兌換成銀元，這起到了穩定軍心，穩定社會的作用。紅軍戰士們的錢很少，多數是蘇維埃幣，如果一下子都成了廢紙，後果可想而知。

中央政府籌備委員會在遵義存在的時間很短。那是我第一次參與如此責任重大的經濟工作，成了我以後參加許多經濟工作第一次重要實踐。

「娃娃科長」

紅軍長征在遵義第一次進行較長時間的休息。但不久敵情發生變化，我們主動有序地退出了遵義，不和敵人硬拚，而是與之周旋，擺脫追擊。我當時祇是感覺紅軍的作戰方法變了。果然，不久就傳達了遵義會議精神，毛澤東恢復了對紅軍的指揮。按他的戰略思想，紅軍退出了遵義。

這時，中革軍委下命令調我任軍委四局三科科長。軍委四局是中革軍委（紅軍總司令部）的一個行政部門，主管軍務、行政和軍委直屬隊的行政、供給、衛生等工作。我到三科任職後，因二科科長楊更生被敵機炸成重傷無法工作，周恩來決定把二科合併到三科。新的三科是軍委四局業務最重的一個科，雖然編在四局，因工作涉及軍委直屬隊的行政，實際上是由主持軍委機關工作的周恩來和參謀長劉伯承直接管。周恩來說：「就讓這個娃娃來幹！」劉參謀長知道我把總供給部的行軍管得很好，又把潰散的運輸部隊重新組織起來，他全力支持周恩來的主張。

我們三科有幾個科員：涂余恩，廣東人；賴梓昆，湖南人；危才安、劉任農、賴勤，江西人。他們年齡都比我大，但對我很尊重，我們親如兄弟一樣度過了千辛萬苦的長征。

離開遵義以後的中央縱隊人數大大減少了，本部祇有三百多人，帶一個警衛營（含警衛、擔架、運輸連）、三部電臺，還有一個連的老同志（幹部連），這裏人雖少，但大單位多、大官多、牲口多、挑剔的人多，可以指手劃腳指責我的人也多，管起來就難多了。

我上任第一天，周恩來、劉伯承曾找我談了一次話，說今後中央縱隊會長期運動作戰，三科先要把縱隊的行軍、宿營、吃飯三件事抓起來。過去各部門的行政工作各自爲政，很分散，現在由三科統一領導，提高了工作效率，減少了利益相爭和扯皮。

過去中央縱隊各部門各顧各，總直屬隊不少單位有官無兵，派不出籌糧人員，各部門饑飽不均相差很大。於是我決定由三科統一籌糧，這件事我一做就得了人心，得到自下而上的支持。

紅軍由遵義向西北進軍，在毛主席指揮下四渡赤水，擺脫了追兵。我們行進在黔滇川交界處的一段時間內敵情一度緩和，沿途物質條件也比較好。軍委直屬隊的行政管理加強了，工作和生活條件發生了不小的變化，平日挑剔的人不再說三道四。

這時周恩來又給我加重擔子了。一天，他把我和宋裕和（四局副局長）找去談話說：「我們下一步是北上，那裏敵情少一些，但自然條件很差，會遇到許多想不到的困難。現在二局局長楊立三不能工作了，宋裕和帶幾個人到二局去當副局長。四局留下的事情主要在三科，三科的工作做好了，四局的工作也就好了。我們馬上要過大渡河，希望你們克服困難把工作做得更好。」

紅軍由遵義向滇川邊界西進的時候，中央縱隊進行了改組。中央機關再次精簡整編，精簡後的中央縱隊由林伯渠任司令員，多出的人下到部隊去了，連一些在中央沒多少工作的高級幹部也到部隊任職，由部隊負責照顧，減少了中央縱隊的負擔，如全國總工會委員長劉少奇到紅三軍團任政治部主任。

中央縱隊改組後，經過林伯渠同意，我們對行政管理也進行了相應的改變：分成了幾個隊，中央領導人分別安排在這幾個隊裏，毛主席在一隊，周恩來、博古、王稼祥、張聞天分別安排在二隊、三隊裏。這幾個隊由軍委一局一科指揮，四局三科管理他們的行政和生活。毛主席那裏總共祇有十幾個人，有他的特務員（即警衛員）、運輸員、馬伕，還有一個擔架班。這樣編隊後，我安排事情再也不用找領導本人，而是找他們所在隊的隊長就行了。我特地把我的老鄉、三科科員賴勤安排在一隊當隊長，我的本家邱長勝當毛主席的運輸員。這樣，毛主席那裏有什麼事我管起來方便。

當時林伯渠已經是個近五十歲的「老頭」了，他比毛主席還大幾歲，已經有不少白頭髮，是中央縱隊裏年紀很大的一位，其他這樣年紀的人都在幹部連休養。我不知道中央為什麼叫這麼一個「老黃忠」當司令員主持中央縱隊的繁雜工作。林伯渠行軍走一天常常很累，一到宿營地就要先休息一下，中央縱隊的具體行政工作，他就放心地交給我這個「娃娃科長」了。

中央縱隊整編後，改變了過去政出多門的情況。這樣一來，我們行軍有序，伙食集中，宿營統一安排，再也沒有混亂了。

整編後的三科還保留一個十二人的運輸班，擔運中央的文件和必不可少的辦公用品。我專門配邱長勝為毛主席挑擔子，毛主席的文件、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大印全在擔子裏。大家給邱長勝起了一個綽號叫「師印」。還有一個警衛排直屬三科，三十幾人，全部是短槍，行軍時押運中央這十二副擔子，一旦有了敵情，三個人保護一副擔子，人在擔子在。所有挑擔的和警衛排的人，都經過了國家保衛局的政治審查，是最可靠的。這些擔子裏的東西最後都安全地到了陝北。歷經長征那麼艱苦和危險之後，中共建黨初期許多重要原始檔案和文件還能保存得那麼多、那麼完好，得益於此。

中央縱隊警衛營的警衛連是保衛中央機關安全的，武器相當精良，這些人是有牲口的騎兵。每到一地宿營，他們是幹體力活的來源。當然，他們主要是警戒。我把要帶的銀元、黃金等放在騎兵們的馬搭子裏，還放了些食品，這些東西他們不許動，我們要用的時候就去取來。

運輸連有幾十人。除了騾馬，還有擔子。運輸連帶的主要的是糧食、食鹽、臘肉、少許藥品。

擔架連也有幾十人。博古、周恩來、張聞天、毛澤東、王稼祥等中央領導和李德都配有擔架。他們白天行軍可以騎馬，夜裏行軍可以睡在擔架上，也可以坐在擔架上邊行軍邊談工作。擔架員體力消耗很大，每過一段時間就由作戰部隊挑一些人來輪換。遵義會議後不久，除了毛主席、張聞天、王稼祥（傷未好）等人的擔架以外，其餘的都「自然」取消了。

幹部連由一些老同志和女同志組成。老同志有董必武、徐特立、謝覺哉等，都是五、六十歲的人了，被當為黨的寶貴財富「隨身」帶著。女

同志主要是中央領導的夫人。離開江西時，一定政治地位的人才許可帶夫人，有這樣「資格」的約三十個。她們中有賀子珍、蔡暢、康克清、鄧穎超、王定國、廖似光（凱豐夫人）等，當時鄧穎超患病吐血，是坐擔架行軍的，這支由老人和婦女組成的隊伍是我們照料的重點。從邊義出發後，我們在雲貴高原急行軍，強渡大渡河，爬雪山，過草地，走過了長征中最艱難的一段，幹部連沒有掉隊的。

中央縱隊改組之後精幹了，行軍時，前衛走出一段路後我們才出發，後衛在後面收容。走在中間的中央縱隊本部隊伍大大地縮短了，後面可以看到前頭，前頭也可看到後頭，首尾相顧，比過去好管理多了。

在長征中，軍委機關曾受到兩次敵人襲擊。一次在貴州北部的土城，一次是到了陝北，在離吳旗鎮不遠的鐵邊城。兩次都是意外遭遇到突然襲擊。

那是一九三五年二月初的一天下午的五時左右，劉湘的教導師無意中遇到了中央縱隊。當時我們正在住的小鎮子裏開飯，敵人來時恰好我們吹了開飯號。他們以為遇上了紅軍主力部隊，遲疑片刻才攻擊，無意中給了我們一點時間。

我剛剛端起碗吃飯，哨兵報告，發現不少的敵人，我就向敵情方向跑去，一看是大股敵人，情況不妙，即下令三科警衛排的三十多人把能夠拿得動的東西都堆在街上當路障，阻止敵人。同時立刻報告毛主席等領導向西南撤出，要他們步行不要坐擔架，以免被敵人打中，還令警衛營還沒出發的一部分搶佔東北街頭山坡上的制高點，組織火力阻擊敵人。

軍委機關行裝笨重，大家一聽北邊有敵情就向西南跑，一下擁擠在街上動不了。這時敵人已經進了北面的街。警衛營多是短槍，沒有工事，擋不住敵人，祇好準備肉搏。這時聞訊趕來的劉伯承參謀長站出來，他非常鎮定，大聲一吼，叫大家不要亂動聽指揮，他下了兩條命令：一是機關有槍的人向北面的街口去佔據每一棟房子進行巷戰；二是用雜物阻塞北面的街道，不讓敵人迅速前進。敵人在拆除北街口的障礙時不斷遭遇到我們的射擊，行動慢了。在這危機時刻，附近的紅軍幹部團團長陳廣率一個營趕到了。幹部團都是戰鬥骨幹，打起來很猛，敵人突然遇到了增援的強戰鬥力，退走了。這次戰鬥我們三科犧牲了董桂之、張壽

山，三科警衛排陣亡了五人，排長杜庚的左手負傷了。當夜我留下負責把犧牲的人埋好，天亮時追上了機關。

到了扎西，就傳達了遵義會議精神，上面的事不太知道，也不懂。但知道毛主席是最高軍事指揮人之一，大家很高興！出了遵義後雖然轉來轉去但總是打勝仗或躲過敵人的追堵，整個紅軍精神狀態很好，對革命前途充滿信心。

相識毛澤東

在長征中，我和影響我一生命運的毛澤東主席認識、熟悉了。改組後的中革軍委組成了一個行政和伙食單位，由四局三科直接管理，我成了毛主席身邊的一個工作人員，和他朝夕相處。

我知道毛澤東的名字很早。一九二七年他領導秋收暴動到江西井岡山後不久，我的家鄉就有很多「朱毛紅軍」神話般的傳說。我參加紅軍後見過兩次毛主席，第一次是一九三〇年第一次反「圍剿」戰役發起戰鬥的那天；第二次是一九三四年初第二次中華蘇維埃代表大會上，我當選為中央工農檢察委員會的委員，毛澤東作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在會上做了講演。

遵義會議後我調軍委機關工作，同毛主席朝夕相處，行軍中我們三科常常跟在毛主席的身後走，途中休息就同毛主席在一起。我和毛主席第一次面對面的談話至今記憶猶新。

那天中央縱隊從貴州遵義向懷仁前進，行軍中大家身上出了汗，休息時大家紛紛脫下衣服捉虱子。我們三科的幾個人苦中求樂，捉虱子比大小。我獲勝了，他們不服地說：「虱子也有官兵之分，你科長身上的虱子自然比我們的大。」我反駁說：「照你們說的，毛主席身上的虱子就有黃豆那麼大了。」此時忽然聽我們上頭的路邊一聲吼：「哪個說的？到我身上提出一個那麼大的虱子來看看。」我們不知道毛主席在我們的上面也在捉虱子，大家哄笑起來，然後我跑上去到了毛主席那裏。

毛主席問我是不是興國高興圩墩丘鄉的？我說「是」。他又問，大路邊岩石下的那家茶攤裏的老頭是我什麼人？我說老頭是我爺爺。這時毛主席說：「啊，老人家就是你的爺爺！我在他的茶攤上喝過茶。那是三一年

春天，我在你們興國走了幾個地方。我知道你的爺爺、父親、母親都是村幹部，你和哥哥都當紅軍去了。」

毛主席接著說起了興國縣的革命歷史：那裏大革命時期就有黨組織。一九二八年我們從井岡山下山，在連花、永新活動過一個時期，以後就進到了興國境內，立即會見了當時縣委的負責人邱會培，他是黨的早期黨員，那時他已經有了二千多人馬，迎接我們在興國站住了腳。興國人民對革命有過很大的貢獻，當紅軍的最多，土地革命是在興國開的頭，做了好事，但也犯了錯誤。對地主不分田，殺了不算還殺親屬，對根據地造成了破壞。

從那以後我和毛主席就熟悉了，他親切呼喚我「小興國佬」。我的幾個科員和毛主席都很熟悉，賴梓昆是湖南湘潭人，他們早就親近了；賴勤是日本留學生，從井岡山時起就是毛主席的文書，經常參加毛主席和其他一些領導人的談古論今，甚至談公事，一般也不避他。涂余恩是廣東人，古文功底很好，主管對外的文書工作。毛主席行軍休息時，常和我們一起聊天，那時紅軍的上下關係密切，高級領導人和普通人關係平等，有時大家也敢在毛主席面前吹吹牛。

長征中的毛主席祇是中央領導中的一員。那時中央領導人在生活上和高級幹部相比祇有兩個特殊：一是帶老婆，二是可以行軍時坐擔架。從江西瑞金出發時帶老婆的有博古、周恩來、毛澤東、朱德、李富春、何凱豐、羅炳輝（紅九軍團軍團長）、周昆（紅八軍團軍團長）、楊尚昆（紅三軍團政委）等人。當時不擔任一定職務的人是不能帶老婆的，許多高級幹部離開瑞金時和老婆是生離死別，非常淒慘。從瑞金出發時祇有幾個人有「資格」配專門的擔架，有博古、張聞天、周恩來、王稼祥、毛澤東、李德。這些人並不是一定抬著才能走，而是一種「待遇」。出發時毛澤東並不得志，受著王明路線的壓制，但他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主席，「國家主席」沒坐擔架的待遇就說過不去了。

毛主席除了有一副擔架之外，還和中央其他領導人一樣有一頭牲口、兩個警衛員和一個運輸員。他的老婆賀子珍除了偶爾能騎毛主席的牲口之外，沒有任何特殊待遇。毛主席的飯由三科炊事班做，主食一般和大家一樣，做什麼毛主席吃什麼。菜是打一份公菜之外，再加辣子。行軍時中午是帶飯吃，給毛主席配有一隻三層的菜盒子裝飯菜，由警衛

員提著行軍。毛主席有些愛吃，但不挑剔，不講究。在甘肅南部行軍中過一個小鎮子，毛主席看到路邊有羊下水賣，想吃。我叫警衛員跑過去用兩個銅板買來一大碗，放了很多辣子，毛主席吃得滿頭大汗，很滿意。警衛員說，看到鍋裏還有羊糞疙瘩呢，毛主席說「眼不見為淨嘛！」一笑了之。

毛主席不計較穿，衣著簡單。他不喝酒，愛喝茶，抽煙很厲害。毛主席和紅軍裏官兵一樣，自己沒有分文，零用錢由公家開支。在長征中，我們對毛主席的生活管得很精心，這裏有我對他內心的敬重和責任感，雖然我對中央所有領導人都一樣精心管理照顧生活，但我對毛主席更親。

毛主席不善講成篇的笑話，但歷史小故事講得很好。行軍中大休息，機關工作人員都願圍坐他身邊聽他講故事。但是到了宿營地，毛主席必須抓緊工作，有點時間也要讀書，誰也不敢打擾他。長征途中很難找到合適的書，後來毛主席對我說：「凡是可以搞到的書，什麼我都愛看！」於是每到一地，為他找書刊報紙成了三科的一項重要工作。

有一次毛主席問到我的學習，知道我讀過兩年私塾，他認為這樣很不夠，此後和我談學文化的事就多了，他的一些教導至今猶在我耳旁。

毛主席對我說，一個青年人如果不關心自己的文化學習就等於不關心自己的進步和前途。文化這個東西是時時處處可以學，比如觀察氣象、走路、講故事，都有文化問題。一種人學文化先上學校，打下基礎；一種人沒有上過學校，靠自己一點一滴地學。前者是學生知識分子，後者就是工農分子了。學文化沒有妙訣，要有的話那就是長期下苦功。毛主席不但鼓勵我學習，還教我方法。他說要常讀、勤寫，要學會查字典，有個字典在身邊，就是請了個不花錢的先生。

在毛主席的鼓勵下，我很想學起來，但軍情緊迫，沒有時間。後來中央縱隊過草地之後，曾在巴西停留了一段時候，我們恢復了正規的作息生活。除中央領導人之外，機關所有人員都參加操課，還恢復了文化課和晚飯後做遊戲，這時學習的機會就來了。拿什麼做課本呢？我在遼義時帶出來了一套《水滸傳》，它成了很好的「課本」。認《水滸傳》真的字，順便也讀了故事。毛主席、林伯渠知道了我們在學文化，主動當了幾次教員。林伯渠講的是《水滸傳》裏的事發生時中國的歷史背景，講得

非常認真。而毛主席就發揮了，他結合《水滸傳》的情節，講革命的高潮和低潮，講不怕失敗，積蓄力量迎接勝利。毛主席深入淺出，融通今古，講得非常動聽，大家越聽越想聽，往往不放他走。毛主席不忙就再講，若是忙就說「且聽下回分解」。

毛主席教我學文化，對我一生影響很大，他的很多話一直記在我心裏。在毛主席指導下，我開始逐漸養成了愛學習的習慣。我擔任了領導工作後，經常親自動手寫文稿或報告。在以後的幾十年裏，我學習上從沒有偷過懶，文化提高了一大步。我敢自誇地說，我一生一直在堅持學習，無論工作和學習都很勤奮，從不虛度光陰！

第五章 艱苦的歲月

過大渡河

從貴州、雲南到四川西北部，是紅軍長征中最危險、最艱苦的一段。我們一直在敵人的追擊中。紅軍強渡金沙江後向北走，紅一軍團強奪了大渡河安順場渡口，在蔣介石軍隊的包圍中打開了口子，一部分部隊得以東渡。但是那裏河水急渡船少，中央縱隊和大部隊不得不繼續沿大渡河西岸北進，想奪取蘆定橋過河，敵人發現了紅軍的意圖，調大量部隊增援蘆定。我們必須搶在敵人前面到達那裏。

由安順場到蘆定大約三百四十里行程，大渡河由北向南在橫斷山脈的深谷中奔流，兩岸地形十分險惡。河邊的山路一側是高山懸崖，一側是急流深谷，崎嶇的山路沿著河岸時有時無，有不少地方牲口都難以通過。紅軍先頭部隊的任務是急速前進，攻奪蘆定鎮的鐵索橋，對其他無法顧及。中央縱隊必須自己籌糧，修整道路，讓牲口、挑子、電臺等能跟上前進。於是，由軍委醫術營兩個連和部分運輸部隊，以及少數幹部組成中央縱隊的先遣隊，沿路保護橋樑，搶修道路和籌集糧食。周恩來指定我帶隊，出發之前，他嚴肅地向我說：「你們如果完不成任務，我們就不能及時趕到蘆定，就有全軍覆滅的危險。」

我帶先遣隊出發，一天一夜是急行軍。這段道路情況尚好，從第三天開始就差了。我們開始了緊張的工作：籌糧、修路、在預定的宿營點搭棚子（當時正是雨季，機關和電臺很難露天工作）。

搞糧出乎預料地順利。大渡河東岸比較富，豪紳們預料紅軍會走東岸，都把糧食裝在船上運到西岸藏起來。當他們發現紅軍走了西岸，又急忙把糧食向東岸運。我們趕過去繳獲了沒來得及運走的三船大米和許多用品。

修路異常艱難，祇能一切從簡，祇要牲口、擔子、電臺能通過就行。

那幾天大雨滂沱，大家衣服整天都是濕透的，到宿營地也無法點天點燃篝火取暖，祇好淋著雨過夜。休息的人披著雨衣還可以迷糊一會兒，工作的人就苦不堪言了。我們搭的棚子很簡陋，是「外面下大雨，裏面下小雨」。但中央領導一到就能進到棚子裏看地圖，電臺能架起來呼叫，有炭火烤衣服，吃上我們用繳獲的大米做的熱飯，高興得不得了。

大部隊跟上來之後，我已經跑前跑後忙得三天沒有躺下睡過覺了。那天下午行軍，部隊在泥濘的小道上堵塞，我們停了一個有四十多度的坡路上。因為是人擠人地站著，每人祇有立錐之地，想坐，沒有容下屁股的地方。我站著站著就站不住了，就趴在我身前邱長勝的肩膀上睡著了。邱長勝一動不動地撐著，時間久了，他支持不住，警衛排長杜庚在前面再做他的支撐，前面的人再為杜庚做支撐，我前面的幾個人死咬著牙硬撐著，我站著睡了將近一個小時。戰友們用自己寶貴的體力為我換來了睡眠。

中央縱隊提前趕到瀘定橋，此時瀘定橋戰鬥已經結束。提前過河到東岸的一軍團一師（李聚奎為師長）三團（黃永勝為團長）首先向橋頭堡守敵發起進攻，拔掉了敵人的碉堡。更為關鍵的是，敵人已經在鐵索橋上埋好炸橋的炸藥包，三團勇士迅速拔掉導火索，保住了鐵索橋。西岸的一軍團二師四團也開火過橋，守敵全部殲滅。過瀘定橋那天我特別激動，它哪裏是橋呀，是懸在相距近幾十米遠兩岸上的十三根鐵鏈子，九根做橋面，四根作兩邊的扶手，上面搭了一些板子當橋面，人走在上面時橋就晃來晃去。瀘定橋是我一生中過得最不安全的橋，但又是一座最安全的橋，因為過了它，我們就轉危為安了。蔣介石想把紅軍當「石達開第二」全殲在這裏的「美夢」破滅了。

我們過了瀘定橋繼續向北走。那時我接到命令，派一個排護送陳雲離隊，後來才知道他是要到蘇聯共產國際去匯報工作。

翻越大雪山

紅軍過了瀘定，經過天全、蘆山，來到了寶興。從這裏向東是成都平原的邊緣，那裏有大量國民黨軍隊防守。弱小的紅軍祇有向西繞道川西、青海、甘肅交界的荒涼地區才能北上。我們要過的第一道險關是

興縣西北的夾金山，又叫大雪山。它海拔4000多米，山上終年積雪不化，氣候變化莫測。當地人叫它神山，說是「祇有神仙才能翻過」。但我們遭受國民黨軍隊的圍攻，別無他路可走。中央縱隊過大雪山的準備主要是籌糧、搞防寒的衣物和防病。

紅軍長征離開蘇區後，糧食全靠沿途籌措。但沿途的地主把糧食藏起來，老百姓也跑光了，況且所經之地又是中國最貧瘠的地區，本來就沒有多餘的糧食養活一支外來的紅軍。當時我們的行軍序列是紅一軍團在前面開路，紅三軍團殿後，中央縱隊居中。中央縱隊跟著一軍團之後走，好處是他們常常會替我們搞些糧食；壞處是前面部隊籌糧之後，我們沿途再也找不到糧食了。中央縱隊在寶興住了一星期，幾乎一點糧也沒有搞到，連續幾天吃「清湯」稀飯。過雪山前，我們決定到近百里遠的一個富裕地區去搞糧食，到那裏要翻過三座山，過一條水深過膝的河流。爲了把糧食搞到手，事前不能驚動那裏的敵人，於是決定突襲。

爲了迷惑敵人，白天我帶警衛營籌糧部隊大搖大擺地朝相反方向走，故意讓當地人看見。等到天一黑，我們掉頭急行軍走了一夜，拂曉時突然包圍了目標，擊斃守敵三十多人，繳獲牲口幾十頭和不少糧食。我叫少數人趕著牲口先走，趕緊回家救急，讓大家吃上飯（中央縱隊已斷糧了），我率部隊殿後，防止敵人反撲。當時搞到了糧食就等於是打了大勝仗！我們回來時，劉伯承參謀長走出駐地幾里來迎接，還集中司號員吹了歡迎號。

長征出發後紅軍就沒有發過衣物，一個個早已衣衫襤褸了。我們到全縣後就採買衣物，又在籌糧中繳獲了一些粗布、羊毛氈（大家稱作麻子布）、棉花。這樣每人至少可以做一件背心。這對抵禦大雪山上的嚴寒差得很遠，但已經很不容易了。

由於氣候不適應，那時病員很多。我們有幾個醫生，但藥品早用光了，祇有請教當地「土醫生」找些中藥治病。我和衛生所所長王斌組織人在山上打了兩天的中草藥。劉伯承參謀長親自向大家動員說：「我們休整不會太長，要抓緊治病防病。沒有西藥，土藥材也有用，大家一定要服用，否則就是在消滅革命有生力量。」劉伯承把吃藥防病提高到「政治問題」的高度，強制執行，給我們的工作以很大的支持。

過雪山前周恩來召開過兩次幹部會議，號召幹部發揮帶頭作用克服困難，順利翻過大雪山。周恩來用總直屬隊兩個科長的例子來說明工作中的問題。一個是警政隊的科長，據國家政治保衛局秘密報告，他企圖用掉隊的辦法離隊，保衛局要逮捕他法辦，周恩來不同意，祇是將其撤職並留黨察看。另外周恩來就是表揚我，說了很多鼓勵的話。最使我難為情的是，周恩來為了讓大家認識我，讓我上臺給大家看看。我不好意思，劉伯承就來湊熱鬧，他一把把我拉到臺上推到周恩來身邊說：「就是這個『小傢伙』。」看到我面紅耳赤的樣子，劉伯承哈哈大笑了起來。

根據先頭部隊的報告和當地群眾傳說，越往雪山上走，空氣越不夠用，如果你一口氣喘不過來，救得不及時就死了。針對這種說法，我們提出了過大雪山的辦法：上山要慢，逐漸適應空氣稀薄和缺氧；到了最高處不能停下來休息，要快下山，連滑帶走，下面空氣裏氧氣多就安全了。我們還進行了嚴密的組織，兩個體力好的和一個體力差的編為一個行軍小組，這一招很起作用，讓一些體力差的人增加了信心。另外，我從運輸隊調來了三十多個健壯的戰士組成了收容隊，這是最苦的工作，我自己任收容隊長。

那天周恩來最先上山，他冒著危險留在山頂上看過山的隊伍。由於措施得當，中央縱隊在很短的時間內通過了雪山，基本沒有掉隊的，祇收容搶救了十幾個人。周恩來看到我在最後帶著收容隊上到山頂，才和我一起下山。周恩來在最危險的山頂呆了很久，卻不許我多呆一會兒。

我們下到半山腰，胸裏頭好像塞了棉花似的感覺沒有了，周副主席邊走邊對我說：這次過雪山，你們的準備和組織得好，應當總結經驗，你每做一件事都要學會總結一次，這樣才能提高工作水平。人的工作能力有強弱，進步有快慢，為什麼？就看你善不善於總結經驗。你們文化低的工農幹部更應當學會總結經驗。

邱長勝對毛主席過雪山準備得充分周到。使人想不到的是，邱長勝給毛主席準備了約有一斤重的熱茶，到了山的那一邊毛主席就喝上了熱茶。過夾金山的那天早上，邱長勝把預備好的火籠裝好了，把水壺放進去。我們早上就開始上山，上山走了大約一半，毛主席就要求停一下，他下了擔架無論如何也不再上擔架了，這時毛主席的感覺和呼吸都還好。到下午三時左右就開始下山了，但下山下到了積雪線不遠的地

方。毛主席突然頭昏，自己就一屁股坐到地下了。此時，邱長勝立即從他竹籬裏取出小水壺，把茶水給毛主席喝了，毛主席就慢慢恢復正常狀態了，他並示意要抽煙。毛主席喝了熱茶，抽了煙，精神就來了。晚上到了宿營地，毛主席又想起來喝熱茶的事，警衛員笑著原原本本地把熱茶的來由告訴毛主席，毛主席心情凝重一時不說話來。待抽了一支煙之後，毛主席祇說了一句話：「你們都是蘇區偉大人民的兒子！」

紅軍一、四方面軍會合

中央率領紅一方面軍由江西出發，最初想到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在那裏發展。但受敵人阻擋進入了貴州，想在那裏建立根據地，由於敵情嚴重，退出遵義向北前進，要到四川同紅四方面軍匯合，這個目標又沒有實現。紅四方面軍主力在川北，沒有南下接應紅一方面軍北渡長江。而四川軍閥劉湘爲了保全自己的地盤，提前南渡長江迎擊我軍，同時蔣介石「中央軍」追擊的也逼近了。在這種態勢下，中央決定不與川軍硬拚，回師貴州北部。

紅一方面軍爲擺脫敵人，四渡赤水，二佔遵義，然後再向黔滇川交界處敵人薄弱地區前進，後來向北渡過金沙江、大渡河、翻過大雪山。在一個叫達維的地方，碰巧遇到了四方面軍李先念的三十軍，當時高興的心情是難以形容的！和四方面軍會師的希望在即，又走了大約一個星期，終於一九三五年六月間在四川西北部懋功的兩河口和紅四方面軍勝利會師了。

紅軍一、四兩個方面軍會合時，全軍上下無不歡欣鼓舞，高興得難以形容。我記得軍委直屬隊和紅四方面軍直屬隊會合時，人群中最多的表情就是傻笑，興奮得手舞足蹈。那天，我們比紅四方面軍直屬隊到得晚，但我們的住處已被他們安排好了。我們一到，他們就把做好了飯菜大盆大盆地送過來，大家一起會餐，到深夜大家也不肯散去。當時，紅一方面軍不足三萬人，紅四方面軍卻有八萬多人。

紅軍兩大主力匯合後，中央在兩河口召開了政治局會議，會上做出了《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戰略方針的決定》，確定紅軍的戰略方針是集中主力向北前進，首先取得甘肅南部，創建川陝甘根據地。但會議之後紅軍並沒有行動，原來張國燾等人與黨中央在發展方向上有矛盾，張

國燾不願意北上。這樣雙方的關係很微妙，四方面軍對一方面軍的熱情沒有持續多久就冷了下來，但誰也不明著說破。

首先，他們很少有人上我們的門了，我們去也不如以前那樣熱情，有時還發生摩擦。例如，我們警衛營上山搞到的糧食，還沒拿回來就被他們奪去了，我們忍讓才沒有發生衝突。他們也常說一些諷刺話，如「中央紅軍穿得破破爛爛，個個像要飯的。」「中央紅軍兵不多，老婆倒不少（指幹部連的女同志）。」……對這些話，一天我向劉伯承參謀長匯報工作時談到了一些，他笑著說：「你懂得什麼叫軍閥主義吧，我們共產黨裏難道就沒有嗎？」劉參謀長向來說話隨和，他這時態度很嚴肅，我基本懂得他的意思是什麼。

一九三五年八月初，紅軍分成了右路軍和左路軍。右路軍以中央紅軍為主，由紅一方面軍的一、三軍團和紅四方面軍的四軍、三十軍組成。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陳昌浩過來任右路軍總指揮和政委，葉劍英任參謀長。中央機關隨右路軍行動，毛澤東、博古、張聞天、周恩來等在右路軍。左路軍以紅四方面軍為主，由紅四方面軍的九軍、三十一軍、三十二軍和紅一方面軍的五軍團等組成，紅軍總司令部隨左路軍行動。朱德總司令、劉伯承參謀長過去，和新代替周恩來任紅軍總政委的張國燾共事。中央直屬隊跟著朱德到左路軍的人不算少，而我們能留在右路軍的則很高興。

紅軍要繼續北上，必須奪取川西北的松潘縣城。中革軍委已經制定了松潘戰役計劃。張國燾公開不反對，但內心不願意，行動遲緩，結果貽誤了戰機，紅軍未曾打開松潘。紅軍分為右、左兩路軍後，兩個方面軍的部隊混到一起了，接觸多了，分歧漸漸明顯。我和四方面軍幹部交往時常聽到不相信中央的言論，指責中央執行了一條機會主義的逃跑路線，說「過去聽『洋人』（李德）的，現在聽『秀才』（毛澤東）的。」「你們從江西逃到這，還要向哪裏逃？」「南下好，北上沒有出路。」「現在的中央是無能的，要改組」……一方面軍的幹部就反駁他們，連主要的人物也說了話，彭德懷敢做敢言，公開反駁那種言論。為了照顧大局，黨中央對張國燾耐心說服，甚至有些遷就，張國燾才勉強口頭上同意繼續北上，向毛兒蓋前進。由於兩軍貌合神離，紅軍由兩河口到松潘耽誤了一個多月的時間，蔣介石完成了對紅軍追擊堵截的部署，發出「要把紅軍消

滅在川西」的狂言。面對敵人的強大壓力，紅軍內部分裂的氣氛一時被掩蓋了。

過草地

新的敵情迫使紅軍要通過草地無人區，向甘肅的夏河流域前進。那時我們面臨著兩個嚴重困難：草地惡劣的自然條件和敵人的追堵，前者甚於後者。草地不僅沒有人煙、糧食、道路，還有不少地段是沼澤（也叫水草地），人根本不能走。

紅軍到了毛兒蓋就開始作過草地的準備。這時周副主席患病了，持續發高燒（多年後周恩來說他得的是肝膿瘍），大家都很擔心，我們把擔架鋪的很軟，勤換擔架員，這樣就平穩多了，我忙完工作，也去為周恩來抬擔架，我嫌擔架員走的不穩。衛生所長王斌是為周恩來治病的醫生，沒有醫藥和器械，他唯一能採取的辦法是要我們搞些冰塊為周恩來高燒時降體溫。毛兒蓋沒有冰塊，要到幾十里路遠的打鼓山頂上才能搞到。我們連夜出發，不到十小時就從雪山上把冰塊搞回來了，敷在周恩來的身上退燒。那時的伙食很差，籌來的糧是藏民的主糧青稞，一般人吃了都不消化，別說是病人了。我派人搞來了一點小米、黍子，這就是珍貴的東西了，我們給周恩來熬粥喝。

過草地的準備工作主要是搞糧。毛兒蓋周圍都住了部隊，百十里內搞不到糧，籌糧的辦法祇有三個：一是搶割老百姓地裏即將成熟成的麥子、青稞；二是挖野菜草根；三是向下面的部隊要一點。

割麥子（青稞）要經過政治機關批准。麥子沒熟時就在田頭插上牌子，標明由什麼部隊收割的，說明紅軍收麥子是不得已的，現在欠下了賬，今後一定要還清等等。部隊割了麥子，中央機關每人都能分到大約二十斤，然後用各種方法（多數是用石頭砸）把麥子加工成像麥片一樣的渣子狀的「麵粉」，這就是過草地的「命根子」。

另外，各部隊也向中央機關送來了一些食物，紅一軍團送得最多。毛主席在長征中一直受到紅一軍團團長林彪的特別保護和照顧。過草地前，林彪送了一個八個人的擔架班和一頭壯實的騾子去為毛主席服務。林彪自己的運輸員也來了，是我到紅一軍團二師把這支擔架隊帶回來的，二師師長陳光和政委劉亞樓再三囑咐我要把毛主席照看好。臨行

前他們又把三十幾個麵餅、二十幾斤由牛肉或馬肉曬成的肉乾交給我帶給毛主席。

挖野菜草根也是搞「糧食」的重要手段。過草地前大家以吃野菜為主，在野菜裏加上少量麥粉做成稀糊糊吃。吃野菜發生了不少問題，全身浮腫、拉不出屎是普遍現象，也有中毒的人，反正不吃野菜也要餓死，祇好以命一試了。那時的毛兒蓋一帶幾乎被「掘地三尺」了，八月間的草原本應草木繁茂，但很多地方連一根草都看不見了。

當時部隊的情緒很悲壯，過草地之前，運輸隊舉行過一次「會餐」，也就是多了幾種野菜罷了。大家互相托付，過草地誰死了，活著的要給他家裏寫封信……顯得十分淒涼。為保證中央領導安全過草地，我叫運輸隊藏了些糧食不敢輕易拿出來，領導人的擔架隊員、抬電臺和發電機的運輸員糧食不夠時就從這裏取。

中央縱隊由毛兒蓋出發過草地走了七天，這是紅軍長征中最艱苦的一段路，非戰鬥減員犧牲的人最多。

第一、糧食不夠吃。出發之前每人的糧食看起來不算少，實際上不夠。部隊過草地是日日夜夜地走，能坐下休息的機會並不多，體力消耗幾乎超過了人的生命極限。部隊長期飢餓，糧食分散帶在每人身上，餓了就掏出來吃，多數人一天要吃兩三斤糧食還喊餓。爲了不餓死人，部隊邊走邊採集能吃的植物，到了宿營地還要組織採集。把野菜煮熟了吃最好，如果找不到柴火，就生著和糧食一起吃，爲了活命，生野菜再苦再澀也不怕了。

第二、通過軟土地帶。它又被叫做「軟草地」，是表面乾、下面濕的沼澤。軟草地上面長的草和乾草地長得一樣，初踏上感到很軟，但是越踩越軟，踩多了就成了漿糊狀了。前面少數人可以過去，後面的人就會陷下去，你要掙扎，會越陷越深，別人也很難相救，因爲你去救別人，自己也會陷下去。軟草地上死去的人都是立著死的，有的三、五人在一起，七、八人在一起死的也不少。死去的人少數被淹沒了，多數沒有淹沒，屍體僵著，姿態各異，有的舉手在掙扎，有的和別人拉著手……這種慘狀是用生命塑造出來的。長征中期紅軍減員最多就是在軟草地上。

中央縱隊牲口多，擔子多，還有領導人的幾副擔架，過軟草地更困難。林彪率紅一軍團過草地後，專門派一個偵察連等候我們，爲我們

引導路線。紅一軍團在一較寬地段之內給中央縱隊留下一條沒被人踩爛的「處女路」，寧可自己減員多，也要中央安全。在繞不過去的地段，偵察連就用鋪樹枝的辦法墊好。中央縱隊通過最危險的一段軟草地時，林彪、聶榮臻等候在那兒，看到毛主席等人通過之後才離開。

第三，遭受敵人騎兵襲擊。中央縱隊過草地的第四天，我們宿營地附近有片樹林，警衛營去那打柴，接近樹林子時，突然一股五十人多人的騎兵從裏面出來衝向我們宿營地，警衛營回不來，在措手不及的情況下我立即叫首長們的警衛員和勤雜人員百餘人集中起來，用人群保護中央領導人，外層的警衛人員準備用短槍反擊，內層的人用身體作「掩體」。敵騎兵離我有百餘米的地方，正巧遇到了一條水溝，馬不好通過，就折回向西南走了。事後分析，敵人並不知道遇到了紅軍首腦機關，誤以為打柴的警衛營是去打他們的，為逃命先衝擊一下，然後逃離。險情過後我向林伯渠司令員報告，告訴他紅一軍團一個騎兵通信連已經趕到了，如果再有情況也可以對付。林伯渠連說：「險，真險！如果敵人真的衝過來，即使是小股，後果也不堪設想。」

第四，暴雨襲擊。進草地頭一、二天氣候好，祇是晚上宿營得在潮濕地上。後來幾天遇到三次大雨，因為一點防雨的辦法也沒有，遇到下雨祇能聽天由命，所以什麼「困難」也沒有了。第六天從下午開始下了通宵的傾盆大雨，整夜淋著雨睡覺，第二天開始行軍時大家連腳都提不起來了。

中央縱隊過草地掉隊的祇有三、四個，犧牲了一個人。犧牲的是運輸隊的林少西，福建汀州人。他挑著中央機要物品的擔子從瑞金走到這裏，身體早已虛弱得不行了，過草地的第一天下午就發了病，來勢很兇，不能行走，我讓他騎在我的馬上，自己步行。我把牲口讓給一個運輸員，在運輸隊裏引起很大的反響。毛主席的擔架員向毛主席說了，他連連稱道。不幸的是，第六天林少西犧牲了，我們祇能把他就地埋葬。沒辦法設墓碑，就把他挑東西的扁擔插在墓前，寫上了他的名字以作紀念。

第七天我們走出草地，到了班佑。現在許多地圖上可以看到「班佑」的地名，但那時是「有名無實」。那裏沒有房子，沒有居民，祇是在地勢稍高點的地方有幾處石塊木頭堆起來的「窩」。中央縱隊從班佑再向前走

一點，到了四川、甘肅交界處的一個叫做巴西的地方，那個村子很大，但人都嚇得逃走了。先頭部隊紅一軍團在那兒爲我們留下了足夠的糧食，中央縱隊在此休整。

過草地前中央縱隊的人數減少了，一部分人隨朱德、劉伯承到左路軍去了。中央縱隊司令員林伯渠兼任總供給部部長，縱隊的辦事機關人很少。我們三科成爲縱隊行政管理部門。由毛兒蓋出發到過草地，行軍中我一直跟著毛主席、周恩來、博古、張聞天、王稼祥等領導，生怕他們出了什麼事，一切都要安排周到。新中國成立後，在一九六一年三年困難的時候，毛主席在一次談話中提到我說：「長征時，中央縱隊過雪山草地時沒有餓死人，師會作是立了功的。」

回想起幾十年前的往事，真有點傷心，在最艱苦的歲月裏，自己把生命和全部力量都獻給了革命事業，長征一路也算是和毛主席有生死之交了。我做夢都沒有想到，毛主席連我們都不要了，把我們打倒，還往我們身上潑髒水。但我對毛主席沒有更多的怨言，後來，這件事又被鄧小平、彭真利用了。

紅軍的重大分裂

中央縱隊過草地後在巴西住下。到巴西的第二天，葉劍英參謀長叫我去交代了三點：1、在這要住一個時期休整，恢復體力；2、加緊籌糧。如有困難，可以找三軍團幫忙（一軍團離這裏遠）；3、要恢復軍隊生活制度。不能再像過草地那樣散漫了。

右路軍在巴西住了不短的時間，吃得飽，休息又好，人們就有些「閒情逸致」了，三科部裏成了領導人聊天的地方。常來的有博古、林伯渠、鄧發、李克農、黃克誠……三科吃的東西多，祇要這些人來了，邊吃邊聊。一坐就是大半天。那時機關裏上下級關係親密，說話隨便，張國燾不願北上是非常談論的話題，大家對張國燾意見很大，卻沒人在嘴上說破。我在工作中更能體會到兩個方面軍之間的一些矛盾。比如，中央縱隊和右路軍總指揮部相距二里多路，中間有一塊二十幾畝快要成熟的麥地。葉劍英偷偷叫我派部隊把麥子看好，不要叫四方面軍的人搶割了去。我派警衛營暗中日夜看守，成熟時一夜割完，收穫一千多斤，一點也不給別人。由此可見，雙方存在戒心。

一九三五年九月九日下午大概兩點多的時候，特務員急忙跑來叫我到林伯渠司令員那兒開緊急會議。我跑步趕到時，曾希聖（軍委二局局長）、李富春、葉季壯（先遣工作團正副團長）、軍委機關工作人員蕭向榮、孫開楚等人和我幾乎同時到達。我見林伯渠心事重重，呆坐著不說話。一會兒，葉劍英參謀長（紅軍前敵指揮部參謀長）來了，林伯渠對著葉說：「關於情況和行動，還是你說一下。」

葉劍英精神緊張地說：現在告訴各位一件事，張國燾帶左路軍到了阿壩，中央要他們迅速來和我們會合，一起北上。張國燾回電說沒有糧食，河水大漲不能徒渡。今天（九月九日）中午收到了張國燾電令徐向前、陳昌浩，要他們停止北上，準備南下。徐向前、陳昌浩很快就能知道張國燾的命令，四方面軍的四軍、三十軍也會收到，他們聽誰的很難說，中央剛才開了會，認為我們走爲上計，行動要快。葉劍英說了幾句短話匆忙離開。林伯渠接著說：祇要我們向林彪的一軍團靠攏了就主動了。我們具體行動方案是：1、中央決定立即北上，右路軍先走，四軍、三十軍如不願意走，我們就和紅一軍團、三軍團單獨北上；2、行動前要絕對保守秘密，不告訴紅四方軍的人，讓他們先跟著走，到了水磨房之後（那兒駐有紅三十軍部隊和紅軍大學），再向他們宣佈我們行動的目的地，走留聽從其便；3、對四方面軍不願走的人不准打罵；4、我們現在就做準備，對外面說是明天全部上山打糧，凌晨三時準時出發。林伯渠佈置完已經是下午五時了。

因爲我主管中央機關的行政和生活，我從林伯渠那裏出來立即召開了三科的小會，佈置了任務，分頭去收帳篷、綁行李、裝擔子、備馬、做飯、那副緊張的樣子我現在也歷歷在目。在準備中，曾希聖來找我商量了一下，說他要晚些時候才能拆收有線電話線，要我配合他。我說時間這麼緊，爲何如此拖拉。他說，是爲了晚上行前給葉參謀長打個電話，叫他過來。

葉劍英趕回去徐向前、陳昌浩住處，想到有一份由川北通向甘肅南部的地圖，在指揮部作戰參謀呂冀熙那裏，壓在他的被子下面。葉把呂派出去辦點事，把地圖「偷」到手。葉爲防不測已安排了脫身之計，大概在晚上十時左右，曾希聖按事先的約定，給葉打去了電話，稱「中央縱隊這邊的通訊設備發生故障了」，葉劍英藉機溜掉了。

中央縱隊九月十日凌晨二時半出發了，黎明時行軍到了紅軍大學附近，紅大還沒有吹起床號。我奉林伯渠的命令跟隨著毛主席先走，不聲不響地過了紅軍大學後，在一個小山坡上坐下等後面的隊伍。毛主席叫我回去把彭德懷的人找到這來。那天，彭德懷派了紅三軍團一個團的部隊，按中央命令於子夜出發，在紅軍大學附近隱蔽，如果紅軍大學和三十軍搗亂不讓我們走，這個團就全力保衛中央縱隊。但彭德懷不放心，又率三軍團主力於七時（太陽剛出來）趕到紅軍大學了。

天濛濛亮時，中央縱隊的行動被發現了。紅大教育長李特出校門來查看，他手持一支駁殼槍，氣勢洶洶地出來，在校部門口衛兵站崗處和彭德懷相遇，正好我也趕到了。李特對著彭德懷罵道：「你們這伙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不要臉的逃跑主義！從江西逃到這裏還不夠，還要逃到哪裏去？」彭德懷反過來對李特說：「你他媽放屁！老子執行中央的決定，北上抗日，你們要到荒無人煙的川西去，你是什麼主義？你們才是地地道道的右傾機會主義！」李特說：「北上抗日像你們這個樣子，這點戰鬥力，還能抗日？」彭德懷發火罵了：「你這個狗日的，屁都不懂，就懂得搞分裂，搞軍閥主義……」他們在爭吵中，李特已下命令要司號員吹集合號，準備戰鬥，很快紅四方面軍的學員們全都持槍上來了。那時四方面軍的部隊不聽別人的，祇聽張國燾一夥幾個人的，祇要李特發令，他們立即就動手。

彭德懷見狀立即拔出手槍指著李特說：「我的三軍團就在你們的前後，你們誰敢開槍，老子就先槍斃了你！」李特對彭德懷的暴躁脾氣很瞭解，沒有那樣兇了。就在此時，學校裏有人急忙跑出來向李特報告說，一方面軍的學員都走了，附近發現了大量紅三軍團的部隊。一聽此話，李特態度就軟了。

毛主席坐著休息的小山坡離爭吵的地方不遠，彭德懷和李特吵什麼他聽得清楚。這時毛主席站起來向前走了幾步說：「彭軍團長，不要同他們吵了。黨中央決定北上抗日的方針是正確的，要堅決執行。一個共產黨員對黨的決議可以有不同的意見，也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見，但是一定要先執行。」毛主席又對李特說：「李教育長，黨中央的決議你是知道的。我們北上抗日，先走一步了。我相信四方面軍隨後也會來的。我們會團

結起來的。」這時葉劍英趕來向毛主席說，中央縱隊全過去了。毛主席揮手叫彭德懷不要理睬李特，去帶好自己的部隊。

後來聽說，九月十日早上我們過水磨房之前，徐向前，陳昌浩就發現中央縱隊率一、三軍團有行動，單獨北上了。四方面軍高級幹部少數人曾主張用武力攔阻，徐向前說了句：「哪有紅軍打紅軍的道理？」在中央和張國燾鬥爭的關鍵時刻，徐向前說了句關鍵的話，應當作爲他重大的功績載入紅軍的史冊！

以我觀察，毛主席離開紅軍大學後是既沉痛又慶幸。沉痛的是，經過千辛萬苦，付出了重大代價，實現了紅軍一、四方面軍的會合，但還沒有發揮作用就分裂了。慶幸的是，這次沒有造成流血事件是不幸中的萬幸。毛主席原來從不公開說張國燾什麼的，現在他說了很長一段話。那是我第一次當面聽毛主席說張國燾，感到非常的新鮮，這麼多年過去了，依稀記得一些。

毛主席說：他在建黨之初就認識張國燾了，張貌似虛心，實際很霸道，但對他這次用槍桿子稱霸卻沒有料到。四方面軍「認人不認理」的色彩比較濃厚。毛主席還說，四方面軍南下沒有前途。劉湘會積極反對他們才能保自己的生存，蔣介石也一定借反共爲由進川，既削弱劉湘也不許紅軍呆在四川，四方面軍最後還會北上。

我們這一隊人向東北方向走了大約二十多里路，突然發現一支百餘人的部隊尾隨而來，喊話一問，知道是紅四方面軍軍事法院的。毛主席停下來休息，要我去請他們領頭的人過來。沒想到我一靠近，他們立即子彈上膛，準備戰鬥。我向法院院長（名字忘了，是個雙腿殘疾的人）說明來意之後，他勉強同意叫部隊解除戰鬥準備，自己坐在一乘轎子上，由四個掛著盒子槍戰士保護下過來了。

毛主席和藹地問他爲什麼來這裏？院長板著一副面孔說，紅四方面軍法院在兩軍匯合後劃歸中央縱隊指揮，他們是昨天得到中央縱隊的通知過來的，現在不知如何是好了，我們不願意離開四方面軍。

毛主席說，我們北上抗日，張總政委（張國燾）不願去，那你們就回他那兒去吧。院長對毛主席放他們回去很吃驚，想說什麼，但沒張口，遲疑了一會兒，問毛主席有什麼話要對張主席（張國燾）說？

毛主席說：四方面軍的人誰想回去就回去，你告訴大家，北上抗日是中央的決定，是完全正確的。你們現在南下，將來還是會北上的。我們先走一步，等待你們到來。

果然，一年後四方軍第二次同中央會合了。巧的是，我在陝北保安縣吳起鎮又看到了那位法院院長，仍坐在轎子上，我迎接了他們並且佈置宿營和煮糧食。

中央縱隊經過兩天的行程到了俄界。先行到這裏的紅一軍團領導林彪、聶榮臻走出了十幾里來迎接黨中央和毛主席的到來，還舉行了歡迎大會，會後是聯歡和會餐。

毛主席在大會上講了話，他說，我們黨的抗日主張可以得到全國人民的擁護，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全民抗戰才是出路。我們離開中央蘇區快一年了，深感沒有根據地的痛苦，我們很快可以到達陝北，我們同那裏的紅軍會合。我們還有革命的「本錢」，現在第一批北上的部隊有百戰百勝的紅一軍團和三軍團，我們有很好的政治家，有重要的軍事家彭德懷、林彪同志，我們一定能夠取得勝利。

毛主席講完話之後，中央領導和紅一軍團領導一起席地就餐。吃的很簡單：青稞面做的餅子和少量豬肉同野菜煮的湯菜，但非常可口。

毛主席的講話裏對政治家沒有點名，軍事家祇提了彭德懷、林彪，對彭、林前面冠以「重要的」三字，可見彭、林在這次關係毛澤東和紅軍生死存亡危機中所起的作用。

由於北上的中央機關和紅軍作戰部隊加在一起不足萬人了，就合編為「陝甘支隊」，司令員彭德懷、政委毛澤東、副司令員林彪、參謀長葉劍英、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紅一軍團部隊編為一縱隊，林彪兼司令，轄二個師，一師師長劉亞樓、二師師長陳光。紅三軍團部隊編為二縱隊，彭雪楓為司令員，因為兵少，下面就沒有師了。中央和軍委機關編在一起，又叫三縱隊，司令員葉劍英，我們三科在葉司令員的直接領導下管理三縱隊行政生活。葉劍英是客家人，從長征中期開始，他對我熟悉了、信任了，以後我們關係一直很密切。

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開會議後，中央率領一、三軍團向陝北繼續前進。行前開了動員北上的大會，毛主席講了話，但主要由周恩來講。周恩來一九三一年進入中央蘇區後任中革軍委副主席、紅軍總政治委員。

是很有影響的人物。長征過了雪山後周恩來病了，睡在擔架上不能管事，到俄界前他的病才好些，這時黨內發生了重大分裂，他在動員大會上講話是必然的。我記得周恩來主要是講了北上抗日，指出了紅軍下一步行動的明確目標。

周恩來說，中央提出北上抗日的口號是非常正確的，張國燾不僅不贊成北上抗日，還批評這是「空談」，他這是爲了掩飾分裂紅軍的罪行。我們很快就可與陝北紅軍會合了。周恩來接著說：我們過了草地，就把敵人追擊大軍甩掉了。蔣介石爲了堵截我們，急忙派來何柱國的騎兵軍，祇有幾千人，敵情並不很嚴重，我們不到十分必要時，是不想打仗的，我們付出一個人的本錢消滅一個敵人不划算，消滅兩個敵人也不划算，我們的本錢太小、太珍貴了。我們的目的不是打仗，而是力求以後得到一個不小的發展。

周恩來的講話表明，歷時一年的長征快要結束了，大家歡欣鼓舞。會後搞了文藝演出助興，這是紅軍開大會後必然要進行的程序。那天的節目一直演到黃昏。晚飯進行了會餐，殺了一頭小牦牛。

回首征途，從江西出發到強渡湘江，這一段軍情最緊張，整日戰鬥衝破封鎖線，戰鬥減員最多，中央紅軍少了一大半人。第二階段是到達遵義之後，敵情緩和了一些，人心略爲穩定。這才有條件召開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的機會主義軍事路線，紅軍絕地逢生了。第三階段是遵義會議之後，又是敵情緊張。紅軍的數量和戰鬥力比剛離開江西時差多了，面臨強敵，有時生死就在一剎那間，隨時可能全軍覆沒。由於毛主席的正確指揮，國民黨大軍一直在我們身邊轉，就是追堵不到我們。第四階段是向川西北進軍到陝北，這時擺脫了敵人的追擊，面臨的是惡劣的自然環境和黨內分裂的危險。在少數民族的極端貧困的不毛之地找不到生活來源，減員又非常多，死的都是老骨幹和精華，實在太可惜了。

中央機關在俄界整編後，許多人到了先遣工作團。中革軍委機關的人數減了不少。除了電臺和警衛、勤務部隊以外，幹部祇有二十幾個人，這是歷史上最小的中革軍委機關。由於人少了，毛主席來我們三科的機會更多了，許多事他都是直接找我爲他辦的。

中央紅軍從俄界出發再向北，祇要經過了天險臘子口，就從山裏向平川走了。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七日，紅一軍團的紅二師一鼓作氣拿下了

敵人認為不可能丟失的臘子口。當我們從這道天險裏走出來時，高興地說，這一年整天在大山裏鑽來鑽去，天大的苦也吃下來了。

我們出了臘子口的第一天，到了一個叫哈達鋪的鎮子。鎮裏有不少的商店，一所學校和一個郵政所。哈達鋪當地的人稱之為「小岷縣」，是周圍各地通商的口岸。半年來我們一直在少數民族地區，在哈達鋪又看到漢族的院落，坐在桌子邊吃飯，感到特別的舒服。到了哈達鋪，別人急於休息，而我們要為毛主席收集報紙。我安排好機關的住宿和警衛，就找郵政所，在那裏找到了過期幾十天的一些舊報紙和一張陝西省通郵圖。

毛主席看到我送上的通郵圖，激動地喊：「這件東西是個寶貝呀！」毛主席在報紙上看著看著高興了起來。原來是一段報道延安、保安、安塞等國民黨軍「剿共打勝仗」的新聞。毛主席說：白軍在那裏打「勝仗」，那裏就有紅軍。毛主席看了一會兒陝西省通郵圖說：我們在這休整一下，就到那個人民要革命的陝北去「安家」。

中央機關到了哈達鋪，三科召開了第一次軍委直屬隊的行政管理會議，提出了三條：1、整頓軍容風紀；2、恢復管理制度；3、恢復集體吃飯。恢復集體伙食的第一頓飯就出了「洋相」，當天吃白面，這是一軍團留給我們的戰利品。炊事班長劉仁從來沒有吃過白面，他像做米飯一樣把水燒開後把白面就往鍋裏倒，最後煮了一鍋夾生面疙瘩。但大家還是狼吞虎嚥地吃了，劉仁的大名也就揚開了。劉仁在長征中一直在三科裏跟著我，埋頭苦幹，抗戰時在敵人掃蕩中犧牲了。

紅軍出了臘子口之後不久就和國民黨的騎兵打了一仗。我們有些傷亡，毛主席心裏特別難過，千辛萬苦都過來了，現在有些同志卻死在異土他鄉。毛主席在葉劍英的陪同下去墓地憑弔了犧牲的七位烈士。我從來沒看到過毛主席如此傷感。毛主席離開烈士墓後又去看了傷病員，毛主席的問候使傷病員們十分興奮。

在回來的路上，毛主席向葉劍英說：這次打敵人騎兵，我們傷亡了二十多人，代價本來很小，但這樣的傷亡我們也賠不起呀！現在就剩下林彪和彭德懷的一、三兩個軍團了，死一個就少一個呀。這些人是黨的寶貴財富，也是我們將來發

千萬個。爲了保存好這些「財富」，我們要盡可能不打仗或少打仗，絕不能拼硬仗。一定不要造成我們大的傷亡。

紅軍長征到這兒是我們人數最少、力量最弱的时候，大家的情緒非常低沉。在以後的行軍中，毛主席不時和大家聊天談局勢，鼓勵士氣。他說：我們紅軍這幾年裏是下了兩次山，第一次是下井岡山，這一次是下岷山。下井岡山時我們祇有千把人，革命是低潮，但下井岡山不久，紅軍就發展到十幾萬人，還建立了個中央蘇區。這次下岷山，人比第一次多，又有久經鍛煉的紅軍，我們還會發展起來的。我們到了陝北先要擴大地盤，那裏南邊有關中平原，自古以來是成霸業的地方，我們要坐北向南，即使不能佔領關中平原腹地，也要佔它一個邊。

毛主席心中已有了今後的戰略。在進軍陝北的路上，中央主要是擴大紅軍，一邊行軍一邊籌糧、籌款和擴軍。要求作戰部隊每兩人或三人擴大一個紅軍，後方部隊和地方工作團一個人要擴大兩個紅軍，要在比較短的時間內擴招一萬人至一萬五千人，把一、三軍團補充起來。

中革軍委機關到了葫蘆河以東的靜寧地區，陝北地下黨派來找中央紅軍的三個聯絡員到了兩個，立刻被毛主席、周恩來找來問話。陝北人講話難懂，就叫地方工作團的陝西人賈拓夫當翻譯，問清楚了陝北紅軍在陝西的清澗、佳縣、橫山一帶活動，力量很小，主要是打土豪，分糧，沒有固定和穩定的政權。毛主席決定翻過六盤山繼續向陝北進軍。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賈拓夫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當選爲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他是陝西黨組織派到江西瑞金向中央報告工作的。一九三四年初參加中共六屆五中全會。會後正逢敵人第五次「圍剿」回不去了，就隨中央紅軍長征。賈拓夫很精幹，善言談，行軍時人們喜歡和他在一起邊走邊吹。「談話走路快」，常常牛皮還沒有吹完宿營地就到了。賈拓夫的名子中有個「托」音，大家開玩笑叫他「假托派」。在瑞金時，紅軍的政治教育中，大家對托洛茨基這個洋名字讀不習慣，有人讀成「偷著吃雞」，成爲流傳很廣的笑話。由此引申，大家又把賈拓夫的外號改成了「假吃雞」，算是飢餓中無奈的消遣。中央決定到陝北之後，賈拓夫的牛皮吹得就兇了，把他的家鄉說得比天堂都好。而來的陝北交通員說，安塞縣城祇有三個商店和鋪子，有的老百姓窮得沒有褲子穿，賈拓夫就不吹了。

中央縱隊進到甘肅東部之後敵情比較和緩，但路難走。那裏屬於黃土高原，遠看一望無邊的平坦，近看溝深得嚇人，溝壁多是六、七十度的陡坡，人不能攀登，祇能走很遠繞道過去。可是這對敵人騎兵活動更為不利，我們寧可選這樣的地方走。

一路上居民越來越稠密，解決宿營、吃飯都方便，但又發生了新的問題，沒有水吃。黃土高原缺水。一個村子甚至幾個村子才有一口甜水井。我們到了宿營地，首先就是控制甜水井，因為水量不大，部隊飲用時還要照顧到老百姓，時常發生爭吵。一次，我們在一個祇有百餘人口的村子休息一天，紅一師部隊在村子裏取水做飯，水少人多發生了嚴重的糾紛。周恩來親臨井臺下命令：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准私自打水，先供應部隊用水，機關到晚上才供應。

六盤山南麓人口相對稠密些。我們每天行軍里程短，停下來休息的時間多，這是為了有更多的時間做群眾工作，擴大紅軍。中央各部門都定下了硬指標，要求平均每人擴大一個紅軍。我們三科人多，警衛排、運輸班、炊事班一起有五十多人，擴大任務很重。軍委機關「擴紅」的積極性很高，但也有方式方法不好的。例如，見到年輕人就問他當不當兵？膽大的可以回話，膽小的聽到「當兵」就跑，我們跟在後面就撵。老百姓也不知道是什麼事，嚇得都往山上跑。這種做法及時得到了改正：一是和房東拉關係，房東看到我們是正派守紀律的隊伍，反正當地很窮，人沒出路，就叫青年參加紅軍了。二是打土豪，我們每到一地總是打一兩個民憤比較大的土豪，把浮財分給窮人，事後總有幾個人參軍。三是發動青年人做群眾工作。大約十天時間內，軍委機關「擴紅」三百零幾人，送到作戰部隊去了。長征開始後，紅軍一路都是減員，祇是進了甘肅以後才開始增員，逐漸恢復了一些元氣。

最後的難關

中央紅軍翻過六盤山之後到了寧夏的鎮原堡和甘肅隴東的環縣地區。軍委機關準備在環縣的洪德城休整兩天，那裏離陝北的吳起鎮不到三百里路行程了。就在此時敵人的騎兵追上了軍委機關。當時一、三軍團在軍委機關的東邊有相當距離，等他們回兵保護已經來不及了。我們

祇有向前拚命地走，趕上一軍團才安全。軍委機關經過動員之後，以急行軍速度出發了。

從洪德城出發的當天我就突然發高燒，衛生所長王斌診斷是「回歸熱」。當時什麼藥也沒有，好在王斌在自己皮包裏藏了僅有的兩支阿媽拉丁注射藥。他把兩支藥作一次給我打了進去，我注射後幾小時後燒就退了，好在當時我還祇有二十歲，發燒四十度雖然很難受，但還能堅持並照常工作。王斌憂慮地說，這點藥量對我的病祇能起到暫時壓一壓的作用，過兩天還會發高燒。這時，軍委衛生部長黃克誠特意過來陪著我走，我知道他是怕我再發病時掉隊，或是被「安置」丟下不管了，他這樣關心我，讓我非常感動。

軍委機關急行軍到了離吳起鎮不到一百里的鐵邊城附近，敵人騎兵追上來把軍委機關衝散了。我們後衛發現了敵人騎兵，由警衛營一個連在後面抵抗。我叫軍委領導走在最前面，擔架班和警衛員們扶著毛主席等人向東面跑。三科警衛排保護文件和財物擔子，電臺跟著走，機關人員隨著跟進，我在後面照應。由於敵人摸不清我們的情況，遇到警衛營的抵抗又很勇猛，天也快黑了，所以祇是不斷試探性地衝擊，我們就且戰且退。

軍委大隊人馬向東跑了大約三十多里路，敵軍就衝上來了，我們後頭隊形被敵軍衝散了，走不動的人就和敵人搏鬥，拖住敵人，為前面跑的人爭得了時間。就在向東跑這危急時刻，恰好遇上了一個寬有幾米的隘口，我帶著科員賴勤、警衛員藍如桂和警衛營的一個排強行搬來老鄉家的一些木頭和雜物，甚至門板也拆下來阻塞在隘口上當鹿砦，利用它進行抵抗。騎兵最怕的就是隘口和鹿砦，敵人祇得停下來，慢慢通過隘口，這樣又拖住敵人兩個多小時，天完全黑了。我們撤出戰鬥追趕大部隊。我們走了二十多里，敵人騎兵從右側攔截過來把我們衝散，好在天很黑，我和賴勤、藍如桂、警衛排一個班長無意中躲在了一起，敵人向前追去。我們沿側面的小路上山，走了很久遇到了一家房舍。家裏祇有六十多歲的老兩口。他們的話聽不懂，我們做手勢要吃飯，他會意了，給我們端出來一盆小米稀飯，一碗酸菜，我們都吃光了。警衛班長身上有個一角錢的銀毫子給老百姓，他擺手表示不要。

天亮後我們又餓又累走不動了，沒多久我又發起了高燒，連站都站不住了。於是賴勤向老鄉要了一根扁擔和一個筐，把我放到筐裏抬起來走。我在筐裏很快就睡過去了，等我醒來一問，已經又走了一天，後來繩子也斷了，接了幾次又斷了沒法再接了。藍如桂毫不猶豫地脫下自己的褲子撕成條編成繩子抬著我走。快天黑的時候，我們走到一個有幾戶人家的小村子，原來這裏距離陝北紅區的邊緣吳起鎮不遠了。

不久，從東邊傳來了槍聲，從槍聲中我聽得出，是自己的部隊來了，我叫賴勤過去探一下虛實，一會兒賴勤帶來兩個班的部隊，老遠就高興地叫著：「我們的人來了。」來的人是一軍團司令部參謀朱虛之。他說：「軍委領導已經安全到了吳起鎮，和陝北的紅軍會合了。你們和敵人遭遇後，一軍團就由吳起鎮向回打，在吳起鎮和鐵邊城之間把敵人騎兵消滅了一大半。」這時，兩個戰士拿來一副說是才繳獲的擔架，抬起我就走。我們先到了紅一團的團部，團供給處主任梁玉振是我在紅軍學校供給隊的同學，對我照顧得很周到，當夜我就住在團部。

第二天一早，紅一團派了一個排長帶幾個戰士把我抬著向吳起鎮送。吳起鎮很小，街上祇有一家驢馬店，有幾間不像樣的房子。他們以為驢馬店裏就是中革軍委，把我抬進去就回去了，沒想到這裏是彭德懷紅三軍團的司令部。彭德懷聽到聲音，從屋子裏面出來，見到我就說：「原來是你呀！這樣年輕的人也患病？行軍中病了可是不得了，好在我們到根據地了。」彭德懷邊說邊伸出手在我的頭上摸了一下，吃驚地說：「還燒得很呀！我這條件差，也沒有醫生，你自己多注意。」彭德懷馬上叫他的人照顧好我，送我回軍委機關。我從擔架上看到路邊的土牆是被風雨剝蝕後殘留下的幾條標語：「擁護蘇維埃！」「打土豪分田地！」「紅軍萬歲！」我激動地流下了眼淚。我們又回到了根據地，回「家」了。那一天是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日。

長征終於勝利完成了！我們從瑞金出發，在不停的打仗行軍中走了一年零兩天，到底走了多少路，我當時不知道，後來算出大概有兩萬五千里。其實那是在地圖上用比例尺量，然後計算的，而真正走的路要比那多得多。紅軍一路上沒有任何給養和保障，前後是敵人幾十萬大軍的堵截和追擊，一路上是說不盡的艱難險阻。我們縱橫十個省，平均每天至

少要走八十里路以上，我們沒有被消滅，成功地到達了目的地，創造了人類軍事史上的一個奇跡。

第六章 永遠的延安

初到陝北

到吳起鎮幾天後我的病減輕了，高燒就退了。我剛能走動就到鎮上去，遇到收容隊帶回來一群掉隊的人。深秋的高原寒氣襲人，可他們祇穿著僅能遮體的破爛單衣，長褲幾乎磨成短褲，不少人手上拄著棍子，虛弱的身子走路直搖晃。再看我們在軍委機關的人，和他們也相差不多。當時紅軍沒有「窮富」之分，富的頂多祇是多一件衣服、一雙鞋而已。

吳起鎮內祇有三四家店舖，最大的房屋群是東北角一個地主莊子，有土窯洞二十多眼。鎮子四周有用亂石壘的城垣。我們到「家」了，卻是個窮「家」，但這裏是救了紅軍生命之地。到長征最後階段，中央紅軍祇有幾千人，疲憊不堪，陝北根據地出現在面前，我們心情之高興，祇有絕處逢生的人才能感受到。

不久，衛生所長王斌通知我到永坪紅軍第二醫院治病。臨行前我領到了一塊銀元的路費，軍委三科的同志又湊了三十幾個銅板，讓我路上用。永坪紅軍第二醫院，院長李資平，政委易秀湘。醫院條件很差，病員分到老鄉家裏，住醫院和住老鄉家一個樣，和醫院的關係就是領糧食的關係。我們把領到的糧食交給房東，和他全家一起吃飯，很受房東歡迎，因為這裏的老百姓基本上是吃不飽的。

醫院又重新對我的身體檢查了一遍，發現我的腸胃長征中損壞了，要再繼續治療。醫院要我節食，但遇到好飯，我吃起來就控制不住，這是長征過來的人的通病。經過了一個月，我的病基本好了，但腸胃病纏了我終生。我的病將要好時，手腳上的皮全脫了，頭髮也脫光了。這次

生病是我有生以來最重的一次，幸好發生在長征末，如果稍微早點，我就可能早沒命了。

一九三六年一月，我回到中央軍委機關時，紅軍主力東征了。留在陝北的是軍委後方留守處，周恩來任主任，劉志丹為副主任。周恩來見到我很高興，要我在留守處工作。他談到當前的任務，幾乎說的都是糧食問題，要我協助他抓這項工作，我被任命為中央軍委供給部糧秣處處長。

周恩來介紹情況說，現在糧食成了我們生存的關鍵。在中央蘇區能夠徵公糧地區的人口不到三百萬，吃公糧的人不到二十萬，十幾個人養活一個人。現在陝北根據地人口少得多，不能養活我們這幾萬人。籌糧是周恩來派給我的一項緊急的重要任務，要依靠陝北的同志來完成，他帶我去見一下陝北紅軍的領導、留守處副主任劉志丹。

周恩來把我介紹給劉志丹後，向我交代任務說：「紅軍後方留守處決定成立延川中心兵站，你去兼任站長。負責領導延川、清澗、延長三縣的籌糧工作，短期內要籌足三百擔糧食，接應東征的紅軍回來。你拿著介紹信分別去找三個縣主要負責人辦理。不久我也會到延川一趟。」周恩來交待完了之後，讓劉志丹向我介紹了那裏幹部的情況。

因為籌糧任務緊要，在將近兩個月的時間裏我一直在那裏籌糧。儘管很困難，經過努力工作很快開展起來了。當我把三百擔糧食籌集得差不多時，周恩來來到延川縣，他沒想到我提前完成了，對我的工作很滿意。這時他叫我把工作交代一下，和他一起到黃河邊上的清水關去察看黃河渡口，一九三六年五月初，毛澤東率東征紅軍從山西回陝北，就是由清水關西渡黃河的。

一九六七年三月三十日，周恩來總理送我回總後主持工作，還提起這段經歷，他說：「我曾經說過，邱會作同志是個老同志，很小的時候就參加我們的紅軍，我還在江西蘇區的時候就跟他相識，到現在來說三十六七年了。長征的時候我們就在一起，特別到了陝北，那時紅軍被迫地離開了老根據地，轉戰北上，集聚在陝北。那時候，我們的領袖毛主席、林彪同志，都在前線作戰，我在後方主持工作，那個時候邱會作同志就參加了後方的後勤工作，我們差不多幾乎每天要見面的，計劃為前方籌運供應的事情，渡黃河東征的事情，轉戰到西邊，所以那一陣

乎我們安寧被脅了，我覺得他是一個很能夠工作的同志，也是年輕有爲的。是一個很有前途的同志，跟著毛主席、林彪副主席走。這個看法到後來來說，已經超過了三十年了，我的看法得到證實，覺得我的看法基本上沒差錯。三十年中，他做了很多工作。」

任糧食局長

這次任務結束後，我回到了瓦窯堡紅軍留守處。周恩來對我說：中央決定李富春同志任陝甘寧省委書記，他點名要你去協助他搞財經工作。我同意了。你暫不要回供給部，先到陝甘寧省工作一段時期。

我立即到陝甘寧省的駐地吳起鎮報到了。陝甘寧省由李富春任省委書記，馬明芳任省主席，蕭勁光任軍事部部長，賴傳珠任政委，我是糧食局長。我一到，李富春就熱情地接待了我，他說：「陝甘寧省現在既無財（產），也無經（濟），一切工作都是爲了搞飯吃，要靠你這個糧食局長了。現在和中央蘇區不同，在那可以徵公糧。和長征路過的蠻子地區（少數民族地區）也不同，在那是見了糧食拿著就走，無所謂買也無所謂征。現在我們到了根據地，不能向群眾直接去要糧，要通過地方政府，以徵公糧的形式要糧。糧食是我們當前最困難的問題，也是同群眾的關係最危險的問題。要是搞得不好，就會「官逼民反」，希望你能解決好這個當前最大的困難。」在富春同志直接領導下工作，我還是第一次。他對我寄予很大的希望。

不久，軍委總供給部也搬到了吳起鎮，和陝甘寧省委相隔五里路。我兩邊都有職務，就兩邊跑。主要是在省裏工作，我的工作幾乎天天要同李富春接觸，得到了他很多教益。李富春是建黨初期的老黨員了，政治思想水平很高，雖然他是一個有文化的人，但他很聯繫群眾，又很平易近人。我們都不叫他的官銜而叫「富春同志」，這在紅軍中是很少見的親切。

那時，陝北遇到的糧食困難極爲嚴峻，已到了沒有飯吃的地步。面對這樣的形勢，一九三六年中央由保安遷到延安後，立即決定成立中央糧食部。凱豐任部長，對外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糧食部。凱豐要我到糧食部工作，富春同志不願放我走，因為陝甘寧省委當

時的主要工作之一也是解決紅軍的生活問題。富春和凱豐爭著要我，「官司」打到周恩來那裏，周裁定我去糧食部，任供應局局長。

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凱豐任糧食部長，是學習蘇聯的「要人管糧食」。凱豐是江西萍鄉人，他夫人廖似光是廣東客家人，對我特別親切。我剛報到，凱豐就高興地說：「老弟，你可是我向周副主席打『官司』要來的。供應局是糧食部的半邊天，你的工作搞好了，就等於把糧食部的工作搞好了。」

凱豐對我們來說是大知識分子，他每天讀書的時間多，辦事的時間少，是個「甩手掌櫃」。他甚至坦率地對我說：「我不會搞糧食工作。但糧食工作很重要，蘇聯十月革命後列寧就親自做糧食工作。這個工作很艱苦，要做出成績很不容易。大家要做個列寧式的糧食幹部。」我問什麼是「列寧式的糧食幹部？」他說：「從書上看，列寧抓了三條，一是向富農、地主強徵多餘的糧食；二是嚴密組織糧食的運輸、保管；三是制定嚴格的供應制度。這後兩條都是你供應局管的事。」我說：「我們和他們情況不一樣。蘇聯那時是地主、富農搗亂，有糧食徵不上來。而我們這兒是地主、富農的糧食也不多。不久前，我已經向毛主席提出了幾條建議：減少邊區的吃公家飯的人數；鼓勵農業生產；部分部隊和機關分散到附近的農村去。毛主席還叫我去談過一次，聽得很認真。」凱豐對我的話非常感興趣，叫我想法子辦。

爲了查清邊區的糧食情況，由我負責組織了一個五人調查組，選擇延安縣南區調查，摸一下糧食情況的底。我們調查發現新區農村的糧食情況比中央蘇區好多了。農民基本上有飯吃，富農、地主手中的有餘糧，但不算很充足，這對制定徵糧政策是一個依據。當地可耕地很多，祇要有勞動力，發展農業很有前途。我們寫了一個調查報告，經凱豐修改潤色後上報了毛主席。毛主席很重視，對凱豐說：「你這個糧食部長倒像個農業部長。從調查報告來看，我們在陝北祇要能站住腳，大概是餓不死的。糧食部能搞社會調查很好！我準備在幹部會上講一次，號召大家對農村進行調查研究。」

糧食部的供應工作是最麻煩的，需求矛盾十分尖銳。我的原則是不管需要，祇管分配。也就是說，我有多少分多少，沒有就不分了。供應

局下設若干個糧庫（糧站），因缺糧，有糧就發，沒糧就停，晚十天半月發糧飽是常事，各單位意見大。

一天下午我到延安東關糧站去，正在這時運糧隊趕著空車回來了，原來入庫的糧食在三十里鋪被醫院的人和傷病員搶走了，說醫院最近每天祇吃一頓稀飯，傷病員們鬧起來了。知道了這個情況，糧站站長連聲說：「反了！反了！這是劫糧，是反革命！」當天黃昏，又有三十多頭牲口空著回來了，攔糧的事不僅發生在醫院，其他單位也有了，事態到了火燒眉毛的地步，不緊急處理就會發生更大規模的搶糧。

我急忙向凱豐做了匯報。他問我是怎樣處理的？我說糧站說是搶劫，要組織人把糧食追回來，我不許他們去，也不許找攔糧單位的麻煩。凱豐說這樣處理很對，攔糧無罪，責任在我們供應不上，我們做的是「肚子不等人」的工作！你考慮一下怎麼解決，我們一起向毛主席寫報告。

我召集全局科長和糧站站長們開會，議出來三條辦法：1、各機關的人，凡是能離開的都到農村去催糧和吃飯。由糧食部劃分籌糧地區，所徵的糧食歸各單位所有；2、各單位的牲口，包括乘馬在內，集中起來到遠處有糧的農村去運糧；3、延安城內約有私糧和公糧三十萬斤，先強行徵收，以後付款，以解燃眉之急。凱豐聽了我的建議說：「好，好！都是最管用的辦法，馬上向中央報告。」我們的報告很快就被批准了，三條措施實施，搶糧的風潮停了。

不久，陝甘寧邊區政府正式成立。中央決定糧食部撤消，在邊區政府成立糧食局。原中央糧食部的幹部重新安排，凱豐調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宋裕和任邊區政府糧食局局長，我任副局長。這時中國抗日紅軍大學成立了，很多工農幹部都想去那裏學習，我也提出了要求。不少領導不願意放我走，我找到李富春，他為我疏通，得以批准。一九三六年年底，我到了抗大學習。

在抗大學習

興辦抗日紅軍大學是中央一項重要戰略決策。紅軍東征回來之後，一九三六年夏天在保安開辦了中國抗日紅軍大學（「紅大」）培養幹部。毛主席任教育委員會主席，林彪任校長兼政委，後來劉伯承兼任副校長。羅瑞卿任教育長，劉亞樓任訓練部長（後為教育長），傅鍾為政治部主任。

任，莫文驊爲副主任，楊立三爲校務部長。由於糧食困難，第一期訓練的學員比較少，辦到第二期就改名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抗大」）並於一九三七年一月遷到延安。校址在原延安師範學校院內。

一九三六年秋天紅四方面軍和紅二方面軍長征也到達陝北，入抗大第二期學習的人就比較多了，有九個隊，約1300多人。一、二隊爲高幹隊，學員至少是紅軍團以上幹部。全校有上千名學生。這麼多的幹部進校學習，是紅軍有史以來第一次。

我進入抗大二期二隊學習。二隊學員近百人，我編在第三組，同一個支部的有張震（來自三軍團）、余秋里（來自二方面軍）、伍書普（來自四方面軍）。我和余秋里、伍書普三人一間窯洞。余秋里戰鬥負傷去掉了一隻胳膊，生活很不方便，但學習期間不能帶警衛員，招呼他的事，如吃飯、打水、洗臉、蘸牙粉等，就由我和伍書普做。至於出公差、打掃公共衛生、整理內務等，也由我倆代勞。我們雖然來自紅軍三個不同的方面軍，但很快就成了最好的朋友，白天形影不離，晚上同睡一炕，親如兄弟。

我在抗大學習了近一年，主要學習了四門課。到抗大講課的人不少，毛澤東、朱德、張聞天、博古、凱豐、吳亮平等人都來講過課。

第一門課《黨的建設》，授課者朱德。

朱德講課沒看見有提綱也不發講義，警衛員抱好幾本書放在講桌上，但他從來沒翻過。朱老總是個可敬的長者，他講課是「擺龍門陣」式的，大家聽得親切，但中心思想難搞清楚。他講課總是愛舉例南昌暴動、井岡山會師、遵義會議、長征路經婁子區……。朱德講黨的建設有一點我印象很深，就是共產黨員是黨的「馴服工具」，要忠實於黨，黨叫幹什麼都要無條件地服從。即使黨的領導做出的決定是錯誤的，也祇能保留自己的意見，不能抗拒。張國燾恰恰相反，讓部下忠於他，自己則以軍閥主義的態度對待黨。

朱德講要把張國燾和四方面軍的幹部分開。四方面軍的幹部大部分都是很好的。當時，也就是三七年三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作出了《關於張國燾錯誤的決定》，抗大積極貫徹會議精神，展開了對張國燾的批判。

第二門課《馬列主義基礎》，授課者博古。

博古講課時講桌上下是大堆的書，有「洋」書本，也有延安土編的。他講課中不斷翻閱，大段大段地讀，有時讀了幾頁也不停口。他似乎不是在講課，而是在領讀馬列主義書本。

博古操一口很難懂的無錫話，講來講去都是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名字和語錄，枯燥無味。幸好博古發了講義，多少知道他要講什麼。但他有時又不照講義講，喜歡列舉俄國革命的事例，他經常舉托洛茨基為反例，念托洛茨基用俄語發音，常引起滿堂人捧腹大笑。博古不知為何？原來我們想起了在江西瑞金紅軍學校中誤把托洛茨基聽成「偷著吃雞」的笑話。我們工農幹部文化水平很低，祇能通俗地進行啓蒙教育，祇講高級理論不行。

博古人很秀氣，對人很和善，講課也很認真。他從最高領導崗位上下來，還能到抗大面對這麼多幹部授課，而且很下工夫，我心裏還是尊重他的。

第三門課《戰術概則》，授課者何迪洲。

何迪洲原是國民黨軍隊的工兵軍官，在江西解放參軍。紅軍的技術人員（醫生、無線電、特種兵）多數是解放參加的。何迪洲講課深入淺出，生動活潑，十分受歡迎。他在國民黨那邊受過正規軍事教育，又有我軍的實踐經驗，能把理論與實踐融為一體。可惜的是國共第二次合作後，何迪洲不辭而別跑掉了，否則他就是人民軍隊軍事教育的奠基人之一了。

第四門課《哲學》，授課者毛澤東。

第一天上課，毛主席就說：「我要講的哲學，在場的多數人是初次接觸，會感到不懂，但你們又會懂得很深刻。因為我要講的內容就是大家工作和戰鬥中的實際問題。你們很會工作、打仗，難道就不懂得其中的道理嗎？你們不要去搞那些名詞和字眼，要很好地研究道理。讓你們學懂一點哲學，我有充分的信心！」果然，毛主席把深奧的理論講活了。

毛主席講課多在一隊學員宿舍門口的院子裏，學員席地而坐聽講。毛主席講課有講稿，不發講義，但他念稿子，總是用工農幹部熟悉的事情來說明理論。我多少有點文化，即使意思很難一下子全部理解，也能引起我很大的興趣，結合工作一想就想明白了。但有的文化低的學員抱怨說：「聽毛主席講課像過年放鞭炮，聽起來很喜悅，過後都忘了。」

不久就有了毛主席寫的油印本《實踐論》、《矛盾論》記錄稿，通俗易懂。最初記錄稿很少，我如獲至寶地把稿子一字不漏地抄在一個厚本子上，常拿出來讀，爲我學習哲學啓蒙，打了基礎。

抗大的生活非常艱苦，吃飯成了嚴重問題。中央軍委供給部把抗大列爲糧食重點保障單位，但僅僅是方針而已，沒有糧食一切都是空話。因此抗大的吃飯有了四種情況：一是勉強夠吃，這樣的日子不多。二是不夠吃，每人每天不足一斤糧，餓得搶飯吃，這樣的日子相當多。三是吃稀飯，多爲一天兩頓，這樣的日子很經常。四是喝稀湯，就算頓飯，學員稱這是「哄嘴飯」，這樣的日子不是很多，但卻叫人難忘。由於飯不夠吃，開飯時大家就爭搶。余秋里一隻手，開飯時我要先爲他搶上一碗飯，然後再擠進去搶我的一碗，稍慢一點就打不上。余秋里常爲我開道，他雖然一隻手，也去拉開別人，我一下就鑽到前面去了。

一九三七年夏收之前，糧食缺得嚴重，祇好用黑豆等飼料代糧，用黑豆、高粱、小米做成稠稀飯，大家叫它「合作飯」，就是這種飯也不能保證，越吃越稀。學員們每天餓得肚子咕咕地叫。全世界的軍隊中，紅軍最有挨餓能力！

儘管生活艱苦，但抗大一年的生活豐富多彩，比如打籃球，這是最熱鬧的活動。祇要朱老總來上課，下午肯定提前下課，朱老總組織大家打籃球。王錚那一幫人打的好，動作很漂亮，他們能打得贏從國統區奔赴延安的青年學生那幫人，但有時卻輸給我們這些土包子。我們這些農家出身，哪會打籃球，基本上是看會的，我們之中有幾個人，東推西撞，動作歪歪扭扭，但往往進球，因此常有爭執，朱老總常用四川話說：「進圈圈爲準！進圈圈爲準！」

回憶抗大的生活，還有幾件重要的事：

一、反軍閥主義

抗大二期有不少紅四方面軍的學員，在二隊約佔三分之一。他們的精神壓抑，很少說話，特別是師以上幹部多是這樣。當時中央要求進行反對張國燾軍閥主義的教育，他們認爲是整他們，來學習就是來挨整。

二隊在學習中，教員舉了一個例子：一個連隊指導員講政治課時提問一個原四方軍的戰士，是毛主席好還是張主席好？戰士毫不猶豫地回答張主席好！這個戰士忠厚老實說實話，反受到了懲罰。二隊在討論時，

一、二方面軍的幹部認為戰士很錯誤，而四方面軍的幹部對於用這樣的實例進行學習很憤怒。

對於張國燾的態度，二隊隊長倪志亮和支部書記謝富治的意見也很不一致，謝到處講張國燾壞，而倪閉嘴不說，實在憋不住就大吼一聲：「都光桿兒了，還有什麼軍閥主義！」這句話被支委會抓住了。倪是四方面軍參謀長，而我們幾個支部委員指責倪志亮堅持錯誤。他雙眼一閉，不理睬。倪志亮越是被說成軍閥主義，越要給大家一個顏色看看。三七年二月最冷的一天，倪事先穿得很厚，突然緊急集合把全隊帶到操場訓話兩小時，學員們沒有準備穿得不多，又凍又餓。事後支委會開會指責倪是故意整人，並向校部報告要對倪進行鬥爭，羅瑞卿批准了。全隊開會鬥爭了倪一整天，一定要把倪的隊長反掉。倪見形勢不妙，立即向朱老總求救。朱德親自來到支部大會上，講三個方面軍的幹部要團結，勸大家把事情結束算了。在朱德的壓力下，倪志亮做了檢查，雖然是應付，但他怕了，以後什麼事也不過問了。

二、毛澤東親自整隊伍

三七年初的時候，天氣相當寒冷了，北風又刮的呼呼地叫。就在這種情況下，抗大在師範學校的院內廣場上，召開了全校軍人大會，會議的內容是聽毛主席講政治形勢問題。

一天下午三點，全校都在廣場上集合了。那時對毛主席當然不像後來那樣神化，但沒有見到過毛主席的人還是多數，很想看一下。隊伍集合之後，毛主席、林彪、羅瑞卿、劉亞樓等人都在臨時架起來的臺上。毛主席來前隊伍有些混亂，秩序不很好。毛主席站在臺子上表情嚴肅。

羅瑞卿宣佈開會時，毛主席從座位上站起來走到臺前站得很端正，稍微掃視了一下臺下，就發出口令：

「全體起立！」全體人員都從席地而坐站起來了。

「一隊以羅炳輝同志為標準，向前看齊！」此時，唰唰的聲音持續了好久。

「坐下！」隊伍稍微整齊了。

隊伍坐下之後，毛主席掃視了一下臺下的隊伍說：「軍隊祇要為伍就要嚴肅、整齊。」接著，毛主席就講話了。他講的主要內容就是，日本帝

國主義正在爲侵略我中華民族做理論上和物資上的準備。我們一定要實行全民族抗戰，保衛偉大的中華民族。

毛主席講話之後，林彪和羅瑞卿對今天的情況表示不安，他們根本沒有料到毛主席會用這種親自整隊的方法來表示對學校的指責。毛主席的一次口令，引起了學校對軍容、風紀的極大重視。嚴肅軍紀風紀成了學校在不短的時間內注意的主要問題。我記得，從此各隊都實行早操。

一九三八年春開的時候，全校在東關機場進行過一次大會操。會操的主要內容就是進行隊列訓練。大家對大會操沒有什麼負擔，更沒有料到會出「洋相」。

林彪、羅瑞卿、劉亞樓等都出席了會操。會操由羅瑞卿主持和施教。會操開始，羅瑞卿發出了口命。可是我萬萬沒有料想到，羅炳輝等跋慢步、出左腿甩右手都不會，搞得順拐，人們大笑。

三、劫持張國燾出走事件

一九三七年春，四方面軍在抗大的少數人曾策劃劫持張國燾離開陝甘寧邊區，還沒實施就被揭發了。

抗大一隊學員許世友（原四方面軍軍長）、洪學智（原四方面軍軍政治部主任）等人想要把張國燾搞到陝南去另外組織紅軍，參加的有二十餘人。從這裏可以看出：當時對待四方面軍幹部的政策很有問題，而張國燾在四方面軍指戰員中確實有些威望。

這些人的活動校保衛處早已有聞，原以爲是少數人想結伙出走，並不知道要劫持張國燾。爲了偵破該案，保衛處的科長陳福生在學員中組織了偵察小組，有一隊張元壽、二隊邱會作、黃克功、三隊李某（名字記不起了）共五人，陳是組長，我和黃克功分工負責掌握二隊的動態。

起初偵察毫無進展。一天，我和黃克功等在延安北門的城牆上無意中發現了二隊學員徐長勳（四方面軍總司令部四局局長）、三隊學員張大華（原四方面軍營長）等七、八個人由城牆腳下的水洞裏出來，見了我們慌張地走了。我們好奇地到下面看了一下，水洞是雨季時城裏向外排水的通道。洞裏有煙頭、花生皮等雜物，可以判斷有過多次活動。我們向邊區保安處長周興匯報了。

第二天周興召集偵察小組到保衛處開會，偵察專家布魯（在蘇聯學習多年回國的）也到了，周興決定拘留張大華進行審訊。張被捕後供出如

下情況：1、幾個月以前，他們二十餘人開過會，傳達了張國燾的指示。我們必須再創造一支紅軍和根據地，四方面軍多數人會投奔來的。這次先到陝南，做秘密準備工作。2、最近又開了第二次會議。3、已對延安城的地形進行過詳細偵察。城一邊是延河，西邊是鳳凰山，北、東、南是城牆，祇有那個水洞是出城的最好道路。4、走的時間定了，行動時在延安城內的鐘樓放火，乘著混亂保護張國燾出城。5、出城後人員集合，保護張國燾直奔陝南。6、預定一起走的人（約六十人，幹部和警衛員各半），都帶好自己的槍，子彈準備要充足。他們幾十個人有相當的戰鬥力，少數部隊很難攔阻住。後來的事，如逮捕許、洪，毛主席又去釋放了他們等情況，多有文章記載，不再贅述。

一九八七年，我的所謂刑期到了。我的孩子鼓動我，找找當時的領導人，反映情況，我沒有答應。經孩子再三動員，我說：「我誰也不找。如果要找，我祇找余秋里。」我寫了一個簡信：「余主任：你好！我在電視裏看見你身體很好，我很高興。我的孩子想去看看你，反映我的情況，不要把你嚇死。我心中的苦比二萬五千里長征中的苦還要多二萬五千倍。致禮！邱會作。」我的大兒子路光找到葉帥的兒子選寧，選寧非常盡心。他先給楊尚昆（軍委秘書長）打了電話，楊的態度很好，表示要在政治局會議上反映一下情況，畢竟是到期了，應該由軍隊養起來。為了複查情況，選寧又把路光介紹給中共中央政法委的秘書長顧林昉，顧林昉正好是管這件事的，顧對路光說：「你爸爸到期了，理應安排，他們吃了苦頭，唉，正確對待吧。安排的原則就是原單位管，你爸爸的原單位是軍隊。但是我們做了很多工作，總政就是不同意，給安置工作造成困難……」選寧又給余秋里（總政治部主任）打電話，余卻把選寧批評了一頓。對黨內鬥爭，我有思想準備，但對戰友之情的變幻，我沒有思想準備，此事我心裏著實難過了一陣子。相反，我另一個「同學」張震，在我一九八九年去北京時，專門在國防大學請我和胡敏吃飯，口口聲聲稱我「老同學」，我不得其解，他說：「我們是抗大老同學呀！」他坦誠地說：「你的事我管不了，胡敏落實政策我盡力管！」他當了軍委副主席後還給我送了不少治病的好藥，真是沒有白同學一場。

任軍委供給部長

一九三七年八月，由於缺糧，抗大二期學生開到甘泉、富縣一帶去就地吃糧，維持學習，把糧食吃完了就提前畢業。我在富縣突然接到中央軍委的命令，要我立即回延安去任職。

一九三六年底西安事變後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遵照一九三七年八月中央在陝北洛川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我軍將分兵深入敵後，在不同的地域上建立幾個根據地，各路軍隊的供給也將由各自根據地獨立辦理。爲了適應這一形勢，中央軍委決定將原來軍委供給部一分爲三，一批人組建八路軍軍需處，同國民黨聯勤司令部打交道，如領取八路軍的薪餉、物資，軍需處駐在西安八路軍辦事處，處長葉季壯。另一批人組建八路軍兵站部，隨八路軍總部進駐太行山，部長楊立三。留在延安的供給部一攤子，仍爲中央軍委的組成部分，但機構縮小了，張元壽任中央軍委供給部長，我任副部長。半年後，張元壽調新四軍當兵站處處長（亦曾稱總兵站部部長），我任軍委供給部長。不過具體的供應範圍縮小了，祇負責西北地區，華北的黃河以東至同蒲鐵路以西地區，以及內蒙古一些地區的部隊。

我擔任供給部長的前幾天，毛主席叫我去談過一次話。毛主席是從開玩笑說起來的：「恩來同志來電提議你任供給部長，這可是一個不好當的官呀。你不能滿足需要，是要挨罵的。你受得了嗎？」

我說：「挨罵的都是好人！國民黨天天都在罵共產黨，我們不就是好人嗎？」

毛主席笑了好一陣子後說：「我說的會罵你的人，不全是國民黨，今後有的好人也要罵你呀。」

我說：「那就請主席訂一條規矩，我們這裏誰罵人就讓誰當供給部長。」

毛主席說：「好呀，你這一條可厲害！我們的隊伍內有那麼一種人，祇強調自己的工作重要，看不起別人的工作，作風又霸道。怎麼辦？我們要用批評和自我批評來解決問題，不能靠罵人來解決問題囉。」

說完這段話，毛主席正式和我談開了，他說：你可以勝任供給部長，因爲許多事你都是做過來的。現在你在工作中要特別學會動腦子。任何人不管做什麼，都是腦子和手足的統一。比如寫字，好像是手在寫，事

實上是腦子指揮手寫的，做工作也一樣。對客觀情況加以分析，把複雜的事務強化，分出主次，組織實施，這就是組織工作。一個幹部的領導能力，最主要就是能夠正確反映客觀情況，周密謀劃和組織，能夠抓緊貫徹執行。

毛主席最後鼓勵我說：「你現在很年輕，『初生牛犢不怕虎』嘛，你就當個『牛犢部長』吧！」毛主席說著笑起來了，一旁的機要科長孫開楚也笑起來了。

陝甘寧邊區劃定為二十三個縣，都是貧窮落後的地區，豐年糧食持平，略有自然災害就有大批人外出逃荒要飯。延安的工業祇有打馬掌等簡單的手工業，延長出產少量石油。

軍委供給部機關，下屬五科一處：會計科，科長廖靜民；出納科，科長（名字忘了）；軍實科（主管軍械），科長劉光明；糧秣科，科長高文智；管理科，科長楊居桃。政治處主任劉鎮，總支書記楊村，保衛特務員王金國。機關工作人員約五十人。

供給部的直屬單位有七個。

1、汽車隊。三十輛大卡車是紅軍改編成八路軍後，由國民政府配給的，擔任延安至西安的運輸任務，剛開始劉鎮是隊長。汽車隊是我軍有史以來第一次有的，因沒有零配件，能開動的車慢慢減少了，最後剩下幾輛怕拋錨不能跑遠道，就分給延安的高級領導人作專車用，朱德、張聞天、王稼祥、高崗等人都有，毛主席用的是一輛救護車。

2、兵工廠。廠長郝希英長征前在就是廠長，兵工廠有三百餘工人，祇能修理槍支和鑄造手榴彈。

3、被服廠。有四百餘工人，廠長曾志賢是江西吉安人，在瑞金時是優秀工人。廠裏除少數踩機器的是男工以外，均是女工。被服廠擔負了全邊區部隊服裝的生產任務。劉志丹的夫人童桂榮就在被服廠工作，是被服廠的老工人，國家一直養著，解放後退休在北京萬壽路居住。

4、鞋廠。有二百多工人，祇能生產布鞋。

5、軍械庫。在延安西的高橋鎮，編制五十餘人。庫內存放的是歷次戰鬥繳獲的一些破舊槍支、洋鎗鐵鎚等軍用品，就是這樣一些「軍械」也被看作是寶貝，不敢輕易處理。

6、驢馬運輸隊。這是從幾十頭牲口發展到八百多頭的隊伍，從一個隊發展到四個大隊的運輸大隊，是邊區最大的運輸力量。每匹牲口可以馱200多斤，匹匹飼養得膘肥體壯，一看就知道是供給部的運輸隊，當地老百姓很羨慕。

7、軍人合作社。主任孔祝三。

8、供給學校。有學員二百多人，軍委參謀長滕代遠兼任校長，我兼任任副校長，耿萬福任教育長，主持實際工作。說起供給學校，我還想起一個故事。葉季壯的夫人馬露貞鬧著要上供給學校，當時要求上學的人很多，不好安排。葉季壯爲了起帶頭作用，交代我不要讓馬露貞上學。馬找到我，我不好當面拒絕，就說給她寫一封介紹信，就可以上學。這封所謂的介紹信是給耿萬福的條子，我寫道：「葉部長說不要馬露貞上學，她去後你打發她回來。」馬露貞高高興興地去了，耿萬福看到條子，對馬露貞說：「收下你了，回去等通知。」學習都快結束了，馬露貞才知道真象，但爲時已晚。多少年以後，馬露貞還罵我：「我一生不識幾個字，都是邱會作害的。」

在延安初期，軍委供給部同其他部門相比比較龐大，是實際工作最繁重的部門之一。這是我第一次獨立擔任軍委直屬機構的領導工作，感到壓力很大，但我畢竟祇有二十二歲，充滿了幹勁，什麼困難也不怕。我接任時供給部正是最困難的時候，但窮有窮的辦法，我一上任就採取了這麼幾招：

第一，出「安民」告示，亮出窮家底。

當時陝甘寧邊區軍委直屬隊（包括抗大）約三千人，留守兵團約一萬五千人，由供給部直接供應，但供給部沒有錢。我記得當時駐定邊縣的三十軍死了一個連長，要幾塊銀洋買副棺材，我們都發不起。那時部隊相當苦，每人每天祇有一斤小米或雜糧，要採野菜充飢，一年當中頂多能吃一、二次肉。紅軍和八路軍生活之苦，古今軍隊都少有。

部隊多數領導能體諒供給部的處境，但也有人不相信，認爲是有錢不發，來吵吵鬧鬧的事常有發生。有一天，陳奇涵、陳先瑞、武亭三個人同時找我要錢。陳奇涵是綏德五縣警備司令，那裏是統一戰線區。他要上任，我發了一百元錢。他啼笑皆非，領吧實在太少；不要嘛，一文沒有，還是打了領條收下了。陳奇涵曾是黃埔軍校教官，大革命時的黨

員，又是我興國同鄉，我一直視他爲兄長。但親是親，公事公辦祇能給他一百元錢。陳先瑞是七十四師師長（後改爲警備二團），部隊駐洛川，也在統戰區。他來領餉，我發了二百元。他嫌少，怒氣沖沖地罵：「軍隊幾個月沒發菜金了，二百元夠個屁用！沒有錢就不要養兵嘛！」不想打這條。武亭是炮兵團團長，也駐在洛川，但無統戰任務，我一文沒給。武亭說：「他們還領了錢，我一個子兒也沒有。這怎麼行？」吵了起來。陳奇涵硬拉著他們走了。滕代遠參謀長知道了這件事，找陳先瑞狠狠地批評了一頓，說軍委供給部確實沒錢。

我想，與其大家來吵，不如先發《安民告示》，說明沒有錢，這是敵人對我們封鎖造成的。告示一發吵的就少了。在那個艱苦的歲月，後勤幹部要受三重苦：一是和部隊一樣生活苦，沒有「近水樓臺先得月」；二是要受謾罵之苦；三是要委屈地受首長批評和責備之苦。但是我們再苦也無怨言。

生活如此困難，幹部就有思想問題，主要是平均主義。我們對毛主席的生活管得稍微好一點，就有人指責我是爲了「往上爬」。毛澤東辦公室秘書長李六如也在會上指桑罵槐地說「供給部忘記了大眾利益。」我不吭氣，向毛主席報告要成立軍委審計委員會，建議李六如當主任。毛主席批准了。審計委員會成立之初，李六如興致勃勃地管事，這一下罵就朝著他去了，過了三個月他受不了了，提出辭職。

第二，賣破爛，應付急需。

當時雖然已經有了中央財政經濟部，但他們也和我們一樣是一個窮家，我們不僅向中央財經部領不到分文經費，他們還經常想向我們借錢。實在沒辦法，我想到清家底賣破爛。我們把供給部值點錢的祇有幾匹老牲口和幾輛不能用的大車。統統賣掉，得現款數百元、用它解決了幾個比較大的問題。

比如，買了一批通信器材。軍委三局王諍局長發現延安城剩有一批通信器材，我批給他三百元購買了。對於我不發菜金買器材，不少人意見非常大。毛主席知道了，在召集各單位負責人開會時爲我說了話：「今天請大家來開會，發不起菜金是問題之一。有人說供給部有錢不發，這不符合事實。他們最近賣了一點破爛搞了點錢，買通信器材就用了三分

之一，這個錢用得對。沒有菜金我們可以不吃菜，沒有通信器材，中央軍委就不能工作了。」毛主席把那些人的嘴封住了。

又如，衛立煌等國民黨高級將領來延安，毛主席親自接待，花了五十多元，事後他收到一封告我狀的匿名信，說「供給部有錢請國民黨軍官吃飯，但幾個月不發伙食費，供給部可能變為國民黨了……」毛主席在一次會上解釋說：「幾天前我接待了一批國民黨高級人員，引起了一些人不滿。客人是我毛澤東請的，罵供給部毫無道理。有人問為什麼過去戰場上的敵人現在成了客人，我說這證明革命的形勢發展了，一起打日本。大家對不發伙食費有意見，供給部是巧媳婦難為無米之炊，我贊成實事求是。」

這次毛主席沒有發火。按著他的性格，搞到他頭上的事是要大發脾氣的。毛主席聽進了大家的意見，特地把我叫去說：伙食費還是要搞個規定好。過去我們祇發實物，現改為費用定額比較好。規定每人每天伙食費五分錢，上級沒有錢的時候，可欠賬，待到有錢時補發。我們的人唯一的就能領到幾文伙食費，現在就規定它幾條：一是伙食費按規定發；二是今後欠的伙食費，由供給機關打欠條。有錢時全額補發；三是伙食費絕不准挪作它用，節餘的分伙食尾子。這是紅軍的制度，應當堅持下去。

我把毛主席交待的規定發佈了。雖是「空頭支票」，但起了安定人心的作用。後來財政情況好轉，這些規定實現了。我軍從創建開始一直是發實物的伙食管理辦法，這一次毛主席親自決定改為費用定額的辦法，是我軍後勤工作上的歷史性改革。

解決經費問題

為了供給部有進賬的錢，我們絞盡了腦汁，最後以辦實業解決了問題。

第一，開驛馬店。

一九三八年春天，我從延長回延安，在東關看到驛馬店裏客人爆滿。於是我想開個驛馬店。供給部以前雖然沒搞過經營，但大家都同意我的意見。

我們開辦第一個驛馬店，每天約能賺二十幾元，利不算大，但天天有進賬。不久，我們又在城南七里鋪開了第二個驛馬店，規模和贏利比

中關的店還好。於是在邊區裏一個一個店地開，開了二十幾個，生意越做越大。這樣，以驛馬店為依托的邊區的運輸線也建立起來了。主幹線有：從延安經綏德到山西西北部八路軍一二〇師為一條線；從延安到寧夏的鹽池為一條線；從延安經富縣到關中為一條線。為來往客商服務，幹部執行任務也可以住宿。全部驛馬店的收入，很大程度解決了供給部的財政來源。為了加強領導，我們又把驛馬店、交通（郵政）與兵站三家合為一，統稱兵站，對整個邊區的經濟，特別是通郵起了很大的作用。兵站這個組織一直保持到解放之後。

第二，發展食鹽。

鹽池到延安大約二百多公里，運到延安賣至少是三倍利潤，我們決定販鹽。

最初供給部祇有十多頭牲口運鹽，一個月頂多走兩趟，運二三千斤鹽。要把鹽業生意做大，就要銷出去。按那時的政策，向西安、山西國統區運鹽是「資敵」。而我們認為池鹽可換到西藥、通信器材等急缺物資，不能簡單地說成是「資敵」。打破禁運互換有無，對瓦解敵人的封鎖有利，禁運是禁了我們自己。一九三八年四月，販鹽問題被提交中央財經部專門討論，李富春肯定了我的報告，但是同國統區發生經濟往來是重大問題，必須報告毛主席，毛主席完全同意我們的意見。

鹽業發展起來後，中央決定陝甘寧邊區成立鹽業公司，鹽業對邊區的經濟發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第三，開辦軍人合作社。

軍委供給部開的軍人合作社在邊區影響很大，甚至成了延安經濟「繁榮」的象徵，外來的人都要到合作社去看看。周恩來三八年春從重慶回來，專門叫我陪他去合作社看過。在延安，無論私人或公家的商號都沒有能與之相比的。

合作社每月都有盈利，雖然從數字上來說還少，但解決了軍隊很大的困難。三八年在大砭溝蓋的八路軍禮堂，是從合作社的盈利中撥款修建的。另外，總政治部每月還要從合作社盈利中拿出一點作領導幹部開銷費用。

通過以上努力，軍委供給部的工作有了相當大的改變，主要的是：有了一定的供應能力；建立了一些保證分隊，如運輸隊等；建立和加強了

相當規模的兵工廠、被服廠、鞋襪廠等軍事工廠，搞起了相當規模的生產企業，積累的資金有數十萬元之多。這些對渡過抗戰初期的困難起到一定的作用。

在我們的生產中還有一個笑話。爲了搞錢，我們開始生產人丹。人丹生產簡單，原料充足，價格低廉，屬於「治百病」的東西，因此銷路很好。這樣我們的歪點子也來了，除了正規產品外，我們在另一種產品中的原料裏用了樹皮，銷路仍然很好。有一天，楊梅生要去看毛主席，他很「神秘」地拿了一大包假人丹就走了，當我知道楊梅生拿著假人丹去看毛主席，嚇的我頭髮都立起來了，我拿了一包真的拔腿就去追他，我追上他，他把人丹抱在懷裏不給我，嫌我小氣。我把真相告訴他時，他的臉都嚇白了。我說：「你還不給我，把主席吃壞了，我們都上軍法處了。」我給他換了一包，他就看毛主席去了，他拉我一起去，我怕他嘴不嚴，沒有敢去，叮囑他一番才回去。

開展生產運動

我到供給部相當長的時期裏，按照我在中央糧食部時提出的方法，分地區自己籌糧。延安縣是分給軍隊的籌糧區，軍隊抽調三百多人、百餘匹牲口組成籌糧隊。當時抽調牲口最難，爲了解決運力，規定所有的乘馬都要去運糧。毛主席把自己的牲口也送來了，這樣，有意見的也祇得服從。有了運力，很快就把籌到的糧食運回來了。能解決吃飯問題，大家都高興，沒人在這方面罵供給部了。

當時軍隊糧食來源有兩個：一是從西安運一部分糧食來；二是就地徵糧。後來國共關係緊張，西安的糧食斷了，徵糧也越來越困難，吃飯問題又嚴重了。後來偶然從軍委供給部軍械倉庫搞生產的實踐中得到啓示，發現可以「種地」（大生產的最早提法）解決問題。

這個軍械倉庫在延安西北高橋，有個五十多人。他們種了十幾畝麥子，畝產二百多斤，那時算是高產了。還種了三十多畝大秋作物，養豬十餘頭，牛四、五頭，羊三十多隻，還有一個菜園，糧食副食自給有餘。利用業餘空餘時間種地，對邊區部隊來說很新鮮，過去從來沒有過。一九三七年中秋節，倉庫主任要我去那裏過節。這裏的情況引起了

我的深思：除了有戰鬥任務的部隊之外，其餘的機關、部隊不是可以搞生產嗎？大家生活好了，精神狀態就好，工作就努力，當兵也安心。

我將高橋倉庫的情況向李富春匯報了。他非常感興趣，邊聽邊問，最後高興地說：「這下可能找到一條活命的路了，你立即給我寫一個報告，向毛主席匯報。」

報告呈上去一個星期，毛主席和李富春叫我去談。毛主席一見我就說：「興國佬，你們的報告我看了，有分析，也有解決的方法。」接著，毛主席對生產問題講了一段很長的話。大意如下：

根據地的生產要提高到戰略的重要地位，否則我們可能不打而自滅。你們這個報告的價值在於說明了軍隊搞生產的可能性，找到了一條出路。我們的供應無非是四條來路：一是取之於敵；二是國民黨政府發給；三是人民負擔；四是自己動手搞生產。前兩項都靠不住，根據地人民負擔一定要有個限度，祇有自己動手搞生產是最靠得住的辦法。請中央財政經濟部對此很好研究一下，並向中央提出報告。軍隊和政府搞生產，可以這樣設想：三八年先小搞，從中摸索經驗，準備以後大搞。先從政府機關、學校、軍隊後方機關作起。

我們回去以後按著毛主席的指示進行了若干準備，一九三八年元旦後中央財政經濟部召集過一次邊區黨政軍負責人的會議，會議開始時李富春說：「今天請各位來，是開個特殊的會，不討論發糧發錢，而是討論各單位要種地搞生產。……」到會的人原想是來分配錢糧，有說有笑，一聽到這裏立即沉默了。接著李富春讓高橋倉庫主任介紹他們去年搞生產的情況和新年的打算。大家對此根本不感興趣。

一見此狀，李富春說：「大家有意見可以提，但今年黨政軍機關都要開始種地……」這一下會場亂了，有人大聲說：「現在一天到晚祇吃兩頓清湯稀飯，餓得路都走不動，種地能行嗎？」「我們連一個鐵丁也沒有，哪有鋤頭？總不能用手指刨地吧？」會場上一片反對聲，會議開不下去了。

李富春祇好抬出了毛主席，他說：「高橋倉庫的生產，毛主席非常讚揚，說他們帶了一個好頭，找到了活下去的路子。毛主席指示，今年黨政機關都要開始搞生產，規模可以小一些，不管願意不願意，都要搞！」

一九三八年開春，延安各單位都搞起了生產，秋天有了收穫，但非常少。秋收後，中央財政經濟部對邊區黨政軍機關的生產進行了總結。會後，李富春和我商量，又給毛主席寫了個報告。

毛主席看到我們的報告後做了段批示，大意是：一九三八年生產沒有搞好是意料中的事，但初步達到了目的，要從實踐中摸索經驗。這個總結提出沒有搞好生產的原因很對，但有一條沒說到，就是壓力太小。明年黨政軍機關（有作戰任務的部隊除外）祇發半年糧，不足的自己動手向地裏要。不想搞生產的人，如果他可以半年不吃飯，就可以不搞。

毛主席的指示對大家震動很大，對生產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中央的領導同志，從毛主席，朱總司令開始，都參加了大生產運動，中央領導同志也在家門口種菜，對延安的大生產運動是很大的促進和鼓舞。

一九三九年延安搞生產的氣氛和三八年大不一樣了，三九年的生產任務下達後，反對生產的話聽不到了，叫苦祇是個別的。通過努力，三九年取得了很大的成績，軍隊生產的糧食夠全年口糧三分之二以上。地方的成績小一點，但也大大改善了。

爲了準備一九四〇年的生產並對一九三九年的生產進行總結，中央財經部在年初召開了一個小型領導幹部會議，李富春的主題報告受到大家的歡迎。李富春認爲我是搞生產的「發明者」之一，再三要我也講話。

我這兒回憶的是邊區大生產的開端。後來黨中央毛主席總結了各方面的經驗，發動了邊區的大生產運動，就眾所周知了。

紅軍的艱苦生活是多方面的，穿衣和吃飯一樣，也是供給工作的難點。紅軍自成立起就沒有發放被服的制度與標準，有東西就發，沒有就不發。我從一九二九年當紅軍戰士到當供給部長的十年裏，從普通戰士成爲領導幹部，我就從來沒有領到過被子。在南方時戰士們睡覺，下面鋪稻草，上面再蓋上稻草。那時後方醫院才有棉被。後來打土豪我搞了一床被子，用了很多年。紅軍除少數老戰士有兩套衣服之外，大多數是一套。夏天洗衣服時祇能光著身子，等衣服乾了再穿上，冬天乾脆長期不洗。每逢滅虱子，祇好光著身子躲在房子裏不出來。而穿襪衣我是聽都沒有聽說過。紅軍在江西時冬天曾發過一件薄棉衣，從沒發過棉褲。春天棉衣變成袂衣，夏天袂衣變成單衣，直到穿爛爲止。穿鞋更簡單，多數是自己打草鞋。

紅軍到了陝北寒區，要有「棉裝」才能過冬，要有鞋子才能行軍作戰。部隊的穿著成了生存和保持戰鬥力的重大問題。

紅軍的供應在初到陝北時是由軍委副主席周恩來親自管的。陝北異常貧窮，要解決部隊穿著非常困難。一九三七年秋天，周恩來親自召集會議討論部隊的冬裝問題。在一次軍隊和有關地方黨委書記的會議上，周恩來把製作冬裝做了佈置，具體到不僅分配有數字，對完成任務的時間也提出了要求。爲了解決部隊的冬裝，我們辦了三件事：第一是籌集資金。爲了籌集從邊區外購進貨物的「外匯」，就必須賣出土產，陝甘寧邊區能賣出去的祇有池鹽、藥材和皮毛。但中央的政治機關不准我們與皮毛商發生關係，說這是資助奸商，有「資敵」之嫌。我祇好向周恩來請示，他不僅同意，還看得更遠，提出了要利用商人發展向邊區外更多的買賣。後來那幾個商人同我們合作了，從國統區進口布匹遇到敵人的嚴密封鎖，就是那些商人幫我們搞進來的。第二是採購布匹、棉花。當時陝甘寧邊區根本沒有布匹市場。農民是自紡自用，祇是在延安和綏德有規模很小的布店，其他各地祇有少量的土布在賣。所以布匹要從國統區買進來。我們在寧夏、隴東、黃河邊和西安方向設立了採購點，但買進來的布料很少。後來我們發現，商人們知道我們在大量採購，就囤積哄抬價格，我們和商人進行了激烈的鬥爭，強買強購，但還不能滿足需要。於是周恩來下令國統區地下黨秘密向邊區運送布料，僅從關中的淳化就運進了幾百匹，很快就解決了問題。第三是加工冬裝。邊區的婦女幾乎都會做針線活，把布料分發了去，到處都是「被服廠」。一九三七年底冬裝按時製作好了，發放又成了問題。冬裝體積大，牲口馱運不方便，於是周恩來下令各部隊派人來背，成隊的士兵來背棉衣，這種供應方法是古今中外軍隊都少見的奇觀。

邊區的財經和供給工作

當時，中央已決定周恩來負責統一戰線工作，常常在國統區。周恩來臨行前，叮囑富春同志近期抓三件大事：一是抓緊向國民政府請領費用和物資，有多少算多少。此事用八路軍和邊區政府的名義，領到的費用和物資由中央財經部統一分配。二是對邊區財經工作實行統一領導，例

如成立邊區銀行，建立貿易公司等。三是貯備布匹和糧食，以我們的財力為準，盡可能多。

我當軍委供給部長時剛二十五歲，能把工作搞得有聲有色，離不開李富春對我的培養和支持。長征中李富春就注意我了，到了陝北，他力主要我參加邊區經濟工作。我同李富春的關係是在經濟工作中密切的，友誼也是在經濟工作中加深的。

按照我軍傳統，中革軍委對供給部的工作有指導責任，但很少有人過問。因為供給工作就是和困難打交道，過問我的工作就是要過問困難了。供給部工作中有很多具體事務，我祇好向李富春請示。他對我的工作特別支持，許多問題都是他親自和我商議決定的。他不僅在業務上支持我，在思想政治上也給了我很大的幫助。一九三七年除夕之夜，我第一次到李富春家吃年飯。那時我人事方面還不熟，李富春把曹菊如（財經部副部長）、鄧潔（中央財經委員會秘書長）等人介紹給我說：「恩來同志離開延安後，我們幾個人就是管中央財經工作的負責人。中央委託了我們，大家看著我們，我們就要負擔起來。今後財經部每星期開一次會討論日常工作，軍委供給部的業務也一起討論一併處理。」從此，向李富春請示工作成了我的常事。那天我們一直談到深夜。李富春談到當前的困難時說，現在邊區的中央機關和軍隊有兩萬多人，吃穿是大問題。邊區就那麼一點大，養活不了這麼多人。延安的人大部分要到前線（後來稱之為敵後）去工作和搞飯吃，我們要向中央提出報告。後來黨中央提出的「到敵人後方去」的重大戰略方針，最初是李富春的建議，主要是政治動議，但也有吃飯問題。

李富春主持邊區的財經工作是很成功的。他辦事民主，喜歡用商量的態度處理問題。我向中央財經部的報告，如果是比較簡單的事，他立即就批回來，遇到比較複雜的，他找我面談後再處理。李富春聽匯報，無論是什麼內容，都耐心聽下去。他注重傾聽別人的看法，經過商量之後才說自己意見。他說話簡單，從無長篇大論和空談。在日常業務工作中，供給部同中央財經部也有不少矛盾，但祇要到了李富春那裏，都能得到很好的解決。他的原則是按重要性來安排順序，先軍隊，後地方。李富春聯繫群眾廣泛，喜歡到下面的單位走動。他經常到軍委供給部來，有時有事，有時來吃飯。在那個艱苦的歲月裏，敢叫外單位的人來

吃飯，可不是一般交情了。李富春來，我總要伙房加菜，要是我們機關會餐或改善伙食，我打個電話他就來，對我毫不見外。

初到延安時，毛澤東在全黨的領袖地位尚沒完全形成，但李富春很注意用毛主席的指示來教育大家，我可以從他那裏聽到許多毛主席關於財經工作的想法和指示，作為我工作的依據，有些至今還記得。

那時毛主席說，財經工作很重要，但又常常不被領導注意。不善於領導財經工作，歸根結底不是一個好的領導者。中央規定軍隊的三大任務（打仗、籌款、做群眾工作），第二項就屬於財經工作。有人認為中央成立財經部沒有多少事可做，是不正確的。我們要做的事多得很，祇是現在還沒有開展。毛主席提醒我們，領導財經工作最重要的就是要注意「手」和「口」的量和比例，這是決定政策的根據。比如邊區有 150 萬人，卻有 20 至 30 萬非生產人員，壯勞動力祇有 25 至 30 萬人。一個勞動力要養活五個人還多，這麼一算就知道群眾負擔之重了。我們剛到陝北時多收了九十萬擔公糧，群眾就要「讓雷公打死毛澤東」，這還不是群眾負擔過重，實在受不了了才那樣說的？對中央財經工作部成立之初的工作，毛主席說最基本的方針是「開源節流」。不過現在早「斷流」了，菜金幾個月都不能發，無「流」可節了。開源的方面，還沒有真正開始，但又非得從這方面做不可。大家都不想種地，但是到了活不下去那一天，人們自己就會去種地的，因為人總想活著。歷史上李自成在陝南種地活下來了，我們比李自成總要高明一點吧！

早在延安時代，李富春就很注意經濟計劃。當時邊區各部門每年都搞財經年度計劃，但實現不了。因此，大家對此都不感興趣，但是李富春有獨特的見解。他說，我們處於被敵人四面包圍的之中，在戰爭環境中搞財經計劃，學習的意義大於工作的意義。通過搞計劃，我們大體上可以做到心中有數，需要與可能這個尖銳的矛盾就能夠認識得比較清楚，就是主動地去認識客觀事物。一切事物都有數量限度，雨水多了會成災，少了呢？也照樣成災，不多不少叫做風調雨順。搞財經工作對數量關係要很明確。我們邊區財經計劃的依據是什麼呢？簡單來說就是：1、人少土地多。邊區祇有 150 萬人口，土地很多，農業有前途。2、經濟落後。很多地區比刀耕火種好不了多少。3、文化落後。文盲佔人口中絕大多數。4、敵人搞經濟封鎖很厲害。5、長期戰爭，群眾負擔很重。因此，

邊區經濟工作的主要任務一是保肚子，不能餓死了；二是保屁股，不能光著身子。保住了這兩個就能活著幹革命。邊區現在還不可能實行計劃經濟，但要用計劃去指導經濟活動。

李富春提出的在經濟工作中要有計劃性、要實事求是的觀點，當時並不為人重視。新中國成立後，李富春成了全國經濟工作和計劃工作的主要負責人，他的這些思想對新中國經濟發展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抗戰初期的國共兩黨合作

回憶我們初到陝北的經濟工作，不能不提及國共合作時國民政府的供給。

一九三六年初，剛到陝北的中央紅軍出擊山西（東征），後來又向寧夏、甘肅出擊（西征），都有戰略目的，就是求生存。沒有地盤就沒有飯吃，無法生存。日本帝國主義侵略造成了中華民族存亡的危機，使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了。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發生了日本發動對上海侵略的「上海事變」，促成蔣介石與我們黨達成協議，同意將紅軍改編為八路軍並開赴山西，在閻錫山為司令官的第二戰區對日作戰。為了適應同國共合作和八路軍深入敵後的需要，我軍供應機構的變化很大，我們組建了以葉季壯為首的八路軍軍需處，常駐西安，向國民黨政府的請領或報告，都由軍需處承辦。國民政府對八路軍供應的編制數，最初為兩萬五千人。所領的經費、物資，由周恩來代表黨中央統一分配，八路軍軍需處承辦，中央軍委供給部祇能分到一部分。一九三八年上半年以前，由國民政府供給的糧食、物資和軍需品，大部分運往山西供應前方作戰部隊，我們駐在陝北的後方部隊祇能分到很小一部分。一九三八年下半年以後，由於日軍打通了同蒲路，向前方的運輸中斷，國民黨政府供給的糧食和軍需物品便大部分運往延安了。從一九三七年下半年到一九三九年兩年多的時間裏，我軍駐西北部隊的困難相對比較小。

全面抗戰開始後，延安吸收了數以萬計的學生，相當多的人是由汽車隊從西安運到延安的。另外，三九年以前國民黨聯勤總部發給八路軍的糧食也由汽車隊運到延安。但由於管理維修不善，這批汽車逐漸損壞不能用了。那時一些地方軍閥對我們也有過支援。當時新疆軍閥盛世才

曾對我黨表示友善，贈送了一萬五千件大衣，對我軍是很大的幫助。我們下發大衣的時候，留下了一些好的皮大衣給在延安的中央領導同志。我為李富春留了一件，但祇有大號的，李的身材小，我就為他改做成一件小皮大衣。我給富春同志送去，他穿起來後左顧右盼，非常滿意地說：「我以前從來沒穿過這樣好的衣服，看來這一件夠我穿一輩子了！」抗日戰爭高潮剛開始的一九三七年底，王明從蘇聯回國了，他一下子從極「左」變成了右傾。當時黨內不少人對國民黨有幻想，認為國民黨力量大，有軍隊，有政權，有盟國支援，這為王明的右傾路線提供了滋生的土壤。紅軍編成八路軍時，國民政府發了一些國民革命軍軍銜指標，不少人很看重它，爭軍銜，不但爭有無，還爭高低。在國共合作較好的時期裏，黨內看國共合作好的表面現象多了，右傾路線又一次在黨內蔓延了。

一九三八年九月，中共中央召開六屆六中全會，批評了右傾投降主義路線，確定了我黨獨立自主地領導抗日武裝鬥爭的方針。不久，高級幹部就開始傳達學習會議精神。

李富春向中央機關各部門負責人的傳達是在延安清涼山最高一層石窯洞裏。在那裏開會，主要是防止日本轟炸。我文化程度不高，但理解能力和記憶力比較好，特別是鄧潔給了我一份李富春的傳達記錄，那裏有毛主席的講話，文件我長期保留著，至今還記得幾處要點：

1、要堅持獨立自主。這是同國民黨合作的關鍵，毛主席說，「別人要問：『你們共產黨是利用抗戰來壯大自己的力量。』發問的人若是自己人或可靠的朋友，你可以向他點點頭，要是別有用心，你可以回答：『沒有人民力量的發展就沒有全民抗戰！』」

2、要建立抗日根據地。過去，我們有根據地就能夠粉碎敵人的圍剿，丟了根據地祇好長征。現在又有了根據地，就有群眾、有軍隊。我們懂得有根據地的好處。現在我們要到日寇的後方去，那裏日本人管不了，蔣介石不敢去，那裏就是我們的了。

3、要執行持久戰的正確作戰方針。我們以遊擊戰為主，運動戰為輔。這是量力而行，從敵我軍事力量對比提出的。遊擊戰能發揮我軍的優勢，有利於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我們到敵後，從開始就要想到最後勝利。我們要在戰爭中積蓄力量。

4、要搞好陝甘寧邊區。我軍主力應到敵後去，不要留在邊區。國民黨佔領延安、佔領邊區都能辦到，但把我們趕走辦不到。敵人呆在延安城，我們就在七里鋪。祇要我們不犯錯誤，邊區丟不掉。

形勢不出毛主席的預料，國共兩黨合作沒多久就冷了。我們從國民政府得到物資供應本來就少，從一九三九年秋天起，形勢發生了變化，東西更少了，再下去就沒有了，祇有「空頭支票」。後來「空頭支票」也沒有了。

抗日戰爭開始之初，我們曾經幻想過從國民黨政府那裏得到軍隊的供給，也確實得到過一些。但我們早就有意識地著手自己解決物資來源，早有了準備，所以形勢變化，國民政府的供應中斷的時候，引起的困難就比較小。後來，我軍到敵人後方去建立了根據地和民主政權，由那裏的人民養活。而中央所在的陝甘寧邊區軍民開展了大生產運動，我們不僅活下去了，而且過著豐衣足食的生活。

第七章 華中三年

中央財經工作團

大概是一九三九年十一月間，中共山東分局給中央的報告中提出（大意）：山東膠東地區是一個群眾基礎比較好的根據地。該地區較富足，海運發達，這裏進口日貨，可以取得大量稅收。因為財政幹部缺乏，山東的財政經濟工作尚未健全起來，建議中央派一批財經幹部來山東開展工作。以我們估計僅把膠東的稅收工作建立起來，每月就可以為中央籌到五萬到十萬（法幣）的款子。

毛主席和中央財經部的領導人李富春對山東分局的報告很感興趣，李富春自己都想去，因為我們的財政太困難了。毛主席當時還沒有下決心，他認為把票子搞到延安來，什麼東西都買不到，毛主席認為多搞「通貨」來比較好。毛主席還對李富春、鄧潔和我說過，你們去山東搞票子好呢，還是在延安種小米好？這時山東分局有來電催問此事，李富春就給中央打了報告，大意是：同意山東分局向中央提出的報告，準備派一個大的工作團去山東，由李富春、邱會作、鄧潔帶隊，預計工作兩年。爭取向中央輸送比較充裕的現款和「通貨」，雖然我們面臨國民黨的反共高潮和經濟封鎖，但在邊區周圍，尤其是西安、山西方面還是可以買進東西的。另外從自身的財政角度來說，也應考慮為召開七次代表大會準備所需的經費。

一九四〇年一月間，適逢周副主席在延安，他很重視中央財經部的報告，並向主席提出李富春不能離開，派邱會作帶工作團去山東，限期工作兩年，還是要回延安工作的。

我離開延安之前，毛主席同我談過兩次話。

頭一次談話，主要是談財經工作問題。毛主席說：「你們是以中央財經工作團的名義去山東，從政治上來說，你是可以勝任的。從業務工作來說，你們祇能叫財經工作學生團。……我們的黨打仗、搞黨的建設、搞統一戰線都還可以，搞財經這還是不很行的，這是我們全黨都要開始的新課題。你們到山東去，要向資本家學習，向日本人學習，我們應該造就一大批有作為的財經幹部。……你就是個農民子弟，過去飯都吃不飽，還懂什麼財經？但是你這個人天資比較聰明，也就是說有一副小科學頭腦，努力工作又好學，是可以學會財經工作的。」毛主席的談話一直對我鼓勵很大。

一九四〇年初，中央組織了一個近百人的財經工作團，準備去山東，由我任團長。我们的工作團以軍委供給部的幹部為主，記得還有謝勝坤、謝錦文、李建亭等同志。

臨走前毛主席又叫我去，主席說：「你去搞點經費回來，你是能搞得到的，具體工作不談了，到洛陽請少奇同志跟你談。」在談話中主席也講到對彭雪楓同志的讚賞和一些擔心。主席說：「你替我轉告彭雪楓兩個問題。一是，他不願深入到津浦路以東去，是不能求得發展的，祇能成為日本人和蔣介石的哨兵，面向西為日本人放哨，面向東為蔣介石放哨。這樣是不能建設鞏固的根據地的。二是，要多團結多聯合人，排斥張愛萍是不對的。我的話你要原本帶給彭雪楓，希望他在實際鬥爭中改正自己的錯誤。第一個問題，他自己不改正，敵人會強迫他改的，終究是要到路東去的。」

因為當時是統戰時期，我們就直接到了西安，準備坐火車去，也開了通行證。國民黨表面上講統一戰線，實際上下面處處刁難，等了幾天才允許我們走，這是我第一次坐火車。

到了洛陽後，我去少奇同志那裏請示工作，這是我第一次和少奇同志說話，少奇同志很和藹，說話也很嚴謹，他講了抗日統一戰線的問題和華中地區、新四軍的情況，也講到對彭雪楓同志比較重的話。現在想起來，這是少奇同志和三軍團彭德懷、彭雪楓、黃克誠的一些歷史淵源有關。我向少奇同志匯報到搞經費的問題，少奇同志才第一次笑起來，他說：「你可能刮不到多少油水。稅收問題也不是很容易。」

淮北往事

我們到達豫東永城縣六支隊所在地後，準備去山東。在那裏我以過路「客人」的身份轉達了毛主席給彭雪楓捎的話。他聽了以後倒還冷靜，但不很高興。他說：「毛主席的話事關重大，除我之外不必和任何人說。」我立即回答：「我絕對遵守黨的紀律。」後來，事實教育了他，一九四一年春，湯恩伯把四師從路西趕到路東去了。

這時，正好發生了安徽太和縣殺害從延安來的十多名幹部的事件，我們去山東就幾乎不可能了，再說隴海路有敵人密集的封鎖線，還要通過很大的國民黨統治區。少奇同志叫我們留下，可能有去彭雪楓那裏搽沙子的意思。我則感到那裏情況複雜，想先到山東去轉一轉。主席知道這一情況，立即來電報，叫我們去蘇北：

雪楓會作並告胡服：

蘇北為最富庶區域，部隊亦最多。邱會作及其工作隊必須即赴蘇北，不得不顧全局，延誤時間。

毛 王 朱

二十七日（一九四〇年五月）

我們帶去的幾十名幹部就在豫皖蘇分配了工作。這時，彭雪楓也找到我，拿出了主席的電報。後來我才知道，彭是不希望我走的，主要原因是怕我透露出去毛主席對他的批評：

胡服雪楓並告會作：

邱會作等決留華中幫助財政經濟工作，並代中央籌款。今後每月可幫助中央若干款項望即告軍委。

毛 王
九 日

從主席的電報看，我們的任務還是「代中央籌款」，另外就是決定我們「留華中幫助財政經濟工作」。在戰爭年代沒有部隊做依托是站不住的，我即向中央請示。主席很快就來了電報：

雪楓同志：

(1) 最近你們打擊敵偽有許多勝利，而頑方正佈置進攻你們。請即將勝利消息，擬成通電，用新聞密拍來，以便轉蔣程衛，要求獎勵；反對頑方進攻。(2) 你處財政收入，有無大希望，如邱會作等留你處工作，每月可供給中央好多數目，望告邱等暫在你處待命。

毛 王
十三日

這樣我就被任命為豫皖蘇邊區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依托在四師。四〇年秋天，黃克誠率三四四旅南下去蘇北組建三師，中央同意留下劉震一個旅開關蚌埠西北的根據地，湯恩伯大量進口日貨的通道被我們控制，我們立即組織淮上地區的稅收，開闢財政來源。在淮上一年多的時間裏，我們的稅收工作，每月能搞到數萬元，甚至十餘萬元。在當時的戰爭環境下，現金不便集中保管，全師旅以上幹部的乘馬，常常是攜帶現金的地方。我們的工作有了一定的成績，曾決定向延安輸送三十萬元。

彭雪楓對我們到四師來並沒有思想準備，彭雪楓以為我很快就會走，並沒有在四師安排我的工作，新四軍軍部幾次調我去，彭雪楓沒有同意，讓我給供給部長謝勝坤同志當政委，後來把孔石泉的政治部副主任兼組織部長，讓給我一個小的，我就兼任了組織部長。



一九四〇年，新四軍六支隊部分領導。左起：蕭望東、邱會作、戴國新、韓震、張震。

四一年春，路西失敗，我們損失很大，劉震是十旅旅長，滕海清是十一旅旅長，他們認為應兩個旅合起來，集中兵力和敵人作戰，彭則讓他們各打各的，讓敵人幹掉我們不少，四師被趕到路東去了，毛主席對彭雪楓的預言成了現實。路西失敗也不可小視，中央、華中局和少奇同志有意將彭調走，由三師副師長張愛萍來當師長，張愛萍認為這樣並不利，堅決不來。在少奇同志的催促下，陳毅同志親自與彭談，讓他到軍部去當參謀長，彭則堅決不肯去。四一年底，華中局決定派新四軍政治部主任鄧子恢任四師政委兼淮北區黨委書記，鄧來了不久，即在洪澤湖以東的仁和集整風，總結路西失敗的教訓。

四師的問題有一定的嚴重性，有人提出路西失敗是「小皖南事變」，收編的地主雜牌武裝，沒有解決「槍換肩」的問題……等等。整風會議之前鄧子恢與我談了一次話，鄧首先說：一，你不能到軍部去，這裏工作需要。二，這裏工作相當困難，要團結更多的人，才能開展起來，靠原來他們幾個主要領導開展不起來。三，要敢於鬥爭，要有點衝勁，把問題端到桌子上來。接著鄧子恢又轉了話題，問我對路西失敗有什麼看法。我就按照毛主席給彭雪楓稍話的精神講了我的意見（我對毛主席批評彭雪楓的話一句也沒有說），鄧聽後很驚奇，他說：「你的思想水平之高我沒想到，我很讚賞。」然後他說：「你把剛才的看法寫成一篇發言稿，對大家會有啓發，能把問題提高到執行路線的高度。」

我寫了一個發言稿，題為《在敵後堅持持久戰》。主要講了三個內容：一，敵後抗日根據地與統一戰線。二，夾縫中的戰略問題。三，建軍的黨性原則。我的發言稿都是根據毛主席對彭雪楓的指示精神做了聯繫實際的闡述。鄧子恢看到我的發言稿甚為稱讚並親自做了補充和修改，並指定要我發言，我說：「我基本上是局外人，送給你發言稿就算交差了吧。」鄧即問我有什麼顧慮，我說不能沒有顧慮，雖然是總結路西失敗的教訓，我感到後面還有較深的領導幹部之間的關係問題，我吃不准，你發言說的是東，別人會理解為西。鄧向我做了解釋，然後對我說：「你就算奉命發言，一切後果和責任在我身上。我們是對事不對人，對革命負責任。」

我對四師的情況瞭解是不深的，在四師的幹部會上，我的發言對全場有一定的震動。我的發言肯定使彭雪楓十分煩惱。

我的發言確實使我不便繼續在四師工作了，我也的確不想留在四師，後來，我和彭雪楓碰面都幾乎沒有單獨談過話。我向鄧子恢政委提了兩條要求：一，還是去新四軍軍部分配工作。二，把我調到地方上去搞財政經濟工作，當時還根本不敢提回延安去。鄧向我解釋說，這樣辦都不好，不利於團結。到了四三年初，中央爲了保存幹部，適遇大批幹部要回到延安去，我也提出了回延安的要求。彭雪楓先入爲主，表示同意我的要求。鄧子恢政委雖然不同意，但不好提出與彭相反的意見。於是他祇好同意我的要求。彭是堅決不同意我到軍部去工作的。事後，鄧同我說：「你提出回延安，我同意你回延安的原因是共同的，這就是我們的黨性原則。」我以愉快的情緒回答說：「我理解你的話的意思。」鄧最後說了一句：「你先走，快要開七大了，對孔石泉和你都還有政治上的考慮，以後你會知道的。」我是輕鬆愉快地回延安的。

主席對彭雪楓是很器重的，不幸的是他在四四年九月在戰鬥中犧牲，英年早逝。彭雪楓文武雙全，是一個意氣風發的優秀指揮員。對於彭雪楓的犧牲我是很悲痛的，胡敏則大哭一場。

從四師回延安

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之後，中央提出了一個重大的戰略決策就是：「保存和培養幹部。」從一九四二年起，各根據地就逐漸將幹部送到延安「保存培養」去了。這一決策對解放戰爭起了重大作用。

從新四軍四師一起到延安去的幹部共十三人：政治部副主任孔石泉，政治部民運部長康步雲，司令部機要科長馮賢駒，副科長周漢英，衛生部長林士笑，抗大四分校訓練部長藍僑，政治部主任張明河，九旅團政委蔡明，十二旅副旅長黃思佩，蕭縣縣委書記李砥平，供給部駐淮南某部政治處主任賀恩寬。除了康、周、林、藍、賀等五人未婚之外，其餘都結婚了，都是夫婦同行去延安的。胡敏當時懷孕已經三個月了，師部還派了一個牲口專門送她過隴海路北，這可以說是很照顧的了。

我們從安徽到延安是一次艱苦的行程。一九四三年三月間，我們從安徽的泗縣半城鎮出發，到一九四四年四月到達延安。究竟走了多少路，無法計算，但走了一年又一個月的時間。我們經過安徽的淮北、山

東、晉冀魯豫、晉西北等解放區。通過隴海鐵路東段、津浦鐵路魯南段、平漢鐵路、同蒲鐵路中段等日本鬼子

大的封鎖線和記不起名稱的很多小的封鎖線。通過這些封鎖線基本上是夜間偷過，或化裝公開過兩種方法，都是在當地解放區軍隊的嚴密組織和派人護送之下通過的。從組織工作的角度來說，是有安全保證的；從敵情的角度來說，是沒有

安全保證的。據我所知，各根據地送去延安的幹部數以千計，都沒有發生過大的問題，這無疑是極大的成功！

我們一過隴海路，就聽到新四軍三師去延安的幹部在海上遇難了。後來才知道他們遭到日本軍的攻擊，三師參謀長彭雄，七旅旅長田守堯等當場犧牲。濱海軍區對我們通過微山湖區是特別慎重的，因為這個封鎖區的縱深是相當寬的，要連續兩三天的行程。

第一天黃昏，我們從路東的抱犢崗山腳下出發，經過一個通宵的急行軍到第二天才到佛山後的秘密交通站。途中偷過了三道封鎖溝，每條溝有四、五米寬，行程約180里，在途中連續走了約二十小時都沒歇息過。我這個還是年青力壯的小伙子，走得都前腳帶不動後腳，幾乎祇剩下半條命。這天行軍，因胡敏有身孕，交通站還特別給她備了一條毛驢。那條驢子特別通人性，對胡敏是幫了大忙的！

我們到了預定的休息地點棗莊煤礦南面的佛山後，我們剛進房子躺下槍聲就響了，而且越響越厲害，像有戰事。我祇好命令大家向山上走，警衛員招呼胡敏走出房子，也向山上走，佛山後是一個石頭山，爬上一步都要費很大的勁，我正在爬山的時候，我同孔石泉商量：「什麼情況也不知道，往哪裏去？走還不如抵抗好。」他同意我的意見，於是就集合了幾個警衛員準備打仗。正在此時，交通員回來了，說什麼情況也沒有，聯絡沒有搞好，是發生了誤會，我們總算鬆了一口氣。

第二天，我們很早就從佛山後出發，到津浦路同棗莊鐵路分叉的鎮子上才吃了早飯。今天的路並不很遠，中午就到了微山湖東岸。這裏沒有房子，儘是一些草棚子，有很多的漁民。那天晚上永遠不能忘記的就是跳蚤多得使人難於相信。我一進草棚子，兩條腿上就密密麻麻的一片黑，立即向棚外跑，問房東怎麼辦？他說，有辦法。房東端了木炭火進去，跳蚤就自動跳進火盆，一時吱吱咋咋響了好久。

第三天，是通過微山湖封鎖區的最後一道封鎖線。這一天要通過日本鬼子一個有五里路長的崗樓群，通過敵人崗樓群的時候，事先交通員交代說：「祇跟著走就是，不要說話。」接著我們三人就在敵人崗樓下面左彎右轉的。我不僅看到崗樓上敵人的太陽旗，也看到了日本鬼子的相貌，敵人對我們根本不管，連話也沒有問過一句，我們就勝利通過了敵人崗樓群。這樣也就基本上通過了整個的封鎖區了。這是我們到延安去最危險的封鎖區。後面的封鎖線，都比這容易過了。

我們到了冀魯豫解放區，深深感到這裏是被日本鬼子摧殘得最厲害、最嚴重、最殘忍、最無人性的一個地區。對全區的情況我不瞭解，以我親眼看到的有如下幾個不堪回首的事。

(一) 堅壁清舍。過了微山湖封鎖區之後，不管是小莊子，還是大莊子，都空無一人，至多也祇能看到個把老人。後來才知道，敵人的漢奸隊專門在夜間進村抓人和姦淫擄掠。日本鬼子對偽政府抓勞工是硬指標，限期抓不到，就要他們自己的子弟抵數，因此，漢奸隊抓勞工就特別兇惡。爲了躲避抓勞工，白天群眾有聯防，晚上就祇有到野外地窖裏睡覺，老百姓把糧食裝在缸裏，埋在野外。老百姓特別痛恨和害怕的就是強姦。日本鬼子是禽獸，對女的不管老少都強姦，還有特別不能使人忍受的是，漢奸隊抓到了年青媳婦和姑娘，都是集體輪姦。日本鬼子欠下了老百姓數不清的血債！

(二) 一罈子血。一九四四年，日本鬼子對濮陽縣根據地掃蕩的時候，在這個村子曾過吃了八路軍和民兵的虧，鬼子死傷不少，日本鬼子就決定對老百姓報復。第二天拂曉就突然回來包圍了村子。把老百姓強迫集中到街上廟門口，結果不到半小時之內被敵人用機槍打死四百多人。倒在死者屍體群之內的倖存者祇有三人！街上鮮血像水一樣的向低處流。他們用罈子把死者的血裝上一罈子，作爲對全體死者的悼念。

我們請三位倖存者講一罈子血的情況，沒有一個人能講到底就會哽咽講不下去，我們聽的人多數都哭泣不成聲。我在發生這個慘案的村子裏親自受到了教育，並向死者鞠躬致哀！我們大家都進一步具體地認識到了日本鬼子的罪行。

從冀魯豫到太行山是比較容易走的，祇要一過平漢路就到了。到了太行山，回延安最艱苦的階段就基本上過去了。

過平漢路後，我們在安陽市最熱鬧的地方吃的中午飯，晚上的就到了林縣交通站。由林縣再走一天就到了一二九師師部住地，以後就不要交通員領著走了。我們在一二九師師部祇住了一天就到麻田八路軍總部所在地。總部駐在上麻田，我們住在下麻田招待所，相隔約半里路。在麻田經過十多天之後，我們四師同行的人，才先後到齊了。

我在八路軍總部認識很多的人。但我除了同總部參謀長滕代遠、總部司令部一科副科長何廷一、二局錢江局長有聯繫之外，同其他任何人都沒有聯繫過，不是十分熟悉和知己的朋友，我是不會找別人麻煩的。

滕代遠參謀長對我很好，我到了第二天就到招待所看我。何廷一是我到的當天就來看我了。第三天，滕代遠叫我去談過一次話，他說了在延安時期的一些歷史情況，並想留我在太行山當兵工部部長。因為我對兵工方面的業務比較生疏，對工作沒有把握，就婉言推掉了他的留任。

八路軍對過往的幹部都比較熱情接待，尤其是從敵後回延安的幹部有困難總是盡力解決。彭德懷向新四軍二師和四師的幹部做過一次時事報告，介紹了晉冀魯豫的情況。他講話之後，請大家吃了一次飯。每人半斤肉的標準，吃一個燉湯菜和一半白面一半粗糧的花卷。朱德、彭德懷、滕代遠等負責人陪著大家一起吃。這頓飯，吃的很親、很甜、很香，這是我軍的光榮傳統！

由於胡敏產期臨近，我就陪她生下孩子再走。同路的黃思佩的愛人連佩珍也是要生孩子，我們就結合一起走。

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六日，我們的大兒子就在麻田西北約三十里的陰峪口野戰醫院出生了。因為孩子是在回延安的路上生的，故取名路光。胡敏生孩子前自己挺著大肚子去敲醫生的門，醫生嚇了一跳，扶她回醫院準備接生。我就在醫院陪著她，但我什麼也不能做。我當時也患了病，躺在胡敏生孩子的隔壁房裏，動也不能動。胡敏剛生下孩子，她自然也不能動。兩個都不能動，祇有心相通就是了。

胡敏生下孩子的第二天就得到日本鬼子掃蕩的情報。醫院要把所有產婦都送到山上去分散在各個石巖洞裏。一片山祇有一個招呼的人，連飯也不能保證吃上，我要同去醫院又不准。怎麼辦？祇有聽天由命了！胡敏是一個非常堅強的人。我們一九三九年十月結婚之後就由延安到敵後去了，我們都是在戰爭的艱苦條件下生活的，她對艱苦從來都沒有過一

句怨言，我們之間的關係，在工作上是戰友關係，在家庭生活上兄妹關係，從來沒有吵過大架。半個多世紀以來，經過很多坎坷和曲折，我們的生活真是長長流水，一直到現在川流不息。

路光的上面還有一個女兒，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出生，是左齊同志接生的。孩子出生之後，由於戰事緊張，環境惡劣，連個名字都沒起好，就寄養在安徽省懷遠縣以西的龍亢鎮老百姓家裏，孩子長到五歲就病死了，孩子白出生一場，是日本鬼子和戰爭造成的，責任不在父母，我們祇有一句話對不起孩子。

胡敏生路光也是苦不堪言。當時連小米稀飯都吃不飽，要想吃別的東西是千萬不可能的，坐月子就是過難關。還算好，有滕代遠送的一隻公雞，老戰友錢江送給我一個搪瓷缸（還沒有把），這就是胡敏坐月子唯一的補養佳品和用品了。現在有了大兒子路光，又在回延安的途中，當時我們的困難是難以想像的。

要把孩子帶到延安去就非有一個運輸員不可。我向滕代遠寫了一個報告，要求調給我一個運輸員，得到了批准，老戰友何廷一在總部特務團給我選調了一個班長鄭繼忠。這個同志非常好，他是路光最好的保護人，沒有他路光可能不會長大成人。後來，在十多年的時間裏，鄭繼忠成了我們家的生活總管。鄭繼忠同志於一九五五年從武漢來北京開會時發心臟病去世了，我永遠懷念鄭繼忠老戰友！

到綏德

一九四三年八月中旬，胡敏生孩子還沒滿月，我們就繼續向延安走，當時條件好多了，孩子裝在一個籃子裏，有老鄭挑著，但胡敏還是不行，孩子還沒滿月，胡敏就開始行軍，落下了走路腳板疼的毛病。我則親自給孩子洗尿布，爲了幹得快，我一隻手拿一塊，邊走邊抖，有時頭上還頂一塊。在文水，交城進入晉西北解放區八分區。

我們從八分區到過黃河要通過山西嵐縣一條封鎖線，路光剛生下來，啼哭是難免的，負責經委工作的藍橋同志告訴胡敏：「過封鎖線時要用雙手放在孩子的脖子上，孩子一哭祇能掐死！」胡敏雖然淚流滿面，但還是照做了，因爲孩子一哭，敵人發現了，大家都活不了，孩子自然也活不了。封鎖線要在晚上通過，當時已經霜凍了。我同胡敏一共祇有三

條褲子，她滿月不久，我就讓她穿兩條褲子，我穿一條。我的孩子祇有一床很薄的被子，怎麼辦？祇有借兵站的一件老羊皮大衣了，這一下孩子的御寒的問題解決了。過了黃河後，我真不想還回大衣，但自己畢竟是一個老後勤了，公家的東西不能隨便要，正好有回兵站的人，我把羊皮大衣托人帶回去了。

過了黃河就到了陝甘寧邊區了，大約十月間就到了綏德，我們住在城南的七里鋪。我被留在綏德工作了半年多，才到延安去的。中央組織部在綏德設了一個處理委員會，主任是李井泉，秘書長李樂光，我和新四軍三師一個旅的衛生處長李永春留在處理委員會工作。處理委員會的任務是，對敵佔區回來的幹部進行處理，主要去向主要是分別送到中央黨校一、二、三、四部學習。由綏德到延安還有一些具體的行政事務也是要辦妥的。胡敏帶著孩子先回延安了，爲了養活孩子，我唯有兩件「寶貝」，一支舊鋼筆和一隻破舊手錶，我把手錶賣掉了，換到三千元邊區票子。

一九四四年四月間，我到了延安，進黨校學習。本來對延安並不陌生，但延安一切都變了，變化最大的是大家都豐衣足食，物質生活豐富，精神狀態很好。延安保存了很大一批幹部，大家都在精神煥發地攻讀馬列主義，整風學習。我到延安是頗有收穫的。

第一，我看到了中央黨校搶救運動的痕跡。大砭溝口，有臨時監獄，陶鑄的夫人曾志和葉帥的夫人危拱之就關在那裏。我在黨校校部還看到過曾志被捆綁在樹上被打的死去活來的慘狀。這些都是搶救運動的結果。

第二，我參加了黨校的兩條路線學習。經過學習，對黨的路線有了初淺的認識，這對我以後的鬥爭，特別是對毛主席思想的理解起到了極大的作用。

第三，邊區的生產發展起來了，享受到了延安的豐衣足食。中央黨校能夠集中數以千計的幹部到延安學習，也是在有飯吃的條件下，才能辦的事，我在黨校學習就沒有吃飯問題的顧慮。

黨校的生活也是不錯的，同三七年抗大的生活相比成了明顯的對照。抗大時期幾乎天天吃不飽飯。現在，黨校不僅有飯吃，而且吃得比較好。早飯是小米稀飯，中午晚上都是小米乾飯，二、四、六中午還有

白麵饅頭。副食，早上有自做的鹹菜，中午和晚上都是兩菜一湯。菜的數量也比較豐富，對填飽肚子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胡敏的革命精神和戰鬥作風

我的老伴胡敏（原名叫胡秀英，參軍後改名為胡芝敏），一九二一年出生在陝西長安縣一個赤貧家庭裏，從小過著飢寒交迫的生活。她三歲喪母，五歲開始和其他窮苦夥伴一起挖野菜、揀垃圾為生，從而被西安的紅十字會收進難民所，邊做工邊學識字。十三歲到陝西省立醫院當清潔工。一九三六年五月，在陝西地下黨的領導下開始做革命工作。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後，國民黨政府對日寇的侵略採取的是不抵抗政策，蔣介石搞的是「攘外必先安內」，對長征到達陝北的紅軍進行「圍剿」。蔣介石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國人民的強烈反對，終於釀成了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的西安事變。西安事變爆發以後，胡敏和省立醫院的進步青年、教職員工，義務為從抗日前線轉送到省立醫院的傷病員進行救護，敷藥喂湯；同時他們與西安的民眾相呼應，走上街頭，搞宣傳，作講演，強烈要求國民政府停止內戰，一致對外。

就是在這種形勢下，地下黨組織西安的醫護人員，組成西北青年抗日前線救護隊，到前線去要與日本帝國主義決一死戰。胡敏是醫療隊十四人中的一員，一九三七年十月奔赴山西八路軍總部，參加了八路軍，在前方野戰醫院工作。三八年組織上送她到延安紅軍衛校學習，三九年，胡敏剛滿十七週歲就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我和胡敏三九年十月在延安結婚，四〇年，中央決定成立西北財經工作團，我任團長，到各戰區去為開黨的七大籌些款，我們就到蘇北去了，後來留在新四軍四師工作。胡敏在四師司令部衛生所當所長兼醫生，她當時祇有二十歲，工作充滿革命熱情，任勞任怨，不知疲倦。工作之餘還去教戰士們唱革命歌曲。彭雪楓同志很賞識胡敏的革命精神和戰鬥作風。

胡敏在四師有三件事是值得回憶的。

搶救陳銳霆。陳銳霆同志（解放後任炮兵副司令員、五機部副部長）在國民黨軍隊任旅長時已經是共產黨員，一九四一年，他率部起義，把部隊拉到新四軍來，這是一個壯舉，陳銳霆同志是有大功的。陳部晚上

宿營已在四師附近，沒想到陳部有些反動的基層軍官，發現陳的意圖，甚至陳的副官也是蔣軍嫡系人物，他們決意殺掉陳，再跑回敵軍去，他們摸到陳銳霆的屋子裏，用刀猛捅陳幾刀，陳的腸子都出來了，這幾個傢伙說：「用電筒照照，看死了沒有？」陳急中生智，把肚子上的血，立即抹到臉上，摒住呼吸，敵人一照認為陳死了，就帶一些人跑了。

彭雪楓得知消息後，立即派胡敏去搶救，胡敏去後，立即將陳的腸子推回腹部，嚴嚴實實包紮好，胡敏又去檢查頭部，祇見滿臉血，沒有傷口，陳銳霆用微弱的聲音說：「頭部沒傷。」胡敏叫來擔架，親自壓住陳的腹部把他抬上擔架。經過一段治療陳銳霆恢復了健康，胡敏為此也受到立功表揚。陳銳霆是個非常講情義的人，一直到建國後，祇要見到胡敏，必稱胡為救命恩人。尤其是我們被打倒之後，不論在什麼環境，他見到胡敏仍稱胡是救命恩人，這真是難能可貴。

搶救劉瑞龍。一九四二年有一天，彭雪楓接到告急報告說：劉瑞龍主任（淮北行政公署主任，解放後是農業部副部長），因工作過度勞累，暈倒了，要趕快去搶救。因胡敏出診去了，彭雪楓找不到胡敏，很是著急，就叫警衛員先備好三匹馬，胡敏剛回到司令部去見彭雪楓，彭的警衛員一把把胡敏抱到備好的馬上，策馬飛奔淮北行政主任公署。彭在馬上著急的對胡敏喊：「你到哪去了嘛？！我們要去救劉主任，劉主任啊！」胡敏到後就給劉瑞龍嘴對嘴的做人工呼吸，掐上嘴唇的人中部位，並打了強心針，慢慢劉瑞龍甦醒了……。彭雪楓的臉上立即轉陰為喜。

在回去的路上，胡敏體力不支，下馬請彭雪楓先走，自己靠到一棵樹下喘粗氣，這時彭才想起胡敏已經是有身孕的人，彭感動地說：「哎喲，你胡醫生是個真正的布爾什維克，是我們的模範共產黨員。」當時，正值中秋節前夕，彭雪楓專門給胡敏送了兩塊月餅。

在四師的評功大會上，胡敏被評為模範共產黨員，彭雪楓專門在獎給胡敏的日記本上題詞——「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送模範共產黨員胡芝敏。彭雪楓」鄧子恢政委題詞是「戒驕戒躁，再接再厲。贈給模範共產黨員胡芝敏。鄧子恢」。

我們回延安時，彭雪楓專門給胡敏贈送照片，鼓勵胡敏努力奮鬥。並說：「我們延安見！」解放後建好軍事博物館時，總政專門來人索取這張珍貴的照片，胡敏痛快地捐贈了。

忍痛拋子。一九四一年，我們的第一個孩子——大女兒出生了。當時是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時期，醫生也很少，孩子剛滿月，胡敏毅然地把孩子送到老鄉家寄養。彭雪楓知道此事後甚為感動，他握著胡敏的手說：「我佩服你的革命精神！」我們四二年回延安時，組織上不讓帶孩子走，實際上也見不到孩子了，因為四師的師部已轉移，我們離孩子的寄養地已經很遠了，臨走前她不能去看孩子，自己哭了一夜，她畢竟是一個祇有二十一歲的年輕母親。全國解放後，部隊打到廣西，胡敏千里迢迢去尋找女兒，不料女兒早已病故。房東老鄉對胡敏說：「孩子臨死前，我對她說，我不是你親媽，你親媽是個當兵的，孩子點點頭就合眼了。」胡敏悲痛欲絕，當即昏了過去，醒來以後，她一直喃喃地說：「孩子連個名字也沒有起就死了，真對不起孩子。」我聽到胡敏的話，心裏也很難過。

因為胡敏是個醫生，在戰爭年代每天忙於工作，晚上還要照顧孩子，是非常辛苦的。一九四六年在承德，胡敏因工作勞累發高燒，沒有見效的藥，正好有孩子要出生，胡敏竟自己給自己打了一針獸用的盤尼西林，撐著病身子去給戰友接生。這一針可嚴重地損害了她的身體。

一九五五年胡敏榮獲三級「獨立自由」勳章和「三級解放」勳章。

解放後她仍然積極工作，努力奮鬥，幾十年如一日，兢兢業業地工作，沒有休過一次假。在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二年三年自然災害、國家經濟困難時期，胡敏經常下部隊，走到哪裏都要做憶苦思甜的報告，鼓勵青年人艱苦奮鬥，積極向上。六五年，胡敏主動響應中央的號召到寧夏農村搞四清，一直和貧下中農「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

胡敏就是這麼一個好同志。在「九一三」之後，因為我的關係，也被打倒，關押了八年之久。還送到勞改農場去監督勞動三年，最後「三開除」（開除黨籍，開除軍籍，開除公職），每月祇發三十元生活費，歷盡艱辛困苦。就是在這麼含辛茹苦的日子裏，胡敏在農場還常常在晚上給群眾治病，贏得了群眾尊敬和愛戴。

一九八一年，經解放軍紀委書記黃克誠的關懷，對黃、吳、李、邱的夫人落實政策，黃、吳、李的夫人都較為順利地恢復了黨籍。總後黨委也擬同意給胡敏恢復黨籍，總後政治部也給胡敏談了話。但總後專案組和總後司令部把持復查工作的造反派（胡敏在總後司令部辦公室任主任），極力阻撓給胡敏恢復黨籍，經常指著胡敏的鼻子訓斥，非叫她承認



一九四五年，胡敏（左）與當年在西安地下領導下參加革命活動時的戰友在延安重逢。



一九五二年，胡敏在廣州任軍區總醫院小兒科主任。



一九四八年冬，胡敏與



一九六〇年，胡敏任解放軍通信兵部衛生處長。



一九六三年，胡敏在總後方醫院。



胡敏晚年。

第八章 參加七大

在中央黨校學習

一九四四年四月間，我開始進中央黨校二部學習。二部主任張鼎丞，副主任安子文。在二部是在十六支部學習，大約幾個月的時間就搬到一部去了，搬到一部就編入華中七大代表團學習了。

我到十六支部後，就是支部負責人之一。黨校的部以下就是支部，支部是黨政合一的組織，支部統管一切。二部就有十六個支部，我們是二部最後一個支部。這個支部的學員，大體上是敵後各根據地來的幹部，中央機關來的幹部和高級幹部的老婆，各佔三分之一。毛主席兩個弟弟毛澤民、毛澤潭的媳婦錢希鈞、賀怡都在十六支學習。邵式平、張鼎丞、陳賡、賴傳珠等等的老婆也在十六支學習。十六支別稱「新聞支部」，其意是知道的消息很多。在十六支可以聽到很多在別處聽不到的事。無論是中央的大新聞，延安各個機關的「小」新聞，甚至某些高級幹部的桃色新聞都應有盡有。在十六支學習的女同志，她們的臉皮比男同志還厚，沒有她們說不出口的話。

黨校學員的生活很簡單，在學習方面，沒有教員，也沒有書本，幾乎每天都在「自學」。每天下午一開始討論，三、五成群的在一起吹牛皮，這是最愉快的事了，學習、生活上都是輕鬆自由的。

正是因為這樣，所以學習生活又是豐富多彩的。學員的典型事例多得不可勝數。陳賡在軍隊幹部中很有威望，傳奇很多又充滿英雄氣概，他的老婆傅涯又在十六支學習，大家對他的談論也就最多的了。

陳賡交白卷。一九四四年入黨校學習的人，都要經過文化測驗，以做編班的根據。

一天，我按照校部的通知，到食堂去參加文化測驗。陳賡坐在頭排的中間，我坐在第三排。我一進考場就看到了陳賡坐在那裏，手裏拿著一支鉛筆，慢慢地在桌子上輕輕的敲著，我從來也沒有看見過這樣的大官參加文化測驗。

主持測驗的人剛發完測驗卷，還沒回到自己的坐位上，陳賡就交卷了。陳賡交卷時，還說了一句帶有「拜」的什麼話。事後才知道，他說的一句英語，是再見的意思。主持測驗的人，看到陳賡是交的白卷，有一個人就趕到門口去大聲叫：「陳賡同志，你為什麼不測驗就走了？回來參加測驗後再走！」陳賡還是用英語說了一句「拜」，就揚長而去了。

測驗卷的內容是什麼？我都記不全了。現在還記得兩條：一是我們黨取得勝利的三大法寶是什麼？二是我們國家最後的五個朝代叫什麼名稱？這兩條我都回答出來了。其餘的條文，我知道的也回答了。

陳賡交了白卷，他見人就說，大家聽了，也總是哈哈大笑。事情也巧得很，自從陳賡交了白卷之後，進黨校學習的人，再也不要參加什麼文化測驗了。後來進校學習的人，也都感謝陳賡的白卷交得好，為大家反掉了一個進中央黨校的「關卡」。

陳賡背老婆過河。陳賡在黨校一部學習，他的老婆傅涯在二部學習。一部和二部隔著一條延河，延河在秋冬之交時，常常發水，膽小的人則不敢徒涉。黨校在延河上架了簡易的水面橋。並且還是獨木橋。稍微發點水就不能行人了。一個星期六，陳賡在河邊上叫傅涯去過週末。傅涯回答：「水大過不了河，不回去了。」陳賡就說：「你下來，我背你過河。」傅涯和同房的四個人都是一部的家屬，她們都一起下去了，四個女人走到河邊，陳賡果然把她們都背過去了。

陳賡背老婆過河的事很多人看到了，笑聲話語多得很。這件事也傳到毛主席那裏去了，為此主席對黨校有批評，這才引起了黨校的注意。於是，黨校在三天之內，就把原來的老橋改造了，一般的水情也照樣可以行人了。陳賡背老婆過河的佳話，在延安城都傳頌開了，大家都異口同聲地讚揚陳賡！

陳賡反霸道。中央黨校副校長彭真有個秘書，大家都叫他小秘書。有一次大家一起把那個小秘書如何霸道的事實同陳賡說了。他聽大家說了之後，祇說了一句話：「那個小秘書會吃人！」

正巧，當天晚上黨校禮堂有文藝演出，黨校一、二、三、四部都發了票。但票上沒有坐位號數。演出之前，小秘書把前五排正當中的凳子都放倒了，意思是這些座位留給黨校負責人坐的。

陳賡走進禮堂時，正好有四部來了好多學員，沒有地方坐了。陳賡就帶著他們到放倒的凳子那裏，並笑著說：「這裏沒有人坐了，你們就坐在這裏。」

不久，小秘書領著校部的負責人彭真、黃火青等和他們的家屬來看演出了。小秘書一進門看到留下的坐位，別人已經坐了。他立即跑出門外去同正要進場的彭真等人說明了情況，要他們等一下再進場。小秘書又進場來，就指著坐在留下的位置上的人說：「你們是哪個部的？這是給負責人坐的位置，你們立即讓出來！」坐在那裏的人，既不動也不說話。

正在吵的時候，從外面進來一個警衛員同小秘書說：「秘書長（黃火青）叫不要吵。他們都回去了，不看了。」那位小秘書也跟著出去了。

事後，小秘書很快就知道四部學員佔坐位的事，是陳賡「搗的鬼」，他要把管閒事的人整一下。第二天，小秘書就在禮堂門口出了一張告示，主要內容是兩條：一條是罵管閒事的人是「哥爾洛夫」（據說是蘇聯的戲劇名稱，可能是指擺資格的人），一條是警告：管閒事的人「不要多管事」。陳賡看到告示之後，一句話也沒有說就走了。

第二天，晚上演出繼續進行，禮堂前面倒下坐位凳子的情況也同前一天一樣。陳賡晚飯後手持一條棍子，站在禮堂門口等小秘書的到來。那位小秘書果然大搖大擺地來了。陳賡看到小秘書，開口就問：「禮堂前面昨天和今天倒下那些凳子是你幹的嗎？」

小秘書：「是我幹的。怎麼樣？」

陳賡：「不怎麼樣，我們到副校長那裏講理去！」陳說完後就伸出手去拉那位小秘書。小秘書便跑到禮堂出門的地方，站下來又說：「我們要多少坐位，你管得著嗎？找副校長講理，我不怕！」

陳賡這一下火了，小秘書看到陳賡火氣很大怕真挨打，他就跑出大門，向山上彭真、黃火青入住的地方走去了。小秘書還邊走邊說：「管閒事管到我們這裏來了。」

此時陳賡火氣更大了，他跟著小秘書的後面攆去了，小秘書一頭鑽進彭真宿舍去了。陳也跟著攆進去了。陳賡一進彭真宿舍的外間，立即

指桑罵槐地說：「七大還沒有開，中央委員還沒有選，就擺那樣大的架子。每次演戲都要留幾十個坐位，把你們祖宗三代都叫來，也用不著那樣多的位子。整風光整別人，對你們自己整到那裏去了？」彭真聽了陳賡的話之後，就知道陳為什麼發火了。第二天的下午，彭真親自召開和主持全校支部書記會議。在會上彭真宣佈：「某秘書工作作風不好，現在宣佈決定撤消其秘書的職務。」會議祇開了半小時就散會了。

彭真宣佈撤職其秘書之後，一部的人看到陳賡，都向他翹起大拇指！凡是七大代表都向他表示：我一定在你的名字上面劃上一圓圓的大圈！陳賡對讚揚的人除了有時說一句：「亂彈琴」之外，對多數人都是以微笑作回答。陳賡在幹部中，特別是在老幹部中威信是很高的。他祇要看到的事，例如：新從敵後來的人，進不了一部的大門，在中央醫院看不上病，家屬來一部吃不上飯等等，陳賡司令員都管，而且能夠管到實處。

整風與七大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我出席了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六月十一日七大閉幕，會議開了五十天，記得開了二十次全體會議。七大正式代表五百四十七人，候補代表二百零八人，共計為七百五十五人。代表黨員一百二十一萬人。我們黨在七次大會時，已經成為一個強大的黨了。七大有八個代表團（中直、軍直代表團，陝甘寧邊區代表團，晉綏代表團，晉察冀代表團，晉冀魯豫代表團，山東代表團，華中代表團，大後方代表團），我在華中代表團。

記得七大開幕式是任弼時主持的，他有很精彩的開場白：「中國人民感覺到祇有共產黨把他們從痛苦中拯救出來，他們把我們的黨看作是驚濤駭浪中的舵手，他們把希望寄托在我們黨身上，寄托在我們黨的領袖毛澤東同志身上。在二十四年的奮鬥過程中，我們黨已經產生了自己的領袖毛澤東同志，毛澤東同志的思想已經掌握了廣大的人民群眾，成為不可戰勝的力量，毛澤東同志已經成為中國人民的旗幟。」在開幕式上，毛主席作了《論聯合政府》的報告。報告總結了我黨二十四年的革命經驗，分析了國內國際形勢，提出了今後黨的任務和方針政策。這個報告對全黨是極大的鼓舞。後來幾天，朱總司令作了《論解放區戰場》的軍事

報告，劉少奇作了修改黨章的報告，周恩來副主席作了關於統一戰線的報告。

記得七大一結束，當時的黨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就發表了社論，稱七大是中國共產黨有史以來以來最盛大的最完美的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確，七大確立了毛澤東思想為全黨的指導思想，用毛澤東思想武裝和統一了全黨，使全黨達到了空前的團結，這表明我們黨已經走向成熟。毛澤東同志在開幕式上的《論聯合政府》和閉幕式上的《愚公移山》兩篇偉大的報告，武裝了全黨的頭腦，為建立新中國準備了條件。七大的確是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

以我的政治經歷來看，七大代表在歷史上是榮譽最高。當時，爭當七大代表的風氣簡直籠罩了整個延安城。

第一，對自己沒有當上七大代表發洩不滿。有些人向中央領導人和各抗日根據地的領導人寫信，那些信是罵人為目的。華中有幾個幹部聯名寫信給華中代表團團長陳毅，這封信就充分反映了這種情緒。陳老總是個胸懷很廣的人，他把這封信在華中代表團公佈了，信的主要內容還記得一些，比如指責陳毅看不起工農幹部，說：你現在喜歡的是所謂的知識分子，對工農幹部根本不放在眼裏。你還記得吧，你上井岡山時，同毛主席，朱總司令下山去接你的是誰？殺豬歡迎你的又是誰？後來在你指揮下打仗流血的又是誰？我們這些人都沒有用了嗎？你常常說，知識分子是革命的，沒有知識分子革命就不能成功。這些話就算你說的是對的，那麼，你為什麼不說，工農幹部也是革命的，沒有工農幹部革命也是不能成功的。

第二，決心討飯的。有個三軍團參加平江暴動的 xxx 當不上七大代表就給彭德懷寫信說：我下決心討飯，去丟共產黨的臉。我是跟著你從平江暴動出來的，現在連個七大代表都當不上，我沒有前途了。爲了此事，彭德懷大罵他一頓後，又苦心做工作，才把要討飯的人教育好了，沒有產生不良影響。

第三，要求退黨。沒有當上七大代表就要求退黨的，不是個別的人，這些人多數是四方面軍的幹部。他們向劉伯承司令寫信說：你是我們的領頭人，現在向你說點心裏話。我們打仗不比別人差，但我們抗戰以來不能當指揮官，祇能當管理科長了。現在要開七大了，我們四方面

軍的幹部，祇有爲數不多的代表，也就是裝點門面的代表，我們祇有要求退黨。這是非常消沉的情緒，在七大之後，中央對四方面軍幹部的任用，提起了注意。

第四，要棺材費。沒有當上七大代表的人思想，真是無奇不有，要棺材費的人也有。有五個人聯名向朱德寫了這樣一封信。他們信上說：「我們參加革命十多年了，現在除了身上的傷疤之外，其餘一無所有。我們要求回家種田，臨走時要求發給一副棺材錢就很好了。」這種人的情緒，比要求退黨的人還消沉。沒有當上七大代表的人的思想表現，確實是複雜的。這也可以看出，當時黨內的思想複雜了。

黨的七大是在黨的整風運動中取得成功的基礎上召開的。七大的勝利召開與整風的成功是緊密聯繫在一起的。

我是一九四四年的四月才到達黨校的，整風運動已基本結束，我對整風運動的情況，是在四四年下半年，學習兩條路線時才接觸的。周恩來在我們華中代表團做了報告，對我學習兩條路線起了重要作用。華中代表團絕大多數都是在整風快結束的晚期到達延安的，沒有參加整風學習。爲使全體代表受到整風教育，陳毅團長特請周恩來向代表團作報告。

一九四四年七月一日周恩來在華中代表團對整風的問題做了長篇報告。以我的回憶，周恩來講了五個問題，這五個問題，我祇對後兩個問題還記得起來一些。他說：我們黨走上武裝鬥爭的道路之後，我犯了兩次路線錯誤。一次是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左傾路線錯誤，一次是抗日戰爭時期的右傾投降路線的錯誤。這兩次路線錯誤都使黨遭受了重大的損失。在左傾路線錯誤時期，蘇區的工作損失幾乎百分之九十；在右傾路線錯誤時期，發生了皖南事變。對這兩次錯誤路線都是毛主席親自領導糾正的，才使我黨能夠勝利向前發展。兩次路線錯誤，我都負有重要責任，是錯誤路線的決策者之一。他又說：這次整風運動，從開始毛主席就提出了總的目的就是要解決路線問題，毛主席提出的路線就是馬列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沒有這樣一條路線，中國革命就不能成功。我們過去所以犯錯誤，所以失敗，最主要的是犯教條主義，把馬列主義當成了教條，這不是馬列主義的過錯，而是教條主義的過錯。馬列主義同實踐相結合，祇記得書本上的話是一點用也沒有的，依靠它來制定路線就一定失敗。我們黨內教條主義者的錯誤，是反馬列主義

的錯誤。周說：毛主席提出的整風的方針，是搞通思想，團結同志。不搞通思想團結不起來，我們的團結是在思想一致的基本上的團結。毛主席說過，張國燾要是自己不逃跑，思想又通了，我們還會團結他的。在整風中，換幾個人容易，但沒有什麼用，還是團結不起來。祇有思想一致的團結，才是真正的團結。周恩來說：在整風運動中，毛主席提出了「思想入黨」的問題。什麼叫做思想入黨？周恩來的認識是（大意）：一，入黨爲公；二，堅持實事求是；三，遵守紀律；四，服從領導。他說：在整風中，毛主席幫助了我，救了我。我對不起毛主席，毛主席十分對得起我。我怎樣報答毛主席的恩情？我的決心是：永遠在毛主席領導下工作，永遠服從毛主席的領導，永遠當毛主席的學生。我的話能說到就能做到！周恩來的講話是在熱烈掌聲中結束的。

會場集錦

七大是在延安楊家嶺中央禮堂舉行。中央禮堂是爲開七大建造的，祇能容納七百至八百人。我們坐的帶有靠背的條凳，覺得坐得很緊的。

第一，大會的氣氛。在我的記憶裏，大會整個的氣氛是親切、熱烈、融洽、自然。我連續參加過黨的七次，八次，九次大會，使人記憶猶新的還是七次大會。

七大代表極大部分都住黨校一部。一部到楊家嶺會場約五百米遠，我們去回都是走路的，代表們在往返途中和食堂裏，都是有說有笑的，我當時還祇有三十歲出頭，我們有幾個籃球朋友，每天下午都是打球，再到食堂去吃飯。

在會場上，我多次看到周恩來、朱德、李富春等人，在開會之前都在會場上同代表隨便閒談。我也同周恩來、李富春閒談過，他們並且還約我在楊家嶺小食堂吃過兩次飯。有一天，我們幾個人看到了毛主席的機要秘書葉子龍，我們向他提出要去棗園看看毛主席。在我們提出之後的第三天，我就得到了去棗園的通知。我們一起到達的有我和白如冰、孔石泉、陳光（長征時期毛主席擔架班的班長，他當時在黨校五部學習）。我們四個人一起同毛主席共進午餐。毛主席首先舉杯說：「歡迎大家，乾一杯！」然後，毛主席又拿著酒瓶，走到我們每個人的面前，給我

們每個人都斟了一杯酒，並且說：「你們在敵人的後方鬥爭，很辛苦，敬你一杯酒！」江青來見了一面，但沒有同我們一起吃飯。

在餐桌上，毛主席除了問問敵後的鬥爭情況之外，主要說了開會的問題。主席說：「我們這次會議，可能開成一個成功的大會。但現在祇成功一半，大會可以制定出一條正確的政治路線，還有一半就是選出一個好的中央來，這就叫做組織路線。祇有正確的政治路線，沒有正確的組織路線，我們的鬥爭還是不能成功的。」稍後，毛主席又說：「在會場上有股議論說，犯過路線錯誤的人，不能當中央委員。這種思想是不對的。我們如果不選犯過路線錯誤的人當中央委員，就要輪到我們犯錯誤了。我們大家都要做說服工作，要選犯過路線錯誤的人進中央委員會。」

第二，討論毛主席的政治報告。毛主席《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是寫好了文稿照念的。對這個報告都是一致擁護的，這是對毛主席的信任和擁護。我參加革命之後，隨著政治思想水平的發展，我向來就是信任和擁護毛主席的。就是「九一三」我下臺之後，我仍然是信任和擁護毛主席的。信任和擁護毛主席與能夠看到毛主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是不矛盾的，關鍵是我們怎麼看待這些缺點和錯誤。

在我們代表團討論毛主席的報告時，有位代表發言說：「我看聯合政府不好。我們陝甘寧邊區已經是三三制政府，再把國民黨請進來，就成了四四制了。」他發言之後，會場上略有笑聲。陳毅立即站起來說：「這位代表能夠把自己的意見說出來很好！我們就要這樣討論。毛主席提的聯合政府是我們國家的政體，也就是政府的組織形式問題。」陳的積極解釋，又加深了對問題的理解。我們代表團中代表的水平是相差很遠的。從職務上來說，有高級幹部，有普通幹部。老實說，對聯合政府的理解，我當時也是說不清楚的。

另外，在討論到除奸政策時，有位代表發言說：「除奸要十分穩重是完全正確的，左傾教條宗派在江西蘇區殺人太多了。」他這一句話震動了全場。不少代表接著說：「殺人多，殺得慘，把許多好幹部都殺掉了！」有的代表說：「在內戰時期，老根據地的人口減少了近百分之二十。人哪裏去了，戰爭犧牲是主要的，但我們自己殺了不少自己的好同志。共產黨殺的甚至比國民黨殺的還要多。許多好幹部都是自己殺的呀。我們對鄧發的肅反政策很憤怒！」

全場還正在發言的時候，當時就有幾處哭開了，有的還大聲邊哭邊述說。對保衛局殺人的事，絕大多數人都可以說出最殘酷的例子來。例如，有位代表說：「一九三四年秋，我們三軍九師部隊有個連長，上午打仗負了重傷，腿打斷了，不能行走。可是晚上就把那位連長拉去殺了。因為腿斷了不能走，硬是兩人拖出去殺了。」這個例子，真刺動了人心。全場呈現出哭的、擦眼淚的悲慘景象。

對殺人的問題，有的代表大聲疾呼地說：「我們要求追查鄧發的責任！」他的話音一落，全場此起彼伏的發出「同意」的聲音。會議結束時，陳毅也以沉痛的心情說：「我們今天的會提出了對過去殺人的問題。這是一個重大問題，代表團一定向大會主席團報告。」平時散會時，大家都是很活躍的，今天多數人都心情沉重地走出會場。

過了兩天，毛主席親自到我們代表團來講過一次話，毛主席指示說：一，被錯殺了的人大都是好同志，我們悼念他們；二，那些同志都是烈士，將來革命成功時，我們應在當地為他們恢復名義，並以烈士對待；三，肅反問題是錯誤的，是路線問題，不是某個人的問題，大家不要提出追查鄧發的責任問題。聽了毛主席的講話，大家沒有再提出新的意見。

第三，大會發言。在大會上發言的人很多，當時的中央領導人，各根據地的負責人都在大會上發了言。有做專門工作的幹部也在大會上發了言，如當時的中央機要科長李質忠就在大會上發了言。在許多人的發言中，林彪、劉伯承、李富春、周恩來等四人的發言，對我的印象最為深刻。

林彪的發言。他的發言的中心內容講的是根據地建設和群眾觀點，歸根到底講的是群眾路線問題。他說，我們一切工作的起點和歸宿點都要為了群眾的利益著想，這才是真正的群眾路線。我們在工作中，不管存在多少問題，其中要害的一定是有違背了群眾的利益的。這是我們必須十分注意和用大力糾正的問題。

群眾利益是很現實的問題。離開當前的利益，專講看不到的遙遠的利益是不行的。我們應該盡可能的做到當前利益與遙遠利益結合起來。他說，在報紙上看到一個根據地，組織民兵放哨，同生產結合在一起，這就把當前利益同將來利益結合在一起了，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我們應當把對敵鬥爭和生產鬥爭緊密結合起來。

軍隊戰士有無當前和將來利益的問題呢？有的。我們打仗當然是人民將來的利益，因為推翻反動統治，是要經過長期打仗才能達到目的。但我們在戰鬥中，減少傷亡就是當前利益了。現在有不少部隊搞軍事民主，並且搞的很好，這就是同戰士的當前利益緊密結合起來了。戰士們知道打仗是會有犧牲的，但他們也懂得，「消滅敵人，保存自己」是可以辦得到的。這就是軍事民主的基礎。其實，群眾基礎說到底就是群眾利益的問題。

林總在會上就講到學習毛主席著作的問題，記得他講到：我們要學習馬列主義，主要就是學習毛主席的著作，毛主席的著作都是馬列主義。

林彪是軍事家，打仗的人，專講群眾路線，這實在是很引人注意的問題。他在發言的時候，不僅臺下的人專心致志地盡心聽他講，臺上的毛主席也聽得很入神，不斷地發出讚賞的笑聲，待講完時還拍了手。

劉伯承的發言。他的發言是專講「百團大戰」的問題。他說，百團大戰在軍事上沒有取得很大的勝利，或者說是得失相等。在政治上吃了大虧。保護了國民黨，暴露了自己，招來了日本帝國主義的大掃蕩。

他說，毛主席對敵後鬥爭的方針，在政治上是發動群眾，佔領地盤；在軍事上是開展遊擊戰爭，不放棄有利條件下的運動戰。總起來說，就是擴大力量，準備反攻。百團大戰是違背了這一方針的。

他又說，國民黨是反共第一，抗戰第二。我們打百團大戰，吸引了日本帝國主義把更大的力量對到我們自己身上，國民黨的壓力反而小了，他的反共氣焰更高了。

李富春的發言。他的中心內容是什麼，我可記不起來了。不過他在發言中，說了一個「候補」的比喻語，則引起了全場大笑。

他說，他在六次大會，被補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這是「屁股上插黨參——後（候）補」。他講這句話時，還一字一板的講的清清楚楚。他的話引起了滿堂大笑，臺上的毛主席也笑出淚水來了，一個勁地用袖子在眼睛上擦。

李富春同志向來同群眾的關係很好，他講話又很幽默，大家都願意聽。他講的「候補」的故事，後來廣為流傳。這是大家都喜愛的一則政治笑話。

周恩來的發言。他的發言的基調，同他在華中代表團的報告基本上是
是一致的，態度是十分嚴肅認真的。

他說到王明的教條宗派，對黨造成了嚴重的損失的時候，他流了
淚，一時說不出話來。他這種嚴肅的認真的態度，贏得了全場的熱烈讚
揚！

他是最後說了三個永遠：「永遠在毛主席領導下工作，永遠服從毛主
席的領導，永遠當毛主席的學生。我的話是說得到應當做得到！」他的話
有很深的教育意義，也取得了大會對他的更大的信任。在七大之後，周
恩來就幫助毛主席進行複雜的統一戰線工作和指揮全國解放戰爭。

選舉與閉幕

選舉在七大是很活躍的一個階段，發生過令人難忘的故事。

對候選人的審查。七大中央委員會地的選舉是先由主席團提出候
選名單，交由各代表團逐個反覆進行審查，在正式選舉之前，再由主席
團提出新的候選人名單。當時實行黨內民主還是很認真的。如曾鏡冰，
是在討論中由代表提出來的，曾鏡冰七大代表都不是，也沒有特殊的功
勞，他被選為七大的中央候補委員。解放後此人在福建，後來被冤枉了。

主席團最後提出的候選名單，同代表團提出的名單差別是很大的，
名單基本上是由主席團最後審定的。當時對王明的教條宗派主義，大多
數人從路線的高度來認識是並非很深刻，但對他們脫離群眾的作風是特
別痛恨的。尤其對王明的官架子和王稼祥的訓人、罵人的壞作風特別痛
恨。王明，王稼祥兩人在華中代表團是始終沒有通過的。

七大的正式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分兩次選舉。同時在選舉之前，還
通過了正式委員落選的人，選候補委員時再選。

由於兩王落選了，毛主席的心情很不安。他在選舉結束就對大會發
表了講話。主席說：王明，王稼祥同志落選了按照我們黨章的規定是正
常的，但我還是要說點意見。他們是犯有錯誤的，但還是要叫他們到中
央委員會來。這不是少了他們兩人不行，而是革命的事業需要他們進中
央委員會。我建議大會要延長兩天才閉幕，我們主席團還要討論再選王
明、王稼祥的問題。

毛主席除了在大會上講話之外，第二天還到我們代表團來講話（據說，毛主席到所有代表團講過話）。毛主席在代表團的講話是既嚴肅又有感情。毛主席很嚴肅地提出了：「選王明和王稼祥同志進中央委員會，是黨的利益、革命事業、黨的團結的需要，不選他們對各個方面都是不利的。他們犯過錯誤，但他們可以改正錯誤。我們不選他們就要輪到我們犯錯誤了。他們兩個都是好同志，我要求大家仍選他們兩個進中央委員會！」毛主席在講到王稼祥時，是很中肯的，他說：「大家知道遵義會議對中國革命是關鍵的會議，如果沒有張聞天、王稼祥從第三次左傾路線中分化出來，站在正確的立場上，遵義會議不會開成功，我們不要忘記他們。」我們代表團一致同意毛主席的指示，保證選王明、王稼祥進中央委員會。

第二次選舉開始之前，毛主席又在大會上講了話。他講話的內容，同在代表團講話的內容大致差不多，但對「選王明、王稼祥進中央委員會」則以宏亮的聲音連著講了兩遍，並說：「我要求大家選他們倆進中央委員會。」說完之後還向大家連連招手。第二次選舉，王明、王稼祥都當選了。王明為正式中央委員，王稼祥為中央候補委員。七大共選出中央委員四十四名，中央候補委員三十三名。李富春和蔡暢雙雙選為中央委員，我很高興，散會時我去和富春同志握了手。

閉幕式。七大專門舉行了閉幕式，毛主席向大會致了閉幕詞。同開幕式的政治報告一樣的，也是照稿子念的。毛主席在開幕式的《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及《愚公移山》的閉幕詞，這兩個報告都很好，鼓舞人心，激動人心，充滿勝利信心。

毛主席的閉幕詞，講「愚公移山」故事的情況時，口氣還比較平穩，但一講到「我們不怕敵人！東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我們一定勝利！」此時，口氣就很大，感情豐富，頭上的筋都鼓起來了。這是勝利的宣誓！當時，還沒有經久不息熱烈鼓掌的習慣，但我記得會場上也有掌聲，也有叫聲，也有站起來說話擁護的，全場上熱烈氣氛幾乎到了就要沸騰的程度！我個人的心情是難於形容的，坐立都不是！大會在國際歌聲中勝利閉幕！

閉幕之後，接著就是全體代表合影。大家都非常喜氣、高興地參加了照像。在照像的過程中，同陳賡開玩笑算是最精彩的了。陳賡當選為

http://book.sinozi.com

候補中央委員之後，幾天以來同他開玩笑的人很多，大家都叫他「屁股上插黨參」或「候補」。照像那次算是最熱鬧的了，不少人，有的拿一支小棍子，有的拿一塊小石頭，有的乾脆用手向陳賡的屁股頭插去，並且還邊說：「來，再給你補一下！」搞得陳賡招架不住。他爲了避免「災難」，他就有意向毛主席、朱總司令、周恩來等人附近靠近。毛主席知道大家同陳賡開玩笑，他也笑起來了，並且說：「這是富春同志的發明！」

打回老家去

七大之後不久，大約是六月就開始選調南下工作的幹部。

一天，我被通知去中央組織部開會，參加會議的有邵式平、張鼎丞等人。在會上，邵式平把我向彭真做了介紹，他點頭說：「名字早知道，富春同志曾要他來中黨校做副秘書長。」彭真看了我一眼又說：「現在就不是做副秘書長了，要去做更重要的工作。」

會議開始後，彭真首先傳達了毛主席的指示。他說：毛主席決定要向南方發展，這是對抗日戰爭正確路線新的發展。過去我們祇強調了深入日本佔領區的敵後這是對的，但又不全面，現在要向另一個敵後，即國民黨佔領區的敵後，這就全面了。國民黨佔領區就全國來說，湘、鄂、贛是國民黨的薄弱環節。日本人的勢力也不雄厚。蔣經國在贛南能夠站住，我們也一定能站住！我們黨內，過去有些人（指王明等人）怕得罪蔣介石，不敢到他的「家裏」去搞革命，吃了大虧。現在這些人都改變了認識，糾正了錯誤，我們的事就好辦了。我們祇要堅定地不怕日本人，不怕國民黨，我們就一定勝利！中央已經決定，由陳毅同志率數百名團以上幹部，其中要有相當數量的高級幹部，向南方發展，恢復湘、鄂、贛、閩四省蘇區老根據地，南方會成爲大的革命根據地。

彭真最後說：選調南下幹部，由中央組織部負責，今天在座的同志都是辦事人。我們不建立什麼組織形式，定期開會就是了。

經過三個多月的工作後，南下工作幹部團終於組成了。

一九四五年八月底或九月初，中央領導人毛主席、朱總司令、彭真、康生等四人，在毛主席的住地棗園接見了南下幹部中的十餘名代表，接見時陳毅也在座。接見的氣氛自始至終都是感人的，整個接見可以歸納爲四個字：親切、莊重。我們一進接見室，中央辦公廳給每人發了

一個很精巧的本子，毛主席、朱總司預先在本子上題了詞。毛主席的題詞是：「不怕敵人，一定勝利。」另外，在接見廳的桌子上，放著一個比較大的本子，每個被接見的人都要自己親筆在本子上寫上自己的姓名、年齡、籍貫。再就是，除被接見的全體人員合影之外，每人都要同毛主席，朱總站在一起分別合影一張。

我同毛主席照像時，主席還拉著我的手說：「興國佬，要打回老家去了！」

接見事項完成之後，毛主席發表了簡短的講話，講的主要內容是不怕敵人。毛主席說：敵人沒有什麼可怕的。你不怕他，他就怕你。在坐的各位同志，開始搞革命的時候，連槍都沒有，也不怕敵人。現在我們有部隊，有根據地，有槍，還會打仗，對敵人還有什麼可怕的呢？現在國民黨的力量是強大的，但也沒有什麼可怕的。你們到南方去，要準備在「豆腐格子裏」（根據地被分割成一塊一塊的）戰鬥和生活。即使出現這樣的情況，也比在山上的樹林子生活好多了。預祝同志們勝利！在吃飯的時候，毛主席、朱德、彭真、康生向大家祝酒。

一九四五年九月底，我們南下幹部團第三團在團長邵式平率領下，從延安出發了。經陝西綏德、佳縣到達晉西北的汾河邊之後，中央突然命令轉為到東北去。我們從南下轉為北上了。

第九章 「我們的八縱」

戰鬥在熱河

一九四五年九月，我們南下幹部團在南下的途中，即到了山西臨縣的汾河白崖，中央突然命令全部改為去東北。後來，我們轉道張家口、古北口，於四五年底到達了熱河省首府承德市。

日本投降後，中央以熱河為中心設立了冀察熱遼中央分局並屬晉察冀中央局領導。我們到達承德之後，分局不讓我們的幹部團去東北，留

下分配工作。除了少數幹部自己到東北去了之外，大部分都留在熱河。

一九四六年四月間，北平軍調執行部秘書長李克農知道我在熱河，即電請分局要我到北平去工作。我到北平之後，任執行部機關黨委副書記（李是書記）兼人事組組長，由於形勢變化，準備打內戰，七月間離開執行部仍回熱河工作。從此直到四七年冬，我都戰鬥在熱河。



一九四六年在北平軍事調度所

一九四七年七月以熱北、熱中、熱東、熱遼四個分區和原來熱遼縱隊所轄十六、十七、十八三個旅成立了熱遼軍區，黃永勝為司令員，領率機關位於赤峰。熱遼軍區的成立是我黨開始糾正和平思想的產物。

日本投降之後，蔣介石利用中國是戰勝國的地位，就開始從陸路、空中、海上運輸了大量部隊到東北，其中還有相當多的精銳部隊，名為接受日寇的投降，實際上是和共產黨搶地盤。我軍當時相對國民黨軍隊是劣勢，在東北更是劣勢。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熱河的戰略地位顯得特別重要。為了佔據熱河這個關內外的大樞紐部，中央先後由察哈爾調了一個縱隊（趙爾陸縱隊），由晉冀魯豫調了一個主力縱隊（楊得志、蘇振華縱隊），由陝甘寧邊區調了一個主力支隊（黃永勝任司令，張秀山任政委），這個支隊在遼寧的錦州整編為熱遼縱隊。冀東還有四個旅可以成為野戰部隊。以熱河為中心的這個戰略區，當時有數萬部隊。與其他軍區力量比起來，部隊就不算少了。

當時，在冀察熱遼出現和平路線問題，主要是三個問題，（一）怕國民黨的軍力過強；（二）怕地主階級的反動勢力過大；（三）希望和平的心情過切。

當時在冀東的國民黨軍隊是十三軍，其兵力從秦皇島起，沿著長城一直伸到了承德及其以北的隆化、圍場；蔣介石從雲南調來一個軍，從錦州起，沿承錦線，一直伸到了赤峰。敵人完成了戰略佔領之後，主動向我軍進攻很少。敵人在熱河的軍事力量，並不是大到了我們不能與敵打仗的程度，我軍作戰的機會是很多的，但在四七年秋季之前，將近兩年的時間裏，除了進行了一些小的戰鬥之外，沒有進行過大的戰鬥。

四七年春，希望和平從思想上、組織上幾乎都具體化了。在思想上，主要是進行同國民黨共事的宣傳教育。在組織上，冀察熱遼分局和軍區已經決定解散。有的單位，如軍區政治部已經開過解散會議，熱河省政府已經準備同國民黨「同桌共事」了，我們準備爭當省政府主席。省政府共方的廳局長都配備好了。財政廳長（分局財政委員會主任高自立）、鐵路局長（分局副書記兼組織部長吳德）、糧食局長（等待分配工作的邱會作）、民政廳長都是我們的。熱河省的保安司令，內定為軍區的副司令員陳奇涵擔任。



一九四六年在熱河。

此外，軍事力量也大為減少了，一縱隊調回晉察冀大軍區去了，趙爾陸縱隊留了一少部分之外，也調回晉察冀大軍區去了，熱遼縱隊領率機關宣佈撤銷了，熱河祇留下了四個步兵旅和一個騎兵旅，同原有部隊相比，減少了一半以上。從此之後，熱河打仗就更少了，例如，熱遼軍區所轄三個步兵旅，在半年之內，祇有鐵路北的十六旅、十七旅，集中在赤峰以南先後打過一次寧城戰鬥和乃林車站戰鬥。

四六年秋，敵人佔領了承德，

赤峰，熱河的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冀察熱遼分局和軍區撤退到了熱北的林西，熱遼軍區撤消，我調赤峰地委（二十二分區）任地委書記兼分區政治委員，吳烈是分區司令員。

赤峰地委是敵人佔領承德赤峰之後，在原來的熱中、熱北地委之間，新劃出的一個地委，是熱北的前哨。赤峰地委當時所屬的縣份有：赤峰、赤西、圍北（圍場以北）、經棚、烏丹五個縣。部隊有三個騎兵團，一個步兵團，連縣大隊一起，部隊約有二千餘人。我們分區是處在敵人包圍之中，分區所在地的烏丹縣城周圍都是敵人。赤峰、圍場有敵軍，赤西、經棚是土匪窩子。

地委成立的時候，擺在我們面前有三個問題。（一）敵情嚴重；（二）群眾基礎差；（三）在物資上處於無錢、無糧、無衣的情況嚴重，幾乎到了不能生存的程度。在這樣的情況下，糾正和平思想，積極打仗，是當務之急。

分區成立時，軍區發給我們熱河銀行的紙幣三千元，我一文不要全部退回了。因為這些錢等於廢紙，沒有商家要這種紙幣。我向軍區領導程子華說：「上面發的錢解決不了我們什麼問題，我們會立即設法向敵人

要東西。我們估計是能夠要得到的！我們的困難是要敵人給我們『解決』的。」

我們分區成立後，不幾天的時間就派了兩個騎兵連到赤峰的公路上去活動。巧得很，部隊出去的當天晚上就在赤峰東南四十多公里處繳獲敵人一輛運冬裝的汽車，繳獲冬裝近千套。後來，我們就經常派部隊活動於敵後的運輸線上，所需的物資幾乎都可以從敵人手中得到，敵人是我們的運輸隊。我們繳獲的東西祇能運走急需的一部分，大部分的東西，如糧食就不能運走，祇好在當地散發給群眾。這個鬥爭真是一舉三得，打擊了敵人，解決了自己物資上的困難，發動了群眾參加對敵鬥爭。

剿匪作戰是我們最中心的任務。在這個問題上，我們地委、分區同分局和軍區存在著政策上的分歧。分局和軍區的指示是，先剿匪後反霸，基本上不殺人。我們認為剿匪反霸同時進行，對土匪頭子格殺不論。我們的報告分局不予批示，我們則堅決執行。實踐證明：地委和分區的決定是完全正確的。



一九四六年在承德。左起：馬希超、陳奇涵、李資平、黃國山、邱會作、



任赤峰地委書記。

四六年冬，我們擺開陣勢剿匪之初，真是兩眼摸黑，民匪不分，找不到敵人，打不上仗。當時，我軍成了「外來戶」，而土匪倒同群眾在一起。經過短時間的實踐，我們總結了經驗，認識到單純軍事剿匪，是不可能解決問題的，於是，我們就轉變為有重點的駐剿。

有重點的駐剿就是剿匪反霸相結合的具體化。熱河的人民群眾是到了無法生存的地步，極大多數都是吃糠、吃草度日。四六年底，我在烏丹縣的東北地方，就遇到一家人，這家人共為五口三代人，我們到這家人去，叫了半天才開門。媳婦光著全身，用一個高粱桿子做的鍋蓋遮住下身來給我們開門。我們走進房子去之後嚇了一跳！祇看到炕上有四個大人小孩的腦袋而不見身子，仔細一看才知道這就是沒有衣服穿的人，用草灰掩住身子取暖。家裏唯一的一件破棉衣和一條破棉褲，男子穿著出門勞動去了。我們對群眾這種苦難都很同情和心痛，我們去的五人中祇我和另外兩人在棉褲裏套有長單褲，我的棉衣內套有一件單衣。我們三個人立即把長褲和褂子都脫下來送給了他們。我的通信員的馬背上還帶有十幾斤的糧食，也立即拿來贈給了他們。這家老小三代都在炕上的草灰內跪下向我們致謝！我們去的五個人都被感動流淚不止，有的還哭出聲來了。群眾的苦難就是遍地的「乾柴」，祇要火點得好很快就能燒起熊熊大火。

日本侵略者在熱河的統治是十分殘酷的，群眾處在無衣無食的水深火熱之中，但取得了二鬼子地位的保甲長、地主、惡霸、土匪頭等，還是相當富足的。這些人家裏多數都糧食滿倉，牲畜成群。勞苦群眾內心裏求生存鬥爭是十分積極的，我們的駐剿是以反霸分浮財為突破口的，在鬥爭的開始時分糧無人要，煮熟飯則有人來吃，分衣服無人來拿，把衣服送到家去則立即穿上，這種情況是個好兆頭。

反霸分浮財也並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鬥爭，鬥爭必須掌握三個問題（一）打得準；（二）解決群眾迫在眉睫的吃、穿問題；（三）鎮壓與寬大相結合。對打得準的問題和解決群眾生活比較好解決，關鍵是鎮壓與寬大相結合的問題，不鎮壓和亂鎮壓都是錯誤的。在圍場縣以北，在一條十幾里長的溝裏，祇有一家地主霸佔了全川的土地，地主的兒子和兩個土匪頭子是把兄弟，帶領百餘名土匪為非作歹。我們把地主兒子和兩個土匪頭子都抓住了。群眾對我們是既高興又害怕，高興的是把真正的壞人抓住了，害怕的是怕我們不殺那三個人。這三個人的死活，就是爭取群眾的關鍵問題。

我們決定要在充分發動群眾的基礎上處決那三個土匪頭子。開始時群眾白天見到工作組，祇是向工作組作個揖就走了，什麼話也不說，晚上來就不同了，群眾接二連三來找工作組，但也祇做個殺頭的手勢不說話就走了。不久我們張貼出殺那三個人的佈告，群眾的情緒大變，都擁到工作組住地要求殺土匪頭子，群眾發動起來了。這樣我們就召開群眾大會公開處決土匪頭子和分浮財。在十餘里長的一條溝裏住有幾百戶人家，共計千餘人，到會竟達七八百人。處決土匪之後，立即就分浮財，糧食數萬斤，各種衣服千餘件，新農具百餘件，新步槍二十多支，還有機槍兩挺。沒過多久就出現了熱火朝天的群眾鬥爭，祇要群眾一發動起來，剿匪鬥爭也就有勝利的基礎了。有了群眾就沒有土匪的生存之地，因為土匪不躲藏在群眾之中，也失去了生存條件。

群眾發動起來之後，一切問題都好辦了，參加土匪的人自動交槍百餘支，自首的五十餘人。工作組對自首的一律不再追究，並允許他們參加貧農團和其他的群眾組織。反霸鬥爭的勝利，對人民的鼓舞是最大的。由於反霸鬥爭的勝利，軍隊同人民的關係也更加密切了。

八縱成立

一九四七年八月一日，在赤峰美麗河組成東北民主聯軍第八縱隊。

司令員：黃永勝

政治委員：劉道生

副政治委員：邱會作

參謀長：黃鵠顯

政治部主任：邱會作（兼）

政治部主任：林忠照

八縱機關就是原熱遼軍區前方指揮所的同志，原熱河地區十三旅、十六旅、十八旅三個旅編入縱隊建制。十三旅編為二十二師（後為一三三師），師長吳烈，政委陳仁麒。十六旅編為二十三師（後為一三四師，一六一師），師長張德發，政委曹德連（代）。十八旅編為二十四師（後為一三五師，一六二師），師長丁盛，政委韋祖珍。

八縱一成立就在戰鬥中成長。

在四七年的夏季攻勢後，敵人收縮在長春、瀋陽、錦州一線的狹窄地區，並轉為重點防禦。九月上旬，敵新任東北「剿總司令」陳誠想顯示一下自己的能耐，提出「確保北寧路，打通錦承線」的計劃。我們則徹底打破了敵人的計劃，給了陳誠一個「見面禮」。從九月初到十一月中，向敵開展秋季攻勢，先後取得了梨樹溝門，兩戰楊杖子，九關臺門四戰四捷的勝利，並對北寧路錦承路進行了四次破襲，共殲敵 28000 多人。部隊打出了威風，部隊在戰鬥中成長。總部發來了嘉獎令：

遼西前線將士們、遼西前線冀察熱遼解放軍全體將士們：

慶祝你們在楊杖子二次戰鬥中，殲滅蔣匪四十九軍主力的偉大勝利。望繼續努力，爭取新的勝利。特嘉獎此次戰役中有功的部隊和指戰員。

司令員林彪、政治委員羅榮桓、參謀長劉亞樓
一九四七年九月十五日於哈爾濱

四七年十月一日東北日報社論，題為《向冀察熱遼人民解放軍致敬》，部隊上下為之振奮。熱河大部分地區得到解放，立即實行土改，人民喜氣洋洋，熱河人民把八縱隊都稱之為「我們的八縱隊」！



八縱第一任司令員黃永勝。

首戰梨樹溝門。蔣介石爲了鞏固東北，任陳誠爲東北行轅主任，陳誠派兵向熱河東部進犯，旨在保證北寧路通暢，林總決心殲滅該敵，任務交給八縱。四七年九月初，敵九十三軍暫編二十二師（欠一個團），敵暫編五十師的兩個團，向我侵犯。八縱司令黃永勝把任務交給二十四師丁盛、韋祖珍，並派二十二師六十六團歸丁盛指揮，獨立一師佯攻牽制敵人。這一仗打得很好，雷厲風行，初戰告捷。二十四師在梨樹溝門殲敵暫編五十師千餘人，其中擊斃 400 多人。這是八縱成立後的打第一仗，十分可喜。

一戰楊杖子。敵暫編二十二師剛與我軍接觸就被我們打的倉皇東逃，二十三師一面追擊敵人，一面上報縱隊，黃永勝決心非常快，立即決定在楊杖子部署戰鬥，他親自帶部隊幹。令吳烈的二十二師和獨立一師跑步前進，佔領陣地，限時向敵發起總攻，並令二十四師在敵人退路上堵截敵人，形成前後夾擊。敵暫編二十二師 2600 多人被我全殲，俘虜敵少將副師長和少將參謀長。

二戰楊仗子。過了兩三天，陳誠又派王鐵漢的敵四十九軍主力，向楊仗子進犯，我二十三師六十九團五連經過肉搏戰攻佔了可俯瞰整個戰場的323高地，我獨一師、二十二師、二十四師，也到達指定位置。但是從上午八時同敵人接觸，直到下午雙方進展都不大，基本上處於相持狀態。

當天的下午三時許，我軍已經決心暫時撤出戰鬥，再尋戰機。撤的命令已經下達，電話線也拆了。撤出戰鬥的部署完畢。黃永勝、黃鵠顯和我三個人都在指揮所的山頭後面閒談，搶香煙抽。此時，敵人向我指揮所來一陣子炮火襲擊，在我們三個人不遠的地方還落了一發未炸的炮彈，濺了我們一身的泥土。幸而炮彈未炸，否則我們三個人送命了。接著，通信科報告，敵方發出了緊急公開信號，但內容不詳。接著，前線部隊又報告，敵人的小分隊向我前沿陣地猛烈出擊。根據得到的三個情況黃永勝立即判斷：這是敵人要撤退的象徵。我們大家都同意他的判斷。

「我們要立即追擊敵人！」黃永勝下了決心。下了撤退命令已經個把小時了，一切通信工具都不發揮作用了，怎麼樣指揮追擊？一時也想不出個好辦法來。就在此時，我想了一個辦法：要司令部可以出動的參謀、幹事，甚至科長都帶著我們手寫的命令一齊出動傳令，要部隊立即向錦西方向追擊。黃永勝立即說：「好！你這個辦法好得很！」不到半小時，集中了有十幾個人，手持命令就出發了。我還向出動的人交代：看到部隊的任何一級指揮員都可以讓他看命令。凡是看了命令的指揮員，都要把他們的番號、職務、姓名登記起來，要是取不到勝利的戰果要追究責任。這樣，一場千軍萬馬的追擊戰就這樣開始了。

追擊戰是第二次楊仗子戰鬥取勝的關鍵問題。不追擊就祇能是「竹筐打水」一場空，除了自己落一堆傷亡之外，什麼也得不到。追擊的結果，我們俘虜敵人上萬人，除敵四十九軍軍長王鐵漢帶少數人，化裝擔架隊逃走之外，其餘的敵人全部殲滅了。戰後，黃永勝、黃鵠顯經常同我開玩笑說：「你的點子真高明，你是我們八縱隊的教師爺。」我說：「沒有你老黃忠帶領部隊，部隊那有這麼大的氣魄！」

九關臺門的戰鬥，我們也殲敵幾百人

此戰，我殲敵四十九軍軍部、七十九師、一〇五師師部及所轄四個團，共 12000 多人。繳獲大小火炮 90 多門，輕重機槍 400 多挺，以及幾十部汽車，車上都是彈藥和物資，我們發了大財。二十三師六十九團五連獲「刺刀見紅」錦旗，連長王紹組獲「毛澤東獎章」。

戰鬥力提高了

熱東的勝利，八縱的作戰能力確實提高了。部隊還是原來的那些部隊，為什麼能夠一下子進步那樣快呢？主要的是黃永勝指揮得當，另外部隊的作戰積極性發生了變化，特別是敢於勝利的思想提高了。在熱河工作過的人都還記得，日本投降後，不敢打仗，不敢發動群眾，大家都有意見。對熱河的國民黨軍隊耀武揚威，地主惡霸殘殺人民，大家是十分痛恨的！對領導上不敢鬥爭，敢怒不敢言，即使提意見也沒有人聽。對此，不少人都離開了熱河，到別處去工作了。八縱的四戰四捷，黃永勝名氣很大，這對冀熱遼的領導本應是好事，但這些渴望「和平」，不願打仗的人，反而對黃有嫉妒心理，挑別人茬子。

八縱有作戰的積極性。在熱東的四次戰鬥，除了九關臺的戰鬥是冀察熱遼軍區前指統一指揮的之外，其餘三次戰鬥都是我們自己主動捕捉戰機的。這裏很清楚地可以看出，如果沒有作戰積極性，祇是奉命搞破壞鐵路之類的事，哪裏還會找機會打仗。沒有作戰積極性，就不可能取得勝利。

八縱有指揮能力。祇有作戰積極性，而不懂得怎樣打仗，同樣不能取得勝利。當時，我們的縱隊司令員黃永勝同志是一個打仗能手，一個身經百戰優秀的指揮員。他對情況的判斷、組織戰鬥都很精通。雖然他也祇有三十六、七歲，部隊都稱他為「老將黃忠」，這是對他的指揮信任的尊稱！仗一打下來，縱隊機關都稱讚黃永勝「老將出馬，一個頂倆」。八縱在黃永勝的帶領下，越戰越強，進步很快。

部隊戰鬥作風有很大的提高。一九四七年秋季四戰捷之後，我有一個總結並發表在縱隊的「鐵拳」報上。這篇文章離現在已四十年了，但還是可以看得下去的。總結要點如下：

我們經過了秋季功勢的動員之外，部隊士氣非常旺盛。正如林總所說：「部隊是想打，有命令打，有機會沒有命令也打。這是部隊好的作風。」

的總的表現。部隊的戰鬥情緒首先表現在部隊出動時的行軍中，連續幾天都是急行軍每天都要走一百多里路，獨立一師一天一夜走了一百七十里路。

在第一次楊杖子戰鬥時，二十三師受領任務是查明敵情和地形，並未受領作戰任務。他們深夜到了楊杖子發現敵人未走，立即投入戰鬥，纏住敵人，造成了殲敵暫二十二師的戰機。二十四師在前進的途中發現錦州附近白庫子有敵一個營的部隊，該團立即投入戰鬥，殲滅了該敵。

秋季攻勢，部隊自己提出的口號是：「這次作戰要讓敵人的血染紅自己的刺刀！」確實有不少部隊，敢於刺刀見紅！有進無退堅守陣地。在戰鬥中，堅守陣地寸步不讓。這次秋季攻勢中，我們能夠守住陣地，是好的戰鬥作風的又一表現。在二次楊杖子戰鬥中，獨一師一個連的兵力堅守白楊術溝的東山，敵人集中炮火向該連陣地發射炮彈數百發，敵人衝鋒四次，均被擊退。我堅守陣地的勇士們，沉著應戰，用刺刀和手榴彈把敵人殺的真可謂「屍橫遍野，血流成河」。堅守陣地的連隊，在打退敵人衝鋒之後，又乘勝向敵人進攻。

在秋季攻勢中，各部隊都能比較好的協同作戰，是好的戰鬥作風的又一表現。參戰部隊協同運動越好，對敵人的打擊就越重。第二次楊杖子戰鬥中，獨立一師，二十四師兩部協同得很好，就實際支援了二十三師。在大兵團作戰中，如果企圖偷安，不僅會增加自己的傷亡，也會增加友鄰部隊的傷亡，也就是增加整個部隊的傷亡。

第二次楊杖子戰鬥中，二十二師對奪取三二三高地，就是組織協同很好的戰例。各參戰部隊，不僅瞭解自己的任務，也瞭解友鄰的任務。這樣，雖然分兩路攻擊敵人的陣地，由於協同得好，就成了在不同空間同時打擊敵人了。減少傷亡，縮短了作戰時間。這種好的戰鬥作風是應當很好發揮的。

迅猛追擊爭取全勝。不顧傷亡大，不顧疲勞，不等命令，敵人退卻就追，這是好的戰鬥作風又一表現。

克服一切困難。秋季四次戰鬥中遇到的困難是很多的。這些困難是在大兵團作戰不可少的。如糧食困難，急行軍，氣候不利等等都是困難。擔架不夠用發生了很大的困難。熱東地區又是新區，動員群眾支援戰爭也很困難，在作戰中的傷員基本上是部隊自己輸送。

糧食供應不上是經常的。可以這樣說：我軍打仗頭一天基本上可以吃自帶的糧食，第二天就有不夠吃的問題了，如果連續作戰三天，幾乎就沒有不餓飯的。在熱東是連續作戰，困難就更大了。比如說，我們九天打了三仗，在當時的情況下就沒有不困難的！

走路的困難。我們的部隊會走路，也不怕走路的，最怕的是沒有鞋穿。我們的困難也就在這裏，沒有鞋穿，赤腳行軍，赤腳打仗是常事。光著腳走長路就是不可想像的事，光著腳打仗的就更不可想像了。我們的戰士堅忍不拔忍耐痛苦，肉板腳變成鐵板腳就是辦法。

英勇奮鬥，艱苦奮鬥這兩個「奮鬥」是我軍的光榮傳統。英勇奮鬥的過程也就是艱苦奮鬥的過程，不怕苦不怕死是連結在一起的。這也就是我軍戰鬥作風最本質的問題。

四七年十二月十九日，八縱從熱河東部的朝陽以南二十家子出發，向遼寧西部的黑山新立屯方向前進。當時，東北的冬季攻勢也開始了，從原來的行政區劃來說，我們到了大清河西岸之後，就同東北的部隊一起戰鬥了。八縱直接歸東北軍區指揮加入了大兵團作戰的行列，這對八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四七年十一月，黃永勝離開了八縱，到主力部隊六縱去當司令，段蘇權同志來八縱任司令。

在進入東北之前，我們縱隊專門召開了黨委會，討論到東北之後要堅決完成任務的問題。我在黨委會上做比較長的發言，對我縱的主觀情況和到了遼西後的客觀情況，都做了比較充分的闡述，我說：我們到遼西去，會有很多的作戰機會，我們是英雄有用武之地的。我們要以積極的精神執行命令。我這裏不妨回顧一下今年的秋季攻勢是一種什麼精神狀態執行命令的。我們是奉令去破壞北寧路的山海關到錦州段鐵路的，但是我們沒有破路就先打了三仗！我們雖然不能背起勝利的包袱，但決不能丟掉取得勝利的積極精神。

八縱在成立之初，即一九四七年的秋季攻勢取得了四戰四捷的重大勝利，我們在戰爭中，壯大了自己，裝備了自己，提高了自己，這對八縱的發展前途打下了很好的基礎。同時，縱隊在四七年的十月下旬開始又進行了一個多月的訴苦運動教育。部隊提高了政治覺悟，整個部隊戰鬥情緒非常高漲。

第十章 遼瀋戰役

遼瀋戰役是解放戰爭時期著名的三大戰役中的第一個戰役。根據毛主席的部署，於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至十一月初，在遼西的錦州和瀋陽、長春等地進行的一場大決戰。遼瀋戰役是解放東北全境的戰役，我們達到了滿意的戰役目的，這是並非偶然的，而是以林彪為代表的東北野戰軍正確路線的總檢閱。

吉林會議

在黨中央和毛主席的領導下，經過兩年多的奮戰，在全國個戰場上共消滅敵人 60 多萬，我人民解放軍壯大為 280 多萬。敵人被迫由進攻轉入防禦，我們則由防禦轉入進攻。

在四七年的夏季、秋季、冬季攻勢後，整個東北發生了很大變化，解放區的面積佔到 90% 以上。在東北戰場上，國民黨軍隊還有 55 萬人收縮在長春（鄭洞國的 10 萬人），瀋陽（衛立煌、廖耀湘 30 萬人），錦州（范漢杰 15 萬人）三個孤立地區。我東北野戰軍有 30 萬人，地方部隊有 30 萬人，敵我人數相當，但我們的武器裝備不如敵人。

一九四八年三月東北軍區在吉林市召開了一次高級幹部會議。參加會議的有各縱隊、各軍區政治委員，吉林附近部隊的領導和省軍區司令也參加了會議。

會議主要內容是講政治整軍。會議開始時，羅榮桓政委講了政治整軍的主要問題；會議結束時，林彪司令員講了打仗的問題。

林彪說：我們進入東北以來，開始我主張不打大仗，從去年秋季開始就打大仗，今後就要打硬仗。從不打仗，到打大仗，打硬仗，是一個很大的變化。我們必須認識這個變化，才能最後戰勝東北的敵人。這是我們當前在政治思想上，戰略戰術上要解決的主要問題。

林彪接著說：東北的國民黨軍隊，現在龜縮在長春、瀋陽、錦州爲中心的三大坨之內。我們今天考慮打仗，要抓住兩個關鍵問題。這就是：要能牽動敵人的全局和減少自己的代價。我們不能如同賣牛皮糖一樣，敲一塊祇是少點而已，這樣，不能給敵人致命的打擊。因此，今後打哪裏是必須慎重考慮的問題。

林彪最後說：從東北的敵情和我們自己具備的作戰能力來說，今後東北的作戰方式，就是大兵團、攻堅戰，打硬仗。我們全區的部隊都要在偉大的解放戰爭中大顯威風。

林總在吉林會議上的講話，時間很短，但講的十分精彩，提出了新的重大問題。林總講話有重大的歷史意義，事實上是解放東北「戰鬥號令」。

林總的講話對我們思想啓發很大。我理解林總的講話，就是要部隊進行政治、軍事整訓。把「大兵團、攻堅戰，打硬仗」的思想貫徹到政治整軍，軍事訓練的全過程中去的。一九四八年七月間，我在縱隊部隊幹部會上報告中也著重講到這個問題，我說：「……在東北當前的情況下，我們的作戰就是運動戰，攻堅戰。過去打仗，打與不打我們是有相當的自主決定權，今天這個情況就完全變了，打與不打是屬於東總的權力。大兵團作戰的主要特點是：堅決執行命令，堅決完成任務，堅持整體觀念。」

政治整軍與軍事訓練

吉林會議結束後，從三月中旬開始，到四月底全部時間進行政治整軍。以毛主席《評西北大捷兼論解放軍的新式整軍運動》爲指針，開展「訴苦」（訴受剝削壓迫之苦），「三查」（查階級、查工作、查鬥志）的教育運動。爲了深入進行政治整軍，縱隊黨委發表了《關於實行政治整軍的決定》，我縱提出了「五整一查」（整思想、整作風、整關係、整紀律、整組織和查階級）。通過整訓，提高了廣大指戰員的階級覺悟，加強了黨的建設和內部團結，改善了官兵關係，打擊了歪風。

整頓紀律主要是在團以上的領導幹部中進行，八縱二十三師是整頓的重點。二十三師是紅一方面軍九軍團的部隊。在全東北戰區，以紅軍爲基礎的建制師並不多，二十三師是其中之一。這個部隊長征到達陝北



任東野八縱政治委員時留影。

之後，就留在了陝甘寧邊區。紅軍改編為八路軍時，編為警備一旅，當時部隊的駐地出產大煙，有的幹部有秘密販賣煙土做生意的惡習。二十三師到熱河後，紀律也不大好。

全縱政治整軍開始時，我自始至終都參加了二十三師的黨委擴大會，我在會上開門見山的指出：二十三師的問題最主要的就是戰鬥意志衰退，戰鬥作風不好，政治紀律不強。二十三師是老部隊，應當比別的部隊進步快，但反而慢了。為什麼呢？我現在向大家提出四個問題。

（一）嚴重的腐敗思想。二十三師的一身都是「病」，最主要的是不少幹部思想腐爛了。貪污現象一般幹部有，高級幹部也有，甚至首長的警衛員都有。貪污的手段主要是做生意賺錢，做生意可謂是「群眾」性的了。有的高級幹部的老婆也經營大煙，這是犯法行爲。

二十三師的部分幹部用公款買個人用品。例如：買鋼筆一個人買兩三支，有的人買兩三件大衣。這樣的幹部還有爲人民服務的鬥志嗎？我希望這些幹部應當猛醒。

（二）嚴重的軍閥主義傾向。二十三師的軍政、軍民關係和內部關係都相當緊張。軍隊看不起地方幹部相當普遍，甚至把地方政府看成包袱。有的部隊連敵情都不通報地方黨政機關。有的部隊私自種大煙；有的部隊毆打稅務機關的工作人員。據政治部的統計，去年一個冬天就打過四百多個老百姓。我們是軍政軍民一家，還是冤家？

你們軍政關係也相當緊張，在二十三師這樣的老部隊還有相當的人看不起政治機關，把傳統都搞丟了。打罵戰士的現象尤其嚴重，竟還有連長（王xx）割士兵的耳朵的犯罪行爲。

(三)政治空氣相當淡薄。你們二十三師正氣不足，邪氣昇高了。在你們師裏最感興趣談論最多的是什麼呢？大煙、老婆、地位。這是什麼風氣，這是「烏煙瘴氣」！

(四)你們師的幹部中知識分子並不多，但反對知識分子幹部則相當厲害。我們用幹部是有政策的，我們的政策是：德、才、資，這是統一不可分割的。我們的幹部政策不是隘路上行軍一個接一個地向前走，論資排輩。我們的幹部政策是大馬路上賽跑。以革命事業為目標，大家都向前跑，這自然就有走在前頭的，有落伍的，甚至有跌到地下爬不起來的。有德有才的人跑到最先頭了，這就是提拔的對象。

我講完話之後，大家進行了熱烈的討論，在討論中揭發了問題相當嚴重。其中嚴重問題之一，就是警衛員、飼養員揭發了師長張德發，他的老婆長期做大煙生意，在小孩的搖籃裏就搜出九斤大煙土，並提到黨委擴大會的會場上去了。這對二十三師是一空前未有的大震動。師長無論政治思想作風上，作戰指揮上，對部隊建設上都不能勝任。縱隊黨委決心撤換師長，我們向東北軍區做了報告提出了撤銷師長的建議。軍區在兩小時內，批准了我們的報告。

一九四八年五月間就開始了軍事訓練，訓練的主要課題是攻堅戰。我記得，六月間東北軍區召開過縱隊司令會議，討論的中心內容，是以攻堅作為對象的。

縱隊黨委對軍事訓練主要抓了三個問題。

第一，全縱部隊全部投入軍事訓練。

第二，全縱幹部戰士都要學習攻堅戰的戰術與技術，幹部學戰術為主，戰士學技術為主，技高膽量大。當時，我縱的炮兵不是很強，因此大抓爆破訓練。經過苦練，全縱隊 80% 的幹部、戰士都學會了爆破技術和連續爆破的技術。

第三，發揚練兵的群眾路線，實行評教、評練、評學的三評運動。

這裏有必要提一下「六個戰術原則」問題。「六個戰術原則」是以林彪的名義提出來的，實際上是廣大指戰員鮮血和生命的總結。開始，林彪提出「一點兩面」和「三三制」。「一點」就是主要攻擊點要選好，「兩面」就是要包圍敵人，打戰滅戰，不要一線平推，打擊潰戰。「三三制」

就是說爲了更好地保存自己消滅敵人，不要扎堆打仗，一個班要分成三個組，互相策應。

在「三下江南」後林彪總結作戰經驗時，又提出了「四組一隊」，「四快一慢」。四七年秋季攻勢後，在東總召開的軍事工作會議上，林彪又提出「三猛戰術」，「三種情況三種打法」。

「六個戰術原則」簡單實用，尤其對工農出身、文化較低的指揮員來說簡直是法寶，運用「六個戰術原則」屢屢打敗敵人取得勝利就是法寶！「六個戰術原則」是和東北野戰軍廣大指揮員的鮮血和生命劃等號的。

軍事訓練於一九四八年七月底基本結束。全縱隊上下的精神面貌煥然一新，我們對今後作戰的勝利充滿相信。



和八縱戰友在一起。前排左起：韋祖珍、邱會作、謝家祥、任榮。
後排左起：任思忠、徐信、鍾池、林忠照、吳興。

錦州攻堅戰

一九四八年的秋季攻勢戰役目標，是幾經變化才決定攻打錦州的。在攻克錦州之後，又抓住了一個遼西會戰，進而攻克瀋陽，解放了全東北，這就是世界聞名的遼瀋戰役。

關於遼瀋戰役，「九一三」之後給林彪抹了很多黑，甚至說林彪不打錦州是怕死。把林彪的大功，說成大錯，甚至說成大罪。好像林彪提出

打長春就是絕對的錯，毛主席提出打錦州就是絕對的正確，這些人不是無知就是別有用心！

早在四八年四月，東北局認真分析了整個東北的戰局後，決定部隊進行政治整訓和軍事整訓後，攻打長春。提出打長春並不是林彪個人的意見，四月十八日由林彪、高崗、羅榮桓、陳雲、李富春、劉亞樓、譚政等向軍委電告打長春的決心和方案，「以七個縱隊的兵力攻城，兩個縱隊的兵力在四平以南阻止增援，……三個縱隊及獨立師，擔任錦州瀋陽間、瀋陽四平間沿途牽制敵人」。林彪還提出「僅瀋陽之敵北上增援，是較易應付的，如錦州附近之敵與瀋陽敵人會合，再向北增援，則使我軍攻城和打援皆發生嚴重困難。因此我們建議晉察冀以四個縱隊或三個縱隊兵力，……開到山海關以北殲滅和牽制敵人」。四月二十二日，毛主席以軍委的名義回電，明確表示「同意你們先打長春的意見。……我們同意你們先打長春的理由先打長春比較先打他處要有利一些。」

毛主席從全國的形勢通盤考慮，提出打錦州，不但「關門打狗」，也卡斷了東北與華北的連接，防止蔣介石企圖放棄東北將兵力撤回華北的打算。四八年九月七日，毛主席電示林彪堅決打錦州，「而置長春、瀋陽兩敵於不顧」。

當時，打錦州的確困難很多，部隊南下北寧線，要從較遠的地方趕來集結，這倒是小問題，人民子弟兵的兩條腿是過硬的。關鍵是準備打仗的彈藥、物資也要從較遠的地方運來，甚至從哈爾濱繞道白城子一線運過來；運輸的汽車也有一些，但汽油卻很困難，萬一錦州打不下，我們撤都撤不及，後果也難以設想。

從敵人來說，打錦州，瀋陽的敵人會來增援，而且蔣介石調兵從南面增援錦州的部隊已經在葫蘆島準備登陸了。這樣，林總的指揮所到了彰武時，林總有新的考慮，並向毛主席提出了報告。我認爲一個戰區的總指揮，十分注意敵情的變化是無可非議的，當敵情起了變化後，向毛主席提出什麼樣的報告都是正常的，向毛主席提出回師打長春也是一種方案，總的目的都是爲了消滅敵人。我認爲林彪和毛澤東沒有什麼根本分歧，都是爲了打倒蔣介石，消滅國民黨反動派。何況，林彪承受了巨大的壓力，放棄了自己的意見，堅決執行了主席的指示，全力奪取錦州。



一九四八年九月，在遼河三江口檢查浮橋。八縱司令段蘇權（前左）、政委邱會作（前右）、副司令張天雲（前中）。

我縱於四八年九月十二日由遼寧省鐵嶺以西的八面城出發，向錦州方向進軍。部隊在三江口西渡遼河，並繞道現屬內蒙地區的草原和沙漠，經康平、彰武等地，於九月二十一日到達北鎮地區，九天行程 900 多里，聽說要打仗，部隊上下士氣高漲。當日晚，部隊剛要宿營，我們就接到總部命令：八縱急速南下，夜渡大凌河，突然包圍葛文碑、薛家屯之敵，截斷錦州、義縣兩敵的聯繫。為此，八縱又連夜強行軍 120 華里，22 日趕到五糧子等地集結待命。

二十二日中午，我們又接到東總電令：八縱、九縱兩個師、三縱九師，由八縱統一指揮消滅薛家屯、葛文碑之敵。我們立即進行了部署，二十五日各部隊均按時到達指定地點，經過激戰，當天就解決戰鬥，這樣，錦州和義縣的聯繫被我縱截斷。三縱為主、二縱一一六師配屬二縱迅速攻克了的義縣，拉開了遼瀋戰役的序幕，一一六師在這次戰鬥中打得很出色，受到林總讚賞。八縱在總攻前，攻佔了北大營，東大梁，被服廠。這樣，錦州東部、東北部敵人的重要據點全部被我縱攻佔，為總攻錦州掃清了障礙。

錦州的攻城戰，於四八年十月十四日上午七時開始，至十五日下午五時基本結束。參加錦州攻城和在黑山、塔山擔任阻擊的部隊共為八個縱隊攻城部隊為：二、三、七、八、九五個縱隊；四、十一縱隊在塔山阻

擊 葫蘆島登陸之敵，十縱在黑山阻擊由瀋陽出援之敵；一縱在錦州到塔山之間為總預備隊。

攻克錦州是我縱加入「大兵團攻堅戰，打硬仗」的第一仗。我們勝利完成了作戰任務。發起總攻後，我縱先後攻佔瓦斯會社、麵粉廠、中央銀行，全殲敵「剿總」特務團，並直接殺向敵剿總前指。截止十五日黃昏，八縱殲滅敵暫編五十四師全部，暫編十八師、暫編二十二師各一部，殲滅敵六兵團司令部、九十三軍軍部，共萬餘人。

在作戰中我們也暴露了一些問題，對那些問題，我們都以「不怕羞」精神，及時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武器進行了總結，這對促進我縱的建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第一個問題，控制錦州機場問題。九月下旬（二十六日）總部命令：八縱派一個師立即向錦州城前進，佔領高地，用炮火控制機場，阻止敵人空運向錦州增援。這本來是一項很容易完成的任務。

接到命令的時候，我在師裏。總部的命令在文字上，有不嚴謹的地方，現在看來也是執行命令不利的因素，因為可用的機場附近有九縱的部隊，他們執行任務更為宜。但我們卻又發出了缺乏軍事常識的請示報告：錦州有兩個機場（其中一個是廢的），佔哪一個？

總部對我縱的請示報告，接連發了三個電報：一是，不能用的東機場還要控制嗎？二是，按前令立即派一個師向錦州城西北角前進，佔領高地，用炮火控制該機場；三是你們對執行控制機場的命令不堅決。第三個電報，壓在羅榮桓政委那裏了，沒有發出。我們是後來才知道的。

這樣，敵人爭取了一個白天稍多一點的時間，由瀋陽空運了五個營的步兵到錦州。由於敵人空運，增加了錦州的防守力量，如果敵人空運很多的部隊到錦州就有造成錦州不能打的可能。總部把控制錦州機場的問題報告了中央軍委，總部轉發了中央的回電。中央軍委的回電：「八縱隊執行命令不堅決，應進行批評教育。」

我從師裏趕回到縱隊之後，對控制機場的問題採取了緊急措施：一，督促二十三師急行軍向指定的地點前進，堅決完成任務；二，將總部的批評電文轉發各師，我們提出全縱隊要以縱司沒有很好執行命令為戒，堅決執行命令；三，立即向總部做了初步檢討。總部的回電是：「對控制機場的問題檢討很好，今後應堅決執行命令，完成作戰任務。」

第二個問題，薛家屯戰鬥問題。薛家屯在錦州市以東約三公里處，是連結大小紫荊山的重要外圍據點，我縱受命拔除該據點。

薛家屯戰鬥是二十三師打的，那次戰鬥主要是師指揮員對組織指揮作戰的能力太差了。諸如，選擇突破口，指揮突破，迂迴包圍等都搞得不好。既使戰鬥勝利了，俘虜和繳獲都甚微，自己反而落了二百多人的傷亡。更爲嚴重的是師裏對缺點錯誤都隱瞞了，未曾如實上報。

二十三師的師長是四八年五月間總部派來的，全師上下意見很大。對師指揮員的問題，當時還沒有條件解決。天津戰役後不久，我們提拔了該師參謀長張曉冰同志擔任師長，基本上解決了問題。

第三個問題，丟掉小紫荊山陣地問題。在錦州外圍作戰時，十月三日二十三師六十八團攻克了小紫荊山陣地，這次戰鬥是該團副團長韓楓指揮的，仗打得很好。但戰鬥結束後，該團祇留了八連守陣地，其餘部隊撤出了陣地，師團兩級對怎樣堅守陣地沒有做任何佈置。敵人反攻時，八連把陣地丟了。這個問題對敵我雙方都影響很大，對敵人起到了鼓勵士氣的作用，對我軍則起到了打擊士氣的作用。況且八連是逃跑式的丟掉陣地，這與我軍英勇作戰的光榮傳統是絕對不相容的。

爲了嚴肅軍紀，縱隊黨委決定：對六十八團八連連長於沛然處於極刑，對該團副團長給予撤消職務，到炊事班當伙夫（韓楓同志真是能上能下，很快就恢復了職務）。總部很快批准了我們的報告。爲了教育部隊和幹部，二十三師召開了六十八團的部隊和全師連以上幹部參加的大會，對於沛然當場處理了。

第四個問題，羅榮桓來我縱視察問題。錦州戰役總攻之前，羅榮桓政委於十月十二日來到我縱視察。羅政委身體不好，加上敵機活動又比較頻繁，他來了之後祇有三次活動。一次是和我、張天雲、黃鶴顯、師長、政委們分別個別談話，一次是接受縱隊黨委的匯報，一次是出席縱隊黨委會，其餘的時間都在野外水溝裏防空。羅政委在接受縱隊匯報時祇說了四句話：接受教訓、團結一致、共同努力、打好仗。

羅政委同我個別談話時，談了三條：一，段蘇權是個好同志，指揮作戰經驗少；二，一個人的領導水平、指揮水平、組織水平都不是一天兩天可以解決的，都是逐漸積累起來的；三，現在怎樣辦？唯一的辦法就是

發揮集體的作用。張天雲、黃鵠顯指揮作戰的水平是比較好的，祇要發揮了集體領導作用，是能夠完成當前的作戰任務的。

羅政委在軍黨委會上講話很短，他說：我親自到你們部隊來看看，我看你們這個部隊很好，很有希望，對完成當前戰鬥任務也是很有信心的。接著羅政委說：秋季作戰以來，你們縱隊發生過執行控制機場命令的問題，有的小仗打得不好，暴露了指揮和部隊紀律戰鬥作風方面的問題。這些問題，從全局來說都是小問題。在你們縱隊內，既是大問題，也是個別問題。對這些問題，你們都嚴肅處理了，表現了你們的領導水平和能力。出了這些事就沒有信心了嗎？這是不對的，總部還是認為你們是個好部隊，有戰功的部隊，總部對你們是有信心的！

錦州戰役結束後的第五天，即十月二十日，總部指名電令我去匯報。其實也不是什麼匯報，而是去和林總見見面，當面以予鼓勵。我在青年的時候就見過林總，以後也曾多次見面，但沒有同林總講過話，他是不認識我的。這次去匯報，我是第一次同林總說話。

我到總部時先見到林總。見面時他第一句話就說「啊，你就是邱會作同志，你們縱隊是背著包袱打了勝仗。你們同大家一樣，都打得很好。等一會到羅政委那裏去，他會多同你說幾句的。」接著林總問了我參加革命的歷史情況，我都一一向他匯報。

羅政委同我談話的時間比較長，但談的不是錦州戰役的問題。羅說：「在你們那裏說過的問題現在就不談了。遼西會戰，今明兩天就可部署完畢，一會兒一〇一對你還會有交代的。我們簡單說幾句思想方法問題。一年多來，從你們的報告和當面談的，我覺得你這個人是能夠抓住大問題的，而且是能夠抓到底的，這是你的優點。不過優點也伴隨了缺點，就是容易出點偏差。這點希望你注意就是了。但你又決不要束手束腳，八縱的進步與你大刀闊斧的領導是有密切關係的，你的領導是成功的。」

在我臨走之前，林、劉都到羅政委那裏來了。林總很莊重地說：「遼西會戰今明兩日就可實行包圍。敵人祇有兩條路可選擇：退回瀋陽或東渡遼河。六縱很快可到新民以東，攔阻敵人退回瀋陽，你們的任務就是不能給敵人爭取時間在遼河架浮橋。打法就是向敵群裏大膽殺進去，端起刺刀向前殺。你要很快趕回部隊去。你見到部隊的各級首長都要說兩句

話：『哪裏有槍聲就向哪裏打，手長腳快就是勝利。』我二十日晚十二時就趕上了擔任縱隊後衛的二十三師。

遼西會戰

四八年十月十六日攻克錦州城的戰鬥結束了，這是遼瀋戰役的第一階段，第二階段是遼西會戰，第三階段就是攻佔瀋陽了。

遼西會戰是在遼河以西，黑山到新民之間這個面積不大的土地上展開的，在這裏有全部美式裝備的敵精銳部隊廖耀湘兵團，約十餘萬人。我軍有從錦州北上的一縱、七縱、八縱和長春方向南下的五縱、六縱、十二縱，加上原來擔任黑山阻擊戰的十縱，共計七個縱隊，兵力約三十萬人。敵我雙方參戰兵力約五十萬人。

總部命令指出：遼西會戰是解放全東北決定性的戰鬥，全軍部隊一定要克服疲勞，勇敢地連續作戰，保證取得戰鬥的勝利。

十月二十日我縱就從錦州市郊出發向黑山前進，參加遼西會戰了。我二十日由總部匯報回來，先趕回部隊，進行戰前動員。

我軍於二十二日就對敵人完成了戰役包圍，敵人被圍後，以新二十二師為拳頭，首先是向黑山、打虎山以南突擊，企圖奪取我黑山十縱陣地，繼而重佔錦州由海上逃竄。總部電令八縱在打虎山以南協同十縱三十師阻擊敵人。敵新二十二整編師是廖耀湘最精銳的部隊，全部美式裝備，敵人集中各種火炮有二百多門，按照坐標梳頭式的炮擊方法，左右前後輪番進行射擊。每次射擊的時間都將近半小時，地面上揚起來的灰塵昏天黑地。我縱二十二師擔任阻擊任務，部隊在兩小時內，遭受了很大的傷亡，但該師打得英勇頑強，部隊幾次進入肉搏戰，堅決頂住了敵人的攻擊，沒有讓敵人前進一步。一個副連長叫蔣布林帶著一個排與敵人白刃格鬥，他刺倒幾個敵人後，也被敵人刺成重傷倒地，他真是視死如歸，拉響了手榴彈與敵人同歸於盡。英勇的戰士們繼續與敵人拼殺，戰鬥到最後勝利祇剩下三人，十四名犧牲戰士的刺刀上個個都沾滿敵人的血。我二十二師勝利完成了阻敵任務，也確保友軍打虎山陣地的安全。

敵人企圖西逃而未得逞又向營口方向撤退，二十四日深夜總部命令：打虎山南敵新二十師的部隊，有向東撤退的跡象，八縱除了二十二師

仍留打虎山南抗擊敵人敵人之外，縱隊率主力向六間房的大小村莊攻擊前進，攔截敵人東渡遼河的企圖。我二十三師，二十四師立即受命攻擊前進，並在六間房及其西北方向展開了激戰。當時已經出現了敵我交錯的形勢，我們縱隊指揮所也參加了戰鬥。段蘇權司令員親自指揮機關戰鬥，我和副司令員張天雲、參謀長黃鶴顯都持卡賓槍向敵人勇猛射擊。

二十三師在六間房阻擊戰中，英勇頑強，堵死了廖耀湘兵團南撤的去路，為全殲廖耀湘兵團於遼河地區起了關鍵性的作用。在作戰中我們的傷亡也很大，政治部主任任榮同志持槍作戰，十分英勇，在這次戰鬥負了傷。

二十六日深夜，我縱就進到遼中縣以西和老大房一線。此時總部的通報指出：敵人在新民以東對我六縱的攻擊已經減弱，敵人有向遼中方向佔領渡口，東渡遼河的可能。我八縱應集中全力，不惜重大代價阻擊敵人東渡遼河，戰法就是要大膽地向敵人集團中衝殺進去打亂敵人的部署，使其無暇組織渡河。

我們的任務是嚴峻的，當時，我全縱部隊都在同敵人混戰中，通信聯絡，指揮都發生了很大的困難。為了貫徹總部首長的命令，我們決定：除司令員、參謀長不離指揮所外，我和副司令員，司令部、政治部所有能離開工作的工作人員，一律出發找部隊傳達命令。我們的命令是：勇敢作戰，大膽向敵群中殺，以獲得戰績為標準。全縱很快形成了熱火朝天的戰鬥。我同張天雲同志到了二十二師，該師成了我縱殲滅敵軍新二十二師的主力。

二十七日下午一時許，敵軍從巨流河向遼中縣方向集團式的向我軍衝擊。對我軍的攔阻和火力射擊都不顧，自己的傷員也不要，一個勁地往前衝就是了。我軍很快查清了，向遼中方面衝擊的就是新一軍、新六軍主力，並以新二十二師為先導。敵軍的目的就是要在遼中縣兩岸，建立新的防禦，實行東渡遼河，逃回瀋陽或向營口方向撤退。我們決心一定要徹底粉碎敵人的企圖，才能取得遼西會戰的全部勝利。

我和張天雲命令二十二師把集結了的兩個多團的兵力，以營連為單位，多路向敵人縱隊隊形中殺去，打亂敵人的隊形，分割殲滅敵人。「刺刀見血，衝鋒鎗點名」，驚天動地的戰鬥，在遼河兩岸平原上展開了。經過數小時的戰鬥，敵人的集團隊形全部被分割打亂了，一個村莊，甚

至一個院落之內，敵我都混在一起了，敵我雙方都失去了指揮，完全是依靠分隊，甚至人自爲戰。在這種情況下，兩種不同軍隊的素質就明顯的表現出來了，敵人在失去指揮的情況下，是越戰越弱，我軍則越戰越強。在西北方向的友軍，也分數路向遼河兩岸衝殺前進，敵人就一塊一塊地被我軍吃掉了。敵人的王牌軍新一軍、新六軍覆滅了，遼西會戰到此基本結束。

在遼西會戰的槍聲還未完全停下來的时候，即十月二十八日黃昏，總部命令：「八縱立即東渡遼河向營口增援。部隊到達營口之後，在作戰指揮上歸九縱統一指揮。」

我們縱隊幾個人看到總部的電令之後，都哭笑不得，仗打到這個份上，大家的革命英雄主義個個高漲，由九縱指揮大家心裏不願意，但沒有人說一句話。我首先說：「張副司令和我先頭走，其餘的人留在後頭集結部隊跟進。」張天雲同志祇乾脆地說了一個字的話「行！」縱隊司令部一查部隊的位置，二十三師靠近遼河邊，部隊開始集結了。張天雲說：「我看總部要我們增援營口，可能是因爲我們靠遼河最近，我們對部隊也不偏向那個，誰靠河邊最近就誰爲先頭。」這樣就把部署定下來了。張天雲說：「我們睡一覺明天再走，讓部隊先走。」我即說，應當反過來，我們馬上出發並經過二十三師，向他們交代任務後，我們渡河到東邊去睡個大覺，這樣一舉兩得。二十三師看到我們先走了，他們就不會說怪話。同樣我們還可安安逸逸的睡覺。張天雲微笑地說：「對呀！」

我同張天雲帶著一個參謀、一部電臺、幾個警衛人員就上路了。我們不敢騎馬，一上馬就有打瞌睡栽下來的可能。於是，我們邊走邊說話，這是不打瞌睡的最好辦法。

我對張說：「你來了幾個月了，對部隊對領導有什麼看法嗎？」

張天雲說：「這個部隊很好，能夠培養出戰鬥力很強的部隊，我對部隊已經有相當的感情了。另一點就是師、團同志對縱隊的領導充滿信心。」

我們到了河東岸之後，二十三師指揮所和先頭團也跟著就上來了，我們順便瞭解一下部隊的情況，認爲有休息一下的必要。

師首長對我們說：「部隊實在走不動了。上船要一個一個地拉著走，下船不僅要拉著下，有的還要抬著下船。如部隊一休息就起來不了，有

的走著走著就倒在路上睡著了。六十八團有一個連隊剩下四十餘人，幹部祇有一個副連長和一個副排長。該連集結後不到十分鐘，除了副連長之外就全部倒在地下睡著了，副連長吹哨子根本叫不起來，副連長拉起前面的，又拉後面的，前面的又睡著了。」部隊實在是開不動了。

全縱部隊已經快十天沒有宿營睡覺了，晝夜都在戰場上渡過的。不要說沒有睡一夜的覺，連臨時的覺也沒有睡過。這怎能不會在走路的時候就倒在地下睡著呢？根據上述情況，我和張天雲決定：今天十二時部隊「正式」睡覺，明天下午五時出發，夜行軍把白天耽誤了的路程趕回來。這一決定受到了幹部戰士熱烈的歡迎。我問我們隨身的警衛人員：「你們看這個決定好不好？」他很幽默的回答：「首長自己也會認為是很好的！」

在秋季中期的東北氣候不冷不熱，正好睡覺。我也是十二點多一點就睡了，一睡就到第二天十時才醒來了，睡得真香啊！我起來起之後，看到身邊的警衛員，這些年青人睡的那種舒服勁，真為他們高興！我同張天雲寧願餓著肚子也不叫醒大家，一直讓他們睡到自己醒來為止。他們醒來之後，看到我們祇是高興的傻笑。

二十九日我們夜行軍走了六十里路就宿營了，第二天十時繼續行軍。部隊休息好了，情緒好了，無論走到那裏都說戰鬥生活。大家說得最多的是諷刺敵軍新二十二師。他們說：「以前都說敵新二十二師怎麼能打，怎麼厲害，咳！原來並不是那回事，我的刺刀捅到他身上，照樣倒下



一九四八年遼西會戰勝利後，八縱老戰友在一起。左起：林彪、張天雲、邵會作、段毅權、黃鶴順。

去！」另外，也有想戰友的，如有的還邊談邊泣，悼念戰友！勝利之師的情緒是非常高漲的。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日我先頭師進至營口以北的牛莊。總部電令：營口追擊戰至此結束，八縱在原地待命。十一月十二日到達鞍山近郊的劉二莊一線整訓，至此，我縱參加的遼瀋戰役勝利結束。

八縱從一九四七年八月一日建立縱隊番號，到四八年十一月東北全部解放的一年又兩個月的時間裏，完成了屢次戰鬥任務，取得了重大的戰績，在戰鬥中鍛煉成爲一支有戰鬥力的野戰軍。

遼瀋戰役即將結束時，十一月一日，中央軍委頒布了全軍部隊統一番號的命令。八縱編爲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十五軍，所屬二十二師、二十三師、二十四師，依次編爲一三三師、一三四師、一三五師，冀東獨立師編爲一五八師歸屬四十五軍。

在解放戰爭中八縱的主要戰績如下：

1、在錦州以西創造了大兵團運動戰的光輝戰績。一九四七年在錦州的西部，八縱一戰梨樹溝門，二戰楊仗子，三戰楊仗子，四戰九關臺門。前三戰是在九天之內連續作戰三戰三捷的運動戰。八縱運動戰的戰績，解放後曾被劉伯承元帥選定爲南京軍事學院的典型教材。

2、在攻克錦州戰役中，單獨完成了突破任務。一九四八年十月錦州戰役是三路攻擊。二縱、三縱在城的東北角並肩擔任主攻任務，並配有大量的火炮和少量的戰車；七縱、九縱在城的正南並肩擔任助攻任務；八縱在正東單獨擔任助攻任務。八縱距主攻的距離最近，並配屬有一縱炮兵團，其任務是僅次於主攻的。所有攻城部隊唯獨八縱是單獨攻進城裏的。

3、在遼西會戰，八縱完成了協助十縱在打虎山阻擊敵人西進的任務，完成阻擊敵人東渡遼河南下營口，北退瀋陽的作戰任務。

我們八縱成立後，在戰鬥中鍛煉成爲一支有戰鬥力的部隊，能夠吃苦的部隊，有自己戰鬥作風的部隊。八縱是一支有發展前途，大有希望的部隊！



林彪完舉隊獎旗。



建國戰役後，八縱召開慶功大會，邱會作時任八縱政委。



图1-1-1 记录员在记录。

图1-1-2

图1-1-2 记录员（右二）在一起。



遼瀋戰役的歷史地位

遼瀋戰役，對打敗蔣介石奪取全國政權，對全國人民的解放事業都有重大歷史意義。遼瀋戰役是同蔣介石集團大決戰的首戰，是在如下的情況下進行的：

第一，全國敵強我弱的力量對比還沒有發生根本變化。一九四八年東北戰場上，敵我雖然在數量上達到了平衡，但裝備上還是敵強我弱。在這一情況下，戰役之前祇考慮消滅敵人的主力，並沒有想到解放了全東北。

第二，史無前例的攻堅戰。錦州是敵人連接關內外的大戰略要地，駐有重兵十五萬人。攻打這樣大的據點，在我軍的歷史上是空前的；堅守這樣大的據點，國民黨軍隊也是空前的。東北部隊攻堅戰除了攻克的四平是比較堅固的設防城市之外，其餘也祇攻克過一些比較小的據點。攻堅戰的經驗，祇有少數的師團比較豐富，還沒有出現過攻堅作戰經驗比較豐富的野戰軍。

另外，我軍的裝備也還不適應攻堅作戰，部隊的火炮比較少，坦克屈指可數。打鋼筋水泥碉堡效果比較好的武器很少。攻堅作戰的主要武器還是炸藥包，炸藥包一定要在接近敵堡壘之後送上去，送炸藥包很難一次成功，這就帶來比較大的傷亡。

第三，敵人增援的可能性很大。在錦州戰役之前，東北戰場上的敵人還是相當強大的，並且其中還有精銳的新一軍、新六軍。瀋陽的敵人要是集中主力援救錦州之敵，我軍有可能被迫撤出戰鬥。另外，蔣介石從關內增援也是完全可能的。事實上，蔣介石也是這樣做了，並且親臨葫蘆島督戰。

遼瀋戰役當然是東北野戰軍的整體作戰，但要論功的話，錦州戰役的頭功應當是黑山與塔山東西兩頭的阻擊戰，尤其是塔山。因為祇要這兩頭的阻擊戰有一頭不能阻住敵人的增援，錦州就打不開。

遼西會戰的頭功應當是六縱隊阻住了敵人沒有撤回瀋陽，次功就是七、八縱阻擊了敵人沒有東渡遼河。

遼瀋戰役的勝利，從全國範圍來說，是敵人轉入被動，我軍轉入主動。遼瀋戰役勝利從基本上來說，就是毛主席戰略思想上的勝利，林彪是有巨大貢獻的。

遼瀋戰役勝利的直接原因是：我軍正確的戰略決策；敵軍在戰略上的錯誤和我軍敢於勝利連續作戰的軍事素質。

關於戰略決策問題。上面提到了，四八年東北的敵人整個形勢就是：長春、瀋陽、錦州，三大集團。我軍打哪裏都是戰略決策問題。毛主席、林總經過反覆考慮，決定我軍主力出擊北寧路，捕捉戰機，殲滅敵人的有生力量，創造攻克錦州的條件，這是非常正確的。

關於敵人戰略上的錯誤問題。我看敵人的錯誤有三點：一是對我戰略決策判斷上的錯誤。我軍向北寧路出擊時，敵人並未判斷到我軍會打錦州。總以為我們還是搞圍點打援的老辦法。因此，敵軍未曾用主力出援錦州。待到發覺我軍打錦州時，再用主力出援為時已經過晚了；二是敵廖耀湘兵團出援錦州過晚了。三是沒有從東北撤退的決心，結果是被我軍分次消滅了。如果在我軍未打錦州之前，敵軍主力要是西援，迫使我軍不能打錦州，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我們打下錦州之後，如果敵人迅速撤回瀋陽和鞍山一線，敵人主力也是完全可以從海上逃跑的。這樣，東北可以解放，但敵軍主力是消滅不了的。

關於我軍敢於勝利連續作戰的素質。由於瀋陽出援到新民一線的敵軍是敵軍的主力兵團，我軍要殲滅該敵是要有相當膽量的。我軍在錦州戰役結束後，祇有四天多的時間就要連續作戰了。我軍除了一縱和五、六縱未曾參加錦州戰役之外其餘部隊都打得相當疲勞，傷亡也不小。參戰部隊不僅沒有得到整頓，連休息也很少，體力並未恢復，以疲勞的我軍同敵軍主力作戰，對我軍是非常不利的。我軍是克服了難於想像的困難，參加作戰的。

我們應當怎樣看待遼瀋戰役歷史地位呢？從直觀來看，我認為遼瀋戰役的歷史地位是大決戰的開端，奠定了全國的勝利的基礎。遼瀋戰役的勝利旗幟是永遠鮮艷不朽的！

第十一章 平津戰役

奉命進關

遼瀋戰役結束後，我四十五軍在鞍山西南的海城、牛莊集結休整，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八日，奉命進關。先頭師於二十三日開動，軍直屬隊二十五日開動，按照軍委「不惜疲勞，不怕減員，不怕受凍受饑」的要求，一路挺進。部隊跨過遼河、大凌河，在進軍途中到錦州才領取了冬裝，又經梨樹溝，由冷口跨過長城入關到玉田，於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五日到達天津西北的寶坻集結。我們是東北野戰軍最先到達天津外圍的一個軍。

遼瀋戰役勝利結束後，部隊要進行休整是可以預料的，但休整多少時間，事先是不得而知的。但從總部先後的命令來看，則有休整比較長的打算。我軍在瀋陽以南的海城地區集結後，東野總部的第一個電令是部隊準備過冬的工作指示。第二個電令是十二月中旬召開全軍軍以上參謀長會議。第三個電令是四九年一月間在瀋陽召開東北戰區的高幹會議，野戰軍、省軍區以上的軍政首長出席會議。

我軍參謀長黃鵠顯同志去瀋陽出席東野總部召開的參謀長會議。在會議進行中，就接到中央軍委命東野迅速入關的電報，「入關配合華北人民解放軍，全殲華北蔣、傅軍，解放全華北」。因此，參謀長會議還沒有開完，就讓大家回去了。黃鵠顯回來時，我們正在舉行遼瀋戰役的慶功大會，他立即傳達林總、羅政委關於部隊立即進關的指示。入關的命令下達到部隊後，全軍上下熱烈擁護，很多指戰員表示：仗沒打夠，今後的戰鬥我們會打得更好！這真叫人民子弟兵呀，回想當年，我現在還是熱血沸騰。我縱隊的骨幹中，極大部分是關內河北人，聽說要入關解放自己的家鄉，更加興高采烈。遼瀋戰役這麼大的戰役下來，尤其是遼西會

方块字读书社区 <http://book.sinozi.cn>

戰，部隊上下疲勞至極。可是部隊接到命令後，祇準備了六天，我們於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就出發了。

進關後對鞏固部隊就成為重要工作了。對部隊政治思想的主要工作就是解決一個「革命到底」的問題。為此，我們根據東野政治部「關於進關動員的指示」在進關前後都進行了深入的動員工作。

東野政治部動員工作的指示，摘要如下：

甲：我們的秋季攻勢取得了偉大的勝利，消滅了敵人四十餘萬，解放了全東北，我軍的勝利，引起了全世界的大震動。蔣介石在廖耀湘兵團被殲滅後，在北平搞得吐血，回到南京後還繼續吐血。

……

乙：我們東北人民解放軍決定迅速大舉進關是完全正確的。……我們要迅速打垮蔣介石，並斬草除根，使蔣介石永遠不能死灰復燃，永遠不能再殘害人民。我們在華北，一定要如同在東北一樣，積極作戰，把華北敵人全部消滅在華北的土地上。

丙：全國革命戰爭兩年多以來，我軍在各個戰場上的勝利，不斷殲滅敵人壯大自己，特別是最近數月內（七、八、九、十四個月內）殲滅了大量的敵人，四個月就消滅敵人一百多萬。我人民解放軍不僅在質量上早已超過敵人，而且在數量也超過敵人。全國的革命，已經迫近到最後勝利的時期。根據我黨中央的估計，祇要再有一年左右的光景，即可從根本上打垮國民黨的反動統治。我人民解放軍同國民黨的武裝鬥爭，經過艱苦英勇奮鬥二十多年，現在確實已到了最後勝利的時候。因此，我們全體指戰員，應該再努一把力，每個人必須參加這一光榮的最後的解放戰爭。這是中國歷史上最光榮的一年，也是每個革命同志歷史上最光榮的一年。……

己：秋季攻勢後，我們休整的時間是少了點。由於形勢變了，必須立即進關，不能再休息了。我們努力爭取打開天津、北平過新年。我們在北平、天津同華北友軍會師，將會是盛況空前的！

庚：進關是我們的光榮任務，我們應當萬分的興奮和高興進關。在關內的作戰中，建立我們新的功勞和光榮。每個連隊要保證沒有逃亡，沒有打仗怕死的孬種現象。我們要爭取偉大的勝利！

經過動員後，部隊情緒很高，決心要在解放華北的作戰中再立新功。

四野部隊入關時，解放區沿途群眾對我軍入關有三點評論：

第一是，部隊整齊。我軍穿著統一的新冬裝，行軍的時候確實是很威風的。從遼寧的鞍山到天津的寶邸歷時二十二天，在我縱隊的行軍途中，隊伍整齊，歌聲嘹亮。群眾對我軍的評語是：「兵強馬壯！」

第二是，部隊裝備好。我縱的裝備同裝備比較好的兄弟部隊相比是中等水平。但在當時來說我縱隊的裝備就很不錯了。爲了防空，部隊的汽車、炮兵大車都在晚上行軍，白天休息。在冀東的平原上，每天晚上都有機械部隊行軍，在數百里的公路上從黃昏後到天明汽車的燈光組成一條大的白光帶。站在高處一看，真是盛況空前！

第三是，部隊紀律好。部隊在解放區行軍，地方政府對部隊的吃、住、喝水等都招待得很好。在進軍路上發生了一個同群眾的關係問題，也就是少數幹部、戰士回家的問題。由於我軍有不少冀東籍的幹部、戰士，有的要走自己家門口過，有人的家離行軍路線很近。這是一個實際問題，解決得不好既會影響部隊也會影響同群眾的關係。經過研究，軍部做出了具體規定：凡是路過家門口的幹部、戰士，在沿行軍路線十里以內的，一律准假三天，回家探親。這一規定，得到了幹部、戰士和群眾的熱烈擁護，絕大多數人都能按時歸隊。當時部隊很窮，但軍部還是規定回家探親的人一律按一百斤糧食的折款下發現款。這一規定雖然數量很少，但發生了很好的效果。回家探親的幹部、戰士都說：「部隊沒有錢大家知道，祇要組織上有心就滿足了。」

部隊行軍到錦州以西的虹螺縣，軍長段蘇權奉第四野戰軍總部的命令，調任東北軍區司令部參謀處長。他即由現地返回瀋陽去了。當時我們軍部祇有一輛小吉普車和一輛救護車。段平時喜愛坐救護車，我們就把那輛車送給他了。老戰友惜別，真有難捨難分的味道，段蘇權是個很正派、很正直的同志，我們並肩戰鬥，配合得很好。

部隊到了天津寶邸時，在寶邸縣電話局我同北平附近的東野司令部劉亞樓參謀長打了一個電話。建議黃永勝回四十五軍任軍長。劉當即表示同意。過了幾天，部隊開進到寶邸黃就來上任了。我們全軍上下對黃都是歡迎的，黃永勝是四十五軍的老司令員、他對組建熱遼縱隊、組建八縱隊都是有很大功績的，團以上幹部對黃永勝指揮作戰的信心是很足的。

重要的決策

人民解放軍東北野戰軍入關後，整個華北的形勢大變。從東面的塘沽起到內蒙的綏遠，千餘里鐵路線上都是戰火連天。當年瘋狗一樣的傅作義，現在變成了烏龜，龜縮在北平城內一步也不敢外出。

爲了統一華北戰區的作戰指揮，中央軍委成立了平津前線指揮部。林彪任前線司令員和前委書記，羅榮桓任政治委員，聶榮臻任副司令員，劉亞樓任參謀長、譚政任政治部主任。

毛澤東原來是決定先打塘沽的。他電示林彪「我軍應不惜疲勞，爭取於盡可能迅速的時間內殲滅塘沽敵人」。但是，打塘沽的情況不盡人意，一是侯鏡如的指揮所已搬到軍艦上，打不贏他就跑了；二是天津的敵人也有向塘沽突圍的跡象；三是外圍的地形對我十分不利，塘沽幾乎都是鹽田、水溝，沒有遮蔽物，而且鹽田不結冰，部隊根本不能展開，祇能沿田埂前進。各軍首長都認爲先打塘沽不利，劉亞樓也到了現場，一看就明白了。先打天津是林彪堅持的，毛澤東幾經考慮終於同意了，十二月二十八日，毛澤東致電林彪、劉亞樓，「放棄兩沽計劃，集中五個縱隊全力奪取天津，完全正確」。

十二月十八日，我們按照東野總部的電示，攻佔了天津周圍的要點。

一三三師奔襲楊村，斬斷平津鐵路、公路交通線。在這次戰鬥中，消滅敵人 2000 多人，俘獲敵少將師長宋海潮。三九九團五連李慶春副排長一次就立了三大功，榮獲全國戰鬥英雄稱號。

一三四師、一五八師在天津至軍糧城之間擔任阻擊任務，防止天津的敵人向塘沽突圍。

一三五師攻佔楊柳青、靜海一線。共斃傷俘敵人 3000 多人。

我們用了四天時間就搶佔了天津城郊主要的交通要道和要點，敵人向塘沽突圍的通道被我八縱封住。

天津前線指揮部在一月初即成立了。劉亞樓任前敵總指揮。他上任後，親自到我們軍部下達作戰任務，並視察攻城的準備工作。劉亞樓同黃永勝說：「林、羅派我來天津是來實習的，在你們帶領下實戰實習。有請各位多多幫助，爭取考試及格。」黃永勝則說：「總指揮在上，請多多關照。給我們的任務越硬就是對我的關照。」

我縱的任務是「協同四十四軍由東向西並肩突擊，與由西向東的三十八、三十九軍在金湯橋金剛橋會師。爾後先南後北各個殲滅敵人。四十六軍和一個獨立師在天津的東南角實行佯攻。」劉亞樓司令臨走前，我們殺了一條狗招待他，大家吃得非常高興，各個滿頭大汗。當時，黃永勝帶來一臺像一個小箱子的收音機，放在指揮所裏，黃永勝「顯示」說，這是遼西會戰時廖耀湘「送」給他的，不料被劉亞樓看上了，拿著就走，劉亞樓還對黃永勝開玩笑說，你們八縱厲害，叫陳長捷再「送」你一個。當年，我軍高級幹部之間，無論是上下之間，還是同級之間的關係都是十分融洽的，這是我軍的好傳統。

天津以東是平地，土包子都沒有，地面上建築物也很少。這種地形對攻城部隊運動十分不利。必須在總攻之前，下決心挖交通壕改造地形，通道與通道之間必須連接起來，面向敵人的方向多挖避彈坑和「之」字坑道。一三五師、一三三師挖了數以萬米的縱橫交錯的交通壕，對減少傷亡起了極大的作用。在天寒地凍的嚴寒下，敵人的炮火也不斷襲擊，對改造地形帶來了極大的困難，我們的指戰員真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準備攻堅器材，模擬訓練。攻堅器材最主要的準備炸藥包和傳送炸藥包的訓練。在城裏，敵人的工事有很多是鋼筋水泥工事，對那些工事祇有使用炸藥包來解決。

在訓練中，除了步炮協同之外，還有一個新的問題就步坦協同。在天津戰役中，總部配屬了我縱一個坦克分隊，步坦協同作戰，是我縱有史以來空前第一次。這對突擊部隊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作用。戰士們說：「過去敵人用坦克來欺負我們，現在該我們用坦克來收拾敵人了。」這真是翻天覆地的變化！

但爲防止攻城部隊產生依賴思想，我們在戰前進行了認真的思想教育，著重說明了我軍在裝備很差的時候，打仗是靠人的勇敢，今天裝備好了，打仗仍然是靠人的勇敢！要發揮人的智慧與勇敢的作用。

我縱進入攻城準備的時候，十二月二十四日，天津市地下黨主動送來了城內敵情資料。我們立即將這些敵情資料繪製成圖，上報東野總部，總部又印發給了他部隊。我們根據資料和實地偵察，選定了突破口。擔任尖刀連的班以上幹部，在師團指揮員的率領下進行反覆地偵察，白天看，夜間摸、同時發揚了軍事民主，解決了很多的問題。這種從實踐出發進行訓練討論是最有效的訓練方法。在總攻前，擔任突擊的尖刀連和指揮作戰的營、團、師、指揮，對敵情，地形、運動道路等都很熟悉了，真正做到了心中有數。

三分鐘突破民權門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我軍對天津發起總攻。在這一天發起總攻，沒有別的任何原因，正是「人等氣候」。因爲祇有那段時間，天津護城河才能冰封，攻城部隊才能通過。

一月十四日七時，我軍對天津發起總攻。劉亞樓司令員在陣地指揮所一聲命令下：全軍開火！頓時千門火炮一齊轟鳴，大小炮彈辟里啪啦落在敵人陣地上，看起來就像急風暴雨中雨點打起的水泡一樣，傾時間，天津硝煙瀰漫，火光沖天。這是我軍有史以來最現代化的戰爭。

敵人在民權門的工事是相當堅固的，構築了大小近百個碉堡，並且是夾層的，前後兩道工事緊密相連，副防禦應有盡有，縱深達二百米之深。各碉堡地堡和散兵坑構成了嚴密的交叉火力網，縱深火力可隨時支援。爲了防止我軍接近和掃清射界，在四、五百米以內的民房都強迫拆除了。民權門是天津敵人的主要防禦陣地。

在炮火襲擊之後，我縱即向民權門攻擊。一三三師是個老部隊，由他們擔任主攻，但是屢攻不破，黃永勝發了很大的脾氣，讓一三五師上，一三五師對作戰準備十分充分，在副師長吳瑞山的帶領下戰壕都挖到敵人前沿陣地附近，黃永勝下命令後，吳瑞山親自指揮一三五師四團三連在三輛坦克和炮兵抵近射擊配合下，三分鐘就突破了民權門。這是我軍攻堅作戰史上一大奇跡！

該連勇士們十四日下午一時把紅旗插上了民權門。「殺開民權門」的紅旗在城門上飄揚。這面紅旗是一連英勇作戰的象徵，第一個把紅旗插到城門上的是鍾銀根同志，不幸他的雙腿被炸斷了，旗桿也被炸斷了。他被炸昏清醒以後，忍著劇痛，用雙手撐地，又一次把紅旗豎起來，真是氣壯山河！前後有五個勇士前赴後繼地把紅旗插上城門，最後是一個叫李澤山勇士完成的。

這面紅旗是勇士們的鮮血染紅的，整個紅旗血跡斑斑，彈痕纍纍，並有多處撕裂。這面紅旗曾經獻給了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我去軍事博物館參觀時，曾見到這面勝利的紅旗，引起了我對烈士的懷念。

一三五師預備隊投入戰鬥後，遭到了敵人屢次反突擊，全師雖然傷亡很大，但在友鄰配合下，縱深戰鬥發展很快。該師四〇四團十五日即進至金鐘河大街，消滅了守敵之後，三營七連即向金湯橋前進，把紅旗插到金湯橋上，七連指導員馬振海同志身先士卒，英勇衝擊，光榮犧牲。天津前敵指揮部的作戰命令是：「東西對攻部隊在金湯橋上會師」。我軍首長給一三五師的指令是：如果友軍先到橋山上，我則舉槍向友軍致敬，要是我軍先到橋上，祇能佔領橋的東頭一半，西頭另一半留給友軍。因為戰鬥還在進行中，對誰先佔領金湯橋曾有異議。後來，三十九軍曾向指揮部正式報告：「金湯橋是八縱先佔領的，我們向八縱學習！」

十四日十四時四十分，一三三師在民權門以北鐵路工人宿舍兩次突破均未奏效。後來軍首長命令該師從民權門進入城內，並向東南發展。該師進城後，巷戰打得很好，起到了積極作用，俘虜敵數千人，繳獲也不少，取得了很大的戰果。該師團政治主任長征同志在戰鬥中壯烈犧牲。軍的預備隊一三四師、一五八師先後於十四日二十時和十五日十時投入戰鬥。

一三四師直接向北洋大學方向發展，殲滅敵主力一五一師大部。一五八師投入戰鬥後，在一三四師的右側同該師同一個方向發展，完成作戰任務很好並取得了戰果。

天津戰役打得好！八縱共殲敵 28400 多人，俘獲敵少將師長張越群、陳賡華、何卓、陳琨。我軍也有很多戰鬥英雄，其中一三三師的副排長李慶春，一三五師的班長宋生，一三四師的副班長劉瑞林都榮立大功，一九五〇年出席了全國第一屆英模大會。

八縱打得好，但打得也很艱苦，尤其是一三五師，傷亡很大。清掃戰場時，黃永勝親自到民權門一線看一看，敵人究竟是什麼樣的防禦，打得如此艱苦。我們在走的一路上，看到我們自己犧牲的戰士，個個死得慘烈，身上的彈孔和外露的棉花，臉上血汗模糊一片。見此情景，黃永勝先是默默地流淚，走著走著他竟嚎啕大哭起來。他愛兵！爲這麼多慘烈犧牲的兵而流淚。我們以後的功名，就是這些烈士的鮮血寫就的，我們深深懷念這些戰友們。

城市政策紀律

天津戰役的城市政策紀律是很好的。東野總部的嘉獎令，就是對天津城市政策紀律總的評價。

嘉獎令

上月中旬攻克天津戰役中，我軍參戰部隊，三十八軍、三十九軍、四十三軍之一二八師、四十四軍、四十五軍、四十六軍、四十九軍及炮兵、工兵、裝甲部隊，紀律均極良好，認真愛護人民利益，保護工廠、倉庫、學校、醫院、公共房舍及市內各種設備和軍用物資。認真維護秩序，不亂打槍，使市面秩序迅速恢復。所有成批和分散的繳獲的物資，均交指定機關接收，沒有失散，使企業設備和其他各種設備除一部毀於炮火者外，未遭破壞。由於這種成績，使天津市民深為讚揚。從而使我黨我軍政策之推行獲得了許多便利條件。為了發揮此種成績，特對天津作戰各部隊指戰員致以謝意，並在全軍內傳令嘉獎。此令。

林彪 羅榮桓 劉亞樓 譚政 陶鑄
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一日於北平

中央軍委平津前線分會，對天津的城市政策紀律提高到了戰略地位。四九年一月底，東野總部進入北平以前在北平東面的通縣召集高幹會議。專門討論了城市政策紀律問題。林、羅、譚在會上講了話。

林彪講話很簡單，很有力量，他說：現在我們又要過一個大關了，就是城市政策紀律問題。這兩關的性質不同，怎麼辦？要領在哪裏？最主要的是「不動」！不管看到什麼好東西不要動手就是了。一般說來，沒有

犯紀律的戰士，祇有犯紀律的幹部，祇要幹部的覺悟提高了，城市政策紀律的關也就過去了。

羅榮桓講話比較長，是會議的主講，他主要講了三個問題。

(一) 對城市政策紀律的戰略地位問題。我軍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是傳家寶，現在我們提出的城市政策紀律也還是屬於這範圍之內的問題，但它的戰略地位提高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是軍民關係問題，城市政策紀律是執政的問題，這就是說，奪取全國政權之後，我們的黨要成為執政的黨，能夠管好城市是執政的重要問題。平津政策紀律好，是我們能夠執政的開始。

(二) 幹部責任性問題。……打仗是最大的政治任務。有一種人認為軍事任務是『硬』任務、政治任務是『軟』任務的說法是不正確的，是一種誤解。我們的部隊為什麼打仗總是完成得比較好呢？原因很多，從幹部責任性來說，軍事、政治、後勤幹部心齊是關鍵問題。領導幹部心一齊，帶領全體指戰員一起幹，就能夠把這個光榮傳統發揚到管好城市政策紀律上來。

……

(三) 抓得緊的問題。對搞好城市政策紀律是需要進行政治教育，思想動員的而且越深入越好。更重要的是要有強有力的組織工作，要有具體佈置，要有監督促進，要有實際解決問題的辦法。

……

對管好城市政策紀律預防是主要的，如果發生了問題再收拾就晚了。各部隊在自己的作戰區，派出部隊維持秩序。派出糾察隊，派出幹部檢查隊等都是必要的。這些也都是『抓得緊』的辦法。祝各作戰部隊，取得軍政雙勝利！

打天津之前，我縱隊在天津政策紀律做了具體的規定：

(一) 一切原封不動秋毫無犯，打到哪時保護到哪裏。在自己作戰區之內，一切公私企業，市政機關，文化設施，黨團機關、社會團體，軍事機關等等，祇有負責保護，不准清查，更不准破壞。

對外國租界和外國機構，如其內沒有敵對行為和私藏蔣軍軍官，我軍可以不入內，並加以保護。要是敵人利用上述單位實行抵抗，則堅決消滅之。

(二) 實行一切繳獲歸公。

(三) 遵守城市秩序，絕對遵守軍管會的領導。

(四) 絕對不准與友鄰爭繳獲。任何地方，祇要友鄰先到，我軍就不得進入；友鄰到我軍佔領的地方，則應以歡迎的態度與之相處。

(五) 絕對不准搜俘虜腰包。除武器和軍用品之外，任何東西都不准拿取。要堅決執行俘虜政策。

我縱在天津的城市政策紀律是很好的。可以說，做到了市軍管會滿意、人民群眾滿意、部隊滿意。這裏我想在無數的故事中舉三個小故事就可見一斑了。

第一個故事：老少三代團圓。

在民權門西北，有一家老少三代人，老爺爺七十多歲，他的女兒四十多歲，其外孫女十歲。一月十四炮火襲擊時，國民黨把他們攆出家園，在恐慌之中老少三代人走散了。

在戰鬥進行中，我軍在巷子裏看到一個小姑娘孤獨一人在哭。一個連指導員讓一個戰士在牆腳下給小姑娘挖了一個小避彈坑並交代小姑娘不要走，還給了他一點乾糧。指導員將救小姑娘的事報告了團政治處，並得到了主任的支持，派人協助指導員回到了小姑娘避身的地方，由於又餓又凍已經奄奄一息了，他們立即設法搶救了小女孩。待小孩甦醒之後詢問她，孩子祇記得自己家的巷子名，他們三人把孩子送回去時，可是孩子家已經成了一片廢墟了。

部隊幹部一直陪伴著孩子，當日深夜小孩子的母親果然找到家裏來了，母親看到女兒在解放軍照顧之下還活著，感動得痛哭。第二天早上，還是這個團的人又把老爺爺送回來了。部隊指戰員都為之喜慶，老爺爺三人身上帶的錢和吃的東西，一點不差。老爺爺和母親最後祇提出了一個要求：要告訴他們是哪個部隊的，小姑娘改名為軍女。後來這個故事在天津日報連載，部隊南下後，軍女同部隊一直有聯繫。

第二個故事：半瓶酒。

在金鐘河南岸邊有一家十多平方米的煙酒雜貨店子。十四日雜貨店被炮彈打塌一個小角，店內的貨物香煙、瓜子散落得滿地都是，有一瓶酒打碎了，下半截剩三分之一。部隊打到那裏時，把這小店子的東西收拾了一下，把店塌了的地方堵上了。並在店門上貼了一張紙條，上面寫著：這家店舖主人不在，我們部隊任何人不准入內。

十六日上午八時許，我同天津市軍管會工作人員一起進市去察看市內情況，我們走到該小舖門口，看到了門上貼的紙條，就停下來了，部隊的同志把前後情況都給我說清楚了。我感到這是一個「小麻雀」可以解剖一下，我即向維持秩序的部隊的同志說：這家舖子的主人回來後我們移交時，一定要請我和軍管會的同志到場。我們要從這個小小的典型來看你們部隊紀律的執行情況。

過了三小時之後店主回來了，我們和軍管會的同志立即到了現場。我向店主人說：現在你和你的家人，立即清查你的貨物，看少了什麼沒有？

因為店不大，貨物並不多，經過不多長的時間就查清了。店主人把貨物的原有數和現有數都開列出來了。店主人說：中央軍把我趕出家門三十多小時了，我店裏的東西除了打破一瓶酒少了不到半瓶之外，其餘什麼都不少。他最後舉手呼起「堅決擁護解放軍接管天津」的口號。

第三個故事：一桌還未吃的宴席。

天津東城離民權門不遠的地方，有一個「中國紡織工業第七廠」，簡稱「中紡七廠」，這個紡織廠是當時天津比較洋氣的廠子，廠內有總經理公館。在戰前根據市內地下黨提供的情況，我軍攻城開始炮火襲擊時炮兵注意到了對該廠的保護，整個工廠遭到的破壞不大。

十六日下午，我軍軍部決定從磚瓦窯裏撤出來，搬進中紡七廠總經理公館裏去。

我們到達中紡七廠總經理公館之後，大家上樓到了經理公館會議室，在當時來說，會議室的設備相當洋化，但一切東西都沒有動，仍然是規規矩矩「各就各位」。

大家坐下之後，我同黃參謀長就到處走著看看，當我們走到後麵食堂時，看到一桌擺得好好的酒席，我看到此景心中正納悶。此時參謀長開口說了：我們小灶司務長（管我們軍首長生活的）還不錯，一來就準備



平津戰役勝利後留影。

好了酒席，警衛排長說：才不是呢！我昨天來看房子就是這樣的！這引起了我和參謀長的注意。

我和參謀長走進了廚房等處看到了嫩好的肉、雞，案板上有炒好了各種菜，灶房裏各種各樣吃的東西都有，豐富得很！我軍炮火襲擊開始，這桌飯就吃不成了，「一桌還未吃的宴席」這樣留下來了。

我們回到會議室之後，把看到的事同大家詳細說了一遍，引起了大家的興趣。軍管會的同志回來後對大家說：「這次天津的城市政策紀律實在是了不起的，剩下的那桌宴席是最好的戰利品，你們吃了吧。」正好這時黃永勝來了，他說：「不能算戰利品，不許吃。叫司務長給我們做飯。」

我們四十五軍，在平津戰役比較好地完成了東野總部給予的任務。這次戰役同半年以前的遼瀋戰役前進了一大步。

勇猛果敢的黃永勝

關於對「和平民主新階段」的認識，黃永勝和冀熱遼的主要領導矛盾很大。黃認為和平不會白來，是要打擊敵人並取得勝利才能到來，有些



和一三五師戰鬥英雄、毛澤東獎章獲得者在一起。左一李祖珍，右一邱會作。

人熱衷「和平」。熱東四戰四捷後，黃永勝卻讓林彪給「盯」上了。四七年冬天，林、羅首長就把黃永勝調到我軍主力第六縱隊任司令員去了，段蘇權同志接任八縱司令。

黃永勝同志一九二七年參加秋收起義，跟毛主席上了井岡山，從此他一直戰鬥在革命鬥爭的最前列。毛主席曾說過，黃永勝是從戰士、班長、排長、連長一級一級上來的，直到當總參謀長。

在井岡山鬥爭最艱苦的時候，那時候能吃上「紅米飯、南瓜湯」還不錯呢！尤其是傷員苦不堪言。不少人要脫離革命隊伍，和黃永勝在一起的，要離隊的人，他一個一個都給勸回來了。

一九三三年，他在一軍團當團長的時候，屢建戰功，榮獲了紅星獎章，這是很大的榮譽。三四年開始長征的時候，他任一師三團團長，三團是殿後的，任務非常艱苦，過湘江時戰鬥相當慘烈；過草地的時候，他的牲口陷到軟草灘裏去了，在不短的時間裏，他都是走路。後來他任紅二師師長；一一五師組建時，他是六八五團團長，一直在重要的軍事指揮崗位上。平型關戰鬥後，他跟葛帥到晉察冀去了。

日本投降以後，幻想和平的空氣很濃，冀察熱遼幻想和平的空氣更濃，根本不想打什麼仗，八縱的任務幾次都是去北寧線扒鐵路。黃永勝同志對形勢認識得很清楚，他認為和平不是白來的，祇有打擊敵人，才能爭取和平，我們的思想很一致，軍、師領導的思想也很一致，所以我們在黃永勝的領導下積極找仗打，一下子搞了個四戰四捷，其實是六戰六捷，黃永勝說上面叫四戰四捷，我們就不要亂叫，不要自己吹牛皮，找仗打，不但消滅了敵人，武裝了自己，也鍛煉提高了部隊。

遼西的勝利，給了陳誠一個「見面禮」——當頭一棒！當時，八縱剛成立一個月，兵力不是很強，尤其是炮兵不強，炮少，炮彈更少。政委劉道生也沒有到位，黃永勝擔子很重，我這個副政委和參謀長黃鵠顯都盡力配合他工作。八縱當時還不到兩萬五千人，可是我們不到半個月就消滅了敵人一萬六千多人。當然，這裏面有指戰員的奮戰，但黃永勝是我們八縱的英雄。他判斷敵情快，下決心快，軍事指揮的功力很強。

尤其是第二次打楊杖子，47個小時就殲敵一萬兩千多人，而且是敵人的正規軍四十九軍，敵我傷亡是多少？10：1呀！戰鬥開始前，我們偵察的敵情是兩個團，黃永勝說：「兩個團來找我幹什麼？」部署部分兵力去打，結果沒打動。再去偵察，好傢伙，是兩個師！這下子黃永勝高興了，他很快就定下了戰鬥決心，一下就吃掉敵人兩個師加一個軍部，這就叫軍事指揮的功力吧。戰鬥結束後開幹部會，大家都很有興奮，但都說不出話來，都在面對面的「嘿嘿嘿」傻笑！

第二次打楊杖子的時候，還有一個驚險的故事：我們的指揮所設在山頂上，大家已經熬了幾天幾夜，黃永勝最為辛苦，兩眼熬得通紅，他從衣兜裏掏出煙來抽，我和黃鵠顯也很饞煙，就問黃討煙，黃說都揉爛了，我們以為他不肯給就把他按在地上，強行「搜查」，黃永勝說：「別打我的土豪呀！」正在這時，敵人一陣炮擊，向我們射來，塵土砂石像雨點一樣打在身上，此時正好「嗖——」一發炮彈落在我們不到十米處，但不見響，原來是一發臭彈，真是虛驚一場，不然全完了。黃永勝很鎮定，他抖了抖身上的土說：「媽的，敵人要跑。部署追擊圍殲！」

仗打勝了，這個時候承德那邊的怪話、風涼話也來了。自己熱愛「和平」，自己打仗不行，還說別人的不是。

八縱一下發展到四萬多人，林彪高興地說：「八縱還真有點主力的樣子。」不過林總也抓到了黃永勝，大家痛痛快快一起干了半年多，黃永勝就調到最大的主力六縱隊去了。

六縱是一一五師六八五團的老底子，黃當過團長。遼西會戰，黃永勝領導的六縱又立了大功，堵住了廖耀湘退回瀋陽，廖耀湘要是退回了瀋陽，東北的形勢又大不一樣了。

打天津時，黃永勝又回八縱。八縱天津打得好，三分鐘突破民權門，第一個攻佔金湯橋。平津戰役結束後，在北平開四野高幹會，毛主席特意叫黃永勝到前面來，可能林、羅首長向主席匯報了黃永勝在東北和平津的戰功吧。當時黃永勝很激動，我們幾個也跟著激動。

第十二章 向中南進軍

四野高幹會

平津戰役之後，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野戰軍（一九四九年三月由東北野戰軍正式改稱）奉令向中南進軍，解放全中南。部隊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都是有充分準備的。當時的中南區包括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廣東、廣西等六省。中南地區的敵軍主力為桂系白崇禧集團。

野戰軍高幹會原定遼瀋戰役後在瀋陽召開，但因急於進關未曾開成。後來才在北京舉行。打了兩個大戰役祇開一次高幹會，意義更為重大。

毛主席出席了會議，並講了話。那天毛主席非常興奮，他說：「在兩年半的解放戰爭中，我們消滅了國民黨反動派的主要軍事力量，…國民黨反動派的統治即將土崩瓦解。我們三路大軍就要下江南了，聲勢大得很、氣魄大得很！同志們做好準備下江南去，我們一定要贏得全國的勝利！」

高幹會的內容是：傳達七屆二中全會決議，討論進軍中南的任務。

林彪傳達七屆二中全會決議（因指揮打仗，林總未出席），有三點在我的記憶裏是比較深刻的，這就是：一，國內形勢問題；二，防止糖衣炮彈的問題；三，將革命進行到底，解放全中國。

七屆二中全會期間，解放戰爭期間的三大戰役——遼瀋戰役、平津戰役、淮海戰役已經結束，國民黨的敗局已定。長江以北已經解放，國民黨撤到長江以南的軍隊不到三百萬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力量，已經發展到四百多萬了，整個力量超過了國民黨，我軍解放全中國指日可待了！

防止糖衣炮彈的問題，主要是指階級鬥爭問題。全國解放以後，帝國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封建主義被推翻了，但資產階級依然存在，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是主要問題。過去的敵人是用真槍打我們的，但沒有打倒；今後的敵人會改變方式，用糖衣裹著炮彈來打我們。我們的人在戰爭年間是英雄，沒有被敵人打倒，解放後有的人可能是被糖衣炮彈打倒的，我們大家都必須警惕這個問題。

把革命戰爭進行到底是我們的方針。我們一定要解放全中國，決不能半途而廢。首先是國際形勢對我們有利。美國人想打第三次世界大戰也打不起來。我們向江南進軍，即使美國援助國民黨，我們也不怕，蔣介石沒有多大力量了，我們有力量打敗蔣介石解放全中國。在傳達之後，就是大會發言討論了。會上大都是政治委員上臺發言的，發言的順序也是照軍的番號排下去的。黃永勝無論如何不肯發言，我就祇好上臺了。我的發言，除了擁護七屆二中全會決議之外，主要講了解放中南的問題。發言的要點如下：

對解放中南的問題，可以說祇要我軍一到就是勝利，我們四野是有戰鬥力的，又有正確的領導與指揮，林總的指揮本身就是很大的戰鬥力。我們是有勝利信心的！

在解放中南的戰爭過程中，我們認為有三個值得注意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艱苦奮鬥的問題。部隊認為半個中國解放了，有吃有穿就不是問題了。但事實上，我們目前的物質條件、交通運輸還不能完全適應部隊的要求。我們餓肚子、打赤腳的可能性還是存在的。艱苦奮鬥這個光榮傳統還是傳家之寶，在部隊應當反覆進行教育。

第二個問題是同地方黨的關係問題。南方地下黨長期堅持地下鬥爭是有功的。我們是解放大軍，從南到北，現在又從北到南了，將來必定會有功臣相遇的，功臣碰到一起，不能沒有矛盾。對這個問題，既是軍隊同地方黨的關係，也是軍民關係問題。我們的原則是凡遇到這類問題首先放到軍民關係上來處理，進而一步再考慮到軍隊與地方黨的關係問題。

第三個問題是部隊的思想問題。過去部隊的主要思想問題是與個人生死有關的問題，現在主要的就是與個人前途有關的問題。其中突出的又是家庭婚姻問題。這個問題，對部隊影響是很大的。

軍屬的家庭生活比較好的很少，多數都低於群眾一般的生活水平。多數家庭祇有老人，勞力很少。固然有地方工作問題，但主要的還是戰爭的影響，大家要正確對待，革命徹底勝利了，大家都會過上好日子。

現在，我們同幹部做思想工作，一般的是很被動的。講大道理不能解決具體問題。幹部普遍說：「打仗的時候，我們從來不考慮個人問題，死了就一切都解決了。現在給我一點很少的時間去處理一下家庭問題總算合理的吧！」我們認為幹部的要求是合理的，準備有計劃地解決這個問題。在平津戰役前後，准許了少數幹部回家，絕大多數都能按時回來，反映很好。在今後的兩三年內，我們決定節省一切費用，省下錢來解決幹部和老戰士回家探親一次的問題。

對我的發言，會議做總結時林總還讚揚了我。林總同我不熟悉，事後他還專門向政治部宣傳部長蕭向榮調查了我的情況，蕭又來告訴我。林總對蕭說：「邱會作同志這個人，思想水平、工作能力都比較高，是一個很有發展前途的人。我過去不認識此人。」

林總在高幹會上的總結。他的總結主要講了三個問題：一，解放中南的問題；二，農村剿匪問題；三，政治思想工作問題。

一，解放中南問題。林總說：解放中南在作戰問題上，大家不擔心這是有道理的。因為總的形勢對我們有利，這是同蔣介石打了二十多年仗，第一次出現了我強敵弱的形勢。今後我們打仗，不是打不了的問題，而是打不到的問題。我們祇要把敵人抓住了，吃掉敵人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中南敵軍主力是白崇禧的桂系部隊，這個部隊的戰鬥力是相當強的，白崇禧的主力，現在部署在南昌以東的浙贛線和湖南境內的湘桂線。敵人在戰略上是要同我們拖延時間，等待所謂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我們則要力求提早結束戰爭，以便使人民得到休養生息，全國實行經濟建設。

我們向中南進軍，擬分為：東、中、西三路。東路四十、四十三、四十六、四十八軍。這路主要向南昌進軍，力求抓住敵軍主力在浙贛線殲滅之；中路四十一、四十五、四十九軍。這路向長沙方向進軍；西路三十八、三十九軍，這路主要是向湘西和桂西進軍，力求阻止敵人退入

貴州和雲南。各路大軍除四十、四十三軍先行出發了之外，其餘各路大軍都將在四月間先後出發。我們預計在今年內全部解放中南大陸地區。

二，農村剿匪問題，這是徹底解放農民的重要問題。大大小小的土匪是直接壓迫農民大大小小的蔣介石，不消滅土匪農民就不能解放。

我們今後的工作中心，從長遠來看重點在城市，但初解放的第一階段，工作的重點還應放在農村。農村問題不解決，城市就沒有飯吃。沒有農村的支援，城市人活不下去。

三，政治思想工作問題。我們目前正處在大變化的時期。我們將要取得全國的勝利，這是國家的大變化；我們將從長期戰爭轉為相對和平，這是軍隊的大變化；上面兩個大變化，必然引起軍隊思想的大變化。這是客觀變化的必然性。

在新的時期，軍隊政治思想工作應當有新的內容。例如，幹部和老戰士的家庭生活問題，婚姻探親等等都是新的問題。這些問題能夠解決一個，比留下一個總是好的。當然，整個問題還是要由國家來解決問題。

將革命戰爭進行到底，這個大問題仍然是中心問題。我們祇有把戰爭進行到底，我們才能徹底打敗蔣介石，解放全中國。我們不少幹部打了半輩子仗了，極大多數幹部和老戰士也打了幾年仗了，這些都是我們大家的光榮。我們大家都要珍惜革命的榮譽，也要珍惜自己的榮譽。榮譽來之不易，但容易毀掉！這是大家都必須注意的問題。

林總的總結最後說：「我們進一步團結起來，將革命戰爭進行到底，解放全中國！」。

當時，中央駐北京以西香山，四野總部駐城內王府井大街的北京飯店裏。一天下午，參加四野高幹的全體人員，均赴香山接受中央領導的接見。

參加接見的有各軍（四十、四十三兩軍已行動，南下了）和特種兵縱隊，總部各機關負責人。各軍為單位集體入場。我四十五軍參加接見的有：黃永勝、我，還有張天雲、黃鵠顯、林忠照（政治部副主任）。被接見的人入場後，由四野參謀長劉亞樓向毛主席等人一一介紹。毛主席拉著黃永勝的手說：「認識！」；拉著我的手說：「長大了，不認識了！」周總理拉著我的手說：「老樣子，認識！」。

接見完之後，就在接見廳裏集體合影。整個接見林彪、羅榮桓等都

在陪同。

接見和合影之後不久，宴會即開始了。這時毛主席站起來，邊張望邊喊：黃永勝在哪裏，到前面來。黃永勝從我們身邊到前面去了，他感到很光榮，我們都感到激動和光榮，毛主席跟他說了一陣子話。宴會用的桌子還是老方桌，酒杯是規格不一的老酒杯，飯碗是老土碗。菜很簡單，除涼菜之外，都是大盆菜。整個宴會的氣氛還是「老八路」作風。在吃飯快結束時，我和黃鵠顯看見周恩來副主席尚未退席，即去向周副主席敬了酒。周看到我們也很高興，我們連碰了三杯酒。

將革命進行到底

平津戰役之後，部隊思想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進軍中南之前專門進行了政治整訓，思想變化的實質上就是戰爭觀的問題，也就是是否將革命戰爭進行到底的問題，主要的是如下三個問題。

第一是繼續打仗的問題。我們的部隊，特別是幹部，對必須把革命戰爭進行到底，必須徹底消滅蔣介石，必須解放全中國，並無不同的意見，都是雙手擁護的。

第二是家庭問題，這是最主要的思想和實際問題。我軍以河北為主體的華北籍的官兵多於三分之二，當時駐在平津地區之間整訓，來隊家屬在三萬餘人次，平均一個河北籍的人來兩個家屬，不少是四、五口一起來了。這次家屬來隊充分看出來了我們與人民群众的密切關係，但幾萬家屬來隊，大多數都起消極作用，這對部隊是一個大的衝擊。四九年二月至三月間，全軍開小差或私自回家的有千餘人，這些人多數都歸隊了，我們對這個問題又採取了正確的政策，對他們祇是說服教育沒有給予紀律處分，穩定了部隊。幹部、戰士的家庭問題是個嚴重問題，主要是家裏都是老弱病小，沒有勞動力，生活困難。爲了協助地方政府解決部隊幹部、戰士的家庭問題，我們向冀中、冀東、熱河等地，派出了比較強的專門工作組，深入家庭一個一個地解決，對部隊思想穩定起到了積極作用。

第三是婚姻問題，這個問題也是主要的實際問題。婚姻問題最突出的是幹部和老戰士年齡都大了，早都超過了一般的結婚年齡。我們採取的政策是幹部和老戰士回家，祇要遵守政府的婚姻法，都可以結婚。

部隊存在上述思想問題和實際問題，是客觀的，實在的。怎樣解決呢？我們提出了教育、忍耐、抓緊六個字的方針。

（一）思想教育是政治整訓的主要問題，重點是輪訓幹部。以師為單位分兩期對連排幹部，部分班長和老戰士也參加了輪訓，輪訓的規模是很大的。

我在會上幾次講到：我們要進軍江南，要從根本上打敗蔣介石，奪取全國政權。今天我們奪取政權需要人民軍隊，將來鞏固政權仍然需要人民軍隊。就是全國勝利以後，建設社會主義時期也需要人民軍隊。解放了，在軍隊幹沒有前途的思想是錯誤的。現在的部隊的思想問題，不是怕敵人，不是怕打仗，也不是害怕美帝國主義。現在部隊最主要的思想問題，是個人的具體問題與當前形勢發生了矛盾，也就是個人前途與家庭等實際問題糾纏在一起了。我想，對這樣的問題，要有耐性，不要急躁，要告訴我們的幹部戰士，自八縱成立以來，尤其是在遼瀋戰役、平津戰役中，犧牲了多少戰友，他們不要說回家看看，就連自己父母的面也見不上了，他們爲了什麼？他們的個人利益又在哪裏？他們爲了人民解放，爲了建立新中國！我們把道理講清楚是完全可以解決問題的。我們應當相信幹部的極大多數是會革命到底的！因此，經過部隊各級領導的深入工作，達到了較好的效果。

（二）忍耐問題。對這個問題首先要承認兩個基本事實：一是，我們的幹部是會革命到底的；二是，我們不少幹部當前遇到很多的困難，這些困難落到誰頭上都是問題。部隊幹部的困難是爲革命造成的，對幹部的困難不承認是不行的，我們要商量的問題就是怎樣暫時忍耐的問題，大家要從苦悶中走出來。等全國解放了，問題都能得到解決。

（三）抓緊的問題。對幹部隊伍存在的困難，我們軍黨委和軍首長是很注意的也是抓得很緊的。軍黨委的決定是：一，進軍中南一段落之後，在當時的形勢可能時，幹部回家一次；二，由軍派出工作組到各根據地，普遍訪問軍屬並協助地方解決可以解決的問題；三，現在少數人自己回家去了，祇要自動歸隊，軍裏準備正確處理他們的問題。

幹部們對黨委的決定，反映很強烈。大家說：「對黨委的決定，我們心服口服，祇好把困難藏在肚子裏，先執行指示。」極大多數都是比較高興的進軍中南了，在湖南和廣西的仗也打得很好。我軍幹部的主體是很好的，是戰鬥力強大的基礎，四十五軍進軍中南，是做出了自己的貢獻的！

向江南進軍

一九四九年四月間，第四野戰軍轄四個兵團，十三個野戰軍，每個軍轄四個師和若干炮兵師，大舉南下，向中南進軍！

第四野戰軍由平津地區出發，沿著平漢路兩側分兩路南下。大軍到了豫鄂交界時，則兵分三路：一路在平漢以西，直指鄂西、湘西；中路沿著平漢路，直指漢口；一路經大別山以西，直指鄂東。三路齊頭並進向長江及其以南進發。由於人民群眾對自己軍隊的熱愛，親切地稱解放軍為大軍。

第四野戰軍總部駐武漢，司令部設在漢口當年的白崇禧「剿匪」總司令部內，當地人民說：剿總大樓，今天成了林彪大樓。解放後，白崇禧的老樓已經有傾斜之勢，我們又在老樓的旁邊照老樓的樣子建了一座新大樓。在老大樓的北邊，有白崇禧公館，門牌為 100 號。

一九四九年四月十日，我軍由天津南楊柳青出發，奉命向長江以南進軍。我軍由天津到湖南湘潭，實際行程約一千五百公里。行軍分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由天津至湖北鄂城。這一階段走的路線是：先沿津浦線南下，轉魯西曹州，豫東商丘、周口，豫南潢州、新縣，再經湖北麻城，六月二日到達長江南的鄂城。在鄂城進行了約一個月的休整。

第二階段：由鄂城至湖南湘潭地區。這一階段走的路線是：經崇陽、通山，翻過幕阜山到了江西境內，再經修水、銅鼓、萬載，八月四日到達江西萍鄉，再到湖南湘潭地區。在該地區休整了一個半月。

四十五軍南下編制序列：

軍長：陳伯鈞（南下開始時，黃永勝還是隨軍行動）

政委：邱會作

副軍長：張天雲

參謀長：雷震

政治部主任：段德彰

政治部副主任：林忠照

後勤部長：劉錫三

一三三師

師長：張萬春

政治委員：謝明

副師長：鄭壽才

參謀長：韓仰山

政治部主任：鍾池

一三四師

師長：黃鶴顯

政治委員：謝家祥

副師長兼參謀長：張曉冰

副政治委員：汪易

政治部主任：藍文兆

一三五師

師長：丁盛

政治委員：韋祖珍

副師長：吳瑞山、韓聲濤

副政委：龍標桂

參謀長：劉江亭

政治部主任：任思忠

一五八師

師長：李道之

政治委員：王曉生

副師長：徐其海

參謀長：莫易明

政治部主任：侯全智

四十五軍南下時是四個師，一個軍屬炮兵團，兩個補充團和後勤機關等，全軍共計八萬五千人。我軍南下時真正是一個人數相當多的野戰



和四十五軍戰友在一起。左起：孔瑞雲、丁盛、邱會作、林忠照、謝明。

軍，當時我軍一個軍的人數同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紅軍由江西瑞金出發長征時的人數幾乎相等。

我們剛出發十天，就接到四野總部發來的毛主席、朱總司令《向全國進軍的命令》，號召全軍將士「要堅決、徹底、乾淨、全部地殲滅中國境內一切敢於抵抗的國民黨反動派，解放全中國！」這對部隊是一個極大的鼓舞。

四十五軍南下是經過了嚴峻考驗的，大多數幹部戰士是「背井離鄉」了，但是在戰勝了不願離開家鄉的保守思想後，部隊又浩浩蕩蕩南下了。那時哪有柏油路，都是土路，部隊行動千軍萬馬，塵土飛揚，「車轆轤，馬蕭蕭」似一條黃龍翻滾，十分壯觀。但是到了安徽境內，又正值梅雨季節，天天淅淅瀝瀝的小雨，部隊沒有雨衣，戰士們幾乎是穿著濕衣服行軍和生活。六月初，部隊跨過長江就進入雨季，部隊常常冒雨行軍走在泥濘崎嶇的上路上，雨一停就是暴曬的太陽，部隊對南方炎熱的天氣很難適應，但是叫苦的反而少了。

七月十八日轉輾行軍到湖南的湘潭地區，在行軍中度過了一個酷暑，發過痢疾或中過暑的全軍近八千餘人，但大部分能堅持隨隊行軍，能夠按時到宿營地的，一般的都祇有一半左右，對這些人幹部都稱之為「神仙」。部隊行軍差不多都要走一天，等一天，兩天的路分為三天走，部隊中暑的慘狀是難以形容的。

軍直屬隊一梯隊四百餘人，大約是七月十五日由湖北通山向幕阜山北麓出發，這是一條由湖北通往江西的大道。我們上路走了約兩小時就有一半的人倒在路兩旁了，當時祇好停下來休息兩小時，經過急救和休息之後，才能繼續行軍。後來，我們軍直屬隊改為早晚行軍，每天行軍路程不超過五十里路。這樣大約經過一個星期之後「好漢」就多起來，對暑熱也挺得過了。

從天津出發，我們已經走了三千多里路，我全軍將士得到了極大的鍛煉，真正成為名符其實的「野戰」軍了！

南下一路沒有打什麼打仗。大約是七月下旬，四野總部組織湘贛戰役，四十五軍的任務是在江西萍鄉一帶切斷湘贛鐵路和公路，堵住白崇禧逃往湖南、廣西。一三四師在江西銅鼓以南，四野總部命令該師截擊由南昌西撤的騾馬牽引的炮兵部隊和運輸部隊。部隊經過三小時多的急行軍到達了離公路六、七里的地方，部隊散了架子，滿山遍野都是人不能繼續前進，不少人甚至都不能動彈了，口裏不向外冒白沫。我拿起望遠鏡一看，公路上向西撤退的敵人車輛多得很，但又一點辦法都沒有。全師能支持的幹部、戰士集合起來共計不到一千人，由副師長帶隊打到公路上去了，但敵人的主力已經過去了，祇截到一個尾巴，繳獲不多。還好，總部並沒有批評，可能知道部隊境況，林總這次很「客氣」地說：「這次跑幾個敵人也無妨，下次一起收拾。」

一九四九年八月初，我軍進到了湘潭地區，就停下來休整了。這是由兩個原因決定的，第一是敵情發生了變化。白崇禧的部隊都由浙贛線撤到湘桂線的湖南地區。主力在衡陽至寶慶一線，同時還揚言要在衡陽同我軍決戰。第二是我軍急需休整恢復體力。當時部隊病號很多，幾乎失去了戰鬥力，不休整是不能戰鬥的。總部命令，四野全軍都在就地休整兩個月。

山地運動戰的典範

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四十五軍在江西的萍鄉地區奉命進入湖南，經株洲西渡湘江到了湘潭、湘鄉地區。我軍十月一日進至湘西南的永豐鎮宿營時，從無線廣播上收聽到新華社的消息，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門城樓上莊嚴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毛主席的話真是驚天動地，對部隊鼓舞極大！

原來，我們估計白崇禧可能要在廣西才與我軍決戰。這時，林總獲得絕密情報，立即調整了部署，急令十二兵團司令蕭勁光「四十一、四十五、四十三個軍，直接向寶慶、衡陽之間及其以南前進，設法抓住一股敵人，並斷其後路。」我們也就是在十月一日晚上，接到四野總部的命令：「白崇禧主力還在衡陽、寶慶地區，我們決心在該地區與白崇禧決戰」。部隊立即向衡寶公路一線攻擊前進。那時，部隊勁頭大得很呀！「以戰爭的勝利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消滅白崇禧向新中國獻禮！」成為我們戰鬥動員的主要口號。

敵我態勢。白崇禧主力第一兵團和三兵團（轄第七軍、第四十六軍、第四十九軍）和十一兵團，部署在西起寶慶，東至衡陽和衡寶之間的水東江地區及其以北的永豐鎮，形成「品」字形防線，企圖在衡寶公路上與我軍決戰，敵人兵力約為三十萬人以上。我軍當時在衡寶線附近的部隊為：四十、四十一、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九五個軍。四野總部九月九日命令十二兵團指揮上述五個軍會同在寶慶以西的十三兵團殲滅白崇禧第一兵團於寶慶。九月三十日我軍開始戰役行動。

十月二日，四十五軍各師按照軍的作戰命令均向衡寶公路上的水東江一線攻擊前進，各部均與敵有所接觸。這證明了敵人並無撤退的跡象。我軍在衡寶線上與敵人決戰成為現實。

十月五日，四野總部感到我軍在第一線的部隊過少，決戰力量不足，即命令十二兵團指揮的各軍停止前進，均在現地待命。同時總部命令十三兵團向寶慶、祁陽之線攻擊前進，二野五兵團向衡山衡陽方向急進。我軍可集結十四個軍的部隊，四野幾個重型炮兵師亦向湘潭至寶慶公路上集結，我軍準備強大的兵力與敵決戰。

整個戰場形勢是：白崇禧對我軍的意圖一時捉摸不到，敵人各部隊都在原地未動。由於山地使部隊的運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我軍的戰役決心也定不下來。整個戰場出現了暫時的平靜。

十月五日，四野總部考慮到我軍一線兵力不足，不宜推進過快，十二兵團發出各部隊停止前進的命令。一三三師、一三四師、一五八師都停了下來，一三五師在行進中未開設電臺，沒有接到電報，該師五日拂曉突破了衡寶公路上的水東江段，向公路以南急進了。沒有接到命令，實際上也等於「沒有執行命令」。如果該師開設電臺，他們也會是照樣在公路以北原地待命的。由於一三五師意外地跨過了衡寶公路。敵我形勢開始發生急劇變化，也打亂了敵人的部署。

斬斷敵人退路，這是衡寶戰役取勝的關鍵問題。因為一三五師這一行動，敵人認為林彪在搞名堂，敵人要判斷清楚林彪的意圖是要一定時間的；再說敵人就是做出了正確判斷，實行撤退也是需要時間的。敵人佔用的「兩種」時間，恰好就為我們集結更大的力量爭取了時間。四野總部知道一三五師的位置後，林總下令一三五師直接歸他指揮。這樣一三五師跨過衡寶公路，反而「弄拙成巧」，被林總視為插入敵人防區的「釘子」，為整個戰局創造了戰機。林總利用了該師的行動捕捉了戰機，也祇有林總這樣的軍事家才有勇氣和決心利用這個戰機。林總直接指揮一三五師並非祇是指揮方法，是有重大的軍事意義的。第一，總部電臺直接同師聯絡，最快時一份電報在十幾分鐘內就可辦好。如果按級指揮，經過師、軍、總部三級，一份電報最快也要一小時才能辦完。第二，能夠最好的協同動作。總部是最有權威的協同組織者，能夠很快決定和解決問題。第三，總部直接指揮到師，增加了下面的信心。

一三五師歸總部直接指揮，很好地完成了任務。該師表現出了三大特點：一是堅決向前打，不顧慮敵情；二是克服了山地沒有道路的困難，不叫苦；三是克服了陰雨、沒有糧食、沒有鞋穿的各種困難。五日，一三五師在祁陽縣境的白地市、黃土鋪，切斷了敵人的退路，完成了偉大的戰略任務。在兩天的時間內，該師行軍作戰的路程，總在一百六、七十里之多，而且又是在攻擊前進的，其困難就可想而知了。我一三五師如果晚五小時切斷敵人的退路，那麼，衡寶戰役就祇能打成勞而無獲。

的戰役。林總給一三五師的任務很明確：翻毀湘桂鐵路，炸毀橋樑，切斷敵人南撤廣西的退路。

這時，我四野大軍已做好圍殲敵人的準備。白崇禧也準備全線撤退。四野總部立即下令追擊、圍殲敵人，四十一、四十五、四十、四十九、四十六軍，二野十八軍及二野五兵團主力，全力向衡寶地區攻擊前進。白崇禧的七軍（四個師）是他的起家部隊，號稱鋼七軍，北伐時贏得「鋼軍」美譽，抗戰時也是臺兒莊大捷的主力，「鋼七軍」是全部美式裝備。

一三五師打到白地市、黃土鋪一線之時，四〇三團與師主力失去聯繫，部隊由軍組織部長林謙和師參謀長劉江亭帶領，記得團長是劉世彬，政委是李濟宗。在險惡的情況下，部隊三天三夜祇吃了兩頓稀飯，五天五夜不睡覺，但沒有一個人叫苦，消滅敵人的決心更加堅定，充分表現了人民子弟兵英勇頑強、艱苦奮鬥的革命精神。四〇四團（團長冰野，政委卜占亞）、四〇五團（團長韋統泰，政委荆健）在轉移中恰好與從衡陽向廣西撤退的白崇禧的王牌部隊第七軍軍部相遇，他們向敵人發起猛烈攻擊，把敵人割成數段，甚至經過多次白刃格鬥，終於把號稱「鋼七軍」軍部和四個主力師徹底消滅。四〇五團二連李九龍連長兩次負傷不下火線，三排機槍手少林雲雙腿被打斷，坐在地上還向敵人射擊。四〇四團在平津戰役中榮獲「金湯橋連」的七連打得尤為勇猛。一三五師的勇士們，大都一兩天才吃上一頓飯，幾天都沒有合上一眼。他們用鮮血創建了「腰斬七軍」、「猛虎撲羊群」等英雄連隊。戰後四〇五團榮獲集體一等功，這是我軍歷史上罕見的。

整個衡寶戰役殲敵五萬餘人，其中四十五軍殲滅敵人二萬餘人。白崇禧最精銳的「鋼七軍」全部被殲滅，這是衡寶戰役的最大勝利。衡寶戰役勝利之後，湘南地區全部解放，白崇禧總部退至桂林。白崇禧由於失去了第七軍，在桂林官邸痛哭不止。

一三五師在衡寶戰役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都是客觀事實，但集中到一點上就是「五小時」的問題。如果該師晚五小時到達黃土鋪、白地市，敵人都過去了，就祇能是自辛苦一場了！總之，時間就是勝利，在林總的直接指揮下，一三五師爭取了五小時，取得了整個戰役決定性的勝利。

衡寶戰役的重大意義

衡寶戰役的勝利對全國有很大影響，對蔣軍有很大震動，對人民解放軍有很大鼓舞。

衡寶戰役是我軍在解放戰爭三大戰役之後，又一次重大的勝利。戰役勝利的意義在於：

第一，消滅了國民黨最強大的地方勢力之一桂系白崇禧主力。

第二，加速了廣西的解放。四九年三月四野北平高幹會之後，林總就專門談到白崇禧和廣西的問題。林總說：「中南大陸的問題，廣西是主要的，廣東還是次要的。」白崇禧的主力如果不被消滅，全部回到廣西去了，我們要付出相當代價才能解放廣西。

第三，對國民黨軍隊，特別是對國民黨地方軍有很大的震動。平津戰役時，毛主席提出了三種方式，即綏遠方式（投降改編）、北平方式（和平起義）、天津方式（徹底消滅）。白崇禧走的是天津方式。白崇禧在國民黨中是一個有影響和有實力的軍閥，他都不能避免被消滅的前途，其他的人就更不用說了。

衡寶戰役的勝利是永留史冊的，四十五軍是有貢獻的。

當時，四十五軍在四野不是頭等的部隊。但這個部隊有朝氣，總是想進步，部隊是有希望的。我軍一九四七年組建縱隊到衡寶戰役，恰好是三週年。在三年裏，四十五軍參加了四七年的熱河東部秋季戰、遼瀋戰役、平津戰役和這次衡寶戰役，共四次大仗；在四次大仗的前前後後，又打了無數的小仗。我軍得到了很好的實戰鍛煉，是在戰鬥中打出來的。對衡寶戰役能夠做出自己的貢獻，是有堅實基礎的，衡寶戰役殲滅敵人四個主力師，主要是四十五軍直接完成的。

第四野戰軍到江南後，衡寶戰役是第一仗，取得了很大的勝利。四十五軍對戰役作出了很大貢獻，得到了很大的獎勵和榮譽，對部隊鼓舞很大。

四野總部，十二兵團在戰鬥進行中和戰後，對作戰部隊連續嘉獎。二野十七軍除發來賀電之外，還派軍文工團去一三五師演出和祝賀。

蘇聯作家西蒙諾夫（《日日夜夜》作者）、著名記者穆青由北京專程來我軍訪問。我軍軍、師、團、營、連戰鬥英雄等，同他相談了一個星期，記錄了大量的資料，有的被採訪的功臣，淚流滿面地說：「新中國都

成立啦，新中國都成立啦！我打死十個、一百個敵人不算多，我犧牲了沒關係，一定要蔣家王朝給我陪葬！」這真是氣壯山河。後來西蒙諾夫寫了一本書叫《戰鬥的中國》，歌頌了衡寶戰役的勇士們。華中局（中南軍政委員會尚未成立）動員了中南地區百餘名文藝工作者和新聞工作者來我軍慰問，著名電影演員舒繡文就來我軍慰問了很長時間。慰問團深入連隊同戰士見面，對部隊起到了實際鼓舞作用。

衡寶戰役之後，我軍在湘桂鐵路線湘南地區整訓，軍部駐在祁東縣城洪橋鎮。大約十月中旬，我和陳伯鈞兩人到衡陽市去向四野總部前敵指揮所匯報。林總、蕭克參謀長、譚政主任等同我們進行了長時間的談話。

林總一見陳伯鈞和我的面就說：「你們八縱隊（林習慣稱縱隊）打了勝仗，這次戰役消滅敵人的數量不算多，才兩萬人，但質量很高，是白崇禧的主力。消滅了敵人的主力，等於解放了廣西。」



一九四九年十月，衡寶戰役結束後，四十五軍軍長陳伯鈞（前排中），政委邱會作（三排左三）與到該軍採訪的蘇聯著名作家西蒙諾夫（前左一）合影。
二排左二為著名電影演員舒繡文。

林總接著說：「你們縱隊是個好部隊，我看有三個優點：一是，戰鬥作風很好，指到哪裏就能打到哪裏。部隊祇要具備了這個優點，就什麼都能辦到。一三五師從衡寶公路的水東江打到湘桂鐵路的祁陽境內的白地市就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對整個戰役起到了決定性作用；二是，部隊軍、師兩級的指揮相當熟練（蕭克插話：陳、邱兩人都是實幹家）；三是，部隊能吃苦。你們這個部隊是哪些部隊編成的？」

我說：我們這個部隊是各個山頭的「聯軍」。主要成份包括：陝甘寧邊區的寶塔山，冀晉魯豫的太行山，晉察冀的五臺山等山頭。

林總：啊，你們部隊同東北部隊一樣，都是「八國聯軍」。我們要用戰鬥作風這個問題來統一部隊的作風。

陳伯鈞說：林總提出戰鬥作風這個問題，對部隊建設起到了極為重要的作用。我們的邱政委三年來一直抓住這個問題不放，並經過嚴肅的鬥爭，現在抓出成效來了。

林總：「用戰鬥作風這個詞好，通俗易懂。我們部隊無論進行軍事訓練、政治教育和各種工作都是爲了提高戰鬥力，因爲部隊的主要任務就是打仗。戰鬥作風這個東西是無形的，但又是實際存在的。想打仗，喜歡打仗，不怕打仗是培養戰鬥作風的中心問題。培養出一個好的戰鬥作風，固然要在實戰中鍛煉，但平時工作抓得緊就是爲培養戰鬥作風服務的。」

我們談了大約有一兩個小時，我和陳伯鈞中午同林總、蕭克、譚政共進午餐。伙食之簡單這裏就不說了。我們正在吃飯時，情報部門送來一份情報。內容是：白崇禧下命令炸毀濱陽以西通往桂西的一座橋樑。林總對這份情報沒有多大重視，祇說了一句話：「白崇禧防止他的部下到桂西去當小土皇帝。」不久，接著送來兩份情報。其中一份說，白崇禧速下命令所有香港票子一律封存，不准外發。另一份說的是，白崇禧下命，對部隊冬裝的運輸，祇送棉衣不送棉褲。林總對三份情報合在一起就十分注意和十分興奮了。

林總說，剛才的三份情報，可以判斷出白崇禧動向來，第一，他不曾退到桂西和雲南、貴州交界的地方同我周旋；第二，他下的命令都是準備撤退海南島的，白崇禧已經下決心撤退到海南島。

林總繼續說：中南地區在大陸是最後一仗了，這仗怎麼打法，是很值得考慮的問題。中心問題是，打到敵人撤退的道路上去，關住「海門」。現在我們如果有辦法打到廣東的湛江、廉江、北海和欽州去就一切問題都解決了。林總說，我們來開個簡單的作戰會議。你們兩（指陳、邱）也參加會議。會議開始，林總要參謀人員講三個問題。一是，四十、四十一軍和二野四兵團和四十三軍的位置；二是，由廣東欽州以北地區和江門地區到湛江的地理情況；三是，白崇禧和廣東的張淦兵團的態勢。司令部的工作人員以非常熟練的口氣報告了上面提出的三個問題。

敵人的態勢是：粵西和廣西的敵人聯在一起了。主力在西江以南的高要、梧州、玉林、南寧之線；西江以北的敵人，在對我實行運動防禦。敵人的部署也是撤退到海南島的態勢。

大家對怎樣打法，提了一些意見。林總經過深思熟慮之後，斬釘截鐵地說：這個仗沒有別的打法，祇有發揮四兵團的作用，由粵西指向湛江才能比較好的解決問題。我們要求四兵團能夠做到三點：一，晝夜兼程前進；二，忍受還沒有發上冬裝的困難；三，要象錐子一樣的向敵人後退的湛江、廉江一路進攻，迫使敵人不能安寧渡海。此舉如能成功就能消滅敵人大部分，我軍忍受一分困難就能多得一分勝利。

林總繼續說：四兵團在沿海從東向西打，四十軍、四十三軍在西江以南也由東向西打，四十一軍、四十五軍則在廣西的中部由北向南打。這樣三路大軍都能向敵人「後院」打擊，我可實行穿插分割，一塊一塊的把敵人吃掉。當然，四兵團是起決定作用的，他們起的作用越大，我軍的勝利就會越大的。大家對林總的指示佩服至極，沒有話說的。粵西、桂東南粵桂邊戰役形成了，戰後的結果，同林總的指示大體一致。

進軍廣西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八日，我軍由湘南的祁陽一帶出發，向廣西進軍。四十五軍進軍廣西是尾隨四十一軍之後的，廣西北部大部分地區已經解放。

廣西山多，除了山還是山，能種糧的地很少，而且山好像都是一個一個壘起來的，一個比一個高。另外，廣西有瘴氣，會患惡性痢疾，那

是一種很厲害的傳染病。我們四十五軍在熱河就是條件艱苦的地方，現在又到了另外一個條件艱苦的地方！

廣西是少數民族很多的地方，講話不懂。廣西地主武裝很強，土匪很多，大點的村子都有碉堡。那些地主武裝也好，土匪也好，對我們都是偷偷摸摸幹的。你去拉屎，屁股上就是一刀，什麼時候都有死的可能。廣西人排外也很厲害。

我軍進廣西是沿著湘桂鐵路線前進的，我們路過桂林時，在那裏休息了一天，除略為參觀了「甲天下」的風景之外，晚上我和陳伯鈞還出席了四十一軍在白崇禧公館專為蘇軍作家西蒙諾夫舉行的生日宴慶。西蒙諾夫是離開四十五軍後到四十一軍去的，那位大記者看到我們非常高興，他特別高興的是，在我們軍裏訪問時，我們在一起喝醉過兩三次。據說，按照蘇聯人的習慣，主人和客人一起喝醉酒，對客人是體面的事。那位大記者見到我們之時，總是要擁抱。陳伯鈞很會應付這一套，他彬彬有禮地親吻西蒙諾夫女打字員的手，我們這些土包子高興地熱烈鼓掌。當天晚上，我事先有準備沒有喝醉，大記者和陳伯鈞又是喝得醉成一團了。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八日四野總部命令，粵桂邊戰役正式開始。總部給四十五軍的命令是「直插南寧、欽州一線」。

泅渡西江戰鬥。我們接到總部命令，即命令一三三師經黎塘在橫縣渡過西江，並直指南寧以南的小董墟斷敵退向欽州之路。如果我軍在小董墟未曾斷住敵人，則自動向欽州，北海線追擊；一三四師經賓陽直指南寧。如果南寧之敵未退，則對該敵包圍之。一三五師在黎塘、貴縣之線集結，為軍的預備隊。我們要求各作戰部隊，必須堅決執行總部的命令，實行猛打，猛插，猛追的三猛戰術。我軍必須以「手長腳快」的戰法，把敵人消滅在逃跑的路途之中。

軍的指揮位置在黎塘以東的單塘墟。

一三三師在橫縣渡西江。西江是連接廣東廣西的運輸大江。在當時的條件下，我軍渡過西江也是遇到了很多困難的。例如，由於地理條件的限制，我軍僅有的炮兵也不能使用到戰鬥中去；我軍又是緊急渡江，沒有充分的時間準備。

爲了掩護南寧之敵南撤欽州，敵人對東面的橫縣和北面的崑崙關都是必守之地。橫縣的守敵爲地方部隊一個團。對守敵來說，西江是一個比較好的屏障，敵人有比較堅固的土木結構工事。對敵人的戰鬥力和工事都不是我軍考慮的主要問題，主要考慮是渡江。

當時，江上的船隻都被敵人控制在南岸，在此情況下，一三三師的鄭壽才副師長和擔任渡河的三九八團團長共同商定後，立即決定召開全團連以上幹部會，發揚軍事民主，討論了怎樣渡江的問題。在渡江之前，一三三師偵察連派了一個班在橫縣以西偵察敵情和地形，不幸的是我們有三個偵察員都被敵人抓住，敵人非常殘忍把我軍戰士雙手砍掉了，耳朵和生殖器都割掉了，把活人丟在水裏淹死了，我們在江上撈到了屍體三具。偵察員的犧牲對我突擊隊是一個很好的臨戰動員，更加激起了我軍的作戰積極性，決心給戰友報仇。部隊將全團會水的二百餘人都集中起來，這就是渡江的主要突擊力量。

對渡江戰鬥進行了簡短的準備。第一是，組織突擊隊。突擊隊編爲三個排，成立臨時支部，每個排成立一個黨小組。第二是，集中全師的迫擊炮和重機槍，掩護渡江。軍、師都有炮兵，由於受地形的限制，不能上戰場參加戰鬥。第三是登陸點選擇在縣城東南約三里路的地方。經過四小時多準備後，渡江部隊於十二月五日拂曉一舉渡江成功。我軍登陸成功後，突擊隊立即派人押送船隻到北岸，接應部隊渡江。部隊五日渡江成功，大約十時就佔領了橫縣，在該處經過很短時間的集結之後，立即向南寧南的小董墟攻擊前進了。

小董墟戰鬥。粵桂戰役到了十二月上旬之後，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四兵團已經進到了雷州半島；十五兵團正在向玉林攻擊前進；四十軍、四十一軍和四十五軍已經在從梧州到橫縣的幾百地段上南渡西江。敵人全線動搖了，主力部隊都南撤了，決心退到海南島去，敵地方雜牌部隊有計劃的進入山溝，並採取化整爲零的戰術與我周旋。我各路大軍按照總部作戰命令，正在猛烈地向敵人攻擊前進。

我軍根據當前的形勢，調了部署，並發出了戰鬥號召。一三三師在橫縣渡江之後，應自擇路線分兩路向小董墟迅猛攻擊前進；一三四師在南寧的西南向小董墟攻擊前進；一三五師在桂平一線南渡西江，向貴縣通往玉林的公路上迅猛攻擊前進。

我們除了向部隊提出了猛插、猛打、猛追的戰鬥號召，還提出了三條具體要求：1、不顧一切疲勞，晝夜兼程勇猛前進；2、各級指揮員要在部隊的前面，根據變化了的情況，及時調整部署；3、輕裝行進。部隊的炮兵，傷病員及其他笨重的東西，一律不要跟大部隊前進。各師對軍的作戰命令和戰鬥號召執行是堅決的。凡執行得越堅決，取得的戰果就越大。

小董墟戰鬥，我軍繳獲物資甚多。白崇禧老婆新從美國進口的「道奇」小臥車和數以百兩的金條都成了我軍的戰利品。小董墟戰鬥參戰的部隊很多，有我軍兩個師和四十、四十一軍友鄰兩三個師，當時注意友鄰關係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我們電令一三三師不與友鄰爭東西，要注意團結，該師做得比較好，沒有與友鄰發生糾紛。小董墟戰鬥結束後，整個粵桂邊戰役就結束了。

平而關戰鬥。一九五〇年二月初我軍一三四師取得了平而關戰鬥的勝利，平而關戰鬥是在粵桂邊戰役結束後一個月才打的，是大戰役的餘波。

敵軍十七兵團直屬隊，一〇〇軍軍部直屬隊，十九師和一七九師共六千餘人。該敵由十七兵團劉嘉樹率領，打算在雲南、貴州、廣西三省同越南交界處以國界兩側建立根據地，或在桂西得到喘息機會，待機由欽州以西之海防由海上撤至海南島。我軍查明情況之後，決心全部殲滅該敵，我們採取了政治攻勢和軍事行動兩手同時並進。

平而關戰鬥是張曉冰指揮打的，四〇〇團董占林，四〇一團鄒長茂、張益三，四〇二團江里鴻，藍亦農都打得很好。平而關戰鬥在軍事上是一個勝利，但更重要的是政治上的勝利。這一戰鬥告訴了殘存在廣西的敵軍，他們的前途祇有兩個：投降或消滅，企圖躲在山上長期存在是絕對不可能的。平而關戰鬥的勝利，對桂西剿匪創造了有利條件，如果敵軍都在當地分散為匪，對我軍剿匪就會增加很大的困難。桂西的土匪比其他地區都少，比較早完成了剿匪任務。

我軍在粵桂邊戰役中取得了重大的戰果：殲滅敵人兩萬三千多人，其中包括二十三名敵軍將官。繳獲各種火炮一百五十餘門，各種槍支八千餘支和各種軍用品甚多。解放了廣西全省。這是在大陸上對國民黨反動派的最後一仗。

執行粵西和桂東南剿匪任務

一九四九年底粵桂邊戰役結束後，四十五軍在廣西的南部和東南部執行剿匪作戰任務。軍部駐貴縣。一三三師駐貴縣西北之覃塘，一三四師駐南寧，一三五師駐容縣。

爲了統一指揮剿匪作戰，中南軍區命令成立粵西和桂東南地區剿匪作戰指揮部，由四十五軍擔任指揮。爲了黨軍政統一領導，廣西省委決定成立桂東南黨軍政委員會，由我任委員會主任，統一指揮剿匪作戰和領導桂東南地區的黨政工作。

桂東南和粵西剿匪區包括：粵西（高要）、雷州（湛江）、欽州、梧州、玉林、賓陽、龍州、百色等分區，共計八個分區。在軍事上，除指揮各分區之外，還指揮四十一軍在高要的一個師和廣西軍區在賓陽的獨立師，全區剿匪野戰部隊和地方部隊約十五萬人。

一九五〇年初，全國一片大好形勢，中南地區除海南島之外，全部解放了。我軍就開始執行剿匪任務了。

我軍執行剿匪任務之時，廣西的匪情確實是嚴重的。當時，我軍祇能佔領城市，大部分集鎮和交通要道，農村基本上被土匪所佔領盤踞，縣級以下的政權，很多不在我們手中。五〇年的六月間，我軍初進入大瑤山西部時，原敵偽的區政府還爲我們派糧派草。我軍一個排的兵力一般的不敢到農村去，單輛汽車行駛也很危險。要徹底消滅廣西的土匪，最後解放人民，並非一件易事，是要經過殘酷鬥爭才能達到目的的。

白崇禧的主力在衡寶戰役、粵桂邊戰役基本上消滅了，但還有龐大的非主力部隊並未消滅，它的基層政權亦未摧垮。南寧西南的十萬大山，賓陽西北的上林山就是敵人的戰略重點。至於敵人的小塊盤踞地則全省到處都有。廣西是全國的封建軍閥統治的堡壘之一，實際上是國中之國，要摧毀這樣的堡壘當然並非易事。廣西有械鬥的歷史，好勇鬥狠，廣西人是排外是很厲害的。

由於敵人是「地頭蛇」，他的消息特別靈敏，我軍的行動，幾乎都能很快就能知道。敵人有周密的情報系統通信聯絡。一九五〇年一月間，我到貴縣西北二十多公里的覃塘一三三師去開會。我早去晚歸「我的行動第二天就被敵人發覺了，敵人在半路上設下了伏擊。幸虧一三三師司令部警惕性高，第二天就派武裝護送，否則我可能早已歸西天了。一九五〇

年五月間，我到六萬大山的靈山縣去視察工作。我頭天經玉林、並住在電白縣，第二天就遭到了敵人的包圍。幸好一三五師派了一個偵察排護送我，那個排四個班，四十餘人，裝備好，戰鬥力強。我們住下之後，還沒有吃飯就發生了情況，我們被敵人包圍了，經觀察敵人有百餘人，我們決心消滅敵人。我們住的是地主院，有圍牆、樓房，院內有水井，有糧食，我們又帶有報話機。我們一方面注視敵人，另一方面調動部隊。一三三師在三十里以外有一個偵察連趕到了，敵人全部被殲滅。

當時，執行剿匪任務對我軍是一個大的轉變，從思想上、作戰行動上、生活管理上都是一個大的轉變。從思想上來說，就是從戰爭轉向和平的大變化，幹部中的主要思想就是老婆和前途問題。戰士中的主要思想就是家庭、婚姻問題。我們對部隊儘管經常在進行「我軍永遠是戰鬥隊」的教育，但效果很小。部隊都說，「敵人都沒有了，還需要戰鬥隊幹什麼？」對部隊的思想教育，比之過去打仗更加困難了。

從軍事行動上來看，就是從打大仗變為打小仗了，打小仗我們反而成為外行了。對剿匪作戰表現急於求成，總想撈大魚，結果小魚也捉不到一個。打不到土匪就消極，對群眾產生埋怨情緒，甚至對立情緒。部隊比較普遍的認為廣西是「匪民不分」，土匪走了就是老百姓，土匪一來就大家共穿一條褲子。

從部隊管理來說，就是從集體生活變為分散的生活了。這種變化帶來了思想渙散的嚴重的問題。部隊分散時，以連為單位的都很少，多數是以排為單位，少數是班為單位。由於部隊管理鬆弛，事故不斷。在大瑤山以西，有某部一個班，因為吹牛皮過晚，沒有設崗哨，拂曉時大家都還在熟睡，被土匪全部殺光。

思想渙散造成生活散漫，駐在集鎮的部隊，每逢集市更是遍地都是軍人，我軍單個失蹤的現象幾乎見天都有。而且軍民關係也不夠好，對地方幹部態度橫蠻，犯紀律很普遍。部隊的特點就是集體生活，集體行動，集體管理，在失去管理的情況下，發生問題是必然的。對這個問題，我們領導上是認識到了它的嚴重性，常派幹部深入基層，定期以連為單位整頓和訓練。

統一對剿匪性質的認識

廣西的剿匪在省委內部存在兩種認識。一種意見認為：剿匪是解放戰爭的繼續，祇有消滅土匪才能解放人民；另一種意見認為：剿匪是民主改革，祇有待群眾自己起來，才能得到解放。這兩種意見針鋒相對。上面的意見不統一，對部隊的剿匪工作影響很大，在五〇年整年中剿匪的成績都很小，土匪越剿越多。廣西軍區第一副司令員李天佑和我兩人是第一種意見的代表人物。

一九五〇年大約是九月初，李、邱共同起草了一個向中南局、中南軍區的報告。報告內容指出了廣西省委對剿匪的態度右傾，要求中南局派要員來廣西解決問題。李、邱拿著電稿去向省委書記報告，並要求他簽發電報，他拒絕簽發電報。後來，以李、邱個人的名義上報，並由李簽發了電報。中南局看到李、邱的電報後，引起注意，並立即派陶鑄代表中南局直接到廣西檢查工作。陶到廣西不久，又收到了毛主席的電報，電文的主要內容是專門說的剿匪問題的。毛主席表揚了湘西的剿匪鬥爭做得好，全省土匪基本上消滅了；指出廣東、廣西的剿匪落後了，是「兩隻烏龜爬行」，牽住了全國的工作進程。這一下對省委震動很大，幾乎不知所措了。

省委立即召開了省委全體會議，對剿匪進行了總結。接著於十一月間，省委召開了地師級幹部以上的省委擴大會議，葉劍英、陶鑄參加了會議。這次會議，認真學習了毛主席的指令，並對廣西剿匪展開了激烈的討論，到會的極大多數人都指責省委對剿匪是執行了一條右傾的路線，致使剿匪一年了，土匪還是越剿越多。李天佑在會上做了長篇發言，他發言的中心內容是把我們在剿匪的問題上同省委爭論的問題都擺出來了，並且把那些問題提高到了路線的高度。這就使會議有了方向，對會議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我接著李天佑之後也發了言。我的發言，除了同意李的發言之外，並以大容山的例子來證明我的發言是完全正確的。我說，玉林東北大容山，是土匪巢穴之一，該處有匪數千人，我們祇花了一個月的時間就把土匪消滅了，現在的大容山是真正的解放區，人民當家做主了。

葉劍英、陶鑄在會上都講了話。他們的講話，沒有公開批評省委執行了一條右傾路線，但他們又公開支持了李、邱的意見。他們說：「李天

佑、邱會作同志的意見，是從實際鬥爭中來的，完全符合毛主席的指示精神。他們的意見是正確的。」他們對中央的方針、路線、政策講得很清楚、透徹，形成了很大的力量。葉、陶代表中南局、華南分局宣佈：廣西要堅決執行中央關於剿匪的路線，政策，堅決執行毛主席的命令，限期消滅土匪，徹底解放人民！

一九五〇年秋省委擴大會議之後，剿匪作戰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在這個取得決定性勝利的階段中，我們主要抓了三個問題。這就是：1、軍事上重點圍剿，一個地區一個地區地同時解決問題；2、剿匪、反霸、收槍、鎮壓反革命四者密切結合起來；3、在剿匪鬥爭中發動群眾與組建縣政權，在條件成熟的地方，有重點地建立民兵組織。這三個問題是完成剿匪任務的全過程。

在軍區統一部署之下，全省劃分為四個重點圍剿區：梧州西北的大瑤山；玉林以西的六萬大山；南寧的西南的十萬大山；賓陽西北的上林山區。這四個區是同時進行的，這是我軍執行剿匪任務以來，規模最大，給土匪打擊最重和效果最好的一次聲勢浩大的剿匪作戰。

例如，對六萬大山的重點圍剿，用了三個步兵團和四個分區的地方武裝。對該區的圍剿是成功的，祇用了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就基本上解決了問題。

首先是佈置三層包圍。爲了不使敵人過早發現我軍意圖，包圍圈開始要大些，然後逐漸收縮。其次是政治攻勢。包圍圈縮小了，在包圍圈之內又到處是戰鬥，此時就要進行政治瓦解。主要內容是要敵人選擇自己的出路：交槍投降，抓匪首。同時還要動員老百姓暫離開包圍圈，以免傷亡。

第三是火力攻擊。對敵人的包圍圈縮小到不大的情況下，則實行炮火的火力攻擊，攻擊一陣子即停下來進行政治瓦解，此時，政治瓦解的效果很好，投降的很多，對死不投降的敵人則堅決殲滅。我軍在六萬大山消滅敵人萬餘人，打死和抓住匪首近千人。

第四是清匪、反霸、收槍、鎮壓反革命密切結合。這是對一個地區剿匪是否徹底的關鍵問題。當地的匪首惡霸，押回各村召開群眾大會，公開槍決。土匪清出來了，槍支收完了，匪首惡霸處決了，人民也就真正解放了。

第五是建立基層人民政權。土匪真正消滅了，群眾自然就有組織自己的政權的要求。在建立農村政權的時候，選擇骨幹是十分重要的問題，也可以說是政權能否起作用的關鍵問題。在剿匪鬥爭中湧現出來的積極分子，是基層政權的依靠力量。

整個桂南的剿匪作戰，大概用了兩年稍多的時間才解決問題。我軍消滅土匪將近二十萬人，鎮壓了匪首惡霸約八萬人。反動統治摧毀了，人民成了主人！

第二篇

軍隊建設的征程

第十三章 從廣州到北京

到廣州工作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我由四十五軍調任十五兵團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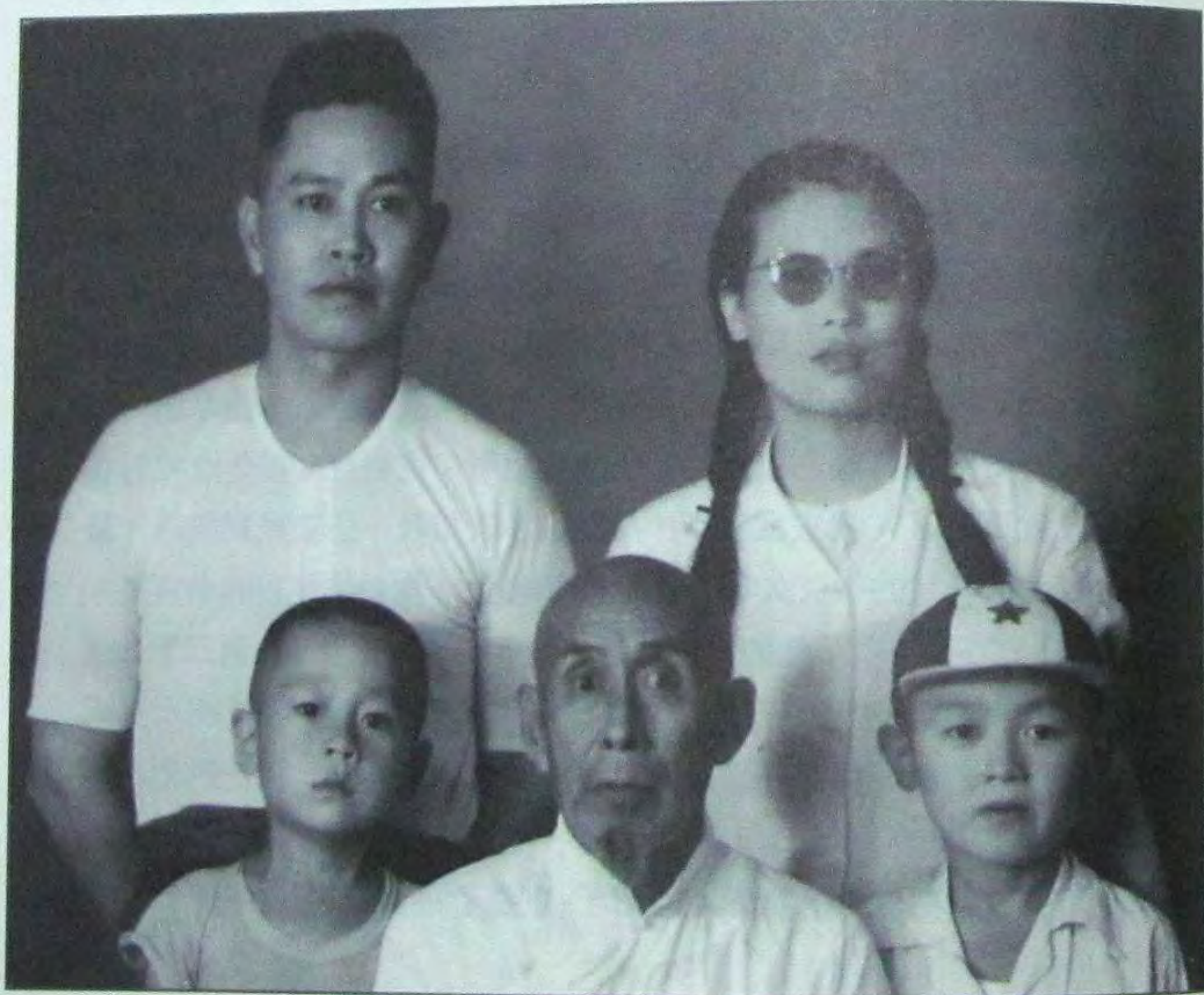
四十五軍是一支由不少紅軍連隊爲基礎組建起來的部隊。這支部隊，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抗日戰爭都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做出過自己的貢獻；在解放戰爭中則得到了很大的發展，起的作用也更大了，對人民的貢獻也更大了。這支部隊是打出來的，在解放戰爭中打過很多的仗，又參加過三大戰役的遼瀋、平津兩大戰役；南下渡江後，參加了衡寶、粵桂邊戰役，屢建奇功，同全國解放軍任何一個軍團都可比媲美。這是四十五軍的光榮！

我離開四十五軍是戀戀不捨的。我從延安到熱河就和吳烈同志戰鬥在赤峰，一九四七年東北民主聯軍八縱組建，整個解放戰爭我都戰鬥在八縱，我熱愛八縱，與一夥出生入死的戰友，結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誼。「九一三」以後，在家破人散最困難的時候，關心我子女的是八縱的戰友，在公審以後，不顧政治風險看望我的也是八縱的戰友，任思忠、孔瑞雲去西安時，左打聽右打聽，打聽到派出所才找到我。在北京時看我的老戰友就更多了。我去武漢時，吳瑞山多次看我，任榮見到我時，緊緊抱著我，拉著我的手久久不放，他深情地說：「你過去是我的老首長，現在還是我的老首長！」他的話使我潸然淚下。我從三十二歲到三十七歲是在四十五軍度過的，這是我青年時代最有意義的經歷。我在四十五軍工作感到最愉快的是得到了全軍極大多數指戰員的信任。我在四十五軍是一個領導者，同在該軍工作過的許多人一樣，是四十五軍的指揮員也是一個戰鬥員。我和全軍指戰員共同奮鬥，創造了四十五軍的榮譽。

在我離開四十五軍後的一九五二年二月，軍委命令，以四十五軍軍部及一三四師、一三五師兩個師，加上原四十四軍一三〇師，合併成一個軍，番號爲五十四軍。五十四軍在解放後，除參加抗美援朝外，還參加了西藏平叛、青海剿匪、中印邊境反擊作戰……，是和平時期作戰最多的部隊之一，對部隊的成長和進步，我感到由衷的高興。

十五兵團的兵團部駐廣州，兵團又兼廣東軍區領導機關。兵團司令員是黃永勝，政治委員蕭向榮，我爲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廣東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是葉劍英，第一副司令員黃永勝，蕭向榮和我都兼任軍區副政委。當時的工作關係是比較複雜的，但不管多複雜，核心領導是葉劍英，葉是解放初期華南地區黨政軍領導的臺柱子。

一九五一年五月，爲了華南軍事上的統一領導，軍委決定以廣東軍區、十五兵團指揮機關爲基礎成立華南軍區，轄廣西軍區、海南軍區、粵東軍區、粵西軍區和廣東防空司令部，兼指揮第四十一、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八軍和華南各特種部隊及中南軍區海軍司令部。華南軍區司令員爲葉劍英，中南軍區第三政委譚政兼任政委，



與父親分別二十年在廣州相見。

副司令員黃永勝，參謀長吳克華，我先任政治部副主任沒有多長時間，繼蕭向榮之後任政治部主任。

一九五二年七月，駐武漢的中南軍區機關遷到廣州，華南軍區即併入中南軍區。軍區司令員林彪，副司令員葉劍英，第一政委羅榮桓，鄧子恢、譚政分別任第二、第三政委，參謀長黃永勝，政治部主任陶鑄，副主任梁必業和我。我除分工管宣傳部、文化部的工作之外，還兼任中南軍區軍法處處長。

中南軍區遷廣州前，林彪已被任命為中革軍委副主席。軍區從武漢遷到廣州後不久，林彪就到北京參與中革軍委的領導工作。軍區第一政委羅榮桓在平津戰役後即留在北京，後任最高人民檢察署檢察長和軍委總政治部主任。葉劍英名義上代理軍區司令員，但精力主要放在地方，軍區實際工作由第三政委譚政主持。

華南軍區的三反運動

三反運動是毛主席一九五一年底提出來的，毛主席是以十分嚴肅的態度提出我們黨內存在著嚴重的官僚主義、浪費和貪污。我們必須堅決反對官僚主義，反對浪費，反對貪污，「三反」這個名稱由此而來。

我記得，當時主持三反運動日常領導工作的是薄一波。他於五二年的四、五月來過一次廣州，是來督戰的。他在華南分局會議上做了一個長篇講話，會議由分局第三書記方方主持。

薄一波說（大意）：這次三反是一場嚴重的階級鬥爭。是無產階級戰勝資產階級，還是資產階級戰勝無產階級的鬥爭。鬥爭的結果，兩個階級必有一存一亡，我們要爭取鬥爭的勝利。……我們進城僅僅兩年的時間，但我們的黨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艱苦奮鬥的好東西丟掉了，資產階級的腐朽生活學到了。我們有不少人，被糖衣炮彈擊中了，存在著嚴重的意志衰退的問題。對這個問題，如果不徹底糾正，我們就會被資產階級戰勝。……官僚主義、浪費和貪污，雖然是性質不同的問題，但又是互有聯繫不可分割的問題。官僚主義是浪費、貪污的溫床，而後兩者又會促進官僚主義的嚴重性，所以我們要把三個東西連在一起來搞，這就是搞三反運動的必要性。……三反運動的關鍵是在黨委領導下，發動群眾。對發動群眾要放手，不需要先築起防什麼的「堤壩」再去發動群眾。為

了充分發動群眾，領導帶頭又是關鍵問題。對這個問題，我們要學陳老總（陳毅）的樣子。他在華東軍區的幹部會上是自己脫褲子，讓群眾打屁股。他要後勤部門司令部管理科、秘書等三人在大會上公佈他的開支賬目。這樣做，陳老總取得了群眾的信任，取得了三反運動的領導權，反過來對三反運動就給予了有力的領導。華東軍區的三反運動是搞得很好的。

華南軍區的三反運動當時是處在「群龍無首」的狀態。司令員葉劍英是不管軍區的具體工作的，副司令員黃永勝還在外地治病。對三反運動的具體領導工作就祇有落在我這個政治部主任身上了。三反運動開始的時候，我到廣州還不到一年的時間，這對我的工作是有利有弊。有利的一面是，我進城時間還不長，「洋」生活還沒有學到，大家認為我還是一個「乾淨」人，這有利於開展工作；不利的是，人生地疏，不瞭解情況，從工作上來說，不利的因素反成了好處，使我在工作中更加謹慎，可以少犯錯誤。

三反運動就其實際內容來說，並不是完全新的問題，在戰爭年代接觸過不少這類問題。但把反官僚主義、反浪費、反貪污聯在一起，作爲一個政治任務進行鬥爭還是一個新的問題。特別是提高到黨的存亡問題，就更引起我的重視。對三反運動，中央祇有原則指示，中南軍區不僅沒有開過會，連具體指示也沒有發過。我當時領導主持三反運動，即使不是「盲人騎瞎馬」，也是蒙著頭幹的。在鬥爭中雖然沒有犯大錯誤，但也沒有搞出什麼大的成績來。華南軍區的三反運動是比較平穩的。

爲了實際工作的需要我們成立了一個辦公室。軍區政治部的組織部長盧文生、宣傳部長江峰、保衛部副部長陳信、司令部辦公室主任楊坤專門協助我進行具體工作。

三反運動開始的時候，中央也沒有政策規定，我們也無經驗，我們經過研究自己確定了三條工作方針：1、充分發動群眾提問題。我們向群眾誠懇宣佈，不管是什麼問題，對什麼人的問題，有問題就可以提出來；2、對群眾提出來的問題，一定要反覆核實清楚；3、實事求是做工作。決不整人，不點名，更不輕易做結論。我們就是根據這三條辦事的。

整理材料是我們工作的重點。對各單位送來的材料，我們都認真的閱讀、研究、整理。爲了好整理材料，我們把浪費和貪污嚴格分開，把三反同其他政治上、歷史上的問題分開。

經過三個多月的工作，到了五二年五月間，對整個的情況就比較清楚了，有兩方面的問題嚴重，突出來了。一方面是領導幹部的生活確實起了很大變化，浪費相當驚人；另一方面，一些同商人打交道的專業幹部和地方部隊的本地幹部，有不少被資本家拉過去了，受賄相當嚴重。前者是屬於浪費的問題，後者就是受賄貪污的問題了。在幹部中，貪污的公款則是極個別的。

爲了三反工作的需要，陶鑄和羅瑞卿來到了廣州。陶是來代替葉劍英主持廣東的土地改革工作的；羅是專門來檢查華南地區黨、政、軍的三反運動的。陶、羅用了一整天的時間，聽取了我們辦公室的集體匯報。他們向我們做了如下指示：

第一點，華南軍區的三反運動取得了很大成績。你們的運動在華南地區機關中處於領先地位，在全軍中也是搞得比較好的。

第二點，你們對中央關於三反運動的指示具體化了，同你們的實際情況結合得很好。特別是你們提出了充分發動群眾和整理材料兩者結合起來，是非常正確的。不充分發動群眾就不能把問題揭露出來；不認真整理材料，就不能對問題有深刻的認識。你們的做法，就是比較好地解決了領導與群眾相結合的問題。

第三點，政策界線問題。中央已經有原則的規定：領導幹部中的官僚主義錯誤和生活中的浪費是屬於批評和自我批評的問題；吞佔公款和受賄是屬於貪污問題。這是性質不同的問題，將來的處理也是不同的。對領導幹部的問題，要特別慎重，決不能借三反運動來打擊幹部。

一九五二年七月中南軍區遷到了廣州，華南軍區與之合併了。從此，我就退出了領導三反運動的實際工作，專門主持部隊的文化教育工作了。

部隊文化教育

我軍的幹部是以農民爲主體的。他們的主要優點是對黨忠心耿耿，鬥爭經驗豐富；主要缺點是文化水平低。因此，建設現代化軍隊的關鍵之



一九五二年中央慰問團在廣州慰問中國人民解放軍。右一梁必業、右二劉興元、右三邱會作。

一九五二年在廣州向中央慰問團匯報工作。



一，是提高幹部的文化水平。部隊進行文化教育爲主的訓練，是建設現代化軍隊的戰略決策。

全國解放後，軍隊建設有兩條路線：一條是以林彪爲代表的，主張部隊以學習文化爲主，並認真學習毛主席著作，總結自己的鬥爭經驗，部隊辦了很多學校；一條是以彭德懷爲代表的，主張以學習蘇軍爲主，軍事訓練爲主，並提出了不走樣子的學習蘇軍。這兩條路線是不同的，我自己和許多老幹部都擁護林彪的路線。

我認爲林總不僅是一個軍事家，也是一個很有眼光的政治家，他參與軍委的領導工作時，雖然朝鮮還在打仗，他就從國際形勢分析，世界大戰一時打不起來，爲此他主張盡快裁減軍隊，省出錢來發展重工業，搞建設，這和他不同意出兵朝鮮的想法是一致的，我們的新中國剛剛成立，休養生息，搞建設非常重要。當時，我軍有六百多萬人，精簡後部隊不到三百萬人，公安軍五六十萬人，全軍精簡近一半，林總魄力很大。同時，林總主張軍隊大力學文化，他說要掌握現代武器，必須學習文化，要更好的執行黨的方針政策，也必須學文化。當時軍隊一百二十多萬人的幹部隊伍，文盲就佔三十多萬，僅有小學文化水平的就有近四十萬，佔幹部隊伍的百分之六十以上。

從五一年開始到六〇年的九年中，部隊開展了規模不等，程度不同的文化教育。從全軍來說，部隊的文化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很顯然，部隊的文化教育沒有達到預期目的。其所以如此，這是兩條建軍路線鬥爭的反映。一九五二年十二月軍委召集了各大軍區參謀長、政治部主任會議，中南軍區是黃永勝和我去參加會議的。會議由彭德懷主持，會議主要討論全軍部隊的軍事、政治、文化訓練問題，會議對文化教育給予了嚴厲的抨擊。不少人指責：由於搞文化教育，槍支生鏽了，大炮筒子有麻雀窩了，早操沒有人上了，都去上文化課了，部隊作風散漫等。一部分人的結論是：要是不加強軍事訓練和嚴格管理，部隊就會自己垮掉。

由於部隊要搞文化教育是由林彪提出來的，經過毛主席批准的，這是起決定作用的。同時，不少高級幹部也支持文化教育，他們都提出要下決心解決幹部的文化問題，也有條件解決這個問題。因此，經過討論之後，對文化教育雖然大大「降溫了」，但還佔很大的時間比例。會議決

定部隊訓練時間的分配是：軍事訓練百分之三十，政治教育百分之二十，文化教育百分之五十。

中南軍區部隊的文化教育，在全軍是起帶頭作用的，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從五一年春開始，到五五年的五年間，全軍區部隊主要是搞文化教育，從未間斷過，也沒有受到什麼大的衝擊。中南部隊的文化教育是有聲有色的，對全軍和全國都產生了積極的影響。全區部隊文化教育取得的成績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一、部隊的幹部戰士百分之九十以上，語文和算術達到了高小的程度，百分之二十達到了初中一年級的程度。

二、團級以上幹部百分之七十輪流進了文化速成學校。經過兩年的時間，語文和數學都能達到初中三年級的程度。大部分文化學校，一九五三年就畢業了第一期，少數學校，到五四年已經畢業了兩期。需要學習文化的團級以上幹部，極大部分都初步解決了文化問題，打下自學的基礎。

中南部隊的文化教育能夠取得這樣的成績，起決定作用的是當時的政治部主任陶鑄。我是他的助手，做了一些具體組織工作。我自己就需要學習文化，我深知沒有文化的痛苦，我對部隊文化教育積極的。

重返後勤戰線

一九五四年十月，我奉命調北京，任總後勤部副部長兼副政委，五五年二月，到達北京上任。

新中國成立前夕，楊立三奉命重新組建了軍委後勤領率機關，是對我軍建設的一大貢獻。但是受當時條件所限，也有一些缺陷，主要是：第一、工作方針不明確。第二、幹部老、能力弱、身體差。總後機關總體文化程度不高，工作水平偏低。第三、規章制度有問題。總後組建不久，我軍開始「不走樣」學習蘇聯紅軍，幾乎把他們那一套全盤照搬來了。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四日，楊立三為準備召開全軍後勤工作會議，向毛主席寫了一個請示報告，毛主席在回信中嚴肅地指出：「據我所知，我軍整個後勤系統長期缺乏這種民主的自我檢討和相互檢討，以致政治空氣極不濃厚，黨的生活極不健全；許多領導同志胸襟狹隘，思想不開

，作風不民主，祇顧小局，不顧大局；後勤系統中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極端嚴重，這種嚴重性至少不小於政府的財經系統和公安系統。所有這一切，均應以這次後勤會議爲開端，徹底地進行批判和改革。」毛主席對總後作的批示是對以上三個問題極爲深刻的揭示。那時楊立三重病在身，不久去世。毛主席指示未曾得到很好貫徹。

另外，後勤系統在「三反」中暴露出來的問題嚴重。爲此，一九五二年，毛主席決定選調湖南省委書記黃克誠任副總參謀長兼總後勤部長，以便更好地配合彭德懷工作。五三年，周純全從朝鮮回來任總後勤部副部長兼副政委。五四年上半年，洪學智從朝鮮回來任副部長，周純全調走。五四年十月，黃克誠任總後勤部部長兼政委。

黃克誠是我軍名將，德高望重，七大當選爲中央委員，歷來擔任要職。解放戰爭時曾出任東北民主聯軍後勤司令員，他整頓了東北後勤，工作出色。黃出任總後部長的影響很大，改變了我軍後勤領導幹部的形象。他是我軍有史以來調到後勤戰線的級別最高的領導幹部，後勤機關地位提高了。

黃克誠於一九五三年六月總後黨委擴大會議之後向軍委寫了一個報告。在肯定了「三反」運動以後全軍後勤工作的若干進步的同時，也指出了存在的嚴重問題：一是浪費現象非常普遍而且嚴重；二是醫療衛生工作存在的問題更多，領導上有嚴重的主觀主義；三是許多供應標準不符合實際情況，供應的實物很差；四是後勤幹部中不安心工作、不團結、鬧地位待遇和對領導不滿的情況比較普遍，尤以總後機關最爲嚴重。黃克誠在報告中認爲，這種嚴重現象之所以發生，有其客觀條件，但主要是後勤領導和幹部中的思想作風和工作上存在問題。首先是沒有明確樹立爲部隊負責、爲國家負責的堅定思想。報告針對存在的問題，提出了一系列的整改措施。

黃克誠提出的「爲國家負責，爲部隊負責」的思想，得到軍委批准和後勤幹部的一致贊同。依我所見，黃克誠的這個提法是我軍後勤歷史上最有思想性的方針，它既是處理全局和局部關係、執行國家政策和保障部隊的需要，也是正確處理後勤內部上下關係的準則。

爲了加強後勤工作，很快就把志願軍副司令員洪學智調進總後工作：接著我也到了總後。

黃克誠當時是軍委秘書長，我到了總後不幾天，他召集總後黨委會。他在會上除了對我簡單介紹了幾句之外，即說：「我今天就交班了，都交給邱會作同志了，他是我的代理人。今後，你們要支持邱會作同志的工作。他工作做好了是你們大家的事，發生了什麼問題，由我黃克誠完全負責，決不會推到你們頭上。」其實我來之前，洪學智同志已經在主持日常工作，黃克誠的話是什麼意思，大家並沒有搞懂，我也沒有搞懂。雖然我也主抓了不少工作，但黃克誠的話我根本沒有上心，因為我不願意搞後勤工作，對工作沒有安下心來，沒有長期打算。

五五年十月，我又當了（兼）後勤學院院長，工作相當累人。

我和洪學智都是扎扎實實搞工作的人，以誰為主搞工作彭總是有考慮的。五七年春節過後，彭德懷找我談了一次話，他開門見山地說：「你認為你和洪麻子誰搞後勤更合適？」

我一下也聽出彭總的意思，略加思考我回答彭總說：「當然洪學智同

志比我合適，我沒有去過朝鮮，沒有組織現代戰爭條件下後勤工作的經驗。」

彭總聽後非常高興，對我的態度很滿意。五七年，對洪學智下了部長命令。此時，周總理和富春同志讓我去搞國家經委副主任的工作，並安排我到蘇聯去參觀考察了一圈。回來後，我「耍了賴」，說不願離開部隊，羅帥也去找總理為我講情，我就先去學習了，先上中央黨校，繼而上了高等軍事學院。

彭、黃的問題出來後，洪學智同志被免職。五九年十月，我回到總後任部長。

我在彭德懷、黃克誠領導軍委時期在總後工作近兩年，其間最大的一件事是籌備總後第一屆黨代



一九五六年在後勤學院開學典禮上講話。

表大會。一九五六年初，總後醞釀召開首屆黨代表大會，黃克誠和黨委分工我負責籌備，並指定我代表總後黨委向大會做工作報告。爲了總結總後重新組建六年來的工作，我們比較詳細地瞭解和分析了後勤系統的情況，深感這幾年總後進步的起因，源於毛主席給楊立三同志的信中對軍隊後勤工作的批評，這幾年的工作，就是總後克服這些問題取得成績的六年。

一九五六年五月一日，總後第一屆黨代表大會開幕，我代表黨委做了題爲《加強領導，爲加速後勤建設而鬥爭》的工作報告。我在報告中指出：「過去幾年的後勤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績，統一了全軍的後勤工作；完成了抗美援朝戰爭、解放西藏、沿海作戰及訓練；做好了邊防部隊的物資供應、衛生醫療及技術保障等任務；加強了組織建設和政治思想工作。但後勤工作的落後狀態至今並沒有得到根本改變。阻礙後勤進步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領導上存在著安於現狀、故步自封的右傾保守思想，對於如



一九五七年，在北京高級黨校學習期間於頤和園留影。

何建設現代化、正規化的後勤，對於如何改變後勤工作的落後狀態，缺乏切實有力的措施，表現了領導與實際需要的脫節……」。黃克誠很支持我的看法，對我代表黨委所做的報告給予肯定。他在大會上以《發揚優良傳統、學習新鮮事物》為題發表了講話，他說發揚優良傳統和學習新鮮事物是密切相關的，是不可偏廢的。祇要我們保持一切好的傳統，並且使之發揚光大，又能把新的東西學到手，不斷充實，不斷提高，我們就能夠把後勤工作迅速地向前推進。在講話中，他對後勤幹部中的弊病也點中了要害。

關於肅反問題

一九五五年一月間，軍隊的肅反運動就開始了。我剛剛到總後，對肅反運動，當時什麼說法都有，有的說清理中層、內層，有的說深挖胡風反革命集團。在肅反運動開始的時候，我找保衛部的有關人員來匯報，硬是問了兩個小時，才把問題的眉目搞清楚了。

軍隊的肅反運動將要開始的時候，黃克誠叫我去他家談過一次，他直截了當地說：「總後的肅反運動由你主持。你可以參加中央十人小組的辦公會議。」他接著就給十人小組主要領導陸定一、羅瑞卿寫了一封介紹信。第二天，我去公安部開會時，把介紹信交給羅瑞卿了。我同羅很熟悉，他熱情地接待了我。從此，我就經常到公安部去開會了。

參加十人小組的辦公會議，各方面都得益匪淺，但最主要的是瞭解了中央一些內情。由於我是代表黃克誠去參加會議的，在十人小組會議的過程中，陸、羅等人說話，處理文件等都不迴避我。我能知道的在中央文件上也是看不到的。

胡風是什麼人，之前是沒有聽說過的。我對胡風問題的瞭解，是參加了十人小組會議才瞭解的。陸定一、羅瑞卿對胡風反革命的問題是反覆講的，講得非常精闢、透徹。對他們所講的問題，我印象最深，現在還能回憶起來的，主要有如下三點：

第一點，清理內層的問題。他們說的反革命大概可以分為三種情況：社會上的反革命，黨政軍機關裏的反革命，領導機關內部的反革命三個層次。這也就是外層、中層、內層。我們這次肅反運動的中心任務是清

理中層、內層，並力求能夠搞得比較徹底。這對鞏固黨的領導，加強無產階級專政是很重要的。

第二點，胡風是鑽到我們黨的領導層內部的反革命。他是披著文學家的外衣來反對黨、破壞黨對文化事業的領導的反革命頭頭。胡風可以鑽到黨的文化領導機關內部來，別的什麼人就不可以鑽到黨的黨政軍領導機關內部來嗎？完全可以的，這就是清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第三點，黨政軍領導機關，對自己的內層，中層要徹底清理，這是主要任務。胡風祇有一個，但胡風式的反革命就決不是一個了。那種人，可能同我們一起開會，同一個桌辦公，甚至同睡在一張床上都有可能。這就是清理中、內層總的指導思想。

總後直屬系統清理中、內層搞了將近一年的時間，取得了一定成績，但沒有解決什麼問題，這有我的領導問題，也有總後的客觀情況問題。

總後直屬機關和各院校都是解放後新建起來的。一種是紅軍時期、抗戰時期的老幹部，都是軍級以上單位的領導骨幹；一種是知識分子隊伍，這個隊伍相當大，總後是軍隊知識分子最多的單位，各大學、醫院、設計院等單位都是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專家、教授、大學生很多。他們是科學、技術、教學的骨幹和主要力量；一種是新參軍的小知識分子，抗美援朝之後，總後接收了很大一批參軍參戰的中學生，這種人成了各機關業務工作的主要成份。總後的清理工作中，發現了如下三個主要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社會關係相當複雜。知識分子中的極大多數人，不僅在國內有複雜的社會關係，在國外還有複雜的國際關係。他們之中的不少人懂得幾個國家的文字，他們寫下的很多的文字東西，大多數都是用外文寫的，他們同國內外通信也多數是外文。他們之中任何一個人的問題，都要經過相當長的時間才能搞清楚。

第二個問題是，知識分子中的一部分人，同政界有密切的關係。另外還有部分國民黨、三青團的骨幹分子，上面這些人的問題，同樣在短時間內是不容易搞清的。

第三個問題，是特務嫌疑。在知識分子中，同國民黨的中統、軍統、日本特務機關有關係的都有發現。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時，我們接收了一批日本統治下的蒙疆共和國（河北張家口）帝國醫學院的學生，其

中就有一批日本的特務分子。後來公安部通知我們，總後幹部部幹事陳政就是日本暗藏在學生中的特嫌分子。

在一九五六年的一月間，總後對清理中內層做了一個初步總結。黃克誠到會聽取了總結，對繼續深入肅反運動做了重要指示。

黃克誠說：「總後直屬單位清理中、內層的運動做得很好，取得了很大的成績。成績之一是對肅反運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進行了比較深入的教育，大家的認識提高了一步；之二是對情況有了比較系統的認識，整理了不少材料，這是一個重要的工作，對今後的工作會起很大作用的；之三是沒有抓人。邱會作同志在總結中提出：肅反是一個細緻的長期的工作，不能像除四害一樣可以隨便打。他說：寧可抓不到一個反革命，也不要抓十個假反革命。抓住一個真反革命是消滅了一個敵人，是很大的成績；抓住十個不真實的反革命，是傷害了自己，幫助了敵人。他的思想和提出的政策界線都是正確的。我們所取得的成績的核心問題就在這裏，沒有抓一個假反革命是最大的成績。現在有的單位抓起來不少大小胡風分子。這難道是成績嗎？……」

黃克誠繼續說：「對知識分子的清理工作要認真進行。這批知識分子是我們的很好的財富，要建設現代化的後勤離不開他們。對他們複雜的國內、國際關係怎麼處理？這個問題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說清楚的，還有待很好研究。我今天可向你們提出一個基本政策是：知識分子祇要不是現行反革命就是好人。我們就要信任和大膽使用。因為他們有這樣或那樣的複雜關係就不信任、不大膽使用是錯誤的。」

黃克誠還說：「肅反運動今天祇是總結，並不是結束。你們提出還有些問題，例如，眼科主任的問題，帝國醫科大學學生的問題等。這些問題，你們要向總政治部報告，請示處理辦法。」

參加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

一九五六年，黨舉行了第八次代表大會。總後的代表有洪學智、張令彬、饒正錫和我。八大的會場是政協禮堂，大會代表 1026 名，比黨的七大多了一倍，代表著全國一千萬黨員。

八大是全國解放後第一次代表大會。劉少奇代表中央做政治報告，鄧小平代表中央做修改黨章報告。大會對樹立毛主席的接班人劉少奇的

威信起到了相當重要的作用，這是成功的一方面。但事後看，八大的組織路線，也是黨內開始不團結的一個不小的原因。

毛主席祇是在大會開幕時致了開幕詞，其餘就沒有說什麼話。但毛主席每次大會都是到會的，不過好像沒有深入小組討論。蘇聯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委員米高揚參加了黨的八大大會。

八大是比較平靜的大會，主要是劉少奇、鄧小平他們在搞，祇是在起草大會對政治報告的決議時，出現過不同意見。在通過決議時，毛主席對《政治報告》中所提出的：「我國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已經解決，幾千年來的階級剝削制度的歷史已經基本上結束，社會主義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來了。」我們國內的主要矛盾「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這些論述，有不同意見。他就是在大會討論時，在主席臺上修改的。在臺下，我們看到毛主席在看什麼文件，當時神態很嚴肅地拿起筆就寫開了，寫了之後即轉給坐在他右邊的周總理看。總理看了之後，笑了笑向毛主席點頭，表示同意毛主席的修改，並簽上了自己的名字。這個問題，當時祇在小組會上做了簡單的傳達。

在文化革命開始後，毛主席和劉少奇反目為仇，才把文件的內容、修改的經過都作為中央文件影印出來了，被當成了劉少奇的一個大「罪行」，給予完全的否定。此時，我才知道當時爭論的真相。

鄧小平在八大修改黨章的報告中提出了反對個人崇拜，把「對個人突出和對個人歌功頌德的方針」，的問題雖然提出來了，但大會自始至終在對毛澤東個人進行歌功頌德，甚至對劉少奇個人也進行了歌頌，這個風一點也沒刹住。

八大也有不成功的一面，就是組織上安排不很得當，劉少奇的人在組織上擺得太高了。過去在白區工作的幹部，特別是華北地下黨的重要幹部（如原北方局的主要幹部），幾乎全部進入了中央委員會。相反，軍隊進入中央委員會的名額是很有限的，這與我們黨的發展歷史很不相稱。在大會討論中央委員會候選名單時，各組裏就傳出這樣一些議論：「今後是建設時期，有建國才能的人都應當進入中央委員會。」更有人在樹立劉少奇的威信，說「打仗靠毛主席，建國靠劉少奇」，連「幹白區黨的比二萬五的（軍隊幹部）鬥爭更艱苦，因為是老虎肚子裏活下來的」等

議論也出來了，而且傳得很廣。黨內這種潛在的思想分歧從此開始了。在兩年後的八大二次大會上進行了彌補和平衡，補選了一批候補中央委員，主要是軍隊幹部，這說明中央已經意識到了這個問題。儘管如此，這也沒有完全消除軍隊幹部和地方幹部由此而引發的一些矛盾，這為後來的文化大革命埋下了隱患。

一九五八年二月，在北京舉行了黨的八次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

在小組會議上，我不記得是什麼事由，引起討論薪金制度問題。對這個問題，我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見。我的中心思想是，主張黨政軍幹部實行統一新金制，這在政治上、幹部團結上、業務工作上都有好處。當時，黨政軍幹部的薪金制並不統一，各搞一套。黨政幹部（除技術、文藝級之外）一律實行行政級，即從一級開始一直往下排。軍隊實行職務級別，即從排長開始向上排，一直排到軍委委員這一級。這兩種薪金制的基本不同點是：黨政幹部的行政級是級別高，薪金數額也不少；軍隊幹部是級別低，薪金數額並不多。爲了說明問題，我舉了武漢軍區司令員陳再道和湖北省委第一書記兼軍區政治委員王任重做例子來說明問題。我說：「王任重同志勝利後連提六級，陳再道同志一動未動。如陳轉業套級，祇能和以前在他部下當宣傳科長的同志相等。余秋里同志轉業後如不提級，則其政治和物資待遇也相差很遠。」軍隊的薪金制，實際上是圖了高薪制的虛名，落了一個不得實惠的薪金數額。因此，我極力主張黨政軍實行一種薪金制。我發完言，文年生同志立即發言支持我。我的意見小組會也都同意，後來軍隊實行的薪金制同我提出的建議也是一樣的。看來，我的意見還是正確的，但我所舉的例子是不太妥當的，容易造成誤會。因爲我舉出的那兩個人恰好是兩種人的代表人物：王任重是新生事物、後來居上的代表人物；陳再道是老資格的代表人物。我把這兩個人排在一起來說明問題，好像我是爲老資格叫冤。這是我後來才認識到的。事後我也落下禍害，成了「資格論」的典型人物了。

八大二次會議以後，就開了軍委擴大會。這次會議就不平靜了，與其說是反對教條主義、個人主義的批判大會，不如說是鬥爭大會。劉伯承、粟裕、蕭克、黃永勝都在大會上做了檢討。因爲八大的組織路線，軍隊幹部下面有牢騷，要剝這股風，沒有契機，陳毅元帥正好以反對「資



在高等軍事學院學習期間參加將軍合唱團練歌。指揮李志民，後排左一邱會作，前排左一李作鵬、左二皮定均、左五吳信泉、左六陳伯鈞、左七黃永勝、左九張賢約。

格論」爲主要內容在大會上做了發言，對粟裕、黃永勝和我都不點名的進行了批評。大會的氣氛始終是緊張的。

我當時已在高等軍事學院學習，陳老總發言之後，我是看簡報才看到的，我立即給軍委擴大會議主席團寫了簡要報告，並請轉小平同志轉中央，我還以「打倒資格論」爲題，寫了一篇準備在小組會上的發言稿。我把發言稿送給了陳老總，他在我的稿子上批了幾句話（大意）：你在小組會上，有關薪金改革發言的觀點並無錯誤，方法有不妥之處。我對「資格論」的批判是作爲一種現象，並非指某一個人。你的發言稿很好，希望安心學習。

正是因爲陳老總有指示，我在小組會上就免得受批判了。回到高等軍事學院，李志民政委找我談話，他說：「你爲軍隊同志爭，是好事，也是多管閒事，你在學習嘛。你準備挨批評。」當時葉帥是院長兼政委，我找到他，事情很快就化解了。

第十四章 新軍委成立

軍委統帥部的改組

一九五九年八月，黨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八屆八中全會在廬山召開，會議批判了彭德懷等同志的「右傾機會主義」，作出《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爲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隨後在北京召開了軍委擴大會議，揭發批判彭德懷、黃克誠的「反黨罪行」和「資產階級軍事路線」。我參加了在北京召開的軍委擴大會議。

廬山會議在我黨的歷史上是一次很有影響的會議，在這次會議上，中央內部開展了嚴重的鬥爭，鬥爭目標主要是軍隊的兩位領導實際工作的負責人——國防部長彭德懷和總參謀長黃克誠，並牽涉到鄧華、洪學智等人。彭德懷主持軍委領導工作，主要是爲了工作方便，組班子主要就是用了黃克誠擔任軍委秘書長、總參謀長、總後部長兼政委，同樣，毛主席也是爲了牢握軍權，推倒這個班子，由林彪重新組班子工作，羅瑞卿任軍委秘書長、總參謀長。這樣大的班子變動，建國以來是第一次，使大家震驚，所以，這次會議對軍隊的影響尤深。

八屆八中全會閉幕的第二天，即八月十七日，在毛主席主持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一致決定由林彪擔任軍委第一副主席，賀龍爲第二副主席，聶榮臻爲第三副主席。

九月二十六日，中央發出《關於軍委組成人員的通知》，決定軍委進行改組，成立了新的軍委，毛澤東仍爲軍委主席，林彪、賀龍、聶榮臻爲副主席，由林彪主持軍委日常工作。軍委常委是：毛澤東、林彪、賀龍、聶榮臻、朱德、劉伯承、陳毅、鄧小平、羅榮桓、徐向前、葉劍英、羅瑞卿、譚政。羅瑞卿爲軍委秘書長，副秘書長爲蘇振華、蕭向

榮，很快又增補蕭華爲副秘書長，蕭華雖然是後任命的，但主要由他輔助羅瑞卿工作。

十月二十日，軍委又發出通知，決定在軍委常委之下設立一個辦公會議，由羅瑞卿、譚政、楊成武、蕭華、邱會作、蕭向榮組成，負責處理軍委的日常事務工作。在此前的十月十四日，已任命我爲總後方勤務部部長（次年四月，總後方勤務部改稱總後勤部），免去洪學智部長職務。一九六二年，我還被任命爲編制屬於軍隊序列的國務院國防工業辦公室副主任（主任羅瑞卿）。

對於新軍委各總部領導人選的提出是有個醞釀過程的。後來，周總理談到，毛主席曾對他說：「你對軍隊的幹部比較熟悉，找些什麼人到軍委辦事，你去物色一下。林彪身體不大好，讓他休息幾天。」

對總參謀長的人選，總理在同毛主席交談時曾提到許光達和劉亞樓。毛主席說：「劉亞樓能力可以，但作風有些霸道。除他們二人之外，還可以考慮其他人。」實際上，主席對這兩個人選並不認可。

周總理又找了羅榮桓元帥，交談了物色總參謀長、總後勤部部長的人選問題。羅帥是一個公心很大的人，他提出了一條建議：搞五湖四海，削平山頭又照顧山頭。雖然反掉了彭、黃，但最好能維持原來任職的歷史情況，即總參謀長最好是三軍團的同志或者是二方面軍的同志；總後部長要選四方面軍的同志。羅帥提出的總參謀長的人選是：許光達、蕭勁光，總後部長的人選是：王新亭、王宏坤。周總理對羅帥的意見未做肯定或否定的表態，可能他對毛主席的心思更瞭解一些，總理祇是申明他們是個人交換意見。

周總理是個很周到的人，他隨時把物色人選的情況向林總通氣，並和林總交換過意見。林總對於主席叫他上臺主持軍委日常工作，是沒有思想準備的，並不情願，因爲林總解放後，大部分時間養病，很多「紛爭」他很少介入。但林祇要決定幹，他會幹出個好樣子的。點將是頭等大事，林總提出由羅瑞卿擔任總參謀長，總理感到意外又表示同意，周總理提出邱會作擔任總後部長，林總很是贊成，其實林總上臺後，黃永勝、賴傳珠等不少人向林、羅建議我去當總後部長，林心中事先是有數的。林總說這樣大事祇有主席才能決定，爲此，林總約周總理一起到毛

主席那裏去匯報。他們到了主席那裏，當時的中央常委包括劉少奇、鄧小平等同志都在座，對林、周的建議，他們都同意。

毛主席聽完林、周的匯報後，笑著對他們說：「你們很會選人，羅是個幹將，此人祇有林彪同志才能想得到；邱會作年輕但能辦事。」接著主席又對林總說：「不過羅這個人渾身是刺，你不怕刺到你身上？你不怕他霸道呀？對邱會作的情況，在座的人恐怕就是總理最瞭解。此人在年青的時候，是一個不錯的人，多年不見了，現在的情況怎樣就不清楚了。」

周總理說：「羅瑞卿在公安部工作十年了，在各方面都很好，同幹部和群眾的關係也搞得不錯。邱會作剛四十歲出頭，還是一個年青人，他本人也有一定組織能力，紅軍東征的時候，他就跟我搞後勤，工作幹勁十足，他當總後部長，是一個比較理想的人物。」

毛主席又說：「在戰爭年代，我和恩來是分別擔任『總參謀長』和『總後勤部長』的。不打仗了，對軍隊的事，總理過問不少，他挨了彭德懷的罵也不少，他們祇會向總理要錢，要東西。選羅瑞卿、邱會作到軍委辦事是合適的，我贊成。大家要沒有不同意見就定下來了吧。」

我擔任總後部長的任命下來時，還在高等軍事學院學習，我一點思想準備都沒有，為此，周總理專門把我叫去談一下。一見面他就對我說：「毛主席決定你去總後當部長了，這是我和林彪同志不約而同提出來的，大家都贊成。以前我還想要你去國家經委工作，現在不成了。不過總後和國務院有密切聯繫，今後我們在一起辦事的機會多了。把軍隊後勤工作做好，對我也是支持。過去彭德懷罵人，黃克誠、洪學智就知道問我要東西。」

這次軍委改組，最關鍵的就是換了總參謀長。羅瑞卿在全黨全軍是一個很有影響的幹部，我很早就認識他，記得在一九三八年他結婚時，專門請李富春、葉季壯和我吃過飯。一九四四年，我從前線回延安參加七大，剛到不久，富春同志就提出要我去中央黨校任副秘書長，我爲了要學習一個時期，不想當這個副秘書長，曾請羅爲我說情，他很負責的爲我辦了。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後我去東北，在路過張家口時，我的牲口的腿摔壞不能用了，在我沒有辦法時找到了羅，他不僅熱情地接待了我，還親自領我去馬廄，任我自己選了一匹牲口。羅當時是晉察冀軍區

副政委，能夠親自爲我解決這樣的具體困難，使我非常感動，革命隊伍中的互相關心是真誠的，使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

一九四九年一月，在平津戰役期間，東北野戰軍在北平以東召開高級幹部會議，羅當時是華北軍區政治部主任，參加了這次會議，他不但親自去看了我們，還請我們幾個人去他那裏吃飯。一九五二年三反運動期間，羅曾代表中央到廣東檢查工作。我當時任華南軍區政治部主任，羅在檢查中遇到的許多問題都主動找我商量，甚至他還專門到我的家裏同我商量，比如有人想整黃永勝，他問我如何看？我說：「我負責地向羅部長報告，黃永勝沒有問題。說穿了就是幹部之間的關係問題。而且趁老黃外出治病，讓老項亂說，也是不健康的做法。」羅瑞卿同意我的意見，但他還是認真做了調查，並很負責地向毛主席作了匯報，他認爲對黃永勝同志是小題大做，毛主席也及時給予指示，黃順利過了關。一九五五年我調任總後副部長兼副政委時，我代替黃克誠去參加中央肅反的會議，但凡去公安部開會，羅每次都是熱情地請我和他們坐在一起，多年的接觸使我感到羅是一個有水平、有能力、有辦法的高級幹部。我當時認爲，中央任命羅爲軍委秘書長、總參謀長，成爲軍委工作的實際主持者，是合適的、正確的。

在歷史上，羅瑞卿曾是一軍團的保衛局長，當時他的主要任務之一是保衛林總。林、羅上臺時，林總在軍委常委會上有介紹羅瑞卿的講話，從這次講話中就可見他們之間的密切程度了。林總說（大意）：在軍委的領導下，成立一個辦公會議，是一個很好的辦法。這個辦公會議，不是平常說的「辦公」的意思，是一個執行中央和軍委意圖的集體領導的組織機構，羅總長是辦公會議的主持人。在座的同志對羅總長都是比較熟悉的，他任軍委秘書長、總參謀長，毛主席、中央放心。我和在座的不少人同羅總長都是老同事，他很有領導和組織工作的能力，由他主持軍委的日常工作，軍委常委對你們的工作是既放手，也會大力支持的。

當時到會的各位元帥都講了話，都表示支持羅瑞卿和軍委辦公會議。

軍委辦公會議

林總對工作向來是提綱挈領的，而且是用人不疑，全力支持下面的工作，給下面的工作創造條件。因此，林總向毛主席建議在軍委常委領

導下設立軍委辦公會議作為執行機構，對軍委常委負責，中央很快就同意了。軍委辦公會議的成員列席軍委常委會議，當時的軍委辦公會議的成員是：羅瑞卿、譚政、楊成武、蕭華、邱會作、蕭向榮。一九六〇年上半年，增補了張愛萍，一九六一年一月，譚政退出。

軍委辦公會議的職責範圍，用一句話來說，就是軍隊日常工作的「總管」。稍微具體一點來說，可以有以下方面：

第一，學習傳達中央的方針、政策、指示等文件。這項工作得到了全軍領導幹部的熱烈擁護。不少領導幹部說：過去對中央的事，祇知道「外面」的（指看報紙），現在可以知道「裏面」的（指聽傳達文件），我們和中央的距離比過去近了。

第二，討論起草上報下發的文件。各總部凡是要用軍委名義向上請示或報告的文件，都要經辦公會議審議；其中重要的事情要提交軍委常委審議，一般的日常工作由辦公會議處理。

第三，審議各總部，各軍、兵種的請示報告。各總部除業務性質的問題以外，凡涉及到全軍的方針、政策問題的文件，都要經辦公會議討論、審議。

第四，審議軍隊高級幹部任免事項。

第五，討論、審議專門問題。

當時的軍委辦公會議在全軍的威信很高，受到了各總部、各軍區、各軍兵種黨委的支持和熱烈擁護。羅瑞卿領導和主持下的軍委辦公會議的工作是成功的，對軍隊的建設和準備打仗做出了重要貢獻。為什麼能形成這樣的局面，我的體會有這麼幾點：

第一，軍委辦公會議是一個有職有權有責的機構。它既掌握了軍隊工作的大政方針，又有權力及時處理各種問題。軍隊的日常工作和各大單位的請示報告，軍委辦公會議負責解決，這樣，不管大事小事都能有個著落。

第二，軍委辦公會議作風民主。辦事注意調查研究，對下面的請示報告，凡是沒有說清楚的，不草率做出決定，一定要查個水落石出。同時注意耐心聽取下面的意見，辦公會議成員有自我批評精神。

第三，軍委辦公會議講究工作效率。開始規定每星期開會一次，後來則幾乎天天開會，會議時間有長有短，長則一天有時甚至二十四小時

不散。例如：一九六二年中印邊境自衛反擊戰期間，軍委辦公會議成員都夜以繼日地集體辦公。對下面的請示報告能夠及時、明確、具體的給予答覆，踢皮球的現象幾乎沒有了。

穩定軍隊的高級幹部

反對彭德懷的鬥爭，重點在軍隊。林總、羅瑞卿是在反彭、黃鬥爭中上臺的，在軍隊中有一大批很有影響的重要幹部，是旗幟鮮明地和彭德懷鬥爭的，如羅榮桓、劉伯承、聶榮臻、葉劍英、羅瑞卿、劉亞樓、蕭華、楊成武、賴傳珠等。我認爲當時對彭德懷的鬥爭是既堅決，又防止了擴大化，會議是成功的，團結了大多數幹部。雖然一時有些群情激憤，但積極分子大都是和彭有些過節的人。當時全國都在反右傾，軍隊批彭也正在風頭上，這是勢在必行的事情。

當時，批彭火藥味比較濃的地方，還是劉少奇、鄧小平、康生他們主持會議的時候，尤其是劉少奇對彭、黃的批判很嚴厲。劉少奇在大會上講（大意）：彭德懷這個人手伸得特別長，還管地方上的事（指彭給主席寫信提人民公社的事）。抗戰時期，彭德懷長期與華中局搞對抗，把手都伸到華中來了（指黃克誠、彭雪楓）。劉少奇還挖苦彭德懷說：與其你反黨還不如我反黨。這時羅瑞卿插話說：你們都知道吧，三軍團有大彭和小彭，大彭是彭德懷，小彭是彭雪楓。本來羅的話說到這裏，事情也就爲止了，但這裏發生了一個插曲。羅瑞卿的話音剛落吳法憲就站起來說：「我要控訴，過草地時三軍團殺了一軍團的人！」羅瑞卿說：「那就是彭、黃搞的。」吳法憲的話是人人皆知的老話，但羅瑞卿的話一下惹火了北京軍區參謀長鍾偉，鍾偉說（大意）：情況不是這樣，彭德懷在前面指揮打仗，黃克誠被撤了職，不是他們搞的。我當時就是負責收容的，情況我知道，過草地時有個重傷員實在走不動了，他爲防止敵人追上來暴露自己是紅軍就換了衣服，羅瑞卿同志卻說他要叛變革命，要殺他。我說我負責收容，情況我清楚，我們的戰友從江西走出來，現在負傷這麼慘，我們要幫他一把。羅瑞卿同志堅持說他要叛變革命，並親自殺了他。是你們殺的，怎麼是三軍團的人殺的呢？！鍾偉的話使主持會議的羅瑞卿、蕭華有些愕然，大爲惱火。過了一會蕭華帶人把鍾偉搞走了。

彭德懷下臺以後，新的軍委對高級幹部一律實行穩定政策，林總、羅瑞卿是把這件事當作一件大政策來掌握的。林總在一次軍委常委會議上說：「新的軍委對幹部不能輕易變動，更不能隨便調換。軍隊的團結、穩定最主要的是對高級幹部的使用問題。高級幹部一換，接著中級、下級幹部都會換，這樣軍隊就惴惴不安了。現在的高級領導幹部有個別的是不稱職的，有調換的必要，但也要在適當時期通盤考慮，適當安排。凡是調整了工作的幹部，特別是本人有意見的，都要做好思想工作，做到被調整的人思想沒有包袱。」林總講話的精神得到了貫徹。除彭德懷外，被降職的祇有黃克誠、鄧華、洪學智、萬毅、鍾偉等人，而且中央都安排了工作。其他人一律沒有作組織處理。

實行穩定的政策，這裏還可舉一個例子，就是成都軍區司令員的人選問題，成都軍區司令員賀炳炎一九六〇年去世後，本來李天佑同志最爲適合，總政也幾次提出繼任人選，後來還是林總執意點名黃新廷擔任。對此，羅瑞卿轉達了林總的話說：「林總關於成都軍區司令人選問題有指示，林總說：由於歷史原因，我們的軍隊是『合股』而成的。我們必須尊重這個歷史，在實際工作中要考慮到歷史的情況，祇有領導對幹部的使用情況做得好，才能把多股合成一股。成都軍區司令員原是由二方面軍的同志來擔任的，這也是個象徵，對該軍區的司令繼任人選就要注意到這種不成文的歷史！」

新軍委成立後，還有一個如何對待所謂「落後」幹部的態度問題：總政的態度是殺一儆百；林、羅的態度是拉一把。對於這個問題，羅瑞卿在一次軍委辦公會議上有個重要的講話，他說：今天的單子裏（指討論的議題）有對xxx同志的處理問題。對總政提的處理意見，我是感到不安的。爲此，我昨晚專門去同常委商量過，向他們請示。他們有重要指示，總的精神是對幹部要看本質，要看大的表現，要看政治。對他們的缺點、甚至某些嚴重錯誤是要批評幫助的，但決不能打擊，這是一條嚴格的界限。對幹部採取打擊的政策，領導上就一定犯錯誤。對今天提出的對xxx處罰的議題我提議撤銷，由總政重新審議。羅的這一講話也算是一條準則，以後發生同樣的事情依此照辦，挽救了好幾個人。我記得當時總政曾建議對xxx（濟南軍區副司令員），xxx（新疆軍區副司令員）給予紀律處分，說他們都有生活作風上的錯誤。還有一批高級幹部如

XXX、XXX、XXX 都是老「運動員」，他們都經常被「運動」的。經過羅瑞卿多方面做說服工作，保護了一些高級幹部。羅對幹部在政治上要求很嚴，對其他方面的一些缺點總是從愛護幫助的態度出發進行批評教育。我認爲，羅的態度和做法，是符合毛主席的一貫的幹部政策的。但是，「九一三」之後，羅重新上臺後變化很大，打擊幹部很厲害，他又一次投靠鄧小平，我認爲這是他的悲劇。

總後在處理和彭德懷有關的同志的問題時，是按總政下發的《關於劃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標準和處理辦法》進行的。總政當時的態度和辦法都是嚴厲的，他們給總後定了兩個重點人物，一個洪學智，一個蘇煥清。最後軍委決定撤消洪學智的職務，離開軍隊到吉林省任廳級幹部。當時，他還住在總後原來的房子中，和我的家也祇有十米之遙，我們從來沒趕他。走之前他提出把他坐的吉姆車帶走，我同意了並報告了羅瑞卿，羅瑞卿說：「（車）帶走吧，帶走吧。祇要人快點走就行了。」他六〇年五月間才到吉林去，我和李聚奎政委及幾個在職的領導還和他一起會餐，晚餐後我陪洪學智到每家去辭行。在審查期間，總政一直抓住洪的小辮子不放，上綱上線太高，洪不能接受，洪找到我，我幫他修改過檢討稿，在總政那裏還是沒通過，無奈之時，洪讓我去登譚政主任的門，譚政聽進去了我的話。洪吃大苦頭是在文革，聽說搞到農場勞改去了。

蘇煥清是總後營房部部長，工作是比较踏實的。他是黃克誠和洪學智在新四軍三師時的老部下，硬讓他揭發黃在任東北軍區後勤司令員時的所謂「經濟」問題，軍事檢察院的黃火星檢察長負責審查蘇煥清，蘇煥清說沒有，因爲在東北軍區他和黃克誠根本沒有同時在一起工作過，總政犯了官僚主義。看來總政是有人想用所謂「經濟」問題把黃克誠搞臭，在這個問題上說黃老不是的也不止吳法憲一人，最後祇能一風吹，但總政還是示意降職使用，這是何道理？蘇煥清解脫之後，我們立即恢復了他的工作。

總後的新班子

彭德懷下臺後，洪學智受牽連也下臺了，其實洪學智和彭根本沒有什麼「有機」的聯繫，祇是在志願軍的時候在一起工作。我對洪的下臺有同情感，因爲洪是一個工作很踏實的人，後勤幹部就需要這樣的人。洪

下臺後，總後政委李聚奎同志臨時主持工作，具體工作參謀長胥光義協助。我任總後部長的命令在軍內公佈時，我還在高等軍事學院學習，我的任命的確在原來總後領導班子中掀起了波瀾。

總後副部長張令彬是一九二六年入黨的老同志，一九二七年跟著毛主席參加秋收起義上了井岡山，他比我年長十二歲，有後勤工作的豐富經驗，對黨的事業忠心耿耿。我回總後當部長，羅帥事先找他談了話，叮囑他支持我的工作，張令彬心中有了底，在後來的工作中，我們一直團結很好。

總後政委李聚奎是一九二八年平江起義的老同志，他曾擔任過東北軍區後勤部參謀長和四野後勤部第二部長，雖然他比我年長十歲，但身體結實，工作認真，他很想在後勤戰線做出成績。因此，我當部長主持工作，我們難免有不協調之處。總政治部主任譚政也專門找李聚奎談了話，讓他帶頭支持我的工作，在老同志中做個榜樣。譚政的話他很難聽進去。我是軍委辦公會議的成員，總後的事都是我在軍委辦公會議上提出研究，軍委的指示也是我帶回總後傳達，可是在總後的會上，開著開著，他就主動主持起來，最後總是他說：「沒有什麼問題就散會。」我有工作要佈置就常發生困難。

後來就發生了推選總後黨委書記的事情。我們黨的黨委書記歷來都是上級黨委決定的，黨委書記也是一種「職務」，尤其是高級領率機關，本單位是不能自選黨委書記的，當然總後也是一樣，總後的黨委書記要軍委定，要中央定。但總後偏偏發生了這樣的事情，在總後的常委會上，由李聚奎同志主持時，竟然研究起總後黨委第一書記的人選。參謀長胥光義直截了當地提出：「李聚奎同志軍銜最高，資格最老，應當為黨委第一書記。」湯平同志立即說：「怎麼還要我們選黨委第一書記？這不對吧！但是如果要我表示態度的話，祇有邱會作同志適合當第一書記，我認為這和毛主席、林總決定邱會作回來當部長，抓全軍的後勤工作是一致的。」張令彬、饒正錫同志都支持我，並認為開常委會醞釀黨委第一書記是不妥的。我當時也發了言，我給李聚奎同志留足了面子，我說：「如果我們可以醞釀總後黨委第一書記，我提議李聚奎同志擔任。」其他的常委都沒開口，就草草散會了。我對自己說，我得了兩票半（湯平、饒正錫支持我，張令彬認為會上醞釀是錯誤的，算半票）。

不久，軍委常委開會，其中一個內容就是總後黨委常委的組成問題，我作為軍委辦公會議的成員也列席了會議。林總、賀老總、聶帥、羅帥、葉帥都參加了。林總來了個開場白，會議就由羅瑞卿來主持。譚政主任代表總政拿出「邱會作任總後黨委第一書記的意見」來討論，他的話音剛一落，羅瑞卿就說：「總後黨委第一書記我的意見就是由邱會作來擔任，在這個問題上，總後的思想相當混亂。本來讓他們醞釀常委，他們卻推舉黨委書記。你邱會作礙著面子，不講原則。」

羅帥接著說：「把論資排輩放在前頭是不成的，總政以後要特別注意。」羅帥當場批評了譚政。賀老總說：「什麼老資格，比我還老？用他們去搞後勤，全軍沒飯吃！」賀總又對我說：「邱會作你給我打起精神來，大膽工作！」最後林總講話，他說：「軍委要支持邱會作同志的工作，現在總後的擔子是很重的，我們相信邱會作同志能夠把工作搞好！」這樣，軍委決定讓我擔任總後黨委第一書記，這個決定很快得到中央的批准。

對這樣的安排，李聚奎同志心裏肯定有意見，但這並不是由我來決定的。我祇有處處尊重他，來搞好團結，搞好工作。當然我在工作中也會有缺點和失誤，李聚奎同志也不斷向總政告我的狀，比如在反對總政搞「空頭政治」方面，我也說過隨便的話。直到一九六六年，蕭華主任對又去告狀的李聚奎同志說：「你不要再告了，雞毛蒜皮我也不聽，軍委已決定你調到高等軍事學院工作，任政委。」

林彪批評了朱德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八日至九月十二日，軍委召開擴大會議，傳達八屆八中全會精神，批判彭德懷。林總在會上作了總結性的講話。林總的講話是以軍隊「革命化」這個口號開場的，這個口號對我來說，並不很陌生，但林總作為軍隊建設的方向提出來，我聽到的還是第一次，意義非同小可。正是因為如此，這句話當時就引起了我的注意。

很快林總的講話就轉向批判彭德懷和對朱德的批評了。對彭的批判，完全可以理解，大家都表態，林也必須表態。對彭德懷的批判，林說的話不多，祇說了幾句話：「有意見不去同毛主席當面說，背地裏搞陰謀活動。」林總說到這裏，對毛主席表示了深厚的革命感情，他說：「毛主席是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領導全國人民打敗了蔣介石，取得全國政

權。沒有毛主席的領導，我們就不能取得這樣偉大的勝利！任何人反對毛主席，都是不顧黨、國家、人民的利益的，對這種人，應當堅決反對！」

對朱德的批評，我立即就和「革命化」這個問題聯繫在一起了，我理解是：「革命化」就是忠於毛主席的代名詞。林總在寓示：對於軍隊，連朱德這樣的總司令都不能忘乎所以，其他人就更不在話下了，彭德懷也是教訓，今後大家都忠於毛主席。

其實，朱德在這次軍委擴大會議上已經對其歷史上曾經犯過的「路線錯誤」及幾次支持過「錯誤路線」做出過自我檢查。對這次廬山會議，朱德認為自己對他們「反黨野心家的本質認識不夠，光從好的方面去想，認為他們已經改過來了，同時和他們在思想上又有共同點，所以這次我同樣表現出嗅覺不靈，沒有及時識破他們反黨陰謀的本質。」朱德的檢查中央後來以中央文件轉發給全國，全軍縣團級以上黨員幹部閱讀。

在廬山會議上，朱德有些偏袒彭德懷，至少是態度曖昧，主席批評他「隔靴撓癢」。我記得林總在軍委擴大會議上批評朱德時，朱德當時就坐在林總的旁邊，林說：「今天當著全軍高級幹部的面，對朱德同志是要進行批評的，他是不承認毛主席是黨的領袖的。朱德同志總是認為自己的功勞很大，其實他名聲很大，功勞不很大。戰爭年間，朱德同志名義上是總司令，實際上我軍的總司令向來都是毛主席。我們的高級幹部，對朱德同志的歷史情況和政治情況，是應知道的，這很有必要。我們學習黨的歷史的中心問題，就是認識黨內兩條路線鬥爭，是很有好處的。」

林總對朱德的批評，我是有理解的一方面，又有吃驚的一方面。我軍的總司令向來都是毛主席，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軍的高級幹部知道得更清楚了，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對朱德不是一個「真總司令」這個問題，對到會的人震動並不大。但林總指出了朱德是個野心家，不服從毛主席，對大家震動就很大了，像我這樣的幹部都有點吃驚了。對朱德過去怎樣反對毛主席我知道的很少，後來從劉亞樓口裏，才知道了實情問題。劉對我和蕭向榮說：「朱德是總司令嗎？他是彭德懷的總司令。在廬山朱德支持彭德懷反對毛主席。在這個問題上，朱德是真總司令，當然，他能起到了多大作用？！為了集中力量解決彭德懷的問題，才把朱德的問題分開的。」劉亞樓又說：「林總對朱德的批評，不是他個人的意思，他是毛主席和中央的代言人。」劉還風趣地說：「林總給我們大家吃了一把

阿斯比林，鼻子通氣了，可以聞到更多的氣味了。」聽了林總批判彭、朱的話，又聽了劉亞樓一席知情話，我對林講的「革命化」的問題，就算是摸到底了。

朱德對中國革命的貢獻是很大的，南昌起義朱德雖然還算不上是什麼主要領導人，但他和陳毅一直帶著這支起義部隊轉戰，湘南暴動後上了井岡山，武裝割據，建立蘇區，朱德是有功的。一九二八年冬，我的家鄉開始鬧革命，我雖然還是一個小孩，但也知道「朱毛」是紅軍的領頭人。一九四五年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場的正中央掛的就是「毛朱」的頭像。「朱毛」這個稱呼，在革命隊伍中流傳很廣，正是因為這樣，就更加促使我去想問題。

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三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對朱德元帥進行了嚴厲的批判，主持人是劉少奇、鄧小平。會議結束時由鄧小平宣佈了中央對彭、羅、陸、楊處理的決定。在會上林彪也批了朱德，主要還是過去那些話，說朱德有野心，說朱德不是總司令，毛主席是真正的總司令，說鞏固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這是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利益之所在。陳老總的發言很嚴厲，問朱德：「你是不是要搞政變？我看你是要黃袍加身，當皇帝。你還大力讚揚赫魯曉夫。你野心非常大。」周恩來也狠狠批了朱德，不過總理是擺事實的。總理說朱德同志的賬是很多的，似乎朱德一直都是錯誤的。（大意）從井岡山一直打到梅縣是盲動主義，流寇主義；執行立三路線、王明路線；和張國燾的鬥爭，也是劉伯承、賀龍、任弼時推著走的；解放以後，高饒彭黃的事，你都沾過邊嘛。我們不放心你，毛主席也擔心常委中有你這樣一個定時炸彈。

一九六八年十月，在黨的八屆十二中全會擴大會議上，同樣有不少人批判了朱德，葉劍英則做了長篇發言。我從葉帥的發言中，對朱德的歷史就有比較系統的瞭解了。會上有人提出：「朱德的問題，造反派早就搞的滿天飛了，但從來還沒有正式傳達過，我們希望進行傳達。」周總理當即回答：「可根據葉劍英同志在全會的發言在小範圍內講，即各大軍區、各軍兵種、各總部的黨委常委和各省市自治區黨的核心小組可以傳達，中央就不發什麼文件了。」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底，我在總後黨委會上傳達過有關林總、葉劍英批判朱德的問題。公審的時候把我在總後黨委會上傳達上面的精神，說成是攻擊朱德的犯罪，也太不尊重歷史，太不尊重事實了。

七一年「九一三」之後，主席又說，「朱毛，朱毛，沒有朱，哪有毛？」這話已經說晚了。

林總在軍委擴大會議上提出，肯定毛主席的領袖地位，擁護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思想和指示，我是完全接受和擁護的。我從參加革命起，在幾十年的革命征程中，不管在什麼情況下，我都是堅決擁護毛主席的。即使在文革中，我知道主席對造反派是支持的，至少是不反對的，當我受到總後造反派多次的殘酷的武鬥，幾乎要了命時，我對毛主席都沒有動搖過。一九八〇年，我在鄧小平、彭真組成的所謂的公審法庭上，我也沒有把責任推到毛主席身上。

一點教訓

毛主席提倡搞「五湖四海」，他曾說我們的革命隊伍是「爲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的」。現在想起來，主席自己也沒有把握好，我感到在反彭德懷以後，毛主席對掌握軍權看得很重，從「五湖四海」搞成「雙一」（一方面軍，一軍團），總參謀長羅瑞卿、總政治部主任羅榮桓、總後勤部長邱會作都是「雙一」，連軍委辦公會議的羅瑞卿、譚政、蕭華、楊成武、邱會作、蕭向榮也是「雙一」。尤其是六二年七千人大會後，更是如此。軍隊這麼多老同志，人家是口服心不服。那時看，這是主席的英明決策；現在看，主席有些失衡。尤其是「九一三」之後，主席打掉了林彪和我們這些「雙一」的骨幹，從羅瑞卿、劉亞樓到蕭華、楊成武，再到我們，死的死倒的倒，可是他又說他身邊沒有（即不用）一個一方面軍的人，四方面軍的人比較謹慎（即比較好），這是非常不妥的，也是蒼白無力的。其實主席並沒有真正接受教訓，在文革中，主席實際上還是摒棄「五湖四海」，而重用「中央文革」（以後是「四人幫」）。主席去世後，受主席重用的「四人幫」頃刻瓦解也就是必然的了。

第十五章 林彪對我軍建設的貢獻

廣州軍委擴大會議

洪學智是一九五四年上半年從朝鮮回來到總後的，我是一九五五年初從廣州到總後的。有一次我們閒談時我對他說：「你在彭總和林總手下都幹過，你對兩位老總的指揮風格怎麼看？」當時洪並沒有說彭，他直接說林：「我給你打個比方，林總打仗像打撲克，不檢分，五分看不上，十分也不要，專門摳底。」我認為洪學智說准了林總的指揮風格，林總是不幹則已，一幹就會幹出個樣子來。林總上臺後出的牌，也和打仗時一樣，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就是高舉「革命化」這張大牌！軍隊怎麼革命化呢？那就是「三八作風」、「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接著又提出「突出政治」、「四個第一」，把全軍集合在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下。

解放軍是一個革命的整體，但由於歷史的原因，山頭主義、宗派情緒也是很重的，不但上級對下級有山頭主義，宗派情緒；下級對上級也有山頭主義，宗派情緒。老上級的批評，對不對都堅決聽；不熟悉的領導批評對了，卻往往口服心不服，嘟嘟囔囔。使用幹部也是一樣，自己熟悉的，不太合適也想用，也想爭；自己不熟悉的，優秀的也不積極推薦。這對部隊建設危害是很大的。

林總就是要打掉這些不正確的東西，把全軍統一在一個思想下，這就是毛澤東思想。林總號召全軍把毛澤東思想真正學到手，「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做毛主席的好戰士」。林總主持軍委工作以後，全軍的精神面貌起了根本的變化，這是林總很大的貢獻。

林總也是一個扎紮實施的實踐家。林總是很能讀書很會讀書的人，爲了我軍建設他讀了大量的書籍，而且取其精華，勇於實踐。林總從南到北，走遍了全軍上下，陸海空三軍都走到了，從我軍的「革命化」入

手，從部隊的編制開刀，把我軍引上革命化、正規化、現代化的道路。遺憾的是，林總因為戰傷，嚴重影響了他的身體，六二年就病倒了。

六〇年初，中央在上海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由毛主席主持，林總在發言中講到部隊問題，林總響亮地提出（大意）：部隊要樹立革命的作風，這個作風要有一個標準，這個標準就是毛主席一九三九年提出的「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團結、緊張、嚴肅、活潑」，三句話，八個字。毛主席以簡單樸素的語言，概括了很多道理。部隊掌握了毛主席這三句話八個字，就有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方向，有革命的雄心壯志，我們的部隊就生龍活虎，永遠有必勝的信心。接著在六〇年春節期間的廣州軍委擴大會議上，林總又反覆講這三句話八個字，而且特別強調團結，提出團結就是力量，「我們有了毛澤東思想，才能團結一致」。林總還引用了孟子「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話，指出「人和」就是團結。林總對部隊的建設是抓住了綱，是嘔心瀝血的。林總一說到「三八作風」的內容，大家熱烈鼓掌，都高興地笑了，因為「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團結、緊張、嚴肅、活潑」，是毛主席當年為抗大題的校訓，大家都熟悉，因此倍感親切。

「九一三」以後，有人把林總糟蹋得不成樣子，什麼「不讀書不看報不學無術」，這完全是一種誣蔑。

新軍委成立後，在軍隊建設上同時提出來了兩大問題，一是軍隊革命化問題；二是準備打仗問題。後來又出現一個軍隊搞生產渡過災荒的問題，這三個問題相互聯繫，相互促進。

一九六〇年一至二月間在廣州召開的軍委擴大會議和九至十月間在北京召開的軍委擴大會議，以及一九六二年二至五月的全軍編制裝備會議是準備打仗的重要會議。這三個會議對部隊革命化、正規化、準備打仗都做出了重要的決策。

一九六〇年春節期間，軍委在廣州召開了擴大會議。各總部、軍種、兵種、院校的負責同志，各大軍區的司令員、政委、參謀長、政治部主任、後勤部長，各野戰軍軍長、政委等參加了會議。會議的主題是討論戰略方針問題。在會議期間，毛主席、周恩來、鄧小平等中央常委都在廣州，會議中討論的問題都及時地得到了中央的指示。毛主席還在



一九六〇年，廣州軍委擴大會議八元帥合影。前左起陳毅、劉伯承、林彪、賀龍、羅榮桓。後左起羅瑞卿、聶榮臻、徐向前、陶鑄、葉劍英。

廣州郊區的雞頸坑接見了到會全體同志併合影留念，領導和主持這次會議的林彪、賀龍、聶榮臻、劉伯承、陳毅、羅榮桓、徐向前、葉劍英等八位元帥還在一起合影（還有陶鑄和羅瑞卿），這是我軍有史以來從未有過的，象徵著軍隊的大團結，這對開好會議都是極為重要的。

北頂南放

林總代表軍委在會議上做了長篇報告，當天會議的執行主席是賀龍元帥。在我的回憶中，報告有下面幾個要點：

第一，關於戰略方針問題。林總說：毛主席早就提出了我們的戰略方針是積極防卸，但有了戰略方針還不夠，還要有具體的作戰方針、作戰計劃。制定作戰方針的主要依據是未來的假想敵、自己國家的經濟實力和我軍的作戰能力，這三條是互相起作用的。現在，我們國家的經濟

力量還很薄弱，準備打仗和經濟建設有一定矛盾，但從國家安全來說又要這樣辦的。

我軍現在還是一個大步兵，空軍的作戰能力稍微好一點，海軍還是個「雜牌船隊」。根據敵我力量對比，我們的作戰方針可以考慮為四個大字：「北頂南放」。北邊以長江為界，對從鴨綠江到象山灣沿海一線的來犯之敵要頂住，要死守，寸土不讓。對南方來犯之敵，可以考慮放進來打，因為南方來犯之敵是從海上來，敵人沒有後方，放進來切斷退路，圍而殲之。

第二，關於部隊建設。林總說，作戰方針是部隊建設的總綱，全面提高部隊戰鬥是部隊建設的中心。政治覺悟、軍事技術、指揮靈敏、保障能力是部隊戰鬥力的四大要素。我們還必須建設能幹的統帥部，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後勤部都是戰略指揮部。管戰略是重要任務，各總部的工作差之毫釐就會失之千里，甚至導致戰爭的失敗。情報不準確、通信失靈、物資無保障等導致戰爭失敗的例子，在軍事史上是很多的。

第三、關於國防工程。林總說：要立即著手搞國防工程，部隊自己要擔負起這項繁重的任務。要在全國實行坑道化、要塞化、地下化。現在國家很窮也要搞，等富起來再搞也就晚了。工程搞起來後沒有用怎麼辦？我們寧願它無用。搞工程按防禦任務來說，是先海邊防再內地。按地區來說，先北後南。東北、華北、西北是重點，南方先搞點「卡口子」工程，卡口子指要塞、隘口等險要堅守的地方。各種工程要像「一盤肉磨子」能夠在長時間把敵人磨成肉漿。我們搞國防工程的原則是：既要搞國防建設，又要少花錢，不過多增加國家財政支出。

第四、關於全國基地化。林總說：未來戰爭有兩個方面的重要問題，一個是防止敵人的原子彈，一個是依托後方的供應。大規模戰爭，沒有後方是不行的。要根據作戰計劃在全國建立戰略、戰役供應基地，後勤保障實行基地化，像「開旅館」一樣建立基地。基地工程要上山、靠山、分散，多打洞子，能夠經得起敵人空襲。

第五，關於國防工業。林總說：我們的國防工業在中央的關心、特別是周總理的過問下，有了一定的基礎。現代戰爭沒有國防工業是不可想像的。我們的武器包括常規和尖端兩個部分，常規兵器生產體系應建立完善起來，我們也要抓緊尖端武器的研製。在今後二至三年內，常規武

器要建立肝膽俱全的系統，對尖端武器來說，我們的決心是原子彈用柴火燒也要把它燒響。原子彈這東西打起仗來有多大作用，我們都還不知道，但別人有的東西我們也要有。毛主席、周總理是贊成搞國防工業的，可能有人說搞國防工業是花「冤枉錢」，我看那也不是壞事，現在世界各國都在花「冤枉錢」，這種錢花多了可能就不是戰爭了，而是「買」來了和平。

第六，關於邊防問題。林總提出了三條原則：一是不逞英雄，二是不打第一槍，三是建立邊防「真空」。林總說：全軍都要懂得，對國外打第一槍的權力祇屬於最高統帥毛主席，祇有毛主席才有決定打第一槍的權力，這應該是一條嚴格的政治、軍事紀律。林總還說：爲了不在邊境上鬧事，我們的邊防部隊可以在戰事起來，後撤二十到三十公里，和對方脫離接觸。

對於林總的講話，會議進行熱烈的討論。從元帥到軍長登臺發言者有若干人。元帥們一致稱讚林的講話把毛主席的軍事思想講活了，是我軍戰備和建設的根據。陳毅元帥專程趕到大會來講話，以表示對林彪講話的擁護。劉亞樓的發言得到了與會者的強烈反響，他說：林總的報告把毛主席的軍事思想、軍隊建設、準備打仗寫成了「描紅」，我們照著填就是了。



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澤東主席在廣州接見出席軍委擴大會議的全體與會人員。

五排左五為邱會作。

林總的這篇報告解決了軍隊建設的主要問題。從一九五〇年代中期起，我們國家的思想戰線逐漸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斯大林去世，赫魯曉夫上臺，毛主席對於反對修正主義，準備打仗幾乎同時提出來了。林總一九六〇年在軍委擴大會上提出了「北頂南放」的作戰方針之後，「加強戰備，準備打仗」就成了軍隊建設的總方針。全軍進行了持久的、空前的、大規模的戰備工作。

北京軍委擴大會議

軍隊就是打仗的，在廣州的軍委擴大會議上，我軍的戰略方針確定下來，林總就放心了。廣州的軍委擴大會議，八個元帥坐下來開會，一開就是一個月，這是我軍歷史上絕無僅有的，而且毛、周、鄧也來到廣州助陣，使會議開得非常成功。

接下來，林總著重要解決我軍的建軍方向問題。一九六〇年九月，在北京又召開了軍委擴大會議。會議的主要議程是（一）反對修正主義；（二）政治思想工作；（三）軍隊的編制和裝備計劃，重點討論了加強軍隊的政治工作問題。

在會議之前，軍委舉行過專門會議，討論了部隊政治工作問題。在會上，林總發表過比較長的講話，對總政治部的工作和對譚政本人都提出過批評。他說，軍委領導上解決了革命化的問題，現在要解決部隊的革命化問題。

在會上，林總提出了乍聽起來陌生爾後又倍感親切的詞語——「四個第一」。

林總「四個第一」是指：人和武器的關係，人的因素第一；各種工作和政治工作的關係，政治工作第一；政治工作中的各種工作和思想工作的關係，思想工作第一；書本思想和活的思想的關係，活的思想第一。林總說，政治工作領域中，有四個問題是相互有關係的，這就是：

一是武器和人的關係。打仗時武器也要，人也要，但武器是要人去使用的，人不勇敢，武器就不能充分發揮作用，所以戰爭的勝利還是靠人。當原子彈、炮彈打過去以後，到接近敵人幾十米時，還是要靠人的勇敢，靠人的高度覺悟和犧牲精神。進攻時你能上去佔領陣地，才能取得勝利；防禦時你能頂得住攻擊，才能

打垮敵人。這是決定勝利的關鍵問題。武器和人這兩方面我們都要搞，但更要重視人的作用。精神的原子彈，即人的思想覺悟、人的勇敢，這比物質的原子彈強得多，有用得多，而且這祇有我們辦得到，我們的敵人是辦不到的，因而這是我們專有的，是帝國主義無法同我們比賽的。

二是各種工作和政治工作的關係。軍隊工作有司令部工作，後勤工作，軍事訓練、文化教育，等等，但政治工作做好了，人的積極性創造性發揮起來了，各種工作就都能做好。從這一環著手，一通百通。政治工作做好了，思想可以管人，政治可以管人，人也可以管人，部隊就可以搞得很好。毛主席建軍，首先是搞政治工作，把軍隊建立在政治基礎上，政治工作做好了，人的覺悟，人的積極性、創造性就會最充分地發揮出來。

三是政治工作中的各種工作和思想工作的關係。政治工作也有各種各樣的工作，有些是事務性、行政性的工作，有些是思想性的工作。各種工作都要做，不能祇做哪一個，但是重點要擺在思想工作。共產黨要把黨的政策貫徹到群眾中去，就是要根據群眾的需要，根據活的問題去進行教育，不能抽象化。

四是書本思想和活的思想的關係。書本也要，但重要的是活的思想，書本也要與實際相結合。部隊有什麼問題，中央有什麼政策，國際形勢如何，這是書本上沒有的。要以實際為中心，用無產階級觀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理來回答這些問題。思想工作要反映實際，要按實際情況去進行工作，這是唯物主義。……書本是要的，但進行書本教育時要聯繫實際。政治工作就要使上情能夠下達，下情能夠上達，不要梗塞。政治部的主要部門是宣傳部，這是做思想工作的部。

林總提出的「四個第一」，得到了毛主席的高度讚賞。毛主席在一九六三年的一個批示中說：「解放軍的政治思想工作和軍事工作，經林彪同志提出四個第一、三八作風之後，比較過去有了一個很大的發展，更具體化又更理論化了」。

林總在會議上講了話，他主要講了三個問題：（一）部隊的問題；（二）政治建軍的地位；（三）發揚我軍光榮傳統。

林總在會上提出「復古」。什麼叫「復古」？就是恢復古田會議決議的精神。在古田會議決議裏，毛主席提出要大力糾正軍隊中的非無產階級思想。林總在會上說：「政治工作是很重要的工作，正像毛主席說的，政治工作是我軍生命線，是統帥，是靈魂，是一切工作的保證。」

林總說：發揮我軍的光榮傳統，是加強軍隊政治工作的核心問題。我們軍隊的光榮傳統就是：忠於黨、忠於人民、忠於毛主席，這是人民軍隊本質的問題，如果離開了這三個「忠於」，軍隊就變質了，變為反毛主席，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軍隊了。

林總繼續說：我是歷來主張政治是第一位的，現在是事在人為的問題，扎扎實實做工作的問題。爲了發揮軍隊的光榮傳統，對一些基本問題必須說清楚，否則就會滑到邪路上去。

林總對譚政搞總政的工作是不滿意的，他曾不點名的批評譚政：有的人如同廟裏的老道一樣，祇會看廟，唸經，對政治工作一點創造性也沒有，這種人的腦子與眾不同，對別人提出來的東西，總是橫加指責。現在我們迫切需要學習，接受新鮮事物。那種抱著一貫正確的人，應當懂得：自己認爲自己了不起，別人就會認爲你沒有什麼了不起。自以爲了不起的人，如不覺悟過來，就會變爲沒有人看得起的人。

林總講話以後軍委擴大會議開始了，會議在西直門內專家招待所舉行。由於譚政對會議的重要性認識不夠，跟不上林總的思想，因此會議開始兩三天沒有人管事，一點起色也沒有。一天晚上，陳錫聯、賴傳珠、劉興元和我到林總家去看望。林總一見面就問：「會開得怎樣？」賴傳珠衝口而出說：「我們是來上香的，連接香火的人也沒有，會議根本沒有人管。」林總沒有說話，立即要秘書打電話告訴羅瑞卿，要他第二天召集軍委辦公會議，各小組召集人也來參加，專門討論開會的問題。

第二天上午，軍委辦公會議在三座門舉行。羅瑞卿首先說：「會議怎樣開法，請大家先發表高見，加強政治工作誰都不反對，但怎樣加強就有不同的看法了。」

羅瑞卿正在高談闊論的時候，林彪破例突然來到了會場。對此，羅雖有點難於理解，但他祇有立即轉變態度，畢恭畢敬向林彪說：「林總，今天的會議是專門討論開會的問題，請林總先做指示吧。」林彪說：「我是來聽聽大家對開會的意見，大家先講。」羅瑞卿說：「這幾天我搞國防工業

的年度計劃了，對會議沒有來得及管，向大家做自我批評。從今天起，就同大家專門開會了。」

譚政說：「全軍政治工作，以大單位來說，少數比較好，多數不夠好，總的來說，都落後於形勢的需要。對這種情況，總政治部，特別是我本人是負有領導責任的。這是一次專門討論政治工作的會議，我決心同大家一起，開好這次會議。」

在譚政講完話之後，賴傳珠突然冒出來幾句話。他說：「林總向來關心政治工作。不僅現在，過去也是這樣的，我們在座的很多都是見證人。近年來，林總對政治工作又有很多新的指示，我們祇是從『小道』聽到一些消息。對林總的指示，不僅不貫徹，根本沒有人傳達，這不知道是什麼問題？這次會議要是上面沒有人管，我們就會本著『五不怕』的精神來開會。我相信，會議是可以開好的！」

賴傳珠的話起到了極好的作用，大家都同意他的意見。林總看到大家的情緒已經轉過來了，於是，他也很高興地講話了。

林總說：「昨天，我將這次會議的目的和當前政治工作存在的問題，向毛主席匯報了，我現在就是來傳達毛主席對這次會議的指示。」

林總傳達毛主席指示的大意如下：毛主席說，軍隊政治工作落後了，主要是沒有人管，以前我是沒有管。有的人自己搞不到飯吃（沒有能力之意），又不服別人管，怎麼能做好工作？

毛主席說，軍隊沒有政治工作不行，會迷失方向，但政治工作不同實際相結合，就會成為沒有用的東西了。政治統帥業務，政治要與實際相結合是完全正確的。……政治工作要發揚我軍光榮傳統的提法是完全正確的，不僅政治工作如此，其他工作也是一樣的。我們自己創造的好的東西，為什麼不去發揚呢？看不起自己的東西，必然喜歡別人的東西。結果是搞得「四不像」，官兵團結、軍民團結、軍政團結等都成了問題。當然，過去的東西要很好總結、提高，否則就不能前進。我們確有很多好東西，如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擁政愛民、官兵一致、三八作風、三大民主等都是不能丟的。彭德懷提出不走樣的學習蘇軍是辦不到的。

林總說：「毛主席對軍隊是很有感情的。要我們一定要把軍隊搞好，否則無產階級專政就是一句空話了。」大家對林總的講話，報以最熱烈的掌聲！

林總傳達了毛主席的指示後，第二天的小組會就大為不同了。各小組意見都很激烈，放開了「機關鎗」，會議氣氛一下子就轉過來了。在幾天的小組會上，出席會議的人搞清了一個過去多數人不知道的問題就是譚政不執行林總的指示，這在當時的情況下，就成了一個頭等重大的問題。大家對譚政不執行林總的指示，既憤恨又感到「謎底」還沒有揭開，劉亞樓氣憤地說：「不執行林總指示的謎底一定要揭開，要順藤摸瓜！」頓時，會議的氣氛變緊張了。此時，林總又說話了：「大家有話要說完，但要注意方式、方法。」林總的話對劉亞樓等人的意見有意抑制了一下。

第四天，軍委辦公會議舉行擴大會議，林總在會議上說：「這幾天的會議開得很好，大家對政治工作軟弱無力的批判是正確的。對這個問題的批評已經很夠了，就不要再批評了。要著重『搞建設』了，這次會議，應當搞出一個比較好的文件來，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大家完全懂得林總的講話精神。

爲了起草一個比較好的文件，軍委辦公會議指定梁必業、吳法憲、賴傳珠、劉興元、李耀文（濟南軍區政治部主任）、張秀川（總政組織部部長）等五人爲起草小組，還有姜思毅、唐平鑄這些筆桿子。這些人都是部隊優秀的政治工作者，賴傳珠是主持人，梁必業、吳法憲分成兩攤，比著干。會議最後產生了一個《關於加強軍隊政治思想工作的決議》，這個決議，經過軍委辦公會議多次修改並一致通過，又經軍委常委討論並一致通過後，提交大會討論，在熱烈的掌聲中《關於加強軍隊政治思想工作的決議》一致通過，並上報中央。這個文件是很成功的，得到了毛主席的讚賞和中央的肯定，中央十二月中旬批准了這個《決議》。這是八大以後，全軍第一次明確提出全軍要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其實也是要全黨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決議》發表之後，對部隊影響很大，對全國影響也很大，因爲中央在批示中指出《決議》的精神，對地方黨政工作也是適用的。《解放軍報》則做了大力宣傳，稱《決議》爲第二次古田會議決議。

軍委擴大會議之後，部隊的政治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對全軍的革命化建設起到了決定的作用，全軍掀起了創造「四好連隊」，爭當「五好戰士」，嚴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和學習毛主席著作的高潮，出現

了雷鋒和一批雷鋒式的優秀指戰員，特別是掀起了學習毛主席著作高潮的影響就更大了。

全軍編制裝備會議

一九六二年二月開始，軍委又先後在廣州和北京召開了全軍編制裝備會議。林彪、賀龍、聶榮臻、羅榮桓、徐向前、葉劍英等元帥出席了會議，羅瑞卿、楊成武、張愛萍、梁必業、邱會作等人組成了會議領導小組。各總部、各大軍區、各軍兵種司令員、參謀長參加了會議。爲使我軍的編制裝備更加切合實戰需要，還請了實戰經驗較多的連、營、團、師、軍五級幹部各十人參加了會議。這次會議實際上是在以前「不走樣的學習蘇軍」向適合中國國情軍隊編制進行的一次重大改革。

當時，我軍在編制方面的確存在很大問題，我軍歷來機關精幹，幹部要加強到基層和部隊，但在「不走樣的學習蘇軍」時期，機關變得業務部門增多，辦事手續繁雜，辦事部門也互相推諉，在編制上是「橫寬縱短」。就總部機關來說，我軍歷來是「司、政、後」或「司、政、供、衛」，學習蘇軍後，總部增至總參謀部、訓練總監部、武裝力量監察部、總政治部、總幹部部、總後方勤務部、總軍械部、總財務部八大部，每個部門下面平行的業務局、處很多，這就叫「橫寬」。可是下面的部隊機關，又簡單得祇有光桿司令，如野戰軍祇有一名管後勤的副軍長，後勤祇有幾個人，幾乎無機關；再比如野戰軍設炮兵主任一職，但又指揮不了部隊，這就叫「縱短」。在機關裏互相扯皮，互相推諉的事天天有，一個部門起草的文件，都要會簽一串部門，公文「旅行」一圈才能發出執行。這樣的機關，平時是事務主義，戰時更要吃大虧。

從後勤編制來說，遭到部隊最大反對的是以營爲單位吃飯，這是從蘇軍那裏學來的。蘇聯人的飲食習慣，是冷飯冷菜，最多煮一大鍋熱湯，不要說以營爲單位吃飯，再多一些人也可以。我們中國人吃飯，吃好吃壞且不說，主食要有米飯、饅頭、麵條之類，副食要有炒菜、燉菜、湯菜，因此一個伙食單位不能就餐人過多，否則爐灶、餐具、食堂都有問題。基層單位堅決反對以營爲單位吃飯，有些部隊就「偷偷」恢復以連爲單位吃飯，上級單位則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這裏還要提及的是，當時我軍請來了很多蘇聯軍事顧問，從總部到野戰軍部有，從後勤系統來說，除了沒有管廁所的蘇聯顧問，各個部門都有，他們有職有權，說話算數，派來的專家，大部分不錯，但也有不少濫竽充數。我們的一個留蘇技術人員，在蘇聯留學時和一個派來的專家是同學，我們的技術人員是優秀生，這個專家是吊兒郎當的學生，可派到中國來就是專家，一天瞎指揮。全軍上下對專家治軍意見很大。

全軍編制會議，就是要大刀闊斧改過來，恢復我軍原來的傳統編制，當然不合理的，也會改進。會議開會的時候，林彪以漫談的方式提出了這次會議的方針任務，林彪說：會議還是要先務虛，然後逐項落實。林總首先提出三個問題：

第一，總結經驗。各國軍隊都有自己的傳統、作戰經驗和生活習慣，因此，其編制也是不同的。蘇軍和美國的編制就不一樣。蘇軍是團、師、軍、集團軍和方面軍；美國是團、師和不固定的軍（等於集團軍）、戰區司令部（等於方面軍），這就很不相同，至於軍隊的生活就更不同了。蘇軍以營為單位組織伙食單位，我們在一個時期也是以營為單位吃飯，但不少幹部、戰士意見很大，他們說：這麼多人吃飯，飯都吃不飽。我們學習蘇軍先進經驗學的是精神，怎樣吃飯就不必學了，怎樣組織伙食單位，應當按自己的習慣來搞嘛。

第二，機械化還是騾馬化？現在流行的說法是機械化，騾馬化被取消了，軍隊的馬場和獸醫大學都交地方了。現在大家羨慕的都是坐汽車，不是羨慕騎馬了，這個問題值得研究。我國百分之七十是山地，祇有東北、華北東部、西北中部、新疆北部、河南中部和皖北是平地，這些平地也祇是在一定的季節可以發揮機械化作用。我國的公路還有很長的時間才能達到發達的水平，即使很發達了，對機械化部隊的運動也有一定的限制。根據我國地形的實際情況，我軍的編制裝備應該考慮機械化和騾馬化並重。黃河以北的部隊（包括中原）以機械化為主，其餘則以騾馬化為主。這種裝備編制當然會帶來某些麻煩，但這種麻煩比部隊不能作戰的麻煩要容易克服。

第三，軍隊合成問題。軍隊歷來是合成的，現在我們討論的是要有高級水平的合成軍隊，這種高水平的合成有三個基本環節：戰術是火力合成，戰役是兵種合成，戰爭是前後方合成。單步兵不是現代化戰爭，我們對後勤在戰爭中的作用和地位問題，從思想上、建設上、編制上都還沒有解決，抗美援朝時期出現的一個星期攻勢，就是沒有解決前後合成問題，因此，這次裝備編制會議要充分考慮到後勤建設問題。我軍的定額在平時要控制在三百萬人以內，我們的編制裝備要特別注意到這個問題。

出席會議的各位元帥都認為林總講得很好，多年來懸而未決的問題，這次都可以得到解決，這對戰爭準備是一個重要突破。

我軍編制裝備的確是存在很多的問題，要解決這一問題，首先要確定我軍編制裝備的原則，再做過細的工作來逐項落實。爲了走群眾路線，會議開始之時，由林總，羅總長親自主持，專門討論研究。參加會議的除各級首長之外，還有吸收少數連、營幹部臨時參加。會議開得輕鬆愉快，發言十分熱烈，其中也有爭論的問題，基層幹部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意見。在討論的過程中，林、羅都特別注意聽取大家的意見，凡是好的意見他們都表示贊同，不大合適的意見也不立即頂回去，反而叫大家展開了熱烈的討論，這實質上是元帥同普通幹部在一起的共商軍中大事，這樣生動的工作場面，是很感動人的。

經過充分討論之後，對我軍的編制裝備歸納爲如下四條原則：1、我軍的現行編制，不管是來自那裏的不合理的都要徹底破除；2、要尊重我軍的歷史，在全國解放前我軍雖然沒有正規的編制，但我們總是有編制的。在我軍原有的編制中，甚至吸收國民革命軍好的東西，我們都要保留下來；3、要適合我們國家的國情和民情，比如吃飯就要考慮到這個問題；4、要特別注意到實戰的需要，編制裝備是爲戰鬥服務的。

研究確定我軍編制

研究確定我軍的具體編制裝備問題，林總是從連隊的定編開始的，由下而上逐級進行。他不但「摳」得很細，而且從四十二軍調來一個齊裝滿員的連隊，作爲研究連隊編制的對象，用實兵作業的辦法現場研究定編，這是我軍研究編制別開生面的、空前未有的創造性的辦法，這種方

法是林彪式的。現場會議在廣州軍區的廣場舉行，林總、羅瑞卿和參加會議的全體人員都同連隊指戰員一起，席地而坐，展開了細緻認真的研究。林副主席對連隊問題是很熟悉的，他問了很多問題都能問到點子上。

連隊編制是從班、排、連部的順序討論定編的。林總領著出席會議的全體人員同一個實兵連隊，座談了三次連隊的編制，葉群叫警衛員去提議他休息一下，他對警衛員視而不見，一直認真傾聽大家的意見。大家對這個問題提的意見最多，經反覆座談，在最後一次座談會上對連隊的編制就定下來了。連隊新的編制是：恢復以連為單位組織伙食的傳統，按每十二個人編一個炊事員，除司務長、上士外，每個連隊編一個理發員、一個司號員。大家對這個新編制十分滿意，在元帥們離場的時候，響起了經久不息的鼓掌聲。林總這麼鞠躬盡瘁，令大家十分感動，散會的時候，羅總長親自去扶他起來。據我所知，元帥們和各級幹部、戰士一起討論、決定編制問題，在我軍的歷史上是沒有的。

這次對連隊的編制裝備是解決比較好的。這樣平凡的問題，都是林總親自解決的，並對連隊的工作做了許多精彩的指示，現在想起來都是很有意義的，我還記得起來的大意是：

關於連長的職責問題。我軍的領導制度，是黨委集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連隊是在黨支部集體領導下的分工負責制，這種制度並不妨礙連長是一連之長。連長是連隊的核心人物，一個連隊作風好，訓練有素，戰鬥力強，主要是靠一個好的連長。連長應當是連隊榜樣，有好樣的連長，就出好樣的連隊。選擇好連長，是連隊建設的關鍵問題。

一個連隊還要選擇一個好司務長。司務長的工作很重要，他的工作做好了，就等於把連隊行政事務大部分工作都做好了。司務長是連長的重要助手。國民革命軍葉挺教導團，對司務長的選擇是很嚴格的。司務長從排長調選，當了司務長，才能當連長，這是教導團的制度。我們對司務長的選擇也要有比較嚴格的要求，絕對不要把吊兒浪當，或工作能力很弱的人選去當司務長。培養出一個好司務長，實在是不容易的。

要注意炊事班的建設。戰爭年代炊事班實際上是「戰士之家」，戰士們戰鬥之後，或平時操課訓練之餘到那裏去呢？主要是到炊事班去。搞好炊事班就要調選好戰士當炊事員，要選擇一個好炊事班長。

在解決了連隊編制之後，接著就解決了營的編制。營的編制比較簡單，是召集幾名營長、教導員和團的幹部共同商定的。有一個指導員是解放戰爭的老子弟兵，在散會的路上說：「過去跟著林總打仗，總是打大勝仗，今天我算知道是爲什麼了，用醫生號脈的方法，這麼認真地解決部隊問題，能不打勝仗嗎！」

接下來就是研究軍、師、團三級機關編制。爲了使野戰軍軍、師、團三級機關編制合理，林總決定，軍長、政委，師長、政委，團長、政委和三級參謀長、政治部（處）主任、後勤部（處）長、團機關股長以上的機關幹部參加會議，由會議來討論編制裝備的有關事項和分組作業制定編制裝備草案。

在會議開始時，林總首先講話，他說（大意）：凡辦事都要有重點。我們討論研究野戰軍三級機關的編制，師是重點，軍和團的機關都要力求精幹，師則要充實一點。

林總說：提出師的機關是重點有什麼根據沒有？可以說是有的。這可從兩個方面來考慮。從作戰來說，軍是戰役兵團，師是戰術兵團，團是戰鬥兵團。這就是說，作戰的規模可以分爲：戰役、戰術、戰鬥。這種分法，在國外的戰爭條令上都有規定，我軍將來的戰鬥條令，也會有這種規定的。另一方面，一個師單獨執行任務的機會是很多的，一個師所具有的戰鬥能力可以完成很多任務。反之，一個軍單獨執行任務和一個團單獨執行任務的機會都不是很多。今後我軍作戰，在多數情況下都會是大兵團的行動，越是大兵團作戰，一個師單獨執行任務的機會就越多。因此，師的編制應是重點，師後勤機關更應是重點，其實，平時的工作也應當是師爲重點。

到會的幹部學習研究了林總的講話和總部提出的其他有關問題之後，就分爲軍機關、師機關、團機關三個組分別討論，在作業的過程中，總部業務部門同部隊之間，部隊軍、師、團三級上下之間都做到了互相交流，共同制定編制裝備草案。正是因爲採用了上下結合的工作方法，所擬制的草案是比較地符合實際的，野戰部隊三級機關編制裝備草案在不長的時間內就拿出來了，這樣，編制裝備會議也由廣州搬回北京繼續開了。

我軍後勤的編制

在全軍編制裝備會議上，後勤的編制裝備也一併得到解決。爲了更好的解決好後勤裝備問題，我召集後勤組的全體到會人員開了一個座談會，在會上我提出三條意見：1、按照實戰需要出發，平時的編制裝備要能適應戰時的要求；2、平戰結合，過去那種平時祇有「廟」，戰時才有「神」的編制裝備不能再重演；3、機關在後勤方面思想統一起來。最後我說，林總還要同大家開會，後勤的編制最終由林總拍板。

第一，連隊編制。

連隊是基層戰鬥單位，後勤保障的主要任務是吃飯、救護和彈藥器材補充。爲了完全上述任務，連隊定編爲：司務長、衛生員、炊事員十三人。在炊事員中，有一個爲連長、指導員搬運行李的運輸員兼理發員。

對連隊編制爭論最多的是多少人編一個炊事員的問題。對這個問題存在著三種意見。一種意見仍然提出以營爲單位辦伙食，至少是平時應當這樣辦伙食，持這種意見的人，是堅持向蘇軍學習的重要人物；第二種意見是連隊炊事員人數要少，一個連隊多編一個炊事員，在一個團之內就幾乎佔去了一個排的人數，持這種意見的人，是主管全軍編制的主要人物；第三種意見是炊事員要夠用，並且還要略爲寬一點，因爲炊事班的用途很多，持這種意見的人比較多，林總支持這種意見。

在座談連隊編制時，林總就提出了「每個連隊都要注意炊事班的建設」。我已經體會到林總是很注意炊事員的數量問題了，對這個問題，我始終不說話，因爲我要是提出了具體意見，容易影響林總對問題的考慮和決策。當時，主管編制的張愛萍副總長，並不理解林總的講話精神，不止一次提出了與林相反的意見，林總對這種意見都未曾過早表示自己的態度。到拍板連隊編制時，還有人提出連隊應當三十人編一個炊事員，林總當即回答說：「連隊編制就算是最後定下來了，按一個班配一個炊事員是合適的，你們不要再提意見了。」多少人編一個炊事員是很具體的事情，林總這麼上心，要是提高一點說，這反映出建軍思想和群眾觀念的問題。

林總關心基層還有一個小故事。一九六一年一月，林總在廣東惠陽的四十二軍視察時，專門談到了要減輕司務長的工作，他當場用鉛筆還

爲司務長制定了工作報表，哪些是以領代報，搞得清清楚楚，以後全軍連隊司務長就統一了報表。

第二，營部編制。

在後勤系統，營不是一級保障機構。營部單位很小，祇有十個人，我記得祇定編一個管理員，一個炊事員。對營的編制沒有什麼不同意見，很快就定下來了。

第三，團後勤處編制。

團是一級後勤，是保障機構，對全團負責保障任務，爲完成任務，在編制上應當「肝膽俱全」。團後勤機關，除增設了一名戰勤參謀之外，沒有新的增減。團後勤處最大的變動是勤務分隊：

(1) 增編供應庫。這個庫包括軍需品、彈藥等的保管和分發，並還編有勤務班，擔任裝卸作業和警衛任務。

(2) 增編修理所。其主要任務是修理槍械、營具、炊具等，這是團的「加工廠」，對後勤業務是很重要的。

(3) 衛生隊保持原樣，但逐年分期分批配了救護車。

第四，師後勤部編制。

在野戰軍裏師後勤部是重要的機構，它常常接受軍區或基地分部的直接供應，同時，組織全師的運輸、物資供應、傷病員收容轉送、及裝備維修等全部的后勤保障任務，因此，師後勤部必須有合理的組織機構才能完成任務。

師後勤部機關，除增編戰勤科之外，人員增減不多，師後勤部編有：戰勤、財務、軍需、軍械、衛生、營房等各科。

師後勤的勤務分隊：

(1) 師衛生營改爲師屬醫院。這個醫院編有：門診、內科、外科三個科和防疫所，平時可以完成治療任務，戰時可以完成收容後送傷病員的任務。同時，這種編制可以容納技術比較高的醫務人員，軍隊幾個醫科大學的畢業生分到部隊，不但可以充實基層，也能學有所用。

(2) 增編汽車運輸連、畜力運輸連、修理連各一個。修理連的主要任務是擔任槍械、汽車的修理，除了能修槍械之外，車輛要能達到中修的水平。在師建立裝備比較好、技術水平比較高的修理機構，無論平時、戰時都有重要作用。

(3) 增編軍需、軍械、油料三個供應庫。三個庫的編制大小不一，但都是幹部、專業人員和勤務部隊一併俱全。師屬倉庫平時擔任供應任務，戰時即可改稱為兵站，擔任兵站的任務。

第五，軍後勤部編制。

軍後勤部除了擔任軍直屬隊直接的後勤保障之外，對全軍後勤保障以檢查督促為主，在一般情況下，不擔任全軍的運輸、物資供應、傷病員收治轉送、裝備維修等任務。軍後勤部除增設了戰勤處之外，其餘各業務處沒有變動。軍後勤部的機關、分隊都比師後勤部小得多。

整個野戰部隊後勤編制的最大特點是保障戰鬥能力的程度提高了，以自身的戰鬥能力來實現保障任務，新編的野戰部隊後勤編制是能比較充分表現出這一特點的。

部隊後勤裝備

後勤裝備是比較複雜的，有些可以叫裝備，也可以叫家什。我軍有史以來，對後勤裝備沒有比較全面系統的解決過，這個問題在全軍編制裝備會議上是解決得比較好的。

在會議過程中舉辦了三個展覽。一個是按一個連隊編制的全部裝備實兵展覽，二是我軍現有兵器的展覽，三是後勤裝備展覽。從元帥到參加會議的全體人員都反覆進行參觀，大家邊看邊議，邊議邊定，會議開得生動活潑。

林總對後勤裝備是十分關心的。在編制裝備會議期間，我們在後勤學院辦了一個後勤裝備展覽，從戰士吃飯的碗筷，到廚房的炊具都是林總親自定的，大家以敬佩的心情，把林總譽為「元帥、後勤部長、司務長一身三任的元帥」。

這裏把林總親赴後勤展覽拍板定案的後勤裝備簡介如下。

第一，戰士用品。包括日用品和衣服、鞋襪、被子等用品。

(1) 飯碗，過去沒有統一規定，有用缸子的，也有用碗的，現在統一規定用搪磁缸子。搪磁缸子有兩種主要用途：吃飯喝水和嗽口等。(2) 鞋襪，鞋子要有矮腰和高腰兩種。行軍和打仗都要穿高腰鞋子，以防砂子進到鞋裏去。鞋帶子特別重要，要盡量做到耐用，每個人都要有一副預備的鞋帶子，在戰鬥的時候，如果鞋帶子斷了，會妨礙完成戰鬥任務。

襪子要做到耐用和行軍時不會「開小差」。(3) 衣服，棉衣一律採用緊身棉衣加罩衣的方法。棉衣可稍微薄一點，配加絨衣。單衣用現在的樣式就可以了，布料要盡量改進，提高質量，做到能穿著比較長的時間。南方部隊也可以發少量放哨用的大衣。(4) 雨衣，一律改方塊式雨布爲雨衣。(5) 被子，可以分北方，南方兩種，但被子不宜太厚，有大衣再加上棉衣，晚上睡覺是不會冷的。(6) 背包，這是我軍不大習慣用的，可以做出兩三種樣品，在部隊試用後再定案。

第二，炊事用品。炊事用品要配套齊全，要做到用自己配帶的炊具就能獨立作業，做好飯。行軍鍋每個連隊兩口，爲減輕重量，改鐵鍋爲合金材料製作。水桶每個連隊配四隻，桶的重量也要盡量減輕。大小菜盆子，每個連隊二十個，這種盆子改用合金材料，以防生鏽和打破。總之，對炊事用品，要做到在任何情況下都能做飯，連隊吃飯是一件大事，也是一門大學問。

第三，連隊公用品。每個連隊配馬燈三盞，主要用於連部、炊事班和送信之用，馬燈要經得起風吹雨打。每個連隊配兩支手電筒。每個連隊配一副擔架床，由炊事班管理。每個連隊的炊事班配一副理發工具。

第四，工程車。團以上後勤機關配備工程車，在我軍裝備日益現代化的情況下，工程車是必要的裝備，使之能解決修理中的問題。

林副主席在看完後勤裝備展覽之後說（大意）：這個展覽辦的很好，把東西擺出來，大家容易看得懂。後勤裝備是個很複雜的問題，也是很重要的問題。我軍的戰鬥力，除了軍事，政治素質之外，就是物質力量了。最主要的物質力量是武器，但保障兩種「口糧」，人吃飯，槍吃子彈是決定性的問題。

林總在主持軍委日常工作期間，是經常下部隊的，而且常常下到最基層，調查研究，組織連長、指導員開座談會，取得第一手的材料，指導全軍工作。現在不少部隊的老同志都公認，從林總一九五九年上臺領導軍委日常工作，到一九六六年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這段時間是我軍的鼎盛時期。祇要我們看一看林總的工作作風，他嘔心瀝血地撲在部隊的工作上，就很容易找到答案。

林彪關於當前部隊工作的講話

回到北京後的四月二十八日，在編制裝備會議上，林彪發表了講話，地點在北京三座門一樓會議廳。當時在京的元帥，各總部，各大軍區，各軍，兵種，各大軍事院校的領導同志都到會了，甚至一些休息的老同志，如周士第、陳奇涵、周純全、傅鍾等也都到會了，這樣陣容的會議是我參加軍委辦公會議工作以來僅見的一次。林彪的講話，對編制裝備會議本身祇講了幾句話，其餘的時間除了津津有味地又講四個第一、三八作風、四好連隊、五好戰士外，還講了我軍的歷史，其內容是很廣泛的，遠遠超出了會議的範圍。現在我回憶起來，主要是講了三個問題：

第一，政治工作問題。林總說：「前年開了會，提出了四個關係：人和武器的關係；政治工作和其他各種工作的關係；政治工作中思想工作和其他工作的關係；思想工作中活思想與書本思想的關係。在這四個關係中，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這是軍委已經明確規定了的，現在是不是都這樣辦的？到底把政治工作擺在什麼地位？各軍區，各軍，兵種不一樣，認識不完全一樣，勁頭不一樣，用多少力量去做不一樣，什麼人去做不一樣。因此，工作的擺法就不同了，有的把四個第一，不是當作第一，而是變為四個第二，沒有把政治工作突出來，沒有把政治工作擺在首要地位，沒有認真抓活思想，工作做得不少，就是沒有抓政治思想工作。軍事訓練、保管武器，都要做政治思想工作，提高覺悟，才能做好。我們說，軍事訓練時間可以多一點，政治工作時間少一些。但另一方面政治工作是基礎，要抓得更緊一些，在做好政治工作的基礎上，軍事訓練、武器保管、部隊紀律等等才能搞好。有的人很重視軍事訓練，卻忽視政治工作，用什麼力量，用什麼人去搞，安排得不適當，沒有把政治工作放在首要地位。凡是這樣搞的，任何工作也做不好，一定要出亂子，一定要出政治事故。軍事訓練佔的時間多，政治工作是首要地位，這兩件事情不能混為一件事情，一定要把政治工作，黨的領導擺在首要地位。這個思想在很多地方沒有貫徹，沒有接受我軍幾十年來的建軍經驗，沒有很好地體會。不是很多人，有那麼一些人，沒有把政治工作擺在適當地位，他們總是不曉得做

好人的思想工作的重慶性。人的一切行動，都是要通過思想的，不正確地去認識客觀情況，不做好思想工作，思想搞不好，一切都搞不好。」

第二，落實問題。林總說：「去年和前年，各方面的工作都作了些原則的規定。政治工作搞了政治工作條例，管理教育工作條例，軍事訓練也搞出了原則方針，四好連隊，五好戰士，三八作風，這些都搞出了章程。沒有章程不好辦事。這些章程集中了全軍的好經驗，搞出來有很大好處，使大家有所遵循，免得亂摸一氣。這些章程可能有不夠的地方，也可能有些不恰當，可以在以後慢慢地修改。」「現在的問題，不是提出什麼重大問題，不是重新規定什麼章程，而是落實的問題。三八作風，四好連隊，四個第一，管理教育工作條件等等這一套，到底落實了沒有？能不能放心？很難說。必須大抓落實工作，要去檢查，哪些做了？哪些沒有做？以為下面都做了，事實上不是，還差得滿遠。」「今年要成為落實年。去年、前年是開花，今年是結果落實，不僅今年，明年，後年這幾年要一直落實下去。因為落實中也會出現不落實，天天有新情況，人的調動可能引起變化，人搞久了也可能要鬆下來。因此，要反覆落實，經常落實。要使幹部養成習慣。不然，一旦有事，戰鬥力不強，過不得硬，開不動，打不準。不要認為這個問題沒有問題了，其實還大得很。管理教育工作條例有的地方祇搞半個禮拜就過去了，有很多地方對軍委的一些規定唸唸就算了。因此，確定一件工作，要哪個機關做，什麼時間做，什麼人做，怎麼做，這些東西，要切切實實地去安排，要經常地注意檢查。不然，過一個時期，人一調，工作就鬆下來了，這些工作就沒有辦法進行了。」「下部隊就是要抓這些問題，三八作風，四個第一，四好連隊，管理教育工作條例，調查研究等等，抓好了就差不多了。要經常按照這個綱領去安排工作，去督促，檢查工作，使這些東西落實。這些東西是從實際中來的，又回到實際中去改變現實。」

第三，工作作風問題。林總說：「工作作風有兩種：一種是鬆鬆垮垮，一種是雷厲風行。一種是抓得很緊，一種是抓得很鬆。各個部隊的情況不同，各軍、兵種的情況也不同，我們要提倡緊張作風。三八作風實際上是七個原則，我知道這個東西的原委，實際上當時是爲了要緊張。這七條原則哪裏都需要，但軍隊的特點就是要緊張。軍隊與地方不同，時間性有很大關係，放過機會就要誤事，戰鬥中關係很大，平時關係也很

大。好事、壞事不抓住，過久了就沒用了。問題不抓住解決，就容易出大事。如平反問題，本來是前年冬天決定的，有些部隊就是不執行，人家有冤氣，不滿意，不給人家平反，結果有的就投敵、自殺、殺人。我們有冤氣，不滿意，不給人家平反，結果有的就投敵、自殺、殺人。我們有軍隊留尾巴，不痛快。鬥爭的時候很粗糙，又不及時平反。這是沒有發覺矛盾，如果發生了戰爭，有些人是會打黑槍的。梁必業同志給我一個材料，去年到今年第一季度情節較為嚴重的六十八起案件中，祇有兩起是敵我矛盾，很多是逼出來的，鬥的時候亂鬥，對落後的採取粗暴簡單，不耐心說服教育，管理教育工作條例規定了就是不執行。三十條是全軍的經驗，放著大路不走走小路，如同治病，已找到了好藥單子不吃，又去亂找藥單子。亂抓二、三十個藥單子，抓不住一個好單子。有些單位祇搞了半個禮拜，有的部隊下面三十條是個好單子，是好藥。發生了問題，該處理的不處理，或者處理要搞，上面還不准搞，拖著。沒有想一想這個情況怎麼運用一般原則去解決。對上邊來的東西拖著不向下交代，對下邊來的東西拖著不處理。這種拖拉作風，列寧很反對，他用了許多嚴厲的字句，甚至用國家法令，反對這個東西。不是很緊張地做工作，而是鬆鬆垮垮，拖拖拉拉，是『懶婆娘管家』，管得稀稀拉拉，亂七八糟。有些單位是這樣，不是所有單位都這樣，大部分單位是好的。我們要提倡緊張，就是要快，上面來的東西要趕快向下交代，下面來的東西要趕快處理，不要讓上面、下面來的事情成堆地堆在那裏。」

一九六一年夏天，林彪在長春休息，他找十六軍的幾個連長，指導員開調查會，研究連隊的工作。連隊在談到了天天讀的情況時說：「我們搞天天讀，開始是讀報，但報紙上的內容不能滿足需要，於是就到毛主席著作裏面去找，作些摘錄進行學習，毛主席著作比課本好多了。」林彪認為，十六軍的連隊以毛主席著作作為政治課本，這種做法是非常正確的，應當肯定下來。後來《解放軍報》宣傳了十六軍的作法，天天讀《毛主席語錄》，以毛主席著作為政治課本就在全軍逐漸推廣開來。《解放軍報》的同志認真編寫了《毛主席語錄》，對部隊學習毛澤東思想，搞好部隊革命化起到了很大很好的作用，部隊基層幹部，甚至高級幹部，文化水平都不夠高，用學習語錄的方法掌握毛澤東思想是一種好的方法。

「領袖的威望，是軍隊最大的戰鬥力」，這是林總十分重視的問題。

一九四〇年代初，林總在蘇聯治病，他目睹耳聞了蘇聯人民對斯大林的崇敬、忠誠和犧牲精神。林總對蘇聯人民和紅軍戰士，對斯大林忠誠的印象是十分深刻的。林總提出的「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做毛主席的好戰士」就是一九六三年對部隊調查構思而成的。林總認為，「我軍廣大指戰員能夠真正成為毛主席的好戰士，就是最高的政治覺悟，最大的力量」。

林總上臺以後，對軍隊各方面的工作抓的是很緊的，他自己又身體力行，把軍隊尤其是高級幹部的革命幹勁都調動起來了。這就像部隊出早操一樣，林總一出早操，那些平時不出操的幹部都爬起來出操了。在林總的親自領導下，軍隊各方面決議、條例、規定都出臺了，工作有依據，有標準。我能記得起來的大致有：《關於加強軍隊政治思想的決議》，《連隊管理教育工作條例》，《合成軍隊戰鬥條例概則》，《步兵戰鬥條例》等等。部隊的面貌為之一新，在毛澤東思想的旗幟下，在革命化、現代化、正規化的道路上邁出了很大的步子。

林總提出突出政治、四個第一、三八作風，這對我軍的建設的確是個創造。但是，在那麼一個革命的時代，左的東西很容易發生，現在看來左的程度不小，尤其是總政治部，把「經」越唱越左，越唱越歪，把突出政治幾乎變成空頭政治，遠離了林總的本意。現在把空頭政治的帽子扣到林總頭上，好像林總祇講政治，羅瑞卿是主張搞軍事訓練，大比武是為了更好的軍事訓練，這完全搞錯了，是不對的。林總是打仗出身，真正是身經百戰，他二十一歲的時候就當了師長，二十四歲當了軍長，後來長期擔任一軍團軍團長，軍事訓練的重要性，他應該比誰都清楚。林總歷來是重視部隊的軍事訓練的，林總多次講過（大意）：我強調政治掛帥，這是不能動搖的，但是，不要以為講政治掛帥就不要軍事，那也是不對的。部隊建設要全面考慮，缺了一樣都不行的。現在我們應該這樣想，軍事和政治比較哪個重要？沒有話說，政治第一。可是講時間安排，那個應該多佔一點，那個應該少佔一點？政治應該少佔一點，學文化也應少佔一點，軍事應該佔多些。我看時間比例，軍事應該佔60%、70%以至80%。但政治還是主要的，這是我們的基礎，什麼工作都要政治掛帥。

一九六〇年以後，全軍部隊單一的訓練任務變成訓練、施工、生產三項任務。在繁重任務面前，部隊堅持一定的軍事和政治訓練時間，叫做天天練、天天讀。天天練就是練軍事上的四大技術；天天讀開始就是讀報，後來就把《毛澤東選集》裏的警句摘了一些，成了天天讀的內容。爲了保證部隊的戰鬥力，部隊專門有全訓部隊。就是在文革當中，三支兩軍任務那麼繁重，軍委還要求部隊抓緊機會訓練，即在工作間隙，練上三五槍瞄準，練上三五次投彈。在文革中，部隊的軍政素質不但沒有降低，反而有所提高。

第十六章 準備打仗與後勤建設

後勤戰略方針與後方基地建設

一九四九年開國到一九五九年，人民解放軍總後勤部已有十年的歷史了。在這期間，在中央、中央軍委和總後各級黨委領導下，我軍後勤戰線廣大指戰員，在保障部隊完成肅清國民黨殘餘勢力，抗美援朝作戰的同時，開始了部隊革命化、正規化，現代化建設的保障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績。

一、對部隊的供應，由各地區自己籌措、分散補給，改為由全軍集中統一補給供應；

二、制定和頒發了全軍性的供應標準和規章制度；

三、由對步兵單一兵種的後勤保障，轉變到對陸、海、空三軍的後勤保障體系；

四、開辦了一批後勤專業院校，加強了後勤幹部的培養訓練，組建了一批後勤保障部隊，一支龐大的後勤專業隊伍正在形成。

五、對抗美援朝戰爭中後勤工作的經驗進行了總結，全軍上下對現代戰爭後勤工作的重要性有了新的認識。

這些都是繼續推進後勤工作繼續前進的基礎。楊立三、張令彬、黃克誠、洪學智等同志為我軍的後勤工作都做出了很大貢獻。我是一九五四年十月調到總後任副部長兼副政委，也加入到我軍後勤建設的行列。

但是，從全軍建設的整體說，全軍後勤工作仍然是落後的。尤其是從現代戰爭對後勤的要求來說，我們還相距甚遠。當時，中央軍委提出了「準備打仗」是全軍的中心任務，我們必須緊緊跟上。認真研究後勤的

實際情況，制定自己的工作方針和任務，是後勤領導工作必須掌握的基
本原則。

一九六〇年初，在廣州召開軍委擴大會議前夕，我知道這是一次討
論戰略方針、準備打仗的全軍最高級的會議，林總要作綱領性的論述。
大會也指定要我發言，我認爲應該利用這次會議，宣傳後勤建設的重要
性，把後勤建設的方針、任務、內容認真地向全軍高級幹部講一番，取
得全軍高級幹部對後勤建設的支持。我把我的想法向總後常委一些同志
講了，我說：「不把後勤建設的方針、政策、任務講清楚，後勤工作就跳
不出事務主義圈子，整天忙忙碌碌，一件大事也辦不成，總後勤部就起
不到統帥部組成部分的作用。」大部分常委同意我的意見，但也有另一種
意見，他們認爲還是按照老辦法辦事吧，能做好「有米之炊」就很好了，
後勤還有什麼戰略方針？不要打腫臉充胖子，這樣的爭論有時還相當激
烈。經過反覆學習軍委指示，個別交談，第一種意見總算是佔了上風。
在此基礎上，起草了我在軍委擴大會上的發言稿，題目是《後勤建設要提
高到與戰略方針相適應的水平》。

我的發言大意是：我軍後勤建設的方針應該是加強黨委領導，依靠
全軍齊動手，發揚全軍後勤人員的革命幹勁，迅速地把後勤建設提高到
與戰略方針相適應的水平。根據上述方針，今後後勤建設的重點應該是：
規劃與實施後方基地和兵站運輸網的建設，加強後勤科學技術研究，加
強後勤部隊的建設，積極培養和建設後勤幹部隊伍，以及進行必要的戰
備物資儲備。

現代戰爭的特點對後勤產生的影響最主要是鞏固交通運輸線和準備
大量的物資等問題。從朝鮮戰爭的經驗來看，敵人無論在戰爭開始，或
在每個戰役開始的時候，都集中力量對我們的運輸線，特別是對交通樞
紐進行瘋狂轟炸，使我們的交通運輸陷於癱瘓。在今後的戰爭中，敵人
破壞我們後方交通運輸線的嚴重性會更大。因此，我們應該在各戰略方
向上建立後方基地。基地建好之後，即使交通運輸遭到嚴重破壞，基地
之間、戰略後方與戰役後方之間一時中斷聯繫，也仍然能獨立支持戰爭。

在戰略後方基地的地域內必須包括軍需工廠、倉庫、修理工廠、
醫院、勤務部隊等後勤保障機構。在戰略基地之間、戰略與戰役基地之

間以及戰役與戰役基地之間，都要形成交通與通訊網，這樣，一旦有戰事，就可以對前方實施不間斷的補給。

建設現代化的後勤，需要一支又紅又專的幹部隊伍。當前培養幹部的重點是指揮幹部、專業幹部和技術幹部，我們培養幹部必須採取兩條腿走路的方針。這就是院校培養與部隊輪訓並舉。

在未來戰爭中，我軍作戰物資的消耗和損失必然比過去大大增加。這是由於戰爭的規模大、技術裝備增加、火力加強造成的。所以，加強戰備必須有計劃地進行物資儲備，當然，有些物資應該由國家統籌儲備，有些東西就應該由軍隊自己儲備了。要有計劃，有步驟地組建一批後勤部隊，主要是運輸部隊，建築工程部隊，道路勤務部隊，特種救護部隊和修理部隊。這些部隊必須具有一定的技術水平和現代化裝備，平時打下基礎，戰時擴編，立即能擔負起繁重的緊迫的供應、技術、救護任務。

爲了落實我軍後勤的建設方針，就要正確處理幾個關係，搞好幾個「結合」。

第一，依靠國家和軍隊自己動手相結合。國家經濟力量是國防力量的基礎，增強一分國家經濟力量就等於增強一分國防力量。但我們絕不能單純做伸手派，一定要鼓足幹勁，充分挖掘潛力，辦好軍隊能夠辦而且應當辦好的事情。

第二，軍隊需要和人民利益相結合。黨中央、毛主席、周總理都很關心部隊的建設，但是，我們做軍隊工作的同志，在考慮軍隊需要時，必須考慮到人民的利益，我們管後勤的人一定要自覺，不要打著軍隊的招牌去向地方要這要那。

第三，專業工作和群眾路線相結合。隨著軍隊現代化的進展，後勤工作形成了許多專業問題。我們的工作必須依靠兩條：一條是依靠黨；另一條是依靠群眾，發動全軍辦後勤。從後勤工作來說，依靠群眾是爲了群眾，祇有樹立全心全意爲人民軍隊的思想，不斷地改進服務態度，改進工作方法，後勤工作才有可能符合部隊的需要。

第四，堅守規章制度和解決具體問題相結合。後勤的規章制度可以解決後勤保障中大量問題，但是不能解決所有問題。強調「特殊」是不對

的，忽視特殊，祇強調「一般」也是不對的，兩者都是從實際出發的原則。

第五，平時和戰時相結合。平時工作一定要爲戰時著想，切不可麻痺大意；但也不是說戰爭馬上就打起來，把什麼都搞得很齊全，擺大攤子，佔用國家的大量資金而無效果。怎樣才能「結合」得好，我們要根據形勢的變化，不斷加以研究和調整。

我發言之後，會議執行主席劉伯承元帥講了幾句鼓舞我的話。劉帥說：「好！話講得好，從理論到實踐都提出了重要的問題。」賀老總在主席臺上直接就說：「講得好！總後提出的問題，應特別重視。」

在廣州軍委擴大會議以後，林總找我去談了一次話，他說：「我贊成你的發言。後勤就是要從工作上來提高自己的地位。那種無所作爲，總是埋怨別人、看不起自己的人，是永遠不會被別人看得起的。今天，我祇向你提一個問題：後勤的戰略建設要納入全軍戰備建設的範圍之內，成爲一臺戲。軍委決定楊成武管全軍的作戰和戰備建設，你應當同他密切合作。」根據林總的指示，在具體工作上，我把楊副總長看成這項工作的直接的領導，我以總後勤部長的身份對楊的工作是非常支持的，楊副總長對後勤的戰備建設也是大力支持的；我們之間的互相理解和支持，對加強全軍的戰備建設起了重要作用。

全國的戰略勘察

爲了落實廣州軍委擴大會議確定的戰略方針，從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六年，在楊成武副總長的組織、領導下，總參謀部召開了四次作戰會議和進行了三次大規模的戰略勘察。我參加了所有這些會議和勘察，我還勘察了幾乎所有的後方基地，領導親自幹，這對於基地的正確佈局，正確的定點，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次戰略勘察是從一九六〇年五月開始的。在楊成武率領下，各總部的有關負責人和有關軍區首長參加，首先勘察了山東半島，從石島開始，沿海到成山角、威海、煙臺、蓬萊，再到內長山列島。山東半島的勘察結束後，渡海到遼東半島的旅順口。從旅順口開始，依次是大連、外長山列島，最後到達丹東。從丹東開始，依次到臨江、長白自治縣、天池、延邊、琿春、張鼓峰，最後到延邊結束了中朝邊境地區的勘

察。從延邊開始，依次到佳木斯、哈爾濱、齊齊哈爾、長春、瀋陽，結束了對東北腹地的勘察。

從一九六一年三月開始，總參謀部又組織第二次戰略勘察。這次是對我國華南、東南地區進行勘察。先從湖南省衡陽開始，依次到桂林、柳州、南寧、百色、友誼關，再折回南寧，經玉林到達湛江，渡瓊州海峽到達海口，從海口沿中路（五指山）公路到達榆林港，然後沿海島西岸回到海口，結束了對海南島的勘察。從海口乘飛機到廣州，然後即對港澳地區和粵東地區進行勘察。在粵東地區採取南北穿梭式的勘察，到了汕頭就結束了對廣東境內的勘察。對東南地區縱深勘察的起點是從潮安開始的，然後上杭、長汀、瑞金、贛州、井岡山、吉安、南昌、杭州、上海、蘇州、無錫。這樣，對縱深地區的勘察就結束了。

一九六六年七月，總參組織的第三次戰略勘察，是對西北地區進行勘察。黃永勝也參加了這次勘察，中央和軍委是怎麼考慮他的，我不很清楚，雖然楊成武是領頭人，但他對黃永勝特別尊敬。在新疆勘察時，新疆建設兵團準備了幾輛吉普車，祇有一輛是新產的「北京 212」，其餘都是蘇制的「嘎斯 69」，「北京 212」是給楊成武準備的，但他執意要讓黃永勝坐，楊動情地說：「你是井岡山上的，我是井岡山下的，你應當坐新車。」由此我也對楊成武肅然起敬。

這次勘察是從南疆開始的。我們從北京乘飛機到甘肅的酒泉東北的機場降落後，參觀了導彈發射基地。然後乘飛機到南疆和田，再到的二十一基地，然後到達烏魯木齊。稍事休息幾天後，再到新疆以西等地勘察，對新疆地區的勘察就結束了。

從烏魯木齊回程時，到蘭州地區勘察，是由蘭州飛銀川，經內蒙包頭西邊的石拐子降落參觀了空軍洞庫機場，原定經呼和浩特，二連地區，再到山西的大同地區，河北的張家口地區，直到北京的八達嶺結束。但到石拐子機場後，軍委領導給楊成武打電話：「你們結束勘察，立即回北京。」接到電話後，我們立即就啓程回北京了。

參加了三次戰略勘察，我感到收穫不小。一是對全國許多在軍事上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地方，以及各地之間的關係，有了概略的瞭解，「腦子裏有了一張地圖」；二是對許多地方的地形地貌，在我的腦子裏都有比較深刻的印象；三是對那裏的交通運輸情況也有了初步的瞭解。我通過這

三次勘察，加上自己過去南征北戰到過的許多地方，對後方基地的佈局基本做到了心中有數。

後方基地的勘察和建設

遵照軍委的指示，在全國建成後方基地網，實現後勤保障基地化，保障部隊在作戰時「開得動，打得準，供得上，救得下」，這是後勤工作的中心，也是後勤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點。廣州軍委擴大會議以後，總後黨委把戰備建設列入了後勤工作的重心，我自己則用主要精力來抓這件事。林彪曾以在全國各地「開旅館」來比喻建設後方基地網。

全國戰略勘察，還不能解決後方基地佈局定點的所有問題，為此，我還親自率領有關人員對幾乎所有的後方基地都進行過實地勘察。例如，在東北方向，我勘察過黑龍江的西北部，遼寧省的西部和河北省的承德地區。在華北方向，我勘察過內蒙的集寧地區，河北的張家口地區、保定和石家莊地區，山西的北部地區。在華東方向，我勘察過山東膠東和魯南地區，江蘇的徐州地區，皖南和浙南地區。在中南方向，我勘察過河南的豫西地區，湖北的鄂西地區，湖南的湘西地區。在西北方向，我勘察了陝西省關中地區的東部和西部，陝西省的南部。

由於我是帶著問題去勘察的，所以才在勘察中特別注意佈局、定點和交通三個方面的問題。這就是說，基地建在什麼地方符合戰略方針和作戰計劃的要求，點定在那裏符合「靠山、分散、隱蔽」的原則，隱蔽能不能解決大量物資吞吐的要求。通過實地勘察，使我直接掌握了第一手材料，為進一步研究、確定後方基地的佈局、定點做了極為重要的準備。

對後方基地的勘察是艱苦的。我們搞的建設，上山、進溝是必須遵守的原則。因此，每次勘察都必須爬山涉水，甚至風餐露宿。為了瞭解邊防部隊的情況，我於一九六四年五月間到西藏去了一趟，由四川成都乘汽車沿川藏路進入西藏拉薩，然後由拉薩乘飛機經青海回北京，歷時約一個月。我是約我的老戰友余秋里一同去的，中途他有急事就先回去了。

總後根據軍委確定的戰略方針和作戰計劃以及對戰備勘察所得資料的認真研究分析，確定在全國建成五個戰略後方基地，三十個戰役後方

基地，組成全國後方基地網。這個規劃，經軍委批准後，按照林總的意圖，納入了全軍的戰備規劃。

根據軍委的戰略意圖，戰略後方基地建設由總後勤部負責組織實施；戰役後方基地建設由各軍區、軍兵種負責組織實施。後勤的戰備建設能夠和全軍的戰備建設同步進行，相應地發展，是和楊成武同志的大力支持分不開的。

大規模地、有計劃地建設後方基地到一九六五年就取得了重大的進展。東北、華北、西北、西南和中南五個戰略後方基地已初步達到了規劃提出的目標；三十多個戰役後方基地的也初步完成了。這樣，在全國各戰略、戰役方向上，就形成了互相銜接、互為依托、互相支援的後方基地網，戰役後方基地的工程是浩大的，僅各種倉庫的儲備量就達×百萬噸，其中地下庫就佔三分之一以上。一旦發生戰爭，就可以有效地支援部隊作戰。在過去革命戰爭年代，我們要打仗就要創造戰場，搞好戰場準備，在未來的衛國戰爭中，我們更要搞好戰場準備，而搞好後方基地建設則是戰場準備的重要內容。

這裏我特別不能忘記的是參加施工的廣大指戰員的那種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他們勞動強度之大，工作環境之差，生活條件之苦，不親臨現場是想像不到的。有許多同志由於長年累月的工作積勞成疾，有許多同志在危險工作中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建設後方基地工程量之大，確實令人歎為觀止，在中國歷史上是沒有先例的。當時的世界還是很不安寧的，戰爭一旦打起來，後方基地對保障戰爭的勝利將發揮重大的作用，我們所付出的代價就會小些，原來這些「浪費」就是很大的節約了。所以我們說，建設後方基地是關係國家安危的一件大事，也是我們為子孫後代辦的一件好事！

軍馬生產

我軍有史以來，除團以上領導幹部有騎馬和少數運載馬匹之外，都是步行的「量地軍」，完全是走路的。解放後軍隊裝備是「機械化」還是「騾馬化」，成了爭論的問題。

為了統一認識，一九六〇年林總在廣州軍委擴大會議上講作戰方針時，就提出了我軍的裝備應當以「騾馬化」為主，少數部隊定為「機械

化」。同時還指出：「這不是現在我們裝備不起機械化，而是完全機械化，不適合作戰的需要。我們應當把這個問題，提高到戰略地位來認真研究。」

爲了說明這個問題，林總從我國的地形說起，一直說到第二次世界大戰蘇軍的戰例和我軍一九四九年湖南衡寶戰役的戰例。

林總說，我國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版圖都是山地，百分之三十的平地，逐步實行農業現代化之後，水利設施的發展也會改變地形的。當然，我們國家的公路是會大發展，但不管怎樣發展也不可能每個山頭都通公路。一九四九年進行衡寶戰役時，祇上去了兩個騾馬炮兵師，炮兵部隊不僅一炮未發，還把道路堵塞，部隊前進發生了很大的困難，最後祇有炮兵讓路，把炮翻到溝裏去。這還是騾馬炮兵，要是機械化炮兵，情況會更嚴重。

在全軍編制裝備會議上確定：軍隊運載工具以騾馬運載爲主，機械化爲輔。實行騾馬化，對我軍後勤工作，不僅增加了馬匹的管理工作，而且要擔負軍馬的補充任務，從此，我軍後勤系統，增編了軍馬部門。

根據我軍的編制，全軍運載馬匹和乘馬約需二十五至三十萬匹，每年服役和補充約需三萬匹。所需馬匹，當時沒有著落。從我國農村不可能採購更多的馬匹；從外蒙可以進口了一部分，但數量有限，質量也不好。我軍所需要馬匹，要靠自己飼養，並且要在幾年內解決問題，這也算是一個不大也不小的雄心壯志吧。

林總對軍馬問題是經常過問的。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會上，林總的發言講到路線鬥爭的問題之外，也提到準備打仗和軍隊，還把辦馬場的問題提高到了國防建設的地位，也可看出辦馬場的重要了。

當時的農墾部長王震，對軍隊辦馬場是積極支持的。他親自上林總的門，提出將地方管的內蒙東部呼和浩特一個大馬場和黑龍江的遜克一個大馬場交給軍隊。國務院發了正式文件，遜克馬場很快就辦理了交接手續。呼和馬場辦了三年也沒有辦妥。當時的內蒙區黨委就是不交，我親自找過他們三次也沒有解決問題。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總後成立軍馬部，確定軍馬場以養軍馬爲主，農牧結合、綜合經營的方針，並制定了軍馬生產發展規劃。規劃要求全軍要建立約三十個馬場。我們除了自繁自養以外，經周總理批准，從外



一九六三年在南京靈谷塔。前排左一甘泗淇、左四李貞，二排左一蕭望東，後排左四邱會作。

蒙進口了幾千匹幼母馬，這樣就解決了生產騾子的問題。到一九六八年軍隊馬場存欄數達到十萬多匹，年產駒兩萬一千二百匹，提前完成了軍馬生產發展規劃。軍馬供應有了可靠的保障了。

生產軍馬，是軍隊後勤工作一部創業史。一九六九年一月總後勤部向軍委寫了一個專題報告，報告全軍軍馬生產的發展情況，補充部隊的情況，軍隊生產的馬匹，平時補充部隊自給有餘。周總理在報告上批示：「這是一個很大的成績。」這對軍馬生產是一個很大的鼓勵和促進，軍隊後勤部門，完成了我軍有史以來一個新的任務。

戰備物資儲備

一九六二年，東南沿海戰備會議結束之後，林總在軍委常委會上傳達的毛主席的指示說：根據目前的國際形勢，世界大戰有推遲的可能，局部戰爭則隨時都可能打起來。我們要準備三百萬人打一年仗的物資儲備，這一任務要爭取在三年之內完成。這是有關國家安危的大事，全軍工作的重點要放在打局部戰爭上。

儲備是一件非常大的事，當時我們遇到了三個方面的問題：一是三百萬人打一年的物資需要多少；二是需要多少錢；三是錢和物都從那裏來。此外，還有戰備物資的管理問題。

後來，幾經研究，我們想了個計算方法，先概略地計算三百萬人打一年的「正常消耗量」，然後在此基礎上，加大計算係數，最後再計算出物資的總儲備量。按照這個參考數，儲備物資所需經費要二百五十億元。這樣大的數字，是一九六二年國家對國防費撥款的四倍多，簡直讓人瞠目結舌！

儲備這些東西從那裏來？軍隊自己現存的東西很少，全國的三年自然災害剛剛過去，經濟還沒有徹底好轉，國庫空虛，銀行無「銀」。當時國家庫存的物資，除了有點糧食、棉花、布匹之外，其餘的東西就更少了。因此，要全部由國家解決物資儲備是不可能的。那怎麼解決呢？依靠國家調撥、各省市支援和自己動手結合，自己動手為主，這就是我們的方針。

根據上述設想，我讓總後司令部擬制了一個比較有說服力的物資儲備計劃。我看了這個計劃後，心中有了底，增加了三年內完成毛主席交給我們的儲備任務的信心。為此，我主持召開了總後常委擴大會，專門討論戰備物資的儲備問題。在討論中出現了嚴重的意見分歧。絕大多數同志都認為祇要我們工作做得好，是可以在三年內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和軍委的決策，完成戰備物資的儲備任務的。但也有少數人是不贊成上述意見的，這種人說：國務院再三反對積壓，我們號稱儲備，實際上是把東西積壓起來……。說到這裏，湯平同志插話說：戰備儲備不是積壓，要說準備打仗是積壓的話，要軍隊幹什麼，整個軍隊都是「積壓」，何不等到打仗時再徵兵，我們這些吃了飯不生產的人，也是「積壓」。

關於物資儲備問題，周總理要我在國務院會議上專門說了一次。我在會上主要講了物資儲備的問題。最後我提出：要完成三百萬人打一年的物資儲備，國家預撥款我們祇要一百二十億元就可以了。撥款以三年為期，如果在三年內不打仗，從第四年逐步從國防費裏扣回來。總理聽了我的發言後，帶頭鼓掌，表示贊成！

最後周總理在講話中說：「邱會作同志的講話大約祇有半小時，但講得像連隊司務長報賬一樣清楚，這種思想方法是值得提倡的，是搞經濟工作的人值得學習的。國家雖然有困難，但至今還可以承擔得起，政府可以承擔戰備儲備所需要經費，至於物資你們上報調撥就可以了（李先念同志插話：賣掉褲子也要完成戰備儲備）。關於戰備物資儲備問題，國務院各部委要同總後密切合作，滿足軍隊的需要。他沒有本位主義思想，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從這個意義來說，總後就是小國務院了。」此時總理笑了，在場的其他人都都笑了！

總理說總後是「小國務院」的話，後來在總後也傳開了。

關於三百萬人打一年的物資儲備計劃，國務院會議討論後。總後向軍委寫了個報告，軍委批准了總後的報告，並上報中央，轉發全軍。爲了落實戰備物資儲備計劃，我們確定了幾項辦法。

第一，堅持軍民儲備相結合。許多物資是軍民通用物資，例如糧食、布匹、煤炭、木材等，這些物資就由地方儲備，祇是由軍隊提出專門儲備計劃，由國家和地方有關部門儲備，保障儲備基數在就可以了。平時有些東西軍民共用，雖然儲備的數量不是很大，但是需要特殊的設備，例如血漿，軍隊沒有這種保管條件，也祇能請地方代爲儲備了，至於武器、彈藥、油料等物資，軍隊自己儲備便於管理和使用。

第二，整頓軍需工廠。解放後，軍需工廠一直由軍隊自己管理，爲了完成儲備任務，我們認真整頓了軍需工廠。一是改變了管理體制，由各軍區分管改爲由總後統管；二是對一些設備陳舊，技術落後的老廠進行了改造；三是確定了「優質高產，質量第一」的生產方針，經過整頓工廠的生產效率提高了，更主要的是產品質量提高了。

同時，爲了和倉庫儲存能力相適應，對工廠的生產計劃進行了調整。軍需產品的體積大，特別能佔庫房，儲備三百萬人打一年的東西，哪有那麼多的倉庫呢？爲此，我們想了一個辦法，那就是把出廠的正常供

應量、工廠的在產產品和庫存原材料三者銜接起來，形成依次「推陳出新」，不斷流動，這既緩和了倉庫的緊張，也能保證未來戰爭的需要。

第三，籌集儲備物資所需經費。三百萬人打一年的物資儲備是需要很大一筆錢的。這些錢，在一九六三年以前國家是在每年國防費以外專項撥款解決，一九六四年以後改為在每年國防費中安排解決。不論在「外、內」安排，祇靠國家撥款是不能滿足需要的，還要靠軍隊自己想辦法擠出一些錢來。多年來，我們主要採取了下面的一些措施，彌補了大量軍費不足。

1、調整人員生活費用。例如，精簡整編，降低全軍的某些生活待遇指標和供給標準。僅一九六五年全軍幹部薪金改套國家行政級標準，再加上士兵降低薪金支出，每年就可減少支出一億元。

2、凍結和清理銀行存款。根據中央和國務院的決定和指示，總後財務部從一九六二年七月至一九六三年三月，對全軍各大單位的經費情況進行了清理。經過審查清理以後，凡是資金來源不符合國家規定的，應當一律交回中央或地方財政。按照中央的這個規定，各單位上交總部近三十億。這次上交的錢，幾乎全部來彌補當年資金之不足。

3、清理、利用庫存物資。從一九六二年三月開始，到一九六四年三月結束，清理各級庫存物資共有二十八億多元，同時對多餘的庫存物資進行處理和利用。一九六四年，利用各種多餘物資計抵扣軍隊經費達一億元。

4、審查軍用物資訂貨價格。根據國務院的批准，從一九六二年起，總後財務部協同總後各業務部門，對訂購的軍品的價格有重點地進行了審查。一九六二年，經審查的部分軍品的價格，就降了4.7%，減少軍費開支近四千萬元；一九六三年，經審查的部分軍品的訂購價格又降低了一些，這樣，一九六三、一九六四年兩年又少支出軍費兩億元。審定軍品價格，既促進了工廠降低成本，又減少了軍費支出，實在是一舉兩得的事情。

5、組織賬外收入。一九六二年又根據中央和國務院的通知精神，總後對經費的使用進行了調整，規定賬外經費收入，均集中於總部和軍區兩級統一掌握使用，以彌補經費之不足。據總後財務部統計，從

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五年七年時間，祇是總部一級就收進經費達三十多億元。

6、縮短基本建設戰線。除了國防工程、後方基地工程和海邊防部隊的戰備、生活設施外，其他基本建設一律從嚴控制，特別是嚴禁修建樓堂館所。直到一九七一年我們倒臺時，在北京除有個總後禮堂外，海軍、空軍連個禮堂都沒有。部隊各級領導幹部的住房都嚴格控制，軍一級幹部也祇有三間住房，那時的幹部大都是四、五個孩子，都是擠著住，都毫無怨言。

7、修舊利舊，節約消耗。祇是將每年收舊的服裝經過修補後改做工作服，每年就可以少發幾十萬套新衣服，新衣服就可以儲備起來。

採取上述一些辦法，不僅節約了國防費用，而且每年還可以擠出不少錢用來購買戰備物資。

第四，籌措儲備物資。儲備物資一要有錢，二要有東西。沒有錢不行，有錢買不到東西也不行。當時，國家實行的是計劃經濟，國家的分配是軍隊所需物資的主要來源。但是，需要的東西不一定能分到指標，有了分配指標不一定能到貨，訂到了貨不一定能按時拿到貨，這都是常有的事。雖然國家把軍隊作為重點保障對象，但國家也很困難啊！所以有許多東西，我們還要在國家政策允許的範圍內，廣開門路，多方自籌，以補國家分配之不足，這更是不容易的事！所以，在那段日子裏，我們總後和全軍後勤業務部門，為籌措物資儲備的事，真是費盡心機，付出了艱苦的勞動！說到這裏，不能不使我想起了一件很不愉快的事，那是一九六三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期間，總後負責人xxx沒有經過我，就批准把儲存在豐臺倉庫的一大批鋼材、電機等戰備物資，賣給了山西省。這無異是對戰備物資儲備的干擾，我發現了這件事，很氣憤！首先直接命令豐臺倉庫不准出庫這批物資，如有違抗以軍紀制裁。同時，我又立即批評了當時的物資部長，當然幹部之間也就有了怨恨。

有計劃地大批儲備物資，是從一九六二年毛主席指示以後開始的，到了一九六五年底，已基本上達到了計劃的要求，到了一九六八年，三百萬人打一年所需物資、彈藥、油料全部入了倉。所有的儲備庫都符合「靠山、分散、隱蔽」的要求。

完成三百萬人打一年的物資儲備，這是後勤戰備的一件大事！爲此，得到了毛主席的很高評價。一九七〇年七月，我陪同朝鮮軍事代表團到上海參觀訪問，毛主席接見代表團後，和我談了戰備問題。毛主席說：「從你的報告來看，軍隊已經儲備了三百萬人打一年的物資，這樣就主動了。我們既然三百萬人可以打一年，就更大規模、更長時間的仗都可以打下去。」

劃區供應

早在解放戰爭時期，東北野戰部隊就是實行後勤分部供應制。當時根據作戰的方向，東北軍區後勤部就設有東線（吉林以東）、西線（吉林以西，遼寧以北）、北線（吉林以北）三個後勤司令部，擔任起各個地區部隊的供應。遼瀋戰役前夕，三個後勤部整編爲五個後勤分部，隨軍進關保障平津戰役和部隊南下。抗美援朝時期，對部隊的後勤保障也是同四野一樣實行分部制的。東北的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時期都是大兵團作

一九六四年在越南。



戰，後勤保障工作都做得很好，這就說明了分區供應的優越性了。但我當時不在後勤工作的崗位上，對此沒有多大的體會，不能比較全面深刻的瞭解。劃區供應，除我軍的歷史情況對我有啓示之外，我軍當前的實際情況，對我的啓發更大。例如，汽車加油站就是分地區設置，供油部門是共用的。我們國家的商店、銀行、郵政就是在更大的範圍內全民共用的。我們就是根據這些情況研究劃區供應的。

實行基地化供應之後，經過一些小的戰爭考驗，也證明了它的優越性。一九六二年十月的中印邊境反擊戰，是一個不算規模很小的戰役，西線由青藏兵站線擔任供應任務；東線由川藏兵站線擔任供給任務，總後祇下一道後勤保障的命令就能順利完成任務。總後勤部和西藏軍區後勤部祇需瞭解情況，檢查督促就能把事情辦好。

一九六二年六月，臺灣蔣軍妄圖用比較大的兵力竄犯粵閩沿海地區，我們準備調動三十萬以上的部隊，殲滅來犯之敵。這是準備一次比較大的戰役行動，爲了實行對作戰部隊後勤保障，總後立即加強了浙贛線上的上饒地區、閩南的龍巖地區、粵東的油頭地區的后勤分部等五個分部和兵站線，各級後勤部門共籌措物資三十四萬噸。由華北南下的六十三軍先頭師，開進到了福建的南平和龍巖一線，對後勤保障情況表示很滿意。由於我軍嚴陣以待，蔣匪放棄了它的冒險行動。

一九六五年六月，應越南政府的要求，我軍開始向越南派出防空、工程鐵道、後勤保障等支援部隊，這是援外的戰爭，援越部隊的總數達到三十多萬人，在越境內部隊最高年份達到十七萬餘人。援越部隊，同過去的抗美援朝部隊是一樣的，一切都由國內供應。部隊的蔬菜，做飯的燃料，牲口的草料，都是從國內運去的，我軍真是沒有動越南一草一木。部隊說：「我們除了吸了越南的空氣，一切都用自己的。」支援越南作戰，對後勤保障我完全有決定權，於是，我就決定以劃區供應的辦法，統一實施對援越部隊的保障。當時，北越並無地面戰爭，我國通向北越的運輸有鐵路、水路，運輸距離並不很長。可以說，是平時戰時兼而有之的情況，對劃區供應能夠進行比較好的試驗，是接近實戰的試驗，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我決心作好這篇文章。對援越部隊的後勤保障，我們劃了兩條線：

第一條，所有進入越南作戰的部隊，一律由廣州軍區設在桂林和昆明軍區設在開遠的後勤分部擔任供應。

第二條，進入越南的作戰部隊，師級後勤部和空海軍的獨立部隊，一律到廣西桂林和雲南開遠同二十、二十三分部辦理供應手續。在越南作戰期間，所有部隊都由這兩個分部供應，一切補給都由總後直接指揮。

我援越部隊真正做到了不動越南一草一木。我軍後勤提出的口號是：我援越部隊除頭頂越南的天，腳踏越南之地，渴飲越南的水和呼吸越南空氣之外，其餘一切都由國內供應，並保證滿足需要。

我軍援越部隊的全部日用品、生活物品，包括主食、副食和做飯用的煤，引火的木柴等全部都是國內供應的。我援越部隊沒有越南貨幣，在越南一文錢的物品也沒有買過。桂林分部和開遠分部對援越部隊的後勤保障是組織得很好的，這種保障方法，可以叫做劃區供應，也可以叫做分部供應。這種供應方法具有如下的優越性：

(一) 便於部隊機動。我援越工程部隊和高炮部隊，接到援越任務之後，祇是按照命令向指定地點開進。不需要攜帶大量物資，也不需要顧慮接受任務後的後勤保障問題。如果不是實行劃區供應，進入越南的高炮部隊和工程兵部隊，就需要各組建一個保障機構。

(二) 能夠保障部隊及時供應。平時部隊以師或以團為單位直接到倉庫去領取，戰時則展開兵站線，由後面直接供應到部隊，這樣，部隊就無論平時或戰時都能得到及時供應。對部隊物資供應，在平時是生活問題，戰時就是完成作戰任務的重要問題。古今中外的戰史中，打敗仗或被迫撤出戰鬥，絕大多數都是物資供應問題。

(三) 節省人力。劃區供應平時祇有倉庫就可以了，不用建設一套供應機構，戰時則依托倉庫，根據任務加以擴大就可執行任務。

(四) 方便部隊。在區域化內供應的部隊，在業務手續上是很簡化的。部隊在自己的上級機關拿到了憑證，到自己駐地附近就可以領到物品，如同憑票買商品是一樣的，這對部隊是非常方便的，特別對單獨執行任務的小部隊更為有利。

總之，劃區供應在一個區域內的部隊就有自己的「家」，過往部隊有了「旅店」和領取物品的「商店」。劃區供應有很大的優越性，但隨著我軍現代化的進程，三軍走上統一的後勤聯合供應是不可擋阻的必然趨勢。

機關工作的整頓和建設

準備打仗，建設一個能幹的後勤機關甚爲重要。沒有一個能幹的後勤機關，就不可能完成對現代化戰爭的後勤保障任務。因此，對機關建設，我把它列入戰備建設之內進行。經過比較長期的工作，總後機關建設是取得了重要成就的。

第一個問題，小題大作。

一九六一年上半年，林總在軍委會議上就提出了「要建設能幹的統帥部」。他說：「準備打仗，同機關建設要結合起來。機關建設是戰備建設的重要內容。現代化的戰爭，沒有能幹的領率機關是不可想像的。」他又說：「機關建設不是加人，而是要精幹，真正有工作能力。」

林總的指示對我有很好的啓示，我下決心親自抓機關的整頓工作，就在此時，我抓到了一個很好的機會。一九六一年的八月間，我由國務院開會回來，在進總後機關北門的時候，看到大門口有一個軍人立正站著聽傳達室值班員的訓斥：「你見天來找我們，是要我親自帶著你去辦事不成！」我立即下車問個究竟，值班員向我報告說：「這是新疆軍區某師後勤部的助理員郭豐，來北京辦事已經兩天了，每天都來找一次到兩次，現在事情也沒有辦成。」我即告訴他：「我是總後邱部長，你要辦的事我來幫你忙，你上車跟我一起走。」郭豐不敢上我的車，警衛員小馬連拉帶請拉了他上車，我直接把來人送到機關招待所住下。

第二天，我組織了一個三人小組，同郭豐一起，做了一個詳細的調查記錄，從材料上來看，我們機關真正成了冷酷無情寺廟了，主要是以下幾個問題：

一、郭豐是第一次來北京和第一次進總後的大門的，可謂是一個「鄉下佬」，他是一個祇有二十幾歲的年青幹部，生性膽子小，是要熱情加以幫助的。

二、值班員作風很不好。客人是來辦理一個有關油料倉庫器材的事情。總後機關號稱大院嘛，客人拿出介紹信給值班員看了，並問：「油料部在那裏？」值班員祇看了一眼就說：「油料部在七號樓。」值班員態度冷漠，郭豐也懵頭懵腦的，無所適從，又不敢進去再問，竟走到宿舍區的七號樓去了，時間過得很快，中午下班的號音響了，於是他就出了機關大門，在馬路旁坐在樹下吃乾糧。下午聽到上班號音，郭豐又去傳達室

打聽油料部在什麼地方，進了北門傳達室，但值班員不在崗位，門崗警衛不讓他進機關大院去，於是他就在傳達室外等，等到值班員回來了，郭豐祇問了一句：「油料部在哪裏？」值班員說：「現在快下班了，你明天上班時候再來。」郭豐不但沒辦成事，連招待所都沒找到。

三人小組搞的材料題目爲《機關怪事一樁》，我批示全文發到師後勤部以上，總後機關發到處以上，並指定爲機關學習材料。新疆軍區某師後勤部郭豐助理員在總後受的罪，成了總後整頓機關一個很好的材料。這件事在總後機關大多數人中震動很大，對機關改進工作作風起到促進作用。

第二個問題，拆廟式的精簡機關。

我軍後勤機關原來並無固定編制，歷來幹部人員很少。紅軍長征開始，總供給部祇有上十名業務幹部，到達陝北後，業務幹部也祇有二十餘人。當然，不是說人少就精幹，但人少與精幹是有密切關係的，因爲人多就容易人浮於事。

全國解放後，我軍後勤機關的編制，是蘇軍那裏搬過來的。它的基本特點是橫寬縱短，並且還稱之爲可以提高工作效率，但恰恰相反，業務分工過細，處理一個問題牽涉的面越寬，扯皮的事就多，文件旅行不止，辦事的效率反而更低。

六〇年代初，總後機關總人數兩千五百餘人，經過幾次精簡，當時減少了一些人，但不要多久，人數又回昇了甚至比原來還多。當時總政的幹部部門，也常把老弱病殘往總後塞，這是總後機關的特點。這樣的機關像一部質量不良的機器一樣，哪能很好地運轉？例如，總後一級領導幹部中，正副部長，正副政委十餘人，開起會來祇有一半人能到會就算好的。在當時的情況下，對老幹部又無離退休的管理辦法，祇好增加人數就是了。

過去，機關精簡幾乎年年都在進行，但頂多也祇能減少幾個人，不能達到精幹的作用。不拆廟，香爐一樣多，我幾次下決心拆廟，但那裏拆得動。到了文革的「鬥批改」時期，毛主席提出要「精簡機構，下放科室人員」，總後的廟才真正拆了幾個，我把原有的十三個部局，合併爲九個部局，整編後，人數由原來的兩千五百多人減到一千二百多人。這是很大的決心，沒有這種決心是精簡不下來的。

機關業務工作，大體上可以區分三種：一是屬於出謀劃策的腦力勞動，這是機關最主要的工作；二是各種專業工作，如財務，審計等，這是不可缺少的工作；三是抄抄寫寫，這部份人可以減掉不少。

在文革當中精簡下來的幹部，也是沒有去處的，除少量轉業以外多數人參加支左或上五七幹校，這些人的怨氣是很大的。因此「九一三」之後，精簡問題帶來的災難是難以想像的，精簡被當權者和造反派利用，說成了迫害。

原來是司令部門稱參謀，政治部門稱幹事，後勤部門稱助理員，這是那裏搬來的，我不清楚。本來名稱是沒有什麼特別的意思，祇是稱呼而已，我要求把司令部的助理員改名為參謀，祇是表達我的一點複雜的心情。一九六二年在全軍裝備編制會議上定編制名稱時，我提出，司令部是行政指揮部門，總後司令部的助理員也改稱參謀。當時，主管編制裝備的副總長張愛萍立即說：「這不是亂套了？」我衝口而出說：「亂了什麼套？難道後勤的人叫個參謀也亂套，也有傷大雅嗎？」他對我的話笑而不答。主持會議的羅瑞卿則結論式的說：「應當統一名稱，可以統一起來。」這場爭論就結束了。

原來司令部核心處叫計劃處，我感到名不符實。我想來想去，想出了一個「作戰勤務保障處」，簡稱為戰勤處，我認為這個名稱是合適的。關於總後司令部稱參謀和司令部計劃處改戰勤處的問題，總參軍務部向劉伯承元帥請示報告了，他點頭同意了。劉帥說：「總後司令部稱參謀，無可非議，既設了司令部，工作人員的名稱就可統一起來。把計劃處改為戰勤處是合適的，比其他名稱都好。你們想的這個名稱不錯，是動了腦子的。」

供應部這個名稱是我起的，這是主管整個後勤的供應業務的部門。對這個部的名稱，有人提議稱供給部，我沒有同意，因為我在延安當過軍委供給部部長，不背這個「樹碑」之嫌。

總後勤部直屬部隊工廠、農場、馬場約三十多萬人，生活艱苦，文化生活極其匱乏。當時不少人提議要建立一個文工團，我考慮此舉並不為過，也就同意了。

妥善安排老幹部

整頓與建設機關，最困難的是對老幹部的安排。總後機關，二級部部長以上的領導幹部一律「紅一色」，都是紅軍時期的幹部，二級部副部長一級的幹部，也多數是老紅軍幹部，甚至處長中有一部分是紅軍幹部。這些幹部，都是黨的財富，這些幹部有三種不同的情況：1、堅持不退位的幹部，這是少數。這些人中除有一定的實際工作經驗之外，領導能力比較差，他們認為不工作，是最大的恥辱，對這種人最難安置。2、要位、要職、要權的三要幹部。這種人在老幹部中不是多數，這些人不去想自己的領導水平如何，總是想到要有自己的位置。3、要汽車、要秘書、要警衛員的三要幹部。這種幹部也是少數，總後原副政委李耀就是這種幹部的典型，我在位期間他什麼都要，就是不工作。對總後的老幹部，我是長期費盡心思，也沒有處理得很好。當時還沒有離職休養的制度，而總後的老幹部又祇有調進來，根本出不去。別處不好安排的同志，都強行安排到總後的就先後有好幾人。

對老幹部的安排，我們自己能辦的就祇有提拔一條路。但我堅持，二級部正部長不能以安插位置來任命幹部，這是在後勤工作的根本一條，二級部的一把手都是要幹實事的，總後首長一級我反而同意作為安插位置來安排。於是，總後領導中的副部長，副政委就安了十餘人之多。別人向我開玩笑說：「你這個部長，現在還是班長，但不要多久，就要昇排長了。」

為了給老幹部找到適當的出路，我還是給兩位老幹部，車管部原副部長劉顯宜和船舶處長李佐榮以「帶職休養」做了安排。這兩位都是老紅軍幹部，他們都是身體不好，很難繼續工作，這兩位幹部思想很好，很聽安排。本來我打算這條路打通之後，就繼續安排老幹部退出工作專心休養，但總政治部則向羅瑞卿告了我一狀，指責我「獨斷專行，破壞幹部工作制度」。羅算做了件好事，沒有同意對我的指責，反而質問總政治部「不能工作的老幹部，怎樣處理，你們提出辦法來。」總政不吭氣了，我也就算免罪了。

對老幹部經初步安排之後，二級部和處兩級幹部精幹了，是真正的工作班子，這對機關建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機關在各個方面都出現了新的氣象。

機關經過幾年的建設，工作能力和戰鬥精神確實大大提高了。我上任總後部長的十幾年，沒有休過一次假，沒有過好一個完整的星期天，每天都是晚睡，但工作還是辦不完。這樣也害得不少同志長期加班也得不到休息。

總後機關經過幾年的整頓和建設，機關面貌漸漸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機關學習、工作、生活秩序都是比較好的。前面說的那位新疆某師後勤部郭豐助理員，一九六九年又來到了總後機關，他對機關也有新的看法。因為工作的關係，我沒有見到那位助理員，他給我留下了一封信，我記得，他的信的主要內容是熱情頌揚了機關的變化。

第十七章 後勤業務改革

調整幹部隊伍

一九五九年，我上任總後部長之初，林總同我談過一次話，林總說：「我同周總理不約而同選你當總後勤部部長，毛主席也很贊成。從高級幹部的反映來看，對你抱有希望。」林總又說：「後勤工作很複雜，複雜性就是很多的矛盾，但在這些矛盾中，又必有一個主要矛盾，這就是幹部問題。正確使用幹部，是軍隊建設的核心問題。你現在就要抓住幹部隊伍建設這個中心，就算牽住了『牛鼻子』，這是你要抓住的至關重要的問題。」

林總同我的談話時間雖然不長，但對要抓住中心問題，給我的教育是十分深刻的。我上任之後，幹部問題始終是我注意的中心問題。這個問題也是總後新舊兩種思想鬥爭的基本問題，每前進一步，都要付出很多心血，按照一般的工作程序，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當時，總後領導幹部的基本情況，用兩句概括性的語言來說，就是「滿堂紅」和「孫子多」。總後領導幹部，二級部正副部長（包括一部分處長）都是紅軍老幹部，各院校領導幹部，除個別之外，也是紅軍老幹部。另外在助理員中又極大部分都是抗美援朝戰爭時期參軍參幹的初中學生。如果以革命歷史的時期來說，紅軍幹部多，抗戰幹部少，解放後的幹部多，「爺爺多，兒子少，孫子多」就是這樣來的。

總後的幹部狀況是領導人造成的。一九四九年總後成立之初，楊立三部長把我軍的一批老後勤工作幹部都集中到總後來了。另外，總後成立之後，總政治部把一些不好安置的老幹部都送到總後。有不少幹部是總政治部專門「按位就坐」在總後的。當時，總後二級部以上的位置，不僅一個空位沒有，而且「加坐」很多。而抗戰時期的幹部，當時在全軍任

軍一級軍政主要領導幹部，兵團級的幹部，已經很多了，在總後就少見了。

在幹部問題上，我同總政是作過鬥爭的。這裏，僅以彭嘉慶和陳念棣任職的問題為例。

彭嘉慶原是濟南軍區副政委，擬調任總後副政委兼後勤學院政治委員。在軍委辦公會議討論幹部任免名單時，蕭華爲防止我提意見以引起麻煩，就對著我說：「彭嘉慶是一個很老、很好的同志，到總後去工作是合適的，對後勤學院的領導會起加強作用。」

我本來就不滿意總政對幹部的安排，聽到蕭華說的那番話，心裏就有點氣了。我毫不客氣地說：「彭嘉慶是個好人，爲何不放到總政當個副主任？放到總後不是委曲了他嗎！」蕭華看到我不高興，就不說話了，羅瑞卿站在領導的角度立即說話了。他說：「老邱，對老幹部的安排是個整體的問題，對彭嘉慶的安排就這樣定了吧。」我聽到羅的話之後，也不說話了。

又有一次，也是在軍委辦公會議上討論幹部任免名單時，總後擬提陳念棣任總後科學研究所所長。甘泗淇看到名單時說：「啊！陳念棣搞業務？他是一個很好的幹部。」我火冒三丈地對著甘說：「甘主任，照你這樣說，搞後勤工作的都是壞幹部？今天我才知道，總政把一些沒有人要的幹部都塞到總後，原來是總政的政策！」

甘泗淇自知說話不對，立即糾正自己的話說：「邱會作同志，我的話說得不妥，但不是你理解的那個意思，請不要誤會，我正式糾正我的話，我對陳念棣任職沒有意見。」羅瑞卿接著我們的爭論說話了，他說：「以我所知道的，在幹部問題上，邱部長對總政是有意見的，而他的意見又有一定的道理。不能工作的幹部確實不要過多地安置在崗位上，否則對工作不利。對老幹部的安置，由總政提出一個具體方案來。」不久，總政就提出了對高級幹部「離職保待遇」的安置方案，這就開闢了一條高級幹部的去路。

我對總後老幹部的情況做了這段回憶，毫無嫌棄老幹部之意，何況，我自己也是一個老紅軍幹部。老幹部的優點這裏不說了，其弱點是普遍的，是歷史帶來的。老幹部的弱點是「老、粗、弱」，這個弱點在總後的老幹部中顯得特別突出。從年齡上來說，是「老中之老」，從文化上

來，是「粗中之粗」，從身體上來說，是「弱中之弱」。這種情況必須改變，否則對事業的發展是極為不利的。

總後對幹部的調整提拔，主要是按照如下三條措施進行的。

第一條，調整幹部。由於總後老幹部過多，位置上是滿滿的，一個空餘的也沒有；不僅如此，常常是一個位置有若干人「共事」。在此情況下，不調整幹部空出位置，就無法提拔幹部。

抗美援朝結束後，志願軍後勤部有一批比較優秀的幹部到了總後，這是加強總後機關建設的一大力量，但由於種種原因，志願軍的幹部在總後頂多是二級部副部長，沒有當部長的。根據調整幹部的原則，現任二級部的老正副部長哪裏去？出去是不可能的，祇有自己消化，總後祇有多設副職來安排。爲了把二級部的位置空出來，就先後提拔了一批總後的副部長、副政委張池明、張天雲、湯平、韓振紀，上述位置空出來之後，才有可能考慮二級部正副部長的提拔。

調整幹部是一場尖銳的鬥爭。有極個別的人竟在我的頭上加上一條什麼「有不可告人的目的」的罪狀。他們說：「調整幹部就是調出自己不喜歡幹部，調進自己喜歡的幹部。」那些不實之詞，當然沒有什麼多大影響。從總後確實先後調出三名、調進三名高級領導幹部，調進的有張池明、張天雲、張汝光等三人；調出的有胥光義（賀帥指名調去國家地質部任副部長），汪易（楊勇指名調去北京軍區後勤部任部長），傅家選（楊得志提名調他任濟南軍區後勤部長）。調進和調出的幹部，都是由總後幹部部向總政幹部部辦理正式手續的，決不是由任何個人調動的。

第二條，加強二級部的領導。調整提拔幹部的重點是加強二級部的領導，經先後調整提拔後的二級部部長爲：司令部副參謀長（一九六五年提參謀長）楊恬（抗戰時期幹部），政治部主任盧南樵（紅軍時期幹部），衛生部部長孫儀之（紅軍時期幹部），軍械部部長張明遠（紅軍時期幹部），財務部長范惠（抗戰時期幹部），軍需部部長王希克（抗戰時期幹部），油料部部長伊文（抗戰時期幹部），營房部部長蘇煥清（紅軍時期幹部），物資部部長喻縵雲（紅軍時期幹部），第二物資部部長范子瑜（紅軍時期幹部），運輸部部長羅文（抗戰時期幹部），軍需生產部部長張和（紅軍時期幹部）。以上十二名二級部部長，紅軍時期幹部七名，抗戰時期幹部五名。紅軍時期老幹部雖然還佔絕對多數，但已經有五名抗戰時期的

幹部當了二級部部長，這是總後勤部空前未有的。二級部的領導幹部調整後，領導加強了，對機關建設起到了重要作用。

總後調整提拔幹部出現的基本情況是：凡是老幹部上去的意見都不大，凡是提拔起來的阻力都不小。在常委內部，我祇有充分做說服工作，萬一說不服，就祇有以「少數服從多數」解決問題，楊恬任參謀長就是少數服從多數定下來的。

第三條，控制機關處長的選拔。機關處一級幹部，是進入領導層的「海關」。因此，對處一級幹部的選拔培養就成為特別重要的問題，也是機關建設的重點。有了好處長就不愁沒有好部長。

對處長、副處長的選擇，我們做了比較具體的規定：一定要選拔優秀分子任正副處長。處一級幹部不准「安位子」，應當注意政治質量、文化水平和身體條件。控制處一級幹部的選拔是打破論資排輩的有效辦法。提拔幹部以德才為標準，就可以克服以資格為標準的現象了。我是提倡在革命道路上賽跑，誰走到前面的就當官，不應當像在隘路上行軍一樣，祇能按照先後一個一個地跟著走。

控制處長的選拔，我們幹部部開始還不十分理解我的意圖，後來，他們向總政幹部部匯報了，並得到了徐立清的讚揚。據總後幹部部對我說，控制選拔處長的做法，徐立清副主任是很讚揚的，徐說：「邱部長親自控制處長選拔的措施，是得力的。其目的就是把住幹部進入領導幹部這個圈子的『進口』。全軍很多領導幹部還不懂得這個問題的重要性，提拔幹部很亂，從一般幹部提到團以上幹部，數量多，質量差。」

學校整編和學制調整

總後原有有高等院校五所：後勤學院、三所軍醫大學、一所獸醫大學，另外，還有六所中級學校。學校的數量和能招收的學員名額，從數量上來說是夠用的，從質量上來說，除軍醫大學之外，其餘的不少是不合用的。總後的學校，沒有起到造就建軍人才的作用，這種情況必須改變。要使學校成為造就建軍人才的場所，就必須整編學校和調整學制。

後勤學院原來祇是對現有幹部的輪訓，沒有培養新幹部的任務，這種學制祇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提高現職幹部質量的作用，不能起到增加幹部數量的作用。按照當時的制度，團級以上職務的幹部，每提拔一級

都要到後勤學院輪訓一次，有的幹部輪訓三次以上，幹部對輪訓不感興趣，擔心學習後提拔不成又丟了位子。

我兼任後勤學院院長時，對後勤學院提出了改變學制的方案。我主張全院改爲三個系：輪訓系、基本系、初級系。輪訓系招收團級以上幹部，學制三年，課程安排爲文化課、業務課各二分之一。老幹部多學點文化，比學「前送後運」的專業課好得多。老幹部祇要文化提高了，很多業務課都可以自學。基本系招收營級以下幹部，學制三年，除了補習必要的文化之外，基本上學業務。初級系招收高中畢業，至少也要有高中水平文化程度的學員，軍內、軍外招生均可，學制五年。

我提出的方案，得到了後勤系統一致同意。但不久，我自己也被送到高級黨校學習去了，方案也就進了「冷宮」。一九五九年，我當了總後部長之後，硬在後勤學院開設了一個參謀系，招收高中學生，從此，培養出來了一批有文化知識的後勤幹部。

軍醫大學的學制、課程沒有什麼改變，祇在招收學員（國家統一招生）上注意了政治條件，否則畢業就復員了。獸醫大學除了開設了一個輪訓班之外，一律在地方上招收高中畢業生，其餘沒有什麼變化。

新成立後勤工程學院，這同成立後勤裝備研究院一樣，又是做了一篇最困難的文章。

前面提到了後勤有六所專業中級學校，招收的學員多數是文化程度很低，畢業出來的學員不少人很快要復員，這對後勤建設沒有什麼作用，這要從辦學方向上來解決問題。我主張把軍械維修管理、汽車維修管理、油料供應等學校合併成立後勤工程學院，在地方上招收高中畢業學生，學制五年。我的主張一提出，在總後內部和總政幹部部門都是「爆炸性」的反對。我則硬著頭皮，爲成立後勤工程學院奮鬥到底。

關於成立後勤工程學院的問題，我在總後黨委一提出，就遭到某主要領導人堅決反對。他說：「取消幾所學校，成立一所什麼工程學院得不償失，還是少搞一點新花招爲好。幾所學校換一所學校，從後勤業務上來說祇會減弱不會加強，何況取消那樣多的專業學校對各部的業務建設也不利。」事情也湊巧，一天在聶帥家裏談國防科委的問題，我順便同張愛萍副總長談了後勤要成立後勤工程學院的事，出乎我預料之外，他說

的後勤要培養工程幹部，比我說的還多還深刻，最後他說：「在軍委辦公會議討論時，我會積極支持你。」

爲了統一認識，我召集總後各有關部的二級部長商談成立後勤工程學院的問題。參加商談的部長們以高興的心情發表了意見，他們說：「成立後勤工程學院和成立後勤裝備研究院的道理是一樣的，我們不僅支持，還要學習邱部長抓大事的思想和作風。」

總後向軍委上報了成立後勤工程學院的報告，在軍委辦公會上討論時，卻遭到了總政副主任徐立清的非議，他以發問的口氣對著我說：「邱部長，後勤也有工程問題嗎？」我要反駁時，張愛萍替我說了幾句很有力量的話，他說：「徐主任一定知道後勤是幹什麼的。後勤的工程問題，用很多的話都難於說完。我看抓培養後勤工程幹部，是對現代化後勤建設入了門，我贊成成立後勤工程學院。」我聽了張副總長的一席話感到很開心，如果總後的報告能獲得通過，我就不準備說話了。此時，徐立清趕緊表示了態度，他說：「我失言，失言，請邱部長不要在意。我同意張副總長的意見，我贊成後勤成立工程學院。」總後成立工程學院的報告順利通過了，在後勤建設史上，空前未有的「工程學院」誕生了。

後勤工程學院是一所中等規模的學院。學員千餘人，學制五年，由國家統一在社會上招收高中畢業生，院址在重慶。學院分設軍械、油料、化工、運輸、建築等五個系，學員畢業後，全部分配在後勤系統。

加強與建設科研機構

後勤的科學技術是在加強戰備，準備打仗總的指導思想之下發展起來的。現代化軍隊的建設，離不開現代化後勤的保障，建設現代後勤，就必須掌握現代化科學技術。我在一九六〇年廣州軍委擴大會議上的發言中說：「我軍的裝備將日益現代化，後勤如果不加強科學研究，提高科學技術水平，培養大量的科學技術幹部，將寸步難行。」我在主持總後的工作期間，一直把後勤系統的科學技術研究，提到工作日程上。應當說我對後勤科學技術是抓很緊的，付出了很大的精力，也取得了比較明顯的效果。

由於歷史的原因，在總後領導中大多數人的文化程度是比較低的。他們是很少懂得科學技術的，包括我自己在內。但是有些人，自己不懂

又根本不去學習，長期安於現狀，閉眼不看客觀發展的需要，故步自封，以外行自居，他們的根據是「外行能領導內行」，因此，在發展科技這個問題上，在總後常委內部長期存在著嚴重的分歧和爭論。而且這種爭論和分歧，又常常和人事關係、「團結」問題攪在一起，搞得十分複雜，令人頭痛！

當時總後有些領導幹部的思想當時還留在「小米加步槍」的時代，他們說：「後勤是管柴米油鹽的，除了看病需要點技術之外，還有什麼科技！」他們還認為，在後勤提倡發展科技就是「矮子蹬板凳，自己提高自己」，這是在後勤系統發展科技的一大思想障礙。

在總後，發展科技，還有一大障礙，就是在幹部使用上的論資排輩思想。你要提拔德才兼備的年輕幹部，他就說是打擊排斥老幹部！你要提拔一些知識分子，他就問你要靠什麼人管後勤？他們說：教授未必會做飯，而大老粗倒是內行。對於發展科技的問題，在總後領導層內長期思想不統一。

一九六三年秋，賀龍元帥在三〇一醫院住院，我同李聚奎、張令彬等同志去看望他，他在和我們談話中談到了科技問題。他說：「這幾年你們總後的工作搞得不錯，走在幾個總部的前面去了，這是在歷史上少有的，過去罵後勤娘的比較多，說好話的很少。今後，你們除了繼續搞好工作之外，就是要抓緊學習，現代化軍隊的後勤，沒有文化，沒有科學知識是搞不好的。」他說：「有一種說法，什麼後勤是管油鹽醬醋的，土包子比洋包子管得好，這是偏見，是保守思想的表現。」賀帥的這番話，使在座的人聽了面紅耳赤，好不是滋味！後來，我讓張令彬同志在常委會上傳達了賀帥的談話，對總後領導幹部提高對科技的認識，起了重要的作用。

我在主持總後工作後，在加強與建設科研機構方面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加強軍事醫學研究機構。

軍事醫學科學的研究，我們算是起步較早的。解放不久，我們就在國民黨國防部的一個研究機構（在上海）的基礎上組建了軍事醫學科學院。當時全院有教授級的研究人員 80 多人，其中有不少是全國知名的專家，學科研究的帶頭人，例如蔡翹教授等，他們在抗美援朝時期就開始

了研究工作。一九五八年新院址在北京建成後，軍事醫學科學院全部遷來了北京，當時擴編為放射醫學、軍事勞動生理、部隊衛生營養、微生物流行病、藥理毒理五個研究所。這樣就成了一所人才、機構各方面都比較強的研究機構了。

由於軍事醫學科學院的主要是研究「三防」，研究成果不是一下子能夠拿出來的，因而許多當前戰備急需的問題不能得到解決。因此，我提議把各軍區衛生防疫研究所改編為軍事醫學科學研究所，主要任務是研究本地區的部隊作戰的衛生保障問題，例如，瀋陽研究寒帶衛生保障，廣州研究熱帶衛生保障，蘭州研究高原衛生保障等等。後來的實踐證明，明確這些研究機構的任務是非常必要的，他們的研究工作也是最見成效的。

(二) 組建五三研究院。(略)

(三) 組建營房工程設計院。

總後營房部的設計力量是比較強的，在五十年代，就設計過軍事博物館、京西賓館和其它一些要求很高的大型工程。但過去是把設計和建築業務混在一起的，設計人員要用很多的時間去搞業務管理工作，這對發揮工程設計人員的專長是很不利的。

在加強防原子、防化學、防生物的「三防」思想指導下，對軍隊的營房工程，特別防護工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急需加強設計力量，於是就將營房部分散在各業務部門的設計人員集中起來，成立營房工程設計院。該院編為特種工程、營房工程、倉庫工程三個設計所。

軍隊的倉庫工程設計任務很大，營房部設計院的力量不夠用，需要把各軍區的力量統一使用。先後將北京、南京、福州、廣州、昆明等七個軍區的設計室擴編為設計所，由總後營房部設計院統一使用。軍隊的營房設計院除了擔負軍隊的設計任務之外，還擔負過地方上不少工程設計，一般的都能做到用方滿意。

(四) 組建後勤技術裝備研究院。

過去，後勤系統祇有分散在各業務部門很少的研究人員研究有關後勤裝備，但力量很有限，極不適應現代化後勤建設的需要。為此，我提議把一些分散的後勤科研人員集中起來，組建「中國人民解放軍後勤技術裝備研究院」，以加強後勤技術裝備的研究。

組建後勤裝備研究院，我真是受到了內外攻擊。總後有人攻擊我是「好大喜功」，總參軍務部攻擊我是「利用戰備擴大編制」，這些對組建裝備研究院都極為不利。此事我本來可以不願干擾，自己干就是了，但我還是注意做通各方面的工作之後，才做正式決定。總後內部的思想統一是主要的，總參軍務部的工作容易做，他們對我是放在眼裏的。

爲了使大家重視後勤裝備的研究工作，我利用各種機會宣傳成立後勤裝備研究院的必要性。我同大家說，後勤裝備雖然不是武器，但它是合成戰鬥力不可缺少的因素，是保障發揮戰鬥力的作用的。拿鞋子，襪子的質量來說吧，它的好壞似乎沒有什麼了不起，但在戰鬥節骨眼上就可能成了大事情。大家都打過仗，如果你在衝鋒，正在追擊敵人，鞋帶突然斷了，對戰鬥不能沒有影響。還有單兵的負荷質量，解放戰爭的那個時候，一個戰士身上祇有背包、掛包、槍支、米袋、水壺等五大件，走起路來不感到負擔太重。建國後，戰士的個人裝備逐漸多起來了，現在要背五十多斤，太重了。毛主席說：「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戰士背那麼重，怎走得了呢？這就要求我們減輕負荷量，但又不能減得影響戰士的生活和戰鬥。這不僅要減輕重量，還要縮小體積，我們要求裝備戰士的東西要一物多用，件數要少，但有多種用途，體積要小，但用起來非常順手，各種東西要做得精巧美觀，非常結實耐用。再如吃飯問題，怎樣把飯做快、做熟、做好，這不但需要適合部隊野戰條件下的炊具，還要有適合各種地區需要的炊具，例如高原的、海島的、熱帶的、寒帶的、坑道內的、海軍船上的等等。爲保護部隊有生力量，後勤要做許多事情，無論在什麼時候保障戰士吃得飽，吃得好始終是一個大事情。過去在革命戰爭年代，我們部隊要靠兩條腿走路，東西要靠人背肩挑馬車運，沒有什麼摩托化裝備。隨著我軍的現代化建設，機械化裝備增多了，油料保障成爲後勤保障當中的一個突出的問題，不但有陸軍用油，還有海、空軍的用油，不但有普通的油料，還要有特種燃料。對這些油料怎麼儲存，怎樣運輸，在野戰條件下怎樣加油等等，無一不是一項專門的課題，都要加以研究解決。我們要建設戰略後方基地，戰役後方基地，要建設一批倉庫，要儲備大量的戰略物資，彈藥、油料、藥材、被裝、食品等等種類繁多，而且各有儲存條件的要求，溫濕度問題，防腐蝕問題，安全問題以及海島、邊防等地區特點的問題等等，都要進行精

細的研究。還有防原子，防化學，防生物武器的「三防」裝備的研究，高空深潛等特種作業裝備的研究，都提到日程上來了，都迫切地需要我們拿出研究成果來，否則談何保障軍隊現代化建設？

老天不負苦心人，我苦口婆心地宣傳，總算說服了總後內部持有不同意見的人，也爭取到了總參管編制的同志的同意。後來，經軍委批准，一九六〇年六月一日，後勤技術裝備研究院成立了，從此，我軍有了第一所後勤技術裝備的專門研究機構。後勤技術裝備研究院下編軍需裝備，軍械維修，衛生裝備，車輛裝備，車船油料，被裝化工，物資貯存等九個研究所和兩個附屬實驗工廠。

從後勤技術裝備研究院成立時起，我們就非常注意掌握他們的發展方向，研究工作的任務和重點，使他們能夠很快地拿出部隊急需的科研成果來，為此，我曾多次和該院的領導幹部、科研人員交換意見，大家在許多重大問題上取得了共識。

知識分子政策問題

知識分子政策問題是科學研究中起決定作用的問題。和革命戰爭時期不一樣了，建國後，我軍後勤系統的知識分子越來越多了，院校和科研部門更是知識分子成堆。建設現代化後勤需要知識，必須調動知識分子的積極性。但在現實中，你會遇到許多問題，如不正確處理，就會挫傷知識分子的積極性。我從一九五四年來到總後工作後，就接觸到了知識分子問題，不能說我對這個問題的處理完全正確，但從總體上來說，沒有出大的偏差。

一是批判「白專道路」問題。一九五八年毛主席對知識分子提出又紅又專的號召。毛主席說：「紅與專，政治與業務的關係，是兩個對立物的統一。」我們當時認為，「紅」與「白」都是屬於政治範疇的，而「專」與「不專」則是屬於業務範疇的，這兩方面的東西沒有必然的聯繫。實際情形是：一個政治上「紅」了的人，他可能有專業知識，也可能沒有專業知識，一個在政治還沒有解決「紅」的問題的人，他也可能有點專業知識，也可能沒有專業知識，「白專道路」的提法是不準確的，是違背毛主席提出的「紅與專統一」的意願的，批判「白專道路」不是通往「紅專道路」的途徑，而往往是適得其反。我們在總後系統，沒有佈置和發動批

「白專道路」的政治運動，歷史證明，我們當時的認識和做法基本上是對的。

二是對知識分子大膽使用的問題。由於歷史的原因，許多知識分子出身於剝削階級家庭，有這樣那樣的個人歷史問題，這是客觀存在。怎樣對待這個問題呢？應該是重在表現，給他們創造發揮一技之長的條件。但有些單位的領導，對知識分子有一種不信任的心理，管得太嚴，輕則挨批，重則挨鬥，結果是留不住人才，甚至連自己軍醫大學培養的醫生，都做轉業處理了。

對知識分子的使用問題，我多次向聶榮臻元帥提出過我的看法，他對此有同感，他說：這不完全是軍隊政治機關的問題，而是黨的政策問題。他又說：「你對知識分子政策和使用上的看法是對的，在我們職責範圍內應當把知識分子工作做好。」他還說：「沒有知識分子參加，老幹部不大力提高知識，我軍的現代化是沒有希望的。」

聶帥還說：「目前要徹底解決知識分子的問題，時機尚未成熟，但軍隊中注意保留知識分子和大膽一點使用知識分子是可以做到的。我們今天幾個人（我記得在座有的張愛萍等人）談一談，待我向軍委寫個報告，用軍委的名義發個指示，估計可以起一定的作用。」不久，軍委發出了注意使用知識分子的指示，其中特別提到了對知識分子的使用要著眼才能，對個人出身不要過於苛求。我們總後系統堅決執行了軍委的指示，大批知識分子提到領導崗位上來了，這對科研工作起到積極的作用。

三是在政治運動中保護知識分子問題。

建國以來，政治運動不少，可以說是一個接著一個。我認為，開展政治運動有些是必要的，但有些政治運動出現偏差，把知識分子當做了運動的重點，這是應該總結經驗教訓的。我主持總後工作以後，遇到了兩次大的政治運動（反右時我在中央高級黨校學習），一次是四清運動，一次是文化大革命。這兩次政治運動，對知識份子的衝擊都很厲害，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更為突出，在當時我都根據自己的認識和力所能及的範圍，對一些高級知識分子採取了保護措施。

一九六五年下半年，總政治部李曼村等人帶領工作組到軍事醫學科學院二所搞四清，總後政治部主任盧南樵也帶工作組配合其工作。他們以抓「兩條道路鬥爭」為名，給一批高級知識分子帶上了「個人主義」

「名利思想」、「新興資產階級」等大帽子，一時搞得人心惶惶。我知道這件事以後，在總後常委會上提出了嚴肅的批評，採取了堅決的糾正措施，李曼村爲此與我結下大仇。隨後，於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在軍事醫學科學院和五三研究院全體幹部大會上，我嚴肅批評四清運動的極「左」的做法，我說：「十多年來『內戰』不少，傷了不少人。動不動就是個人主義，名利思想，動不動就是『兩條道路的鬥爭』，就是『新興資產階級』，那就祇會挫傷人的積極性，自己挖自己的牆腳。」我的講話，受到了廣大科研人員的贊同，他們認爲我說出了心裏話！

爲了保護知識分子，一九六六年八月十日我還到軍事醫學科學院二所給在四清運動中被整過的知識分子開座談會。我鼓勵他們不要害怕，即使在文化革命中重提過去的問題也不要害怕，共產黨是正確的，個別辦事的人有這樣那樣的錯誤，不要與共產黨混爲一談。不久，該院的病理學家兼三〇一總醫院的病理科主任吳在東自殺身亡，我立即告訴總醫院，對吳按照一般死亡處理，不要去追究他的自殺問題，這對保護知識分子起了積極的作用。在整個文化革命中，軍事醫學科學院、解放軍總醫院對知識分子都沒有大的傷害。當然，在知識分子隊伍中，確有個別很壞的人。例如，三〇一總醫院有個心臟科專家，就是一個很壞的知識分子，政治上、道德上、作風上都很壞，但這是個別的，並不能代表整個的知識分子隊伍。

改革軍服質量和顏色

軍隊的軍服質量很低、顏色難看成了我軍上下共同關心，共同議論，共同罵人的問題。這是一個必須解決又很不容易解決的問題。

一九五三年，我還在中南軍區政治部工作時，經常下部隊，我愛看愛問戰士的吃、穿、住等生活問題。有一次看到一個團的部隊集合一起看文藝節日，大家穿的衣服很難看很破舊，此事成了我的心病，久久不能忘懷。時隔六年之後，我當了總後部長，有一次我去北京衛戍區，看到部隊穿著的情況仍然很差，我心裏想：「對部隊的穿著不好，過去是心裏難過，現在應當是責任難逃了」。從此，我就認真考慮部隊的穿著問題了。

軍服存在的主要問題是，布料不耐穿，染料不保色。軍裝的質量反映了我們國家當時的經濟狀況和技術水平，兩方面都有問題。前者是主要的，後者也有主觀努力的問題，但盡力而為，還是有解決好問題的希望的。我決心花大力氣去解決這個問題。後勤部長不為部隊辦好事，就是「飯桶」部長了。

軍裝的布料，長時期都是用的十六磅棉布。這種布料很不耐穿。戰士每人每年發兩套單衣，一套襯衣，一套棉衣不夠穿。戰士的單衣，有的穿上兩三個月之後，就打補丁了。

棉衣的質量同單衣一樣。北方部隊一年有半年穿棉衣的時間，穿上好衣服的時間不足三個月，其餘的時間都是破爛不堪的。開衣服不夠穿的問題，成為當時的主要問題。部隊對軍裝的意見，有善意的，有叫苦的，謾罵的，無所不有。

六二年三月有駐山東部隊直接給周總理郵寄去一條棉褲。這條棉褲是用麻繩子串起來的，破爛的程度無法形容，棉花剩了不到四兩，補丁不計其數，各種顏色皆有。周總理把這條褲子掛在他的會議室牆上，抗美援朝時期，彭德懷拿著戰士破爛不堪衣服，曾去國務院拍過周總理的辦公桌。周總理對著這條褲子，不知說了多少次「對不起解放軍！」

軍隊軍裝的供應制度是發新收舊。收回的單衣百分之七十以上破爛不堪，褲子根本收不上來。棉衣收回來的情況，比單衣略為好些。但在修補棉衣時，也要三件以上才能拼湊修理成一件舊棉衣。

軍服的染料是土黃色，據說這種染料還是從蘇聯來的。用這種料染出的衣服，洗一次變一次顏色。而且在同一件衣服之上，背上、胸前、腋下的顏色又不一樣，同在一件衣服之內顏色都是「五花八門」的。

有的部隊為了保持好的軍容，單衣總有一套「管制衣服」，這就是有一套單衣要統一穿著和下水的時間，這樣才能保持顏色大體一樣。這套衣服一般是要有一定意義的時候才能穿的，例如開軍民聯歡會、歡迎首長來到，或舉行什麼慶典，戰士們把這套衣服稱為「禮服」。

對服裝問題經過再三研究之後，下決心提高質量，穩定顏色。

第一次改革失敗了。我們的改革方案，國家紡織部不僅大力支持，而且當作自己的任務接受下來了。紡織部向我們提供了樣品：人字呢式布料和草綠染料。

「人字呢」布料不同於平布的紡織方法。布比較厚，在布的表面上有「人」字樣式的紋路。故稱「人字呢」。染料比原來綠色多一些，顏色比原來的好看一些。我們感到高興。但部隊試穿半年之後，暴露出來好多的問題，其中最嚴重的問題是布料不結實，顏料不保色。同原來的相比好不了多少。

在我們工作上遇到了很多困難，又沒有辦法的時候，我去向總理報告了。周總理聽了我的簡要報告之後，不僅沒有責怪我，反面高興地說：「你把解決服裝的問題提出來了就是好事。現在沒有搞成，明天就可能成功。我們三個人（李先念在座）共同努力，一定在最短時間之內，解決軍服問題。現在已經走出的這一步，不要後退，繼續搞下去。」遵照周總理的指示，我們把這次搞的改革堅持下來了。

第二次改革不盡人意。爲了服裝改革我請總參謀部二部利用他們的業務關係找國外資料。他們積極行動找到了國外各種資料。我在翻閱香港一本雜誌看到了日本有關石油化工的報導。這一發現，向我們提出了一線希望，日本生產的高級衣料「的確良」就是石油化工纖維加其它材料紡織而成。

爲了研究化學纖維，成立了專門小組對日本的石油化工進行研究。專門小組拿著資料去大連石油化工研究所，這算是找到門路了。我當即撥款一萬元（當時的一萬元啊！）作爲研究費用，三個月之後，石化所研究成功了可以抽出口綸石化纖維。對此，我們同石化所的同志們是一樣的高興！

我們立即進行試織，是兩股化纖線，一股棉線合在一起織布。用這種方法織出來的布，十分令人滿意。這種布比進口的布的確稍微厚一點，但非常軟柔，著色之後很漂亮。經過不多長的時間，幾十套衣服縫製出來了。這次試穿在全訓部隊進行。

試穿的衣服，經過洗水十次水之後，毛病就出來了：三股線，由於成分不同，對顏料的汲取程度也不同，衣服有了相當明顯的花紋，很像麻布，但布的質量性能很好。這次改革雖然不算完全失敗，但也不算成功。不過我們也大膽地向部隊宣佈：兩年以後部隊就會穿上這種軍裝。

第三次改革全軍滿意。第二次改革出了「麻布」之後，我沒有放棄的念頭，指示繼續研究，這也是我們搞改革研究多數人的精神狀態。有

兩名老工人和一名搞技術的同志，共三個人，他們常說：「多做試驗不犯罪。」於是他們三個人共同提出了一個大膽的想法：把兩種不同成份（口綸、棉花）的纖維混紡成紗，就像原來織平布一樣的紡織方法，進行試驗紡織。他們說幹就幹，不久「混紡」布就出來了。這種布同原來的三股線織成的布，似乎更軟柔了。

他們接著很快上顏色製成衣服，並發給工廠的搬運工人穿著，每天洗一次。經過一個月勞動的烈日暴曬，下水洗過三十次，顏色的變化不大。三人小組帶著試穿過的十套衣服和布匹，專程來北京匯報。我們聽了他們的匯報，再看實物，我們大家心裏高興的程度，真是無法形容。我除了讚揚和感謝三人小組的工作外，當即決定召集專門會議討論定案。

爲了鑑定「混紡布」的質量，我們召集了各種專家三十餘人，進行了充分的討論。發言的人除了讚揚軍隊的工作精神之外，從各種技術角度證明了「混紡布」是一個創舉，開闢了我們國家紡織史上的新篇章。大家一致同意，把混紡布定下來。我同意大家的意見，並拍板定案，還將這種布取名爲「三元布」。

「三元布」的問題解決了，我帶著試穿過的衣服和原布料專程去向周總理匯報。總理聽了我的簡單匯報和看了實物，他除了高興和頻頻點頭之外，立即拿來了茅臺酒向我祝賀。總理說：「三元布很好，我向你祝賀！」總理又說：「我們原來定的是，我們三人共同努力，解決軍服的問題。現在你替我解決了一個大問題，我向你們搞研究的全體人員祝賀。當年彭德懷拿著志願軍穿的破爛不堪的軍衣，就在這裏向我發了脾氣，拍了桌子。我當時祇有忍受，別無什麼可說的。今天，我們也是在這裏在這個桌子上，看到了新軍服布料問題解決了，我感謝軍隊對國務院工作的大力支持！」三元布成功了，不要多久部隊就可以穿著改革後的新軍裝了。我的心情，當然是很高興的，總後黨委個別領導人總是攻擊我「好大喜功」，這回我真要好好喜功一下了。想到部隊今後能吃得好、穿得好，我也不怕戴修正主義的帽子了。

三元布在部隊起的作用就更大了，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起到了改變總後形象的作用。從一九六七年冬開始，在不長的時間內，部隊師級以上幹部極大部分都穿上了三元布料的衣服。大家確實是很喜愛的。

中央機關的警衛部隊穿起了三元布的軍裝，毛主席、周總理都看到了。毛主席稱讚說：「這是總後勤部鼓足幹勁鼓出來的。世界上任何一件事，沒有幾分勁頭能辦得好嗎？」周總理對軍裝改革很清楚，當然是很稱讚的。李先念說：「軍隊的服裝改得好，邱會作為部隊辦了這樣一件好事，值得學習、發揚。」周總理說：「邱會作很年青的時候，我就看到他是一個很能辦事的人。他確有股子牛勁。他不輕易說話，辦不到的事，從來不說；辦得到的事，是非辦到不可。」

總起來說，三元布的搞成，從國家來說，並不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但對軍隊來說是一件大事。軍隊上至統帥，下至戰士，都是稱讚和高興的。從供應工作來說，也是提高了質量，減少了數量，又不增加經費開支。

改革物資供應

我軍的實物供應，是根據國家高度的計劃而來的，我們國家從建國以來除日用品是國家專營的商品經濟之外，其他的都是計劃經濟。生產資料全部由國家統一調撥，軍隊所需用品全部要列入國家計劃，就是普通用品，如睡覺的涼席和草墊也要列入國家計劃才能解決問題。邊防和一些特殊地區的所需物資，包括香煙，甚至火柴、食油等，都是國家統一調撥的。

軍隊所需物資都是由總後各部向國務院有關部門交涉，各部門對軍隊也是很照顧的，大體上都可以解決問題。但如果不是國家的計劃指標，有時也就不能解決問題。為了確保對軍隊的物資供應，一九六〇年一月成了總後物資計劃部，同年九月物資部一分為二，增設第二物資計劃部，專管國防科委的物資供應。從此，軍隊的物資就統一管起來了，軍隊所需物資都列入了國家計劃，年度或季度都能得到計劃指標通知書。有了指標通知書，所需物資就如同憑票供應買日用品一樣的，除特殊情況都能取到實物。

組織實物供應是比較繁雜的。為此，在物資部之下又在各大區東北、華北、華東、中南、西南、西北成立了物資局和若干供應站。軍隊的物資管理機構，對外一律稱「〇五」單位。從此，軍隊物資供應的組織工作就完成了。

軍隊物資管理系统建立起來之後，解決了如下問題：

第一，同國家計委掛上了鉤，軍隊成為國家計劃部門的固定戶頭。軍隊的物資部門可以參加國家經濟部門有關的業務活動，可以瞭解全國的經濟情況，對工作和學習都是有利的。

第二，軍隊所需物資列入了國家計劃，一般的是有保證的。這樣對軍隊的物資供應就可按計劃進行，對軍隊的供應工作，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

第三，軍隊的物資部門，經常要同各省市政府經濟部門打交道，這不僅增進了軍民關係，也能得到地方上的支援。我軍的戰備物資貯備，有很大一部分就是各省市支援的。從實踐中可以證明，在國家高度計劃經濟的條件下，軍隊必須適應這種形勢，才能保證供應。

軍隊物資供應的第二個問題是組織生產問題。

軍隊的軍需品和汽車零配件都是自己組織生產的。大型裝備，如飛機、船隻、坦克所需零配件，除部分小零件軍隊可以生產之外，其餘的都由國防工廠擔任生產。軍隊自己有幾百個軍需工廠和修理工廠，工人幾十萬，軍隊的生產工廠比當時國務院一個中型工業部所管的工廠還要多一點。

為了統一管理工廠，一九六五年總後原有的軍需生產部改為工廠管理部，統一管理軍需工廠和修理工廠，這對生產起了重要作用。軍隊的工廠是分散在全國各地的，工廠管理部直接管理工作，面過大，不利於對工廠的管理，為此，總後設在各地的工廠管理局，除對工廠實施領導之外，還要向省市辦理地方供應生產物資。

部隊的團、師和軍直屬隊，根據部隊的不同裝備，分別設有軍械、汽車修理和軍需修理所，這三種修理所，是直接為部隊裝備和生養服務的。這些修理所的生產所需的物資供應，當時還沒有統一的渠道，多數是由各業務部門用臨時的辦法供應的。

這裏要順便說一下，在六十年代中期，部隊的汽車實行小修、中修不“出門”，即由部隊汽車修理所自行修理，這對保證汽車完好率起到重要作用。一九六五年東南沿海戰備和後來援越部隊的汽車都是部隊自行修理的，在實踐中證明了是一種很好的辦法。對部隊的裝備修理一定要實行平戰結合的辦法。過去，所有裝備修理都一律送工廠，平時不經

濟，戰時不可能，部隊如果沒有一定的修理能力，就等於部隊沒有「醫生」是一樣的。在戰時，部隊裝備一律送工廠，實際上等於減少了裝備。

我軍的營房、倉庫、機場、軍港，是最大的不動產。對這些不動產，每年的維修費用是很大的。營房、機場、軍港，過去都是歸所駐部隊管理，管理機構屬部隊的編制，即部隊駐在那裏，那裏的不動產就歸部隊使用和管理，部隊調動時，管理機構隨部隊調走。這種管理制度很不合理，不僅不利於營房、機場、軍港的建設，而且部隊調動時容易發生破壞，無人修理，造成很大的浪費，這種事例，是不勝枚舉的。

從一九六〇年以後，營房、倉庫實行基地化管理，即管理機構固定化，不隨部隊調動，部隊住營房就如同住旅館，對營房祇有使用權，沒有別的權利。這種管理制度很好，是既省又好的辦法。營房實行基地化管理，又實行企業化，企業化的基本要求是管好營房、建好營區，以林業、農業、修理業為主開展生產運動。在一年至三年之內，做到營房維修部分或全部自給，這個要求有不少營區一年之內就實現了。對營房維修和營區生產所需物資，由物資部系統按計劃供應。營房管理改革後，對營房的管理加強了，比較好地解決了不動產的管理問題。

軍隊物資供應的第三個問題是發揮倉庫的作用問題。

軍隊的數以百計的倉庫，庫容量數百萬噸。但我們的倉庫過去僅僅是起到了貯備物資的作用，沒有起到供應的作用。倉庫的幹部和警衛分隊人數不少，但也是像老和尚看寺廟一樣的，祇是把倉庫的物資和庫房看住了而已，這種情況必須改革。軍隊的倉庫應當改為兵站倉庫，是物資的「兵站」，主要任務是三條：收集物資，保管物資，供應物資，這三項任務是統一的。

第一，起到了兵站的作用。平時對部隊的物資供應倉庫能夠直接送到師、團，甚至分隊。一九六二年後，對中印邊境反作戰，東南沿海戰備，援越部隊的供應都起到了這種作用，部隊的反映也很好。

第二，對物資保管進行了科學技術研究。倉庫防潮、防鏽、防腐爛是保管物資的大問題，也是世界各國都沒有很好解決的問題，我們的倉庫在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以海島儲備為例，大米、餅乾等物資都能儲備相當長的時間，解決了好大的問題。

第三、各類倉庫都建立了修理所。儲備物資需要修理的，能夠及時修理，收回來的舊品，能夠翻修，或拼湊修理都能再用。例如全軍一年單衣棉衣兩種工作服，大約需要二百萬套，極大部分都是從收回來的舊軍服修理再用的。

此外，倉庫的植樹造林，農副業生產也搞得很好，不少倉庫都成了花園，從生產收益中也改善了幹部戰士的生活。總之，把倉庫改革為兵站勤務分隊，除原有的任務之外增加了供應勤務，這對戰備將起到了極大的作用。我軍平時有幾百座倉庫，戰時就成了分佈全國各地幾百個兵站，這是最為實際的戰備建設。

改革醫療衛生

我軍的醫療衛生工作是後勤工作一個重要戰線，擔負著保障全軍指戰員健康的重要任務，我軍的衛生工作歷史悠久，並有歷史連續性，在長期的鬥爭中，形成了自己的傳統。

（一）堅持醫療衛生工作為人民服務的大方向。我軍的衛生工作人員，長期以來都堅持了為部隊服務，為人民群眾服務的大方向，並得到了戰士和群眾的喜愛和尊敬。

我軍同人民群眾有著密切的關係。衛生工作也常常起到了建立這種關係的重要作用，衛生工作在一定的條件下，常常成為聯繫群眾的工作。在戰爭年代，我軍新到之地同人民群眾的聯繫可以說有三件見面禮，這就是軍隊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助民勞動和給群眾治療疾病。在我國缺醫少藥的情況下，能夠為群眾治病，特別是治好了病，群眾就把軍隊看成救命恩人了，這種情況，在我軍歷史上是很多的。

全國解放後，我軍的衛生工作保持了自己的光榮傳統，不少部隊派出醫療隊深入農村，駐軍也注意了為群眾治病，這就出現了好多的動人故事，例如三十八軍的模範衛生科等等。邊防、海島部隊對群眾的衛生工作，比內地部隊是做得更好的，也是應當這樣做的。我軍衛生工作同人民群眾的密切關係，應當繼續發揮，代代相傳下去。

（二）堅持面向連隊，面向基層，面向海島，面向邊防的工作重點。軍隊衛生工作的重點應當放在哪裏，是放在醫院，還是放在部隊，曾經有過不同的看法。這兩種思想，在實際工作中統一起來了。我們說辦好

醫院和爲部隊服務都是重點，但服務的內容是不同的。辦好醫院是爲病人服務，而面向部隊是爲部隊服務，從總體上來說，都是爲部隊服務，也都是衛生工作的重點。

面向基層，並非把技術力量擺到連隊去，這樣理解也是不對的。面向連隊主要是兩方面的問題，一方面是加強部隊的衛生工作，做到部隊少發病；另一方面就是組織醫療力量輪流到部隊去爲部隊解決更多的問題。各軍區組織的海上醫療隊、邊防醫療隊的做法都是很好的，爲部隊解決了不少問題，受到了基層的歡迎，我們應當這樣堅持下去。

(三)加強醫院建設問題。我軍有幾百所醫院，對完成醫療任務起到了重要作用。現在我軍醫院的工作，如果以上，中、下來區分的話，就是「兩頭小，中間大」，即是很好的是少數，處下等地位的也是少數，居中間地位的是多數。根據歷史的經驗，對醫院建設要抓住三個主要問題。

第一是領導班子問題。一個醫院的領導幹部，不僅要有思想、政治工作方針，更要有實幹精神，發揚「有頭腦的事務主義」在醫院是最爲合適的。此外是技術力量問題，醫院是治病的，沒有一定的技術是不行的。當然，技術的高低是相對的，但不管怎麼樣，要注意技術力量的建設是肯定的，不注意技術力量建設，就是對自己的事業不負責任。

第二是反對空頭政治。曾經有一種很不正確的提法就是在知識分子中批判「白專道路」；在一般的技術人員中批判「單純技術觀點」。這兩種提法都是錯誤的，應當徹底糾正的，技術人員應當政治掛帥，但技術人員的帥旗應當掛在會治病上，除此之外的帥旗都是空頭政治。我這個人參加革命以後一半時間是搞政治工作的，我主張政治掛帥，但我又堅決反對空頭政治，空頭政治是害人誤事的。我主張技術人員要認真學習技術，現在我們部隊的衛生人員中有各種各樣的小專家，在治病方面能夠解決很多的問題，這是非常好的，應當發揚推廣。

第三是護士問題。一個醫院管理得好壞，護士是起重要作用的。我的看法：在治療方面護士是「戰士」，在醫院管理方面是「衛士」，護士在醫院是有重要作用的。在護士中還存在各種各樣的問題，我們應當繼續解決那些問題。

總起來說，衛生工作成功的經驗就是：加強領導，預防為主，大搞群眾運動。我們應當把我軍衛生工作的光榮傳統，發揚光大，更好的爲部隊服務。

改革財務管理

全國解放後，我軍進入現代化建設新的階段之後，在後勤中突出的矛盾就是財務管理問題。這個問題與我軍的歷史有關，我軍歷來都過的窮生活，所以領導幹部對錢對物都看得很重的，在戰爭年代，我軍皆大喜歡的是兩件大事：打勝仗，有繳獲。

過去，我軍上下之間的矛盾，表現在後勤工作中就是調錢、調物。上面調東西，下面必須服從，否則就是本位主義。在解放前，我軍都是在不同的範圍之內自籌自給解決自己的供應，部隊的生活情況根本不一樣，苦樂不均都是經常的現象，部隊搞本位主義，「打埋伏」早就有之，是歷史的產物。在我軍的歷史上對本位主義似乎不在乎，掛在嘴上經常檢討總也改不了，可以說，我軍沒有本位主義的領導幹部是少有的。這種本位主義是爲了本單位的工作著想的本位主義，我自己也犯過不少本位主義。

全國解放後，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按照財務法規各種經費開支都是「一個蘿蔔一個坑」，沒有可機動的。各大軍區和軍兵種，領導幹部能夠批條子也就是爲數很少的預備費。軍區、軍兵種首長，過去對花錢都是「說話算數，批條子有效」的，現在不行了，他們能舒服嗎？這是不可能的。新的矛盾就是一個財權的問題。

一九五九年秋天，軍委舉行擴大會議的期間，一天下午散會後，幾個軍區領導把我拉去共進晚餐，他們半真半假半開玩笑地把我圍攻了一頓。他們說：「你是老政治委員，現在當了總後部長，能政治多點，制度少點嗎？」我說：「要政治也要制度。你們也知道，沒有規矩能成方圓嗎？」他們說：「方圓！我們祇有兵權，沒有財權，你知道嗎？」我說：「你們不是都有自己後勤部，怎麼沒有財權？」「我們的後勤部，是你們總後派來的大使館，我們怎能管得了。我們今天是向你提意見，你聽不進去，我們爲了要開支就給你發電報，一個不行就天天發一個，這樣的權利總有吧？」我是初上任的總後部長，那天大家提出的那些問題是給我上了一堂

很生動、很實際的大課，我認爲他們向我提的那些意見，是反映了我軍的歷史情況的。

總後部長難當，我感到最頭痛的就是兩方面的問題。一方面是各軍區首長一見到我，不是諷刺就是挨罵，一句好話也沒有。另一方面，天天電報很多，都是用錢、吃飯、穿衣服的問題。經過一段時間工作之後，我感到自己不是當總後部長，是在爲軍區軍兵種首長當管理員，大事小事都得辦。這種情況，是管理制度造成的，讓大家牽著鼻子走，我想應該把這種情況顛倒過來，不僅不要讓別人牽著鼻子走，還要手執鞭子把別人趕著走。這就是我考慮財務改革的直接原因。

在財務管理上，我總是感到有問題，但病症在哪裏？出路就是調查研究，向實際學習。對總後具體業務，我是「半瓶子醋」都不夠，總後機關幹部對我的反映是「講道理可以，掐手指、算細賬還要學」。爲了得到真正的知識，我決心向軍區軍兵種首長學習，向部隊後勤部長、處長學習。在瞭解到一定情況之後，再向財務幹部學習，並展開調查研究。部隊的領導同志說：「部隊是執行財務制度的機器，沒有辦法，有困難就寫報告。並不能發揚大家的積極性。要是把錢交給我們管，也並不一定就管不好。」部隊的後勤幹部說：「我軍的後勤財務、物資管理存在的共同問題，都是從蘇軍進口的。要改變就不是修修補補的問題，是要開刀的問題。」

我也閱讀了一些有關財務管理方面的文件、資料。我得出的初步看法是：我軍財務工作最大的問題是財權和軍政首長的領導權分離，黨委和首長對後勤工作有職有權是根本問題，後勤財務工作也應符合黨委集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分責制。總後的鼻子上安了很多的繩子，讓別人牽著走。部隊除了牽鼻子之外，是沒有別的辦法，我們確實把業務工作管死了。

經過調查研究，瞭解到我軍財務制度的一些具體情況：

(一) 財務管理制度，基本上是定額開支。從小定額到大定額都有，這些定額都不是根據消耗得出來的定額，而是習慣性的。

(二) 祇有大定額沒有小定額的開支。

(三) 小定額無約束力的定額開支。例如旅差費就是這種開支。旅差費如同辦公費也是按照機關等級規定定額的。規定了出差人的坐車等

級，伙食補助標準等，這種標準並非是計算定額開支的根據。例如一個團可以是十人次出差，也可以是五十人次出差，出差人數之多少，並不一定影響定額規定。為什麼旅差費是超支最多的費用？這也是從財務管理制度而來的。這種費用祇規定了出差人員的待遇，並沒有規定出差人數，各單位祇是考慮工作上的需要派人出差，並不考慮開支的問題。但是，如果既規定出差人員的待遇，又規定旅差費定額，同時還要規定旅差費節省歸單位轉為下年度使用，這樣，就可基本不超支，甚至還可以有節餘。

(四)在年終為什麼會出現突擊花錢，這也是從財務管理制度而來的。在制度規定上，行政費年終節餘要上交，在這種情況下，上交和花了都一樣，但與單位的利益聯繫起來，還是花了為好。如果在制度規定上，節餘可以歸單位所有，轉為下年度使用，極大可能就不會突擊花了。

根據對上面分析，財務制度存在的問題，是從「科學」管理而來的，但科學的進程總是有時代性的，超前的科學是行不通的，後勤工作在一個歷史時期內最科學的制度就是「馬虎」(實行包干，大錢嚴管，具體不要握的太細)。

實行財務包干制。經費是分配的基礎，制度是分配的方法。在經費不足的情況下，越實行過細的制度越感到不夠，實行包干的「切塊」制度反而可以解決問題，這樣就可以實行大家有權大家負責，全軍辦後勤，不會把困難集中在總後勤部這一點上。

實行包干制的辦法很簡單，主要是三個問題。

(一)把經費分為實報實銷和包干報銷兩大類。人員生活費，牲口飼養費，戰備費為一類；各種行政、專業費為一類。第二類，科目繁多，但可以歸並為三大項：行政費，事業費，臨時費。這些費用，除臨時費沒有定額規定之外，其餘都有規定，規定本身就是報銷的依據。

(二)由總後勤部到團一級，實行層層包干。機關和院校怎樣包干法，由各大單位自行規定，但絕對不許可把經費按人頭分配到科處室和個人手上。

(三)實行包干的經費，節餘歸單位轉為下年開支，絕對不許可把節省費用分給個人。在一個單位之內，各種經費可以調劑使用。在一般情況下，超支經費不予報銷。

包干制是財務管理的一種方法，與供應標準不可混爲一談。例如，人員旅差的乘車標準和旅差費都要按標準執行，不可因爲旅差費包干了，就任意隨便開支。如果因爲經費包干了就隨便開支，是違犯財經紀律的，是要受到法紀處罰的。

包干制是一九六四年從旅差費開始的，然後才普及到其他各種費用。包干制的優點，我在這裏不再多說，但我記得一點是：大大地節約了開支。我還記得一九六四年瀋陽軍區節約的數字是可觀的。

實行包干制以後的報銷方法，很多費用都可以改爲以領代報。一九六一年林總去廣東汕頭視察工作，回程到惠陽四十二軍軍部，同軍的首長談到要減少連隊的繁瑣工作時，專門談到了減輕司務長的工作。他隨即用鉛筆劃了一張連隊司務長「以領代報」的報銷表。我看到過那張表，是鉛筆劃的，線條很粗。林總是我軍唯一從排長、連長逐級提拔起來的元帥。他是很熟悉連隊的。他能劃出一張這樣的表，正是對基層工作的總結。

經過前後將近半年的時間，對改革財務管理制度心裏有了一些底。我把財務改革的問題準備就緒之後，最初接觸的就是當時的財務部長湯平。他由於沒有思想準備，我們的談話，使他震驚不小。我們連續談了三個晚上，第一個晚上，他不說話，表現心情沉重。第二個晚上，他向我問了好多問題我都一一給了答覆。第三個晚上，他面帶笑容說話了。湯平說了三點。一、他很慚愧，過去我批評財務部就是「數字部」，今天才真正接受；二、他對我提出的財務改革，全部佩服，並稱讚我是管錢的高手；三、他完全站在我一邊，並承擔改革的全部具體工作。我們之間有了共同語言了。經過他向財務部進行動員，大家認識一致了，領導財務改革的力量加強了。

我把財務戰線上的工作做好之後，就向總後的領導幹部做工作了。對財務改革的問題，遇到了一些人的強烈抵制，他們提出的理由是：我軍從來沒有實行過什麼包干制；現行的財務管理制度，是他們制定的，不能改；要是搞財務包干，他們就沒有什麼工作可做了。對財務改革的問題，在總後機關鬧得很熱鬧，正確的東西，總是越辯越清楚，經過各種方式做工作之後，特別是湯平同志以當事者的身份發言，各方面的思想都基本統一了，財務包干制定下來了。

一九六五年一月，全軍後勤工作會議的主要內容之一，就是討論財務包干制。這個制度一出臺，就得到了各軍區各軍兵種後勤部長的熱烈擁護，大家一致贊同財務包干制。在討論中，大家一致認為：財務包干制，不僅解決了財務管理本身的問題，而且解決了後勤工作同各方面的關係問題，特別解決了各級後勤同同級黨委和首長的關係問題。這個制度適應我軍黨委集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

軍政首長對財務包干制是喜多憂少。他們說：「財務包干制，是把責任交給我們了，我們要把事辦好。過去，沒有錢可以寫報告，今後寫報告也難辦了。」有的也說：「財務包干就是把困難下放，我們當然祇有把困難承擔起來。比較起來，這樣辦比過去辦法還好些，我們主動了，困難是可以克服的。」

總的說起來，財務包干制是成功的。我對後勤工作得出了三條主要經驗，第一條要有黨委的真正領導；第二條要有全軍領導幹部的熱情支持；第三條要把改善戰士生活成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屬點。這三條歸結到一點就是：全軍辦後勤。

第十八章 軍隊農副業生產

三年災害對軍隊的影響

一九五九年開始，全國連續三年發生了嚴重的自然災害。對災情可能給部隊帶來的危害和影響我是特別警惕，力求防止軍隊餓肚子，發生浮腫病，在困難的時候要特別注意保持軍隊的戰鬥力。軍隊搞農副業生產，就是在這個背景下發展起來的。

我參加過全國救災的領導工作，對這次遍及全國的自然災害，從局部到全國的情況，都有所瞭解。農村是天災人禍都有，兩者是夾在一起的，自然災害是基本的，由於工作做得不好，沒有及時有效救災，以至發生災上加災。

這裏，我不去說災害的一般情況，祇說周總理要我處理的有關災情的幾件事，就可見一斑了，我舉三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廣西餓死人的情況。一九四九年我是率領四十五軍參加解放廣西的，在廣西剿匪的整個戰役中，我又同他們一起工作了一年多時間。一九六〇年五月間廣西橫縣的駐軍給我發了一個電報，稱政府機關因飢餓不能工作了，要求借軍糧幾萬斤，我特將電報呈周總理批示，爲了掌握第一手材料，總理讓我親自秘密去看一下。

我是直接到廣西貴縣由駐軍派車到橫縣去的，在隨行卡車上帶有數千斤糧食。我到達橫縣時，正是群眾做晚飯的時候，但所看到的情況是有些淒涼，家裏冒煙的都很少。我見到縣委書記的時候，他躺在床上是有些淒涼，家裏冒煙的都很少。我見到縣委書記的時候，他躺在床上起不來了，祇是有氣無力地向我作揖流淚，他祇伸出四個手指，意思是四五天沒有吃飯了。我立即要人去車上搬下糧食，熬了兩三鍋稀飯，並端給他們每人一碗。多數人喝了稀飯之後不久，就能坐起來說話了。

由於周總理交代，我是秘密去的，不同自治區黨委聯繫，也不公開露面，祇是親眼看一下情況。第二天，縣委書記的身體繼續好轉，我同駐軍的師政委和縣委書記三人到城外附近的各村莊看了一下。幾乎村村都有餓死人的，每家每戶家裏都有病人，大家吃的多數都是青菜葉、樹葉，一粒米也看不到。我問：「你們家的糧食哪裏去了？」他們回答說：「我們家裏就沒有放過糧食，收到的糧食都交給食堂，大家早都吃完了。」我們又問：「現在食堂還管飯嗎？」回答說：「要有人管飯，就不會餓成這個樣子了。」

當天的晚上，縣委書記和其他幾個幹部同我們談了全縣的災荒情況。他們說：根據現在已經知道的情況，全縣餓死的人，大約在一千人左右，但是每天都還在死人，數字很難掌握得準確。我問縣委書記，你們為什麼不報告，不想辦法搞糧救災，連黨政機關都餓死人了！縣委書記以沉重的心情說，我們縣是一九五八年的「衛星縣」，宣佈糧食增產一倍，一年產的糧食夠三年吃，其實根本沒有那回事。另外在食堂集體吃飯，無計劃、無節制，今年的春節期間就把糧食吃完了，食堂也垮掉了。上面不准我們報災情，說是要保護「衛星縣」的名譽；全縣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生產隊確實是豐產了，豐收的生產隊現在都戒備森嚴，不准向外運糧食，爲了糧食的問題，已經有些生產隊之間進行械鬥，根本不會互救。

我們向縣委書記提出：應當立即向地委如實報告災情，不要再保留「衛星縣」的虛名了，否則就要犯大罪了。由於我的目的是瞭解情況，第三天就回北京去了。

第二個例子，一九六一年冬，空軍作爲一個社情，報告了甘肅河西走廊玉門地區的災情很嚴重。周總理又叫我立即去看一下，並當面交代由軍糧撥出五萬斤，調幾臺汽車，把糧食直接送到村子裏去。總理說：「爭取時間，實行緊急救災，把口糧早一天送到，就要少死好多人。」我把周總理的命令直接下到兵站去了，並要他們星夜兼程把糧食送到安西敦煌去，由汽車團派副團長帶隊，在二十四小時以內就到達了指定地區。對此，周總理非常滿意。

玉門、酒泉地區發生了這樣嚴重的災情，死人估計上萬。對此，甘肅省委一個字的報告也沒有，周總理追問也回答不出一個所以然。總理是不愛生氣的人也生氣了，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周總理向毛主席作了

比較詳細的報告，毛主席立即調省委書記到北京，向中央報告全省的災情，爲了此事，張仲良也就下臺了。

第三個例子，國務院直接發放鋤草糧。一九六二年吉林省進入夏鋤的時候，祇鋤完了第一遍草，第二遍就不能進行了。因爲農民沒有口糧，必須自己上山下河採野食，度過災荒。在周總理的辦公室，吉林就有人提出，如果能供給一千萬斤糧食，全省主要產糧區，鋤第二遍草，有的鋤第三遍，今年可增產糧食十億斤以上，這是一個公私都有利的大事。

對吉林提出的問題，在會上周總理沉思沒有輕易表態。過了一會兒總理對著我說：「會作呀，怎麼辦？有辦法嗎？」我瞭解總理處理問題方法，如果他對我不是胸有成竹，就不會向軍隊開口的。我對總理的問話立即回答說：「軍隊借出一千萬斤糧食，但在秋後要歸還，這樣就完全不影響軍隊的供應。」

我的幾句話，周總理立即轉憂爲喜，並連說：「好，好！總後對國務院是很大的支持。」吉林的同志聽到我的話，尤其聽到總理同意向軍隊借糧的話高興的簡直要跳起來！問題解決了。周總理指示給到會的人，每人上了一包餅乾，一碗湯麵條，大家都吃了晚餐才散會。

黑龍江知道吉林經周總理批准，向軍隊借到了糧食，他們也找到國務院去了。周總理批准，也借給該省部分糧食，兩省的夏鋤沒有吃的問題都解決了。

在三年災害的時候，我參加周總理主持的救災工作祇是部分的。我認爲用舉例的辦法來說明情況，比抽象的總結能夠比較好的說明問題。

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一年的人禍天災，是全國性的，總的情況是北方嚴重些，南方稍微好些。災情並非全國一律「赤地千里」，那爲什麼抗災能力這樣差？主要是由兩股風造成的，一股是浮誇風，一股是本位風，除這兩股風之外，也還有工作上的問題。

浮誇風害死人。一九五八年，我們國家農業確實是豐收了，是解放以來最好的年成。那麼糧食又哪裏去了？去路主要是三條：一是沒有收起來，地裏糧食長得好，但是顆粒還家之類的口號連說都沒有人說了，頭腦發熱，認爲糧食吃不了，據事後推算，全國掉在地裏的糧食平均在四分之一以上；二是敞開吃吃掉了，當時全國很多地方都吃食堂，都放開肚

皮吃飯，一般的要比在家多吃二分之一以上；三是飼料糧過多，用糧食餵豬，喂大牲口，是普遍現象，家禽則根本不愁沒有吃的，這三條都是「人禍」問題了。

一九五八年全國糧食產量究竟多少，這是神仙也說不清楚的問題。從中央到公社的會計都是「豐收」二字。一九五九年全國糧食就減產了，但究竟減到什麼程度，也是神仙都說不清楚的問題，浮誇風、假話風害死人。

本位主義害死人。在一個省，一個縣之內，對於缺糧情況，如果能及時調劑，近水可救火，可以解決很大問題。但在「恐糧病」的情況，要調劑糧食實在是太難了，極大多數地方則根本不可能辦到。

除「兩股風」之外，還有工作上的問題，例如存糧情況究竟怎樣？很難搞得清楚。又如運輸條件也是很大的問題，農村有糧要運到鐵路線是很困難的。當時，不少農村連公路都沒有，人力運輸往返消耗的數量就很大，北方有糧運不出來，南方可調劑一些糧食也存在運輸困難的問題。

由於自然災害的影響，從一九六〇年春起，部隊生活開始緊張了。憑證領不到東西，已經習慣按供應標準過日子，突然來個不能保證供給，對我軍是個致命的問題。這就是自然災害對軍隊影響的實質問題。

三年災害對我軍的影響，由雜糧代替細糧，憑票買不到東西，有錢買不到蔬菜成了普遍的問題。部隊報告很多例子，但誰也提不出怎樣解決問題。這裏我回憶三個例子，來說明當時部隊生活的緊張程度。

地瓜乾。一九六一年夏天駐山東的部隊，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吃地瓜乾，有時一個星期也領不到一顆糧食，這種地瓜乾又是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存下來的，原來根本不是當口糧的，而是做豬飼料，多數都是有霉點的，吃這種地瓜苦得難以下嚥。膠東還是山東比較好的地方，部隊都得不到糧食供應，駐該省其他地方的部隊就更困難了。

雜質面。一九六一年秋駐河南周口的部隊吃的麵粉，有百分之三十以上都有雜質，樹葉、草、麥桿等都有。這種面就像麥麩子拌乾草喂牲口吃的細料差不多，河南周口是比較好的地方，對部隊供應的糧食都是如此之差，駐其他地方部隊吃的糧食就可想而知了。

砂子米。一九六一年駐四川綿陽部隊吃的大米有百分之二十以上的稻殼，砂子，泥土等，駐在天府之國的部隊都吃這樣的糧食，真是令人不可想像的事。

這裏回憶的三個例子，是我親自在部隊看到的，同部隊一起吃過這種糧食做的飯。這樣做是糧食不夠充數而爲的，部隊的糧食定量每人每天一斤半，除去不能吃的東西，每天每人真正下肚的糧食也就是一斤多一點。戰士都是二十左右的年青人，見天吃這種飯能行嗎？糧不夠瓜菜代，當然是出路，但部隊哪有瓜菜？

部隊除了乾巴巴地吃一斤多糧食之外，蔬菜，肉食，食油都沒有，多數部隊一年也嘗不到幾次肉味。自己沒有生產，憑票證領不到東西，這種生活不能長期下去。軍隊困難，國家也困難，看到總理那憂慮、疲憊的面孔，向國家要糧我是張不開口的，爲了不「自取滅亡」，必須自己動手解決問題。

生產渡荒

自然災害對軍隊的影響確是嚴重的。怎樣辦？出路祇有一條，就是軍隊自己動手搞農副業生產渡過災荒。軍隊現在搞生產，同一九四二年延安的軍隊搞大生產，時代背景是不同的，但也有共同點，都是逼出來的。延安搞生產是國民黨對邊區的封鎖，沒有飯吃逼出來的，現在搞生產是自然災害逼出來，不管願意不願意，搞生產這座「梁山」是非上不可的。

對軍隊一定要走生產渡荒的道路，多數領導幹部的認識過程是比較長。因此，軍隊搞生產的阻力是很大的。以我的記憶，軍隊對搞生產是經一九六〇年和一九六一年兩年的時間才逐漸統一起來。

阻力之一是軍隊搞生產會衝擊突出政治。一九六〇年冬，快要過元旦的時候，軍委舉行常委會，羅瑞卿向常委匯報了全國的災情和經濟形勢。最後，羅瑞卿說：「災情對軍隊供應影響不小，請邱會作同志說一下這方面的問題。」

我非常珍視這一發言機會，不誇大也不縮小，如實地把軍隊的供應情況，發表了意見。我說：「軍隊還是按照標準供應，但地方並不能保證供應。有的地方供應的糧食，一半以上是地瓜乾，有的地方糧食很不

好，個別地方無糧供應，憑證買不到肉食和食油，蔬菜也很難買到。全國的供應情況都不好，部隊生活比較緊張。」

賀龍元帥主持會議，他對著我說：「邱部長，怎麼辦呀？我相信你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你說說這方面的問題。」我立即回答說：「自己動手搞生產，別無他法。」我的話音一落，主管軍隊政治教育的總政副主任劉志堅說：「歷史上的教訓值得注意。林總提出的突出政治的建軍路線在部隊剛形成勢頭，又要去搞生產？這是值得注意的問題。軍隊的供應，當然是重要的，這就不能向國務院提出來解決問題嗎？軍隊搞生產是牽動建軍方針的問題。」對劉志堅的意見，我祇說了一句：「戰士的肚皮最重要。」在當時的情況下，劉的意見是很吃得開的，會場上，對我和劉的意見都無人表態，我心裏想：這可給軍委出了一個難題。這時羅瑞卿用請示的語氣向賀帥說：「我的意見，由邱部長起草用軍委名義向總理寫個報告，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賀點頭同意羅的意見。在這次會議上，我有意不把問題提的過於尖銳，否則阻力會越來越大，不利於解決問題。因此，這次的軍委常委會上，對部隊搞生產沒有解決任何問題。

阻力之二是軍隊搞生產會妨礙軍事訓練。一九六〇年夏天，駐膠東部隊要搞一個月的游泳訓練，要求每人每天補助訓練糧一斤，看到這個報告之後，我認為這是解決軍隊搞生產會衝擊軍事訓練的突破口。

針對濟南軍區的報告，我起草了一份復電：「同意給游泳訓練部隊每人每天補助訓練糧一斤，由總後發給糧票。希望你們同山東省特別交涉，以求得到供應現糧」。電報是用總參、總後的名義起草的，我把來電和復電一起送給羅總長了。羅批示：提交軍委辦公會議討論，第二天軍委辦公會議開會，羅總長一進門尚未坐下就對主管軍事訓練的副總長張宗遜說：「宗遜，全國到處都餓死人，游泳訓練還要增定量呀？」張宗遜說：「可以考慮不訓了！」羅總長對著我說：「老邱，有辦法吧？」我說：「我沒辦法。請總長決定！」羅瑞卿：「你是沒辦法的人嗎？周總理說你是最有辦法的人之一。你不是向總理提議，全國基本建設，不分大小，一律『剃光頭』？」

接著羅總長用一種比較溫和的語氣說：我國的災情確實是預料之外的嚴重。在平常的時候，補助訓練糧的問題，邱部長早就處理了，不會

送到我這裏來的。我看訓練照樣進行，可以改每天訓練半天，以保持體力，另外，用多餘的時間，部隊自己動手搞代食品，以補助糧食不足。

在當時的情況下，這是最好的處理辦法。我心裏感到高興，部隊生產會妨礙軍事訓練的阻力，事實上就衝破了！

阻力之三是部隊不願意搞生產。一九四九年我軍南下時，中央曾經提出：人民解放軍是戰鬥隊，工作隊，生產隊。但對生產隊的問題，我軍從來也沒有進行過教育，其實，我軍祇有不願意搞生產的領導幹部，不可能有不願意搞生產的部隊。部隊不願意搞生產的問題，完全可以通過教育，把生產同部隊的切身利益結合起來解決問題，這樣問題是容易解決的。對怎樣解決部隊渡過災荒的問題，我認為從自己這個總後勤部長的職責來說，不僅要向中央軍委報告情況，而且要提出解決問題的積極辦法來。我自己下定決心，要做一個稱職的總後勤部長，要認真解決部隊的生活，要拿出魄力來進行鬥爭。

於是，一九六一年一月間，我在河北、遼寧西部、冀東、天津地區走了好多的部隊，並在天津的一個團蹲下來了。經過調查研究，向軍委寫了簡要報告，並代軍委起草了一個文件，於二月間，春節除夕之夜回到北京，並在當晚就把文件送給羅總長了。向軍委的報告，我主要寫了部隊供應的嚴重情況和部隊一定要自己動手搞生產的建議。在報告中指出：我親自看了一下駐石家莊、錦州、冀東、天津部隊的供應情況，一、糧食還可以按標準供應，但雜糧多；二、肉食和食油停止了供應的時間至少在三個月以上；三、蔬菜根本買不到。這次我在河北，遼寧都同地方政府商量過對部隊供應的問題，也親自去各地糧庫看了一下，糧庫基本上都是空的。用錢買不到任何東西是普遍的問題，省、地、縣的幹部都說：軍民是一家人，我們從良心上、責任上都要負責軍隊的供應，但又是實在沒有辦法了。

我代軍委起草的電文之中指出：部隊的供應出現嚴重的問題情況，政府對部隊按照標準供應都不能保證。在全國災情嚴重的情況下，軍隊也絕對不能向地方政府提任何額外要求，軍隊祇有自己動手搞生產來保證自己的供應，我們一定要用生產來解決自己的問題，以保證部隊的戰鬥力。今年開春在即，各部隊要立即佈置搞生產，把政治教育、軍事訓練、農副業生產三者都安排好。各部隊的農副業生產，從自己當地的條

件出發，以種菜、養豬，小規模種糧開始。全軍各級黨委要從思想上、工作上真正認識到軍隊搞生產的重大意義。

我的調查報告和代軍委起草的電文送上去之後，我預料到在春節四天假期之內是不可能開會討論的，這樣大的問題，羅一個人也不會批發的。但到了春節後第五天、第六天還沒有討論，我著急了。我在電話上詢問蕭向榮，他說：「值班秘書作為急件，放在急辦的夾子之內，已經一個星期了，羅總長還沒有看。」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於春節後的第七天，我派人搭乘空軍的飛機把文件送到廣州林總那裏去了，林彪當時在廣州。當天晚上，林總直接同我通了電話，他在電話上對我說：「送來的文件收到，你的報告和起草的電文都很好。你抓住了大問題。軍委明天開常委會，你的報告會批准的。」這下我心中有數了，我心裏十分高興！

春節後的第八天，軍委舉行常委會專門討論軍隊搞生產問題，即討論我提出的報告和建議。羅總長走進會場特意看了我一眼，我即想到可能是我把文件報到林總那裏去，引起了他的不高興。會議開始時，各位元帥在發言中都一致同意我的報告和起草的電文，發言的多數人也說到了，軍隊自己搞生產是唯一的出路，邱會作同志很好地抓住了大問題。羅總長並沒有問到會的人還有什麼意見，就宣佈：「邱會作起草的報告和電文壓在我這裏好幾天了，耽誤了時間，由我負責。」同時就宣佈散會。

會議之後，羅把我留下來談了兩個問題。首先，羅問：「你同林總打電話，還談到什麼問題嗎？」我回答說：「沒有。林總祇是說，要我不要過於著急，我的報告會得到批准的。」接著我又說，林總在電話上說：「我的報告和代軍委起草的電文都是很好的，所提辦法也很好，抓住了解決困難的大問題。」此時，羅的表情有些喜悅了。羅接著又說：「林總在電話上，同你說過的話，也同我說了。此外，林總還同我說了一句可能沒有同你說的話，要我重視你的意見。這幾個月來，我們合作得很好嘛。」我祇回答了一句話：「我堅決服從羅總長的領導！」

羅又問：「你發了一個什麼通報？楊勇打電話說，你提出了人吃稻草的辦法。」我回答說：「吃稻草，言過其實，我發了通報，可以在稻草上提取澱粉。」今年一月初，我在天津一個團裏同他們交談搞代食品時，有人提出了在稻草提取澱粉的意見。首先，將稻草用械具砸碎，泡到水裏兩天草粉就可以分離出來。每百斤稻草可以出七斤粗粉。我說：「這個方法

可以。長征路上我們也從草裏提取過澱粉。」說完我叫人把提取的澱粉煮成糊糊，我帶頭吃了幾大口。

接著我就簡單說了一下，我去天津觀看稻草提取澱粉的情況。聽後羅總長笑了起來，並說：「大家一起努力，就是對我的工作最大支持。應當告訴全軍部隊都要因地制宜注意搞代食品，做到能吃飽肚子。當然，在吃的時候，要特別注意防止中毒。」我把羅的指示轉發了全軍。

軍委關於搞農副業生產的電文發出之後，對搞生產就算「立法」了，我們的工作也「註冊」了，這解決了一個好大的問題，可以說是救了幾百萬軍隊的大問題。各軍區，各軍兵種接到軍隊搞生產的電文之後，都向軍委發了擁護搞生產的表態性報告。

對軍隊搞生產，我的指導思想是：搞生產是我軍的光榮傳統之一，這不是課餘的副業，應當是軍隊的任務，是堂堂正正的正業。後勤機關應當做好搞生產的組織工作，更多做實事，力爭做出成績來。

軍隊生產以「副」業起家

縱觀軍隊搞農副業生產的歷史，就是一部鬥爭的歷史，全軍的生產是在鬥爭中發展起來的。

從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一年的時間裏，軍隊生產是搞農副業生產，可以稱之為以「副」業起家。這是生產的第一階段。一九六一年，軍委發出了電文指示，全軍都要執行農副業生產，生產時間由部隊自己安排，但主要的是在操課之外的時間進行。生產項目以種菜、養豬為主，以求得迅速解決部隊的副食供應，切實解決長期不見「油水」的生活。

軍隊搞生產，對後勤工作是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其特點是：後勤工作成了國家經濟工作的一部分，要以經濟工作的方法來管理後勤工作。在這一新的歷史時期，全體後勤人員的主要任務，是學會做經濟工作，在當前我們就要通過領導組織全軍生產的實踐，來提高我們的思想認識和辦事能力。軍隊搞生產，後勤部門的主要任務是什麼？就是當好參謀，負起責任。這就是說軍隊生產是部隊的行動，其決定權是屬於各部隊黨委和首長，但決定之後，主辦是後勤，責任也落到後勤了。

當時，我向全軍後勤人員提出：鼓足幹勁，負起責任，深入實際，總結經驗，把生產搞好。我們一定要發揚我軍後勤工作的光榮傳統，實

獻我們聰明才智，爲全軍渡過災荒努力奮鬥。在軍委搞生產的統一號令之下，全軍都行動起來了。同長征過草地一樣的，千軍萬馬自己動手搞飯吃。第一，全軍大搞代食品，以解決迫切的不夠吃的問題。搞代食品，是動手即可獲益的勞動，對這種比較容易搞，可以解決迫切問題的勞動，部隊是喜歡搞的，如搞木耳和蘑菇。第二，全軍大搞種菜養豬。第三，部隊的農場生產。全軍除了業餘生產之外，也注意到了農場的生產問題，當時，部隊都稱之爲大生產。

連隊業餘生產搞起來之後，從一九六一年夏季開始部隊填飽肚子就基本上解決了問題。特別是秋收之後，基本上解決了吃不飽的問題。這是一個很大的勝利，不僅改善了部隊的生活，也解決了繼續生產的積極性問題。但是隨著生產的發展，各種問題也出來了，主要對搞生產有臨時觀點。

對軍隊的生產有兩個前途：穩步發展起來，成爲軍隊的財富；逐步下降，慢慢取消了。我們爭取第一個前途。這主要靠軍委決策的力量，減少空頭政治阻礙的力量，加強後勤部門組織領導的力量。軍委內部對搞生產都是支持的，但當時空喊「突出政治」的口號喊得也很響。「突出政治」和「空頭政治」完全是兩回事，減少空頭政治的阻力，是最嚴重的問題，搞空頭政治在我軍是不可估計的力量，這種力量是由人的因素決定的，有些人把「突出政治」提高到了建軍路線的高度，突出空頭政治也有強大的組織力量，因此突出空頭政治是整人的手段。我軍的政治工作，有提高人的思想覺悟的好傳統，也有整人的壞傳統，有的人對突出空頭政治祇要眨個眼，搖個頭，都有大禍臨頭，甚至滅頂之災的可能，這是極大多數人不敢碰的禁區。但從當時的情況來看，空頭政治壓倒生產的可能性不是很大的，另外，部隊對搞空頭政治並不感興趣，相比之下願意搞生產。

至於我個人，對搞生產是決心負責到底的，在搞生產的問題上，同空頭政治鬥爭，不怕挨整。軍隊搞生產之後，專講空話的空氣有些變化，這種變化的基本情況是，突出政治要落到實處的講法多起來了。這裏，我不泛泛的談論這個問題，祇談還記得起來的兩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是某軍舉行軍生產會議，請軍政治部主任去講話。軍政治部主任說：搞生產是兩條建軍路線的尖銳鬥爭，搞生產比單純軍事觀點

還嚴重，優裕的物質生活是修正主義的溫床。大家當場反擊了軍政治部主任的講話，指出他的講話不僅是反對生產的問題，而且是把矛頭向上的問題，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某主任當面下不了臺。

第二個例子，步兵某團有四個連的部隊在西南邊境農場搞生產。團政治處主任公開號召突出政治要落實到搞好生產上，生產開始之時，他在動員會上說：「生產部隊要堅持突出政治，這是根本問題。突出政治的目的就是爲了落實到完成生產任務上去，如果不是這樣，我們突出政治就沒有目的了。」這個政治處主任被別人打了小報告，接著也就以「深造」爲由調去上學了。

總政治部某些人，創造的空頭政治特點是：爲政治而政治，會講空話就是一切，目的是沒有的。他們極力迴避政治的真實含義。他們從來不會說，突出政治要落實到戰鬥、工作、生產中去的。政治工作是我軍的光榮傳統，搞空頭政治的人，正是舉著這面大旗做虎皮，在裝腔作勢嚇唬人。

軍隊生產以「自」業傳家

軍隊的農副業生產，從一九六四年以後就轉爲搞生產基本建設爲主了。從一九六一年開始，祇要把這些家產建設得好，就可以代代相傳。

軍隊有大量的農場。這些大小不等的農場，有數以千計，耕地面積可能有五百萬畝。凡是比較大型的農場，都是自己新建的，例如廣東汕頭牛田洋農場是圍海的。

軍隊凡是條件比較好的農場，都建設得比較好。第一，對農場都下了大功夫搞農田基本建設。土地平整，道路和收割場地等都配套齊全，基本上實現了田園化。第二，水利灌溉條件比較好。第三，基本上實行了機械化。這種農場，一年祇有播種（插秧），鋤草，收割三個季節需要比較多的勞動力，平時祇需少數人管理就行了。建設好了的農場所需勞動力是越來越少了。

連隊的生產建設是以保證自己的生活進行建設的。全軍極大多數連隊都有了一塊菜地，一個豬圈，一個作坊。這裏簡要回憶我自己親自去看過的幾個連隊，就可以看到全軍的一般情況了。

(一)遼寧南部的一個連隊。一九六四年十月間，我們進到連隊之後，我就信步走進了連隊的伙房。進去之後，真是使我大吃一驚！伙房的貯藏室，不僅米面滿缸，食油滿桶，雞蛋一大筐子，豬肉一大盆，各種蔬菜應有盡有。不到一個小時，就給我們開飯了，那天是週末，連隊改善伙食，主食是烙餅和麵條，副食有一大盆豬肉炒辣子，一大盆炒雞蛋，一大盆炒蔬菜，一大盆豆腐燉西紅柿，我們根本吃不完。他們還想挖一個小魚塘，養上魚生活就更豐富了。

(二)海南島一個海防連隊。這個島離榆林港大約祇有十海里，駐在島上的部隊是以任務定編的，全連不足百人。部隊因地制宜搞生產，雞、羊完全各自吃野食，自生自長，要吃雞蛋，上山隨便拾就是了，石巖裏、路旁邊隨地都是雞蛋。想吃雞等晚上，拿著手電筒去捉，用手電一照雞就不動了，要大要小隨便挑選就是了。羊群更有意思，戰士們祇要發出一種哨子音，全島的羊都全自動「集合點名」，到時候，該判誰「死刑」都是可以的。連隊給我們表演了一次，戰士出去發出哨音，約半小時左右，連部門口就集合了黑呼呼的活蹦亂跳一群山羊。

爲了在島上種菜，真是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建了一小塊不足一畝的菜地。這塊菜地是先造出一塊平地出來，然後就向平地上填土，島上自身的土不夠，就由大陸上運來，幹部、戰士探家，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從陸地上帶一包土回到島上，經過很長的時間，才把菜地裏的土壤有一尺多厚。由於淡水不夠，又自己動手造了一口大蓄水池，這樣就自己種菜了。這個守島連隊，經過自己的艱苦努力，搞好了生產建設，自己的生活就完全有保障了。

(三)雲南邊防一個連隊。這個連隊是西盟佤山中部邊境一個以任務定編的大連隊。全連有一百六十餘人。這個連隊所處的生產條件是得天獨厚的，土地多，氣候好，一年可種兩季糧食，常年都可種菜。該連養了一群羊，可能有近百隻，該連還有一個大豬圈，存欄豬經常有三十頭左右。駐在西盟佤山上的這個連隊是個老連隊，在那裏多年了，這裏要加以說明的是，該連也是害過「恐餓病」的。難道過去他們就不知道地裏可以長莊稼嗎？當然不是的，而是種莊稼要受批判，過去他們隨便種點蔬菜，或幾個南瓜都是不許可的。上面政治機關來的工作組，經常批判連

隊搞生產，說不注意思想純潔，祇注意物質生活，前途就是修正主義。搞空頭政治的人是一夥蠢豬，連什麼是修正主義都不懂，真可憐！

我軍所有連隊都有自己規模不同的生產建設，全軍又有數以千計的農場，這是我軍一項很大的財富，也是我軍後勤工作注重生產的主要依據。古今中外軍隊的後勤工作都是懶懶散散，吃吃喝喝的，平庸形象很普遍，在士兵和群眾中的影響並不好。但是我軍自己搞生產，參加經濟建設，把後勤工作與國家的經濟工作結合在一起之後，後勤工作的社會地位提高了。

在這裏還可以順便講一下，我軍創造四好連隊時，「四好」的形成過程。四好連隊是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風好，軍事訓練好，生活管理好，這是經過反覆研究才形成的。開始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提出過若干個好，就是沒有提出過連隊生活問題。在軍委辦公會議談論這個問題時，我提出過要把有關連隊生活的問題上也加去。蕭華說了一句：「把做飯好也寫上？」劉志堅補了一句：「炒菜好也加上？」很顯然，他們的話對我有諷刺之意，我沒有多加思考立即反擊就說：「兩位主任的指示十分精彩，應當在《解放軍報》上發表出去。」接著，正式討論時，我又提出：創造四好連隊，要有生活方面的內容。羅總長表示同意我的意見。在四好連隊「四好」中，有「生活管理好」就是這樣來的。後來，林總說：在創造四好連隊中，生活管理好是非常重要的。這樣就把連隊的「生活管理好」納入四好之內了，連隊工作也就全面了。

全軍農副業發展起來了，自己是消耗不完的，必須找到出路。另外，當時國家的食品工業還很不發達，各種副食品加工工業銷路都很好，因此，發展農副產品加工工業是利軍利民的事業。

軍隊的農副產品加工工業發展很快，各種大小的加工工廠已經發展到數以千計，各種糧食和副食都可以加工成成品。我記得糧食加工品、肉食加工品、鮮菜加工品，多數部隊都可進行生產，例如壓縮乾糧，脫水菜，過去要專門工廠進行加工，現在部隊自己就可以加工了，而且質量都很好。

部隊的農副產品加工的同時，還因地制宜地發展了一些出口產品和特種產品的生產。

第一個例子，種香茅草。在南方特別在海南島可以種植香茅草，這是做高級香水的最好原料，這也是一種出口的高價原料。這種原料很容易生產，在路邊地頭都可以種植。

第二個例子，種木薯。在兩廣多數地區可以生長的高產木薯，房屋前後，路旁地角都可以種植。這種薯類除了可以做澱粉之外，還可以做豬飼料，也可以代人口糧，連隊祇要種上就有收成。

第三個例子，種蓖麻。這是一種全國到處都可以種的作物，路旁、田邊、地角都可以種，是一種高產植物。其用途主要是用來做機器潤滑油，也可以用來做肥皂，當時是一種用途很廣的原料。

部隊所需物品是多種多樣的，不少也是自己動手可以解決問題，這裏祇說部隊自己動手解決了的幾個問題。

第一，做草墊子。部隊過冬每人都需要一個草墊子，特別是北方部隊是不可少的。這種物品，過去需要通過國家計委下達計劃到各省統一收購，並由總後軍需部統一供應。草墊子的收購費加上運輸費，在當時每個就不是幾毛錢可以購到。爲了鼓勵部隊搞生產，在供應標準上，由供應實物，改爲供應費用。這樣部隊獲利，總後則可減少了工作量，也減少了開支。

第二，打馬草。部隊所需馬草數量很大，駐有團級部隊單位以上的地方都有牲口，都需要馬草，部隊所需飼草都由部隊在當地購用，少數不出草的地方，還要調運。後來，由部隊打馬草，解決自己的問題。每年到了秋收打草季節，部隊都要用一定的時間打三草：墊草，馬草，豬草。

第三，維修營房營具。營房和營具經常有小的維修，一定時間之內還有大的維修。過去，所有維修業務都請各種工匠進行，要花費很大的費用。後來改爲部隊自己維修，費用改爲部隊的生產費，這樣對營房和各種營具的維修能及時進行。

第四，修理生活用品。部隊的生活用品很多，如炊事用品，還有一些公用品等。過去，對這些用品的修理都要拿到市鎮去修理才能解決問題，後來改爲自己修理，既解決了自己的問題，又增加了生產自給這項勞動，不少單位都是組織隨軍家屬擔任的。

部隊的生產，當時限制在種和養兩個方面，商業是禁區。種和養都是「生財」，對部隊生活有直接的利益，對國家也是有利的。商業是「分財」，這對部隊經濟收入有利，但對部隊建設是極為不利的，因為商業是最容易毒害幹部和部隊的，同時，軍隊經營商業對國家是極為不利的。爲了部隊生活上的方便，在當地商業部門的支持下，部隊建立過自己的軍人服務社，這是爲了服務，並不是商業，我是始終反對部隊經營商業的，在當時的情況下，我認爲我的主張和做法是對的。

全軍歷次農副業生產會議

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一日，我在第一次全軍農副業生產會議上報告了全軍農副業生產的情況。

像這樣專門的農副業生產會議，解放以後還是第一次。這次會是根據林總對全軍明年任務的安排而開的。軍委和林總下了很大決心，把軍隊搞農副業生產定爲一九六二年中心任務之一，爲了完成這個任務，軍委對全軍一九六二年的工作，根據不同任務，將部隊分成三類：第一類是全訓部隊，訓練是主要的，這就是值班部隊；二類是施工部隊；第三類是全生產部隊，搞生產是主要的，訓練是附帶的。農副業生產在全軍的地位提高了，成爲軍隊主要任務之一。

爲什麼林總和軍委下這麼大的決心？照我的理解，還是一句老話，就是需要與可能。從國家整個情況來看需要這樣做，從軍隊生產供應來看需要這樣做。我們國家連續幾年遭到了災荒，農業受到了破壞，有些東西供應不上，要解決這個問題，在幾年之內主要是靠自己大搞農副業生產，這是需要。另一方面，軍隊搞生產有了前兩年的生產基礎，部隊現在也可以擔負這個任務，這是因爲我們有了值班部隊，它什麼都不幹，就是準備打仗，一旦有事情，它可以頂一陣，所以其他部隊就可以搞生產了，這是可能。當然搞生產的部隊也不是放下武器解甲歸田，而是成建制的組織生產，也進行一定的訓練。我們知道，古今中外軍隊的統帥，他們都是祇抓訓練這一條，而我們就不是這樣。林總是既重視部隊的訓練，同時又把軍隊農副業生產的位置擺得很高，軍委和林總這個決心，對我們管後勤工作的人來說，是個可喜的好事，因爲拿那麼多部

隊來搞生產，對搞好部隊的生活是很有利的，但是另一方面也要看到，這是給了我們一個很重的擔子。

我的心情是既高興又發愁，很多天總是在考慮這個問題，打電話請駐京的一些同志到總後來，和他們研究商量這個問題。林總下這樣大的決心，拿出這樣大的力量，再搞不好生產，就很不應該了。當然部隊還有各級黨委的領導，但是具體組織這件事情的擔子，是要由我們後勤部門擔起來的。

軍隊前兩年搞農副業生產是取得了一些成績的，就現有的統計材料來看，在糧食產量方面，全軍平均每人合五百斤左右，這是很大的數字。在養豬方面，現在全軍平均每四至五人有一頭豬，各單位還養了一些其他畜類，據我瞭解，新疆差不多每一個人平均有一頭牲畜。再就是蔬菜生產，全軍幾乎是自給的，買的很少。還有一個成績，這就是土地，現在全軍平均一個人有一畝地。這些大部分是靠戰士們開荒來的，是一鋤一鋤挖出來的。

首次全軍農副業生產會議提出了「大量生產糧食，大量養豬」的方針。十一月十四日，軍委批轉了這次會議紀要，提出農副業生產是一九六二年全軍中心任務之一。各級黨委必須加強領導，爭取一九六二年農副業生產豐收。部隊解決農副業生產所需土地的辦法，應以開荒為主。一切農副業生產活動，都必須嚴格遵守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不得與民爭利。

一九六二年五月十四日，軍委辦公會議指出，軍隊搞生產是一個長期方針。並指示總後要抓緊研究生產中的問題，切實加強領導；全軍生產會議要提前開，對生產中的內部關係、和地方的關係、和自然的關係，都要有政策規定；在分配問題上，參加生產的部隊可以多勞多得，但不能自由支配，要定出一套分配的原則。同年七月，總後在北京召開第二次全軍農副業生產會議，主要是討論研究產品分配與生產管理問題，制定《中國人民解放軍農副業產品分配暫行規定》、《中國人民解放軍農業生產管理辦法（試行草案）》等，軍委隨後批轉了會議的報告和產品分配暫行規定。

一九六三年十月，總後在北京召開第三次全軍農副業生產會議。會議主要是總結幾年來農副業生產的經驗，研究農副業生產遠景設想。我

在會議上作了講話，講話中說：「這幾年，農副業生產的成績很大，這是大家共同的想法。軍委的領導同志這樣看。主席、中央的領導同志，對我們搞生產也是很高興的。這幾年大搞農副業生產，在軍隊內部解決了很大問題，對人民群眾影響很好。在國外，影響也很大。像阿爾巴尼亞、古巴、阿爾及利亞，他們的軍隊也在學我們的樣子搞農副業生產。」

「當然，我們部隊農副業生產的發展是不平衡的。有的發展較快，有的發展得慢一些，今年的生產情況也是如此。今年全軍的生產情況與去年比較，大體上也出現三種情況。有好幾個軍區發展，有幾個軍區祇保持了去年的水平，有的軍區還不如去年。對發展得慢的，我們希望他們盡量發展得快一些。」

在講話中，我還著重講了如何解決部隊生產與訓練、施工的矛盾問題：「軍隊平時除了擔負戰備、海邊防和值班任務之外，主要有三件大事，這就是：訓練、生產、施工。在這三項任務之間有沒有矛盾呢？我們的看法是，矛盾是肯定存在的，但矛盾又是可以統一的。不少部隊訓練，生產雙豐收的經驗，說明我們這個看法不僅在在理論上講得通的，在實踐當中也是辦得到的。……一個領導者，怎樣看他領導水平的高低呢？我們說，歸根到底，就看他是否善於抓住主要矛盾，解決主要矛盾。我們可以回想一下一九六〇年冬天和一九六一年春天的情況，……如果讓那種情況持續下去，那將是一種什麼局面呢？很顯然，如果這幾年不搞生產，生產和訓練的矛盾固然不會出現，但那就必然會出現另外一種新矛盾，新的局面，而那種局面是更加不好辦的。在那種情況下，部隊的體力受到削弱，思想問題很多，那還能夠搞好訓練呢？因此，我們絕不應該說生產妨礙了訓練，而應該反過來說，生產促進了訓練，我們這樣說，當然也不是主張要過分地強調生產。任何事物都有一個限度，所謂『物極必反』，如果強調得過份，事物就會走向它相反的方向，同樣會變成不正確的了。」

軍隊的生產效益

軍隊生產的效益怎樣？簡要的回答是：1、渡過了災荒，保證了部隊指戰員的體質，部隊的連隊基本上沒有一個浮腫病；2、軍隊建立了相

當大的家底；3、發揚了軍隊建設社會主義生產隊的作用。這是一部劃時代的經濟賬，也是政治賬。

我國的災荒是在一九五八年「大躍進」後的形勢下突然而來的。人民沒有想到，國家沒有準備。我是在高等軍事學院渡過「大躍進」的，我進學院的第一課就是學的「大躍進」。爲了理論聯繫實際，學院領導學員向社會學習，請地方負責同志作報告和去河南參觀。

當時的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兼北京市市長彭真向學院做過一次報告。他以十分興奮的心情說了很多的話，對「大躍進」描寫的相當美麗動聽。我記得彭真在報告中最後說的是：「過去，我們總是嫌吃不飽，最少也嫌吃不好，這個時代過去了！今後就是怎麼樣吃好的問題了，你們在學院學習，兩耳不聞窗外事，但決不要擔心吃的問題。你們同市政府有關部門聯繫好，儘管吃就是了。」我們聽了彭真的話，感到很興奮。

我們去河南參觀時，先到新鄉七里營，我們在那裏呆了兩天，吃了不要錢的飯，參加摘棉花的勞動。我們看到的人民的精神面貌確實很好，也看到過糧倉和麵粉廠，確實是「糧滿倉」。在七里營得到的印象，同彭真給我們說的幾乎是一樣的。我們自己感到，對大躍進有了感性認識，對自己的思想提高了一大步。

在鄭州，我們聽了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關於人民公社運動的長篇報告。他在講到「大躍進」時，同彭真講的精神也差不多。我記得，吳芝圃說：「在物質豐富的基礎上，吃食堂改變人民的生活方式是必然的。……」對吳的報告，我們信以爲真，沒有多想其他的問題。

我是離開工作崗位去學習的。我不僅對全國情況不瞭解，對軍隊的情況，甚至對總後的情況也不太瞭解。一九五九年我上任之後，在不短的時間內，我都是以瞭解情況爲主，全國災情對軍隊供應的影響，我是在一九六〇年冬天才有一個比較全面的認識，一九六一年初，我才提出「軍隊自己搞生產渡過災荒」的建議。

從實際情況來說，軍隊搞生產不僅發揮了很好的經濟效益，也發揮了很好的財政效益，節省了難於計數的財政開支。軍隊在全國解放後，即戰爭結束之後，實行全軍統一供應標準以來，供需就存在很大的矛盾。戰士吃不飽，要求各種補助（野外訓練、各種勞作、開慶功會、來隊家屬口糧等都要補助）是普遍存在的問題。部隊關於這方面的報告、提意

見、發牢騷，甚至罵人也是普遍的。這些問題，自始至終也沒有得到較好的解決，更沒有從制度上解決問題。有些非要解決的問題，也祇是臨時批示報銷，整個問題依然存在。

關於供應方面存在的問題，我舉兩個例子就可看出其嚴重性了。

一九六〇年葉劍英元帥在青島休息，就有當地駐軍軍長拿著超支萬餘斤糧食的軍子，請示批准報銷，葉帥當時很難處理，但還是硬著頭皮批准報銷了。葉帥回到北京之後，同我說了這個問題，並提醒我要注意研究解決部隊吃飽肚子的問題。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間，我上任總後部長不久，濟南軍區要開辦一期輪訓班，分期輪訓老戰士，需要五千斤補助糧。所需糧食數目不大，但是從批准到領到糧食往返手續兩三次，並且還經過當地領導機關特別打通關係才領到現糧。當時，國家還很窮，物資不豐富，領導幹部自覺遵守財經紀律。但可以看出一個問題是，各軍區的確很窮，這對部隊建設是很不利的。

一九六一年秋收之後，部隊存在的三大問題成為歷史的過去：1、戰士吃得飽了。2、長期以來部隊要搞一件什麼事，如野外訓練，開各種會議，沒有不需要補助的，要求補助糧的問題，現在提都沒人提了。3、來隊家屬口糧等都逐漸解決了。軍隊臨時來隊家屬吃、住問題，向來是頭痛的問題。全國災荒之後，來隊家屬猛增。來隊家屬極大多數是專門到軍隊吃的，而且大多數也是不打算再走的。他們說：「橫直是餓死，死在家裏，還不如在部隊死在自己的親人面前。」一九六一年秋收之後，家屬的吃飯問題就算基本解決了。隨著國家度過災荒的好轉，家屬來隊也就越來越少了。臨時來隊家屬吃飯問題，也是軍隊搞生產才算徹底解決了。

一九六〇年，有一次羅瑞卿總參謀長同我說：「老邱，我們訂一個君子協定，部隊要糧食的問題，我一律不管都由你管。到開會的時候，我總得承認一次我犯官僚主義。」我回答說：「同意訂這個協定，我完全承擔責任。但我承擔了也沒有糧食呀。」後來羅又把話說回來：「不管也不成，這總是我一塊心病，戰士吃不飽我心裏著急，我們應當設法解決這個問題。」未搞生產之前，這個問題始終也沒有解決。

軍隊搞生產之後，拿不出補助糧的問題根本不存在了。一年之後，即一九六一年秋收之後，羅總長又同我說：「老邱，一年前我們的君子協

定，可以廢約了。現在部隊是不是幾乎沒有請示要糧食的了？」我回答說：「部隊自己有了，就不會再伸手向上要了。」羅又問：「今年部隊生產的情況怎樣？」我回答說：「多數部隊可以做到填飽肚子了。」

羅總長說：「看來，軍隊搞生產是對的，不搞生產是沒有出路的。這不僅渡過災荒要這樣，不發生災荒也是要這樣的，我們軍隊在自己動手，這是一種不可改變的方針。」

軍隊搞生產改變了後勤工作的格局，從單純向國家伸手，轉為國家供應同自己動手相結合，這是我軍後勤工作思想、作風、方針的轉變。周總理對軍隊後勤的轉變，給了很大的評價。一九六二年冬，周總理要我在國務院的會議上講一下軍隊生產渡荒的情況。總理在我的發言之後，對軍隊後勤工作講了三個重要問題：

第一、林總主持軍委工作以來，軍隊的面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軍隊把毛主席建軍路線更加具體化了。這就是：突出政治，加強戰備，積極搞生產。軍隊的後勤工作是軍隊整體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如果不把後勤工作提高到建軍路線相適應的高度，祇搞些事務性的工作，後勤工作就不能起到積極的作用。現在我軍的後勤工作，是在建軍路線的指引下，生機勃勃的向前邁進。

第二，社會主義國家軍隊，和平時期的後勤工作的方向是什麼？對這個問題，我同意邱會作同志提出的「依靠國家供應為主，自己動手為輔」的方針。這就是說，在社會主義時期，國家財富還是不豐富的時期，國家對軍隊的物資生活是不能完全滿足的，永遠都有自己動手的問題。因此，邱會作同志提出，軍隊後勤工作，要把國家供應的物資管好和軍隊自己生產緊密結合是完全正確的。

第三，軍隊後勤部門，也是一個特殊的經濟部門，其任務是特殊的。國家的經濟部門是執行政府的生產計劃，產品由政府分配，收入交國家；軍隊後勤部門的生產是列入政府計劃之內，產品不歸政府所有，主要是保證軍隊生活之用。軍隊生產是補充政府供應不足，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軍隊後勤部門具有國家和軍隊經濟部門的雙重作用，因此，支持軍隊後勤部門的工作做好了，就是政府經濟部門的戰備工作。

周總理最後說：「我對軍隊後勤工作是過問比較多的。過去的過問，主要的是解決軍隊的問題，現在過問的情況變了，是軍隊支持政府。剛

才，邱會作同志的發言中提到兩個重要問題：軍隊可以吃飽肚子了，到現在還沒有發生過一個浮腫病，這就是對政府的最大支持。全國發生這樣大的災荒，政府無力解決軍隊的問題，一切困難都是軍隊自己戰勝的。在戰勝困難的鬥爭中，軍隊後勤做了很好的工作，這是我軍後勤工作的一大奇跡！」

軍隊的生產是鬥爭中發展起來的。軍隊搞生產的阻力那樣大，為什麼生產又搞起來了，並且成為全軍的大事？這是非常容易回答的問題。

（一）逼出來的。在全國大災荒的情況下，軍隊的出路祇有兩條：自己動手找活路；等著挨餓。災荒就是最有權威的「找出路令」，沒有這個「找出路令」，軍隊的統帥也不會輕易下決心的，特別是對生產存在不小的阻力的情況上，更是不易下這個決心的。

（二）軍委和林總的正確決心。在當時，林總的決心，對全軍能夠搞生產，是起舉足輕重的作用的。林總提倡「突出政治」與「空頭政治」是有原則區別的，前者是聯繫實際，後者是脫離實際。他提出的「四個第一」，始終是把抓人的因素放在首位，人的因素就是最大的實際。另外，林總治軍原則，關心戰士生活，始終是放在重要位置上的。古今中外，沒有一個好的統帥是不關心戰士生活的。林總過去、現在正是這樣一個統帥。

（三）全軍後勤部門組織生產的作用。這也是一種重要作用，事實上，任何工作都有組織實施問題，全軍的生產就是後勤部門組織實施的。我們做了應做的工作，在工作中遇到了很大的困難，也遭到過打擊，這都是歷史事實。我們用自己的思想、智慧、勤勞，幫助全軍度過了災荒，但不應把它看成是自己的功勞，而是總後部長和總後黨委及廣大後勤戰線的指戰員應做的份內之事。

毛主席的《五七指示》

一九六六年四月間，總後向林總寫了一個《關於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的報告》，他把報告轉送給毛主席了。五月七日，毛主席就是在那個報告上做了批示，《五七指示》即從此而來。

我們寫給林總報告的主要內容是，全軍農副業生產情況的簡要報告。報告的內容，除了略談了全軍農副業生產的概括情況之外，主要講

了海南島和雲南西蒙山駐軍的生產情況。對上述兩地駐軍的生產情況：海南島在解放前是基本上不種菜的。人民解放軍進駐海島之初，各種蔬菜都是由大陸運去的，並且主要是乾菜。因為部隊長年吃不到新鮮蔬菜，就自己開始種菜。使人預料之外的是，種的各種蔬菜都長得很好。在軍隊的影響下，當地群眾也種菜吃菜了。種菜是一件小事，但通過種菜，更加密切了軍民關係，促進了農業經濟的發展，改變了群眾有史以來的生產習慣。

雲南西蒙山在邊境地區，該處土地多，土地也肥沃，氣候很好。過去，駐軍按上級的命令不准種菜，部隊所需蔬菜都購買。自然災害開始時，部隊沒有蔬菜就吃鹹菜，甚至鹽水就飯。從一九六一年，部隊開始種菜了，也種了糧食和養了豬。現在不少部隊都有十餘畝糧食地，莊稼長的綠油油的，菜園子長勢都好。養豬十餘頭，還有幾十頭羊的羊群，部隊的伙食很好。西蒙山是雲南少數民族所在地，解放前後都還是刀耕火種的耕作方法，更不種菜不吃菜。在駐軍的帶動和幫助下，現在群眾也種菜吃菜了。由於生產發展，同海南島一樣，群眾的生活習慣都改變了。

對毛主席五月七日的批示，我是知道比較早的。當時，楊成武同康生乘專機去杭州兩次，參加討論文化大革命的問題。五月中旬，楊第二次回京後，我就看到了批示全文。

一九六六年五月中旬，中央軍委舉行常委會，其中內容之一是傳達毛主席的批示。楊成武讀了批示全文。各位副主席都以興奮的心情說了話，但總政有一群主任，一個講話的也沒有。我也當了閉口道士，一句話都未說。最後，葉劍英說了話。

葉副主席說：「毛主席的批示是對軍隊最重要的指示，這是對軍隊極大的鼓勵。我們軍隊應當很好傳達，認真學習，繼續創造出更大的成績來。」稍停了一下，葉帥對著蕭華說：「怎麼辦？」蕭華祇「嗯」了一聲，反而接著對著我說：「邱部長，你替軍委起草一個指示，文件發到全軍，要全軍很好學習，並提出貫徹執行方案來。」

我帶著微笑的聲音說：「我起草指示？這是不分油鹽柴米，總後不能辦。」

接著聶帥說：「這是中央軍委的事，還是由辦公廳辦爲好。」軍委辦公廳承擔了這一任務。

散會時，蕭華走到我面前，竟拍著我肩膀說：「恭喜你得了大獎！」在中央軍委開會的當天晚上，我就以總後勤部的名義向全軍後勤部門發了指示。

毛主席的《五七指示》產生了很大的社會效果，中共中央宣傳部和《人民日報》對《五七指示》做了連續的報導。一九六六年夏季，《人民日報》以「共產主義宏圖」爲題，對《五七指示》發表了社論。據說，那篇社論是中宣部起草的，陳伯達修改後，經毛主席審閱定稿的。那篇社論的內容記不起了，主要精神是提出了人民解放軍是個「大學校」，以一業爲主「兼學別樣」是建設社會主義、邁向共產主義的必由之路。這同總政治部的態度，就無法比了。《五七指示》在全社會產生了很大的效果。後來總政認識到這並不是對我的批示，宣傳《五七指示》的工作很快就跟了上來。

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是人民當家作主。沒有人民群眾的積極性，沒有全民動手，是不可能建成社會主義的。《五七指示》正是解決全民動手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人民日報》「共產主義宏圖」的社論也正是著力宣傳了這個問題。正確的思想變爲廣大群眾的行動就是偉大的物質力量，這是真理。「五七」道路就是廣大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的力量。

毛主席去世之後，《五七指示》同毛主席的無數光輝著作一樣，都成了他的殉葬品。

附：《五七指示》

毛澤東對軍委總後勤部《關於進一步搞好部隊副業生產的報告》的批示

林彪同志：

你在五月六日寄來總後勤部的報告，收到了，我看這個計劃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將這個報告發到各軍區，請他們同軍、師兩級幹部在一起討論一下，以其意見上報軍委，然後報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軍發出適當的指示。請你酌定。祇要在沒有發生世

界大戰的條件下，軍隊很可能也成為一個這樣的大學校，除打仗以外，還可做各種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八年中，各個抗日根據地，我們不是這樣做了嗎？這個大學校，學政治，學軍事，學文化，又能從事農副業生產，又能辦一些中小工廠，生產自己需要的若干產品和與國家等價交換的產品。這個大學校又能從事群眾工作，參加工廠、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完了，隨時都有群眾工作可做，使軍民永遠打成一片；又要隨時參加批判資產階級的文化革命鬥爭這樣，軍學、軍農、軍工、軍民這幾項都可以兼起來。當然，要調配適當，要有主有從，農、工、民三項，一個部隊祇能兼一項或兩項，不能同時都兼起來。這樣，幾百萬軍隊所起的作用就得很大的了。

工人以工為主，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在有條件的地方，也要從事農副業生產，例如大慶油田那樣。

公社農民以農業為主（包括林、牧、副、漁），也要兼學軍事、政治、文化。在有條件的時候了要由集體辦些小工廠，也要批判資產階級。

學生也是這樣，以學為主，兼學別樣，即不但學文，也要學工、學農、學軍，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

商業、服務行業、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凡有條件的，也要這樣做。

以上所說，已經不是什麼新鮮意見、創造發明，多年以來，很多人已經是這樣做了，不過還沒有普及。至於軍隊，已經這樣做了幾十年，不過現在更要有所發展罷了。

毛澤東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

第十九章 後勤工作的天職

正確認識後勤工作的地位

在我軍的歷史上長期存在過輕視後勤工作的問題，過去的說法「能打能沖的當指揮官，能寫會道的當政治官，什麼也不會的當糧食官」。在解放後的一個時期內，輕視後勤工作的現象不是減少了而是更加嚴重了，從政治生活、日常生活，甚至開會坐位置等等，都可看出後勤幹部低人一等的現象。一九五九年，我上任總後部長之始，總後幾個老領導對我說：「你又回來了，沒有逃脫這個當孫子輩的地方。」我以帶笑意的口氣說：「別人輕視，我們自己要重視。我們團結起來，做好工作。」我知道總後的思想混亂是有歷史原因的，總後存在的問題非「一日之寒」，解決問題也非「一日之功」，是要有個過程的，並且是要紮實做工作的。

我上任不久，兩大任務就來了，一是戰備準備打仗，二是渡過災荒，搞農副業生產，兩項是全軍的中心任務，再加上一個業務改革，這樣就三大任務交織進行。我們是抓得很緊的，不僅沒有掉隊，而且搞得相當出色。要完成好以上三大任務要解決思想問題，就要學習，從一九六一年下半年開始，開始有計劃的學習，學習的方法主要是辦短期輪訓班，主要是學習毛主席的《矛盾論》和「老三篇」，學習的效果是令人滿意的。

關於黨委生活問題。總後黨委內部的鬥爭是經常的，從一九五九年十月改組總後黨委起就開始了鬥爭，後來無論搞戰備，搞農副業生產，業務改革等等問題，都是經過鬥爭，甚至經過激烈鬥爭才解決問題。

這裏，我想講一件以小見大的小事，就可看出總後黨委內部的思想狀態了。一九六一年總後管理局生產了一些農副業產品，一天，我從外地回來，在辦公桌上看到一張農副業產品分配方案。該方案規定分爲四級：總後首長爲一級；二級部正副部長爲二級；處級幹部爲三級；其餘的

人爲四級。我認爲這樣分配太不像話了，必須改變，從總後首長到炊事員平均分配，我還批了：「我的批示，爲最後定案。即照此執行，不可更改。」

我的批示，表示了我對「分配方案」是氣憤的，我下定決心：「寧可不同意的人反對，也不可讓不正之風存在下去。」我的批示，管理局當然是執行的。過了一段時間在黨委常委會上突然有負責人指責：「邱會作同志用平均主義的方法來提高自己的威信，是搞個人主義的手段。」他們所指的是農副業產品的分配問題。我心想，這雖是小事一樁，但對我的指責是提得很高的，有展開爭論的必要，從這件事開始，也許可能解決一些思想認識問題。

於是，我就號召大家：「儘管對我提出批評，不僅對農副產品的分配可以批評，對其他問題也可以批評。」但一時沒有人說話。在大家要說不說的時候，有的人爲我抱不平，他說：「你們對邱部長的指責，毫無道理。什麼平均主義根本不沾邊，即使是平均主義，也比三六九等好多了。我提議，這個問題不要討論了，如果有人主張一定要討論，在軍人大會上討論。」接著還有人說話了，他說：指責邱部長平均主義毫無水平。看樣子，鬥爭展不開了，我也沒有急於求成，沒有繼續討論下去。

任總後部長之初，黨委常委有幾個委員，我記不準確了。但當時有共同語言的，還有湯平、張賢約、饒正錫、張令彬、李雪三，其餘的人，同我都很難一致。但在今天的常委會上，大家對不同的意見敢於反駁，是一種好現象，正氣佔上風了，在思想上，今後可能還會更健康。

總後勤部常委的思想統一，是經過一個過程的，而且是經過鬥爭，特別是經過取得工作上的重大成績才逐漸統一起來。這個統一過程，大體上可以分爲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上半年。這一階段最主要的是認真學習毛主席著作，提高認識，打下基礎，在學習過程中，又與整頓機關不正之風結合進行，收到了很好的效果。過去，部隊來辦事的人，常常是進門難，辦事更難，這些不好的作風，有很大改正，部隊來人對機關反映很好，部隊的反映是：「同過去相比，總後機關成了兩個樣」。作風是無形的力量，機關的作風好，人的精神狀態、工作態度都好了起來。

第二階段，一九六二年下半年至一九六五年。這一階段，最主要的取得了很大的工作成績。「做好工作，解放自己」基本上實現了。總後當時抓的三大工作：戰備、農副業生產、業務改革從一九六二年起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績。這些成績，同部隊的工作生活緊密結合起來了，是大家看得見摸得著的，對部隊影響之大是空前未有的。

一九六二年進行中印邊境反擊作戰、東南沿海戰備和後來的支援越南作戰，總後對作戰部隊的保障完成地很好，部隊可以不負重行動，走到那裏，打到那裏，後勤保障不僅跟上來了，而且在許多地方都預有準備，部隊不發愁，不叫苦，更沒有罵人的。我們這樣大的國家，這樣大的後勤機關，保障這樣多的部隊作戰，本來就不應當有什麼困難的，但同過去相比，又是變化極大的問題。西藏剿匪，參戰部隊最高到過九萬人，後勤保障是費了大勁的，幾乎動用了全軍後勤機關的支持，也不能滿足部隊的最低需要，由於後勤保障困難，祇有減少駐藏部隊。

一九六二年，全軍的農副業生產發展很快，形勢很好，部隊生活不僅有保障，而且有很大的改善。全國黨政機關、工廠學校、城鄉居民，都在鬧災荒，軍隊反而生活得較好。俗話說「吃飽了不想家」，部隊的生活有了保障，精神狀態好了，對各方面的工作都有促進作用，部隊消除了浮腫病，保持了體力。爲此，受到毛主席、周總理多次表揚，軍委各元帥也很高興，這對全黨全軍全國都發生了重大影響，軍隊後勤工作的地位提高了。

一九六二年，業務改革也有了很大進展，特別財務管理改革，得到各級領導幹部的讚揚。總後同各軍區軍兵種的矛盾，部隊各級後勤同同級黨委首長的矛盾，基本上解決了。過去，依靠制度管業務，把業務管死了，現在，基本上依靠黨委當家，全軍辦後勤，把業務管活了，後勤工作發生了重大變化。

一九六二年冬，軍委辦公會議舉行擴大會，各軍區、各軍兵種首長到會了。元帥們到會聽取了各軍區、各軍兵種的匯報發言。在會場上，聶帥即席插話說：「大家的發言都很好，你們對總後爲什麼不提批評呢？」賀帥接著說：「是呀，過去開會，沒有不罵後勤的，現在反而說好話的多，爲什麼？」瀋陽軍區政委賴傳珠接著發言說：「我們不是對總後不批評，而是沒有什麼可批評的。總後的工作做得好，全軍區上下都是讚揚

的。邱會作會辦事，他是全軍的總後勤部長，我們是他的後勤部長，把我們指揮得團團轉。」（全場大笑）接著發言的，對總後都說了大同小異的好話，總後勤部在全軍的威信提高了，是我們繼續做好工作極為有利的條件。

第三階段，一九六五年以後。這一階段，最主要是總結經驗，有計劃搞建設使後勤工作更提高一步。我們主要是抓各項建設工作。

第一是劃區供應。這是後勤戰備，平戰結合的主要措施，祇要這一措施落實了，準備打仗的工作就同平時的工作結合在一起了，戰備工作也就在很大程度上落實了。

第二是搞農副業生產基本建設。全軍的農副業生產，向田園化、機械化、企業化方向發展。力爭在兩三年內，連隊的生產實行業餘生產，農場生產實行企業管理，除了農忙季節部隊臨時參加生產之外，平時不佔用部隊時間，全軍的農場都力求能發揮比較好的經濟效益。

第三是抓緊科學研究工作。後勤裝備都要向現代化方向發展，軍需裝備要向「減輕數量，提高質量」的方向發展。還有業務工作的規章制度，要繼續改革與完善，使業務工作能夠走上制度化，這是業務建設的基本問題。

對上述各種規劃已經制定，並且已經開始執行，也取得了新的成績。在文化大革命前夕，毛主席、林總先後發表了對後勤工作「四加強」的指示和「五七」指示，對後勤工作給予了極大鼓勵和支持，對總後勤部的思想統一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在毛主席、林總的親切關心下，總後機關出現了空前未有的好形勢：思想統一，團結一致，幹勁十足。但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全國全軍的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後勤工作也隨之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在文化大革命中，雖然造反派對總後的正常工作破壞得很厲害，但總後機關上上下下大多數同志都能堅守崗位，堅持了正常工作，並保證了全軍援越部隊、軍事外援繁重任務的完成。

充分發揚革命幹勁

總後機關，經過學習毛主席的《矛盾論》和「老三篇」之後，思想覺悟提高了，對後勤工作的認識基本上解決了問題，收到了新的效果。

這時我們提出：「勤懇辦事，勤儉辦事，勤巧辦事」三勤的思想，目的就是更具體的爲部隊服務。我們總後機關深入部隊的作風很好，蹲點、跑面，不辭辛苦。部隊軍、師、團後勤機關的工作做得更好，他們經常下基層，同戰士打成一片，並開展送上門的活動，物資上門，財務結算上門，醫療上門，修理上門等等。例如，戰士的衣服壞了，可以縫補好，部隊的後勤人員把工作做到每個人的身上，也就是做到了每個人的心上。全軍後勤系統出現了大批的四好單位和五好個人，出現了許許多的典型人物，這是做工作做出來的。

一九六三年一月間，我在總後勤部領導幹部學習毛主席著作學習會上講的中心問題，是發揮革命幹勁爲部隊服務，其中也講到了政治思想同發揮革命幹勁的關係。我講到了「政治工作的任務同行政工作的任務是一致的，政治工作沒有單獨的任務。我們所以要加強政治工作，就是動員廣大指戰員很好完成任務。從政治上保證完成行政任務，就是傳統的政治工作；離開行政任務，單獨談什麼政治工作，就是空頭政治。」我講話之後，立即有人對我說：「你講政治工作的問題，真是大膽，可能惹下麻煩了。」我回答說：「毫不在乎，真理總是真理，你們不要爲我擔心。」果然，第二天總後某領導人就把記錄稿送給了總政治部蕭華主任，蕭看了之後，很惱火。

林彪元帥在論述軍隊培養三八作風時指出：我們要緊張，反對懶惰、散慢、疲憊、吊兒郎當，不要今天的事推到明天，明天的事推到後天。我們要有一股革命幹勁，沒有幹勁什麼事也辦不好。我們在毛主席和黨中央領導下，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都是完全正確的，我軍的建設方向和方針也是完全正確的。我們的工作條件很好。我們的任務就是沿著毛主席指示的方向，充分發揮主觀能動作用，鼓足幹勁，勝利完成黨交給我們的任務。

沒有幹勁的表現形式是多種多樣的，一種是不想幹事，實際上已經不是幹革命，祇是憑老資格吃飯。一種是怕困難，遇到困難就打退堂鼓。第三種人是辦事不認真不講質量，咋咋呼呼，他們每天上班，好像很「忙」，實則敷衍了事。這種人，把一個革命幹部降低到一個舊職員辦「差」的水平。

有幹勁也有三種表現，這就是想幹、快幹和深幹。

想幹，就是不斷革命的精神。這些同志一個是有很高的積極性，一個是有很大的主動性。很高的積極性就是不甘落後，成天想工作，總想把工作做好，精益求精，永不滿足。很大的主動性必然就是具有一往直前的精神，毫不顧慮，不能前怕狼後怕虎，祇要對革命有利的事，總是爭著去幹，堅決地力爭幹好。像林總論戰鬥作風時所談到的那樣：總想打仗，不是想休息，打仗一往直前，命令規定的戰鬥任務堅決完成，沒有規定的，祇要有仗打就堅決打，槍聲就是命令。具有這種作風的人，在我們後勤系統是很多的。

快幹，就是要搶時間。時間是不等人的，今天過去了就永遠不會有今天了。時間就是力量，快是聞風而動，是政治責任和政治熱情問題。快是我們這個時代的特徵。要快，要盡可能在短的時間內，把我國建設成爲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所以我們辦事就要快，要和時間爭取主動權，今天能辦完的事，決不拖到明天。

深幹，就是深入實際。什麼是實際，客觀事物就是實際，從部隊來說，連隊就是最主要的實際，從業務工作來說，一切具體事物都是實際。深入實際的目的，就是總結經驗指導實踐，「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深入實際不可能正確總結經驗指導工作。總的一句話，就是深入實際，深入群眾，發現問題，總結經驗，以提高我們的工作質量，這就是我們所說的深幹。想幹、快幹和深幹是統一的，相互聯繫，相互促進的。想幹是基礎，有了這個基礎，才可能幹得快，幹的深。快和深是數量和質量的統一，是多快好省的統一，祇有幹得快，才能爭得深入下去的時間，而深入下去，抓住主要矛盾，不失時機的加以解決才能真正的快。工作幹得快，幹得深，獲得了成績，增長了才幹，豐富了知識，必然會更加激勵幹工作的熱情，增加想幹信心，從而幹得更快，更深。

當時，全軍都在大張旗鼓地貫徹軍委擴大會議關於加強政治工作的決議精神。全軍上下生氣勃勃，熱氣騰騰，爭先恐後，努力上進，各項工作聞風而動，你快人家比你還快。古話說：「逆水行舟，不進則退」，這種形勢下，不要說不進則退就是進得慢也會落後，這就是全軍後勤系統的精神面貌，我們後勤系統是一定不會掉隊的，一定會跟著時代的步伐勝利前進的。

黨委當家，全軍辦後勤

我軍的領導制度，是黨委集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這應當是後勤業務建設的基本依據，決不能與之對立。我軍後勤的規章制度，是適應我軍的領導制度還是搞業務獨立，這是業務建設的方向問題。應當承認，我軍在解放後「不走樣的學習蘇聯紅軍」之後，把這個問題搞得混亂不堪，我認爲我軍在學習蘇軍的問題上是所得不大損失不小，這應當是一個教訓。

中國人民解放軍同蘇聯紅軍都是共產黨領導的軍隊，但歷史傳統是截然不同的。蘇聯紅軍的歷史傳統是由俄國沙皇時代的舊軍隊而來的，雖然進行過改造，但保留下來的舊東西還很多，特別是蘇聯軍隊的領導制度是個人集權制，上下之間、官兵之間等級森嚴。

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歷史傳統，是由孫中山時期的國民革命軍而來的，這支軍隊是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後來以農民爲主體組建的中國工農紅軍是一支農民革命軍，在長期的革命戰爭中，鍛煉成了一支新式的軍隊。我軍的領導制度、戰略戰術、內部生活都有自己的一套。我軍除了可以研究蘇聯反法西斯戰爭的經驗和軍事技術之外，其餘沒有什麼可學的，「不走樣的學習蘇軍」是完全錯誤的。後勤部門與其說學習蘇軍，還不如說是把蘇軍的一本本條例都搬過來了，由於學習「成績」很大，內部造成的矛盾就更大。這些矛盾成了我軍後勤前進的主要障礙，我們必須大力克服矛盾，才能恢復我軍後勤的傳統並繼續向前發展。

對業務改革，當時有兩種對立的意見：一種意見認爲，後勤規章制度不能改，規章制度是後勤工作的準則，改了對整個後勤工作必定是大的破壞；另一種意見認爲，後勤規章制度必須改，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妨礙後勤工作爲部隊服務，改得合理的規章制度對後勤工作必定是大的發展。反對改革的意見，從原則上是少數，從具體工作上是多數，因爲業務改革常常會涉及到業務工作的職權問題。這就是業務改革的真實困難。

在理論上提高認識之後，大家一致認識到，後勤業務工作主要問題是兩個字：一個字是「死」字，一個是「活」字。用辯證法的方法管業務，就一定管「活」；用形而上學的方法管業務就一定管「死」。這裏說的管活了，就是實行全軍辦後勤，依靠黨委，依靠群眾，依靠人的積極性，既爲他們服務，又依靠他們工作；這裏所說的管死了，就是實行業務「專

政」，祇相信自己，不相信群眾，用很多的框框去束縛別人，實際上也捆住了自己的手腳。

我們過去處理許多問題，比如局部和整體，集權和分權，制度和實際等等，往往不是犯這樣的片面性，就是犯那樣的片面性，陷入了形而上學。對這些問題就其中幾個關係來加以分析。

第一，制度和實際工作的關係。後勤的規章制度的構成，就一般情況來說是根據國家的經濟情況，軍隊的傳統和現實情況制定的。現在我們的規章制度，基本上也是符合上述情況的，但任何規章制度都不能解決一切實際，所有實際問題也不可能包括在規章制度之內。

這裏舉一個供應劃線的例子。對冬季服裝的供應，總後對北方地區劃分了嚴寒區和亞寒區。嚴寒區每個連隊供應皮大衣，亞寒區則供應棉大衣。北京軍區一個師駐在河北宣化，大部分部隊駐在宣化及其以北，按標準即供應皮大衣，駐在宣化以南三公里的小部分部隊則供應棉大衣。對此，北京軍區首長親自出馬，對總後進行了激烈的攻擊。

一九六〇年，在一次軍委會議上，當時的北京軍區某首長以上述三公里之差兩種待遇為題，對總後的規章制度攻擊說：「我們現在的供應制度，是教條主義、官僚主義、權威主義的產物。這種制度不僅解決不了問題。反而引起了部隊不團結。」他的發言，我認為他是同彭德懷劃清界線，又是向林彪表態，具有政治性的發言，但所選材料是不適當的。

我對發言人說：「對總後的制度提出批評，我表示歡迎。但以三公里之差來攻擊總後制度是不妥當的。宣化發生的問題，不是制度本身問題，是實際工作問題。供應棉衣、皮衣之分是根據氣候不同劃線。既然是劃分了嚴寒區和亞寒區，能沒有線嗎？但駐宣化的部隊是一個師，完全可以實行統一供應標準。這個問題我現在就拍板定案：駐宣化的部隊，今冬實行統一的供應標準發皮大衣。」

我說完話之後，發言人微笑點頭表示同意我的意見。羅瑞卿則笑著說：「你們兩個都是政論家，不要爭論下去了。」

規章制度是必須的，是軍隊各方面的生活不可缺少的。對後勤工作來說，應當肯定需要規章制度，但還要肯定的是在執行規章制度的同時，必須解決實際問題，祇有這樣，規章制度才能行得通，才能為工作服務。

第二，統計和有「數」的關係。爲了心中有「數」，我們要有必要的統計；但有了統計，並不等於心中有「數」。統計數字祇是研究問題的一種資料，而不是全部根據。如果迷信統計，把報表看成是萬能的工具，就會造成報表成災。我主張少一點統計數字，多一點研究，可以做到心中更有「數」，統計過多，調查過少，反而會心中無「數」。後勤工作是需有一定統計資料，否則就不可能掌握整個情況的。比如說：有多少錢，有多少物資，有多少運輸工具等等，都是工作的依據，但反過來說，如果這些數字不準確，也會耽誤工作的。例如，平時在統計報表上看到，某部車輛完好率爲百分之九十以上，可是接受任務之後汽車則開不動；又如，某部的衛生統計報告，發病率高達百分之六十，但缺勤率祇有百分之二，以上兩則統計可以相信嗎？顯然是不可以的。

第三，當家和管家的關係。黨委當家，後勤管家，這是後勤工作幹部必須遵守的原則。因爲各級後勤部門是黨委領導下的一個部門，是局部而不是全局。

在這裏我們講的黨委當家，後勤管家，是規章制度的問題。如果規章制度規定得不合理，黨委當家就會成爲有其名無其實，黨委根本不能行使當家的權力。以財務法規來說，從軍區起，各級黨委祇有權批准少量的預備費用開支，其餘的則一律不能過問，這樣的規章制度是必須改變的，後勤的規章制度應當與我軍的領導制度相一致，才能體現黨委當家的原則。當然黨委當家，後勤工作也不能黨委拉一拉就動一動，不拉就不動，後勤永遠要保持「有頭腦的事務主義」的作風，祇有這樣，後勤才能起到管家的作用。

黨委當家，全軍辦後勤是我軍後勤的基本指導思想，在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動搖，但這個思想的基本含意是什麼？黨委當家也要在制度範圍內當家，黨委當家必須從規章制度中體現出來，但又不能離開規章制度自行決定一切，這兩種偏向都必須克服的，才能真正實現黨委當家。

局部與整體的關係

國家是整體，軍隊是局部，這是決不可顛倒的關係。我軍的後勤工作似乎有個「天生」的缺點就是本位主義，這是必須徹底克服的。

在軍隊後勤工作中局部與整體的關係，也就是本位主義的問題，是有個歷史過程的。在歷史上的三個時期：紅軍遊擊戰爭時期、根據地時期、國家供應時期都有不同內容的。紅軍初建時期，這個時期軍隊既是局部也是整體，還不存在局部與整體的關係問題，軍隊是局部與整體合一的。根據地建起來之後，軍隊始終是處於鬥爭中主體的地位，支援戰爭是黨、政、軍共同的任務，因此，局部與整體的矛盾並不很大。全國解放後，國家的主要任務是經濟建設，局部與整體的關係是進入了新的時期，國家的主戰場是經濟建設，對軍隊的供應，是國家計劃的正常部分，擺正局部與整體的關係顯得更為重要。

第一個問題，關於依靠國家供應與軍隊自己動手相結合的問題。

國家對軍隊不能保證供應嗎？我們說能又不能。當時國家的經濟力量是薄弱的，軍隊的需要即使有計劃也常常不可能按計劃供應，因此，軍隊自己動手搞輔助供應就十分必要了。

國家經濟力量是國防力量的基礎，國防事業的發展必須以國家的經濟力量為前提。毛主席說過：「沒有工業，便沒有鞏固的國防」，今天增加一分經濟建設力量也就等於增強一分國防力量，這是最大的政治。軍隊後勤工作幹部，對這個問題須有清楚正確的認識，我們除了管好國家供應的經費物資之外，決不能做單純依靠國家供應的伸手派，大力辦軍隊能夠而且又應當辦的事，把依靠國家供應與軍隊自己動手很好結合起來。

第二個問題，支援國家建設問題。

支援國家建設是政治任務也是經濟任務，在和平時期軍隊不僅要保衛社會主義祖國，也要直接參加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這是新形勢下的新任務。

對支援社會主義建設，後勤部門一定要有積極的態度，凡是中央的號召，軍委的指示，上級黨委的決定，後勤部門都要積極的堅決的執行。特別是搶險救災，要如同戰鬥任務一樣堅決保障完成任務，從後勤部門來說是要出錢出物的，對這項開支是可以「先斬後奏」的。對支持社會主義建設，決不可以「先要錢，後辦事」的商人作風去處理問題。

對支援社會主義建設，還有幾個經常遇到的問題，我們應認真做好。

一是醫療隊下農村的問題。軍隊經常派醫療隊下農村是好事，應當有計劃地進行。這樣可以為缺醫少藥地區的農民治病，又可密切軍民關

係。這裏主要是藥費問題，這個問題的解決辦法可事後同當地政府衛生部門辦理，能解決就協商處理，如果當地衛生部門無力解決，則由軍隊報銷，決不能因為藥費問題，而影響醫療隊的工作質量。

這裏附帶說一下醫科學校和軍隊醫院的收費問題。各醫科學校和醫院，城市居民一律按照原有的法規收費，收不到了就欠賬，對欠賬可以催賬，但不准到欠賬人家裏要賬，因為到居民家裏要賬，容易發生預料不到的問題。

還有一些特殊情況，如海島上的駐軍同島上的居民真正是一家人，有的同飲一口井的水，甚至同用一個鍋灶做飯，在這樣情況下，軍民祇有共同生活了，軍隊應當把居民的治療包下來。

還有邊防，特別是新疆、西藏、內蒙，有些很遠的邊防口岸，交通很不便，一年之內大部分時間都積雪，不能行走。軍隊對這些口岸居民的治病和其它生活上的問題，同海島上的居民同一個原則辦理。

少數民族地區對駐軍的依賴性更大，他們認為部隊給他們看病和解決生活上的某些問題是「應該」的，是一家人的事。這是好現象，我們不應當視為經濟上的負擔，而是有重大政治意義的。

總起來說，支援國家社會主義建設，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是重大的政治任務，軍隊除了保衛社會主義國家之外，軍隊支援國家建設，是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方式之一，後勤部門應當以很高的政治熱情來完成這一任務。

認真管理業務

任何工作都不是抽象的，都有具體的業務。後勤工作是軍隊的「管家」工作，管好業務，是後勤工作的政治任務。一些後勤幹部和部隊後勤部門的領導管業務不懂業務，「當和尚不會唸經」是一個帶普遍性的問題，不愛學習，尤其不愛學習業務，是後勤部門的老毛病，對此必須大力克服。

根據後勤的特點，對業務學習我們提出了三個相結合作為應當遵守的學風。

（一）學習知識與學習管理相結合。對業務要有一定的知識，才能認識這個事物，但同時也要懂得它的規律，才能駕馭它，這也就是經常說

的學與用結合起來。如果說學政理論要防止脫離實際，那麼學業務就更是如此。在業務工作中知其然，不知所以然的「半瓶子醋」，不僅無濟於事，而且會誤事，在我們已往的工作中，由於無知而發生事故的例子是多得不勝枚舉的。

（二）學習業務與學習文化相結合。由於歷史的原因，我軍的幹部文化水平是比較低的，而後勤工作幹部，又是低中之低，這是提高業務水平主要的困難，我們一定要克服這個困難，才能達到提高業務水平的目的。

業務的專業知識各有不同，但文化知識是共同的基礎，沒有文化是學不到專業知識的。現在我們的學習條件比過去更好了，我們不僅可以聽講課，而且在我們的隊伍中有很多的教師。學習的方法有多種多樣，我說有一種最好的方法就是「不恥下問」，我們說，不僅「三人行必有我師」，應當說，隨時隨地都有我們的教師，而且是很好的教師。我們祇要問就沒有得不到回答的，這就是我們學習的最好條件。

學習文化，學習業務知識，是爲了管好業務。管好業務首先要熟記後勤各項業務工作的規章制度，我們必須首先肯定規章制度是必要的，沒有規章制度會使工作雜亂無章，同時，也必須肯定，後勤工作的規章制度必須適合我軍的情況。因此，我們現行的規章制度必須切合我軍的實際情況，必須爲指戰員服務，爲建設現代化後勤服務。

（三）平戰結合。平戰結合的著眼點，應當是戰時，而不是平時，這是必須明確的指導思想。根據這個思想，我們在具體工作上必須有個大轉變，例如，戰略後方基地建設，島嶼邊防和調整部署後的營房建設等都要考慮到這個問題，否則就有可能既不適合戰時的要求，平時又無多大用處，會造成很大的浪費。除了某些個別問題，戰時有特別要求之外，絕大多數都是通用的。

樹典型的問題。在業務工作中樹起好的樣板，對業務工作能起到很大的作用。現在全國有三個響噹噹的樣板：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學解放軍，這對促進社會主義建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各級後勤都要學會樹樣板這種領導方法。

後勤工作是軍隊的管家工作，可以看到有形的東西很多。所以樹樣板，對我們後勤工作來說，既有利的條件，又有特殊重要的作用，最適

合我們後勤工作的特點了。後勤工作中有好多事情，像服務典型，節約典型，技術革新成果等，光靠嘴說，往往很難說清楚，而有了樣板，就一目瞭然，什麼馬蹄形回風灶，還有什麼雙眼回風灶，就很難說清楚，也不容易說服人，有了實物樣板，演示一下效果，一下就推廣開了。

樹樣板掌握方向非常重要。該提倡的就提倡，該反對的就反對，起促進派的作用，如果方向錯了，問題就來了。我們總醫院有個病室，在搞醫務工作革命化的時候，有的休養員提出倡議，要休養員「放下架子」，參加勞動，自己服藥等，意思是反對休養中的「特殊化」。休養員的精神是好的，但醫院提倡就不好了，這樣做，把醫院的服務對像置於何地？事情幸而發現得早，制止得早，不然推廣出去就很不好了，這說明了掌握方向的重要性。

反對空頭政治

政治和業務的關係，是一個基本而又普通的問題。我當了總後部長之後，由於我堅決反對空頭政治，竟成了我的「罪惡」，可見，這個問題對我來說是一個大問題。

政治和業務是哲理問題，從實際鬥爭中來說是個普通常識問題。在現實的社會生活中，沒有單純的政治，也沒有單純的業務。政治和業務永遠是對立統一的。

一九五九年十月總後勤部黨委舉行擴大會議。會議的內容：1、批判彭德懷等人的錯誤；2、關於解決部隊生活，特別是海防部隊生活存在的嚴重問題。怎樣解決部隊生活問題我提出了具體意見，過了幾天，蕭華以軍委副秘書長的身份，叫我去談過一次話。他首先說：「軍委改組已經完畢，軍委辦公會議已經成立了，現在的軍委是以林總為首的新班子，也可以叫做新軍委，我們都是在林總領導下工作，加強政治工作是首要任務。」

我接著說：「林總在軍委擴大會上總結時指示，要總後勤部抓緊解決部隊生活問題。對此我們已經上報了方案，待軍委批准後，大體上可以解決問題。我們學習林總指示時，認為抓緊解決部隊生活問題是全軍後勤戰線加強政治工作的重要問題。」我對蕭華孤立地提加強政治工作是有意不予理睬，蕭華很不高興，立即打斷了我的話說：「部隊生活是小問

題，發幾個錢就解決了。大問題是方向問題，沒有政治就沒有一切，你這個老政治委員，爲什麼這樣就被人同化了，真危險！你今後抓政治領導是主要的。」我也回敬蕭華幾句：「後勤工作任務同政治工作的任務總有區別吧。後勤部門搞好業務工作就是最大的政治。」

又過了幾天，軍委舉行常委會，在討論的議題中有總後關於解決部隊當前生活問題的報告。在審議時，各位元帥都點頭說好，主持會議的賀龍元帥，以風趣的語言說了好話，賀帥說：「邱會作同志這個報告寫得很好，祇有這樣才能解決問題。過去是有錢不辦事，現在是有錢會辦事，總後勤部就是要有這種態度，才能解決問題。邱會作同志是新官上任三把火，希望不止三把，要繼續燒下去，看來我們的後勤工作是有希望的。」賀帥的這一小段話，到會的多數人都點頭表示贊同。

蕭華立即說了話，他說：「我們各總部發言、講話等都要注意政治內容，要有政治水平，這個報告（指總後報告）是這樣的嗎？」

我實在忍耐不住了，即奪口而出地說：「要是寫上幾句毫無意思的政治詞彙，我的報告就十全十美了嗎？」我的話有諷刺之意。我同蕭向榮坐在一起，我的話音一落，他就在桌子下面，用手拉了我一下，並低聲說：「不說話，比什麼都好。」

羅瑞卿帶有裁決的口氣說：「對總後的報告不討論了，按照賀帥的指示辦。蕭向榮同志在文字上過一下目，就立即發出。」

經過幾次接觸之後，我對總政態度就形成了一個看法。我認爲他們是「打著加強政治領導的旗號，憑著自己的地位，在軍委稱王稱霸」。會後，我走訪軍委副秘書長、辦公廳主任蕭向榮同志，我們的關係很好，什麼話都可以說。我對蕭說：「學習三年都學糊塗了，連話都聽不懂了。」我把蕭華以前同我說的話也對他說了。

蕭向榮說：「我聽了你昨天說的那幾句話，就知道你心中有氣，你說的那些話，別人一聽就懂得是說不務實際的人。看起來你是真的不懂早晚時價了，現在有的人把政治強調得過頭了，又非要別人跟著說一樣的話，不然，輕則說你沒有政治水平，重則就說你反對政治，對此祇有不說話，別的辦法是沒有的。」

我又問：「林總對加強政治工作（當時還未提出突出政治）的基本精神怎樣？」

蕭向榮說：「林總是注意加強部隊政治工作的，但和他們說的不一樣。林總的基調還是過去的提法，部隊要有強有力的政治工作，才能提高戰鬥力，幹部才能做好工作。」

蕭向榮同我的談話，使我受益不淺，對政治同業務的關係這個問題就心中有數了。我心裏想，現在擺在我面前的有兩條路：跟著說空話的人一起走，或者自己走自己的路。我既然不盲從，就要好好想想，把問題想通，才能有勇氣去進行鬥爭。

我軍的政治工作是什麼？這是首先要搞清楚的問題。搞空頭政治的人認為，政治工作的任務是特殊的，同行政任務是不一樣的。做政治工作幹部，應該站在空中手舞足蹈的指揮一切，才能顯示政治工作的威力，這是絕對錯誤的。基於這種錯誤的認識，必然導致政治工作脫離群眾脫離實際。政治工作的任務同行政工作業務工作的任務是一致的，政治工作沒有單獨的任務。這是早在四十年代初毛主席對譚政在西北局高幹會上的報告就是這樣批示的。空頭政治派，不願承認這一點，標新立異另搞一套是沒有出路的。

我軍強調政治工作重要也是正確的。但這個重要正是爲了完成任務的需要，並不是離開實際需要去空談別的需要。例如打仗，政治工作就要保證完成戰鬥任務；農副業生產，政治工作就要保證完成生產任務；軍事訓練，政治工作就要保證完成訓練任務。離開了真正的需要，去搞別的什麼花樣，政治工作就不能成爲保證作用，而會成爲破壞完成任務的反作用。後勤工作是軍隊的管家，並且祇要管上了的事，就應該管到底的。難道這就是我的單純業務觀點嗎？後勤部長不管業務，那就是地地道道的「官僚」部長。

空頭政治派使用了三根大棒打擊我不突出政治的「罪行」。

第一根大棒是：單純業務觀點。

1、關於拍賣戰備物資問題。

對這個問題，主要指責我對業務工作抓得很緊，致使別人「無事」可做，指責了我三件事。前文提到過根據毛主席的指示精神，國務院、中央軍委決定：軍隊要貯備三百萬人打一年仗的物資。從一九六二年起，我們就有計劃的用積少成多的辦法，貯備戰備物資，我們已經貯備了相當數量的物資。大概是一九六二年冬，我向周總理簡要匯報過軍隊的戰

備物資情況，總理聽後說：「感謝你爲我辦好一個日夜擔心的大事。」李先念說：「還要繼續增加貯備，不怕多，祇怕少。」我們遵照周總理、李先念（他是國務院管戰備的當事人）的指示，繼續積極增加物資貯備。

大約是一九六三年春，總後主要領導人把豐臺倉庫貯備的戰備物資、鋼材、機電物資等，同意賣給山西省政府數十萬元的物資。對拍賣戰備物資，倉庫的領導幹部感到不可理解，於是就直接向我打電話報告了。我立即命令，物資不准出庫。此人很顯然對我不滿，但又不便提什麼理由來，於是就向蕭華告了我一狀。他首先輕描淡寫地說了幾句賣給山西的是「積壓」物資，然後即以憤怒的口氣指責我：「個人說了算，別人什麼都管不了，一點權力都沒有。」爲此，蕭華找我去談過一次話。我們談得很不好。

蕭：「總後領導人之中，現在對你有意見，你知道嗎？」我說：「知道，何止現在對你有意見，我還沒有上任之前，就對你有意見，恨我佔了他的位置。」蕭：「對老資格要尊重，否則就團結不起來。」我說：「怎樣尊重？我放棄自己的職責？軍委如果有這個意圖，我就立即離開，把位置讓出來。」蕭：「事情有這樣嚴重嗎？某人向我寫了一個報告，他說是爲了照顧同山西的地方關係，賣給了他們爲數不很多的積壓物資。（邱：積壓物資？）爲一個具體問題，你恐怕看得過重吧。」我說：「好吧。我回去即向軍委寫個檢討報告。中心內容是『我反對某人賣戰備物資是不對的。他也是首長，我反對他拍賣物資就更不對了。』」蕭：「這樣寫對嗎？需要寫檢討報告嗎？」我說：「我盡職責不行，寫檢討又不行。我該怎麼辦？」蕭：「報告不要寫了，今天就談到這裏。」

蕭華是軍委第一副秘書長，他是軍委領導集團之內僅次於羅瑞卿的人物。我們之間的談話，我是有意把問題擺到他面前，看他怎樣處理，在我們的談話過程中，蕭似乎意識到了我是對的，但又不願意表態，所以談話就祇好不了了之。

2、關於青藏線運輸改革問題。

一九六三年夏天，總政、總後各一位領導人在蘭州召開了表揚青藏兵站的運輸革新會議。在座談會快要結束時，總政領導人提出了問題。他說：「汽車運輸可否像火車一樣，即司機分段執勤，汽車不停。」對這個問題，當即有兩種意見：一種是可以試行，一種是反對。由於有人擁護，

又加上西藏辦事處主任立即提出了「堅決執行首長指示」，於是有兩個汽車團就擔任起試驗任務了。

擔任試驗任務的兩個汽車團，約有汽車一千輛。因為汽車司機不足，祇組織四百輛汽車參加試驗，其結果是：由青海到達拉薩為六晝夜，縮短了一半的時間。汽車單程在途中拋錨約百分之二十五，回程空車在路上拋錨的約為百分之十五。一趟來回共拋錨汽車百分之四十，近一半汽車沒有了。西藏辦事處的試驗報告，對縮短時間提高運輸效力方面報告說得很生動，對損壞車輛方面，祇提到「汽車也有小的損壞」。提出問題的人看到報告之後大喜，立即下令全線數千輛汽車全部實行「人歇車不停的運輸革新」，並提出了號召：爭取任務半年完成，部隊開回內地整訓。

「運輸革新」對車輛會造成大破壞是常識問題，並且開始試驗就看出來了，但辦事處不向總後報告真實情況。九月間，我從外地回到北京，才察覺了這個問題，並採取了三種措施：1、立即停止「運輸革新」，突擊搶修車輛；2、新調三個汽車團支援西藏的運輸任務；3、派強有力的工作組檢查西藏辦事處的工作。

九月底，總政、總後搞「運輸革新」的領導人高高興興地去向蕭華匯報，他津津有味的說個不停，蕭華聽得高興之餘還說：「你們兩個創造性地解決了總後勤部加強政治工作經驗。」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匯報會議正進行時，總政袁子欽秘書長急急忙忙給蕭華送來了一份急電，電報是總後工作組的檢查報告。報告內容：「運輸革新，造成青藏線上汽車損失慘重，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汽車不能行駛了，沿途到處都是拋錨汽車」，蕭華把電報給匯報人看，並說：「這是怎麼一回事？」他們說：「人的積極性是調動起了，辦事處的領導幹部沒有組織好。」匯報草草結束了。

羅瑞卿總參謀長看到西藏軍區「供應告急」的報告，又看到總後青藏檢查組的檢查報告之後，叫我去詢問情況。我簡要報告了事情的經過和嚴重情況。羅聽了我的報告之後，祇向我說了兩句話：「你已經把問題處理得很好。我們都要有必要的忍耐！」我懂得他講話的意思，什麼話也沒有說了。在一次辦公會議上，羅總長對蕭華說：「青藏線上發生的事情夠嚴重了。有的人可以不做任何工作，也不要去做外行的瞎指揮。」蕭華沒有說話。

3、關於平調產品資金問題。

一九六五年夏天，總政、總後有兩位領導人對中南地區的軍需產品質量問題寫了一個報告，並附上了幾件實物。

他們認為對軍需產品質量的要求過高了，他們的觀點是：「軍需品中的多數都有使用時間，質量不需過高」。他們的觀點是不正確的，因為軍需產品不能以平時穿著的時間來論質量，而是要以作戰要求來論質量標準，我們是毫不動搖地堅持後一種觀點。

軍委辦公會議把這個報告列入了審議的議題之內，他們二人出席了辦公會議。羅總長把報告放在討論的最後面。辦公會議將要結束時，羅總長宣佈：「還有一個報告不討論了，所提問題由邱部長處理。」他們兩人坐在一起聽到羅的宣佈之後，立即起身就走了，他們對軍需產品的報告，事實上是向軍委告我的狀的。我看到他們的報告，我沒有考慮怎樣對待他們，他們也沒有料到羅總長會採取不理的態度。

從上面三個問題來看，我是在認真管理業務，還是「單純業務觀點」？事實完全回答了問題。

第二根大棒：單純生產觀點。

總後有很多的企業，工廠、農場、馬場，同當時國務院的工業部門相比，總後是名符其實的一個生產部門。生產是總後的重要任務，我當然要用很大的精力來領導關心生產。

空頭政治派是反對軍隊自己搞生產的，他們對工廠、馬場的生產向來不聞不問。在這裏主要是簡要說一下，他們對軍隊搞農業生產的態度，他們總的目的是想抓到農業生產中的一些什麼問題，以便給我致命的打擊。

一九六一年軍隊農業生產，是在全國災情到了嚴重時期，部隊面臨餓肚子的情況下開始的。軍委各元帥對部隊的生活是最為關心的，林總則不斷過問部隊的生活和農副業生產。但總政對部隊生活根本看不上眼，從來不過問這方面的問題。

大家知道，我軍的政治機關是有權有勢的。由於總政反對搞生產，部隊政治機關同樣有反對生產的，因此，不斷發生指責刁難生產的事件。

一、人畜不分。這是北京軍區首長在軍委辦公會議，指著我的鼻子說我同天津駐東局子的部隊共同搞在稻草裏取澱粉的事。

二、與民爭利。這是福州軍區首長的指責。這主要是指向地方要土地之事。軍隊除營房之內有些空地之外，別無寸土，要自己種菜和糧食就要有土地。爲此國務院曾發出通知，要地方政府照顧軍隊用地的實際需要，經過協商辦理，基本上解決了問題。個別地方確有與民爭利的，當然是需要注意的問題。

三、破壞資源。這是內蒙打黃羊的問題，內蒙打黃羊是存在嚴重問題，也是周總理很關心的，對內蒙打黃羊的問題，總理曾派我去處理了。

四、十個人殺一頭豬。這是《解放軍報》記者的指責，主要是指部隊對改善生活感興趣，記者反映：某連隊殺一頭豬，派了十個人幫忙，還有爭著要去的，反之，助民勞動不願去了，這是一個反常現象，部隊正在向吃好的方向發展值得注意。羅總長在該簡報上批示：「部隊生活好一點不好嗎？但從來沒有看到部隊吃不飽的反映。」

五、流行菜餚經。《解放軍報》記者寫了一篇部隊生活報導，其中有一段提到：某部一個連隊在政治學習，炊事班長來叫人幫助下廚。班長說：「今天的伙食要改善改善。」三個做菜的能手同他一起走了，此時全場活躍，大家七嘴八舌地大談菜餚經了，在兩小時討論時事政治的時間裏，很多人都在談與討論題無關的內容，對怎樣做菜談得津津有味。總政治部在一份簡報上把這一段摘錄出來了，並加了一個標題：「部隊向何處發展？」

六、食物中毒。某軍區以司令部、政治部的名義發了一個通報，主要內容是防止中毒。防止食物中毒是部隊的管理工作，但通報的內容則把中毒歸罪於部隊搞生產的後果。

七、會餐過多。部隊生產發展起來了，生活確實好起來了，不少部隊平時吃的一般化，每個星期天一定會餐。這本來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祇要加以管理就行了，但有的部隊則指責生活好了「平時影響訓練施工，戰時會影響士氣」，這是對生產毫無道理的指責。

八、幹部生活特殊化。連隊農副產品很多，有的幹部下連隊總喜歡「順手牽羊」帶些食物回家，這也歸罪於生產搞好了的過錯。

九、家屬不願回家。這確實是比較普遍的現象，特別是一九六三年秋冬以前，來隊家屬更多，部隊對來隊家屬管吃飽飯，幹部戰士很滿

意。這不是搞生產之「罪」，而是一件好事，生產發展了，部隊才有可能解決這一問題。

十、事故增多。部隊搞生產確實出了不少事故，當然有值得教育批評的地方，但部隊軍事訓練，國防施工出的事故還少嗎？這又是什麼問題？

此外，還有許多指責。軍隊搞生產受到了這樣大的壓力，不是我頂不住的，我可沒有這樣的能耐。軍隊的生產所以沒有被壓垮，主要原因是：1、毛主席、軍委支持軍隊搞生產，這是最大的力量；2、林總和各元帥不斷親自過問部隊的生產、生活情況，特別關心部隊不能發生浮腫病；3、形勢所迫。在全國嚴重災荒的情況下，軍隊祇有生產自救的道路，才能解決問題，別的辦法是沒有的；4、軍隊生產代表了廣大指戰員的利益，從而調動了廣大指戰員的生產積極性，軍隊搞生產是一件流傳千古的大好事。

從上述情況可以看出，軍隊搞生產決不是我的什麼「單純生產觀點」可以辦得到的，我祇是在軍委領導下，做了應當做的工作。也可以說，在搞生產的問題上，我是當了一名合格的總後勤部部長的。

第三根大棒：軍純財務觀點。

在這個問題上，他們對我的指責不僅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而是想加我大罪。這裏祇能舉些例子來說明問題。

第一個問題，實行企業化單位的財務核算問題。在軍隊逐漸減少定額的情況下，有些單位要取消，不能繼續存在，例如建築部隊、營房維修分隊等等。對這些單位怎麼辦？這是大軍區以上都存在的問題。一九六二年全國編制裝備會議期間，總參軍務部要我提出解決辦法來，經過考慮我提出了「編外定編，實行企業化管理」的辦法，這樣既可保留必要的勤務分隊，又不佔軍隊編制。我的意見得到了羅總長和各大軍區首長的贊同。

第二個問題，以高價買軍需產品「使用時間」問題。我的觀點是軍需產品是一種特殊用品，質量是起決定作用的。有的產品因為質量好，使用時間長，反而更便宜。對此，在濟南布鞋廠，我同工廠展開了討論。該廠生產的布鞋一般的來說是比較好的，但祇能穿一個多月。如果提高質量，能穿三個月，成本提高五角，前者便宜，還是後者便宜？他們

同意了我的觀點，後來生產的布鞋能多穿兩個多月，但成本祇增加五角錢。

第三個問題，組織家屬搞服務性生產問題，部隊來隊家屬，有不少生活很困難，來了就不回去。當時社會上還沒有打臨時工的工作，而部隊組織家屬生產，則可以有一定的收入。家屬搞服務性的勞動雖然不多，但還是有一定出路的，例如縫補、洗舊棉衣等都可得到少量的收入，這是後勤部隊做的好事，受到了家屬和部隊親屬的歡迎。

第四個問題，部隊出賣農副產品問題。部隊搞生產之後，不少部隊的農產品有多餘的，自己消耗不了，怎樣辦？我向周總理報告了，總理立即回答：「向群眾出賣，越多越好。」並要秘書通知商業部照辦。

第五個問題，財務包干問題。前面專門提到了這是後勤業務改革的中心問題，這個問題不解決好，其它的改革都是空的。當時，主要是要辦的事很多，但國家撥給的費用總是有限的，不能滿足部隊需要是主要矛盾。

勤懇辦事，勤儉辦事，勤巧辦事

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至一九六六年一月召開的全軍後勤工作會議期間，大家在討論後勤工作突出政治的總結時，一致認為「勤懇辦事，勤儉辦事，勤巧辦事（以下稱三勤），是後勤工作思想建設的方向」，是後勤戰線的思想武器。一切工作都有自己的方向，後勤工作也應當有自己的方向，而三勤就是後勤工作必須遵循的總方向。

後勤工作是保障工作，保障作戰、保障訓練和保障部隊生活。而這些保障工作，在形式上都是服務性工作，要完成這些工作就必須具有「三勤」思想，這也是要有服務思想，節約的精神和有辦事的能力。我們要在學習和實踐中，不斷提高認識，才能武裝自己的頭腦，才能用「三勤」指導我們的行動。

我們應該怎樣做呢？就要做到三個認真，認真改造世界觀，認真管理業務，認真總結經驗。

一、認真改造世界觀。人們對客觀事物的認識，不管自覺不自覺，都有立場、觀點、方法問題。毛主席曾不止一次地批評總後勤部，「不過問也不認真管理業務」。這是什麼問題？就是為人民服務還是當官做老爺

的問題，也就是兩種世界觀的問題。在革命隊伍中，有進步與不進步之分，這是什麼問題，就是改造世界觀的程度問題。凡是世界觀改造得好，進步就快，反之則不進步，或進步很慢。改造世界觀不是一勞永逸的問題，而是每個人畢生的問題，應當是活到老，改造到老的問題。

二、認真管理業務。後勤工作是複雜的業務工作，管好業務是我們的職責，後勤工作不管業務或長期當「外行」是無論如何說不過去的，不能用任何理由去推脫自己的責任。後勤幹部不會業務，就如同和尚不會唸經是一樣的，不會唸經的和尚是假和尚，不會管業務的後勤幹部是什麼？那就是官僚主義。當然我們所說的會管業務是相對的，比如說，一個後勤部長要精通後勤的各種業務是絕對不可能的，我也還是一個不懂業務的後勤部長，但我比過去懂得多一點了，比如說，我過去祇懂汽油這個名稱，現在知道汽油有多少種，我們祇要學習是會多懂得一點的。

事業心是管好業務的根本問題。不可設想一個沒有事業心的人，能夠管好任何事業。這種人祇能是當官混日子，反之，一個有事業心的人是不會管不好事業的。事業心、責任心是一致的，一個人有事業心最主要的表現，就是對自己所管的事有高度責任心。總之，在我們後勤戰線上是值得發揚事業心和責任心，沒有廣大幹部的積極努力是做不好工作的。

規章制度是管好業務不可少的，我的觀點是要有規章制度，但反對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和用規章制度束縛解決具體問題。規章制度是一般性的，實際情況是複雜的、現實的，在工作中應當很好結合起來。對現行的規章制度應很好總結、改革，使我軍後勤的規章制度更加合理，更加切合實際，更能促進業務管理工作。

要管好業務，有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學習業務。幾年以前，我提出過「學知識，立規矩，鼓幹勁」，提倡學習業務。我們要學習必要的業務知識，更要學習管理業務的知識，後者是學習的重點。業務是具體的，各有不同的特點，但從管理的意義上來說，有共同點，這就是領導幹部學習的重點。

三、認真總結經驗。近幾年來，我們全軍後勤部注意到了總結經驗這個問題，有的軍區做的還比較好，整體來說，發展趨勢是好的。我們

後勤戰線上可歌頌的事情多得很，各種發明創造，各種典型多得很，但我們總結出來的東西則是很少的，總結好的則更少。

人們的認識總是從感性到理性，從少到多從分散到集中，從雜亂到系統。我們祇有把零星的感性認識，集中起來上昇到理論知識，其作用就更大了。現在我們後勤系統似乎有這種傾向：對好人好事祇注意表揚，評上四好五好就行了，這樣做是很不夠的，更重要的是很好總結他們的經驗，把分散的東西集中起來，系統起來，成為指導工作的經驗。

總結經驗是提高思想水平的主要途徑。一個人不可能事事都實踐，但學會總結經驗，學會把別人的實踐經驗總結起來，成為自己的經驗是決不可少的，總結經驗是領導幹部最為重要的實踐活動，我們一定要學會總結經驗。總結經驗，不要貪心過大，華而不實，一鳴驚人，一般的來說，這是不現實的。最靠得住的辦法是從個別問題開始，深入進行，逐漸擴大、提高。對事物的認識，不怕粗淺，質量不高，最怕的是不去實踐。我希望全軍後勤部門，改進作風，重視總結經驗，把後勤建設再提高一步。

我們後勤工作突出政治，也有它的共同性和特殊性。從後勤的共同性來說，有三個具體問題是學習的重點，這就是：勤懇辦事，勤儉辦事，勤巧辦事。

勤懇辦事，就是要有誠懇的服務態度。後勤的各項工作，都是直接或間接為廣大指戰員服務的，都是屬於服務性的工作。這是後勤工作的特點，我們必須深刻認識這個特點，對同志對人民極端熱忱，樹立勤勤懇懇為部隊服務，全心全意為部隊服務的思想。

做到勤懇辦事就要有實幹精神，後勤工作是很具體的，都是要動手動腳才能做好的。我們做後勤工作的，都要當「有頭腦的事務主義者」，一方面要有政治頭腦，一方面要勤懇辦事的作風。我們要反對那些動口不動手的官僚主義者。現在全軍後勤都在大搞服務上門，物資下送，醫院不少專家也到部隊去了。這是非常好的要堅持下去。

勤儉辦事，就是辦一切事情都要講究實效和節約的原則。我們後勤工作的主要內容就是管錢，管物。管得好，就叫管家，就叫紅色管家人；管得不好，就叫敗家，就是「敗家子」。我們突出政治，就是要把我們革命業務管好。怎樣才能管好革命的家務呢？最主要的就是要樹立高度的革

命責任心，要管好革命家務，就必須對工作極端負責，時時刻刻想到把工作做好，責任心的強弱，是一個人政治覺悟高低的表現。

其次，要自己動手。想問題，辦事情，要立足於自力更生的基點上，首先要看到自己的雙手，相信自己的創造能力，不能大小事情總是眼睛向上。自力更生是革命精神，是我們戰勝一切困難的力量源泉，這個方針運用到我們軍隊後勤工作上，就叫做自己動手。近年來，我們自己動手搞生產，搞科技革新，搞建設，以至每個戰士一個針線包修修補補都能解決很多實際問題。我們自己動手，不僅能解決自己許多問題，還能減少國家的負擔，這就是對社會主義建設的支援，也就是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直接行動。

勤巧辦事，這就是說要又紅又專。管業務工作，一定要解決會辦事的問題，也就是要解決為部隊服務的實際本領。如果我們不懂業務，不會辦事，那就談不上突出政治，我們反對空頭政治，也要反對祇會說話不會辦事的空頭業務。我們做業務工作的，如果不懂得實際，政治也就是空的，因此，我們一定要在政治掛帥的前提下，熟練自己的業務技術，提高自己的辦事本領。

第二十章 軍隊的風雨歷程

林總推選羅瑞卿為總參謀長

一九五九年，羅瑞卿出任總參謀長是林總推薦的。羅瑞卿並不是以戰將的身份出任總參謀長的，但他是一位名將，是軍隊十員大將之一。可主席認為羅渾身都是「刺」，問林彪怕不怕刺到他身上？林彪說不怕。主席的言外之意是不太同意羅幹；林總說「不怕」，是有點堅持自己的意見。後來還是總理給主席做了工作，總理對主席說（大意）：你讓林管軍隊，他那個人的身體狀況，也祇能管大事，把握方向，具體工作要找個他熟悉且身強體壯、精力充沛的人。毛主席最後批准了林的意見。

林和羅的關係，淵源是很深的。早在一九三〇年林彪當紅四軍軍長時，羅是四軍十一師政委；林任一軍團軍團長時，羅是軍團保衛局長；在延安，林是紅軍大學的校長，羅是教育長。他們在戰爭年代艱苦卓絕的環境中，在槍林彈雨之下，結成革命的情誼。

林的確是用人不疑的，對羅瑞卿是特別地委以重任。除總參謀長這個重要的職務外，羅還擔任軍委秘書長，軍委辦公會議召集人。林總身體不好，難以參加日常工作，爲了給羅瑞卿創造更好的工作條件，林總提議羅瑞卿爲中央書記處書記等要職，得到了毛主席的批准。歷屆總參謀長頭上掛的職務，數羅最多，比如副總理一職，粟裕、黃克誠都不是。

林總選羅瑞卿當總長沒有什麼錯，羅也是能勝任的。羅瑞卿是很有革命幹勁的人，魄力大、幹勁足、責任心也很強，工作是盡心盡力。羅確實也爲林彪、葉群盡心辦過很多事，對他們的子女豆豆、老虎的生活、學習都很關心。

不過，幾年後主席關於羅渾身是「刺」的話言中了，羅的「刺」刺到了林彪身上，刺到了老師身上，刺到了不少軍隊老幹部身上。林彪不

怕羅的「刺」，並不等於別人不怕。例如六四年的時候，供應比較緊張，葉帥的弟弟葉道英在華僑事務部門工作，他搞了一點自行車的票證，這件事屬不屬實且不說，就是有其事也與葉帥毫無關係，結果組織人在會上把葉帥圍攻了一頓，敗壞葉帥的名譽。羅垮臺時，喝酒慶祝的，不乏其人。

一九六三年九月間，林總是太累了，身體情況極其不好，一下就病倒了。毛主席叫他休養，抓住大政方針就可以了，並指定軍委副主席賀龍主持軍委的日常工作。林總一隻「猛虎」休息，「群龍」就湧動起來，關鍵人物是羅瑞卿。羅瑞卿像一個砝碼，在毛主席對劉少奇、對黨內一線工作有看法時，劉少奇、鄧小平對毛主席有隔閡時，如果羅瑞卿堅持站在林彪這邊，就等於站在毛主席這邊，就等於站在主席一直倚重的「雙一」（紅一軍團、紅一方面軍）這邊，這樣主席就放心，這也是毛主席、林彪及諸元帥推舉羅瑞卿任總長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羅瑞卿和賀龍搞在一起，疏遠林總，不聽林總的，那毛主席就認為問題相當嚴重了。賀龍和劉、鄧，和一線的書記處是密切的，軍隊的事情，如能被這些人所左右，主席是不能容忍的，主席是必須防範的，必須採取措施的，毛主席歷來對軍權極為重視，不許他人染指的。從林總休息開始，軍隊的情況從有微妙的變化到逐漸有了很大的變化，當然這些問題是不能說出口的，林總祇能批評羅，爭取把羅拉回來。但羅瑞卿讓毛、林都失望了。羅有了私心，他把寶押在「林總的身體不會好起來」上面，他這個砝碼倒向了賀，再有就是幾年的工作成績讓羅有些忘乎所以，沒有剛上臺那樣謹慎了。

賀龍、羅瑞卿能夠搞起一個與林彪對立的陣營，其基礎與軍隊歷史上的山頭是有密切關係的。

一九五九年反彭德懷鬥爭的時候，陳毅專門介紹過林彪的歷史。他說：林總在一九二七年南昌暴動的時候，在葉挺獨立團擔任排長職務。向廣東轉移的時候，我們在廣東大埔三河壩，和敵人遭遇，林總擔任連長的特務連向指揮部靠攏，我們得救了，後來林總帶的隊伍就成了我們繼續戰鬥的主力了。在湘南暴動的時候，林總帶的連隊戰鬥力更強了，一直是整個部隊的主力。從南昌暴動上了井岡山的部隊就編為紅軍二十八團，林總就是二十八團的團長。林總帶的二十八團是當時紅軍部隊的主

力，紅一軍團就是在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林總二十一歲的時候就當了師長，二十四歲當了紅軍第四軍軍長，後來長期擔任一軍團軍團長。一軍團出了許多優秀的高級幹部，並一直爲毛主席器重和依靠。林總對創建這支主力軍團是有重大貢獻的。

歷史上，我軍的三個大山頭是一、二、四，三個方面軍，但其中有些人的歸屬則有不少變化。這三個大山頭的特點是：1、一方面軍的幹部最多，並且有很多能人。其次是二方面軍，幹部也不少，但能人比較少。又次之是四方面軍，幹部數量不少。2、在黨、政、軍各界擔任要職的情況，也是一、二、四方面軍的順序。3、三個山頭的代表人物實際上是彭德懷、林彪，賀龍、徐向前。從個人的歷史功績、威望、能力來看，林彪當然屬於第一位的；徐向前由於張國燾及四方面軍的原因，他本人很謹慎；因此，能夠和林彪的陣營相對立的，祇有賀龍的山頭。從搞山頭的真正意義來說，賀龍這個山頭甚過所有的山頭，在全國解放後也始終是緊密團結的。不僅如此，賀龍還在彭德懷下臺、徐海東得病後，把能夠拉過來的三軍團、十五軍團的無「家」可歸的人都收在自己門下了，賀龍把他們都團結得很好，他甚至說：「茅臺酒勝過黨性。」賀龍還同最高層一些人如鄧，有最爲密切的關係，因此，賀龍在黨內鬥爭中是能起「砒碼」作用的人物。賀龍能把好多人拉在一起，特別象羅瑞卿這樣的人也在利用賀龍做事。羅瑞卿的問題是由林彪身體不好引起來的，如果林總身體好，還在崗位，羅是不會離開林總的。當時林彪的身體確實不好，有體好，還在崗位，羅是不會離開林總的。當時林彪的身體確實不好，有一段極其不好，毛主席對林彪的身體很擔憂，專門爲他書寫了曹操的詩《龜雖壽》，並派汪東興帶上自己相當數量的稿費去看他。一九六三年，在林彪休養前，毛主席指定賀龍主持軍委工作，並說：「軍隊的工作，今後就靠你了！」毛主席對賀龍說的這句話，就是林總後來說的毛主席的話「一句頂一萬句」最原始的來源。毛主席的這句話確實引起了賀龍、羅瑞卿的心事，從此開始，他們二人就在林總身體上做文章了。

羅瑞卿的變化

賀龍主持軍委日常工作之後，我開始感到羅瑞卿同以往有極大不同，這就是羅對賀畢恭畢敬竟到了庸俗的程度。這個問題，引起了我的深思，羅瑞卿當了軍委秘書長和總參謀長之後，以我的觀察，除了對林

總是五體投地的尊重之外，對劉帥也還可以，對其餘的元帥都幾乎不在其眼中。現在對賀的尊重，比對林的尊重還有過之而無不及。當時，我還認為，因羅同賀歷史上沒有共事的關係，所以羅對賀這樣做是顧全大局的，應當這樣做的。後來，賀、羅對林總的身體同時「憂慮」起來，就有了新的想法了。

賀龍、羅瑞卿在林總的身體上下賭注是有理由的，他們要大家聽他們的，除了以「關心林總的心情」向大家說明林總的身體是到了「無可奈何」的地步之外，用任何辦法要在林總身上打主意，不僅不可能，反而會適得其反。因為林總的歷史功績，在群眾中的威望和才幹，是別的任何元帥都不能與之相比的，賀、羅的政策可謂是高明之極了。

羅瑞卿對林總身體的「關心」確實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了。羅瑞卿過去的講話，三句話有兩句都要帶上林總如何說的，如何高明，以後的講話則三句有兩句都要帶上要如何關心林總的身體。他甚至講過「我們身上的血肉，如果對林總的身體有利的話，我相信大家和我都會慷慨的。」

羅瑞卿把大家與林總隔開是用了很多辦法的。首先是，動員大家不要干擾（看望、匯報）林總，其次要軍委辦公廳蕭向榮總把關，對「隨便干擾了林總休息」的人，還要給予批評。他的這些辦法，有效果但效果又不理想。於是，後來就把傅連璋抬出來了，傅在一次軍委辦公會議擴大會上說：「我們對林總是盡量爭取他多活些時間，別的辦法是沒有的。」他的話，給人的印象是「林彪是在熬時間了」，這席話，造成了極大的影響，有些人就開始找自己的出路了。

在兩個陣營中，各有能起作用的主要人物二十多人。從數量上來說，幾乎相等，但力量懸殊，最主要的是政治力量和能力不同。林彪陣營有一批能人，這是優於賀、羅陣營的，尤其是林彪同毛主席的關係特別密切，這也是特別的優勢。賀、羅陣營雖然有同劉少奇、鄧小平的關係，但他們同毛主席的關係就大大不如林彪了。這個不如，在某種程度上起決定作用。另外，在軍委內部劉伯承、陳毅、羅榮桓、聶榮臻、葉劍英等元帥都是支持林彪的，這樣，賀龍在軍委內部幾乎成了孤家寡人。

兩個陣營的鬥爭是很激烈的，但鬥爭的辦法大相逕庭。林彪除了保護自己的人不受打擊外，一般不挖別人的人。他認為把別人的人收來沒有用，反而成了包袱。賀、羅不同了，他們除了保護自己的人外，還

盡量收羅別人的人，他們認爲人越多越好。像我這樣在軍內地位普通的人，在總醫院住院時賀、羅都去看過我，羅還去過兩次。賀龍請我到他家去吃飯，那就不止一次了。

軍隊內部兩個陣營的形成

在軍委內部，由於對軍隊建設的方針看法不同，就逐漸形成兩個對立的陣營。

兩個陣營鬥爭開始表現在對譚政下臺問題上。林彪對譚政的工作能力向來是不滿意的，四野進關時，爲了加強政治工作，林彪特意調陶鑄擔任四野政治部副主任。林彪主持軍委工作以後，批評總政的工作「四平八穩」沒有創造性。對林彪的批評，譚政沒聽進去，他就是個四平八穩的人，實在沒有能力領率總政，他祇是吞吞吐吐地說幾句要「改正」之類的话，就沒有下文了。在林彪不在場的軍委常委會上，有的人還常說點帶有挑撥性的話，例如，有人說：「你們總政治部那樣多秀才，多寫點『領導』呀，『第一』呀，『鼓勁』的文章有什麼難啊！」有的人則消極地說：「做不好就到他那裏（指邱會作）養馬去。」他們之間這類話說多了，就傳到了林彪那裏，林彪就不能不考慮總政主任的人選了。

當林彪提出要另擇總政主任的人選時，軍委內部出現了激烈的鬥爭，提出了好幾個人選。最後，林彪把提出來的人選都提到毛主席那裏去了，請毛主席選定。毛主席最後決定，由羅榮桓兼任總政治部主任，蕭華爲第一副主任。蕭華反對譚政是積極的，但收穫不大，自然心裏有想法，這也是後來羅瑞卿把他拉動了的原因之一。

林彪、羅瑞卿、劉亞樓他們真正是戰友加兄弟，情誼很好，相知很深。但羅有了「心思」之後，他就拉動了劉，林總是心知肚明的。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日在江西擊落一有人駕駛的電子偵察機，十一月一日空軍導彈在江西擊落 U-2 偵察機一架。另，一九六四年二月軍委在北京召開學習空軍經驗現場會。林彪聽了匯報後說：「空軍的建設有成就，對空軍應當宣傳一下。」這是學空軍的直接由頭，但還有它的深層原因，林彪知道劉亞樓和羅瑞卿混得過密，經過反覆考慮提出向空軍學習，從而拆散羅和劉的不健康的關係。羅瑞卿對林彪的這一舉動感到突然，他說：

「我們真跟不上林總的思想，學空軍是沒有思想準備的。」他在表面上採取了擁護的態度，卻又在辦公會議上說：「學空軍是有政治目的的。」

軍委決定全軍學習空軍的第三天下午，楊成武約作戰部長王尚榮和我一同去空軍參觀。劉亞樓、吳法憲、曹里懷等空軍領導同志都在辦公樓門前迎接我們，我們參觀了空軍的內務、衛生等後，劉亞樓等陪同我們在食堂吃了晚飯，整個接待搞得十分熱情。飯後，我們在劉亞樓家裏閒談時，我問楊成武：「蕭主任爲什麼沒有來？」他沒有直接回答我的問題，卻說：「林總說，觀其人先觀其友，你懂嗎？」楊的這句話引起了許多複雜的想法。

學空軍的時間不長就結束了。羅瑞卿對此一直是消極的，他除了在三座門主持了一次劉亞樓向駐京部隊的匯報會外，其餘沒有參加什麼活動。經過學習空軍的活動，軍委內部兩個陣營站了一次隊，誰站在那一邊都清楚了。

全軍大比武

從一九六四年六月開始，全軍開展了大比武活動，這場大比武的規模，在我軍的歷史上是空前的。海軍在青島舉行了海軍各兵種最大規模的現代化實戰演習，空軍部隊有少數單位進行過以師爲單位的實兵演習，各大軍區都進行過全區性的部隊大比武，羅瑞卿等紛紛親臨現場觀看比賽，其排場之大也是空前的。大比武不能說沒有一點積極作用，但搞比武、搞演習中出現的弄虛作假、錦標主義、揮霍浪費比比皆是，也是空前未有的。由於大量的經費用於比武，軍事訓練等費用多開支五億多元。

爲了大比武，一九六四年底羅瑞卿在南京召開了全軍陸軍軍長以上的幹部會議，祇有一個軍長因病未到會，還受到了羅瑞卿的批評。會議開始之後，羅要秘書通知我也去參加會議，我也應當去參加，但我因爲當時有事脫不了身未曾去，派了副部長張賢約去參加會議。南京大比武回到北京後，在一次軍委辦公會議上，楊勇向我開玩笑說：你怕花不起錢，南京開會都不去。我正要回答時，羅瑞卿以相當嚴重的神氣補充說：「官大了，還能隨便請得動？」對羅的話，我很驚訝，但由於我同羅並非「兄弟」班子，他是我的上級，現在又那樣的嚴肅，我就一句話也不說

了，但引起我心裏好多的想法。爲什麼羅瑞卿會出現這樣一種態度？在我的心裏總是放不下。過了幾天，我是在楊成武那裏無意中搞清楚了這個問題。

一天，我到楊成武那裏有事，聽到他交代秘書說：「你同張宗遜副總長打個電話，明天總參黨委會議，請他主持，我有別的事就不到會了。」他接著好像自言自語說：「會議除討論大比武之外，沒有別的內容。想用開黨委會的辦法，也把我套在大比武之中去，沒有那樣簡單。」其實，他不是自言自語，是說給我聽的。從上面兩句話，我心中不解的問題有初步答案了。爲了要搞清楚一點，我又問了楊成武一句話：「天津的大比武，聽說盛況空前，你參加了嗎？」楊成武笑著說：「比武也好，比文也好，好戲還在後頭呢，我才不去。你也是辦公會議成員，全軍大比武，什麼時候軍委批准過？什麼時候林總同意過？」當時，楊成武確實是不折不扣的林總的代言人，他對大比武的態度就是林總的態度。這是什麼性質的問題，我當時還是不清楚的，但不管怎麼樣，從此我對大比武就慎重對待。果不其然，在一九六六年北京批羅時，羅瑞卿在三月十二日的檢討中承認「這次大比武是我個人擅自決定的。現在看來，重開一次那樣興師動眾的南京現場會議，就是一個錯誤的決定，而且把軍委主管訓練工作的葉劍英同志撇在一邊。」「大比武帶來的嚴重惡果，劉志堅同志歸納了八條，張宗遜同志歸納了四條，全軍比武資料上歸納了十條，邱會同志特別講了經費、物資、彈藥的驚人浪費，在軍內外造成了惡劣的影響！」

張宗遜副總長是主管軍事訓練的，曾數次要我組織一次全軍後勤系統的大比武。張說：「現代化的戰爭後勤保障佔有重要的地位，沒有現代化的後勤，也就不可能進行現代化戰爭。組織一次全軍後勤的大比武，實屬必要。」我半開玩笑的回答說：「後勤沒有武可比，也沒有文可比，比吃還可以。」我總是用些沒有什麼用的話，把比武的問題拖著不表示態度。

一天，軍委常委開會，在會前張宗遜當著賀龍、羅瑞卿的面又問我說：「總後比武的問題定下來了嗎？」賀、羅都主動說：「總後組織一次全軍後勤大比武很好嘛！」要後勤搞比武的問題，權威人士都在向我加碼，我就不好多說話了。我祇能說：「待研究準備後，再向軍委報告。」要組織後勤搞比武問題，總後內部不少人積極性更高，好多人都要我下決心，

並且還得辦得像個樣子。所以，後勤不參加比武問題，我既要應付上面，又要應付自己內部，真是內外爲難。總後在大比武的風裏浪中沒有太大的動作，不是我有多高的認識，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經費問題，如果總後因比武多花了錢，其它單位都會因比武來問你要錢，全軍花的錢就不得了，控制不住。

林總歷來是重視部隊的，他說：「政治同軍事相比較，政治是屬於第一位的。」據我當時的觀察，有的人並不反對突出政治，林彪也不反對搞軍事訓練的，那爲什麼把大比武的問題提高到了兩條軍事路線鬥爭的高度了呢？這裏的奧妙是羅在自己的檢討裏說的很清楚：「我爲什麼要這樣幹呢？除了自己喜歡獨斷專行，不講民主的惡劣作風外，還有個人主義的好大喜功，想在軍事訓練上搞出一點突出的成績來，以便向主席，向黨，向軍委，向林彪同志邀功報捷，動機是很不純的。自己到處跑，到處看，跑了十三處之多，也證明了這一點。」

羅把大比武當作一種手段，他是借大比武突出自己，急於在林彪身體極其不好時，順當的接班。當時，林彪一發覺賀、羅「聯盟」，完全違背了毛主席由林彪掌管軍隊的初衷，不顧自己很弱的身體情況，就對羅開始批評了，但羅聽不進去。林的舉動不是爲了自己，而是爲了毛主席，在當時來說爲了毛主席就是爲了黨的大局。那時候唯一能拿到桌面上的說法，就是搞大比武衝擊了突出政治。林總進行這場批評的前線總指揮就是葉劍英、楊成武，這就是當時的軍內的實際情況和實質問題。這場鬥爭使軍委內部兩個陣營鬥爭達到尖銳化、明朗化的程度。

全軍大比武，在我的思想上，工作上都不佔位置。這不是因爲我在政治上就有什麼考慮，而是總後的事太多了，確實沒有時間「陪差」。我自己想：「跟著元帥、大將到處跑，出風頭是夠意思的，但是工作沒有人管，就不夠意思了」。除非公差派到我頭上，我一般的都不參加與我工作無關的活動。

劉亞樓、楊成武、蕭華的作用

劉、楊、蕭都是林彪的老部下，都長期在紅軍一軍團工作。劉、楊是福建人，都是由地方部隊編入一軍團的，蕭是在江西興國縣直接參加一軍團的。他們三人都有點文化，又肯學習，當時都算是有知識的人

了。他們三人在當時的條件下都得到了很好的發展，劉、蕭在長征中和長征後期，就分別當了主力部隊的師長、政委。這裏不說他們的歷史功績，祇說說他們在解放後，特別是在軍委內部兩個陣營鬥爭中所起的作用。

全國解放初，毛主席曾委託林彪提出組建海、空軍和特種兵的方案。當時以四野十二兵團的領導機關為基礎組建了海軍，以四野十四兵團的領導機關為基礎組建了空軍，以四野特種兵縱隊為基礎組建了炮兵和裝甲兵。林彪對海軍的建設是既關心又不放心，而對劉亞樓任司令員的空軍建設是既關心又放心。果然，在同時期、同樣以陸軍為基礎建立起來的兩個軍種出現了很大的差距，空軍發展很快，海軍出現了落後狀態。一九六二年，軍委組織了一個檢查團，以東海艦隊潛水艇事故為突破口，檢查了整個海軍工作。檢查團是以楊成武為首的，團員有劉志堅（總政副主任）、李作鵬（總參軍訓部長）、張秀川（總政組織部部長）。事後，李作鵬調任海軍副司令，張秀川調任海軍政治部主任，這是對加強海軍建設採取的一個重大步驟。

林彪對劉亞樓向來是器重的。劉在林彪陣營中處於很優越的地位，他們是同志加兄弟，林對他的重視是高於蕭華、楊成武的。劉亞樓同羅瑞卿的關係也是十分密切的，羅在當公安部長時期就曾保護過劉的一些「什麼」問題過關，特別是在一九五五年隨同彭德懷出訪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前一天晚上，有某人服毒自殺，羅下命令緊急搶救，沒有發生人命大事，劉也躲過了一場政治責任。所以，後來的羅、劉搞「四條」是有基礎的，羅是發起者，劉是被利用的。一次，羅在辦公會議散了以後，閒談時說了這樣幾句話：「現在中央領導中都讓別人塞滿了，林總這個人向來都不注意自己的地位，更不為別人去考慮。」劉接著說：「我也是同感，我看可以同一〇一談談心。」

林彪把劉亞樓拉了回來，是經過楊成武多次談話之後，劉亞樓才覺悟的，劉亞樓在一九六五年春天最後說：「我把羅瑞卿這個野心家沒有看清楚，真傷心！我認識林總以來，就祇有這一次對不起他！有關向林總提建議的內容都記在一個本子了，我請你把這個本子交給林總，這就是我的交代。」毛主席看了劉亞樓的本子之後說：「劉亞樓是個好人。臨動身

之前（即死之前）把問題說清楚了，還是一個好人。這樣他到馬克思那裏就有共同語言了。」

劉亞樓因患肝癌於一九六五年五月初去世，去世前的四月十五日，他給羅寫了一封信，對羅表示不滿，因為病重，生前沒有交出去。在一九六五年上海會議時，劉的這封信作為證明材料發給了參加會議的人員。劉的這封信比葉群的發言有力量得多，現在傳言鄧小平對此事說是「死無對證」，怎麼死無對證？劉生前的信還在嘛！

林彪對劉的死是很悲痛的。劉病危時，林在上海，一直等到劉去世後才回北京。劉的骨灰用專機送回北京時，林彪和各總部、軍兵種、院校的指戰員代表一千餘人在西郊機場迎靈。劉亞樓的骨灰停放在北京勞動人民文化宮，骨灰盒上是林彪的題詞「劉亞樓同志永垂不朽」，對他舉行的追悼會的規格同羅榮桓元帥的規格是一樣的。劉亞樓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鬥的一生，也可以說是榮耀的一生！

楊成武在全國解放後，基本上就接替了聶榮臻在華北的地位。他不僅成了華北地區的領導人物，也成了全軍的實權人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楊的地位突然高了起來，他對華北地區的發言權高於聶榮臻，是能夠掌握華北局勢的人物，他對軍隊的發言權僅次於林彪。他對我軍建設做了許多工作，他的貢獻最大的有兩個：一是國防建設；二是對穩定林彪陣營起了重要作用。

林彪主持軍委工作以後，根據毛主席確定的戰略方針，提出了一系列關於國防建設的方針政策，而楊成武則是具體組織實施者。從一九五九年起，首先以總參第一副總長的身份總攬全軍戰備建設工作，各項工作搞得有聲有色，幾年之內就改變了我國有國無防的狀況。這項工作楊沒有完成，一九六八年他下臺之後還繼續在搞。我們可以這樣說：毛主席提出了戰略方針，林彪是執行者，林彪提出了作戰方針，楊成武是執行者。領導實施我軍的戰備建設，是楊成武一生中取得的最大成就。

楊成武同羅瑞卿的個人關係也是很密切的，但羅始終沒有把他拉過去。楊成武不僅在思想上、工作上同林彪保持著密切的關係，就是在對待賀、羅的拉攏上，同樣保持和林彪這個「病號」革命同志的關係。羅對楊的一舉一動，楊都及時向林彪報告。例如，羅瑞卿把楊的愛人從地方上調來做楊的辦公室主任，羅指定楊住元帥的房子，羅親自交代為楊

配備專用護士等等，楊都是先得到林彪的同意才辦的。凡是與賀、羅陣營有關係的大問題，楊都設法迴避。例如，對大比武，楊成武連總參黨委會和軍委辦公會議都藉故不參加。

蕭華在全國解放不久就是總政治部副主任，羅榮桓去世後他就成了總政主任。論地位，蕭華比劉亞樓、楊成武早參加軍委領導工作，但蕭華一直沒有起大的作用，政治上沒有多大作為，所以對總政治部的工作，上到毛主席，下至基層幹部都不滿意。

蕭華在軍委兩個陣營的鬥爭中是個動搖分子。他一九六二年被羅瑞卿拉過去了，後來又被林彪拉回來了。一九六三年，蕭在天津養病，羅瑞卿專程去蕭那裏商量有關軍委領導的人選問題。羅同蕭說：「看來，林總的身體不能再堅持工作了，中央要賀老總主持工作不是暫時的措施。」蕭說：「賀老總身體也不好，軍委的領導責任早晚要落在羅總長頭上！」羅很高興地說：「我們合作吧！」像這樣嚴重的問題，蕭華沒有向林總報告說過一個字，而是在羅瑞卿下臺後蕭華的秘書把這件事揭發了出來。林彪爲了團結大多數，對蕭華採取了往裏面拉的政策，這是正確的政策。

蕭華所以能夠被羅拉過去，主要原因是對自己的地位不滿意，譚政下臺後，蕭華已經準備上臺了，但毛主席決定羅榮桓兼主任，蕭華仍爲第一副主任，蕭表面上積極擁護，但心裏面是不滿的。林彪在軍委常委會上傳達毛主席的決定時說：「主席說，蕭華同志同羅榮桓同志一起主持總政工作很合適！羅出場有點古人味，這樣很好，梅蘭芳在臺上，即使不唱戲，臺下的人也不會說話的。」毛主席這番話，很顯然是嫌蕭華能力和幹勁都不足。爲了照顧蕭華的面子，林總是用他自己的語言說的。

劉亞樓、楊成武、蕭華三人在林彪陣營中，起作用最大的是楊成武，其次是劉亞樓，蕭華起的作用很小，在兩個陣營的鬥爭中，如果沒有楊成武的積極活動，不僅鬥爭會發生困難，而且可能發生難於預料的混亂現象。

葉帥打招呼

一九六五年，大約是五、六月間，軍委常委會在京西賓館舉行。會前，葉、聶兩帥在休息室談羅的問題。我進去了時他們還在談。我欲退出，他們卻招手讓我坐下，我聽到葉帥說：「他真是利令智昏了，人長、

腳長、手也長！」聶帥說：「壞就壞在手長上！」雖然他們說的那些話未指出人來，我的腦子一轉，也就知道是指誰了。葉帥還對我說：「我們談的問題，你是懂得的，將來你會知道更多的問題，估計你已經知道我們是說誰了。我們還要給一些同志打招呼。」關於羅瑞卿的問題，葉、聶不僅僅是打招呼的問題，而是教導我們要與羅的錯誤作鬥爭。

我當時就想，葉、聶議論羅的問題決不是犯自由主義，葉、聶都是原則性很強、修養很深的人，這樣的意見如不是來自毛主席那裏，他們是不會亂說的。這也說明早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三十日林給主席寫信之前，早在主席召葉群去談話之前，主席對羅瑞卿已有打算了。葉劍英、聶榮臻、謝富治、蕭華、楊成武等對主席的意圖早已心知肚明了。因為主席找葉、蕭、楊他們談話可以說是瞭解軍隊的情況，但叫謝富治去瞭解公安部的情况，就和軍隊的問題、林羅之間的關係問題毫不相干了，所以，葉、聶二帥向軍隊高級幹部打招呼，應當是主席安排的。而且，哪些人可以打招呼，哪些人不可以打招呼，可能都是主席決定的，比如不給賀龍打招呼，這麼大的事，葉、聶是不敢定的。然而我卻沒有聽說林彪給誰打過招呼，林也從來沒有找我談過話，講羅的問題。

一九六五年六月間，葉帥又把我叫到軍事科學院他的家中，專門談「長子」的問題。葉帥說：「我才從林總那裏回來，我向林總匯報了主席對羅的看法，主席說，『我說羅長子渾身是刺吧，刺到了你的身上，不知刺到林彪同志沒有？』我們談了很多問題，今天就同你談長子的問題。」

「長子問題？」我擔心沒有完全聽清楚。

「是的！就是談長子問題。你是辦公會議的成員，要起好作用。我們過去信任你，現在信任你，將來也信任你。」

葉談話的要點如下：

林總指出：長子這個人變了，可能是官大，權大，他一身從頭到腳都是官。他當總參謀長之初，還注意總參謀長的身份，現在是獨攬一切，他儼然是軍隊統帥了，把我和聶都不放在眼裏，劉帥、徐帥和你（葉）就更不在話下。

林總接著指出：我從一九六一年就開始敲打羅，主席說我是用袖掌櫃，我就敲打羅，人是我推薦的嘛，總是要負責任嘛！毛主席對民兵工作有指示，徐帥管民兵工作，你羅長子要聽嘛，徐帥按主席的指示講，沒

有錯嘛。你羅長子不能耍驕傲，你對人家不禮貌，人家說我用的人沒教養，這不對嘛。

林總還說：羅這個人很會裝自己的「腰包」。在南京軍區著手總結的郭興福軍事訓練方法，他開始不注意，後來毛主席做了批示，他就打主意了，把功勞硬搶過去了。

郭興福教學法是葉帥發現、總結出來的，羅搶了過去，並以大力推廣郭興福教學法爲由，在南京召開了全軍軍長以上的會議，除一個軍長因病未到會之外，所有軍以上的軍事幹部都到會了。這是一次興師動眾的「搶功」大會，大會之後並非搞軍事訓練，而是搞全軍大比武了。比武規模之大是空前的，但羅沒有請示，更沒有經過軍委辦公會議。各野戰軍、各軍種、各兵種都比武，形式主義發展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葉帥說，林總還指出：長子同他的「同盟」（指賀龍）已經搞起了一個圈子。他有了小圈子就把楊成武、李天佑、吳法憲、蕭勁光、李作鵬、邱會作等人放到圈子外，反而作爲他們的「爭取」的對象了，有時還給他們穿小鞋。有的人不願穿小鞋，有時還敢頂起來。

林總會對他提了兩點：一是，政治與軍事的關係，政治是第一位的，不要搞昏了頭；二是，要多團結一點人，總是比不團結人好，你待人處事要把我（林彪）放進來，你看不上人家，人家會說你的態度就是我的態度。

林總說：我看對羅還是批評教育，我盡到心了。怎麼解決羅的問題，要主席來定。

葉帥繼續說，對長子的問題，我告訴林總，已按照主席的意圖同聶帥、劉帥、陳老總、楊成武都談過，還要很快同有關同志打招呼，以免他們陷進去，有的會越陷越深。我們共同商定了一個打招呼的名單。第一步有你一個，然後視情況的變化，打招呼的人還要擴大。要盡量多爭取一些人，不要陷到長子和他同盟的圈子裏去。不過鬍子（賀龍）的問題不要對外人提起。

葉帥最後說：長子竟然咒罵起林總來了，讓林總讓賢、讓權，這是很多人想不到的。但仔細一分析，應該是可以想通的。第一，長子急於上臺，是把寶押在林總身體不好之上的。第二，長子搞大比武，就是想把自己打扮成一個軍事家，撈到政治資本，好「光榮」上臺。第三，鬍子

是歷來就搞自己山頭的。他自己的山頭，人手並不多，於是就注意召集「散兵遊勇」，把「無家可歸」的人，搞到自己門下來。第四，鬍子、長子利用了林彪身體不好，築起了自己的圈子，特別是把林總很信任的人都挖過去了（葉帥指的是蕭華、梁必業、吳克華等人），這是影響很大的。

林彪身體不好，出現了好大的政治問題。

毛主席的底牌

主席六二年開始就想扳倒劉少奇，並在準備條件，等待時機，到六五年時，毛倒劉的打算已基本成熟。倒劉要依靠軍隊，但軍隊在賀、羅手上，你羅瑞卿把軍隊搞成這個局面，能依靠得上嗎？！再說，老帥的「狀」都告到主席那去了，毛主席再重用羅等於他自己也支持縱容了羅，這樣會得罪一大批老資格，毛主席也意識到這個問題必須解決。而解決問題的最好方法就是拿掉羅，這是主席的決定，這是主席端掉劉、鄧司令部的重要戰略部署。要端掉劉、鄧司令部，首先要把中央書記處中的幹將拿掉，拿住軍權又是首當其衝的，因而，羅瑞卿的倒臺也是首當其衝的，這就是毛主席的底牌。

在毛主席面前，反映情況的自有人在，主席很早就知道了羅瑞卿的問題，主席自己對羅有所警惕了。對羅的問題，主席的確是有打算和安排的。

——一九六五年六月七日，毛主席任命楊成武爲第一副總長，並指定李天佑副總長管作戰部；六月十四日，又決定楊成武爲軍委副秘書長。

——一九六五年十月十日，毛主席在同大區第一書記和各大軍區司令員談話時說：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你們就造反。主席已經在吹風。所以，整羅，整楊尙昆，及以後整彭真、陸定一，毛主席都是通盤考慮的，把他們當成修正主義，把他們看成劉、鄧司令部的重要成員來考慮的。並不是像外面所說的：林要整羅，主席要拉林一起搞文化大革命，違心地支持了林。

——大概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毛主席下令軍委副秘書長、軍委辦公會議成員、中央軍委辦公廳主任蕭向榮停職審查，由楊成武兼代主任，並兼國防部辦公廳及總參辦公廳代主任；

——大概在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楊尙昆被免去中央辦公廳主任職務；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日，毛主席在蘭州軍區黨委《關於五十五師緊急戰備中突出政治的情況報告》的批示，批評折中主義就是指羅瑞卿的。毛主席多次找葉劍英、蕭華、楊成武、謝富治、劉志堅等人談話，叫他們收集材料，這些都是爲開羅瑞卿的會做具體準備的。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三十日，毛主席招葉群去杭州談話（不是如一些文章所說，是林叫葉群去杭州主席那裏的），這是主席準備把羅的問題向林攤牌了，也是給林打招呼吧。爲此，林給主席寫了一封短信，林自然也是怕在羅的問題上，把自己牽連進去，成爲黑後臺。葉群帶上一些材料，這些材料中最重要的一份在整理劉亞樓遺物時劉的家人上交的劉亞樓臨終前（四月十五日）給羅瑞卿的一封信，信中對羅大爲不滿（爲什麼不滿，還不是因爲「四條」的事劉當了炮灰，被林刮了鼻子）。這份材料才是上海會議十一份材料中份量最重的一份。

在文革中，有一次我和胡敏去毛家灣，葉群和我們吹牛皮時，拿著一雙灰色皮鞋說：「這雙鞋跟太高了，你（指胡）拿到祿米倉（總後服裝研究所）給我改成坡跟的吧。」接著葉群又笑著說：「這雙鞋還是羅長子出國訪問時給我帶回來的。羅對我說：『葉群呀，這雙鞋是我出國訪問時攢的零花錢給你買的，不要讓郝治平知道了，祇給郝治平帶了一條頭巾。』一〇一對羅長子是很器重的，羅過去對豆豆、老虎也很關心。那些年，林對羅是出奇的耐心，一直在批評教育他，希望他改正並得到元帥們的原諒，同心協力搞好軍隊的工作。但羅的問題究竟怎麼處理，林總一直在等毛主席的態度。有一次，葉帥來看望一〇一，一〇一象對不起人似的對葉帥講，我要經常刮他（羅）的鼻子，不要目中無人。葉帥對一〇一講了主席的決心，說主席讓我告訴你，羅的事你不要管了，由中央來解決。我們知道主席對羅的態度後，我都慌了神。這邊羅對林耍態度，可是別人以爲羅是仗著我們在耍霸道。」

林彪給毛主席的信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中旬，毛主席下令免去了軍委辦公廳主任蕭向榮的職務，由楊成武代理主任。蕭向榮是一九五二年由林彪點名調到北京的。葉群後來對我們說，蕭的事使他們「爲之一震」。

林彪給主席寫信是在一九六五年的十一月三十日，而且是在主席召葉群去匯報時，由葉群帶去的一封倉促寫就的短信。信中說：

主席：

有重要的情況需要你報告，好幾個重要的負責同志早就提議我向你報告。我因為怕有礙主席的健康，而未報告。現聯繫才知道楊尚昆的情況，覺得有必要向你報告，為了主席有時間先看材料起見，現先派葉群送呈材料，並向主席作初步的口頭的匯報。如主席找我面談，我可隨時到來。

林彪

主席召葉群去，其實是攤底牌了。後來葉群對我們說，主席對羅的態度和決心，對「首長和我都是震驚和幾乎是措手不及的。」

羅的問題不是一年兩年了，「四條」的事也有了一年了，且劉亞樓一九六五年五月就去世了，葉帥五月份都和我們打招呼了，可林對羅的問題還在考慮之中。林對羅的批評是有的，甚至是很嚴厲的，對羅的問題，林既沒有向外散佈，更沒有向主席報告，在此之前，不少老同志向林反映羅的情況，林都壓著，甚至「好幾個重要的負責同志早就提議我向你報告。我因為怕有礙主席的健康，而未報告。」現在，主席都找上門來了（召葉群去匯報），再不說，林就被動了，甚至隨時也會被裝進去，外面說，林如何處心積慮想幹掉羅，真是亂說一頓。另外，為什麼林彪不單說羅的問題，而是聯繫到「楊尚昆的情況」才向主席報告？可見，林認為主席也不是孤立地解決羅的問題，而是對劉少奇司令部的問題通盤考慮。為了愛護羅，「四條」的問題，林當時沒有在信上說。「四條」是主席招葉群去杭州時葉當面向主席匯報的。公開說「四條」，是主席叫葉群在上海會議的小組會上說的。其實，楊成武他們早先於葉群把「四條」的大意說出去了，這樣「四條」已經不祇是羅對林的不尊敬的問題了，而是上昇到羅有野心的問題了，我軍的總長有野心還得了？！是毛主席和楊成武把羅瑞卿推到有野心的問題之中的。

為什麼主席又要借葉群的嘴講出這「四條」呢？那就是通過此舉把林彪捆綁在毛主席「倒羅」的戰車上，其實葉群在上海會議上所講的，事後並沒有得到很大重視，因為葉群講的都是些個人關係的瑣事，祇是

現在渲染過重罷了。後來下發中央文件，根本沒有葉群的講話，而葉劍英、蕭華、楊成武、謝富治的發言作為中央批轉關於羅瑞卿問題的報告的附件下發了！

其實林、羅都有彌合裂痕的願望，羅曾說：「這次我認定了，跟定了，今後彈打不飛，棒打不走，我羅瑞卿死了燒成骨灰，都忠實於林總。」林也說過：「現在幾個大將，論身體，論能力，我不用羅瑞卿，用誰？」葉群也說過：「他（林）是把你（羅）作為最親密的人才給你發脾氣的嘛。」

外面說（包括羅本人），羅是如何如何抵制林的錯誤，也是亂說一頓。在文革中羅瑞卿的確遭受了大苦大難，但他出獄以後曾對他女兒說：「一直到做了林彪的班房，我還認為是毛主席和林彪對我的誤會。」這才是羅的真實思想。坐了班房還「執迷不悟」，過去怎麼會有抵制呢？！

第三篇

人民軍隊忠於黨

小引

毛主席下決心搞文化大革命，過去都說主要有如下三個問題：斯大林逝世的影響；赫魯曉夫上臺的教訓；劉少奇的問題。但這三個問題，是否就是毛主席下決心搞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從文化大革命的過程和結果來看，有符合的地方，也有很多不符合的地方。

斯大林逝世對毛主席的影響是很大的。斯大林繼承了列寧的事業，把蘇聯建成了社會主義國家，打敗了德國法西斯。這三件事，使毛主席對斯大林是敬重的。建國初期，我們決定向蘇聯學習，重點學習三個問題：

第一是，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問題。在我的記憶裏這是學習蘇聯的核心問題。

第二是，優先發展重工業問題。

第三是，國防工業問題。蘇聯是把國防工業放在國家整體建設的首位，我們先後也成立了幾個工業部，都是搞國防工業的。

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後，赫魯曉夫上臺。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做秘密報告，徹底否定斯大林。這一舉動，影響了中國的政局。赫魯曉夫上臺以後，搞了對國內、國外影響很大的三手：對外和帝國主義搞和平主義，對內搞反斯大林運動，對中國搞大國主義和分裂活動。赫魯曉夫背離了共產主義的軌道，打亂我們建設社會主義的步伐。毛主席說赫魯曉夫搞修正主義路線。

由於蘇聯搞修正主義，改變了我們集中力量搞經濟建設的方針，不得不把防修、反修的鬥爭放在重要的日程上。毛主席是堅決反對赫魯曉夫路線的，毛主席不但親自參加在莫斯科舉行的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代表會議，我黨還以評論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方式，闡述了我們對共產主義運動的基本原則，前後發表了九篇評論，這些做法在國際上起了重要

作用。簡單地說，我們同蘇聯的關係是：從學習斯大林的社會主義開始，到反對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而告結束的。

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對反對修正主義是提得很高的。但時間不久，即一九六六年八月，在黨的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報出來後，就把「革命」的矛頭公開指向劉少奇、鄧小平的黨內資產階級司令部，從此，「反修防修」就成爲口頭禪了，打倒劉少奇就是目的之一了。

毛主席爲什麼要打倒劉少奇？這是一個其他人說不清的問題，這個問題祇有毛主席心裏知道。八屆十二全會，定劉少奇爲「叛徒、內奸、工賊」，真正相信的人並不多，但又都舉手擁護毛主席永遠開除劉少奇黨籍的決定。舉手打倒劉少奇的，除林彪、陳伯達、康生、謝富治、黃永勝被列入另類外，其他的人不但有偉大領袖毛澤東及周恩來，朱德、陳雲、董必武、李富春、葉劍英、劉伯承、陳毅、徐向前、聶榮臻、李先念、蔡暢、鄧穎超等，還有身後也冠名爲無產階級革命家鄧子恢、粟裕、張雲逸、蕭勁光、徐海東、王樹聲、滕代遠、王震等人，這樣問題就不簡單了。

五十年代，我國的社會主義改造進行的很好，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後來即提出高舉「總路線、人民公社、大躍進」三面紅旗。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成績是主要的，但也不能沒有缺點。在一九六二年，中央召開過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七千人大會），對三面紅旗，對搞人民公社、大躍進中出現的問題，對三年自然災害造成的困難進行討論，提高認識，統一思想，鼓起幹勁。

在七千人大會期間，毛主席雖然也談笑風生，但第一次感到了「政治壓力」，幸有林彪的講話壓陣，堅決擁護毛主席，維護黨的團結，扭轉了會議的形勢。毛主席對林彪是讚賞的，也是感激的。可以說，軍隊的幹部大都是擁護毛主席的。

毛主席對劉少奇、彭真是不滿的。毛、劉之間在路線問題上確實有了嚴重的分歧，這種分歧到了難以調和的地步，至少對毛主席是這樣。後來，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中說：「聯繫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的嗎？」七千人大會的賬，毛是不會忘的。

一九五九年，毛主席罷免了彭德懷，由林彪主持軍委日常工作。林彪是統領和管理部隊的能手。他提出在人民解放軍中要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把毛澤東思想真正學到手，主張毛主席人民戰爭的思想，認真學習毛主席的「十大軍事原則」。林總提出要「復古」（按「古田會議」的革命精神建軍），也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軍、治軍方針，如「突出政治」，「四個第一」，「三八作風」，「四好連隊」，「五好戰士」，「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苦練 200 米硬工夫」，「提倡勇敢不怕死，敢於刺刀見紅」等等，把人民解放軍造就成爲一支忠於黨、忠於毛主席的革命化、現代化的軍隊。對此，毛主席大爲讚賞。毛主席指出：「四個第一好，這是個創造。解放軍的思想政治工作和軍事工作，經林彪同志提出四個第一、三八作風之後，比較過去有了一個很大的發展，更具體化又更理論化了。」毛主席號召全國學習解放軍。後來，毛主席依靠解放軍搞文化大革命，奪劉、鄧司令部的權，這步棋毛主席是早就看準了的。

林彪號召人民解放軍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主要是爲了部隊的建設。林彪的想法和做法是健康的，是「無意」的；毛主席對人民解放軍卻是有心的。幾十年以後我才感覺和認識到這一點。

實際上，毛主席早在發動文革以前就想扳倒劉少奇，不過當時的條件不成熟。劉少奇那時掌握著黨的領導實權，這種領導實權也已經運行了多年，在中央和地方都有不少擁護者和追隨者。當時，毛主席不要說扳倒劉，就是對劉有批評，也未必能完全貫徹下去，因爲中央和地方的很多領導，都是劉、鄧的人，實權在劉、鄧手上，鄧倒向了劉。

毛主席要下決心搞掉劉少奇，擁護解放軍、讚賞林彪是他長期的重要戰略準備。這種準備，長期以來祇有毛主席有數，其他人長期以來沒有數，甚至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也未必有數。當然，毛主席還要做輿論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的準備：

——在六四年、六五年，毛主席決定解放軍派出大量幹部支援地方工作，中直機關、國務院各部委成立政治部，政治部的主要領導都是軍隊派來的幹部擔任的。

——在六五年，毛主席讓江青秘密組織班子，搞〈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打擊右傾翻案。

——在六五年，毛主席親自出馬「打倒羅瑞卿」。

——在六六年初，毛主席讓江青去請林彪這個「尊神」支持，搞「部隊文藝座談會」，以此爲武器，向文藝黑線開火。

——文化革命一開始，毛主席決定成立了有江青參加並掌實權的中央文革，隸屬於政治局常委領導之下，毛主席很快就把中央文革這些人演變成主持全國黨、政、軍日常工作的最高權力機構中央碰頭會的主要成員，實行中央書記處的職能。

——到六六年，毛主席召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發出《五一六通知》，「打倒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

以上這些都是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戰略準備，這些準備都是爲了端掉劉、鄧的「黨內資產階級」司令部，這是雄才大略的準備。發出了《五一六通知》，兩個司令部就真正開火了。

關於〈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情況我不瞭解。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解決羅瑞卿問題的上海會議和回到北京後，六六年三月又召開會議繼續批羅，我是從頭到尾參加了。

江青搞「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情況我知道一些。這個座談會是在毛主席的指示下召開的，不是林彪委託江青而開的。《紀要》的名稱中原來根本沒有「林彪同志委託」這個冠名，江青那麼傲氣，誰敢加這樣的抬頭，「林彪同志委託」這個冠名，是毛主席定的，並親自加上去的。至於林彪有奈也好，無奈也好，當時林彪沒有反對毛主席這樣做，也算是對毛主席的支持吧。

其實，江青搞「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是毛主席讓江青去請林彪這個「尊神」，人民解放軍這個「尊神」。也就是毛主席爲了打劉、鄧司令部這些「鬼」，借助林彪和人民解放軍這個鐘馗罷了。

平心而論，對文革來說，毛主席認爲他發動和領導的文革是「革命」，而不是「運動」。毛主席自己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實質上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無產階級反對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廣大革命群眾和國民黨反動派長期鬥爭的繼續，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階級鬥爭的繼續。」革命就是砸碎舊的國家機器，而不是簡單的調整、撤換幹部。如果從「革命」二字出發，回過頭來再看看文革，或許能想通一些過去想不通的問題。毛主席說文革

「三七開」，文革就是「七三開」，就是再糟糕的文革，也是我們黨歷史的一部分。文革既然已經存在了，就要認真地總結教訓，不能簡單地用所謂「徹底否定」去了結，去鞭笞。文革有深刻的社會階級鬥爭的原因，有黨內路線鬥爭的原因。具體地說，也有長期以來，首先是黨內最高和較高層面上的領導同志把毛主席擁戴到黨和國家之上，把黨內生活的平臺變成斜坡，使之失去平衡和制約，促使產生毛主席可以「和尚打傘，無法無天」的局面，而且黨內最高和較高層面上的領導同志自己也在起勁地擁護文革，因歷史上的恩恩怨怨在文革開始時打擊同志，直到革命革到自己頭上，才對文革產生怨氣。現在大家都把文革中的「不是」推到毛主席一個人頭上（毛主席是要負主要責任），並推給林彪、江青以及黃、吳、李、邱去承擔責任，沒有多少人把文革作為「黨的歷史的一部分」自己去反思自己、去承擔一些責任。不是栽贓他人，就是推得乾乾淨淨。

附：林彪同志給賀龍等同志的信

賀龍、榮臻、陳毅、伯承、向前、劍英諸同志：

送去江青同志三月十九日的信和她召開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請閱。這個紀要，經過參加座談會的同志反覆研究，又經過主席三次親自審閱修改，是一個很好的文件，用毛澤東思想回答了社會主義時期文化革命的文化革命的許多重大問題，不僅有極大的現實意義，而且有深遠的歷史意義。

十六年來，文藝戰線上存在著尖銳的階級鬥爭，誰戰勝誰的問題還沒有解決。文藝這個陣地，無產階級不去佔領，資產階級就必然去佔領，鬥爭是不可避免的。這是在意識形態領域裏極為廣泛、深刻的社會主義革命，搞不好就會出修正主義。我們必須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堅定不移地把這一場革命進行到底。

紀要中提出的問題和意見，完全符合部隊文藝工作的實際情況，必須堅決貫徹執行，使部隊工作在突出政治、促進人的革命化方面起重要作用。

對紀要有何意見望告，以便報中央審批。

此致

敬禮！

林彪
一九六六年三月二十二日

第二十一章 軍隊文革的序幕

上海緊急會議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八日到十五日，由毛主席主持，中央在上海召開了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會議批判了羅瑞卿，會後他就下臺了。這次會議是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他們主事的，軍隊是蕭華、劉志堅在管會議的事。

參加上海會議的除政治局委員之外，還有軍委常委、各中央局主要負責人，軍隊各大軍區、各軍、兵種、各總部主要首長。中央機關少數人參加了會議，吳冷西就分在我們組。記得梁必業、王新亭是後補上來的，會議開始後第二天還是第三天才來的。

大會召開之前，葉劍英、謝富治、蕭華、楊成武、劉志堅等人到杭州，向毛主席系統匯報了羅瑞卿的問題。毛主席聽了匯報之後說：「霸道，我是可以想得到的，並同林彪同志說過，這個人渾身是刺；但有野心就是新問題了。你們告訴林彪同志注意身體，『長子』的問題由中央來解決。」毛主席最後叫了葉群，林寫信向毛主席報告羅的問題時，已經離上海會議沒幾天了。毛認為林都反感羅了，那麼，倒羅的條件和時間已經成熟了。

上海會議很突然，很秘密。十二月六日晚上，空軍司令部通知：「接中央通知，明天上午八時，請邱部長帶秘書和警衛員，到西郊機場上飛機，去參加重要的會議。」過了一會，中央警衛局也來電話，對方在核實我帶的秘書和警衛員的名字，這是以前從來沒有過的。

七日，我們同機飛上海的有劉伯承、葉劍英、賀龍、李作鵬等。賀龍不知道到上海開什麼會，劉帥是知道的，在飛機上，劉帥故意逗賀龍說：「賀鬍子，到上海開什麼會呀？」賀龍說：「除了打仗的事，要我們去

幹什麼？我把軍用地圖都帶上了。」劉帥笑著說：「打仗，我們也沒用了。我們都是黃忠的哥哥了！」大家祇有互相一笑，就談別的了。賀龍當時是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連打倒總參謀長的會，毛主席都不給他事。先打招呼，說明主席已經對賀老總另眼相看了。上海會議以後，葉帥就替代了賀。

羅瑞卿當時正在雲南邊境視察。羅外出都是帶著電臺和專業通訊人員隨同的，他祇要一停下來，各方面的電臺就會立即開通。據說，羅給留守北京的彭真打了電話，彭真說都到上海開會去了，因此，羅乾脆直接向上海的鄧小平打電話。事情也巧，打電話之前不久，中央常委決定要讓「長子」參加會議，因此，鄧小平的電話就非常好打了。鄧小平接到了長子的電話即向他說：「你去一趟邊境不容易，故意讓你晚到幾天。會議還未開始，你現在可以來了。我要空軍派專機去接你。」這幾句話說得長子轉憂為喜，第二天乘飛機直奔上海來了。鄧小平親自指示吳法憲派專機去「接」羅瑞卿，鄧特別指示吳：告訴專機組的同志帶上槍。

東道主陳丕顯和空軍司令吳法憲去機場接羅。羅在機場看到陳的第一句話就是說：「有勞大駕。」陳表情很平淡，不說話，打不起精神。羅就開玩笑地說：「大戰通宵（指打麻將）沒有精神了？」陳回答說：「上車慢慢說。總理、小平同志在等你。」羅沒有到會場，而是被拉到建國路一個院子給軟禁起來，警衛都是由北京帶來的 8341 部隊擔任，整個會議羅都沒有露面。

全議開始前，總理和鄧小平召集全體人員開了預備會議，宣佈了大會的紀律，強調會議保密，宣佈編組名單及有關會議本身的其他問題。我編在西北組，組長劉瀾濤。會上每人發了一個電話本和一本材料（後面訂著白紙）。材料中有林總給主席的信（就是前面提到的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三十日那封）；有劉亞樓給羅瑞卿的信（一九六五年四月十五日，信中劉對羅大為不滿）；有海軍李作鵬、王宏坤、張秀川的材料，總參作戰部雷英夫的揭發材料及林辦的材料等。我當時心裏比較緊張，因為我在軍委辦公會議，在羅的直接領導下工作六年，幾乎天天見面，但我當時還沒有態度。我回來後把這本材料和電話本交給了秘書呂玉潤，沒想到第二天就出了麻煩，劉志堅召集部隊的所有秘書開會，問誰看過了材料，結果祇有劉志堅的夫人劉蘭英和我的秘書呂玉潤承認看了文件，會後他

們兩個人被責令不能出房間，怕消息傳到羅耳朵裏出意外。直到羅到了上海後，對呂玉潤的「禁令」才解除。

會議主要方法是小組會。開會的時間是「九三學社」（上午九點、下午三點開會），開的是「馬拉松」會議。在小組會議上，大家可以隨便發言，沒有長篇大論，大都是「交差式」的發言。這次會議比較特殊的是沒有出簡報。

我所在的西北小組，比較集中的是對長子的「幹將」與「霸道」兩個問題談得比較多。大家異口同聲地指出：他有才幹，他霸道。吳冷西對他的霸道作風說得很好。他說：「長子的霸道作風有很多的特點，其中之一就是『手長、嘴尖』……。」還有就是蕭勁光等人批判羅搞小圈子也說得比較好。

劉瀾濤對大家的發言稍有異議。他說，大家批判長子的霸道作風和搞小圈子都是完全正確的，看來羅也在準備搶班。如果是前者就不需要任何準備，問題的實質是後者。他指出長子搶班主要是做了兩方面的準備，一是搶葉帥軍事訓練的成果，搞大比武，這事實上是撈政治資本；二是搞小圈子搞自己的班底，政治上、組織上他都在準備。大家認為劉的發言對羅的問題提高認識很有啓發幫助。

由於會議沒有簡報，又祇是小組會，對各元帥的意見是聽不到、看不見的。以我個人對各元帥的接觸來看，他們都是站在毛主席和林總一邊的。因為羅瑞卿問題的實質根本不是同林彪個人的關係問題。這裏我想談一下賀龍、葉劍英兩帥的態度就可以說明很多的問題。賀龍在會上是最積極的，他見人就罵「長子」。他說：「他媽的，長子是婊子養的。他是最積極的，他見人就罵『長子』。他說：『他媽的，長子是婊子養的。他用公安部的辦法，在黨內、軍內幹私貨，真卑鄙！』葉帥當著我們這些去看他的幹部大聲說：『搬掉兇神，解放元帥！』他說：『你們受壓當然不好受，但你們到底還有工作，他對你們還是要客氣一點的，否則對工作不利。對我他就不客氣了。他根本不把我這樣的人放在眼裏的！』」

回想起來，上海會議有三個明顯的特點。

第一，沒有過火鬥爭。在會議期間，對「長子」都是背靠背地批判，他本人根本沒有露過面。小組會議祇傳達過「長子」兩點意見：一是承認大比武是不對的；二是不承認反對林副主席。他說：「我對林副主席向來

都是擁護的，從來沒有過二心。在林總領導下工作，我是最愉快的。」這樣的傳達也祇有一次。

第二，參加會議的人沒有任何負擔。在小組會上，可以說話，也可以不說話。

第三，沒有結論。會議結束時，劉少奇、鄧小平召集全體人員開了半小時的會議。劉少奇說的主要內容是：「這次會議開得好，大家都平心靜氣地擺事實，講道理，沒有搞鬥爭。回北京後，中央還要繼續開會，也依照著上海會議的精神辦理。」

上海會議是開了一個沒有「火藥味」的會議。但會議一結束，羅就被撤消了總長職務，由楊成武任代總長。

回北京後，開羅瑞卿的會都是在主席的指示下，由鄧小平、彭真他們牽頭，成立中央工作小組進行工作的。會議是以中央書記處的名義領導的，並不是以軍委的名義領導的。但實際主持會議的又是實際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葉劍英元帥，林並沒有主持會議。

我過了關

上海會議之後，我回到北京立即著手準備召開全軍後勤工作會議。一九六六年一月底，葉劍英副主席叫我去談話。我看到葉的表情同以前不大一樣，我很納悶，葉帥問我：「在上海會議期間，你同別人談到蕭華同志什麼問題嗎？」我回答說：「沒有。祇是在陶鑄同志那裏聽到過蕭華不宜掛帥（任軍委秘書長）的話，我也插不上嘴。」葉帥聽到我說之後，好像稍微輕鬆了一些。

我問：「葉帥是怎麼回事呀？」他回答說：「有些要緊的事。」此時夜餐送來了，我們坐下吃東西之後，他首先說：「沒有掛上帥的人（指蕭華沒有當上秘書長）恐怕心裏總會在想什麼吧？」我回答說：「可能總想找張路條（指整別人以表現自己）回來吧。」葉帥帶著驚奇的口氣反問：「路條？」「嗯，到別人門下去了的人（指蕭華同羅瑞卿搞在一起了），現在要回來，不拿『路條』表現一下自己就不好進門。」我這樣回答。此時，葉帥面帶笑容說：「真高見！你的話我懂得了」。

稍停，葉帥心情比較好地說：「他們已經提出了一個同羅瑞卿一起批判的名單，其中包括你在內。他說羅是單純軍事觀點的主帥，你是單純

作。你們現在改變了這種情況，這是很好的，今後，你們應當繼續加強思想工作，加強學習毛主席著作，加強抓活思想，加強抓工作中的實際問題」。後來我們稱之為林總對後勤工作的「四個加強」的指示。對林總的指示，全軍後勤工作會議立即發給了與會人員，同時還用電文發到了全軍師級以上後勤部門。林總的指示對全軍影響很大，對後勤工作的鼓勵和積極作用是空前未有的。

葉帥看到了林總給總後的電話記錄之後，又立即叫我去談了一下。葉問：「你看林總的電話目的是什麼？」我回答說：「我看一箭雙鵰，既接待了拿『路條』回來的人，也保護我不被打倒，這是林總的高明辦法。」葉帥：「你這個人對問題的看法很深刻。總政出面點名對你的批判是不可能了，軍委也不會同意。」

我說：「我遵照葉帥的指示辦。」我對總政可能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對我的批評是做好了準備的。我寫好了一篇題為《政治和業務緊密結合，堅決反對空頭政治》的發言稿交給葉帥。葉帥看了我的稿子之後說：「稿子的思想性很好，但問題也比較大，現在放下，以後再說。」在林總、葉帥和軍委的保護下，我沒有同羅瑞卿一起受批判，一起打倒。

中央工作小組會議

一九六六年三月四日到四月八日，繼上海會議之後，在北京召開了會議，稱中央工作小組會議。開羅瑞卿的會都是在主席的指示下，由鄧小平、彭真他們牽頭，成立中央工作小組進行工作的，外面誤稱軍委擴大會議，可能這個會議實際上主要是軍隊的同志參加的原因吧。會議在京西賓館舉行，時間進行了一月有餘，主要內容是批判羅瑞卿的資產階級軍事路線。會議分兩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大約有兩周時間，主要是軍隊參加上海會議的領導同志，大概有四十多人，羅本人也參加了會議；第二階段參加會議的人，除軍隊參加上海會議的全部人員之外，中央和國務院各部委的負責同志也參加了，總共有近百人參加會議。

政治局常委召集中央書記處的領導，組織了第一次會議。會議開始的時候，總書記鄧小平把參加會議的全體人員接到中南海懷仁堂召開了全體人員大會。我記得總書記鄧小平說了兩句話，他說：「對會議怎樣開，上海會議結束時，少奇同志已有交代，我就不說了。另外，我提議

成立一個會議領導小組，具體領導會議的進行。」接著鄧指定葉劍英、蕭華、楊成武、蘇振華組成領導小組並由葉劍英同志主持會議。

鄧、彭也多次找羅談話，鄧小平叫他從「關係、工作、個人作風、思想意識、組織紀律」五個方面作檢討。

毛對羅究竟是什麼打算，當時林並不知底。林祇知道羅給他丟了人，他提名的總長有那麼多人不感冒，因此，林也有尷尬之處。上海會議，林彪沒出面，回到北京開會，林既無參加，也無指示，更無主持會議，整個會議沒有聽到林的任何指示，林連面都沒有露。這和開彭德懷的會完全是兩個樣子。

會議上衝鋒陷陣的還是去杭州給主席匯報的葉劍英、謝富治、蕭華、楊成武、劉志堅等人以及總政的一幫人，如李曼村、唐平鑄等人。我從一九五九年就是軍委辦公會議成員，天天和羅在一起辦公，羅對我有拉也有打，但對我的工作支持還是多的，我當然怕把我劃在羅的一邊，我也積極發了言。當時，積極發言批評羅是很風光的事，但是還輪不上我風光，比如三總部的發言，總參、總政都是由楊成武、蕭華發言單列的，祇有總後沒有單獨向中央的書面報告。參加會議的人都發了言，地方幹部也發了言，我還沒有聽說參加了會議而沒有發言的人。羅的秘書也在會上做了揭發。

因為林總有話在先，葉劍英說服了大家，整個會議沒有直接涉及賀龍的問題。

這次大會同上海會議不同的是：有系統文件、有記錄、有簡報，每個人的發言都可以看到。兩個陣營的人的發言，出現了截然不同的特點。林彪陣營的人的發言是有事實、有批判，具有相當的說服力，葉帥、蕭華、楊成武這些大將親自上陣。「鬍子」陣營的人的發言則恰恰相反，除了許光達的發言有份量，刺痛了羅，沒有什麼其他幹將打先鋒，不少人的發言除了講了一點「政治和軍事的關係」之外，沒有涉及任何實質問題。但他們對羅的倒臺又是幸災樂禍的，祇要不扯到賀就行。打倒羅瑞卿，二、四方面軍的幹部高興。

我的發言，著重從形式主義和浪費相關的問題上，揭露了在大比武中經費、物資、彈藥浪費的大量事實，並批判了羅瑞卿的資產階級軍事路線。我發言時，羅本人在場恰好聽到了。羅兩次想插話，被葉帥制止

了。三月十二號羅瑞卿檢討時說：「邱會作同志特別講了經費，物資，彈藥的驚人浪費，在軍內外造成了惡劣的影響！」

大會對羅瑞卿的批判，葉帥有意把它形成兩半段，前半段揭發批判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後半段則揭發批判小圈子。實質在後一個問題。

從上海會議起，林彪就注意做爭取工作。總政梁必業副主任是爭取的重點，因為他是羅瑞卿小圈子裏的重要人物，但梁必業也是林喜歡的人物。林副主席分配李作鵬和我做他的工作，我們的工作做得很成功，經過幾次談話之後，把問題基本上摸清楚了。梁必業同我們談話的情況大致如下：

梁說：一九六三年羅瑞卿同他談林副主席的病情談得最多，首先是以「關心」的口吻談，後來就談「後事」了。羅瑞卿說：「林總的身體是很少希望了。自然規律，無法抗拒。我們這些人祇有做好自己的工作。」

他說：一九六四年開始，羅瑞卿定的方針是：「冷林、熱賀」四個字。在日常工作中要很自然地擴大林彪的「病情」，宣揚鬍子的「親政」，要使大家信服林彪的身體祇是「熬時間」了。

他說：羅瑞卿再三強調，突出政治就是突出人的作用，沒有自己的人哪還有什麼政治？在各總部，各大軍區，各軍種、各兵種都要搞「兩套人馬」（即擁林、擁賀兩種人）祇有這樣才能「平衡」。羅瑞卿再三交代，對同我們合作的人要特別的關心，現在有很大的作用，將來的作用就大了。

梁必業自己在大會上也發了言，他的發言說得很詳細，態度也很中肯。他自己再三說：「我的檢討還不深刻……」葉副主席也再三說：「你是發言，不是檢討，講的很好。」檢討和發言祇有兩字之差，但可以看出軍委的鮮明政策。林總對他的發言是滿意的，已經下命令調他到南京軍事學院任副政委（未到職），文革時，總政的領導人硬是不容他在北京呆下去，把他下放到安徽去了。一九七〇年準備召開的四屆人大，軍隊要解放的一批高級幹部中就有梁必業等人，黃永勝、李作鵬和我與梁的關係都很好，想把他先安排在安徽省軍區任第二政委，因李德生沒有同意而作罷，祇安排了張宗遜為濟南軍區副司令。

中央工作小組會議繼承了上海會議的精神，剛開始羅瑞卿看起來好像沒有多大負擔似的，他祇出席過兩次大會，一次是聽別人發言，一次是自己做檢討。他參加小組會是自由的，可以去，也可以不去。

關於「四條」的問題

「四條」的核心問題是「伸手」，即有「野心」的問題。羅自己在檢討中，已經觸及到「伸手」的問題，羅瑞卿說「我對陶鑄、蕭華、楊成武、梁必業說的那些話，我都是說了的。類似的話，還同劉亞樓同志說過，這些都是絕大的錯誤。」

中央工作小組《關於羅瑞卿同志錯誤問題的報告》，葉帥在北京批羅會議上的總結發言，蕭華的揭發以及楊成武的幾次系統揭發，都提到「伸手」問題，都確認有「四條」。翟雲英也說有。如果說沒有，首先是葉劍英、蕭華、楊成武他們幾個人給全黨開了大玩笑，有些人後來改了口，那也祇是改了口嘛！

其實，既然毛主席要拿掉羅，主要不是因為羅的品質問題，而是要拿掉羅的軍權，防範劉、鄧。那麼，在毛主席倒羅的決心中，「四條」就並不是很重要了，沒有「四條」，毛主席也要拿掉羅的。

林彪和羅榮桓、聶榮臻、葉劍英的關係是很好的，都是擁護毛主席的。一軍團還有一批尖子，陳賡、羅瑞卿、劉亞樓、蕭華、黃永勝、楊成武、楊得志、鄧華、李天佑、賴傳珠、吳法憲、梁必業、梁興初、曾國華等等。劉亞樓和林總共事時間長，他們是「同志加兄弟」。羅靠上了賀龍，自己有了非分之想，他叫劉亞樓去和林總講「四條」意見，這「四條」是葉群在上海開會時，在小組會上揭發的。開完上海會議回到北京後，在批羅的會議上蕭華、楊成武有系統的發言，又講到這「四條」意見。這就是讓葉群告訴林總：（一）一個人早晚要退出歷史舞臺，這是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林總將來也要退出歷史舞臺；（二）要認真愛護林總的身體，拜託葉群多費心；（三）林總把部隊的方針都定好了，今後林總就不要多管軍隊的具體事了，由他們去管，主要是把林總的指示落實好；（四）林總要放心讓羅去管，放手讓羅去管。

劉亞樓去世以後，在整理遺物時，有一封劉六五年四月十五日寫給羅瑞卿的信，信當時沒有發出去，劉在信中對羅大為不滿。這種不滿總

不會是憑空而來的吧，他們的關係一直很好，這封信是上海會議的文件之一，此信對與會人員的震動是高於葉群發言的。因為畢竟是羅讓劉上了「竿子」去和林講，林又把劉訓了一頓，碰了一鼻子灰嘛。一九六五年初，羅瑞卿到上海，去醫院看劉，劉和羅大吵一架。劉的秘書何汝珍和照顧劉亞樓生活的空四軍的管理員過全都聽見他們在吵。這之後劉的身體狀況下降很快，幾個月後就去世了。他們還能吵什麼呢？這都是不言而喻的事。

林總更傷羅與賀搞到一起去了的心，軍隊讓誰掌管，毛主席心中有數，並非林彪能左右，羅瑞卿這樣的意見，肯定被林頂了回去。羅昏了頭，劉也昏了頭，他們昏了頭與當時賀的「興旺」是有密切關係的。林彪生病期間，主席叫賀龍主持軍委日常工作，雖然主席對賀龍也有親近的話，但毛絕不會把軍隊交給賀。主席的底牌還是林，我們那時離上面還遠，我們還能看清主席的底牌，羅是應該能看清的，但羅看走了眼，這就是利令智昏的道理吧。很快劉亞樓醒悟了，他痛哭流涕地揭發了羅。

現在，有的材料上說，在開上海會議的時候，鄧小平說上面所講的事情「死無對證」，我沒有聽到鄧說過這樣話，我更不相信鄧當時有膽量說這樣的話。鄧小平、彭真都是批羅的主要負責人，他們若表示了相反的態度，不是把自己放到毛主席的對立面上去了嗎？如果鄧小平說了「死無對證」的話，楊成武、蕭華又怎麼可能在批羅的大會上，把這「四條」和羅的其他問題，又認認真真揭發呢？楊成武、蕭華又不是傻瓜，我想他們祇會說有根有據的話，不會說「死無對證」的話。中央工作小組給中央的《關於羅瑞卿同志錯誤問題的報告》，也鄭重地提到「四條」，這個報告都是要經鄧的手把關的，如果鄧說了這個話，他怎麼還同意寫上四條？！這祇能說明羅的確鑽到劉、鄧司令部裏面去了，鄧小平說「死無對證」是教唆羅耍賴。想想看，羅都投降了劉、鄧，毛主席怎麼能放過他呢！？

羅瑞卿的錯誤和林總的態度

說到羅瑞卿的錯誤，中央工作小組上報中央的《關於羅瑞卿同志錯誤問題的報告》，葉劍英在北京批羅會議上的總結發言以及蕭華、楊成武的幾次系統揭發，劉少奇對羅的嚴厲批評已經講的很清楚了。

羅瑞卿的錯誤總的來說有這麼幾方面：

一是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包括大比武等等在內。但我認為能為黨工作，並以極大的革命熱情和幹勁去工作，比小病大養、養尊處優強得多。我們黨內有個不好的毛病，叫做「牆倒眾人推」。人一遭了殃，從頭算賬，缺點變成錯誤，小錯變成大錯，無限上綱。

二是工作作風和思想作風。羅瑞卿的民主作風的確很差，相當盛氣凌人，相當霸道。這樣，他往往是費力不討好，工作做了不少，還把不少人得罪了，甚至把老師也得罪了，人家不可能不告你的狀。羅瑞卿這個人「權貴」思想很重，他能看得上的人很少，嚴重脫離群眾。對下級、對工作人員總是不可一世的樣子。六四年在福州開會，午休時有幾個秘書在打撲克，影響了他休息，他衝出房間對著幾個秘書歇斯底里地罵，罵了個狗血噴頭，很失領導水準。羅這個樣子，這裏面有雙一（紅一方面軍，紅一軍團）的優越感，但我認為更重要的是毛澤東、林彪把他慣壞了，羅是毛、林都很器重的人物，個人關係也不錯。

三是從有私心到伸手，最後變成了「野心」。六二年，林總生病，毛主席決定由賀龍主持軍委日常工作。從六二年到六五年期間，羅在主持軍委辦公會議期間，擅做主張的事情也不斷增多，我是軍委辦公會議的成員，幾乎天天在一起開會，情況基本知道，羅是要負責任的。比如：搞大比武；對聶、葉、徐等各元帥都不夠尊重，對他們分管的工作都不夠支持；軍委的總結報告，沒有授權讓他來搞，他自作主張地搞了。給幾個老師看一看，徵求一下意見，他認為充其量是走過場，心裏滿不在乎。

尤其不應該的是，他認為林總的身體肯定不成了，竟開始嫌棄林總，說出「病號就是養病，要讓賢，不要干擾，不要擋路」的昏話來。林總生病時，毛主席都為林總寫下曹操的《龜雖壽》來鼓勵他，相比之下，羅的昏話實在不該說。由於劉少奇說過羅是國防部長的接班人，羅認為新一屆人大他應當國防部長。六五年林總身體有明顯好轉，在六五年一月召開的三屆人大會議上，林總又被任命為第一副總理兼國防部長，羅有點意想不到，自己國防部長也沒當上，還把林得罪了，心裏有點慌，他讓劉亞樓把他對林表忠心的話趕快告訴林總，羅說：「這次我認定了，跟定了，今後彈打不飛，棒打不走，我羅瑞卿死了燒成骨灰，都忠實於

林總。」這個話我們當時就聽到過嘛，爲什麼說出這種話，說明以前開始走了，要改換門庭嘛！

林總這個人是最不愛囉嗦的，但他對羅可以說是苦口婆心、語重心長的，林從內心裏還是想教育羅，對羅仍然抱著希望，羅畢竟是林提議當總長的。

當然，有時候林總嚴肅批評羅，甚至罵羅，但這和想要打倒羅是兩回事，這就是林對羅的基本態度。林是很慎重，很沉得住氣的人。「四條」的事發生後，林就認識到羅的「野心」，但林並沒有向毛主席報告，葉帥、聶帥、楊成武等，早就在林總面前反映羅的問題，並希望林向毛主席報告，林並沒有向毛主席報告，仍寄希望對羅的教育。如果不是毛主席叫葉帥給林通氣打招呼並給不少老同志打招呼，如果不是毛主席決定召開上海會議解決羅的問題，林是不會同意葉群把「四條」講出去的。林是個「不諳世事」的人，林總告訴羅要通氣，因爲元帥和其他人到林處反映羅的問題，林往往因不瞭解情況而無言以答，因爲林不瞭解情況，很難爲羅說話。對於林總的教育和苦心，羅的神經已經麻木了，他反而越走越遠。林總不得不對羅說出這樣的話：「如果我們沒有工作關係，你一百年不來我這裏也沒有關係，你是總參謀長，我還是你的上級吧，你的情況我一點不瞭解怎麼辦？軍隊的工作我是要對中央負責的。」

對林、羅這段關係的發展變化，我認爲一開始羅未必存心是對林有什麼封鎖，羅認爲自己和林總的關係好，林又不是管小事的人，事無鉅細的匯報林反而嫌囉嗦。另外，林當時的確身體不好，羅也不願意輕易打擾林。後來羅變了，以爲林的身體不會再好起來，沒希望了，羅瑞卿倒向了賀龍。賀龍當時「壯」得很，其實羅看走了眼。主席發現了羅倒向賀，賀又和劉、鄧關係密切的嚴重情況，毛批評了林，嫌林是個「甩袖掌櫃」。這時林再找羅談話也認真了，羅也就開始有意封鎖林，有意不主動向林匯報工作了。當時，羅也有擋箭牌：賀主持軍委日常工作，是中央決定的。對羅的做法我真有點想不通，這才叫利令智昏。

賀龍主持軍委日常工作，有自己的工作作風，應該是無可厚非的。賀老總對工作也是抓得很緊的。可羅瑞卿倒向了賀龍，就有問題了，什麼問題呢？軍隊是毛主席的命根子，軍隊應該掌握在毛最信任的人手裏。最信任的人是誰呢？就是林彪嘛！林病了以後，就是羅瑞卿了。可

羅瑞卿看軍隊這個「家」沒看住，沒看住的標準就是羅瑞卿與賀龍搞在一起，和劉、鄧搞在一起。這樣，在毛主席那裏問題就嚴重了。羅是不折不扣的「擅離職守」。

在毛主席面前，反映情況的自有人在。我想這些人向毛主席匯報，是講羅反毛吧！不會祇講羅反林吧？主席自己對羅有警惕了。毛主席信任林彪遠勝於信任賀龍，羅瑞卿完全應該明白這些，但是他沒有真正明白，他還來了個「冷林熱賀」。羅瑞卿厄運的到來主要在此，也就是說在他自己。這種格局的形成，主要責任不在賀龍而在羅。林總身體確實不好，是羅「改換門庭」的主要因素。羅有了私心，這是關鍵。

羅瑞卿檢討與「自殺」

在批判羅瑞卿的資產階級軍事路線之後，他在三月十二日做了一次檢討。羅發言的那天下午，北京的一些「名義會員」（即有名單，平時不到會的人）也大都到會了。會場的佈置有半圈沙發是主持人和元帥們坐的，對面的前幾排也放著沙發，後面有幾排桌椅。羅是穿著便服，後面還是跟著副官來的。他來到會場之後，葉帥招手要他到沙發上去坐，他祇是笑了一下，並未去坐他過去應當坐的位置。

羅瑞卿檢討時，由葉帥主持會議。他宣佈：現在請羅瑞卿同志發言。羅點了一下頭就開始發言了。他的發言還是上海會議的基調，即承認大比武是資產階級軍事路線，衝擊了政治，而且他強調大比武是他個人決定的。他說：「這次大比武是我個人擅自決定的。現在看來，重開一次那樣興師動眾的南京現場會議，就是一個錯誤的決定，而且把軍委主管訓練工作的葉劍英同志撇在一邊。……我為什麼要這樣幹呢？除了自己喜歡獨斷專行，不講民主的惡劣作風外，還有個人主義的好大喜功，想在軍事訓練上搞出一點突出的成績來，以便向主席，向黨，向軍委，向林彪同志邀功報捷，動機是很不純的。……大比武帶來的嚴重惡果，劉志堅同志歸納了八條，張宗遜同志歸納了四條，全軍比武資料上歸納了十條，邱會作同志特別講了經費，物資，彈藥的驚人浪費，在軍內外造成了惡劣的影響！」

同時，羅還對一些具體事例做了檢討，如搞形式主義等等。另外，他還以真誠的口氣說了，沒有反對林副主席。他說，過去沒有反對林副

主席，今後也永遠不會反的，羅還特別說了他對葉帥不尊重，對軍委其他領導不尊重的話，並表示檢討，最後還說了幾句對林副主席的身體關心不夠的話。

葉帥、蕭華、楊成武是有防範準備的，蕭華、楊成武事先把我們幾個人叫到一起議了議，葉帥也在座。蕭華說：「如果羅態度不好，總政的同志上，他的問題多啦。」楊成武則說過一句意味深長的話，他說：「這個會開不好，別人會看笑話。」羅在檢討中雖然嫌有些帽子戴得太大，如「野心家」，「陰謀家」，「篡黨、篡軍」，但他給自己上的綱也不低，他說過：「我的錯誤是十萬分嚴重的！有的同志說是犯罪，也不過份，黨給我什麼處分，我都接受。」最後，羅瑞卿還表示「請求黨重新宣佈撤銷我有關軍事工作的一切職務，撤銷我的黨內外的一切職務！把我放到領導強的基層單位去改造我，考驗我！……」

在揭發羅的時候，他有時並不在乎，如王樹聲發言的時候；他有時很生氣地瞪著人家，如許光達發言時，揭了他不少過去的短處，羅氣得想對質似的，葉帥沒有同意。還有人揭發羅的霸道時，說了一件事：在抗大時羅瑞卿為教育長，說他作風霸道得很，為此主席到抗大去開座談會，在學校工作的譚希林、張愛萍、王智濤、韓振紀等同志對他意見很大，說羅高高在上，他的馬吃的馬料比教員伙食還高，並說羅常往女生隊跑，馬掌都換了幾副。會後有人提醒發言人說：「你老兄嘴上沒站崗的，那時林總是校長，提議羅為教育長，你是不是說林總護短呀，你是不是借古諷今呀？！」其實林彪是兩次為羅瑞卿護短了，一次是抗大當教育長，一次是當總參謀長，兩次都是林提名，兩次都被拉下馬，到頭來還說林整羅，這實為不公。

羅瑞卿講話後，即退席了。大會繼續開，並自由發言。有的人提出，要羅瑞卿到會，面對面的接受批判，有的人對羅的發言則加以讚揚。接著葉帥講了話。他說：「羅的發言比在上海有進步，承認了錯誤，也有些自我批評。對羅的發言，要表示歡迎的態度。……對羅還是不搞面對面的批判，不到會也不妨礙大家發表自己的意見。」

在羅檢討發言後，即把大會揭發他搞小圈子的材料和梁必業副主任的記錄稿，他的老婆給林總的信等都給他了。葉帥是很精細的人，給他

的都是原始稿，羅看到材料的當天晚上，通宵未眠，坐臥不安，第二天早晨就自殺了。

羅瑞卿住南池子，在北京是屬於一等的院落。他本人的宿舍是三層樓房。他「自殺」的方法是，在三樓兩腳朝下溜下去，有如小孩在公園玩滑梯一樣的。這樣是不可能死的，除了一隻腳傷了之外，其餘地方並未受傷。羅爲什麼這樣做，真不得其解。

羅在自殺前留下兩封遺書，一封是給他老婆的，一封表示對批判他不滿，甚至說他走到自殺這一步是被逼出來的。羅瑞卿爲什麼會「自殺」？從後來揭發的材料來看，主要是怕把小圈子的問題端出來。他自己在梁必業副主任的發言的記錄稿上，寫了兩句話：「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反黨集團」，可見他感到痛的是後一個問題。

羅瑞卿自殺未成後，對大會的影響很大，無論過去擁護羅的人或是對羅有意見的人都對羅產生了憤恨。因爲羅在檢討中說過「同志們這次所揭發的大量材料，我如果還不覺悟，不在真理面前低頭認罪，就太不像樣子了」，他在檢討最後大聲說：「請同志們繼續批判我！揭發我！」按照羅在會上的態度是不應該自殺的。

中央工作小組對羅瑞卿的自殺向毛主席、黨中央及時做了報告。中央後來下發文件，明確指出了：「中央認爲，羅瑞卿同志的錯誤，是用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反對無產階級軍事路線的錯誤，是用修正主義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錯誤，是反對黨中央、反對毛主席、反對林彪同志的錯誤。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野心家篡軍反黨的錯誤。中央認爲，這次小組會議開得很好。貫徹執行了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擺事實，講道理，對羅瑞卿同志進行了耐心教育和嚴肅批判。羅瑞卿同志不僅不認真檢討自己的錯誤，反而於三月十八日跳樓自殺（受傷），走上了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的道路。鑒於羅瑞卿同志的錯誤極端嚴重，中央決定停止羅瑞卿同志的黨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以後再提請中央全會決定」。羅是以「自殺」來抵抗對他的批判，對羅瑞卿的「自殺」，葉帥傳達毛主席的話是這樣說的：「羅瑞卿自殺由他自己負責。閻王老子辦事是有原則的，沒有叫他去自己去是不會接受的。」當時毛主席在杭州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會議，會上也在批判羅瑞卿，據說大家的發言驚心動魄。羅瑞卿自殺的報告到杭州，連劉少奇、鄧小平都

對羅的自殺十分不滿，劉少奇說：（大意）「羅長子平時盛氣凌人，鋒芒畢露，他對老師都打擊。自己不認真檢討，過不了關就自殺，沒出息。跳樓自殺也要有講究，應頭朝下，他是腳先落地。他是堅決向黨對抗。」「跳冰棍」的挖苦話就是鄧小平說的，說得很形象，大家很快就傳開了。羅的自殺不僅給自己抹了黑，而且給毛主席這邊，劉鄧那邊都抹了黑。

羅瑞卿、楊成武等人，在文革中都屬於勝驕敗餒的人，得志時不可一世，頤指氣使；失勢時經不起考驗，結果問題越搞越複雜，對黨對個人都造成很大損失。

羅瑞卿炫耀自己

羅工作是能幹的，整人也是能幹的。毛主席去世之後，他得到了重新上臺的條件，利用自己的保護人重新得到了權力，當了軍委秘書長，主持軍委日常工作，把自己吹到天上去了。羅吹噓自己最主要的一條就是他歷來就是反對林彪的。羅當一軍團保衛局長（負有直接保衛林彪安全的責任），他就是反對林彪的。他還特別指出了林彪是不會打仗的，另外，就是用全力宣揚他當總參謀長時，搞大比武的「盛況」和空前的成績，過去發表過的大比武的文章，又重新發表。例如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參觀過十三陵大比武的文章。另外，他把他垮臺的原因全部推給林彪，好像他倒臺的原因是因為他和林彪的個人關係不好造成的，他以偏蓋全，其實等於他否認自己有錯誤。

羅瑞卿炫耀自己的另一個手段是鎮壓。後來，他對所謂的「林彪反黨集團」一個不拉地都進行了殘酷的鎮壓，對他自己權力範圍內能夠鎮壓的人則進行慘無人道的鎮壓。例如，他在解放軍總醫院住院治他的傷腳，為他出過力的院領導幹部、專家、醫生、護士都進行了鎮壓，連給他送飯的護理員也未曾倖免。院長靳來川、副院長曹根慧逮捕法辦，靳來川被關進秦城監獄十年，曹根慧被關在總政白廟監獄，判了重刑，在獄中做了胃切除手術，都不讓保外就醫，仍然關在監獄，吃著豬狗食，到了令人髮指、毛骨聳然的程度。對黃、吳、李、邱的四位夫人，中央決定要從監獄放出來，參加勞動學習，羅瑞卿下令全部押送農場勞動改造。在文革的黨內鬥爭中，羅瑞卿和自己的家庭、妻子、兒女都飽受了苦難，他應當有所感悟，應當更有高風亮節，但他重新上臺以後，沒有

做到。黃克誠同志受的苦更多更長，他有博大的胸懷，能正確評價毛主席，還正確評價了林彪，對黃、吳、李、邱的四位夫人也落實了政策，如果沒有軍內「造反派」的破壞搗亂，會落實的更好。羅瑞卿實行這樣殘酷的鎮壓，一則是他的報復，二則是借此來提高自己的威風，實際上降低了自己。

葉帥的總結

上海會議之後，葉劍英元帥代替羅瑞卿主持辦理軍委的日常工作，葉帥領導和主持的對羅瑞卿批判的會議是成功的。會議遵照上海會議的精神，完全是黨內生活，根本沒有過火的鬥爭，這是大家的共同看法。

葉帥說：「會議從三月四日到四月八日，共開了一個月又五天，參加會議的共有九十五人，除了事假病假外，發言的同志有單獨發言的，有聯合發言的，共有八十六篇發言稿。從全部發言中可以看到，同志們對羅瑞卿同志的錯誤，有揭發，有批判，有建議。差不多全部發言，都肯定羅瑞卿同志的錯誤，最主要的是篡軍反黨。」

在批羅時，系統發言的有蕭華、楊成武（與王尚榮、雷英夫聯名）、謝富治。會議結束時，葉帥代表軍委做了長篇的總結講話。葉帥的總結分為三個部分，大意是：一、羅的錯誤：1、反對毛主席，是反黨的；2、反對林彪同志，是要篡奪軍權的。二、羅歷史上的錯誤，抗戰時與彭德懷勾得很緊，當公安部長時一上臺就大抓個人兵權，大搞「十無運動」，到處大抓大捕。三、到會的高級幹部，應從羅的一生取得深刻的教訓。在總結中，葉帥對羅瑞卿的批判很精彩，對大家的教育很深刻。葉帥說：要有私心，在一定的條件下就會沒有公心，發展為野心，羅瑞卿這樣的人也不例外。羅是利令智昏，錯誤的估計形勢而垮臺的。

葉帥在談到羅反對林總時說：「他把林彪同志當作敵人，公然伸手搶班奪權。羅瑞卿同志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惡性發展到一定程度的時候，不可避免地要向黨伸手。他私自封官許願，拉攏一些人，為他效勞，派人當『說客』，以林彪同志遲早要登上政治舞臺為名，勸林彪同志讓權，此外還親自出馬，當作林彪同志的面大喊大嚷地說：『病號嘛，要像個病號樣子嘛！要讓賢嘛！』『不要擋路！』最後還想林彪同志有病，把林彪同志氣死、逼死、折磨死。其實林彪同志的身體，據醫生多次檢查的結

果，內臟各部都是很好的，祇是負傷以後神經功能有點毛病，現在一天比一天好起來了。這是全黨全軍一個喜報。而羅瑞卿同志卻說想不到這個人還能東山再起！使羅瑞卿大失所望，啼笑皆非。這個人還能算是我們的同志嗎？！」

葉帥還說：「他拚命反對林彪同志，絕不是什麼個人恩怨。羅瑞卿同志跟了毛主席近四十年，受過毛主席許多年的言教身教。在近四十年中，也在林彪同志直接領導和指揮下做過許久的的工作，耳濡目染，寧有幾人？羅瑞卿同志當總參謀長也是林彪同志和總理推薦的。林彪同志信任他，放手讓他工作，對他工作中的錯誤，多次批評，誠心教育，忍耐等待，足足六年。羅瑞卿同志對林彪同志的批評、指責、教育，如果自認爲有委曲之處，何以不報告毛主席？而竟同劉亞樓等同志密談！跟毛主席幾十年，還不把毛主席看作父兄師長。難道這樣做法，不是有意背著毛主席，故意和林彪同志作對嗎？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好學生、好戰友，毛澤東思想學得最好，用得最好，跟得最緊。他對黨忠誠，對同志和善，幾十年刻苦自厲，好學不倦，帶病不休，一生以毛主席的理論與實踐爲準則。他是我們全黨最有威信的領導者之一。林彪同志受黨中央和毛主席的委託，主持軍委的工作，在羅瑞卿同志看來，不反掉林彪同志，就不可能實現他篡軍的野心，我看這就是羅瑞卿同志拚死反對林彪同志的根本原因。」

在談到羅三月十八日自殺時，葉帥說，「『將軍一跳身名裂，向河梁，回頭萬里，故人長絕！』這是我套用稼軒詞句，把『百戰』二字改爲『一跳』，爲羅瑞卿跳樓所哼的悼語。我認爲他的政治生命已經死亡了。如果要重新作人，必須真正地在政治上脫胎換骨。」

葉帥還說：「『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這是古人說的話。看來這句話對羅說來，不恰當。羅跳樓前，寫了兩封沒有簽名沒有月日的遺書，都印發給同志們看了。他說，『自殺是可恥的』。但是，『誰爲爲之，孰令致之？』他竟惡毒地說是會議把他逼死的，說他的可恥行動是被迫的。這簡直是對會議的誣蔑，是垂死的反撲。證明羅對自己的錯誤是想抵賴，也可能是想掩埋不可告人的東西，想把錯誤帶進棺材去。」其實，毛主席對羅的問題早有察覺。主席幾次在談到羅的問題時說：羅的思想同我們有距離；林彪同志帶了幾十年的兵，難道還不懂什麼是軍事，什麼是政治？過

去打仗本質上都是政治仗；你們說羅封鎖林彪同志，他羅長子長期以來，從未單獨向我請示報告過工作；羅不尊重各位老師，這和彭德懷的錯誤是一樣的；羅在高、饒問題上實際上是陷進去了；羅是個野心家，又專橫跋扈，別人還不反他？！

葉、蕭、楊、謝的發言，在中央下發《中央工作小組報告》時作為附件也同時下發了。這是毛主席的一整套部署，可見他們的發言份量之重，對毛主席向劉、鄧司令部開火是多麼重要。當時，自己的發言能上簡報，甚至上文件，是很風光的事情，這樣風光的事當時還輪不到我們。後來，「兩案」公審的時候，整羅的大幹將們對此隻字不提，我們這些跑龍套的人卻成了犯有大罪，天下豈有此理？！

當時，有一個很關鍵的問題，就是誰接替羅瑞卿任軍委秘書長。上海會議結束時中央原則上已定：蕭華任秘書長，楊成武代理總參謀長。楊成武反羅是積極的、堅定的，過去蕭華已被羅拉去半個身子有餘，因此，楊成武對蕭當軍委秘書長很有氣。對秘書長人選，楊成武提出了不同的意見，他對問題提得很尖銳，他說：「這樣的人事安排（指蕭當軍委秘書長），我們軍隊今後能夠清除羅瑞卿的影響嗎？這是一個重大原則問題。」說穿了，楊認為蕭是和羅沾了邊的人。林總完全理解提意見人的意思，一九六六年五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決定葉劍英任中央書記處書記時，同時決定由葉兼任軍委秘書長。

葉帥出任軍委秘書長，除了毛主席信任、他自己眾望所歸和德才之外，還有一個重要條件就是林總的建議。以我所知林總與葉帥向來關係都很密切，互相很信任。在文化大革命中，林總對葉帥是大力保護的，支持的，葉帥對林總是欽佩和擁護的。

楊成武是反羅的幹將

實事求是地說，在當時，楊成武的確是我軍優秀的領導骨幹之一，軍政水平都很好。他對我也很好，不像有些人愛擺架子，我對他也是敬重的。林總都說，在羅長子的問題上，楊成武是最乾淨的。楊是批羅的第一幹將和先鋒，直到他一九六八年被打倒之前都在批羅。一九六六年在批羅的會上，楊有《堅決捍衛偉大的毛澤東思想徹底粉碎羅瑞卿篡軍反黨的陰謀》發言，他是中央工作小組的成員，與葉帥他們一起向中央寫

了《關於羅瑞卿同志錯誤問題的報告》。一九六七年三月，在全軍軍以上幹部會議上，楊成武發表了長篇講話，系統地批判了羅瑞卿；十一月，他又發表著名文章《大樹特樹偉大統帥毛主席的絕對權威，大樹特樹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該文的副標題就是「徹底清算羅瑞卿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的滔天罪行」。該文聲稱：「資產階級陰謀家、野心家羅瑞卿，是隱藏在黨內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的重要成員，是中國赫魯曉夫的代理人。他的根本罪惡，就是長期以來秉承中國赫魯曉夫的旨意，惡毒誹謗毛主席，攻擊和歪曲毛澤東思想，反對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建軍路線，反對毛主席的軍事思想，反對樹立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的絕對權威，妄圖按照資產階級面貌改造我們無產階級的軍隊。我們必須用毛澤東思想這個最強大的武器，從政治上、思想上、理論上把黨內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及其代理人羅瑞卿之流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徹底肅清其流毒。」。

楊成武是羅瑞卿專案組的負責人，他對專案抓的很緊，工作既神秘又對自己管專案有優越感。有一次辦事組開完會，他對我說：「老邱呀，我帶你去看看熱鬧。」原來，楊是帶我去看軍隊專案關押人員。楊對專案關押對象的地方很熟悉，他指給我說這是誰，那是誰，然後掀開小窗口讓我看，我們第一個看的就是羅瑞卿。

楊成武和羅瑞卿的鬥爭一直是很堅決的，大的方面他自己的幾次發言說了很多，小的方面他也不放過。文革前，在一次在軍委辦公會議上，研究一些幹部的調級問題，總政治部副主任徐立清在會上一個一個提名字，一個一個研究通過。研究完了以後，羅瑞卿就準備宣佈散會了。這時楊成武突然說：「你們拉下了大事！太不公道的了，太不公道的了。像薛明、葉群（他故意把薛明說在前）也是『三八』式嘛，他們做了大量的工作，是無名英雄，級別和軍銜都很低嘛，調了這麼多人，我認為她們也應該調。」羅聽後忙說：「哎喲喲，疏忽了，疏忽了」，接著又研究通過了薛明、葉群調整級別和軍銜的事。

「九一三」以後，毛主席解放了楊成武，這也是對的，但毛主席把「楊、余、傅」事件推給林彪是不對的。楊倒臺後不久，毛主席就說過：「如果講楊成武的後臺，第一個就是我」。「九一三」之後，在羅瑞卿的問題上，毛主席也說過一些不實的話，這是我在心靈上第一次感到震撼。

毛主席在工作上甚至方針上有錯誤，我都是可以接受的，但主席煞有介事地說不實的話，我是意想不到的。比如毛主席說在羅瑞卿的問題上「聽了林彪的一面之詞」，我太不理解了。其實，對羅的問題的決定權在毛主席而不在林彪。林也不得不跟著毛主席走，而絕不是毛聽了林的。

毛主席逝世以後，楊成武就開始說假話了，而且越說越厲害。他甚至說他在總參傳達羅瑞卿問題的會上，竟在主席臺上傷心地哭了起來！這真是天大的謊話。

現在一些報刊上，甚至公審的時候，說我們迫害了羅瑞卿，這簡直是胡說八道。要說打倒羅瑞卿是對的，這個功勞還輪不上我們搶；如果說打倒羅瑞卿是錯的，這個主要責任也不該我們擔。如果在上海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和北京的中央工作小組的會議上發言的都是錯誤的，那人人有份。

附：關於羅瑞卿同志錯誤問題的報告

黨中央、毛主席：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八日至十五日，黨中央、毛主席在上海召開了會議。揭發和批判了羅瑞卿同志的錯誤，和他進行了背靠背的鬥爭。會後，黨中央指定周恩來、鄧小平等同志對他進行了多次耐心的教育和幫助，羅瑞卿同志不但沒有老老實實檢討錯誤，反而表示受了委曲，多方為自己辯解。在傳達了黨中央上海會議情況以後，在軍隊政治工作會議上，在黨和軍隊的高級幹部中，又揭發了羅瑞卿同志大量的嚴重的錯誤事實。為了徹底弄清羅瑞卿同志的問題，根據毛主席的指示和中央常委的決定，在黨中央直接領導下，從三月四日到四月八日，召開了討論羅瑞卿同志問題的小組會議。會議本著擺事實，講道理，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對羅瑞卿同志進行了面對面的鬥爭。

這次小組會議是分兩個階段進行的。第一階段歷時十三天，參加成員包括軍委各總部、公安部、國防工辦、國防科委、軍事科學院和大部分軍區、軍種、兵種的負責同志，以及羅瑞卿同志本人，共四十二人。三月二十二日開始，會議進入第二階段，根

據黨中央指示，增加了五十三人，包括黨中央、國務院有關部委和各中央局的負責同志，第一階段未參加會議的軍區、兵種、軍事院校的負責同志。第二階段參加會議的共九十五人。

由於三月十八日羅瑞卿跳樓自殺（受傷），第二階段的會議，祇好又轉為背靠背的鬥爭。

根據會議揭發的大量材料，羅瑞卿同志的主要錯誤事實有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敵視和反對毛澤東思想，誹謗和攻擊毛澤東同志。

羅瑞卿同志極端敵視毛澤東思想。林彪同志提出，要「把毛主席的書當作我們全軍各項工作的最高指示」，羅瑞卿同志卻胡說這「不符合我們國家的體制」。林彪同志提出，「毛澤東思想是當代最高最活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羅瑞卿同志卻胡說，「不能這樣講，最高，難道還有次高的嗎？難道不能再高了？最活，難道還有次活的嗎？」「最高最活，不好理解，外國人也不好翻譯呀！」林彪同志提出，「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頂峰」，羅瑞卿同志卻胡說，「這句話也不要這樣說，對外國人影響不好。」羅瑞卿同志還不准說毛澤東思想的形成包含有「個人天才」的因素，說什麼「現在沒人敢再提個人天才了呀！」林彪同志提出，「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羅瑞卿同志卻反對向外國人宣傳和介紹這四句話。林彪同志指示《解放軍報》要經常刊載《毛主席語錄》，羅瑞卿同志卻嫌搞多了。總政治部根據林彪同志的指示，把毛主席、黨中央的指示和軍委的文件，編成教材，作為幹部、戰士的必修課，羅瑞卿同志卻借口發到連隊的東西太多了，不准印發。林彪同志指示，要在民兵中開展學習毛主席著作的活動，羅瑞卿同志卻胡說，「不要單獨給民兵佈置學習毛著任務」。羅瑞卿同志還指責歌舞劇《水兵的光榮》中，唱「敬愛的毛主席」太多了，說要和共產黨聯繫起來，不要單獨地唱。

羅瑞卿同志歪曲和反對毛主席關於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毛主席一再教導，人民內部也有階級矛盾，羅瑞卿同志卻胡說，「農民有一部分自發勢力，想搞單干，不是階級矛盾，而是人民內

部矛盾。」劉少奇同志指示，軍隊內部也有階級鬥爭，羅瑞卿同志卻胡說，「我們軍隊本身不存在階級矛盾，但是存在立場要堅定，階級覺悟要提高，要抵抗資產階級、封建思想的侵蝕，以及對政治問題要有辯證的分析方法等問題。」

羅瑞卿同志當公安部長的時候，就否定毛主席關於社會主義社會存在著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學說。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剛剛發表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指出階級鬥爭還是長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羅瑞卿同志在一九五八年卻大搞什麼「十無運動」，限期做到無反革命、無盜竊、無流氓阿飛、無火災、無車禍，等等。並且把蘇修的東西搬來作論據，鼓吹什麼蘇聯內部已經沒有階級了，那裏的犯罪問題，主要是外部原因了。這是典型的階級鬥爭熄滅論，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觀點。他這種搞法雖然受到黨中央多次批評，但是他仍然堅持錯誤。他不僅散佈階級鬥爭熄滅論，而且接著又放出了一個無產階級專政消亡論。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他就公然說過，「現在基層政權在開始消亡，專政的工具也是如此。」「現在反革命更少了，我們的基層政權主要的不是搞階級鬥爭，而是搞經濟建設、文化建設，就這個意義上講，他是在開始消亡。」黨中央、毛主席反覆強調公安工作一定要在黨委的領導下，走群眾路線。羅瑞卿同志卻強調垂直領導，搞神秘主義、孤立主義，搞蘇聯「格伯烏」那一套。

羅瑞卿同志在新疆地區反對蘇修顛覆活動的鬥爭問題上，違背和反對黨中央、毛主席的方針和指示。他誣蔑我們在中蘇邊境上「製造人為的緊張」，對中蘇邊境的糾紛為蘇修開脫罪責，說什麼「不能說多數是他們挑起的，要作具體分析」。一九六二年五月，新疆伊犁自治州的暴亂事件，明明是蘇修策劃和組織的，他也是非常清楚的。但他卻極力為蘇修開脫，祇輕描淡寫地說，「我看與他們的領事館有點關係」，接著他又別有用心地說，「不曉得這筆歷史怎麼寫法」。他違背毛主席的指示和黨中央、國務院的規定，擅自宣佈邊境地區的五類分子不要內遷，責備新疆軍區在中

蘇邊境「製造無人區」。他還胡說，「現代修正主義攻擊我們在進行民族迫害，搞得不好就是迫害嘛」！

羅瑞卿同志反對毛主席人民戰爭思想，反對我們武裝力量的傳統體制。我們武裝力量的傳統體制是主力軍、地方軍和民兵遊擊隊相結合，羅瑞卿同志卻阻撓和反對建設地方武裝，忽視民兵工作。

羅瑞卿同志拒不執行毛主席關於建立和加強地方武裝的指示。毛主席早在一九六〇年就明確指示，要從主力軍中抽出若干師給沿海各省，作為地方武裝的骨幹。羅瑞卿同志對這一極為重要的戰略指示，既不傳達，也不佈置執行，竟然拖了近五年之久。一九六四年六月、七月毛主席又連續兩次在會議上提出這一問題，指定要從正規部隊中撥出 XX 個師給沿海各省，並且對羅瑞卿同志進行了嚴厲的批評，羅瑞卿同志這時才被迫佈置。但是，他在佈置時卻提出，「究竟抽調完整的建制師，還是抽調一部分建制部隊補充一部分新兵，或者是補充新兵和原來的地方武裝合併組建，還可以研究」。結果，毛主席的指示，還是被他打了折扣。

毛主席指示，搞四清要把民兵工作搞好。林彪、賀龍、徐向前同志也都指出，在四清運動中要自始至終地抓民兵工作，參加四清的軍隊幹部要做民兵工作。羅瑞卿同志卻一再反對，說四清運動中的民兵工作「祇在建設階段抓一下就行了」，並且規定，「軍隊幹部下去參加社教工作不要外賦予搞民兵的任務」。

羅瑞卿同志在民兵工作三落實的問題上也和毛主席唱反調。近幾年來，毛主席多次指示，民兵工作的三落實，第一是組織落實，第二是政治落實，第三是軍事落實，首先是有沒有，然後講政治。羅瑞卿同志卻狂妄地反對毛主席這一指示，他反覆說，「民兵三落實，首先是政治落實，在政治落實的基礎上，再做到組織和軍事的落實」，「如果政治不搞好，思想上不搞好，那個組織不落實還好一點，越落實，被壞人奪去了領導權或者被壞幹部掌握住了，那個越落實就越會幹壞事。」「要把關係搞清楚」。羅瑞卿同志在這裏好像是很強調政治，實際上是用詭辯論否定毛主席首先要

把民兵組織起來的重要指示。同時，羅瑞卿同志搞民兵大比武，也就把毛主席提出的民兵工作三落實統統給衝垮了。

羅瑞卿同志還反對毛主席的文藝方針。毛主席歷來教導，文藝第一是政治標準，第二是藝術標準，首先要解決文藝的政治方向問題。一九六四年六月，毛主席批評文藝界「十五年來，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劉少奇同志也說，文藝戰線的問題「是文藝方向、性質問題。是搞封建的資產階級地修正主義文藝？還是搞社會主義的文藝？這是兩條道路的鬥爭」。羅瑞卿同志卻在部隊文藝隊伍中多次強調，部隊的文藝方向問題解決了，要突出藝術。他胡說什麼，「光搞政治性、戰鬥性很強的東西，就會顯得太單調、太枯燥」，「我們軍隊有些文藝作品，比較生硬，藝術加工很不講究，使人看了很枯燥。我不主張這樣。不然還有什麼藝術？光讀毛選就行了」。

羅瑞卿同志公然修正毛主席關於凡是有群眾的地方就有先進、中間、落後三種狀態的理論。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他說什麼「我們部隊不要提先進、後進，不要提後進戰士」，「後進戰士這種概念可以取消」，「我們軍隊中，祇要有黨員、團員、五好戰士、英雄模範、革命軍人這些名稱就行了」。

羅瑞卿同志還對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進行惡毒的誹謗和攻擊。他多次在大庭廣眾之中散佈對毛主席的不滿。他還向別人說，毛主席不信任他，會整他，他想到上海當市長，早點離開毛主席。以後因為上天安門毛主席沒有要他陪同，到成都開會毛主席沒有讓他一道坐飛機去，他又說毛主席不信任他，要整他。這證明他對毛主席懷恨在心是由來已久的。

羅瑞卿同志這樣敵視和反對毛澤東思想，誹謗和攻擊毛澤東同志，實際上就是反對、敵視和攻擊無產階級的政治，力圖以資產階級的政治來代替無產階級的政治。

第二，推行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反對毛主席軍事路線，擅自決定全軍大比武，反對突出政治。

羅瑞卿同志擅自決定全軍大比武，反對突出政治，是他的資產階級軍事思想的大暴露，是他力圖把我們的軍隊，拉到脫離無產階級政治軌道的陰謀的大暴露，是他力圖以資產階級軍事路線，代替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無產階級軍事路線的陰謀的大暴露。

一九六四年一月，羅瑞卿同志沒有經過軍委辦公會議和軍委訓練研究委員會，也沒有請示林彪、賀龍、聶榮臻同志和軍委常委，擅自決定全軍大比武。一月至十月，他還先後十三次到各地督戰。各省、市民兵比武也是他個人擅自決定的。

大比武是比軍事，比技術，是提倡軍事第一，技術第一。一搞大比武，就否定了四個第一，否定了軍委決定的一九六四年全軍工作的方針。大比武衝擊了政治，衝擊了學習毛主席著作，削弱了部隊的政治思想工作。大比武造成了嚴重的惡果。為了在比武中爭第一，拼湊尖子、弄虛作假的現象非常普遍，單純軍事觀點、錦標主義的傾向大為發展，嚴重地敗壞了部隊的作風，嚴重地脫離了群眾，嚴重地影響了內部的團結。由於大比武，部隊中資產階級思想氾濫，歪風邪氣上昇，四好連隊大幅度下降。為了比武，不少單位選撥幹部和發展黨、團員重技術、輕政治，有些單位排擠工農幹部，把政治思想品質好但技術稍差的幹部撤換了不少，完全違背了毛主席關於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五個條件的指示。大比武也衝擊了正常的軍事訓練，練為看，不是練為戰，搞了一套形式主義、花架子，根本不符合實戰要求。比武中浪費現象十分驚人，訓練事故也大量增加。民兵大比武，衝擊了民兵工作三落實，影響了生產，脫離了群眾，增加了人民群眾的負擔，也發生了許多事故。

一九六四年底，林彪同志根據毛主席一貫的建軍思想、我軍建設的歷史經驗和當時部隊反映的大量材料，作了突出政治的指示，嚴肅地批評了大比武的錯誤。對於這個指示，羅瑞卿同志不僅不執行，反而千方百計地反對、篡改和歪曲。十天之內，他對林彪同志指示的內容反覆篡改了八次之多，竭力閹割其革命精神，塞進了許多私貨。一九六五年初，他在軍委辦公會議第八次

擴大會議和全軍學習軍師機關革命化經驗大會上，以及後來多次到部隊、院校的講話中，他都意圖反對林彪同志突出政治的指示，並且惡毒地進行煽動。例如，一九六五年一月十五日，羅瑞卿同志在高等軍事學院軍以上幹部讀書班結束時的講話中，公然煽動大家說，對於林彪同志突出政治的指示，「你們贊成不贊成？可以討論一下。你們今天就要走了吧！不贊成的回去以後寫信來。」他到處別有用心地講，對於林彪同志的指示要有「正確的」、「全面的」、「辯證的」理解。他還說一九六四年的軍事訓練工作，是建國以來最好的一年，大比武的成績是主要的，氣可鼓，不可洩，不要潑冷水。他到處散佈折中主義（即機會主義）的謬論，極端反對毛主席關於政治領導軍事的基本論點，而強調單純軍事觀點，說什麼軍事就是政治，軍事政治應該並重，反對所謂「空頭政治家」。說什麼「政治搞不好別的就搞不好。但是，如果單純把政治搞好，別的都不好，垮下來，這種政治恐怕不能算政治好，是空政治。哪裏有這種政治！」「一定要正確理解林總的指示，政治搞得不好，打起仗來向後跑。但是，軍事沒有一點功夫，我們訓練就是為了打仗，打得不准，一打人家撲過來，你說向不向後跑？」「軍事訓練搞不好。浪費事小，打起仗來就要亡黨亡國」，等等。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林彪同志提出突出政治五項原則之後，馬上又遭到羅瑞卿同志的反對和歪曲。羅瑞卿同志反對把毛主席的書當作我軍各項工作的最高指示。他還把「苦練過硬的技術和近戰夜戰的戰術」這一條，說成是五項原則中最重要的一條，而把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抓活思想等主要的幾條放到次要的位置。軍委已經決定把五項原則作為一九六六年全軍工作的方針，他卻別有用心地強調主要是解決方法問題，說什麼「不解決方法問題再好的方針也要落空」，影射林彪同志的五項原則是「瞎說一通」。

第三，目無組織紀律，個人專斷，搞獨立王國，破壞黨的民主集中制。

前面說過的羅瑞卿同志個人擅自決定大比武，反對林彪同志突出政治的指示，在公安部搞「十無運動」等等，不但在政治上是嚴重的錯誤，而且在組織紀律方面，也都是嚴重的錯誤。

關於東南沿海對敵鬥爭的方針問題，毛主席、黨中央、軍委曾多次明確指示，臺灣海峽的鬥爭，不單是對蔣匪的鬥爭，主要是對美帝的鬥爭，不單是軍事問題，主要是政治問題。因此，對蔣匪採取的一切作戰行動，都必須從政治上、戰略上加以全面考慮，由黨中央根據整個形勢的需要掌握決定，未經黨中央批准，任何人不得自作主張，輕舉妄動。羅瑞卿同志不請示毛主席、黨中央和軍委，竟然於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日私自指示福州軍區，今後海上作戰，軍區可以根據情況，「積極主動地打擊敵人」，「為了不失戰機，可以邊打邊報告」。

一九六一年一月，昆明軍區部隊進剿蔣殘匪的作戰沒有打好。戰役結束後，根據周恩來同志和軍委常委各同志的指示，軍委決定由張愛萍、王尚榮同志組織檢查組去昆明軍區進行調查研究和總結經驗。王尚榮同志路過重慶，特地把周恩來同志和軍委常委各同志的指示向羅瑞卿同志匯報並請他指示。他還沒有聽完就大發脾氣，暴跳如雷，說什麼「總理他們不瞭解情況，他們所瞭解的與實際情況距離很大，這次打仗的部署是我確定的，部署上沒有什麼不周密的地方，我回去向他們說一下。」還說了一些不三不四的話。最後，他交代檢查組不准把周恩來同志和軍委常委各同志的指示，向正在昆明的張愛萍同志和昆明軍區領導同志傳達。後來，周恩來同志在上海同他談話時，羅瑞卿同志又扯謊抵賴。

羅瑞卿同志對許多重大的軍事行動和作戰計劃，往往不向軍委常委請示報告。有時軍委常委開了會，作了決定，祇要不合他的意，他就發脾氣，頂回去。如一九六四年擬制的XX協同作戰計劃，一九六五年九月、十月在中印邊境的兩次軍事自衛行動，羅瑞卿同志都沒有向軍委常委請示報告。又如一九六二年五月，軍委常委開會討論了中印邊境鬥爭和軍工生產兩個問題，大家根據當時的情況，認為最好調一個部隊到中印邊境西段去，同時軍事工業對常規武器的生產應該加強，使常規武器、彈藥，能增加一些儲備。會議上常委同志要雷英夫同志向羅瑞卿同志報告一下常委的意見，請他考慮決定。他聽了匯報後就大發雷霆，當著很多

人的面，連著說，「不要迷失戰略方向」，「請問什麼地方影響了軍工生產？」

關於國防工業建設和國防科學技術工作等問題，黨中央、毛主席和軍委都制定了一系列正確的方針和政策。但是，羅瑞卿同志不但不貫徹執行，反而任意篡改和取消。一九六二年底，他在國防工業辦公會議上竟狂妄宣佈，「新軍委成立後，中央、軍委、林總對國防工業提出的一系列方針，賀總在三級幹部會議上總結的十七條經驗教訓，凡是正確的，一定要堅持；部分或大部分正確的，加以修改；不正確的，取消。」他否定聶榮臻同志直接領導的國防科委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在我們的原子彈、導彈出來以後，還狂妄地攻擊國防科研工作「從資料到資料，從設計到設計，一事無成」。

林彪、鄧小平、聶榮臻同志，不同意羅瑞卿同志提出的在國防工業中馬上取消軍代表制度的主張，多次指出，「軍代表制度的改變應當慎重考慮，在未弄清情況以前暫時不動。」羅瑞卿同志卻狂妄地說，「軍代表制度是不相信黨、不相信群眾的表現」，「有人說取消軍代表制度是彭、黃思想，我就要冒這個風險」。

羅瑞卿同志在公安部工作的時期，就有很多無組織無紀律的錯誤。例如，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他不請示毛主席、黨中央和軍委，即擅自決定，將軍隊系統警衛北京的兩個師和一個團，改為公安部直屬的人民公安中央縱隊，歸公安部建制。受到了毛主席和軍委的批評。以後，他又積極地擴大公安部隊，並且企圖建立公安工作和公安部隊的垂直領導系統，竭力擴展自己的權力。

羅瑞卿同志還利用各種機會，當著下級幹部的面，散佈流言蜚語，破壞軍委領導同志的威信。他對林彪、賀龍、聶榮臻、陳毅、劉伯承、徐向前、葉劍英同志和已故的羅榮桓同志，都曾妄加言論和攻擊誹謗。

羅瑞卿同志身為黨中央書記處書記、軍委秘書長、總參謀長，但是他很少認真地系統地向幹部傳達黨中央會議的精神和毛主席、黨中央的指示。有時他雖然也傳達一點，但很少原原本本地講述，而且常常和他個人的話攪在一起，使幹部搞不清楚究竟

哪些是毛主席、黨中央的指示，哪些是他自己的東西。羅瑞卿同志還對黨中央，對軍委，特別是對林彪同志，實行封鎖。林彪同志自一九六一年以來，曾對他多次進行批評教育，希望他通氣。一九六五年四月，林彪同志又明確指示，今後軍隊六級（中將）以上幹部和總部各部部長的任免，要先請示報告軍委常委各同志，然後再上報黨中央審批。羅瑞卿同志對這一指示卻置若罔聞，一九六五年五月，全軍中將以上幹部的定級，他不請示報告林彪同志和軍委常委，即擅自決定用軍委的名義上報黨中央。羅瑞卿同志還經常以林彪同志和軍委常委各位同志身體不好為借口，不准別人去請示工作和匯報情況，誰去請示工作或匯報情況，他就訓訴、打擊。

羅瑞卿同志是個典型的「一言堂」，極端不民主，嚴重地破壞了黨的民主集中制。許多重大問題，他不經過軍委常委，不經過軍委辦公會議，不經過總參、總政，常常是個人批示決定。即使是軍委常委、軍委辦公會議上決定了的事情，他也可以隨便推翻，任意改變。軍委辦公會議經常是他一個人講話，別人發言，常常被他攔腰打斷頂回去，不讓人家把話說完，甚至諷刺挖苦，惡語傷人。軍委常委開會，也是他講的多，軍委各位副主席的講話也常常被他插斷。他沒有一點自我批評精神，聽不得半句反面意見，老虎屁股摸不得，誰要給他提了意見，他就長期懷恨在心，尋機打擊報復。

第四，品質惡劣，投機取巧，堅持剝削階級立場，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登峰造極。

羅瑞卿同志個人突出，飛揚跋扈，鋒芒畢露，稱王稱霸。他想盡一切辦法爭名譽，爭地位，出風頭，不擇手段地為個人撈取政治資本。他特別熱衷於以個人名義發表文章和講話，極力為自己爭版面，爭頭條，爭畫面，爭鏡頭。在國內外重大政治問題上，他常常搶先發言表態，把自己打扮成黨和國家的權威發言人的樣子。

羅瑞卿同志是最會投機取巧的。例如，一九六四年葉劍英同志親自抓了郭興福教學法，召開了現場會議，並向軍委建議在全

軍推廣，毛主席和林彪同志同意這一建議，並表示很讚揚。羅瑞卿同志一看這裏面大有油水，便把葉劍英同志撇在一邊，興師動眾，親自召開了一個規模更大的現場會議，把功勞據為己有，並乘機搞起全軍大比武，推行他的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再如，羅瑞卿同志還把自己裝扮成反彭、黃的英雄，到處說自己是受害者，說延安整風時他批評了彭德懷，彭恨死了他。實際上，抗日戰爭時期他在野政工作時，跟彭德懷是跟得很緊的。延安整風時，他看到彭德懷受到批判，就轉過來批判彭德懷。解放戰爭時期打太原時，他看到彭德懷又擔負了重要職務，到太原前線來了，於是又靠上去。當時，彭表示對延安整風受批判不滿，羅接著向彭說，「我也覺得對你的批判是過火了。」一九五三年彭、高、饒聯盟反黨時，他又陷了進去。這說明羅瑞卿同志是個很典型的投機分子。

羅瑞卿同志在軍委工作這幾年，一直高高在上，脫離群眾，脫離實際，從來沒有到基層去作過調查研究，也不願意聽取人家匯報。他在工作上極端不負責任，嚴重失職。他卻裝成最忙的樣子，並且到處吹噓自己忙得不得了。其實，他忙的是撈取政治資本，搞陰謀活動，忙的是吃喝玩樂，甚至在作戰或備戰最緊張的時候，他還照常去看戲、跳舞、釣魚、遊山玩水。他在生活上也是揮霍無度，糜爛透頂的。

羅瑞卿同志雖然入黨已經幾十年，但是他的剝削階級立場並沒有改變。

羅瑞卿同志對於培養和教育了他幾十年的毛主席和林彪同志，對於革命的同志和戰友，毫無革命的階級感情，冷酷無情視若仇敵。

羅瑞卿同志對待他的公務員段光富同志和自己的地主親屬的態度，完全暴露了他的剝削階級立場。段光富同志是苦大仇深、雇農出身的烈士子弟，他在羅處工作十年，勤勤懇懇，任勞任怨，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照顧羅的生活，把自己的身體都搞壞了，但羅對他百般虐待，有如奴隸。相反，羅對於他的地主家庭

是很有感情，甚至把有反革命活動的地主岳父，窩藏供養起來，成為反動地主的「防空洞」。

第五，公開向黨伸手，逼迫林彪同志「讓賢」、讓權，進行篡軍反黨的陰謀活動。

羅瑞卿同志在他的篡軍反黨活動中，首先把矛頭指向林彪同志。他把林彪當敵人看待，常常製造謠言，誣蔑和打擊林彪同志。並且採取種種陰謀手法，逼迫林彪同志「讓賢」、讓權。

一九六四年九月中旬，劉亞樓同志講過，羅瑞卿同志向他說，林總講他身體不好，今後軍委的工作、軍隊方面的事情要羅獨立主持，要大膽地處理問題，不需要經常向林總請示，也不要到處去請示。又說林彪同志還要羅瑞卿同志現在就多抽出時間去把全國地形、戰場都看一看，一旦發生戰爭，就要靠羅瑞卿同志指揮了。這件事情經過查對，完全是造謠，明顯地暴露了他的篡軍反黨的野心。

一九六四年國慶節之後，第三屆人民代表大會準備召開之前，羅瑞卿同志迫不及待地要林彪同志交位「讓賢」。當時他跑到林彪同志處，在談幹部同志問題時，借題發揮，指桑罵槐，說「病號嘛，就是養病，還管什麼事！病號，讓賢！不要干擾！」他走出房門外，在走廊裏還叫嚷說「不要擋路！」

一九六五年一月，第三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林彪同志被任命為第一副總理兼國防部長。一月十七、八日，即人大大會後，羅瑞卿同志到上海私下對劉亞樓同志說，「想不到這個人又東山再起了！」為了騙取林彪同志的信任，羅瑞卿同志對劉亞樓同志說，「我這次認定了，跟定了，今後彈打不飛，棒打不走，我羅瑞卿死了燒成骨灰，都忠實於林彪同志。」並要劉亞樓同志把這些話報告了林彪同志。二月二十二日羅瑞卿同志又到上海，先和劉亞樓同志談了半天，第二天上午去見林彪同志，向林彪同志表示，今後他更相信林彪同志的領導，更擁護林彪同志的領導，說今後是「跟定了」。林彪同志指出，「要跟黨中央、毛主席。」並要他今後改正過去的一些想法，好好工作。林彪同志因羅瑞卿同志對劉亞樓同志談了許多不應該的話，批評了他。羅瑞卿同志上午

剛講了更相信更擁護林彪同志和「跟定了」林彪同志的話，下午一到廣州，就又大造林彪同志的謠言。

一九六五年二月十四、十五日，劉亞樓同志在羅瑞卿同志的指使下，向葉群同志講了四條意見，希望她勸林彪同志接受。這四條意見是：第一，一個人早晚要出政治舞臺，不以個人的意志為轉移，不出也要出，林總將來也要出政治舞臺；第二，要好好保護林總身體，這一點就靠你們了；第三，今後林總再不要多管軍隊的事情了，由他們去管好了，軍隊什麼都有了，主要是落實問題，不要再去管了；第四，一切交給羅去管，對他多尊重，要放手讓他去管。劉亞樓同志還對葉群同志講，「羅總長說祇要你辦好了這件事，羅總長是決不會虧待你的。」劉亞樓同志提出後，葉群同志說，「這樣大的問題，你和我講是不合適的，你要說，請你直接和林彪同志說好了。」二月十九日，劉亞樓同志到林彪同志處，向林彪同志講了上述第四條意見的大意，說要尊重羅，更相信羅，軍隊的事情放手讓羅去管。林彪當時嚴肅地批評了劉亞樓同志，並向劉亞樓同志指出了一九六一年以來羅瑞卿同志的思想情況、惡劣傾向及近幾年來對羅進行批評的經過，劉亞樓同志表示他過去受了羅瑞卿的騙，上了羅瑞卿的當。關於這件事，劉亞樓同志的妻子翟雲英同志聽說過，楊成武、吳法憲同志也都聽劉亞樓同志在臨死前說過。

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九日下午，羅瑞卿同志利用中央常委接見軍委××會議人員的機會，給中央常委，特別是給林彪同志出難題。羅瑞卿同志事先沒有請示報告軍委常委，就佈置各小組選出代表和他一塊向黨中央常委提意見。他採取「突然襲擊」的辦法，帶頭提出要求大量增加部隊定額和合併軍區的意見。他發言後，就要各軍區的同志發言，妄圖造成一種聲勢，逼著中央常委馬上表態。羅瑞卿同志這一惡劣做法，當即受到林彪同志和黨中央常委其它同志的嚴厲批評。羅瑞卿同志合併軍區和大量增加部隊定額的主張，林彪同志多年來是一直不贊成的，並且向毛主席請示報告過，毛主席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意見。這件事，羅瑞卿同志是非常清楚的。羅瑞卿同志在這裏是玩了一個陰謀。他的如意算

盤是，如果中央常委同意了他的意見，他就在各個軍區同志的面前，顯示他的功勞，又達到了打擊林彪同志的目的；如果中央常委不同意他的意見，他就可以挑起各軍區對黨中央和林彪同志的不滿。

羅瑞卿同志曾當著很多人說，「汪東興同志說，毛主席四個第一中人的因素第一這句話缺乏階級分析。人有好人、壞人，有這個階級的人、有那個階級的人。」汪東興同志證明，毛主席根本沒有講過這些話，汪東興同志也沒有對羅講過這些話。林彪同志所提出的四個第一中人的因素第一，是就人和武器的關係來說的，這正是毛主席一貫的軍事思想。毛主席對林彪同志提出的四個第一，幾年來曾多次稱讚。羅瑞卿同志還造謠說，羅榮桓同志病危的時候，想見一下林彪同志，但林彪同志托病不見，等到羅榮桓同志逝世後，林彪同志又去向死人鞠躬，去送葬，這是補過，也是做給別人看的。羅榮桓同志的妻子林月琴同志和林彪同志的秘書，都證明根本沒有這回事，完全是捏造和誣蔑。

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日，即在××會議期間，林彪同志連續批評了羅瑞卿同志之後，羅瑞卿同志還和梁必業同志私下密談，挑撥林彪和羅榮桓同志的關係，誣蔑和攻擊林彪同志。

羅瑞卿同志長期對林彪同志進行封鎖，受到林彪同志的批評後，雖然他表面上也作過一點檢討，但實際上他不僅不改正錯誤，反而懷恨在心，變本加厲，對林彪同志惡毒地進行造謠、誣蔑和攻擊。他不但自己不報告、通氣，而且也不准別人報告、通氣，誰若通氣，他就打擊、訓斥。有時他也搞一點假通氣，又常常假傳林彪同志的指示，進行挑撥和誹謗。

羅瑞卿同志不僅陰謀篡奪軍隊的大權，他還從中央到地方，到處伸手。本來他是管軍事工作的，但是他越權越位，常常以個人名義，以命令口氣，向中央書記處的書記、國務院的副總理、各中央局、大部分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批過大量文件，許多事情他不經調查研究，亂加批評職責和瞎指揮。這種事例很多。

羅瑞卿同志為了實現他篡軍反黨的陰謀，還背著黨，同一些和他氣味相投的人勾勾搭搭，吹吹拍拍。羅瑞卿同志和楊尚昆、楊獻珍、劉亞樓、蕭向榮、梁必業同志的關係是極不正常的。

到會的同志一致認為，羅瑞卿同志的錯誤不是一般性質的錯誤。他是用資產階級軍事路線來反對無產階級軍事路線，是用修正主義來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反對林彪同志，反對黨中央，反對毛主席。他妄圖奪取兵權，達到他篡軍反黨的罪惡目的。他是一個資產階級極端個人主義的野心家、陰謀家、偽君子，他是打著紅旗造反，是一顆埋藏在我們黨內軍內的「定時炸彈」。

這次小組會議，大家根據擺事實、講道理、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對羅瑞卿同志進行了耐心的教育和嚴肅的批判，並且一再說明允許他申辯，允許他保留不同意見，竭力想把他挽救過來。但是，他不但毫無悔罪認錯之意，反而一再向黨進行欺騙、抗拒和威脅。他在三月十二日的檢討中，雖然也承認自己犯了錯誤，戴了幾頂空帽子，但是在根本問題上，還是千方百計進行狡辯和抵賴，並且安下許多「釘子」，進行反撲和準備日後翻案。他的檢討引起到會同志極大憤慨，當場受到許多同志批駁。之後，他又以來不及作檢討為借口，要求先行散會，大家回去工作，待他準備好了之後再來開會。此計不成，三月十八日，他竟以跳樓「自殺」向黨進行要挾，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走上了叛黨的道路。他在跳樓前寫下的「遺書」，是向黨進攻、向會議反撲的毒箭。在「遺書」中他連前幾天承認了的一點點錯誤也全部推翻了。

會議認為，羅瑞卿同志的錯誤發展到這樣嚴重的地步，不是偶然的，是國內外階級鬥爭的反映，是有其深刻的階級、歷史和思想根源的。羅瑞卿同志出身於地主家庭，入黨三十多年來，他的剝削階級立場沒有得到改造。在民族民主革命時期，他在黨的領導和幫助下，雖然走過來了，但是，到了社會主義革命時期，他同黨的距離越來越大，終於以黨內資產階級當權派的面目站了出來，進行篡軍反黨活動，作了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

各國反動派的應聲蟲，充當了地富反壞右的代理人。在各個革命時期，羅瑞卿同志曾犯過許多錯誤。例如，在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他是跟著王明路線跑的。在一、三軍團的關係和對待四方面軍的幹部問題上，搞宗派主義，破壞團結。在抗日戰爭時期，彭德懷搞百團大戰、給群眾運動潑冷水，他是積極支持的。一九四一年皖南事變後，彭德懷違背黨中央的政策，擅自發佈「沒收大地主的土地，分配給無地少地的農民」的訓令，也是他起草的，建國以後，彭、高、饒反黨聯盟事件，他也是陷進去了的。黨中央、毛主席和軍委、林彪同志對他做過多次批評教育。一九六一年以來，林彪同志以最大的耐心，對他的錯誤反覆多次進行批評教育，以至向他提出嚴肅的警告。但是，他還是陽奉陰違，拒不改正錯誤，終於在近兩年惡性發作，來了個大暴露。羅瑞卿同志的世界觀，是資產階級極端個人主義的世界觀。為了追逐個人的名利權位，他不擇手段，做了各種壞事，直到公開向黨伸手。結果就全部剝落了自己的偽裝，暴露了自己的原形。

到會同志一致認為，黨中央、毛主席和軍委、林彪同志及時地察覺了羅瑞卿同志的篡軍反黨陰謀，斷然地採取了處理這一問題的措施，是非常英明的。繼中央上海會議之後，又召開了這次小組會議，徹底揭發和批判了羅瑞卿同志的錯誤，粉碎了他的篡軍反黨陰謀，這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是黨的正確路線的偉大勝利。這又一次證明了我們的黨是一個偉大、光榮、正確的黨，證明了我們的軍隊是黨的無比忠實可靠的武裝力量。幾年來，在黨中央、毛主席和軍委、林彪同志的領導下，軍隊的工作成績是偉大的，對羅瑞卿同志的錯誤是有抵制的。出了一個反黨分子羅瑞卿，絲毫也無損於毛主席親手締造的我們人民解放軍的光輝。到會同志一致深信，在粉碎了羅瑞卿同志的篡軍反黨陰謀之後，壞事將變為好事，我們黨的事業，我們的軍隊建設和國防建設，都必將得到更大的發展，取得一個又一個新的更加輝煌的勝利。

會議根據羅瑞卿同志的嚴重錯誤及其自絕於黨的事實，向黨中央提出如下建議：

- 第一，撤銷羅瑞卿同志在軍事系統的各项職務。
- 第二，撤銷羅瑞卿同志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
- 第三，撤銷羅瑞卿同志黨中央委員會書記處書記的職務。
- 第四，對羅瑞卿同志的錯誤作出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結論。
- 第五，把中央工作小組的這一報告和小組會議上的幾個主要發言，以及羅瑞卿同志三月十二日的檢討，傳達到適當的範圍，徹底肅清他在各方面的惡劣影響。

彭真同志在這次會議過程中，在一系列的重大政治問題上，對羅瑞卿同志的錯誤，採取了縮小、掩護、包庇、支持的態度，並且企圖給羅瑞卿同志待機翻案作種種準備。彭真同志實際上是同羅瑞卿同志站在反對毛主席、反對黨中央、反對林彪同志的一個立場上。有關事實，由葉劍英、蕭華、楊成武、劉志堅四同志，另寫一信報告毛主席和黨中央。

以上報告，是否有當，請批示。

中央工作小組
一九六六年四月三十日

第二十二章 炮打司令部

端掉彭、羅、陸、楊

批羅的會還沒有結束，就傳來彭真「出事」的消息。聽楊成武說：「彭真包庇羅瑞卿，破壞中央工作小組對羅瑞卿問題的處理，他們告到主席那裏去了，主席非常重視這個問題。」

當時，全國工作的重點，一是搞「四清」，二是搞「戰備」。因此，主席批判《海瑞罷官》，批評中宣部是「閻王殿」，我們認為是地方上的事，對軍隊幹部影響不大。彭德懷是「死老虎」了，雖然，又一次被毛主席點名，沒感到有什麼大問題。後來，主席批評了由彭真主持搞的「二月提綱」，開始搞到彭真頭上了，說彭真「爲自己準備了垮臺的條件」，這時，我思想上才開始重視起來。彭真在中央是個不簡單的人物，除了七個常委之外，就數他是老大了。他都有問題了，可能中央內部有了較大的意見分歧。

一九六六年五月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重點批判了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撤消了彭真負責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成立了新的文化革命小組，有江青參加，這個小組隸屬於中央政治局常委領導之下，就是大家所叫的中央文革。會議發出了中共中央《通知》，大家都叫《五一六通知》。這個通知裏的話就比較厲害了，《通知》裏說到「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爲資產階級專政」，《通知》還說到「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而要做到這一點，必須同時批判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裏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清洗

這些人，有些則要調動他們的職務」。這兩段話都是毛主席親自寫的，份量很重。

中央撤消了彭、羅、陸、楊的職務，重點在彭、羅。這對全黨、全軍的震動是很大的。羅瑞卿在軍隊霸道，彭真在黨內張狂，打倒他們，當時在全黨、全軍的確擁護的人不少。七大以後，有毛的提攜，劉的重用，彭真的地位越來越高，可彭真在東北，在華北，都沒有搞好。八大以後，彭真又得到劉少奇的重用，是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是劉、鄧司令部的重要幹將。毛主席批判彭真搞的「匯報提綱」，又撤消了他領導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後來又進一步深入，不久就指向劉少奇，劉少奇成為革命對象了。

打倒劉少奇是文化大革命開始的核心問題，其餘的問題都是由此擴展的。毛主席要打倒劉少奇，並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按照常規，用舉行中央會議的辦法是可以解決的。其實，人民解放軍是支持毛主席的，高級幹部的大多數，祇要不是劉、鄧圈子裏的人，也是支持毛主席的，就是劉、鄧圈子裏的人，祇要主席還要用他們，他們也會支持毛主席的。因此，打倒劉少奇並不一定要把劉少奇說得一無是處，更不用把他說成反革命，或「叛徒、內奸、工賊」。正像兩口子離婚一樣，不必把對方說得一無是處，實在合不來就分開，降低職務或撤消職務就可以了。主席為什麼要對劉少奇這麼做，不清楚。因為，當時我所處的地位，離中央高層還遠。但我從五九年秋天開始，就是軍委辦公會議的成員之一，九大以後，又參加了政治局的領導工作，對打倒劉少奇的問題，還是有接觸的。我盡量把自己接觸過的有關打倒劉少奇的問題，在這裏回憶一下。

如果搞清楚了毛主席為什麼要自下而上地搞「四大」來打倒劉少奇，那麼對毛主席為什麼要搞文化革命也就清楚了，或基本清楚了。

要進行反擊戰了

一九六六年五月九日，楊成武打電話叫我到他家去看一個文件。我到之時，李天煥等好幾個人早在他家裏的一樓客廳閒談，談得很熱鬧。

我剛坐下，楊就說：「老邱，要進行反擊戰了。另外，還要祝賀你得了大獎！」

「我不知道你說的是什麼問題。」

楊笑著說：「你也有不知道的事？」大家哄堂大笑起來了。

李天煥插話：「剛才，楊總長（李稱呼楊的職務向來不加『代』字）說，反擊戰就是毛主席決定，要反擊他們正在領導進行的文化革命。楊總長還帶回來毛主席對你的報告的指示。」（指毛主席在林總轉送的《軍委總後勤部關於進一步搞好部隊農副業生產的報告》的批示，後來稱「五七指示」。）

我正在看「五七指示」時，楊成武以高興的心情談了他參加杭州會議的情況與討論的內容。

楊成武說：「前幾天，我同康生乘專機去杭州參加中央常委擴大會，怎麼把我也擴大進去了，我開始也不知道。中央辦公廳通知我去，我去請示林總，他說你去吧，我是代替林副主席去的。會上把羅又批了一通，我向主席報告說要發言，主席說你聽聽別人的發言。會上大家群情激憤，毛主席在會上還做了重要指示，說我們的文化大革命就要開始了。」

對毛主席指示，楊說了三點：

第一點，毛主席說：「他們（指彭真等）迫不及待地搞一個《匯報提綱》，是沒有什麼事可做嗎？不是的，我交代的好多事都沒有人辦，連怎樣做的意見，都沒有提出來。是我官僚主義太多嗎？並不完全是，我官僚主義也有就是了。我們應當仔細觀察。我不同意整左派。」

第二點，毛主席說：「中央分爲一線、二線，沒有說要兩個中央。我離開北京到外地時，常委議了兩條，中央的工作以一線爲主，我有什麼意見會向北京提出來，我不在外地發指示；同時，也希望北京有什麼大的問題，也向我打個招呼。他們搞文化革命是一件大事，但同我連招呼都沒有打一個，就做決議，發指示。這是什麼問題，大家想想吧。」

第三點，毛主席說：「修正主義不祇是文化界出，黨政軍也有。總要有個辦法吧。跟著他們走，也是辦法，但大家又不願意，就祇好唱對臺戲了。」

另外，楊成武還說了杭州會議一些細節。例如，文化革命的名稱都議論了好久，才定下來的。陳伯達提出叫「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主席說伯達提得好，就叫「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楊談話至此，我也吹了楊幾句：「楊代總長是中央要人了，可以同毛主席一起議事了。『反擊戰』一詞用到政治鬥爭上來，也合適，表達力很強。」

李天煥說：「總長同統帥的關係，早就是同桌辦公了。在我軍高級幹部的心目中，早已明確：楊總長是林副主席的接班人。」

楊成武面帶笑容，聲音很大地說：「我們都是毛主席的兵嘛。百年之後，林副主席的事業，總要有人繼承的！」

很顯然，楊成武內心是高興地承認了他自己是林副主席的接班人。這裏順便說一句：楊這個人不愛說笑話，嘴巴裏髒字很少，但非常善於表現自己。他在同人們的接觸中，特別是同高級幹部的接觸，絕大多數時間，都是自我介紹，毛主席、林副主席怎樣器重、培養、信任自己，常常委以重任。「瀘定橋」、「臘子口」經常掛在嘴上。

我們正在談得熱鬧時，葉群來了。她是來看望楊成武和來取「五七指示」的。

葉群來到之後，首先親熱地拉住楊成武的手說：「我來時，『一〇一』交代，要告訴成武：他這個時候做了很多大工作，很累，要好好休息兩三天。我感激他，代我到杭州去參加中央常委會。我得到了休息，他倒是很累的。」

楊成武接著說：「我一定聽『一〇一』的話，我感到能夠為『一〇一』辦事，是非常非常光榮的。我等一會就去看林副主席。」

楊、葉互相間的談話，使我感到，林、楊、葉之間的關係，不僅是親密無間，而且有很溫暖的人情味。

葉群看完毛主席的批示全文之後，接著說了一段很長的話，她說：「我看了毛主席的批示，不敢用任何字眼來評價，祇有認真學習。主席對一個部門的報告做這樣的批示，以我知道，解放以來是第一個。主席的批示，對軍隊，特別是對總後，是一個極大的鼓勵。我們邱部長的工作做得好，向你祝賀！」

我立即說：「林總領導得好。軍委領導得好！」

這次在楊成武家談話，受益不小。大約談了三個小時，大家才高興地散了。

八屆十一中全會之前，陶鑄在京西賓館黃永勝的住房裏，兩人有不短時間的談話，我是去看黃永勝，然後在那裏靜聽的。

陶鑄以自己特有的風度，直接了當地說：「現在，我們黨內不是一個中央……，毛主席說過幾次，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怎麼辦？前一段，主席還談到兩頭蛇的問題。主席說：顧名思義，兩頭蛇是一條蛇有兩個頭，一頭向東，一頭向西，總是走不到一個方向，這有好受的嗎？……」陶鑄臨走時，同黃永勝說：「要帶口罩，不要感冒了。感冒了，聞不出氣味，就會上錯了門。」

六六年羅瑞卿的會結束後，有一次葉帥在京西賓館他的宿舍閒談的時候，葉帥也轉述了毛主席說的兩頭蛇的問題。

劉少奇談彭、羅、陸、楊

五月政治局擴大會議以後，大家「階級鬥爭」這根弦一下就繃緊了。全黨立即在黨內高級幹部中進行傳達，傳達的主持人都是後來稱爲「無產階級革命家」的人，都堅決擁護毛主席，堅決擁護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堅決擁護中央撤銷「彭、羅、陸、楊」職務的決定。軍委的傳達會議是葉帥和蕭華主持和張羅的，葉帥講他傳達「彭、羅、陸、楊」問題主要是根據「少奇和小平的講話」。

劉少奇在一九六六年六月下旬的一次重要會議上說：

彭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鄧小平同志不在的時候，實際上他又是副總書記，他還是北京市的市長、市委第一書記，……他雖然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卻經常參加常委會議。書記處分工由他管人大常委、公安、政法方面的事務。彭真有些工作能力，但有許多缺點，過去也犯過不少大的錯誤，他有濃厚的宗派情緒，長期地進行了宗派活動；他沒有自我批評的精神，有架子；他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是不大懂的，又不大去研究。在歷史上他犯過盲動主義的錯誤，在晉察冀犯過王明路線的錯誤，兩次王明路線錯誤，他都有份；在解放戰爭中，在東北，他也犯過錯誤；全國解放以後，在參加領導的活動中，他在重大問題上，提不出解決問題的意見。對彭真，我們批評過他，毛主席也曾多次地批評過他，我們是要把他培養成爲黨和國家的領導

人，對他基本上也是信任的。這幾年來，他濫用了對他的信任，極力培植他的私人勢力，他同毛主席、同我們搞兩面派，背著毛主席、黨中央進行了不少地下活動，與羅瑞卿、楊尚昆有密切關係，有些地下活動是聯合搞的；與陸定一也有密切的聯繫，最近在文化大革命上與毛主席對抗，就是和陸定一共同搞的。彭真對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實際上也是反對的、抵抗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是當前偉大的、深刻的社會主義革命，彭真是堅決反對的，他極力把運動拉向右邊去，拉到與毛主席思想相反的方向去。對文化大革命，對城鄉四清運動，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實際上也都是反對的。這是這幾個人的共同點……彭真不接觸群眾，不接觸實際，喜歡搞個人突出，他在相當長的時間裏，就反對周總理，也反對陳毅、小平同志，也反對我。在我面前搞兩面派，當面一套，背後一套。彭真是長期隱藏在我們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者。在階級鬥爭深入到當前階段，他就不能不站出來，反對毛主席思想，這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

劉少奇說：

羅瑞卿是軍委總參謀長。國防部部長是林彪，但林彪長期生病，經常工作實際上是由他來做的，可是他還是不滿足。林彪同志在軍隊裏威望比羅瑞卿高得多，他講話，大家都照辦，這就觸犯了羅瑞卿，認為干擾了他。他不願意讓林彪同志『干擾』國防部、總參謀長的工作，因此，林彪講幾句話，他就跳起來了，他要林彪把國防部長的位子讓出來（作者註：其實這就是「四條」的核心）；他長期不把國防部的情況向林彪同志報告，別人去向林彪同志匯報，他反對；林彪同志找人談話，他也反對，甚至採取了惡劣手段反對林彪同志，可以說是虐待一個病人。他還反對黨的軍事路線，毛主席在軍事問題上，有一套完整的路線，林彪同志和毛主席的軍事路線是一致的，並且有些發展，羅瑞卿是反對主席、林彪軍事路線的。……他實行的是資產階級的軍事路線。此人盛氣凌人，鋒芒畢露，對老的元帥、老幹部，都加以打擊，他是專搞一言堂，不聽別人的意見；他到處伸手，干涉地方工作；到

處突出個人。羅瑞卿問題是在去年十二月揭露出來的，並作了處理，是毛主席親自處理的。處理以後，在今年二、三月間，召集了幾十個人，有地方、軍隊幹部參加的會議，進一步討論羅瑞卿的問題，他在會上講了一次話，大家不滿意，沒有讓他過關，此時他就在自己住的三層樓跳樓自殺，受了點傷，沒有死。本來，自殺要有點技術，應該是頭重腳輕，他卻是腳先落地，腳壞了點，頭部沒有傷。（鄧小平：就像女跳水運動員那樣，跳了一根冰棍）他的這種行動，是對抗情緒，是嚴重地對抗黨，對抗同志們的批評。在這次會議作出決議的過程中，發現了彭真的問題，彭代表中央參加處理羅瑞卿問題，但彭真在作結論時，在關鍵問題上，包庇了羅瑞卿，這暴露了彭真、羅瑞卿之間的不正常的關係。劉少奇說：

陸定一的問題。首先是從陸的老婆嚴慰冰反革命案件上暴露的。……嚴慰冰的反革命案件，兩年前就發現了，當時我們懷疑陸定一是否知道她的反革命活動。這事是交給彭真去處理的，因為這是一個具體案件，我們沒有直接去處理。兩年以來，嚴慰冰的反革命活動越來越猖獗，她打入黨內，探聽林彪同志的行蹤，林彪同志什麼時候到什麼地方，住在哪裏，這些事我們都不太清楚，但是她都打聽得清清楚楚。嚴慰冰跟著陸定一，參與很多黨內機密，知道很多事。幾個月前，要彭把嚴慰冰的材料告訴陸定一。而陸定一回去卻把情況全部告訴了嚴慰冰，並用多種方法來包庇嚴。最近已把嚴慰冰這個反革命分子逮捕了。根據各種材料判斷，陸定一是知道嚴的情況的，陸嚴是合謀的，許多事陸定一如果不告訴嚴慰冰，嚴是無法知道的。

劉少奇還說：

楊尚昆是黨中央辦公廳主任，當了二十多年，掌握全黨的機密文件，各種重要的事情。近來發現他把黨內重要機密、核心機密文件，讓不少人抄走了，有幾萬件，不請示中央就讓人家抄走了，到底抄到什麼地方去了，不知道，是否出國了，很難講。現在還查不清楚。楊尚昆歷來是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的。毛主席鑒於蘇聯的經驗和外國的經驗，多次決定：不論黨內、黨

外、對中國人、對外國人都一律禁用竊聽器。搞這些東西黨內緊張，黨外也緊張，外國人也緊張。我們到外國去，在室內就講相反的話，真正的話是不在那裏講的。歷來黨內是禁止用竊聽器的，楊尚昆在一九五八年以前，中央開會楊是公開安裝錄音機錄音，後來禁止了，他就秘密的搞竊聽器。一九五九年毛主席發現了，再一次加以禁止，他還是不聽，仍然背著主席搞，我們常委開會、談話，甚至毛主席坐的火車上他都裝了竊聽器，我們常委幾個人的談話他都知道。一九六一年又給毛主席發現了。這時楊尚昆就把機要室的主任、副主任推出來承擔責任，說他自己不知道。最近發現在毛主席辦公室安裝的竊聽器就是楊尚昆指示的，這事就不簡單了，就成為政治問題了。這不是一般的紀律問題，是嚴重違反黨紀和國家綱紀的。最近讓楊尚昆隔離反省，要他交代這個問題，楊尚昆是犯了罪的。今後有些會議，要公開錄音的，都要經過請示、批准；安竊聽器是絕對不允許的，任何情況下也一律禁止。

彭、羅、陸、楊他們的互相關係是不正常的，到底是什麼關係，達到何種程度，我們組織了審查委員會，正在進行審查。他們共同特點是反對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都是搞地下活動的。他們的企圖不是個人要點什麼東西，而是企圖根本改變我們黨和國家的根本路線、根本政策，要按照他們的路線辦事，要按他們的面貌改造黨，改造全中國，企圖在中國實現修正主義政策，也就是復辟資本主義的政策，如果他們的企圖得逞，就可能實現政變。

彭、羅、陸、楊事件是有發生政變的可能的，這是激烈的、國際、國內階級鬥爭在我們黨內領導機關的反映。如果他們政變成功，我們的國家就要變顏色。主席前幾年同羅瑞卿、賀龍同志講，我們國家是否會變顏色，如果發生政變，會不會把我們也抓起來？賀龍同志當時聽了傻了。不要以為政變是沒有可能的，是有這種可能的。當然如果他們搞政變是不可能成功的，特別是毛主席還健在的時候。這次彭、羅、陸、楊還來不及搞政變，就被

揭露了。這次事件的揭露是黨和國家的偉大勝利，是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

傳達政治局擴大會議精神後，各單位都在揭蓋子，中央各部委的領導是這樣，各省市的書記也是這樣，不少人都在抨擊黨內自己的戰友，說人家反對毛主席，說人家是修正主義。如譚震林把鄧子恢罵得狗血淋頭。當時革別人的命都是起勁的，等革命革到自己頭上，又怨聲載道，氣餒懼怕，不斷地「檢討」、「請罪」，甚至表示「永不翻案」。可是，文革過去了，這些人都說自己是反對文革的，當年說過的話都是違心的。我認爲這麼說是對黨不忠誠的，政治上是不負責任的，文過飾非並不能總結文革的教訓。如果我們黨的高級幹部在黨內鬥爭中都說的是違心的話（違心的話客觀上就是假話），那我們共產黨不就成了了一個說瞎話的黨了嗎！？

嚴慰冰事件

嚴慰冰是陸定一的老婆。大約從一九六〇年起，到一九六六年一月五年多的時間裏，她給林彪一家寫了幾十封侮辱人格的匿名信。信的內容主要從挑撥豆豆同她母親葉群的關係起，直到亂編亂罵。例如，說豆豆不是葉群生的，說豆豆長得像劉少奇。嚴慰冰更卑鄙的是在信中竟署名「王光×」，地址寫成王光美母親辦的托兒所所在的西城區按院胡同，這是明目張膽誣陷我黨在第一線主持工作的副主席劉少奇，惡毒攻擊我軍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林彪，應該是大罪。陸定一在延安追求過葉群，這是很正常的事，嚴慰冰在匿名信中謾罵葉群，給葉群造謠，總之，信的內容惡毒下流。

嚴慰冰的做法，當時是觸及刑律的犯罪行爲，現在看仍然是觸及刑律的犯罪行爲。豆豆鬧，葉群到處找證人，老警衛員、馬伏等等，搞得林總一家不得安寧。這件事對林彪的傷害很大。

黨中央很重視此案，公安部門組織專門力量進行偵破。我記得當時中央指定駐京各大單位黨委書記，親自掛帥破案。劉主席、周總理、彭真等中央領導都親自指導過破案。一九六五年國慶節前就破案了。陸定一爲了包庇嚴慰冰竟逼迫中央保健局長史書翰同志作嚴慰冰有神經病的偽證，結果史書翰同志爲此含冤而死。對此案，周總理的態度是嚴肅到

了空前未有的程度。在會上對陸定一，不僅批評、痛罵，還激動得把喝水缸子砸到陸定一坐的那邊去了。總理這樣發怒，以我所知是空前未有的。

總理批評嚴慰冰這種行爲，不僅在共產黨內不應該有，就是在國民黨內也是少有的；是國民黨少數特務才能幹出來的下流手段。在我們黨內發生這樣的事，並且還持續了幾年的時間，這不僅對林總不應當，對任何人都不得當。把國民黨的下流手段搬到共產黨內部來，是對黨的破壞，完全是反革命行爲。對這件事，應當受到黨紀、國法的制裁！

陸定一、嚴慰冰是夫妻關係，但他們並非同案。對嚴慰冰應當依法處理。陸定一即使有一定的責任，也還是黨內問題。後來，把陸定一也關進監獄，是錯誤的，至少是用感情代替政策了。凡是用感情代替政策，也就沒有政策了。

在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期間，汪東興向我直接打了一次電話。他說：「我們這裏有兩個人，現在到你們那裏去拿嚴昭的東西（嚴是陸定一的小姨子，總後副部長韓振紀的老婆）。你先告訴韓，把東西交給來人就行了，不要問任何事情，你自己也不要去打聽那些事。現在的事，當你能聽到的，不用問也可以聽到；要是你聽不到的事，問也問不到，不僅如此，還可能引起不必要的麻煩。不過我可以告訴你陸定一壞的出奇，嚴慰冰已經被抓起來了。」汪東興的口氣很大，我除了聽之外，一句話也沒有說。

五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是在極爲秘密的情況下舉行的。在會議進行期間，一天下午我這裏有一件急事，必須立即向葉劍英副主席請示報告。在沒法可想的情況下，我打電話到懷仁堂仁政廳。

仁政廳旁邊小房子有保密專用電話。接通電話之後，值班的警衛首先問：「你是邱部長嗎？」他對我要找葉帥接電話有些爲難，但又不好拒絕，於是 he 去找葉帥去了。

一會兒值班警衛回來帶著歉意的口氣對我說：「不行啊，不能叫，葉帥在發言呢。」沒有辦法，我祇有自己到中南海西門值班室去等候葉帥散會了。散會時，葉帥知道我在等他，就叫工作人員來通知我跟他一起走，我上了他的車，我的車跟在後面。葉帥在車裏還很激動，有些言猶

未盡的樣子。他對嚴慰冰寫匿名信和陸定一說他不知道嚴的事特別氣憤；對彭真，葉帥是極其鄙視的態度，一路上說個不停。

葉帥答覆了我的問題，叫我不要走，說一會楊成武要來。楊來了以後，祇講了幾句工作上的事，話題又轉到開會的情況。楊說：「聽了嚴慰冰搞的這些特務活動，真是氣人啊！我對陸定一講解放軍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柱石！我邊講邊站起來走到陸定一跟前，把拳頭伸到他眼皮下說：『這就是無產階級專政！』」楊成武邊說邊打手勢，同時把拳頭也伸到我的眼皮底下，說得活靈活現。

首都工作小組

政治局五月擴大會議期間，對首都安全問題，提高到了重要的日程上來了。中央指定葉劍英副主席擔任首都工作小組組長。小組辦事機構開始時設在京西賓館八樓，後搬到三座門。我雖然不是首都工作小組的成員，但參加了工作組的部分工作。

對首都安全，主要採取了兩項主要措施。

第一是加強衛戍區，也可以說是建立了有實力的衛戍區。文化大革命前，北京有三個警衛部隊：首都警衛師、公安總隊、中央警衛團。這三個部隊分別隸屬總參謀部、公安部和中央辦公廳建制。另外，還有一個管理人民武裝的衛戍區。

衛戍區改組後，除原有的首都警衛師改為警衛一師，公安總隊改為警衛二師之外，又從野戰部隊增調了兩個主力師，一個是二十四軍的七十四師，這是我軍當時的兩個機械化師之一；一個是駐石家莊六十三軍一八九師。

據楊成武說，在選調首都警衛部隊的時候，林總曾向他說：「選衛戍部隊的條件是要同你（指楊成武）有濃厚感情的部隊，能夠指揮自如，十分踏實的部隊。」林能向楊說這種話，也可見他們之間的關係密切的程度了。從六十三軍調來的一八九師，是楊成武在抗戰時期創建的部隊；從二十四軍調來的七十四師，在抗美援朝回國後就駐在北京地區。這兩個師對楊成武都是十分忠誠的。

第二是確定首都工作小組的日常工作。這項工作是十分複雜的，準備花費很大的人力和時間來進行。這項工作，中央由周恩來總理領導，

葉劍英副主席抓總，具體工作由謝富治、楊成武組織實施。周總理指定我總管經費開支、物資調撥等。

對首都安全的任務暫定了兩項：（一）制定對首都的設防、警衛、主要目標控制的方案；（二）準備對首都進行全面的清查清理。清查清理的對象包括社會人口、槍支彈藥、電臺、監獄、僑民等。

爲了具體進行工作，在首都工作小組領導下，組織了一個勘察小組。小組成員有楊成武、邱會作、汪東興、萬里（當時的北京市副市長）、李靜（總參作戰部副部長）等，楊成武爲主持人。勘察小組對北京城進行一個多月的實地勘察。

對遠郊區曾經勘察過的有：南口、紫金關兩個中央首腦指揮工程；房山、長辛店的廣播發射臺和勞改農場、秦城監獄等。對近郊區曾經勘察過的有：玉泉山（毛主席住地，中央戰時指揮所），象鼻子溝（國務院戰時指揮所），西山（中央軍委戰時指揮所）；還勘察過密雲、順義、通縣、長辛店等處衛戍區部隊的外圍部署地區。對城內曾經勘察過的有：電訊大樓、電訊大樓、地下污水道和中南海周圍的高層建築。電訊大樓屋頂上，距離中南海毛主席住房直徑祇有幾百米，內眼看得很清楚。我們就在樓頂開會，研究過對中南海的保衛和安全問題。

六月三日，葉帥在首都衛戍部隊營以上幹部大會上講話時說：

在今天的會議上，將由楊代總長向到會同志，並通過你們，向首都衛戍部隊全體指戰員，傳達毛主席、黨中央、軍委給予你們的保衛首都這一光榮而艱巨的任務。

北京，是我們偉大祖國的首都，是毛主席、黨中央的所在地，是領導全世界人民反帝、反修、反對一切反動派的總司令部所在地。現在，全世界都注視著北京。一切革命人民把北京看作是他們的希望，而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一切反動派，則把北京視作眼中釘。我們保衛首都，就是保衛世界人民革命根據地的中心。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就是保衛偉大的革命旗幟和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偉大的導師。保衛首都不受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一切反動派的破壞和顛覆，就給世界革命人民以最大的鼓舞和信心。

首都衛戍部隊所擔負的任務，是光榮的，同時也是艱巨的。你們要完成任務，必須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堅持四個第一，發揚三八作風，活學活用毛主席著作，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自己，擦亮眼睛，提高嗅覺，團結一致，不斷前進。在完成保衛首都這一任務的過程中，把我們的部隊鍛煉成為非常無產階級化的革命的部隊，使全體指戰員鍛煉成為堅強的革命戰士。

擔任首都衛戍任務的部隊，同野戰部隊有許多不同的特點。小分隊執勤和一兩個人分散執勤的情況比較多，接觸的環境比較複雜，會遇到資產階級各種各樣的誘惑和攻擊。所以，必須加強對部隊的政治思想工作和管理教育，把工作做到基層，做到每個戰士的心上。林彪同志提出，在戰鬥中要發揚孤膽精神。今天在城市裏執行警衛任務，我們要提倡孤忠執勤。在任何情況下，要對毛主席、對黨、對人民無限忠誠，要成為黨和人民的馴服工具，忠心耿耿地愉快地完成任務。

毛澤東點火

六五年上海會議解決了羅瑞卿的問題，六六年間三、四月間，毛主席在杭州兩次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會上批判了羅瑞卿，這是繼上海會議以後，在最高層次的會議上評判羅瑞卿。會上，主席提出「現在有些共產黨員反對共產黨，反對馬克思主義」，也批評了彭真搞的《二月提綱》。

六六年四月，中央組成由鄧小平、彭真、葉劍英為領導的工作小組（實際上葉帥主持會議），又對羅瑞卿批判了一個多月。

中央五月在北京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由劉少奇主持，會議批判了彭、羅、陸、楊等人，會後立即在黨內傳達了中共中央的《五一六通知》，在傳達貫徹《五一六通知》的時候，劉、鄧本人也把彭、羅、陸、楊罵的狗血噴頭。這次會議事實上就是劉、鄧「司令部」的垮臺，可悲的是由他們自己「宣佈」的。

五月二十八日，中央宣佈新的中央文革小組成立。劉、鄧、彭的老文革小組，從此就不復存在了。

六月一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號召群眾起來造反。

五月到七月，中央宣傳部、《人民日報》社、北京市委都先後改組了。劉、鄧賴以搞文化革命的機構，宣傳工具，輿論陣地都由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司令部佔領了。六月間，北京大學哲學系聶元梓等的大字報，由毛主席批准，由新華社廣播了，《人民日報》社刊載了。大字報的矛頭直接指向了劉、鄧司令部。

六月初，劉、鄧決定中央各部委往北京的高校派工作組，全國各省市，解放軍的高校也派了工作組。學校的群眾，尤其是激進的，和工作組屢屢發生矛盾。

此間，毛主席一直沒有回北京，主席在背後看。「鎮壓學生運動」的把柄被抓到了主席手上後，七月八日，毛主席回到了北京，開中央全會倒劉的條件就有了。其實，劉少奇的問題並不在於派不派工作組，在於毛要不要劉少奇，毛決意不要劉少奇了。

一九六六年八月一日到十二日，黨中央在北京召開了八屆十一中全會。會議由毛主席主持。出席全會的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一百四十一人，各有關方面負責人和首都高等院校革命師生代表四十七人列席了會議。十一中全會是分兩段進行的。前一段在北京飯店舉行，後一段在京西賓館舉行。兩段之間，大約有個把星期。按照後來毛主席所說，全會是宣佈了劉少奇、鄧小平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破產，毛主席與劉、鄧相對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發動起來了。全會在文化大革的進程是一次重要會議。要說《五一六通知》是指向劉、鄧司令部的幹將「彭羅陸楊」，十一中全會就是向劉少奇直接開火了。

會議開始時，由鄧小平宣佈會議議程：一、通過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二、討論和批准中央在十中全會以來的工作；三、確認五月政治局擴大會議關於一些同志任命的決定；四、通過全會公報。接下來是劉少奇講話，按照常規他向全會匯報了十中全會以來的工作，並對派工作組的問題承擔了責任。會議開得「不痛不癢」，毛主席不高興，劉少奇講話時，主席常打斷劉少奇的話，說派工作組是「方向性路線性錯誤」，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上」。爲了把火點起來，八月四日，毛主席舉行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在會上有幾段講話，話說得很坦率、很

直接：「在前清時代，以後是北洋軍閥，後來是國民黨，都是鎮壓學生運動的，這與陸平、蔣南翔有什麼分別！」「中央自己違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課半年，專門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學生起來了，又鎮壓他們。不是沒有人提過不同意見，就是聽不進；另一種意見卻是津津有味。說得輕一些，是方向性問題，實際上是路線問題，是路線錯誤，違反馬克思主義的。這次會議要解決這個問題，否則很危險。」「自己下命令要學生起來革命，人家起來了又加以鎮壓。所謂走群眾路線，所謂相信群眾，所謂馬列主義等等都是假的。明明白白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反對無產階級。說我反對新市委就是反黨，新市委鎮壓學生群眾，爲什麼不能反對？！」「我是沒有下去蹲點的，有人越蹲越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反對無產階級。規定班與班、系與系、校與校之間一概不准往來，這是鎮壓，是恐怖，這個恐怖來自中央。」「北大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是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巴黎公社宣言。貼大字報是很好的事，應該給全世界人民知道嘛！而雪峰報告中卻說黨有黨紀，國有國法，要內外有別。大字報不要貼在大門外給外國人看見。其實除了機密的地方，例如國防部、公安部等不讓外人去看以外，其他地方有什麼要緊。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也容許群眾請願、示威遊行和告狀。而且言論、集會、結社、出版自由，是寫在憲法上的。從這次鎮壓學生群眾文化大革命的行動來看，我不相信有真正民主，真正馬列主義。而是站在資產階級方面反對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當劉少奇說到，我在北京，要負主要責任時，毛澤東說：「你在北京專政嘛，專得好！」

當葉劍英說到，我們有幾百萬軍隊，不怕什麼牛鬼蛇神時，毛澤東說：「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第二天主席就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開始對劉少奇下手。

十一中全會，是因爲形勢的變化臨時決定召開的。林總當時在大連休養，原定不出席中央全會，並向中央請了假。全會進行了幾天之後，毛主席突然決定要林總回京參加會議，林總是幾經催促才回京的。

當時，林總毛家灣的住房正在維修，林總回京之後立即住在人民大會堂的江蘇廳。他是上午回到北京的，按時間計算毛主席才睡覺不久。

於是，他想先休息後才去見毛主席。不料，毛主席還沒有睡覺，在專門等候林總回來，他們很快會面了。

後來林總見到我們時說，毛主席見到林總時，向他說：「現在形勢變化很快，群眾起來了，這是出乎預料之外的。出了這樣大的問題，你現在是非回來開會不可了！」

林總說：「主席在家坐鎮就好，一切都好辦。對當前出現的問題，令人擔憂；但在主席領導下，是完全可以對付的。我所擔憂的是，主席的身體要緊。現在主席是進入了『戰時』指揮所，希望主席睡好覺，才能更好地指揮作戰。」

在全會中間，林總在人民大會堂河北廳，向出席會議的軍隊代表講過一次選拔幹部的標準問題。我參加了聽講。

林總說：「看幹部，首先要看他是擁護毛主席的，還是反對毛主席的；是不是突出政治；革命幹勁是不是高。要看到主流和支流。」「幹部政策就是不要和事佬。所謂人緣很好，就是工作中怕得罪人，我們不要選這種幹部。我們要擁護毛主席的，突出政治的，有革命幹勁的好幹部。這是方向性的問題，我們的軍隊按照這樣作是一種面貌，否則就是另一種面貌。」「今後我們的幹部政策應該是，誰反對毛主席，就罷誰的官；誰反對突出政治，就罷誰的官。不管他有天大的本事。」「兩種政策，兩種路線。一種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突出政治，有革命幹勁；一種是不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不突出政治，單純軍事觀點、技術觀點，謹小慎微。我們不要把我們的軍隊變成萎靡不振的軍隊。對犯錯誤的幹部，能教育的要教育，能爭取的要爭取，不可救藥的罷官。」「要通過這次運動，全面地審查幹部，該昇級的要昇級，該罷官的要罷。我們軍隊幹部如果再出現反對毛主席的，就是最大的恥辱。」

陶鑄在小組會上，對林總的講話，同樣發揮得很精彩。他說：林總的講話是有目的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風浪中，怎樣保護好的和比較好的幹部，是一個關鍵性的問題。他接著說，搞文化大革命，有三條是絕對不可少的。這就是：毛主席的絕對權威；黨委領導和廣大幹部上第一線；軍隊支持文化大革命。這三條少一條都不行。但文化大革命的發展並不是陶鑄所講的那樣，都在所有老幹部預料之外的。最大的變化就是黨委垮臺了，「造反派」奪了權。

十一中全會的特點

十一中全會，可能與以前的全會都不同。中央文革後來解釋，十一中全會是「造反」會議，這種解釋是有根據的。

全會的特點之一：毛主席號召造反。對全會震動的最大的，是八月五日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這是黨內生活出現的新事物。從大字報的內容看，完全可以看出是針對劉少奇的，但為什麼要「炮打」就不理解了。當時，會內會外，都認為要打倒劉少奇了。會議中間的一個晚上，總理把參加會議的不少軍隊的同志叫去，給我們吹風，我是跟楊成武一起去的。總理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的作用比林彪大多了。總理把主席的大字報唸了一遍，直截了當地說：劉少奇不成了，辜負了主席；林彪同志幾十年來一直是擁護主席的，主席號召全國學習解放軍。

接著，總理又說：可能大家沒聽清（總理唸毛主席的大字報），我再唸一遍，不過今天的會議內容不要外傳，聽安排，今後要把會開好。說完總理又唸了一遍主席的大字報。開會前，大家都在那興高采烈、東拉西扯地亂談一氣，散了會大家的話就少多了，不過也沒有什麼緊張的，各自上車回家了。

毛主席除了發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之外，在兩個月以前還批准發表了聶元梓的「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八月一日寫了致清華附中紅衛兵的一封信，從上述一系列活動表明：毛主席依靠「造反派」搞文化大革命的指導思想就明朗化了，要拉解放軍來為他保駕護航。過去的運動主要是依靠黨委領導，依靠老幹部，依靠群眾的大多數，即使有些偏差運動後期也能糾正過來，關鍵就是有各級有黨的領導。文化大革命就不同了，依靠力量變了，依靠的是中央文革，依靠了少數造反派為骨幹，這就決定了文化大革命一定要遭到最嚴重的損失和最終的失敗。

全會的特點之二：「革命師生」參政。過去，有過領導幹部列席中央全會，一般幹部列席全會的聽都沒有聽說過，這次是別開生面，有「革命師生」（包括聶元梓）列席會議。

全會特點之三：劉少奇泰然自若。劉少奇是比較成熟的政治家，在十一中全會上表現出老練、沉著的風度。

劉少奇我並不熟悉。一九四〇年二月間，在河南洛陽才第一次同他談話。當時，劉少奇（化名胡服）任中共中央中原局書記，秘密住在洛陽。我由延安帶中央財經工作團到山東，路過洛陽。我臨離開延安時，毛主席同我談過兩次中原的形勢和戰略方針問題，要我路過洛陽時，一定要向劉少奇轉達清楚，因為有些話，電報上還不好說，同時也難於說透徹。我到達洛陽時把毛主席的話向劉少奇詳細轉達了。劉聽後說：「你的話轉達得很清楚，對中原今後的鬥爭是一個根本問題。」由於工作的關係，以後同劉少奇就沒有直接接觸了。

十一中全會鬥爭的對象是劉少奇，我總以為他會很緊張。但他竟同平常一樣的！劉少奇是一個不善言談，更不說笑話的人，也不多說話。以我看到的他在全會的表現，可以歸納為如下三點：一是，胸懷寬廣，若無其事。二是，一切照常，毫不計較。三是，堅持原則，是非分明。劉少奇在小組會上，他總是平心靜氣說，在工作上有錯誤和有過不同意見，同反對毛主席是性質不同的兩回事，不能混為一談！在全會開幕和閉幕進場，他也是堅持原則的，開幕時，劉少奇走在毛主席的後面；閉幕時，他走在康生的後面。

當時，我對毛主席和劉少奇的嚴重分歧和鬥爭瞭解不多，我認為劉少奇有錯誤，但決不是反革命。毛主席打倒劉少奇，是他一生中政治上、組織上最大的錯誤。這一錯誤，給國家造成了災難，破壞了黨的組織原則，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傷害了毛澤東思想和毛主席本人的形象。毛澤東去世後，給劉少奇平反是完全正確的，但措施又不適當。這樣，給劉少奇的平反，在宣傳上又打擊了毛主席。

全會的特點之四：王光美的活躍。王光美當時是劉少奇的秘書，她在全會上露面的時候特別多。她的一切做法，似乎都向大家表示什麼。

我是一九四六年在北平軍調處執行部時認識王光美的。一九五五年，我到北京之後，看到她的機會並不多。現在她的打扮變了，穿的很樸素。在全會期間，王光美對人的態度很謙虛，見到任何人都是客客氣氣的。這使我想到了她介紹桃園四清運動經驗的報告，我去聽過。她不肯在臺上講話，一定要到臺下同聽眾在一起。一次在人大會堂河北廳講話時，她無論如何不肯坐在臺上去，一定要到臺下才講。

我認為在文革中王光美如果有錯誤，批評她是可以的，運動來了一些過火行爲也是不可避免的，但把王光美打成反革命則是完全錯誤的。

全會的特點之五：會議期間，出席十一中全會的人員，到清華看大字報，參觀文化大革命，自由參加，我也參加了。

全會的特點之六：劉少奇下臺，林彪成了中央唯一的副主席。據葉帥在京西賓館講過：在十一中全會的後期，即選舉中央領導機構之前，中央常委開過一次很重要的會議。會議討論的問題，對中央的決策和黨的團結起了重要的作用。

當時參加常委會的，除常委：毛主席、林彪、周恩來、朱德、劉少奇、鄧小平等外，還吸收了陳伯達、康生、陶鑄、葉劍英參加。會議由周恩來主持。會議的議題是討論《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但實際上是批判劉少奇。在葉帥那裏閒談的有好幾人。其實葉帥並非閒



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林彪接見革命群眾。

談，而是在對我們進行思想教育。葉帥還說：十一中全會的最後階段突然根據毛主席的建議，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根據毛主席的提名，選舉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十一人：毛澤東、林彪、周恩來、陶鑄、陳伯達、鄧小平、康生、劉少奇、朱德、李富春、陳雲。陶鑄、陳伯達、康生、李富春是新當選，劉少奇、朱德、陳雲的位置明顯拉後了，林總引人注目地排到了被看作爲接班人位置的第二位。這些對我們來說，都是出乎意料之外的。

歷史的教訓

文革已經過去三十多年了，往事歷歷在目，黨在這段歷史上有深刻的教訓。毛主席去世後，後來的中央領導人把毛主席領導的文化大革命看爲是他的「最大罪行」，並做爲反毛主席的主要根據。事實上，毛主席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與劉鄧的文化大革命相對立而來的。也就是說沒有劉鄧的文化大革命在前，毛主席就不一定會有他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種形式，當然，主席打倒劉少奇，是下了決心的。

說來也是，毛主席不反對劉鄧的搞法，劉鄧的文化大革命就會繼續下去的，其後果也是不可設想的，這種搞法也是不成的。每個大學都派了工作組，都搞幾十個、上百個三類學生（即反動學生），全國就有幾十萬，甚至上百萬，這如同第二次反右鬥爭，也是後患無窮的。當然，按照毛主席的搞法，事實證明災難更大，因爲反工作組，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祇是爲了打倒劉少奇而抓他的辮子，而十六條就直接指出「運動的重點是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樣，群眾的矛頭就對著各級的領導幹部來了，結果全國的黨政軍都亂了。我所在的總後系統，院校特別多，總後黨委也按中央的指示派了工作組，結果總後黨委和我本人都付出了沉重地代價，我幾乎被造反派打死。文革後我們的黨並沒有認真地反思，不少人重新上臺以後，就忙著打擊報復、整別人，什麼教訓也沒接受。其實，應當說毛主席發動文化大革命時，反對文革的人並沒有多少，包括劉鄧在內；文革後痛恨文革的大有人在。他們痛恨的也祇是文革使他們受衝擊下了臺。他們重新上臺以後，與毛澤東晚年的錯誤有過之而無不及，比如：個人站在黨之上，充分利用手中的權力。

附：毛澤東《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呵！請同志們重讀一遍這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可是在五十多天裏，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聯繫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的嗎？

第二十三章 軍隊文化革命的方針和三個階段

軍隊的文化革命對全國的文化革命是舉足輕重的。穩定軍隊，還是搞亂軍隊，直接關係到黨和國家的命運。

六六年五月間，葉劍英元帥在中央軍委常委擴大會議上，傳達了林總提出的軍隊文化革命總方針是：軍隊不搞「四大」，進行正面教育，既要搞好革命，又要保持戰鬥力，加強戰備。這是完全正確的方針。從元帥到軍委常委及參加會議的軍委辦公會議成員、各總部、各軍兵種、各大軍區、各院校負責人，都完全擁護這條方針。

軍隊當時的三大任務是：戰備、國防施工、農副業生產。文化革命初期，在各級黨委領導下，各項工作都搞得很好，軍隊的戰備一直是常備不懈的。

在六六年十月以前，對軍隊的文化革命，都是中央軍委常委直接領導的，從批判羅瑞卿開始的。各級黨委通過批羅，使軍隊進一步團結起來了。六六年十月以前，即軍委《緊急指示》發佈以前，各級黨委的精神狀態很好，認真抓各項工作，一點害怕和顧慮都沒有，甚至覺得文化革命是學生的事情、地方的事情，軍隊是不介入的。地方上的不少領導幹部，對軍隊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時的狀況是十分羨慕的，他們在軍隊都有老戰友，不少人還在軍隊避過難。

當時的軍隊文化革命小組，是在總政領導下的，組長是劉志堅。工作人員都是總政的，同時，也從各軍區選調一些人來協助工作，以記者的身份做聯絡工作和調查研究。這期間，葉帥主持軍委日常工作，每個星期至少開一次常委會，而且多數都是擴大會議，討論軍隊的文化革命。全軍文革的正、副組長以上都列席會議。在軍隊還沒有出現造反派之前，會上對文化大革命的討論都是很熱烈的，發言踴躍，大家說話也隨意。

當時，全軍文革提出的主要方針是：徹底進行革命大批判；徹底批判羅瑞卿的流毒；徹底轉變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對徹底進行革命大批判，全軍文革提出來的任務是：參加批判、出大字報的人數，要達到各單位、各部門總人數的95%以上，出大字報的數量按人頭計算要達到200%以上。即每個人要寫兩張以上的大字報。此外，對牽涉機密的意見，重要的意見，還可寫小字報，按系統上送。

記得在一次軍委常委擴大會議上，許光達說：「我就可以寫十張。」王樹聲說：「你寫十張算什麼，一百張也可以。」有的人說：祇要有紙、有筆墨，要寫多少有多少。劉志堅看大家漫不經心，又有諷刺的意味，便解釋說：中央文革提出數量的要求，就是要造成一種革命形勢。我們的意見是，祇要是擁護文化大革命，把矛頭指向修正主義和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就行了。

聶帥說：「這樣做，什麼用也沒有，祇有糟蹋紙就是了。」

接著，也有人說：我看事情也不是那樣簡單，還是不要隨便說為好。今天說了，明天怎麼樣？還不知道會發生什麼想不到的問題。

總之，大家七嘴八舌還說了很多。大家的發言都不著邊際，事實上也就等於沒有討論了。

葉帥笑著說：「會議開得活躍。大家發言時，可以將今天全軍文革提出的三個問題談談自己的認識。」

然後，葉帥要全軍文革劉志堅組長把準備展開討論的問題向大家簡要說一下。劉志堅看大家的思想離他要講的距離太大，就簡軍說了一下也沒有說出一個所以然來。這樣，葉帥就以插話的方式，把劉的話打斷了，他接著說了話。

葉帥說：「當前文化大革命一個中心問題，就是學習，像過去打仗一樣，在戰爭中學習戰爭。文革是一個大關卡，大家必須過的。毛主席最近指示說，我們的同志，對文化革命不理解，不認真，不得力。這三個『不』，不是正是指的大家沒有學好嘛！所以學習是主要問題。」

葉帥接著說：「昨天下午，我去向林總請示今天開會的問題。林總有三點指示：（一）毛主席說，軍隊的文化革命由軍隊自行決定，不照地方的辦法。軍隊堅持正面教育，不搞『四大』（會場上熱烈鼓掌）。（二）軍隊高級幹部，不要怕別人革自己的命，就怕自己不革命。（三）軍隊要特

別警惕企圖搞亂軍隊的人。對這種人，不論來自何方都必須嚴肅對待。上面三點就是軍隊文化革命的方針，我們要堅決貫徹執行。」

葉帥最後說：「今天會議開的很好。當前工作就以全軍文革提出的三個問題，認真去做併力爭做出成績來。」接著，葉帥調轉話題，講了向地方學習的問題。

葉帥說：「我們向地方學習，祇學習好的革命精神。在文化革命中，我們的任務是穩定軍隊，搞好戰備。我們對穩定的看法，主要就是看領導幹部站在那一邊。大家都站在毛主席一邊，站在林副主席和中央軍委一邊，我們就穩坐釣魚臺。軍隊雖然不搞『四大』，但也決不會是一點風波都沒有的，大家在思想上要有準備。現在有人正在組織什麼『造反突擊團』，並公開說：『主席表揚了聶元梓，軍隊為什麼不可以出聶元梓？』這種想法要不得呀。」

聶帥插話：「軍隊的幹部不許造反，什麼人要造反，我們同他要『涇渭分明』（熱烈鼓掌）。」

《五一六通知》下發後，總政治部由蕭華主持，制定了軍隊文化革命十二條，對機關、院校、部隊的文化革命分別作了規定，提出了要求。這是對軍隊文化革命「正面教育」的具體化。當時，總政治部的規定是正確的。

軍隊的文化革命，經過了複雜、曲折的過程，但主要的三個階段又是很清楚的。六六年五月到十月初《緊急指示》公佈是第一階段；六六年十月到六七年上半年是第二階段；六七年五月「五一三」開始，到一九七一年九月「九一三」，為第三階段。

在第一階段之內，全軍基本上是穩定的，全軍的文化革命在各級黨委領導下，有秩序地進行，主要是「抓革命、促戰備」。在轉發中央工作小組關於羅瑞卿問題的報告時，葉帥、蕭華、楊成武、謝富治批羅的發言，作為附件下發全黨了，各級黨委主要是傳達批判羅瑞卿的文件。五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是劉少奇主持的，會議之後，毛主席也沒有回京，林總不知主席下一步是什麼打算，就到大連去了。去前他指示全軍不能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六月一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因為社論是毛主席批准的，使北京的政治空氣變的非常緊張，大家開始聞到了火藥味。當天晚上，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又播放了聶

元梓的大字報。第二天（六月二日），《人民日報》又全文刊登了聶元梓的大字報和毛主席代《人民日報》寫的評論員的文章。這樣，北京的高等院校沸騰起來，全國的高等院校反響也很強烈，開始亂了。學校的黨組織立即癱瘓，並開始揪鬥學校領導幹部。爲此，毛主席非常高興，說這是革命師生「造修正主義的反！」「群眾發動起來了！」

這時軍隊的高級幹部，甚至軍委的領導，感到有些緊張，這種緊張不是因爲自己的原因而緊張，而是害怕地方的風吹到軍隊來。林總說「不介入就不緊張！」林總是高明的。

八月一日召開了八屆十一中全會。毛主席不斷催促林彪回京參加會議，林一拖再拖終於在八月六日回到北京，周總理親自到西郊機場接林彪（後來林總說，總理在機場就跟他攤了劉少奇的牌）。林彪這個人考慮問題是很縝密的，在大的問題上一般不會輕易「騎」上去，林總這回被主席召回北京，趕著「騎」上去了，這一「騎」上去，下來就難了。此時，林一方面頌揚毛主席，頌揚文化大革命；一方面強調軍隊不能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林總對部隊是非常愛惜的。對林總的指示，葉、聶、楊都執行的很堅決。

六六年六月以前，機關的文化革命主要是學習毛主席著作，七月到十月開始，在內部出大字報和小字報，機關的業務工作照常進行。

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主席接見紅衛兵以後，上海二醫大成立了造反組織「紅縱」，就違反軍紀跑到北京，鑽進總後機關裏來了。他們在禮堂、飯堂到處帖大字報，矛頭主要指向我和副部長饒正錫同志，但機關則秩序井然，一點也不亂。各領導機關是不怕「造反派」的。「造反派」妄圖搞亂機關，反而把機關鞏固起來了。機關本身的「造反」分子，多數是在群眾監督和包圍之中。反對「造反派」成爲機關絕大多數人一致的行動。

軍以下的野戰部隊，一直不准搞任何形式的「四大」。

當時蕭華、劉志堅他們是總政的主要領導又是全軍文革的領導，是主管軍隊文化大革命的。文革是毛主席發動的，毛主席不斷叫理解，叫跟上，江青和中央文革又不斷給軍隊施加壓力，這樣，再不跟上，就是對毛主席的態度問題了，態度問題就是立場問題。我想蕭華、劉志堅他們有以公心擁護毛主席的一面，但也有以私心擁護毛主席的一面，支持

在軍內造反，就是以私心擁護毛主席的一面，當時軍隊亂了他們是有責任的。李曼村、謝鏜忠和他們手下一大群《解放軍報》記者，這些人就不同了，他們是軍內張春橋、王、關、戚式的人物，他們非常「理解」毛主席的革命路線，並想在軍內培養聶元梓式的人物，同時自己也能在文革中飛黃騰達，搞亂軍隊他們是有「功」的。

六六年十月到六七年上半年是第二階段。這一階段是部隊最複雜、最混亂、最黑暗的階段，十月五日，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發出《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緊急指示》的主要精神是同意部隊搞「四大」。《緊急指示》是「放」的指示，這一放不要緊，整個局面亂的不可收拾。六六年國慶節後，參加國慶活動的軍隊院校學生大部分都沒有回去，脫離了學校的領導在北京和地方院校搞串聯，接著就開始在軍內造反，矛頭直指各總部，各軍、兵種領帥機關，而後又到各大軍區造反。當時，省軍區以上的領導機關和院校都亂了。有的機關，如總後、南京軍區則亂透了。

六六年十月五日，中央軍委發佈《緊急指示》，是完全錯誤的，使軍隊文化大革命 180 度大轉彎，這是劉志堅、李曼村、謝鏜忠等人把軍委往邪路上引的結果。不過，在當時的情況下，極「左」的東西出來，也是擋不住的，「擋不住」和「往邪路上引」，在思想深處是不一樣的。蕭華、楊成武沒擋住，葉帥、聶帥沒擋住，林總也沒擋住。這道命令改變了中央軍委關於軍隊文化革命的總方針，允許院校搞「四大」，成了軍隊大亂的突破口。

這樣一來，原來按中央軍委的方針進行文化大革命的各總部、各軍兵種的黨委領導，一下子成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執行者，軍隊領導幹部被揪鬥得很厲害，軍隊的工作全面陷入被動，大家怨聲載道。葉帥、聶帥、林總很生氣又很無奈。當時，我們還看不清毛主席的總意圖，但葉帥、林總他們似乎已經體會到了。因此，毛主席對部隊的問題給軍隊發出各種指示時，林彪、葉帥、聶帥就祇有服從了。軍隊內部搞四大，軍隊機關搞亂了；軍隊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對地方搞支左，結果又大都支了保，支錯了。葉帥、聶帥終於忍不住了，結果愛護部隊卻成了「二月逆流」。

這一階段是軍隊各領率機關的大亂時期，尤其是六七年一月，徐向前當全軍文革組長（經江青提議、毛主席批准的）和江青搞在一起，把軍隊就徹底搞亂了。造反派衝擊機關，殘酷揪鬥各領帥機關的領導幹部，尤其是我，幾乎被打死。

經林總、葉帥、聶帥、楊成武（楊成武雖然大力巴結江青，但對穩定部隊還是做了大量工作的）等人的努力，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林總親自起草了軍委《八條命令》。軍委《八條命令》對穩定大局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六七年一月底軍委《八條命令》頒布和三月全軍高幹會後，中央軍委決定對部隊的「造反」分子一律實行軍紀制裁，這對部隊的穩定，保持戰鬥力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六七年初，在全軍文革的示意下，《解放軍報》社少數造反分子，企圖撰文煽動全軍搞「四大」。《解放軍報》的社論都排上版面了，中央軍委林彪、葉劍英、聶榮臻等及時發覺了他們的陰謀，命令立即撤版，果斷制止了。

由於地方造反風潮對軍隊的影響，內蒙古軍區警衛營三百餘人，未經領導批准，集體跑到了北京，要求搞「四大」。葉副主席代表中央軍委命令北京衛戍區用了相當的兵力，採取了最爲嚴厲的措施，將跑到北京的內蒙古軍區警衛營全部捉拿並送到六十三軍訓練改造。爾後，大部分的內蒙古軍區警衛營全部遣散回家去了。在文化革命初期，昆明軍區某炮兵團就成立了昆明軍區「造反突擊團」，造反派依靠這個造反組織進行武鬥。

雖然軍委《八條命令》是毛主席同意簽發的，但軍委《八條命令》執行後，中央文革又是不滿的，生怕壓住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毛主席也說過：仗著八條，抓人太多。葉帥聽到後氣的不能自己。聽葉群說，有一次在毛家灣，葉帥坐在會客室不說話也不走，林總一直陪葉帥坐著，誰也不說話。軍委《八條命令》出臺以後，軍隊各級黨委、各級領導的確當成了法寶，打擊了「造反派」，有的甚至開了槍，如趙永夫。因爲元帥們有氣，軍委《八條命令》的頒布又使他們發火有了本錢，這樣「二月逆流」的發生勢在必然，軍委《八條命令》本身對毛主席的路線就是最大的「逆流」。毛主席把老一輩的黨、政、軍主要領導人大都給扣上「二月逆流」的帽子，進行批判。「二月逆流」的本質不在於這些老同志說了什麼話，而在於毛主席要壓住這股反文革的「潮流」，所以叫「逆流」嘛。

當時，爲了顧全毛主席的大局，林總和葉帥、聶帥商量，又於六七年四月六日發出《中央軍委命令》，即十條。十條是對八條的否定，毛主席有所滿意。

當時，部隊各機關已經亂的不可收拾，葉帥、聶帥戴著「二月逆流」的帽子，領導已經無力，蕭華搖搖欲墜；楊成武陪毛主席在外，部隊基本上群龍無首，這時看守小組成立了，由吳法憲、葉群、邱會作、張秀川組成。

軍隊大亂的主要責任是江青、中央文革直接插手了軍隊的文化革命，直接責任就是當時的全軍文革劉志堅、蕭華、徐向前。江青和全軍文革相勾結，把軍隊搞亂了，最後他們自己也沒保住，反而先行下臺了。現在說蕭華、劉志堅的倒臺是因爲他們抵制了江青、中央文革而獲罪，是不符合歷史事實的，尤其劉志堅的倒臺是在「二月逆流」之前，當時葉帥、聶帥還在主持軍委日常工作，葉帥有相當的決定權。

按照總政的規定，院校、科研單位、文藝團體等單位是文化革命的重點部門。六六年國慶節以前，在校內可以出大字報，但不准大字報上街，不准到地方串連，也不准地方的造反派到軍隊內來。另外，軍隊院校的文化革命初期，按照中央（劉、鄧主持工作）的部署，總政指示各單位「摸底排隊」，把「革命對像」的重點分子找出來，這種做法，成了院校的大災難，稱爲「黑材料」。「摸底排隊」準備整人是全軍文革佈置的，這是執行劉鄧時期的決定。劉鄧垮了以後，他們看到上面的風頭，鼓動軍內造反也是他們幹的。運動來了，他們想整人，想發「政治財」。六六年九月下旬，軍隊文革提出：軍隊院校的學生想念毛主席，他們又不能串聯，希望批准軍隊院校的師生到北京參加國慶節。其實是全軍文革是打著「軍隊院校師生想念毛主席的」幌子，實際上是打算利用軍隊院校來京串連，搞亂軍隊。中央軍委在討論這個問題時，許多人提出了激烈的反對意見。主持會議的葉帥，開始傾向大多數人的意見，後來由於劉志堅點到了要害處，即對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態度問題，葉帥也有很大壓力，就祇有同意全軍文革了。這個歷史性的錯誤，主要責任在全軍文革。葉帥負有決策上的重大領導責任。

十月《緊急指示》發佈以後，軍隊院校就照地方學校一樣搞「四大」了，大約在一個月時間內，軍隊一百多所院校的領導班子，一個不剩的

全部垮臺了。毛主席高興地說：「軍隊院校吆吆吆（111所院校），的確有妖」。這樣就助長了軍隊院校學生造反的氣勢和掀人的風頭。毫無例外，所有軍隊院校的造反學生都衝到他們的上級機關。軍隊機關大亂就是從此開始的。

《緊急指示》發佈後，中央文革非常滿意。全軍院校的學生來京參加國慶節之後，本應回到各自的學校去，但根本就做不到了。在中央文革和全軍文革縱恣和支持下，學生們就在北京立即紛紛成立戰鬥隊，衝擊各總部、各軍、兵種機關，鬧的各機關都雞犬不寧，全軍文革的意願實現了。不僅如此，全軍文革還鼓動葉帥等軍委領導，接見來京的軍隊院校師生。葉帥對軍隊造反派的破壞力是估計不足的，他同意了。

十一月十三日，中央軍委的領導在北京東郊工人體育場接見了全軍院校的師生員工。參加接見的有：葉劍英、賀龍、陳毅、聶榮臻、徐向前和各總部、軍種、兵種的首長。接見開始時，由葉帥領頭，在廣場繞遊一周。我記得，此後，聶帥、楊成武則退席了，未曾上主席臺參加大會。

接見之後，即舉行了大會。蕭華主持大會，葉帥發表了適合學生心意的長篇講話。葉帥講，熱烈擁護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相信群眾，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等，葉帥還專門謳歌了林副主席，他說：經醫生檢查，林副主席的身體非常好，可以活一百歲，這是我們革命事業的重要保證！我們祝林副主席身體永遠健康！葉帥的講話，贏得了學生最爲熱烈的喝彩，學生鼓掌的時間比他講話的時間還長。葉帥也表現了元帥的「風度」，不時站起來向學生揮手致意！

參加接見的領導幹部，有不少人對中央軍委接見學生就很不滿意，對葉帥的講話更不滿意。我同許光達、蕭勁光等人坐在一起，一直心情沉重。我們在談論：「今天葉帥的高興，就是我們明天的災難，也許包括他本人在內，都是要受難的！」

六六年十月前後，北京各總部、軍種、兵種、院校的首長，由於特別痛恨「造反派」，經常地三三兩兩「自由結合」到葉劍英元帥那裏去訴苦。葉帥開始時都是聽別人說話，自己不說話，也不搖頭或點頭。後來，葉帥的態度變了，痛恨造反派。葉帥很快就「醒」了，他是個很有正義感的人，雖然他也「馬失前蹄」，卻也實屬無奈，因爲搞不好就是對毛主席的態度問題，隨時有被打倒，被衝跨的可能。葉帥爲了保衛人民解

放軍，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十一月二十九日，中央軍委的領導，又在工人體育場接見了全軍院校的師生。葉帥和陳老總都發表了較長的講話，對軍隊院校師生衝擊各總部，各軍、兵種機關，揪鬥領導幹部和其他胡作非爲提出了嚴厲的批評，並要求軍隊院校師生回到學校就地鬧革命。

會後，葉帥親自帶著空軍司令吳法憲和政委余立金，深入到前門大磨場的小巷子裏，那裏是空軍的招待所，空軍一高專的教員彭謙是軍隊造反派的總頭頭，葉帥爲了保衛軍隊的大局屈就上門與彭謙談話。彭謙這個混帳反而趾高氣揚，不聽葉帥規勸，口口聲聲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口口聲聲敬愛的江青同志，葉帥震怒之下，立即叫隨從的衛戍區部隊把彭謙給抓了，葉帥深深感到保衛部隊的穩定是非常重要的。在葉帥的精神鼓舞和支持下，各大單位對造反派更加不滿，並開始整頓紀律了。總參、空軍、海軍、總後都抓人。總後拘留錢信莎，把另一個頭子王香谷抓了起來，對造反派管得更嚴了。祇要中央文革、全軍文革不借用造反派的名義整人，各單位管好造反派，是一件最爲平常的工作。

在動亂中，林總、葉帥對軍隊幹部是愛護的。軍委通知各大軍區的主要領導，都到北京京西賓館來「躲反」、「避難」，宣佈京西賓館不許衝擊，並由衛戍區嚴加把守，在形勢穩定下來才陸續回去。這和地方幹部相比是天壤之別了。

在全軍文革領導下，軍隊批判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始終都是積極的。當時造反派還成立了「鬥羅（瑞卿）籌備處」，這是一個凝聚全軍造反派的核心組織，幹盡了壞事。我就被二醫大「紅縱」押去參加過他們三次批判大會，以「殺雞給猴看」。

一次是在總後大操場，這次到會五萬餘人，批判大會由院校「造反派」聯合主持。批判的對象有：彭德懷、黃克誠、羅瑞卿、譚政等十餘人。羅瑞卿因爲腿傷是用一個筐子抬到會場上的。坐在那個筐子裏受批鬥長達三小時之久，是十分痛苦的。一次是在軍事博物館門前的廣場。這次到會的人數可能兩萬多人，批判會同樣由軍隊院校造反派聯合主持。這次主要是批判劉少奇叛徒集團，那天的會，祇押著我到廣場看了一下「盛況」，沒有要我參加大會，可能因爲我不是叛徒之故吧。還有一次是六六年十一月六日晚，在後勤學院禮堂。這次到會的人數有近兩千人，「紅縱」頭子錢信莎主持的批判大會，參加大會的是以「紅縱」爲主

的造反派，還有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數百人到會，哈軍工的造反派頭戴柳條帽，手持短棒，活像要吃人的豺狼一樣。會議開始時，錢信莎命令饒正錫做「檢討」，饒祇講了幾句，就有人把稿子搶走了，並停止了他的講話，很顯然，饒正錫做檢討是陪襯的。接著，錢信莎命令我做檢討。我的講稿很短，講了不到十分鐘。針對我的檢討，「紅縱」即進行批判。我和錢信莎的父親錢益民很熟悉，但她完全不把你當作領導和長輩，整個會場上殺氣騰騰。

其實，在文革中軍隊搞打砸搶的造反派，不論是揪鬥羅瑞卿的，批判「彭黃賀羅」，對我及軍隊老幹部殘酷武鬥的，還是六七年「五一三」後，被我們整肅的，都是一夥人。但奇怪的是，「九一三」後，羅瑞卿重新上臺，他反而把殘酷迫害他的這些傢伙，包括「鬥羅籌備處」的造反派豢養成了他的紅人，用這些造反派又替他去整林彪「死黨」。更有甚者，公審的時候，這些傢伙又坐在公審的主席臺上，煞有介事地裝成「正義」的化身。

六七年初，新的全軍文革成立，徐帥爲組長，江青爲顧問。新的軍委文革的主導思想是「不要怕亂」，這樣，軍隊省軍區以上的機關在軍隊院校造反派的重新衝擊下，大亂了。各大軍區，各軍、兵種多數是受自己所屬學校和文藝團體的造反派衝擊而大亂的，有的也受到了地方造反派的衝擊。

總後勤部是全軍文革直接調遣來的造反派二醫大「紅縱」搞亂的。徐向前是元帥，是軍委副主席，我應該尊敬他，可是在他任全軍文革組長時，真是左的很，對待軍隊老幹部和葉帥、聶帥、劉帥完全是兩樣。這期間，祇要徐帥接見群眾，必先大罵劉志堅是壞蛋，這明顯是向江青和中央文革示好，因爲劉志堅得罪了江青。徐帥直接點楊勇、廖漢生的名，讓批倒、批臭；也多次點蘇振華的名，說他是彭黃漏網分子，並批准把蘇振華抓起來。更有甚者，徐帥竟說賀龍要讓許光達當總長，據我所知，這祇是一個笑話，賀老總不會許過這種願。……這樣，軍隊亂了，葉帥火了。他在京西賓館的會上給徐帥拍了桌子，把手指都拍斷了。官方的書上說，葉帥是對中央文革拍桌子斷了手指，這不是事實。

文化大革命是在混亂中進行的，這種混亂，後來發展到毛主席自己也難控制的程度。當時，省、市以上的機關，幾乎都讓造反派取代了。

當時，祇有中國人民解放軍完整無損，軍隊保持了穩定，這是決定中國命運的大事！對我們的黨和國家起著脊梁骨的作用。從當時的實際情況來看，如果軍隊也亂了，就會超出文化大革命本身的問題。其結果也就不會是大亂的問題，而是黨和國家及人民軍隊的存亡問題了。

造反派的出現，並能興風作浪，毛主席的支持是起決定作用的，中央文革小組是全國造反派的司令部。六六年十月軍委《緊急指示》發佈以後，全軍文革小組也就成了軍隊造反派司令部。造反派很快就在全國各地的軍隊單位揪鬥領導幹部。在這樣的情況，軍隊要制止「造反派」的破壞幾乎是不可能的。當然，對「造反派」也要做階級分析，其中大多數群眾是好的或比較好的，毛主席號召造反，一哄而起。但在造反的隊伍中一些對共產黨有仇恨的階級異己分子、國民黨的特嫌分子、舊軍警分子等趁著文化大革命，以「極左」的面目出現，打著「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幌子，殘酷揪鬥老幹部，煽動派性，挑動武鬥，搞打砸搶，對文化大革命本身起到了很大的破壞作用。而這種以「造反有理」為幌子的破壞活動，都倒了全軍文革的縱惠和支持。

究竟怎樣制止造反派的破壞？這裏僅以軍委炮兵機關文化大革命為例。軍隊大軍區以上的領導機關，造反派奪取了領導權，並成立革委會的，軍委炮兵是唯一的一個。即使象總後機關成了大亂的典型，造反派也並未敢奪取領導權。

六七年一月間，炮兵司令吳克華，仿照上海的「一月革命」的方法親自起來造反，組織了「造反突擊團」，一舉奪取了領導權，把炮兵政委陳仁麒，副司令吳信泉、匡裕民，參謀長丁本淳打成「反黨集團」並處罰到農場勞改。

中央軍委對炮兵的「造反奪權」是十分關注的，但處理起來也是棘手的問題。從文化革命總的形勢來說，對造反派不能公開反對，從制止造反派對軍隊的破壞來說，對造反派應當堅決反對和取締，這就是尖銳的矛盾。怎麼辦？「祇做不說，心中有數，決不手軟」就是辦法。

從六六年底，到六七年三、四月間，我記得軍委常委擴大會議上，對炮兵的文化大革命討論過三個問題，對每個問題都得到了「處理」。

(1) 關於批准炮兵成立革命委員會的問題。在軍委常委擴大會議上，葉帥一看到報告的題目就說：「對這個問題，由全軍文革按照規定辦理。」

全軍文革劉志堅說：「按規定，就是要中央軍委批准呀。」葉帥根本沒有再理睬，就說其他問題，這樣，也就算「處理」了問題。

(2) 關於接見炮兵造反派問題。炮兵造反突擊團成立後，全軍文革提議中央軍委接見一次，以鼓勵軍隊機關的文化革命，並列為軍委辦公會議的一個議題。會議開始大概祇有五分鐘，聶帥就大聲說：「葉帥，今天要討論的問題很多，要抓緊時間。」葉帥會意，就連聲說：「是的，是的。」在討論完其他問題後，葉帥就宣佈散會了，把全軍文革關於接見炮兵造反派的報告放在一邊了，也就算「處理」了。

(3) 關於批准成立全軍科技戰線造反團的問題。在軍委常委擴大會上，葉帥祇看到全軍文革報告的題目，連內容都未看，就大聲同聶帥說：「這個問題怎麼辦？」聶回答說：「我不知道有什麼戰線！」葉帥說：「由全軍文革辦理。」這也就高明地「處理」了。

從處理上面三個問題完全可以看出，中央軍委對「造反派」的立場、態度和處理問題的方法了。當時，公開反對是不成的，公開反對立即就會變成對毛主席的態度問題，對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態度問題。

六六年底，北京醫院已經不「安全」了，總理叫我把住在北京醫院的幾個黨和國家的領導幹部以及著名的民主人士轉到三〇一醫院高幹病房，並囑咐我祇能讓院長靳來川知道，再就是告訴葉帥。葉帥非常負責，以軍委的名義下命令：三〇一高幹病房人不許衝擊，醫務人員不許責，在病區搞四大。劉志堅、李曼村這些全軍文革的頭子，非常不滿。劉志堅的老婆劉蘭英（劉志堅的辦公室主任），親自打電話給我，問三〇一高幹病房藏著什麼人，我就是不告訴他，祇說軍委有命令。我越不告訴他們，他們越來勁，不但向江青匯報了，而且由李曼村親自出面，叫醫院政委白崇友發動三〇一護校的造反派衝擊三〇一高幹病房，由於衛戍區嚴防死守，沒有得逞。鄧穎超住三〇一醫院，醫院的造反派走漏風聲，二醫大「紅縱」爲了打擊周總理的養女龍書霞（龍飛虎的女兒，她是反對二醫大「紅縱」殘酷揪鬥老幹部，到處搞打砸搶的），闖到鄧穎超的病房去要脅。總理知道這些人的行徑後很生氣。

上海「一月革命」之後，反派奪取了領導權，對全國各地，對軍隊的影響很大。

上海奪權之後，全軍文革一幫人和軍隊的造反派更加手癢的不可忍耐了。二醫大的造反派頭頭如錢信莎等人，都特別想當軍隊的聶元梓，李曼村、謝鏗忠這些人就想當軍隊的張春橋。而且，他們望著的「用武之地」是整個的軍隊。他們給徐帥出了很多壞主意。

六七年一月初，趙爾陸、李天煥、王秉璋、杜義德和我同在西山軍委戰時指揮所「躲反」。當時，能夠到西山躲反的，都是經過葉帥或林彪總批准的。趙爾陸是林彪要他到西山躲起來的。但徐帥以不要怕群眾為由，把我們都趕下山去，當時是最亂的時候，我們都遭到殘酷武鬥，我幾乎被打死，趙爾陸在同造反派的鬥爭中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臨下山前幾天，我們兩人在趙的住處，從晚飯後一直談到快拂曉才散的。趙說：「羅瑞卿倒了，賀龍也不成了，他們把我整的厲害呀。本應把工作好好抓一下，現在又躲在這裏。誰怕群眾？徐向前在說風涼話」。幾天後趙人命就沒有了。林總知道趙爾陸死後，竟然不信，他反覆說：「不是在西山嗎，怎麼就死了？」

趙爾陸是不怕造反派，而又死在造反派手裏的。誰願意戴上怕造反派的帽子？！趙一回到機關就被造反派抓起來了，並用極其惡毒的手段，對趙搞長時間的批鬥。趙患有嚴重心臟病，身體終究是支持不住的。造反派把趙關進了他自己的辦公室，同外面不能聯繫，甚至連一口水也喝不上。他死的時候，左手的中指和無名指之間，還夾著一支燃著的紙煙，手指的肉都被燒焦了。開趙爾陸同志的追悼會，大家都傷心地流了淚的！

六七年五月「五一三」開始，到一九七一年九月「九一三」，為第三階段。在將近四年半的時間裏，軍隊極大多數都是穩定的。軍隊的穩定，是中央軍委、林彪、葉劍英、聶榮臻等副主席的功勞。這裏還要特別指出的是，楊成武、黃永勝兩個時期的軍委辦事組對穩定軍隊都是有很大貢獻的，尤其是黃永勝時期的軍委辦事組，貢獻更大。黃永勝時期的軍委辦事組，不但很好穩定了軍隊，還支持周總理、和老同志一道支撐著黨和國家，同時，還在極其複雜和艱苦的環境下和中央文革、江青一夥進行了堅決的鬥爭。以黃永勝為組長的軍委辦事組是有大功的。軍委辦事組堅決抵制了江青插手軍隊，也不許軍隊有江青的代理人。沒有江青一夥插手軍隊破壞搗亂，軍隊才能穩定。

這個時期，軍隊整治、處理了造反派，和後來整治「三種人」是一樣的。治理了他們對軍隊的嚴重破壞，健全了黨委來領導文化革命。軍隊的文化大革命、三支兩軍、戰備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績。六九年三月，我軍取得了珍寶島邊防戰鬥的勝利，是對軍隊的文化革命和戰備的一次很好的檢驗。

附：「一〇五」緊急指示

中共中央批轉軍委、總政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

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中央各部委，國家機關各部委黨組黨委，各人民團體黨組，解放軍總政治部：

中央完全同意軍委、總政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中央認為，這個文件很重要，對於全國縣以上大中學校都適用，同樣應當立即向全體學生和教職員工原原本本的宣讀，堅決貫徹執行。

中央
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

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

各軍區、軍種、兵種、院校、總參、總後黨委、政治部：

軍隊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把院校作為重點之一，總的說來形勢是好的。但是，有些領導機關和院校的領導過分強調了軍隊院校的特殊性，至今還有壓制民主的現象，不許班、系、校串聯，把運動搞得冷冷清清，甚至挑動學生鬥學生，打擊左派，嚴重地違背了黨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即十六條。因此，根據林彪同志的建議，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必須把那些束縛群眾運動的框框統統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樣，完全按照十六條的規定辦，要充分發揚民主，要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在這方面，軍隊院校要作出好的榜樣。在運動中不許挑動學生鬥學生；要注意保護少數，凡運動初期被院校黨委和工作組打成「反革命」、「反黨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志，應宣佈一律無效，予以平反，當眾

恢復名譽。個人被迫寫出的檢討材料，應全部交還本人處理，黨委或工作組以及別人整理的整他們的材料，應同群眾商量處理辦法，經過群眾和被整的人的同意，也可以當眾銷毀。要充分信任群眾，不要怕群眾，要敢字當頭。要相信院校的學生和教職員工的絕大多數是革命的，好的，他們是聽毛主席的話的，聽黨的話的，他們革命的大方向始終是正確的。也要看到軍隊院校領導和教職員工中，確實有一小撮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壞傢伙，一定要借文化大革命的東風，把他們揪出來，徹底鬥，徹底批。同時要確實掌握林副主席對領導幹部所提出的三條標準，即高舉不高舉毛澤東思想紅旗，擁護不擁護毛主席；是不是突出政治；是不是有革命幹勁，進行檢查。還要注意，要文鬥，不要武鬥。

以前軍委總政對院校文化大革命的個別規定，如關於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運動在撤出工作組後由院校黨委領導的規定；關於指揮學校的學員隊開展文化大革命的作法與連隊相同的規定；關於祇在軍種兵種院校範圍內不在軍種兵種院校範圍外和地方學校串連的規定等，已不適合當前的情況，應當宣佈取消。今後各院校應按照十六條的規定由革命學生和教職員工選舉成立文化革命小組、文化革命委員會和文化革命代表大會，作為文化革命的權力機構。為了搞好軍隊院校的「鬥批改」，應當允許進行革命串聯和調查，但軍隊院校不要干涉、介入地方的文化大革命。

這個指示，應立即向全體學生和教職員工原原本本的宣讀，堅決貫徹執行。

軍委、總政
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

中央軍委命令（軍委八條）

中央軍委命令

所定八條，很好，照發。

毛澤東
一月二十八日

根據毛主席的指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已進入全面階級鬥爭的新階段，軍隊必須改變過去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規定。為了適應兩個階級、兩條路線鬥爭發展的新形勢，特規定如下：

一、必須堅決支持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派，爭取和團結大多數，堅決反對右派，對那些證據確鑿的反革命組織和反革命分子，堅決採取專政措施。

二、一切指戰員、政治工作人員、勤務、醫療、科研和機要工作人員，必須堅守崗位，不得擅離職守。要抓革命、促戰備、促工作、促生產。

三、軍隊內部展開文化大革命的單位，應該實行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充分運用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嚴格區別兩類矛盾。不允許用對待敵人的方法來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不允許無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許任意抄家、封門，不允許體罰和變相體罰，例如，戴高帽，掛黑牌，遊街，罰跪，等等。認真提倡文鬥，堅決反對武鬥。

四、一切外出串連的院校師生、文藝團體、體工隊、醫院和軍事工廠的職工等，應迅速返回本地區、本單位進行「鬥批改」，把本單位被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篡奪的權奪回來，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

五、對於衝擊軍事領導機關問題，要分別對待。過去如果是反革命衝擊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衝擊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後則一律不許衝擊。

六、軍隊內戰備系統和保密系統，不准衝擊，不准串連。凡非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檔案和技術資料，一概不得索取和搶劫。有關文化革命的資料暫時封存，聽候處理。

七、軍以上機關應按規定分期分批進行文化大革命。軍、師、團、營、連和軍委指定的特殊單位，堅持採取正面教育的方針，以利於加強戰備，保衛國防，保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八、各級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要用毛澤東思想嚴格管教子女，教育他們努力學習毛主席著作，認真與工農相結合，拜工農為師，參加勞動鍛煉，改造世界觀，爭取做無產階級革命派。

幹部子女如有違法亂紀行為，應該交給群眾教育，嚴重的，交給公安和司法機關處理。

以上規定，從公佈之日起，立即生效。全體指戰員、院校師生、文藝團體、體工隊、醫院和軍事工廠的職工同志，必須嚴格遵守，違者要受紀律處理。

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

中央軍委命令（軍委十條）

中央軍委命令

（一九六七年四月六日）

林彪同志：此件很好。

毛澤東
四月六日

毛主席指示，中國人民解放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大力支持左派，這是一個偉大的、具有戰略意義的決定，是一個嶄新的歷史任務。我軍廣大指戰員，積極響應偉大領袖毛主席的號召，在支左工作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最近我們檢查了某些軍區的支左工作，有的做得好，有的做得不好。目前出現了許多新問題，應當及時引起嚴重注意。為此，特發佈命令如下：

（一）對群眾組織，無論革命的、或者被反動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況不清楚的，都不准開槍，祇能進行政治工作。

（二）不准隨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對於確實查明的反革命分子要逮捕。但必須證據確鑿，經過批准手續。

（三）不准任意把群眾組織宣佈為反動組織，加以取締。更不准把革命組織宣佈為反革命組織。對於犯有某些錯誤的群眾組織，要積極進行幫助教育。對於確實查明被反動分子控制的群眾組織，要做分化爭取工作，孤立其最壞的頭頭，爭取被蒙蔽的群眾。必須公開宣佈其為反動組織加以取締的，要經中央批准。

（四）對於過去衝擊過軍事機關的群眾，無論左、中、右，概不追究。祇對業已查明特別壞的右派頭頭，要追究，但應盡量縮

小打擊面。不能僅僅根據是否衝擊過軍事機關這一點來劃分左、中、右。

(五) 對待較大的群眾組織採取什麼態度，應就地深入調查研究，進行階級分析；採取重大行動前，應向中央文革和全軍文革請示報告。

(六) 一概不要進行群眾性的「請罪」運動。也不要強迫群眾寫檢討。群眾自動寫的檢討書，退還其本人。有些長期不覺悟並且堅持錯誤觀點的群眾，不要急於要他們認錯，而要給以時間，讓他們在鬥爭中自己教育自己。不允許體罰和變相體罰。例如，戴高帽，掛黑牌，遊街，罰跪，等等。

(七) 在軍隊中要深入進行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兩條路線鬥爭的教育。學習毛主席著作，必須結合兩條路線的鬥爭。廣泛搜集揭露反動路線和一小撮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各種具體材料，印發到連隊進行教育，使廣大指戰員瞭解他們的反動事實，進行徹底批判，肅清其惡劣影響。

(八) 對派到地方上去或主持支左的幹部，要詳細交待政策。要防止趙永夫式的反革命分子（趙永夫原青海省軍區副司令員，是一個混進黨內軍內的反革命分子，他玩弄陰謀手段，篡奪軍權，對革命群眾組織進行殘酷的武裝鎮壓）或思想很右的人來主持支左工作。

(九) 在支左工作中，要學會做群眾工作，相信群眾，依靠群眾，有事同群眾商量，善於採用說服教育的方式，而不應採取簡單粗暴和命令的方式。

(十) 對業已違反了上述諸條做法的，都要立即改正，積極進行善後處理。今後，堅決按以上各條辦事。

這個命令，要在我軍所有機關、連隊內部用電報、電話迅速傳達，廣泛張貼。

第二十四章 全軍文革支持造反

總政李曼村與總後結「冤家」

從六四年開始，中央佈置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一般也稱「四清」。總後是一個在京直屬單位很多的領導機關。由於歷史的原因，總後又是一個在編制上「矮人半頭」的單位，所以政治運動一來，總政往往在總後直屬單位做試點。

五九年，林總主持軍委日常工作，他提出「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突出政治」，「三八作風」等一系列建軍方針是完全正確的，全軍上下一致叫好，總後也是堅決貫徹，堅決緊跟的。但是，總政長期高高在上，他們在工作中往往不是說服而是壓服，這樣「突出政治」便是壓服別人最好的大棒，實際上他們搞的不是「突出政治」，而是「空頭政治」。總後是一個幹具體工作的後勤保障部門，一切工作都是實的，來不得半點「空頭政治」。這樣，總政和總後形成的對立情緒是很大的。

軍事醫學科學院（後字二三六部隊）是一九五一年在上海成立的，後遷來北京。這說明中央及中央軍委對軍事醫學的研究是非常重視的，楊立三、黃克誠、洪學智對軍事醫學科學院的工作都是很重視的。軍事醫學科學院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最高醫學科研機構，當時好像設有放射醫學、基礎醫學、微生物流行病、藥理毒理、部隊衛生營養等研究所。主要從事平、戰時特殊環境、特殊損傷醫學防護和衛生防疫技術、裝備及相應基礎研究。這裏彙集了一批專家和優秀的科研人員，但他們中間的不少人來自舊社會，因而階級成分和社會關係不可避免有些問題，這是客觀事實，關鍵是我們做領導的要正確對待。

總後系統文化革命開始於軍事醫學科學院六五年的四清。總政直接領導「四清」的單位，軍事醫學科學院是點，三〇一醫院是面，以點代

面。總政派出了以宣傳部長李曼村爲組長的工作組，總後政治部主任盧南樵爲副組長。李曼村是個「三八式」幹部，山東大漢，有點文化，參加革命後進步較快，解放戰爭時期就當了師級幹部。李曼村應該說是有工作能力的，就是思想左得要命，文化革命開始後更左，害了總後，也害了他自己。

軍事醫學科學院是全軍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而且不少骨幹是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總政工作組沒有注意到這一特點，他們不是對知識分子「搞社會主義教育」，而是對知識分子「搞階級鬥爭」。總政工作組一進駐軍事醫學科學院，就把矛頭對準了知識分子，從院裏到科室對專家、教授搞清查，甚至進行圍攻批判，不少科室的科研工作都被迫停止下來，並且牽動了三〇一（解放軍總醫院）的知識分子，弄得人心惶惶。比如說，有個專家工作表現是不錯的，但他信天主教，就去整人家；再比如，有個專家參加搞原子彈，他說：「我熱愛和平，反對搞原子彈」。可是他說歸說，工作照樣在做，爲了這句話就去整人家。

在對待知識分子的政策上，李曼村怕總後黨委和他們對立，特意請總政主任蕭華到軍事醫學科學院去講話，李曼村向蕭華匯報談到知識分子時說：「都是蔣介石丟下不要的，邱會作當寶貝，每年春節邱會作都要去給專家拜年，送東西，紅軍幹部都撈不上，專家卻都有，專家的工資比紅軍幹部高。邱會作對知識分子太右了。」蕭華的講話受李曼村影響很大，當他在講話中說到「運動的重點是整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時，有人遞條子問什麼是當權派？蕭華說：「室主任以上就是當權派」。這一下全院嘩然！因爲室主任都是專家知識分子，而且都是由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這些知識分子一下全被嚇住了，有幾個人立即表示「不配當」室主任這個當權派，大大影響了工作。我知道這個消息後，對總政工作組很有氣，立即由我口授，由司令部資料處秘書科長劉明璞記錄搞了個講話稿，並拿去給盧南樵徵求意見，盧南樵說：「邱部長講的道理很對，但肯定會被扣上和總政鬧對立，對抗工作組的罪名。」我並沒有在乎這些，對盧南樵開玩笑說：「你要會搞科研就去當室主任，我們不會嘛。歷史會證明誰對誰錯，現在不去管它。」然後，我親自到「二三六」去講了話。

我首先說軍科的「四清」搞左了，矛頭對準知識分子是不對的。我講到有些專家想「撂挑子」也是不對的，要振作起來，敢於擔責任；我也

講到科研任務不能停。在講到知識分子問題時，我說了這樣的話：「你們都是從舊社會過來的，舊社會就是國民黨的天下嘛，不爲國民黨做事爲誰做事呀。知識分子不論是在舊社會還是新社會，要報效國家，但也首先要搞到飯吃，你們爲國民黨政府服務過，這有什麼關係！這不算歷史的污點。……你們現在是在新社會、新中國爲人民服務，不少人說，通過新舊社會的對比，還是新社會好，還是共產黨好，這就不錯嘛。你們祇要認真真工作，搞出成績或一時沒有搞出成績都是報效國家，把自己的本職工作做好就是擁護共產黨。有的人認爲我太右了，我看他們是太左了，不符合黨對知識分子的政策。」我還講到了紅與專的關係，我說：「又紅又專很好，……『紅』不一定就等於『專』了，『專』了不一定就不能『紅』……」我的講話知識分子是歡迎的，對穩定知識分子的思想有作用，對穩定軍事醫學科學院的工作有作用。我認爲我的講話和總後黨委對知識分子的態度是正確的，文革當中，全國不少知識分子都吃了苦頭，而軍事醫學科學院和解放軍總醫院的知識分子是在比較平安的環境下度過的。軍事醫學科學院的知識分子爲我國的尖端科學研究做出了貢獻；解放軍總醫院的知識分子在文革中尊重老幹部、盡心爲老幹部治病，做出了突出的貢獻。當然，我的講話也得罪了總政。

文革開始後，總後黨委往軍事醫學科學院派了工作組，總後政治部副主任新斧爲組長，兩個二級部長羅文、王希克爲輔，他們是貫徹總後黨委方針的。但文革的極左思潮刮起來後，全軍文革神氣了，李曼村這些人更神氣了，他們抓住機會對總後黨委進行報復。軍事醫學科學院是全軍文革李曼村這些人直接搞亂的，他們採取了如下三種手段，一是派全軍文革的「記者」去該院，以採訪的名義煽動搞「四大」，發動機關行政工作人員與科研人員對立。例如，記者說：「軍事醫學科學院的根本問題是知識分子領導了共產黨，而不是共產黨領導知識分子。這是因爲你們邱部長重用知識分子造成的。不久前，他在你們這裏講話，把知識分子寵上天了！對『軍科』存在的問題必須通過「四大」來解決」；二是，通過後勤學院造反派組織「星火燎原」把該院政治部副主任鄭洪泰拉過去（鄭原是後勤學院的幹部）。去的人說：「我們後勤學院文化大革命原來也很落後，現在全軍文革直接管，蓋子就揭開了，文化大革命要靠全軍文革，靠總後是沒有用的」；三是，通過二醫大「紅縱」派人去該院串聯，

把少數「積極分子」組織起來了。但上面三種辦法效果不大，軍事醫學科學院還是亂不起來。

但是，全軍文革下了決心要搞亂「軍科」的。六六年十月間，軍委《緊急指示》下達後，全軍文革從政治學院調了五十餘人的工作組進駐「軍科」，「幫助」搞文化大革命。工作組進院後，採取了搞四清的辦法，把一切權力都奪過去了，院黨委成了他們的辦事機構。

工作組進院不久，全軍文革把他們在防化兵學院搞的「科研單位文化大革命經驗總結」用通報形式印發全軍，並要求立即傳達。我知道後命令該院暫不傳達，我說「這不是經驗，是一桶汽油」。全軍文革知道我的態度很生氣，他們強行通過工作組傳達了。在傳達之後，「軍科」立即亂了，鄭洪泰等人在混亂中奪取了院裏的領導權。把院長、政委關了起來，後來還強迫他們勞動。在工作組支持下，鄭洪泰還當上了「軍科」革命委員會主任，統一掌握全院的領導權力。「軍科」亂了，使人十分擔心。爲了立即解決「軍科」的問題，我向中央軍委、全軍文革寫了正式報告，提出了兩點建議：一，「軍科」的文化大革命由全軍文革直接領導，不和總後搞雙重領導；二，仍由總後領導該院的運動，並立即停止搞「四大」，鄭洪泰停職反省；三，如果上面一、二兩條不能實行的話，對「軍科」這樣特殊科研單位，由衛戍區派部隊「看管」。聶副主席很瞭解該院的情況，他在我的報告上的批示是：「對軍事醫學科學院的文化革命，同意總後黨委的第二條。」葉副主席完全同意聶的批示。

全軍文革對聶、葉副主席的指示不表態。在急得無法可想的情況下，我上聶副主席的門求援。我向他提出現在急不可緩的就是要派部隊對「軍科」這樣特殊科研的單位先「看管」起來。因爲「軍科」有防原子的科研任務，正在聶帥所管轄的工作門下，聶帥完全同意我的意見，我們二人共同向秘書口述起草看管命令，直接送給林總簽發了。衛戍區很快執行了命令，我可放下了一個大包袱。

六七年四月間，我回總後重新主持工作後，向中央軍委提議，對「軍科」實行軍管，軍委批准了。軍管組進院後一個星期，提出把鄭洪泰離職反省，總後黨委在兩小時內就批准了。軍管約一個月就結束了，工作和生活秩序也恢復正常了，被造反派奪取了領導權構的軍事醫學科學院恢復了黨委領導。

二醫大「紅縱」發難

一九六六年的全軍文革，祇是總政領導的一個辦事機構，主管軍隊文化革命的具體工作，總政副主任劉志堅爲組長，他同時也是中央文革的副組長。劉志堅畢竟是個老同志，辦事還有原則，李曼村、謝鏜忠這些人就不同了，特別能接受文革中的極「左」思潮。因爲總後和總政關係一直不好，文化大革命開始後，李曼村搞總後的勁頭大得很。當時，全軍文革還專門下了文件說：三總部不許衝擊（不包括總後）。葉帥對此很生氣，他對劉志堅說：「你們說三總部不許衝擊，括號不包括總後。總後不是三總部嗎？是三總部就不許衝。現在戰備任務很緊，總後衝垮了怎麼搞戰備。」全軍文革這一條沒有得逞，又決定總後是全軍文化革命三大試點單位之一。葉帥關心地對我說：「你的問題是從你反對空頭政治來的，但你不必擔心。林總說過，看他們（指全軍文革）怎樣來，我們就怎樣去，這就是鬥爭。」對葉帥的話，我完全理解。林總對中央文革和全軍文革都是不感冒的，因爲他不願意這些人打著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旗號牽著他的鼻子走。

從文化革命開始，毛主席支持造反派，全軍文革就特別注意發展造反派，從而代替黨委來領導文化革命。軍隊院校的文化革命，原來也祇搞正面教育，不准搞四大，在這樣的情況下，二醫大少數文化革命的「先進分子」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主席接見紅衛兵以後，上海二醫大成立了造反組織「紅縱」，從後來審查錢信莎得知，她通過潘國平同張春橋聯繫上了。

二醫大的文化革命得到了張春橋的支持、關心之後，形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張春橋爲了便於插手和控制上海駐軍的文化革命，對二醫大「紅縱」表示了特殊的寵愛。二醫大「紅縱」也特別賣勁，一直支持張春橋。張春橋第一次接見錢信莎等人時，錢信莎就向張春橋提出請求：「在我們學校有全軍文革派來的記者，他們希望我們派人去北京到總後上訪，但學校不讓走。請春橋同志批准我們去北京！」經過潘國平的活動，以錢信莎爲領隊的「上訪隊」終於組成了，並在張春橋的幫助下與全軍文革取得了聯繫。

錢信莎等人在全軍文革暗中支持下，跑到北京來上訪。這個上訪隊是未經總後黨委批准來搞造反的，也違反軍委的有關規定，總後文辦不

予接待，但還是安排他們住到總後大院外的前門招待所去。全軍文革得知後指示總後文辦，讓上訪隊要住在總後機關大院之內的招待所，我當時沒有在意。這樣，全軍文革就在總後機關內爲造反派安下了一個「白色堡壘」。總後機關的災難也就從此開始了。總後機關成爲全軍大亂的典型，是中央文革支持全軍文革指揮軍內造反派搞亂的。

上訪隊住進總後大院後，機關幹部根本沒有人理睬他們。因此，上訪隊力爭做三件事：一是能生活下去；二是與機關的造反分子秘密聯繫；三是要用肇事的辦法，「讓邱部長犯錯誤」。

一九六六年國慶節前，經軍委批准各地軍隊院校的師生來京參加國慶活動，接受毛主席的接見。軍委對來京的軍事院校有嚴格的紀律和規定，並要求先行到京的「傘兵」（散兵）統一歸建。二醫大參加國慶活動的大隊伍到京之後，住在後勤學院，學校通知住在總後大院內的招待所的上訪隊歸隊時，他們竟拒絕歸隊，總後文辦再三動員都無效。原來全軍文革的記者早就跟上訪隊串通好了，要他們一定要在機關站住腳，以便起到院校和機關串聯的作用。我們「先禮後兵」的工作是做到了，我就向總後文辦交待三條：第一強行歸隊；第二嚴格管理；第三學校實行集體活動。

「強行歸隊」就是上訪隊非回學校住地不可。九月二十六日我下令給學校，限他們在中午十二時前一定要把上訪隊帶回去，學校堅決執行命令。最後上訪隊只剩下五人，他們逃竄到招待所附近的油料化驗室閉門固守。我立即批准破門抓人。但是由於警惕性不高，學校隊伍回營時，全軍文革三名記者混入隊伍同錢信莎等人聯繫上了，引起了後來更複雜的鬥爭。

「嚴格管理」就是所有人外出一定要有學校的假條，否則一律不准外出，這一條就把上訪隊管住了。他們的反抗力也很大，上訪隊的學生王香谷（號稱「軍師」）公開昂首挺胸向外走了，我立即依軍紀下命令把他關起來了。錢信莎外出很晚歸隊遠遠超出請假時間，我同樣立即下令把她禁閉起來了，上訪隊不敢動了。

「集體活動」就是學生一律不准單獨外出活動。在國慶節前不准訪友，外出參觀則集體行動，這一規定，限制了全軍文革在學生中煽動造反肇事。

經過上述工作之後，二醫大基本平靜下來了。除了少數造反派之外，師生都高興。全軍文革活動的餘地小了，他們必須另想辦法。

九月二十七日晚上，全軍文革派了五名記者拿著正式介紹信到二醫大師生住地去「採訪」。當時學校領導並不知道這是個陰謀，按照工作關係接待了他們，並提供了工作上的方便。新去的五名「記者」同原來混進去的三名「記者」匯合後，與學校的「紅縱」頭目通宵策劃後，於二十八日上午，向學校提出晚上要舉行全校辯論會，主要內容是：國慶節軍隊院校在首都怎樣做好樣子。學校未向我請示報告，就舉行了大會，結果學校上當受騙了。

全軍文革派去的「記者」，對「辯論會」計劃得很周到，辯論會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象北京大學的聶元梓一樣，把造反派的牌子亮出來，逼我公開表態承認造反派的革命性和合法性。辯論會分三步走：第一步要把會場衝亂到校領導無法控制的程度；第二步要廝打，打傷得越多越好；第三步造反派衝到圖書館的樓上集中在一起固守。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張家口技術工程學院的造反派已經準備好了，他們接到通知後即可前來支援。

由於學校極大多數學生都反對造反派，學校的軍事生活又嚴格，因而辯論會開始後，全校幾千人的會場秩序井然。造反派分散在自己班級的隊列中不能隨便活動。在一小時多的時間裏，發言的都是正面意見，造反派一個發言的也沒有，因為他們根本得不到發言權。「記者」到底是書生，他們的計劃基本上沒有實現，「記者」急得沒有辦法。

此時，幾個「記者」在一起嘀咕了幾句後，其中一人立即走到擴音機前，向主持會議的人說：「我以全軍文革記者的身份說幾句話」，然後記者大聲說：「今天的會議不是辯論會，是說教會。我們要民主，要說話，要造反！不怕挨打受傷的人衝破束縛就是勝利！」記者說話之後，錢信莎所在的地方亂起來了，此時八個「記者」裝著給學生送水，一起衝到騷亂的地方與錢信莎等會合，他們一起向外衝，而學院隊幹部和學生幹部則往裏拉他們，互相打起來了。學校立即命令：散會！隊伍回宿舍，不准在院子裏活動。學校用了兩個學員隊把鬧事的地方包圍起來了。此時，「記者」示意，錢信莎等人是女同學，要求進室內整理衣服。不久，錢信莎等人把自己動手撕破的衣服拿出來了，還有帶血印的，作為她們遭受圍攻

被打傷的證據。「記者」拿著「證據」，帶著錢信莎到全軍文革控訴總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去了！全軍文革策劃的陰謀得逞了。

九月二十九日，全軍文革小組組長劉志堅拿著二醫大學生被圍攻、武鬥的「證據」到中央文革去開會。江青看了證據之後說：「一個跟著毛主席長大的人（指我）今天也反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反對革命造反派，真是不可想像的事。這是全軍活生生的典型！軍隊的文化革命，不能不使人擔心呀！」

但是，國慶節之前，總後機關一直沒有亂，工作井然有序，幹部上下團結。

軍隊院校進京

八屆十一中全後，地方的大學都在批鬥工作組，勒令工作組交出整學生的「黑材料」，當時把學生分成一、二、三，三個等級。三等的學生就是反動的學生了，運動後期是要處理的，就像反右時處理右派一樣，每個學校搞上幾百個反動學生，全國就是幾十萬，後果也很嚴重。不言而喻，當時按照劉鄧的搞法也是不成的。

按照總政的指示，總後也在一些大學派了工作組，也把學生劃了等級，學生提出「黑材料」問題，也無可厚非。但部隊是組織紀律嚴格的，總後就這個問題請示了總政，總政答覆是：「等通知。」自然，總後對下面的答覆也是：「等通知。」這就引起了學生的不滿和對立情緒，想上北京告狀的學生大有人在，學校不穩定的因素急劇上昇。

八月十八日，毛主席接見紅衛兵後，全軍文革於六六年九月藉機向軍委報告說：軍隊院校的學生們也想念毛主席，前幾次毛主席接見紅衛兵沒有參加上，國慶節的時候希望能批准他們來北京，總壓制下去會產生不良結果。在軍委辦公會議上，大家意見不一，全軍文革的態度很堅決，我們反對這個報告，並認為這是真心支持和愛護葉帥，全軍文革堅持這個報告也說是真心愛護葉帥，葉帥最後同意了這個報告，但心裏有些猶豫，我記得散會時，葉帥還重複說「會產生不良結果，會產生不良結果」，然後邊走邊自言自語開玩笑地說：「現在做事怎麼防賊似的」。軍委雖然同意了這個報告，但要求軍隊院校來北京要由校長、政委親自掛帥，各隊大隊長、政委親自負責，嚴格管理，嚴格遵守紀律。全軍各院

校到北京參加國慶節，這是全軍文革搞亂院校的一種手段，他們利用全軍各院校都在北京的機會，逼著中央軍委批准全軍院校搞四大。

爲了院校參加國慶紀念，總後黨委常委做了認真的討論和具體佈置的。對二醫大參加國慶節則做了周密的安排，力爭做到不出事；萬一出了事也能立即處理。

二醫大校黨委，對參加國慶節的問題，提出了具體建議。他們的意見是「紅縱」骨幹分子一律不許去天安門廣場參加國慶活動。總後常委討論了二醫大的報告，認爲他們對防止造反派在天安門鬧事的精神是好的，但具體政策上有欠妥之處，總後常委的決定是：所有來京參加國慶的學校師生員工，一律參加國慶，但必須是嚴密組織，嚴格紀律，嚴格管理。總後黨委常委、副部長張賢約爲總後勤部參加國慶活動的總指揮，親臨現場指揮，而且二醫大還組織一支有能力的糾察隊，由張賢約直接指揮。

天安門上被告了一狀

十月一日國慶節，我一登上天安門，就有一位老戰友大聲叫喚我說：「老兄！你人還沒有上來，城樓下就有你的光榮榜了。」我順著那位戰友的手向下一看，原來是造反派兩張鬥大字的標語，鋪在金水橋北面的地下。左邊一張是張家口技術工程學院造反派寫的：「強烈要求李天佑停職反省」。右邊一張是上海二醫大「紅縱」寫的：「強烈要求邱會作停職反省」。後來，我同李天佑兩人一起看了那兩張大標語。在文化大革命的氣氛下，我們倆人，當然都有思想負擔。

天安門廣場開始群眾遊行的時候，我看到毛主席手指城樓下，向著總理在說話。由於我站的比較遠，他們說什麼，我不可能聽到。但看毛主席的表情，同平時談笑風生的態度是一樣的。

不久，鄧穎超大姐走到我跟前來，對我說：「你看標語會有壓力吧？不要去管那些事，那是小孩子的事。總理對你都是很瞭解的。紅小鬼什麼風浪都經過了，還有什麼可怕的！」

陶鑄的女兒陶斯亮也在天安門上，他看見毛主席進了休息室，就跑進去向毛主席告我的狀，陶斯亮說邱會作「鎮壓群眾運動」，他以軍隊有紀律爲借口「定了很多條條框框」，不許我們到北京串聯，趕我們回去，

我們「在總後大院連飯都吃不上」。陶鑄看見女兒跑到毛主席身邊去說話，怕她影響毛主席休息，就去叫她，毛主席說：「我想聽聽，做調查研究嘛。」陶鑄和和我甚好，他出來後走到我跟前，摟著我的肩膀說：「嘿，亮亮在主席那裏告你的狀，你對亮亮管教不嚴，她是你的兵。」我不服氣地說：「我前幾天就給她寫了一個條子叫秘書送去，我寫的是『亮亮你不要跟著鬧，要退出，否則我告訴你爸爸了』，她不但不聽，還在大會上念了我的條子，表示要堅決和革命群眾在一起。」陶鑄說：「她怕曾志。」他邊說邊刮了我一下鼻子就走了。事後曾志批評了陶斯亮，陶斯亮很快就退出了。在這裏我想特別說幾句：陶鑄是我的老領導，我對他是很佩服的。他思想水平很高，工作魄力很大，能力強、辦法多、充滿革命激情，對同志非常熱情、關心。陶鑄在文革中不幸去世後，我是很揪心、很難過的。亮亮是他和曾志唯一的女兒，她祇是在文革初期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參加運動，但很快就退出了。亮亮畢業分配去了艱苦的地方，我是不知道的。我當時是完全有權力、有條件關照這件事的，但我沒放在心上。現在想起來有些對不起陶鑄和曾志。

大約在十二時許，總參謀部臨時設在城樓上的值班參謀來同我說：「總理指示，遊行結束後要您稍等一下。」在下午一時左右的時候，總理在天安門上同我和李天佑作了簡單的談話。他說：「從最近全軍文革的材料上來看，你們的日子不很好過。不過，也不要想得過多了。剛才，主席還指著城樓下的兩條標語在說，好人受點衝擊是難免的，這是群眾運動的特點。你要找李、邱談一下，要他們兩人不要有什麼負擔。」

在天安門城樓上發生的事，我的思想當然是不平靜的，我始終就認為造反派本身是烏合之眾，並不可怕。當時造反派還沒有那麼大的膽量，敢把大標語搞到天安門，沒有人背後支持是辦不到的。祇有當權派利用造反派來興風作浪，造反派是會吃人的！

十月四日，中央軍委舉行常委擴大會議，專門討論院校文化大革命的問題。除辦公會議成員外，各總部、各軍兵種首長都到會了，會議由葉帥主持。

開會的前一天晚上，我們幾個人在京西賓館葉帥的房子裏閒談，葉帥斷斷續續講了很多的話，他以詩人的風度，著重講了「勢頭」的問題，他說：「形勢和勢頭兩者有關係，但又不是一回事。如果把形勢理解成是

客觀存在，那麼，左右這個形勢的力量就是勢頭了。我的看法，現在是造反的力量比革命的力量大得多，造反和革命有聯繫也有區別，大家必須認識到這個問題。我勸你們對這個問題，應當做必要的分析，這也可以說是適應形勢發展的問題。」對葉帥的話，我們祇是聽，一句話也沒有說。我們幾個人走出葉帥的房間之後，都不約而同地有悲歎的情緒，但沒有說什麼就各自走了。

在四日的會上，對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當時有三種不同的意見。即：一律搞四大：一律搞正面教育；或者在兩者之間闖出一條新路子來。第一種意見，即搞四大，這是全軍文革獨一家的意見；第二種意見是極大多數人的要求；第三種意見是葉帥考慮的意見。有幾個堅持正面教育的熱心人，我記得有許光達、李天佑和我等。

由於有葉帥頭一天的談話，我在四號的軍委常委擴大會議上一言未發。在會議上，李曼村對軍隊院校在國慶期間，對機關文化大革命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為主題，做了長篇發言。接著文革組長劉志堅對文化大革命就提出了搞四大的方案。到會的人，對他們的發言，也一言未發，葉帥知道大家的情緒，並沒有要大家發表意見。當時有些冷場，過了一會葉帥請聶帥講活，聶帥在沒有精神準備和情緒不高的情況下講了話，聶帥說：「我這幾天到各機關去走了走，看了一些單位的大字報。我看那些大字報的內容，有的寫得很不錯。對工作上的缺點和領導幹部提出了批評，對今後的工作提出了建議。在此同時，大家也都在堅守崗位，工作進行得很正常，這些都在黨委領導下進行的。我看各級黨委既能搞『武化』革命，也能搞『文化』革命。」聶帥當然是反對搞四大的，但他沒有說出來就是了。

李曼村在聶帥發言之後，繪聲繪色地講了陶斯亮國慶節在天門上向毛主席告我狀的情況，他強調說：「偉大領袖毛主席最痛恨鎮壓群眾。」然後他宣讀了一個學生給全軍文革的一封信，信的內容是要求搞「四大」的，我記得信的內容的大意是：「現在不少領導幹部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和劉鄧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都還不能做出本質的區別。其實它的區別就是照『我』的意見搞文化大革命，還是照毛主席和革命群眾的意見搞文化大革命。前者就是反動路線，後者就是革命路線……」李曼村宣讀這封信，是因為全軍文革對聶帥講話的不滿。當時李曼村這些人挺猖狂的，

不愧是軍內造反派的最好後臺。他這樣猖狂的目的，就是也想在軍隊搞一個什麼「風暴」，以便自己成爲「文革英雄」。

全軍文革把葉帥、聶帥推到大風大浪的浪尖上，暴風雨的風口上，葉帥終於同意全軍文革對今後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拿出一個具體意見來。這個意見就是軍委「一〇五」緊急指示。

「一〇五」緊急指示

六六年十月五日，中央軍委發佈了《緊急指示》，批准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一律搞四大。

過去，軍內都稱十月五日軍委《緊急指示》爲「一〇五」命令。造反派把命令稱之爲「救命令」。從命令的錯誤性質來說，確實是救了造反派，害了極大多數的革命幹部和革命群眾。我自始至終都認爲，「一〇五」命令是軍隊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大錯誤，但這個錯誤也是不得不犯的錯誤，因爲對待毛主席的態度是首位的，毛主席是支持四大的，大家明明知道這種態度要產生極大的惡果，也要支持這種態度，至於產生的惡果，祇有在用加倍的努力工作去挽回、去彌補。林總也祇能同意了這個命令，道理也是一樣的。我要特別指出的是，「一〇五」命令不是林彪搞的，是全軍文革搞的。不過在當時的情況下，葉帥、聶帥沒擋住，林總也沒擋住，誰也擋不住罷了。

十月四日深夜，即「一〇五」命令發表的頭一天晚上，當時的全軍文革組長劉志堅還親自同我打了一個電話。他興高采烈並帶著諷刺的味道同我說：「學校搞四大的命令，明天就要見報了。我特意同你打一個電話，盡量爭取一點主動，又要有精神準備。估計二醫大造反派對你會有些意見，葉帥指示，要我打電話告訴你，先召集小型會議，做必要的自我批評，這樣可以爭取主動。我的意見供參考。」不一會，葉帥又來電話，他說：「要說的話，劉志堅都同你說了。我知道你對軍委的決定是有意見的。邱老弟同志，你知道我心裏是什麼滋味嗎？但不這麼搞就是對毛主席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的態度問題，了得起呀！現在有意見和無意見都要照命令行事。下決心多做點工作，對你可能會有好處的。」由於葉帥同我打了電話，我得立即行動，我分別召集兩派各四、五十人在總後開了兩次會議。我做了簡短的自我批評。「紅縱」的人，聽了我的講話之

後，報以熱烈的掌聲。臨退席時，不少人還同我爭著握手。接著「紅旗」也是四、五十人來開會。我同他們講話之後，沒有一個人鼓掌。退出會場時，有的人同我握手說：「邱部長保重！」有的則哭泣而走，當時，我內心裏也是十分難受的，特別想到總後的幹部群不可避免地會受我的牽連而遭受一場大的災難，心裏就更難受！

「一〇五」命令發表後，軍隊院校的學生在北京有組織的活動就散攤了。我記得除了大同的汽車學校，還是由學校帶隊回去了之外，其餘的學校都在北京象決了堤的洪水一樣潰散了，學校的領導職權立刻崩潰瓦解，不少人領導當時就做了造反派的「俘虜」。

由於全軍文革的李曼村給「紅縱」透了信，在五日清晨，「紅縱」打著旗子在總後大院進行了遊行，慶祝搞「四大」。接著「紅縱」有三百餘人，高舉「紅縱」的旗子，整隊步行去三座門全軍文革慶賀「一〇五」命令的頒布。此時，全軍文革的工作人員還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因為他們還不知道「一〇五」命令的頒布，二醫大紅縱就捷足先登了。

同時，「紅縱」發佈了第一號命令：學校的文化大革命由「紅縱」領導，學校的一切權利由「紅縱」行使，學校的原有領導幹部由「紅縱」集中辦學習班。踢開黨委鬧革命，一切權力歸造反派。二醫大的極大多數共產黨員，青年團員，幹部，積極分子，對學校搞四大都沒有思想準備，也根本接受不了。他們保持沉默的態度對待「一〇五」命令。學校有幾個學生，聯名向葉帥寫了一封最簡單的信。信上大意說：「葉副主席，我們對您十分尊敬！我們認為『一〇五』命令是錯誤的。我們對命令不公開反對，但我們也決不執行。」

中央軍委「一〇五」命令，在當時就是錯誤的，從它的後果來看，也證明了完全是錯誤的。這個錯誤的源頭，還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林、葉向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讓步了。直接的罪魁禍首是全軍文革。第一，院校搞「四大」，對軍隊的文化大革命打開了一個亂軍大的突破口。軍隊院校人數眾多當時約在二十萬人左右。院校是軍隊的組成部分，同機關有密切的關係，同部隊也有一定的關係。院校搞「四大」，直接影響領導機關的正常工作，對部隊甚至作戰部隊也有極大的不良影響。按照原定的方針，軍隊搞正面教育是非常正確的。第二，院校搞「四大」，是給了造反派一個陣地，他們有了這個陣地就可以上衝下連。大軍區以

上所有的機關都是院校造反派衝亂的。有些部隊也是造反派衝垮的。第三，許多院校被造反派搞垮了。不能成爲培養部隊幹部的機構。後來對院校進行整頓是必要的，完全正確的。

江青接見「紅縱」頭目

軍委「一〇五」《緊急指示》後，北京的軍隊各領率機關就亂了，全軍文革操縱、支持的軍隊造反派真是揚眉吐氣了。在李曼村縱恿、支持下二醫大「紅縱」串通後勤學院「星火燎原」和總後機關的「造反派」在總後禮堂、各飯堂到處貼大字報，批判「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鎮壓學生運動的人絕沒有好下場」，這主要指我和副部長饒正錫。說來也奇怪，總後機關很奇怪並沒有亂起來，學習和工作井然有序，「造反派」妄圖搞亂總後機關，反而把總後機關鞏固起來了。機關本身的「造反」分子，多數是在群眾監督和包圍之中，反對「造反派」成爲機關絕大多數人一致的行動。全軍文革很著急，他們竟然請到江青來接見二醫大「紅縱」。這裏的內幕我一直沒有搞清楚。

十月八日，在全軍文革的陪同下，江青在軍事博物館學習館，接見了二醫大「紅縱」勤務組全體成員，這是江青第一次接見軍隊的造反派，這次接見的「壯觀」是空前未有的。全軍文革的全部工作人員和軍事博物館的全體人員，在博物館的廣場上，排成了很長的歡迎隊伍，全軍文革負責人站在隊伍的最前頭。當江青的車來到時，迎上前去給江青開車門，並摻扶她下車。江青下車之後，「毛主席萬歲」，「向江青同志致敬」，「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等口號，響徹全場，直到江青進到室內，口號還沒有停止。

江青進到接見室時，「紅縱」勤務組、全軍文革的記者等人，又在呼同樣的口號。當江青同被接見的人見面時，錢信莎等人則哭成一團，「泣不成聲」。主持接見的李曼村再三說：「我們要高高興興地聽敬愛的江青同志指示」。這時，江青說：「造反派是英雄，不怕流血，也不要流淚！」江青的話音一落，這些人哭得更厲害了。這下可把江青感動了。她站起來，掏出自己的手帕去給錢信莎擦眼淚，並連說：「英雄不哭！英雄不哭！」江青的舉動令全場沸騰起來，江青坐下之後說：「我首先祝賀軍隊也有了革命造反派！你們在北京敢反大人物，敢在太歲頭上動土，敢造你們上司

第二十四年
(均指我)的反，這是了不起的。這就叫做造反派的革命精神！軍隊過去把你們壓得死死的，中央批准軍隊院校搞『四大』，把你們解放了，希望你們大力發揚造反派的革命精神！」

這時李曼村站起來舉臂高呼：「向敬愛的江青同志致敬！」之後又說：「我們全軍文革接受江青同志的批評，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沒有搞好，應由我們負主要責任。過去，江青同志就批評我們沒有到文化大革命第一線去，我誠懇接受批評！」

在接見的當場，全軍文革院校組向江青遞交了一份「紅縱」在京「鬧革命」的報告，其主要內容是邱會作打擊造反派的罪狀，其內容大致如下：

一、拒絕接見「紅縱」上訪隊，致使來訪人員吃不上，喝不上，更沒有休息的地方。機關人員把造反派視為眼中釘。

二、「紅縱」的負責人如錢信莎、王香谷等人被抓起來關押過，這是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典型。

三、總後對「紅縱」的活動有嚴密的監視，「紅縱」的小將遭到了學校組織的圍攻，這是群眾鬥群眾的典型。

四、「紅縱」搞的學校領導幹部鎮壓學生的材料，全部被總後文辦沒收了。

五、總後文辦整理了「紅縱」在京活動的黑材料。

六、總後對二醫大自行離京人員，一律不發路費和糧票。

江青看了報告之後，即發表了講話：「一，我以中央文革小組的名義，今天是第一次接見軍隊的第一個造反派。中央文革和全軍文革都是支持革命左派的。二，『紅縱』在北京的革命精神，我們給予高度評價，特別是敢於批判大人物（指我）。三，文化大革命才開始，希望你們繼續努力。今後可能遭到比現在更大的困難，你們要有充分的思想準備。」

正在接見的時候，二醫大「紅縱」的對立面「紅旗」派出五人代表去要求參加接見。在外面擔任警衛的衛戍區一個副司令員，把條子遞進去了。江青看到條子後說：「我祇接見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的。」江青拒不見擁護中央軍委、擁護總後黨委的「紅旗」。江青接見之後，「紅縱」印了上萬份傳單。除了在北京、上海大量散發之外，他們還派人到全國各地去散發，造成的輿論之大，在當時是罕見的。這次接見，對搞亂軍

隊起到了極壞的作用：（一）鼓勵軍隊也搞「造反派」，起來大造反。（二）「紅縱」的地位提高了。全軍文革院校組的會議，「紅縱」是經常列席的。在全軍文革那裏，錢信莎比我的地位高多了，當時「紅縱」就有人向我勒令：「邱會作的吉姆車應當交給錢信莎使用」。（三）從十月五日之後，軍隊院校在一個星期之內全部亂了，黨委垮了，造反派奪去了領導權。

國慶節之後，軍委決定軍隊院校都要回校鬧革命。迫於形勢，二醫大也要回去，爲了搞亂總後，全軍文革還是背著軍委特別批准「紅縱」在京設了留守處，全軍文革特別批准「紅縱」可以留守五十人。

全軍文革把江青接見「紅縱」的指示奉爲聖旨，他們要求葉帥立即召開有三總部、軍兵種首長參加的會議，傳達江青講話精神。在當時的形勢下，葉帥同意並參加了會議。在會上全軍文革建議傳達討論了三個問題，一是江青的指示；二是以全軍文革的名義發出了堅決貫徹江青講話的指示；三是以軍隊院校「造反派」的名義向江青發了致敬信。「紅縱」有三個人列席了全軍文革的會議。

全軍文革在會上主持討論江青的指示，引起了高級幹部思想的分化，搞亂了部分幹部的思想。當時有位司令員就是倒向造反派，他在發言中說：「今天，全軍文革的會議開得好，使我學到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江青同志的指示，完全表達了毛主席的思想。今後我們是反對造反派呢，還是站在造反派一邊，這是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根本問題。」

全軍文革的領導人對這位司令員的發言大加讚賞。但此人發言的時候，葉帥向他瞪了兩三次眼，暗示他爲什麼要說這樣無原則的話，此人則毫無反映。在會議結束時，全軍文革再三要求葉帥做指示，他一句話沒有說，祇是打手勢，表示沒有什麼話可說。

當天晚上，我記得有王樹聲、許光達、陳錫聯和我等幾個人去京西賓館葉帥住處打聽消息。今天同往常有些不同，我們一進門，葉帥手上拿著一份什麼文件自言自語地在說：「拍馬屁也要找個好對像呀！」接著，他把文件遞給秘書手上，並說：「你附個條子，說這個文件我不看了。」當時，大家都不知道什麼事。我好奇地挨到秘書跟前去看那個文件的標題，原來是一份向江青的致敬信。大家都知道了葉帥不高興是怎麼一回事了。

我們幾個就在葉帥那裏隨便談了一會，葉帥對別人談的問題，提出的問題避而不談，他最後說了文化大革命的領導問題，他說：「共產黨的事要共產黨領導，這是常識，也是一個千真萬確的真理！我想文化大革命祇要在毛主席、黨中央和各級黨委領導下，就什麼都不怕。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有人說我們確實不怕文化大革命，就怕不讓領導文化大革命，這個問題，我有同感，……」

十月中旬，《紅旗》雜誌又發表社論，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全軍文革直截了當的提出了，邱會作是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典型之一。此外，李天佑等人也是在批判之內的。在中央軍委常委討論時，葉劍英副主席不同意把我們作為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典型來批判。他說：「在文化大革命中，犯這樣或那樣的錯誤是不可避免的，不少人都犯有不同程度的錯誤，我也犯過錯誤。我不同意公開批判這幾個同志，如果在軍隊一定要批判反動路線的典型，我自己願意當典型，我代表犯有錯誤的領導幹部接受批判。」在當時的情況下，葉帥和中央軍委常委還是有一定的權威的，擋住了全軍文革企圖批判一批高級幹部的惡浪！中央軍委始終沒有同意對我進行公開批判。

第一次昏倒在批鬥場上

在江青接見之後，二醫大「紅縱」真是瘋狂到了極點。他們被中央文革，全軍文革封為「革命造反派」，這在當時是最高的「榮譽」了。緊接著，「紅縱」把矛頭指向了三個方面，這就是：打垮二醫大「紅旗」；在總後機關組織同盟軍；打倒邱會作。這三者又是互相聯繫，齊頭並進，但以打倒我為主要目標。「紅縱」打砸搶的能量真是不可一世的！

「紅縱」在江青接見他們的第二天，即從十月九日開始，到十一月十七日，在全軍文革縱恿、支持下，對我連續批鬥了四十多天，經常都是晚上八時開始，到次日六時結束，名為要我解答問題，事實上是對我進行精神和肉體的折磨。當時，我既要參加軍委辦公會議的日常工作，又要主持總後的工作，對我的身體和精力來說，早已是滿載超軸了。他們說：「邱會作是鐵人，也能把他燒軟了。」

全軍文革還指使錢信莎組織了「全軍院校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觀摩大會」，實際上是對我的批鬥會。從十一月十六日晚八時開始，先在機

關食堂進行批鬥「預演」，到十七日上午轉到總後禮堂批鬥，下午三時我自己就感到頭暈，支持不下去，祇有硬頂，六時左右就一下昏倒在批鬥場上了。總後門診部立即把我送三〇一醫院搶救。

我到醫院兩小時以後，葉帥就給三〇一醫院下了命令：(1) 要全力搶救邱部長；(2) 要保護邱部長的安全；(3) 不准任何人干擾邱部長的治療。

造反派除了執行全軍文革打擊老幹部的指示外，其餘任何人的話都不聽的。爲了確保安全，二十日晚上，葉帥就派軍委辦公廳科長杜海舟把我接到西山（軍委戰時指揮所，絕對禁區）養病去了。當時，葉帥是有條件保護我的，也是真心保護我的。十一月十三日，葉帥等人在工人體育場接見軍隊院校師生時就說：「二醫大那些同志，搞過了頭就錯了。」

二醫大「紅縱」在總後機關鬧了幾個月，除了批鬥了我幾十次之外，其餘什麼也沒有撈到，由於軍委一再催促軍隊院校的師生要回到學校去鬧革命，十二月底他們灰溜溜地回上海去了。他們是被迫回去的，當然是心裏不服的。中央文革副組長張春橋立即接見了紅縱的勤務組，張春橋說：「你們在北京得到了鍛煉，學到了造反本領，也出了名。特別重要的是得到了江青同志的接見。你們現在的任務是搞好學校的文化革命，隨時接受新的任務。文化革命才開始嘛，英雄還能無用武之地！現在上海的形勢很好，在學校你們是沒有多少事可做了，你們還是要準備上北京的。你們那位部長是又臭又硬的，現在躲在山上同元帥住在一起享起清福來了。這就是他們這些人對偉大領袖毛主席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態度。」「紅縱」很理解張春橋的指示，果然一個多月以後，「紅縱」奉全軍文革的命令，又殺回總後機關來了。

「紅縱」把總後變成鬼蜮世界

造反派利用「四大」的武器是搞打砸搶的能手。他們反對黨委領導，打倒老幹部，打擊革命群眾，搞得天下大亂。造反派的興起，大都是從批判劉少奇、鄧小平開始的。最初起來造反的人，最大特點就是被劉鄧鎮壓過的「冤者」，他們誓死也要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現在看來，按劉、鄧搞運動的方法也傷害了大量的群眾。當然，文革中的亂，毛主席支持造反是決定性的因素，毛主席支持「群眾」反劉、鄧，「群眾」中的一些壞蛋就藉著毛主席支持造反，卻去反對共產黨。形勢越搞越亂。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七日，二醫大「紅縱」按照全軍文革的旨意第二次進到總後機關，到三月中旬，大約鬧了兩個月，他們的主要行徑是：

一、勒令總後黨委不准「擅自」開會（這真是天大的笑話），並要監督黨委會議的召開，他們的無理要求遭到拒絕後，在總後政治部造反派的點撥下，和後勤學院「星火燎原」去搶保密室，企圖搶走黨委常委會記錄。

二、宣佈邱會作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頑固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死不改悔。大肆造輿論說：毛主席、林副主席、周總理過去對邱會作是器重的，現在不保了，並把他交給了中央文革和全軍文革處理。

三、佔領邱會作的家和辦公室，並數次抄家搶劫。

四、大肆抓人。總後機關二級部副部長以上的大部分、處長級的一部分和邱會作身邊的工作人員都抓起來了。對抓起來的人，成天進行批鬥、遊鬥、陪鬥，到處都是打砸搶的聲音。

五、以總後政治部造反分子為主成立了「紅色造反總部」，妄圖統一領導總後的文化大革命。

六、開支大量公款滿足造反派的需要。

七、對機關實行管制。機關工作人員白天不准外出，晚上不准出門。

八、機關內所有房子的牆上，大馬路上都寫滿了大字報、大標語。整個機關沒有一塊乾淨的地方，同垃圾場無異。

九、大肆破壞。黨委辦公室、俱樂部、大禮堂休息室，招待所的電話和用具極大部分都砸壞了，連招待所的被單子上都寫上大標語。

經過造反派的糟蹋，總後機關狼藉不堪，成了鬼蜮世界。

後勤學院的造反派「星火燎原」，是二醫大「紅縱」一手搞起來的。就其本質來說，「星火燎原」、「紅縱」是一樣的。「星火燎原」的特點以頑固著稱，是一部分教員和勤雜人員聚集在一起的。在一九六七年的「五一三」之後，一直負隅頑抗到十月才解體的。當時，軍隊的這種造反派，在北京祇有測繪學院、軍事博物館和後勤學院等三個。

在文化大革命開始時，後勤學院就沒有學生了，學院的教職員工不足千人。學院的政治質量很好，向來的政治運動都是很平穩的。文化革命開始不久，我還去學校看過大字報，在院長戴金川、政委閻捷三等陪同下，我同指揮系的幹部還開過座談會。直到一九六六年十一月間，學

院還是在黨委領導下進行文化大革命的。二醫大「紅縱」在學院禮堂對我進行批判時，學院的幹部也參加了，他們還處處保護我，雖然「紅縱」的批判會對我很兇狠，在臺上也放了高帽子，但始終沒有敢給我戴上。學院的政治質量很好，那爲什麼「星火燎原」會成爲全軍院校的八大左派之一呢？這個問題非常簡單，那就是全軍文革直接參養的結果。「星火燎原」開成立會的時候，祇有七、八個人，二醫大「紅縱」是受全軍文革的委託，主持「星火燎原」成立會議的，並立即得到全軍文革院校組的支持。

「星火燎原」成立後，在「紅縱」的控制下，立即加入了「打砸搶」的行列。當時，在造反派流傳著這樣的話：「星火燎原」是大膽打了三棒成爲軍隊造反派的後起之秀。

第一棒是對總後的文化大革命提出了方針性的意見。一九六六年十一月間，全軍文革機關組在後勤學院俱樂部樓上召集二醫大「紅縱」，後院「星火燎原」和機關的「造反」分子開了一個會，討論了總後機關文化大革命怎樣辦的問題。這是動員造反派搞亂總後機關的會議。

全軍文革機關組組長謝鏜忠首先在會上說：「總後機關的文化大革命，在九、十月間的形勢是較好的，江青和全軍文革都有評價，也很滿意，但現在發生了變化，形勢反而變壞了，已經起來的造反力量也有被撲滅的可能。今天在座的造反派對怎樣幫助機關搞好文化革命負有重任，要提出一個切實可行的辦法來。」

「星火燎原」說：「總後文化大革命能否搞起來，最主要的是上級對邱會作的態度問題，要是把邱會作的威風打下來，總後的文化大革命就成功一半。」全軍文革機關組完全同意「星火燎原」的意見，同時，謝鏜忠還讚揚他們是：「有思想，有見解，有能力的造反派。」

「星火燎原」成立之後，學院政委閻捷三，教育長李汎山，政治部主任王瀑聲就倒向他們了。大約是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初，他們還登門對我「勸降」。他們說：「學院『星火燎原』是新生力量，並且得到了全軍文革的信任和重用。我們特來請求邱部長支持『星火燎原』，這是對學院文化大革命的支持。」我沒有多說什麼話，祇挖苦說：「我要是支持你們學院的『星火燎原』，他們就會立即垮臺的。因爲他們的後臺是二醫大『紅縱』，而我是「紅縱」要打倒的領導幹部中的主要對象。」爲了教育造反的幹部群眾不要陷得太深、少犯錯誤，我派總後文辦的王永久去找「星火燎原」

的頭頭談話，告訴他們：「你們大都是教員，應比學生的水平高。現在總後的領導病的病，休息的休息，祇有邱、張（池明）、饒（正錫）在主持工作。你們可以貼大字報，可以開批判會，但不能剝奪他們的行動自由，影響他們的履行職責。現在戰備任務這麼緊，影響他們對全軍後勤的指揮，是會造成嚴重後果的。」這本是一番好心的話，「星火燎原」的頭頭向全軍文革匯報了，第二天全軍文革的簡報上就刊載：「邱會作同志派總後文辦幹部威脅革命造反派，用戰備之名壓制群眾。」可見，全軍文革和造反派是什麼關係了。

第二棒是幫助高等軍事學院造反派沒有被吃掉。一九六六年冬，高等軍事學院的文化大革命是由領導幹部發動起來的。一派（革命派）是院務部長劉忠爲首；一派（造反派）是政治部主任爲頭目。兩派進行了長時間的武鬥。雙方都建立了戰場、營地、堡壘、工事和路障等。全軍文革院校組要後勤學院「星火燎原」去支援高院造反派的鬥爭。他們積極完成了任務。高院造反派是一個小派，很有可能被吃掉。但在全軍文革的支持下，後勤學院「星火燎原」支持該院造反派不僅沒有被吃掉，反而發展起來了。全軍文革很滿意，並對他們大加獎賞。

第三棒是對總後機關核心要害處，如黨委辦公室、機要保密室、打字室和我的家等處進行打砸搶，企圖搶走檔案，黨委常委會議記錄本和總後的大印。「星火燎原」的頭子王述臣解放前當過偽憲兵隊長，搞這些勾當是行家，比二醫大「紅縱」這些青年學生高明多了。當時總後急需給軍委打一個報告，聶帥收到報告非常詫異，他生氣地對我說：「你真是亂彈琴，給軍委的報告，怎麼是手寫的？！」我說：「聶帥呀，打字室都被造反派搶佔了，實在沒辦法呀。」這樣聶帥才消了氣。

五大部長

部隊的政治部門也是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這些人有文化，政治上比較敏感。在文化革命中，除了院校、文藝團體、科研單位外，政治機關一般是先亂起來的。

二醫大「紅縱」是通過總後政治部「五大部長」把機關「紅色造反總部」組織起來的。「五大部長」是總後機關造反派的核心人物。他們對搞亂機關，批鬥領導幹部，奪取領導權，起到了決定的作用。

在文化大革命中，「五大部長」通過各種渠道，同全軍文革保持著密切的聯繫，對搞亂機關起到了真正的核心作用。

第二，興風作浪。總後機關文化大革命，從開始直到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九日全軍文革組長徐向前給邱會作下一命令之前，都是在黨委領導下，進行得很正常的。這段時間，雖然全軍文革直接指揮，二醫大「紅縱」衝擊了機關，但都沒有亂起來。徐向前不下命令把我送給「紅縱」關押起來，總後幹部的思想就不會發生混亂，總後機關是亂不起來的。這當然是個「奇跡」！這個奇跡是在黨委領導下，經過幹部群眾堅決鬥爭取得的。

二是拒絕造反派進入文辦。參加文辦工作的人，都是對黨的事業忠實可靠的同志，但政治部參加文辦工作的人很少，他們對此恨之入骨。「五大部長」控制的政治部與總後文辦一開始就處於對立狀態。總後文辦

「忍事」。後來，我批評文辦說：「光怕引起事端並不能解決問題，要旗幟鮮明地進行鬥爭，不鬥爭。鬧事的人會越來越兇！」有一次，政治部對一份總後文辦的簡報提出了書面抗議，經過據理鬥爭，他們把抗議書收回去了，從而囂張的氣焰也被打下去了。

三是不准在機關慶祝《緊急指示》。六六年十月五日軍委發佈了軍隊院校搞四大的《緊急指示》。總後政治部的造反派高興極了，爲了在機關發動造反，「五大部長」策劃以政治部的名義召開慶祝會，總後文辦不同意政治部舉行慶祝會，在開會前還相持不下，我親自出面制止。我說：「機關同院校的文化大革命不一樣，對《緊急指示》總後機關無須慶祝！」在當時的情況下，我的話還是很有效的，慶祝會果然沒有舉行。「五大部長」事先已與「紅縱」串通好了，「紅縱」以慶賀《緊急指示》爲名，在機關遊行，宣傳「造反有理」，並準備了大量的大字報。

四是禁止與「記者組」聯繫。全軍文革派出「記者組」到總後機關，是搞亂總後機關的偵察隊。他們的任務與「五大部長」的意願是完全一致的。記者組要來，他們真是高興極了！但事與願違，總後黨委規定：作爲紀律不准任何人單獨與記者接觸。陳政秘密與記者接觸過一次，不到十分鐘就被抓走了，記者在總後機關活動期間，造反分子根本無法同他們接觸。機關管理之嚴密，是記者預料之外的，也是「五大部長」沒有預料到的。

五是不准批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典型。六六年十一月間，全軍文革提出了樹立軍隊院校八大造反派爲革命左派，其中包括二醫大「紅縱」和後勤學院「星火燎原」。同時，全軍文革也提出了要在全軍廣泛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並定邱會作爲全軍執行劉、鄧資反路線的典型。對上面兩個問題，葉劍英副主席不同意。但要批判我的資反路線典型，「五大部長」指使總後政治部的造反派對我所謂鎮壓學生的「罪行」秘密印了一本很厚的材料並急於要開批判會，但軍委當時有指示：「要點名批判總後領導人，則一定要有中央軍委的指示。」「五大部長」無可奈何，祇好泛泛地批判一番就算了事。

總之，徐向前不下命令把我送給「紅縱」關押起來，總後幹部的思想就不會發生混亂，總後機關是亂不起來的。

第三，控制政治部爲獨立王國。總後政治部，由於跟著總政搞空頭政治，在群眾中「有威無信」。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政治部「五大部長」的成員之一就說：「這次文化大革命不是網破就是魚死，別的出路是沒有的。」陳政則說：「死也好，活也好，最重要的一條就是政治部不要被『零的』賣」（意思是把他們這些人拆散，調動工作）。控制政治部爲獨立王國就是由這種思想而來的。他們控制政治部的主要措施是三條：自己鬧革命，保護盧南樵，打倒周長庚。

政治部在文化大革命中舉足輕重，對這點我是有充分認識和思想準備的。但怎樣加強對政治部文化大革命的領導，我則始終沒有想出一個好辦法，權衡利弊還是決定由他們自己管比較妥當。我曾經這樣想過：通過文化大革命，爭取政治部大部份同志站到正確方面來是有可能的。

政治部成立文革辦公室之前，他們採取了一個特別的行動，政治部黨委集體向我請示匯報文辦的人選。在匯報會上，我指定陳靜爲政治部的文革辦公室主任。我的決定完全符合政治部多數幹部的心願。這一決定雖是平常問題，但對政治部則起到了爭取、分化的作用，以宣傳部長、副秘書長爲首的很大一部分同志逐漸站到黨委一邊來了。

兇惡的武鬥昏天黑地

「紅縱」二次來京的當天晚上，就在總後機關俱樂部樓上（「紅縱」的辦公地點）與總後機關的「五大部長」，後勤學院的「星火燎原」開了一個決策會議，他們經過分析說：「現在的形勢很好，主要是全軍文革旗幟鮮明地支持造反派，打倒邱會作的條件是成熟的。現在的中心問題是把邱會作弄到手，我們把他控制起來就好辦了。」

爲了實現他們的目的，他們一是在機關大抓擁護黨委、擁護我的「老保」，一共抓了四百多人，辦公樓全部成了臨時監獄。二是到三座門全軍文革辦公地圍攻糾纏徐帥，逼著他把我交出來。三是大造輿論。造反派在群眾中對我大造輿論，主要內容是：邱部長變了，他變成「反革命」了；敬愛的江青同志定邱會作是「頑固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全軍文革準備把邱會作交給「紅縱」，毛主席，林副主席，周總理現在不保護邱會作了，交給「革命群眾批判鬥爭」。這些謠言，對不明真像的群眾起到了很大欺騙作用。

在造反派橫行的時候，破壞是由亂而來的。造反派把機關搞得到處狼藉不堪，其中黨委辦公室，招待食堂，院內招待所被破壞的最為嚴重。上述三個地方，我都親自看過現場。房內各種設備沒有一件是完好的，黨委辦公室的幾部電話都砸爛了，連喝水的杯子也全部打爛了，院內招待所的被褥大部分被撕爛了，暖水壺全部砸爛了，食堂的桌凳都砸了。上面三個地方所有牆壁上都寫上密密麻麻的罵人的所謂大字報。更使人難於理解的是，招待所的不少被褥上用墨汁寫上了「大字報」。

造反派的另一種破壞，就是對廣大幹部群眾的人身摧殘。在造反派橫行的時期，機關被抓的幹部幾百人，佔機關全體人員的三分之一多，死在造反派屠刀下的，僅機關就有十餘人。這裏祇說工廠部部長張和，電工李為和禮堂公務員劉其三個人之死，就可見造反派殘忍到何等程度了。

工廠部部長張和，湖南平江人。一九三〇年參加了彭德懷領導的平江暴動參加紅軍。他經過二萬五千里長征，並在戰爭年間失去了右腿。他在抗日戰爭後期做過旅一級的職務，一九五五年評定軍銜時，授了少將軍銜。

自從我當了總後部長之時起，對於軍需生產就存在兩條方針的鬥爭。原軍需生產方針是：「低耗，高產，完成計劃」。我則反對這個方針，因為沒有質量要求，不符合軍需品的需要的。我提出的方針是：「優質，高產，質量第一」，這是從軍需品特點提出來的。有的人堅決反對我提出的方針，張和（當時軍需生產部副政委）則堅決擁護我提出的方針，大大改變了軍需生產的面貌。

正是因為張和是支持總後黨委的，支持我的，造反派就把他定為「邱會作的死黨」。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就把矛頭指向張和了，並且對他進行了殘酷鬥爭，直到把他逼得無路可走，死了才了事。首先是對張和戴高帽子遊鬥。他是一個殘疾人，一條腿是假肢，平時走路就要用手杖，但對他進行遊鬥時，造反派就要他把銅鑼掛在手杖上，要邊走邊打鑼喊自己是「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造反派是在對領導幹部進行人身污辱，也是對殘廢軍人，對人民解放軍進行污辱。因為他祇有一條腿，站不住，經不住造反派的體罰，多次跌倒在批鬥場上。

張和受到造反派的打擊之後，我和張令彬還去他家去看過他一次，當時我們也毫無辦法，因為總後的文化大革命是全軍文革直接插手搞亂的，他們打著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招牌揪鬥老幹部。張和想來想去認為沒有前途了，自己又是殘廢，實在受不了造反派的磨難，於是就一死了之。在此，我向張和部長致以沉痛的哀悼！

電工李爲之死的情節很簡單也很殘忍。在文化大革命之初，造反派去變電所鼓動造反，工人們把去鼓動造反的人關起來了，造反派懷恨在心。他們把總後搞亂之後，被關的那個人帶了一群人去變電所算老賬，搞報復，造反派氣洶洶地說：「以前關我們的保皇分子是誰？」李爲毫無懼色地站出來說：「是我！」於是，造反派就把李爲關到原來關造反派的房間裏，由於關人的房子在變電所的後面，又沒有向變電所任何人說過，大家都不知道李爲被關起來了。三天之後，家裏人去找變電所問情況，撬開後面的房子一看，李爲成了殭屍了！李爲死時才二十一歲，是部隊的復員軍人。他工作非常好，大家都很喜愛他。

劉其是禮堂的服務員，志願軍的復員戰士。一九六七年一月中，禮堂有五人值班，其中兩女，三男，造反派知道這一情況之後，有兩個晚上闖進禮堂去企圖姦淫那兩個女工作人員。但造反派不知道樓上還有三個男工作人員，闖進去的那兩個人正要發洩獸行時，男同志聞聲從樓上跑下來，兩人溜走了。不久造反派來了十餘人並手持兇器，把劉其圍起來毒打致死，連劉其的屍首都找不到了。